

外蒙古独立内幕

（1）内容提要

本书依据大量历史文献，全面、系统、客观地叙述了外蒙古从脱离中国到走向完全独立的全部过程，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秘闻轶事和内幕真相。介绍了沙皇俄国操纵外蒙部分王公导演“独立”丑剧，哲布尊丹巴活佛卖身投靠，乔巴山等亲赴苏俄求助，列宁下令红军入蒙“剿匪”，中国外长险遭不测，苏俄被迫承认“外蒙主权属于中国”，斯大林翻云覆雨，宋子文忍气吞声，蒋介石“承认”外蒙独立，引发全国声讨浪潮，莫斯科谈判毛泽东进退两难，北京友好会谈赫鲁晓夫拒不认帐，周恩来仰天长叹无力回天，情节生动、起伏跌宕，扣人心弦、催人泪下。

引子

1986年7月28日，仅有四十七万二千人口的苏联远东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一下子成了举世关注的太热点：善于捕捉信息、嗅觉灵敏的各国资深记者纷纷云集该城；

众多国家的元首及其军政要员也不约而同地把视线聚焦到这个小城；

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大街上彩旗飘扬，巨大的横幅上书写着“热烈欢迎戈尔巴乔夫总书记”、“谁也打不赢核战争、核战争永远不能打”、“迎接亚太和平曙光”……街心广场的灯光新闻牌上不断闪烁着牵动世界的醒标题新闻，过往行人驻足而视。

身佩绶带、钢盔，手戴白手套的武装卫士在大小路口列队而立，还有荷枪实弹的卫队在街头回巡逻。

大雨滂沱，直到早饭时分才停了下来，透过厚密的云幕，偶尔可看见一些微弱的阳光。习惯一早奔向各自工作岗位的市民和有说有笑去上学的孩子们，也一改往日积习都变得脚步匆匆。

就在这时，一阵刺耳的警车鸣笛声打破了小城的安静，一辆辆小轿车风驰电掣般地驶向了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政府礼堂。其中一辆特制防弹黑色的小轿车内，端坐着一位身体结实、服饰鲜亮，神态非凡，颇有学者风度的官员。他不是别人，正是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他将在那里向全世界发表关于亚大地区格局大变动的主要演说。

戈氏从莫斯科动身前夕，苏联外交部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放出这样的风声，戈氏要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就亚太安全问题来个大动作！

风声一出，各国从政府到舆论界立刻有了反响，做出种种揣测，其中议论最多的是中蒙边境。

1921年随着苏俄红军进入中华民国的外蒙古，继而外蒙古宣布“独立”，从此，苏联势

力就稳固地扎下根来，对外蒙古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 1945 年 2 月，在雅尔塔会谈中，苏、美、英三国同意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条件是要求中国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这笔交易实际是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进行的。

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于 1946 年 1 月 5 日被迫正式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后来又撤销承认)，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以及以后的数十年中，外蒙古完全处于苏联的势力控制之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苏联在远东就部署了十七个精锐师和近千架飞机，还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部署了太平洋舰队（以一百艘潜艇为骨干），同时使用着旅顺、大连军事基地，由此不难看出苏联在“帮助中国”的名义下，其“良苦用心”。

1969 年，苏联在阿拉木图开设了新的集团军司令部，当然这也是针对中国而采取的旨在加强战力的措施。根据后来的情报判明，苏联还在塔什干成立了中亚军区，利亚申科大将任军区司令。

中国“文革”期间，中苏边境纠纷日趋激化。据英国战略研究所的资料，1978 年前后，苏联布署在中苏边境仅地面部队就达四十四个师，比 1965 年时增长了 2.6 倍。

1975 年，苏方在中苏边境方向上的各军区司令全由上将担任，在全苏联 16 个军区司令中还有三名大将，而他们都长期在中苏边境地区任职。

70 年代末，苏联在中苏边境修建了三百个机场，以备战时随时增加所掌握的航空兵力。

与此同时，中国方面清楚地意识到苏方的用心，不敢有丝毫怠慢，进行了各方面的加强战争的准备，中国把北京到外蒙古的宽轨铁路改换成中国式的窄轨铁路，还接通兰洲--包头铁路线，并在延长包头向北的支线，以便加大抵抗苏联的纵深。

中国还在内蒙古南侧的长城一线加强防御，构筑了马其诺防线式的要塞地带，准备以顽强的抵抗保卫首都北京和华北这个重要地区的安全！

两军对垒，而且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对垒。在中苏两国七千公里的国境线上，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布署了百万大军，国境线上平均每七米有一名士兵。

苏联全球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不允许在它的身边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国，因为这是苏联扩张其势力范围的巨大障碍。

这样的两军对垒，严阵以待，言其“投一石以震动亚洲，跺一脚全球皆惊”并不过分。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苏联乘着美国在越南战争之后从亚大地区收缩力量之机，执行它的“南下战略”，出兵阿富汗，并支持越南发动侵柬战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方又大量集结陆、海、空三军团于中蒙边境，严重威胁了亚太地区许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安全！

亚太局势的恶化和复杂化，引起了全世界的极大关注！

苏军入侵阿富汗的第七今年头，那里的流血冲突仍在继续，阿人民坚决抗战，使苏军深

陷泥淖，不能自拔，也使苏联的国际威望江河日下，这是苏联犯的重大战略错误。

柬埔寨的抗越战正经受着严峻的考验，中国和其他国家决心支持柬埔寨抗战力量，直到最后胜利。

苏联军事开支以每年百分之三的速度递增，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维持在百分之十一至十三的水平上，经济力量所承受的军费负担比美国高一倍以上，而其经济实力只相当于美的2/3。就连苏联当局也不得不认为，“军费开支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危险象沉睡的火山一样在袭击着80年代的苏联。忧心忡忡的戈尔巴乔夫如坐外地，权衡利弊，他果断下了决心，一定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搬开通向东方的绊脚石。撤军，是以退为进，是为图谋东方、缓和同东方大国中国的紧张关系。

戈氏的视点首先投向了中蒙边境，他要在这个全球炙手的热点处打开一扇向东的窗子，正如有些外国评论家所言，戈氏要利用中蒙边境问题向中国“求爱”了。

经苏联高层决策部门的反复磋商。“求爱”的地点选在了离中国最近的苏联远东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

在弧形瓦房盖顶，巨大的椭圆形政府礼堂的讲坛上，戈尔巴乔夫小心翼翼却又是极其严肃地向全世界发表了一个声明：

目前苏联正同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一起研究撤出驻外蒙的一部分苏联军队！

这个声明，顷刻通过大大小小的有线、无线电波，传遍了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数月之后。

1987年1月5日。苏联外交部宣布，1987年4-6月间，苏联将从蒙古撤回一个摩托化步兵师。

1987年1月11日，苏联国防部宣布、苏军驻扎蒙古的一个摩托化步兵师和几支独立部队开始从蒙古撤回苏联。

岁月匆匆，时光易逝，然而，被蒙古人称之为“俄国佬”的苏联军队撤出外蒙的步履却颇显艰难，一点都不利索。

1989年，苏联宣布，他们将在1990年从蒙古撤走他们5万驻军的75%、以此作为部署在中国边界地区的军队减少20万人的一部分。

一年之后，美国《芝加哥论坛报》发表的一篇题为“在蒙古，苏联人撤走并不很快”的报道，现摘录点滴如下：

“在铁路的运货车上，停着一辆辆苏联的T-52型坦克，坦克的履带上挂着一根根冰柱，

它们正等待着被运回国内。不远处，空空的停机库洞门大开，就象建在白雪皑皑的草原上的爱斯基摩人的圆顶茅屋，苏联的车队正在撤出蒙古，这场运动是要结束插在中国和苏联之间的这个缓冲国的 69 年之久的新殖民地的地位。”

“在站台上，一位中年妇女朝薄薄的冰面上吐了一口痰，然后咒骂了一句‘俄国佬’，表达了大多数蒙古人对驻扎在蒙古的估计为 15 万苏联士兵和技术人员的蔑视。苏联驻军的人数接近蒙古人口的 8%。”

1990 年，苏军在蒙古撤军史上又艰难地碾下了蠕动的一环。

1991 年 8 月 19 日，苏联爆发了改写苏联 70 年历史的“八·一九”事件，戈氏被高高架空，各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整个苏联陷入山重水复疑无路之境，苏联何去何从，这对戈氏来说，已如衣服上的扣子，无需他去多想了。

1992 年，撤军工作完毕！

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外蒙“独立”终于拉上了帷幕。正如蒙古政府的一位新闻官员所言：“在苏联操纵下的‘独立’滋味受够了，真正的独立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评论家惊呼：“呵，苏联东进！代价多么大的高姿态啊！”这句话言中了一半，至于代价，与沙俄 17-19 世纪的东进比起来，这算不了什么，那蒙古独立的前后的风风雨雨，无言地诉说着这一切……

外蒙古独立内幕（2）第一章 中华北疆——外蒙古

第一节 悠悠高原情

中华大地的正北部，横卧着广袤、多山的蒙古高原。在这里，绵延着一片辽阔的富饶的沃土，她就是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国，过去中国人习称为外蒙古的地方。

不熟悉外蒙古的人，常常觉得那是一大片宽阔无垠的浩瀚沙漠、除了苍茫沙野、骆驼刺和荒原孤烟等混合而成的一副雄浑、古朴和静寂的景象外，再也没有什么可人的景致，置身其中，难生激荡的情怀。事实果真如此吗？我要告诉你：不！决不是这样。这里的地型风貌，和世代代在这里生息繁衍的民族，都有一种奇异的迷人风采，一种与众不同的超凡情调，令人神往，令人忘返。

这是块真正的热土。

她有无穷的魅力，这不仅是因为她有天苍苍野茫茫的广阔外貌，气度阳刚而又不失阴柔，更因为她哺育着一个神勇、剽悍的民族，这个马背上的部落总是顶着一个灵气十足、万人景仰的光环。

正是靠着这些天赋异禀，在奔流不息的苍茫历史长河中，她虽然没有那种气吞山河、发聋震聩的大手笔，但却是独树一帜，大有任你姹紫嫣红，风景这边独好的气势。

多么神奇的地方！

袅袅的炊烟。

熊熊的篝火，

这里是蒙古人生长的地方。

.....

古老的民谣是高原情调的真实写照。是啊，白烟人云，牛马粪干燃起篝火，每当蒙古人用他们那独具特色的悠扬长词吟诵时，整个高原上都流动着一种自豪，回荡着那一声声“我是蒙古人”这肃穆的宣告，委实让人神往、陶醉。

真正的高原情调远比这些民谣内涵丰富。

蒙古几乎没有象撒哈拉或阿拉伯半岛上那洋的沙漠，这里的沙漠大都镶嵌在山脉之间，象依偎在母亲怀中酣睡的孩童，虽然面积不小，但由于山峦的分割，并未形成一望无际的气势，没有构成地貌的主流。这就给另外一些有灵性的天地造化留下了些许裕余，使得那山泉、瀑布、草木和湖泊，在群山和大漠共同装扮了这片沃土，使她阴阳兼具，物华天宝。

蒙古多山。但山的王国里弥漫着钟灵毓秀。西北部 and 北部，蜿蜒着阿尔泰山、唐努乌拉山、萨彦山和肯特山，构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只可惜，它既挡不住年复一年的西伯利亚寒流，使这里的生灵免受酷寒的肆虐；也未曾挡住沙皇俄国的大举入侵，使这里的先民免受异族的蹂躏，横亘在版图中段的广阔的杭爱山，和在疆域南部伸展开的蒙古阿尔泰（阿尔泰奴鲁），都改变不了这种地理的、历史的命运、只能默然挺立着，为历史作见证。

这里的山太柔和、太可爱了。它们大多轮廓柔和、连绵，很少有鬼斧神工、陡岩峭立的悬崖绝壁。或许是因为无力使生灵免受气候、异族侵袭的缘故吧，这里的山峰大多终年戴孝，银装素裹；那散居其间的冰河，大概就是她们的眼泪凝成的！？

山亦有情，“阿尔泰”一语源于“阿尔坦”，原意是“金”。在蒙古高原上，“阿尔泰”，表示阿尔卑斯那样的草地，和可以游牧的山峦。“杭爱”，则表示水草肥美、森林茂密、气候凉爽。绿色是生命之色，是灵异之色；她使绿山脉脉含情，显示出一种高贵的气度，依托起一个坚韧的民族。

蒙古多戈壁，文人多雅致，所以汉语中变幻出了“瀚海”、“大漠”“龙沙”“朔漠”等，不一而足；用作蒙古高原的代词。其中，“瀚海”一说广为流传，浮想连翩的文人雅士。往往情怀激荡地意会：黄沙飞腾，似浊浪滔天，人或马消失就象沉入海底一样，不露痕迹；当然，看起来象海，但绝不是真正的海域。对于其中的浮夸之处，却无心甄别。

渤海，外貌“山阜连绵、沙石间杂”，脾气变化无常。当气候稳定时，她是那样的无边的平静敛声息气，而当风翅骤展，天色突变的时候，她就变得狂暴、躁动，而到了严冬，她又是“渤海阑干百丈冰，悉云惨淡万里凝”，令人怯步。

渤海非旱海，这里散布着许许多多的“窥布尔”（浅泉），随使用手清理一下，水就能涌出。流动的泉水汇成小小的沼泽，招来水鸟翔集，游人至此莫不流连忘返，忘记这是在沙漠瀚海之中。这里青草肥美，色泽洁白，是牛羊驼马的上好饲料，也是编织艺人采用上乘的原料。这里多砾石，五色兼备，玲珑透剔，很象琥珀；每天旭日东升之际，远远望去，到处铺锦，极为壮观，似乎顽石有灵，在娓娓述说关于远古苍茫浩荡的水域的故事。

翰海的灵异，更在于她拥有海市蜃楼的奇景，蒙古高原雨水稀少，天空非常晴朗。白昼一片蔚蓝，夜里星光闪烁，在阳光充沛、视线清楚的日子里，翰海温顺至极，平等至极，偶而能触动人的感觉，使人摆脱那种死寂的，只有海市蜃楼——瀚海之梦，在沙漠和辽阔的平原上，眼前骤然涌现湖泊、河流、沙野、绿地，层次分明，近在咫尺，历历如画，恍若仙境。探险家们称瀚海之行为“梦之旅”，这大概是一种祝愿，也是一种推崇，不管怎样，能亲眼看到海市蜃楼，可算是达到旅行的最高地界，才可以说不虚此行。

蒙古多河湖，有高原母亲河之称的色楞格河气度雍容，河宽流朴，水质清澈，流域长达千里。沿途，到处绿草畅茂，野花烂漫，铺地如画，牧草和田禾一色、畜群与犁锄齐驰。克鲁伦河、鄂嫩河、翁金河……，群星拱月，小心翼翼地保卫着、服侍着母亲河。河水，应该说地天造化的乳汁，哺育着万世臣民，支撑着这里的文明，难怪游牧人世代依恋！

“陂陀折叠路回环，到处盐场死水湾”。这是元朝人邱处机对高原的记述。
“死水湾”是由内流河水在一些洼地滞集而成的湖泊。高原平湖，水泊连天，自然为静寂、变幻的高原增色不少。湖水或咸或淡，或温。咸湖中水不用煎熬，不必风吹日晒，可以随便取用；淡湖多鱼，潮涨时鱼出水无数，足以养活人家；温泉经常是在千山回合处，形成云蒸气吐的气象。

……

蒙古高原的奇异难以描摹。

她绝不是古人眼中的“山无绿兮水无情，风既毒兮沙亦腥”，或者“云沙映茫天光闭，河色阴沉海色凝。”

但是，她也并不优越：地处内陆，没有出海口；酷寒、大旱、使马背上的人终年艰辛。的确，蒙古高原先天不足。神奇的她，似乎是神话中身有残疾的佳丽，她那美丽中总有几分哀怨，几分凄楚。一方水土一方人。

正是这样的高原，养育出了有铁一般性格，不怕苦，不辞贫，不避风寒，不羞简陋，纵横驰骋的马背上的民族。这个民族的独特风采是高原赐予的。

文明，起源于马背，又从马背开始延伸。

历史，始于游牧，更从游牧开始嬗变。

于是，在宏阔的历史画卷中留下许多痕迹，是涂鸦，是妙手丹青。自然，那入画的不仅有毡鞋、骏马、蒙古包、更有那凝聚着千年文明的蒙古魂，查甘沙拉（白月），那达慕：

日日的日子来到了
在院子里铺上白毡
我向明朗的天空鞠躬
我向美丽的
羊群、杜力木叙述
自己秘密的思想
……

这是蒙古民谣描述的查甘沙拉（白月）——新年节。按月历算，它是第一个春季月份的第一天。在这一天，人们穿着盛装，赞颂蔚兰的天、亲爱的富有的养育者——土地，和即将到来的春天、灿烂的阳光、崇高而忠贞的山峰。

“那达慕”，意为游戏、娱乐。古时，每一家族的亲属，为了分配牧场，检查自己的力量，每年夏季都要举行和平的竞技活动，通过共同参与骑马、射箭，摔跤等骑士“三艺”，祀祭保护神。

每年七、八月份，辽阔草原上，人群川流不息，熙熙攘攘。蒙古族人身着五颜六色的盛装，闪着绚丽的光彩。游人群群聚集，花团锦簇，就象织在地图上的图案一般。喧闹声、笑语声更使这场面增添了活跃的气氛。每当此时，蒙古人常常千方百计地用华美词藻夸赞自己的伙伴和良友——骏马，赞赏它跑起来象草原上的疾风，漫步如海上的浪花一样柔和，毛色象闪电那样火红；往往千方百计地赞扬、敬酒，歌颂蒙古勇士的丰功伟绩和灵巧技艺。每当此时，蒙古人那粗犷、刚强兼忧郁凄凉的长调，总会响彻高原：

它那飘飘欲舞的长鬃，
好象闪闪发光的金伞随风旋转；
它那炯炯发光的两只眼睛，
好象一对金鱼在水中游玩；
它好宽阔无比的胸膛，
好象滴满了甘露的宝壶；
它那精神抖擞的两只耳朵，
好象山顶上盛开的莲花瓣；
它那宽阔而舒适的鼻孔，
好象巧手编织的吉祥结；
它那潇洒而蓬松的尾巴，
好象色调明快的绸缎；
它那坚硬的四只立蹄，
好象风驰电掣的风火轮
他从七勃里处挥舞而来，
震得山岳动荡不已；

他从八勃里处跳跃而来，
踏得大地震撼颠簸；
从前面猛一看云，
犹如一支斑虎；
从后面乍一看云，
犹如一只猛虎。
他有雄师般的力气，
他有巨象般的身躯。
这摔跤手的功夫呀，
实在令人惊奇！

骏马、勇士伴着颂歌，分明在展示一个民族的英魂，分明在呐喊“我是蒙古人！”。这种自豪、自信、感染了神奇但并不豪阔，优越的那山、那“海”和那河湖，她们为子孙骄傲；于是，那山、那“海”和那河湖愈发神奇、奇异。

高原，情悠悠。

蒙古人，情亦悠悠。

第二节 一代天骄撼欧亚

一、高原鹿正肥

蒙古高原上的游牧人，首先是匈奴人、他们自称先祖是夏人苗裔。

在蒙古人心中，“匈奴人——原始蒙古人”其颠朴不破的，同样是神勇、剽悍、刚毅，同样是大漠驰骋，同样是攻城掠地、威震朔方，从那金戈铁马、血雨腥风的历史中，他们似乎很容易就找到了自己民族魂的根源。

触目所及，今日已经没有匈奴这个民族了。后世蒙古高原的游牧人相继兴起，其实未必是它的嫡裔。

云雨高原草木青，风尘战地山河腥。

在匈奴人的生命记录中，有和平、辛勤的劳动，也有激烈的浴血奋战，而战斗的号角往往比竹野芦笛吹得宏亮、吹得持久，他们在马背上称雄，在马背上衰落，在马背上消逝。

匈奴先人的强盛，少有具体、直接的反映，但间接的印证，还是有的。秦、赵、燕曾竞相构筑长城，那长城的亭燧箭垛，面对着的不就是匈奴吗，涛朝有个胡曾的人作诗“不知祸起萧墙内，虚筑防胡万里城，”其实，“防胡万里城”可不是虚设，实在是很必要。

可到了头曼单于时，情况已大不相同了。烽火连天，匈奴已经被驱入一条败亡的狭谷。东胡轻视他。月氏又要他的太子冒顿充人质，在南边，他又不是秦朝的对手。可昏庸的头曼只管与爱妻打猎取乐，还废太子另立爱妻生的少子。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冒顿登上了历史舞台。

羁旅异域，饱尝屈辱的冒顿，是从月氏那里盗马逃回的。父亲头曼根本没料到他能生还，就在仓促中封他为“万骑”。历尽磨难的冒顿决意不等待、不乞求，他时刻提醒自己：“要篡夺！一定要篡夺！”

他冥思苦想，绞尽脑汁，终于研制了一种发响的箭族——鸣镝，他命令下属：

“鸣镝射向那里，你们就射向那里，违者立即斩首！”

他先后选择了野兽、自己的骏马和美貌的爱妻作目标，诛杀了那些胆小的士卒，用鲜血染红了自己的训令。当他确信自己的训令已经足够神圣时，他就把鸣镝射向了头曼。

鸣镝一支定龙庭，冒顿自立为单于。

雄才大略的冒顿征东胡，讨户氏。蒙古高原上出现了大强国。

西起今鄂毕河上游和叶尼塞河上游，中经安加拉河上游，东至贝加尔湖以东。

确实是泱泱大国，威震朔方。匈奴人不仅在百蛮中首屈一指，而且使当时的汉朝也不敢小瞧。

只可惜，有盛有衰，枯宽松常更迭。匈奴人虽然曾经有过使汉兵卒“平城之下祸甚苦，七日不食，不能弯弓弩”那样的军事上的辉煌，但在之后的岁月里，和亲加征讨，使匈奴木叶离落，当年那种际会风云，纵横天下的盛景，日趋颓萎。

祸起萧墙，匈奴合了分，分了又合、再分……分崩离析的匈奴，或者归汉，或者灭亡。

东汉时，鲜插人从发源地辽东往西迁移，占据了曾经是大国的匈奴旧地，漠北高屋子，即今逢春。

北魏时，游牧部落丁零改称高车，但丁零人自称救勒，古民谣有救勒川：

阴山下；
天似穹庐，
笼盖四野。
天苍苍，
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救勒人臣服北魏。后来，柔然占据了漠北。

北魏末年，突厥灭了柔然，威服朔方，漠北重现大国。

东起辽海西，西到里海，南起漠北，北到贝加尔湖。

之后，突厥内乱。历史的悲剧再度重演，或者归顺，或者灭亡。隋朝时，突厥就开始南下归顺，唐朝时，南投的趋势仍在继续。

唐朝贞观年间，太宗在色楞格河上游、鄂嫩河与克鲁伦河之间、肯特山一带、鄂嫩河上游、乌兰巴托东北、杭爱山东端等处，设六府七州；又在阴山南麓设燕然都护府，统辖上述州府。后来，又多次改制。

唐后，这里相继出现过契丹族（辽）、女真族（金），那时的中华北疆，西起叶尼塞河上游东至黑龙江上游，其间包有贝加尔湖周围地区。

朔漠高原，征战未息。

二、弯弓射大雕

“蒙兀室韦”中的“蒙兀”，是“蒙古”一词的最早汉文译名。“蒙古”最初出现在元代文献中。

“蒙兀”（蒙古）原先只是古代民族部落群中的一支，后来演化成这些部落的统称。

“蒙兀室韦”发源于额尔古涅·昆，也就是额尔古纳河山谷。统治北方的回纥部瓦解后，他们就开始向西迁移，占据了东起兴安岭，西至三河源头的广阔森林和草原，游牧狩猎，生息繁衍。慢慢地这里变得人丁兴旺，部落星罗棋布。只是，“人多散居，无所统一”。

在现今的杭爱山·肯特山脚下，色楞格河叶尼塞河河畔，当年的蒙古人征战不休，到处血腥弥漫。

《蒙古秘史》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

星空团团作转，
各部纷纷作乱，
谁能在床上安眠！
都去劫掠财源。
大地滚滚翻腾，
天下到处作乱。
谁能在被窝里安睡，
人们相杀相残。

蒙古高原一片凄凉。

天下扰攘，互相攻伐。谁都相信“强权即正义”，谁都希望占有对方。可以想见当时的暴虐和野蛮！

时势造英雄。高原上升起一颗璀璨的明星，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名字叫铁木真。他生逢乱世，九岁时，戎马倥偬的父亲也速该死在塔塔儿人部的筵会上。曾经是八面威风的也速该没能护住先人传下来的权力，没能庇护自己的后裔。他死后，部属鸟散，家庭破败财物被洗劫一空。成吉思汗的母亲和弟兄们穷途末路，感到“深池已经干枯了，坚石已经破碎了”。

为了生存，年幼的铁木真跟母亲、弟兄们流落远方，靠钓鱼、打猎，挖野葱、草根谋生。在窘迫中铁木真的母亲经常教导他，鼓励他恢复家庭霸业。

宝剑锋从磨砺来。铁木真变得冷酷、权力欲强烈，英勇善战。在火与剑中，他终于成长起来。

他称雄高原，公元 1206 年，在斡难河（今鄂嫩河）畔称成吉思汗。

蒙古人齐心协力，箭上弦，弓满月。

在成吉思汗称雄二十年的时间里，蒙古铁骑已踏遍了半个亚洲，所到之处，无不臣服。

铁蹄翻飞，谱写血泪史诗……

当年征服世界的人，
原是沙漠出生，
他们离别未婚的情侣，
佩挂锋利的刀剑出征。

蒙古快骑在成吉思汗副将哲别和速不台率领下，由里海口南绕道北上，横扫高加索。挥舞大刀，征服这里的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和异教徒。将士们在基辅大公的尸体旁，摆酒庆功。

到 1237 年时，蒙古人的征服浪潮再度冲击欧洲。这里的王国仍旧是四分五裂，人们仍然沉浸在因征服而引起的恐怖中。拔都（木赤之子、成吉思汗孙）和速行台率领游牧铁骑，使那些异族部落、王国象烧焦的牛皮纸一样枯萎凋落，大败波兰、匈牙利军队，兵锋逼近维也纳，整个欧洲在颤抖。蒙古铁骑的狂飙，席卷了整个欧亚大陆。

蒙古人经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在马背上托起了泱泱大国。元朝一统中国，震撼欧亚。

后人曾这样追忆当年蒙古铁骑西征：铁装骑手打马飞奔，铁蹄踏出的印痕，就是蒙古的疆域。其实，汉骑西征充斥着血与泪、剑与火。元朝统治者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成果，他们设置行中书省，有效管辖急剧膨胀的北方疆域：鄂嫩河、克鲁伦河流域，时尼塞河流域，安加拉河流域。

铁木真称雄百余年后，蒙古人合力创建的元朝帝国大厦气数渐尽。1368 年，元顺帝杯揣玉玺，带妻子、老小，一只逃回蒙古高原，虽然国亡：但蒙古铁骑雄风犹在。明朝多次动

刀兵，但蒙古余部败后分裂。使得明朝不得不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从军事征服转为招服贸易等怀柔政策，明代勉强维持着对中华北疆的控制。西起叶尼塞河上游，东到黑尔江上游往北，包括现今贝加尔湖地区，悉数归中华。

疆域依旧人已非。昔日金戈铁马。铁骑撼欧亚的族人已退出历史舞台。那些悲壮、雄浑的历史场面，仍旧为游牧人传唱。那种用长调唱出的英雄史诗，在讴歌先民千秋功业的同时，也流露着几许无奈、几许凄凉。

第三节 大清帝国擎天柱

在松花江东、长白山麓、鸭绿江源头、渤海之滨等处，曾经生活着这样一个民族：

性格悍剽勇猛，喜好战斗，能忍耐饥渴，不畏艰辛，在陡峭的山坡上打马如飞，在河上纵马飞渡。喜欢射箭，打猎。

一个神勇、强劲的民族！

他们就是女真人。

女真人，曾经有过阿骨打那样的英雄，箭无虚发，出生入死，率领族众建立金国。南下入关，掳走大宋皇帝徽宗、钦宗。女真人，也曾用兵如神，使得在两年时间内从阿穆尔河打到黑海和波罗的海的蒙古铁骑，不遗余力地征战三十年，才制服女真人。

潮涨潮落，天地造化。女真族人的命运也是如此。

四百年一次轮回。1616年，努尔哈齐统一女真各部立后金。女真人花开两度，再次挥师入关。逐鹿中原，终于得到了天下。自此，大清王朝置上了历史舞台。

靠坚兵利刃夺得龙庭的大清王朝，在中原的地位还不稳固。而此时，边疆烽火已起。“北极熊”（俄罗斯）在黑龙江流域虎视眈眈，随时准备着燃起入侵之火。

边疆多事、实为大清隐患。到底该怎么办呢？

清朝当权者认为，“鄂（俄）罗斯僻处西北”，而蒙古和大清干系很多。因此应该和蒙古和平共处，多多仰仗、合力对付“鄂罗斯”，“软硬兼施，控驭藩服，稳定北疆，维护清廷”，是大清王朝奉行不渝的准则。

早在满族兴起，图谋称雄中原的时候。漠南、漠北和漠西蒙古中出现了一些杰出的人物：巴图尔珲台吉，噶尔丹，顾实（始）汗，达赖汗，林丹汗。他们势均力敌。别人征服不了他们，而他们也无法统一蒙古。

后金掘起后，他们中的一些人曾和后层发生过摩擦。后来，许多蒙古部为了逃避其它部的攻击，摆脱被奴役的地位，归顺后金。1636年，漠南蒙古各部首领同满汉贝勒（王公）一起，尊奉皇太极为“宽温仁圣皇帝”，自此，漠南蒙古归顺清朝。

漠北喀尔喀蒙古、西北厄鲁特蒙古，也纷纷向清朝交纳贡品。喀尔喀蒙古还有了固定的贡品：自驼一峰，白马八匹。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九白之贡”。精明的满洲人也多次到喀尔喀蒙古部慰问，准许他们选择水草肥美的地方游牧，灾荒年境可以越境游牧，不遗余力地维护他们的利益。清朝的笼络政策确实生效。当沙俄策动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叛乱，并把矛头指向喀尔喀蒙古时，喀尔喀蒙古人在宗教首领哲布尊丹巴率领下，沿着苍茫大漠，南迁内蒙古；长途跋涉使许多蒙古族优秀儿女丧身瀚海，南下之路铺满了血泪情仇！然而，威武不能屈的喀尔喀蒙古人义无反顾地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

厄鲁特蒙古各部与清朝的关系富有戏剧性。在厄、清交往的历史舞台上，既有册封臣服、诚心纳贡的大团圆，又有听信沙俄谗言、反目成仇的闹剧，也有万里归中华的义举。当年，偏僻的西北疆域也曾皇恩浩荡。顺治帝御赐顾实汗盔甲弓箭，加封“遵文行义敏慧顾实汗”。大清的恩宠使厄鲁特蒙古人心说诚服，纷纷纳贡称臣。后来，对中华大地垂涎三尺的沙俄从中挑拨，声称“我与中华，一道同轨”的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率先发难而惨败，野心勃勃的辉特部首领、噶尔丹的外甥阿睦尔撒纳再度发难。当然，分裂祖国是没有好下场的，两次发难都被大清王朝从容消解。1771年，远离故土、寄人篱下的土尔扈特部，不远万里，不畏万难，不惜生命，回归祖国。

厄鲁特蒙古终于全部归属大清龙庭。

满洲人痛感“以蛮制蛮”的弊端，为了进行有效的行政管辖：在内蒙古和外蒙古地区设立盟、旗，并且规定，“凡内外札萨克王、贝勒、贝子、公、台吉、塔布囊，越入他人之地者，罚俸半年”。

内蒙古和外藩蒙古成为属地。蒙古高原仍旧魅力无穷、风采特异。只是，这里的富庶之地全被满洲人占领，成为大清王朝的牧场。

千里高原龙旗猎猎。高原成了清朝的军事大本营，与此同时，高原上的勤劳民族也亲手创出了巨大物质财富。

神勇剽悍的蒙古族人，在休养生息的时日里，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哺育着大清王朝。在烽烟连绵的时日里，他们跨上骏马，拿起武器。浴血沙场，虽九死而不悔，痛击沙俄，维护祖国边疆。

蒙古人虽然没有了当年金戈铁马撼欧亚的雄采，可雄心犹在，雄风不减当年，多么强劲，神奇的民族，多么灵异。富庶的高原！

真不愧为大清帝国的擎天柱！

外蒙古独立内幕（3） 第二章 垂涎三尺的“北极熊”

第一节 祸水东渐

紫貂就是神话中的“金羊毛”，
掠夺成性的俄罗斯为之垂涎已久，
那永不消逝的动人的魅力，
驱使他狂奔疾走，
横越整个大陆。

中华北疆，物华天宝。

沙皇俄国对我国广阔的土地和富饶的物产馋涎欲滴。他们深知，那中华北疆的茫茫翰海中，滚动着的是令人心醉的财富。他们从偏僻处极目远眺，仿佛耳边响着那悦耳的驼铃、雄浑的民歌，眼前闪过那长长的驼队、沉甸甸的财物。他们感叹：

“天旋地转，
岁月奔驰不息，
茫茫沙碛，
一望无边无际，
牵骆驼人领着他们的驼队，
迎朝阳，
送落日，
横越戈壁。”

可是，羽翼未丰的沙皇俄国对泱泱东方大国和雄踞北疆的骁勇强悍的蒙古族又望而生畏。

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曾几何时，蒙古铁骑的征服浪潮，使俄罗斯举国震恐。哲别、速不台、拔都，曾亲率蒙古铁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打到黑海和波罗的海沿岸；俄罗斯王公只能从征服者手中乞求权力。心有余悸的俄罗斯人对那段血腥、恐怖的历史记忆犹新：

当年征服世界的人，
原是沙漠出生。
他们离别未婚的情侣，
佩挂锋利的刀剑出征，

摆脱了蒙古金帐汗国统治，另立门庭，并斗胆称沙皇的俄罗斯首领，无法挥去那记忆中的阴影。

然而，狼子野心加上对“金采毛”的贪欲，驱使沙俄小心翼翼开始了一场持久的追逐。

“北极熊”举步南下。

一、我是蒙古人！

狰狞的面目。

预兆着战争，

彪形的大汉，

敢于冒险求逞。

北欧海盗的子孙——哥萨克，以沙皇的名义，肆意烧杀掠掳。在他们扩张的途中，武器不够精良，只凭强弓利箭，组织又不够严密的鞑靼人，难逃死亡或沦为奴隶的命运。

哥萨克为自己的胜利而欢欣鼓舞。推进的步伐加大了。

在森林地区和冻土地带，江河四通八达，湖海星罗棋布，这些条件都对侵略者很有利。但往南去，却是游牧民族世代居住的，既无森林又无河流的大草原，这里情况迥然不同，地区开阔，有利于人口众多的牧民采取统一行动，他们健壮有力，脉管中充满着战斗的血液，又具有征服其他民族的历史传统，他们不仅善于保卫自己，而且他们攻击令人生畏。

厄鲁特蒙古人就是这样的民族古代的地图绘制家十分风趣地描绘：

“黄金汗”端坐在湖畔的毡帐里，周围簇拥着自己的妻子儿女，他的部众人丁兴旺，俯首听命；他的牛羊成群，多得不计其数；还有一位赐予天恩的圣者来拜访他，他不是长着翅膀，来自天堂的天使，而是由梵天佛土降世的“活佛”。

的确，额尔齐斯河流域的厄鲁特蒙古人安居乐业，与鞑靼诸部落和睦相处。那里，曾经是一块乐土。

鞑靼人挡不住哥萨克南下的脚步。唇亡齿寒。所以，厄鲁特蒙古人就不得不拿起武器，抵抗外侵。

1607年。额尔齐斯河畔。

群山巍峨，连绵不断，山上长满雪松，山麓上满布着低洼的草地。一切都是那么和谐、宁静。可惜，这里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哥萨克的皮鼓声已在耳边响起。饱受欺凌的鞑靼人，和即将被侵略的厄鲁特蒙古人同仇敌忾，歃血为盟。执剑佩弓的蒙古“头鹰”在宣誓：

“马上生，马上死！冲击吧，为了不辱没祖先——成吉思汗！……”

不可一世的哥萨克吉先发起了攻击。他们层层包围了额尔齐斯河畔的小要塞库尔拉拉。结盟的厄鲁特蒙古人和种客人，勇猛抵抗；双方展开了猛烈厮杀。

远道而来的哥萨克麻痹大意，三百多人宿营在额尔齐斯河两条支流汇合而成的一个小岛上，夜里，阴雨蒙蒙，漆黑一片，被长途跋涉折磨得精疲力竭的部队，相继进入了梦乡。

得知这一情报的盟军，半夜里派出一支精兵，悄悄模向敌人的宿营地，他们渡河后，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劳扑向敌人。在黑夜和混乱中，俄国人来不及拿起武器，几乎没有抵抗就被击溃。自以为骁勇无敌的哥萨克四散奔逃、或者被杀，或者落入河中，因为盔甲太重而葬身河底。

额尔齐斯河畔一役，哥萨克死亡二百余人，伤者近百人。

沙俄吃了一记响亮的耳光。清醒之后，他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赤裸裸的武力征服是行不通的，必须软硬兼施、威逼诱骗。

他们把矛头指向了克尔木克蒙古人。

克尔木克蒙古是蒙古人的西支。克尔木克是音译，又作“厄鲁特”。十七世纪时，它主要有四部：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部和和硕特（和托辉特）。

1607 年，沙俄塔布拉城将军西拉·加加林公爵，打着和平亲善的旗号来到了额尔齐斯河流域。这里居住着杜尔伯特部和土尔扈特部——曾经给沙俄下马威的族人。

这里又重新恢复了往昔的和乐、宁静。伪善的加加林受到了蒙古人的礼遇，领略了这里的风光，了解了这里的富庶。

这里积雪可达一俄丈，象狼一样的狗拉着雪橇，疾走如飞。雪野上，褐狐异常醒目，一点也不怕生人，比别处的更漂亮、更优良。那神话传说中的“金羊毛”——紫貂，随处可见……

加加林陶醉了。他恨不得把这片沃土扶上雪橇，运回本土。他鼓动三寸不烂之后，极尽说服、威逼之能事。

“全俄罗斯专制君主。拥有许多王国的领主、大君主和沙皇瓦西里·伊凡诺维奇大公、英明神圣，垂怜遐迩。游牧人象没有根的树，没有源的水。还是转入俄国国籍吧！”

好客的蒙古人心平气和地打发走了加加林，不为所动。

回到塔拉城的加加林，眼前似乎总晃动着额尔齐斯河流域那诱人的画面，白雪、褐狐、紫貂……仿佛在无声地戏弄着他。

未能得逞的加加林寝食难安。两年后，他派戈鲁平再度出使土尔扈特部驻地。

戈鲁平先是旧话重提，企图引诱蒙古人臣服。他的无理要求遭到蒙古人的严辞拒绝。恼羞成怒的戈鲁平撕下伪善的面孔，咆哮道：

“你们必须宣誓忠于沙皇，否则，不准你们游牧：哥萨克会更清楚地告诉你们！”

土尔扈特首领、蒙古人的“头鹰”和鄂尔勒克，勃然大怒，他“嚓”地一声抽出佩刀，砍掉了桌子一角；面向众领主，慷慨陈词：

“这是我们的游牧地，我们游牧民族，想到田里游牧就到哪里游牧。谁吃了熊心豹子胆，敢阻拦我们，那他的下场就跟这桌子一样！”

众领主齐声喝采，并扯出各自的佩刀，高高举起，以示决不臣服。

戈鲁平仓惶逃出土尔扈特部。

两次碰壁的沙俄，笃信“芝麻总会开门”。于是，就把目光转向了和硕特部。

1605年，托本斯克总督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沃林斯基派出了一个负有秘密使命的使团。

使团里面有三名特殊成员：总督代理人，他们组织了一批商人，乔装成贸易使团。认为采取这种方式，既可以蒙蔽他人，又可以减少沿途遭受袭击和抢劫的危险。

不料准噶尔部和硕特部发生了战争，使团不得不返回。尽管如此，他们也不是一无所获，它带回了关于和硕特部的一些情报。

俄国人把和硕特部首领顿垒乌巴什的称号“琿台吉”，译作“阿勒坦汗”，意即“黄金汗”，这本身就给人以富有和威严的印象。在地理位置上，“黄金汗”的领地是沙俄通向中华大国的唯一之路。因此，沙俄很想把该处据为己有。

1616年，以丘麦涅茨和彼得罗夫为首的哥萨克远征队，带着以沙皇名义赠送给“可汗”的礼品，肩负着使和硕特部臣服的使命，历经艰辛，来到了乌布萨湖畔。

和硕特部以礼相待这远方的来客。

顿垒乌巴什派幼子率领五十位领主，按照族内习俗，带上酒肉，到离营地两里的地方，迎接“嘉宾”。那醇香四溢的马奶酒，着实令人心醉身醉；那蒙族人的盛情，更是令人忘怀。

在那金碧辉煌的蒙古帐内，倍受礼遇的丘麦涅茨·彼得罗夫喧宾夺主、厚颜无耻地宣称：“你们应以实际行动表达向沙皇归顺的愿望，就本地区所产物品向陛下纳贡，按自己的习俗宣誓效忠……”

奉令行事的和硕特王子，领主悉尽地主之谊，对沙俄使节的过份要求未作制止。他们采取了克制的态度。

沙俄使节被安顿在离顿垒乌巴什的毡帐的半里地的地方。

几天以后，和硕特部举行传统的拜佛仪式。顿垒乌巴什琿台吉决定在拜佛仪式上接见沙俄使节。他派人送马到俄使驻地，由自己的宠臣玛穆泽来作陪同，把俄使迎到呼图克科礼拜寺。

呼图克图礼拜寺一派节日气氛。

毡帐内拧满了各色花布，地上铺着毯子、毯子，墙上挂着用羊皮纸画的图画。

诸领主身穿彩色绸缎的节日盛装，众星捧月般簇拥着一人：他就是甘顿特部首领硕垒乌巴什琿台古。沙皇心目中的“阿勒坦汗”。他虽年逾花甲，却体态魁梧结实，脸上一簇黑髭更显得仪表堂堂。他身穿金缎长袍，盘腿坐在半膝高的毡座上。

当俄使致辞时，硕垒乌巴什依礼脱帽，问候沙皇健康；俄使呈上以沙皇名义赠送的礼品，他也恭谨地接受了。

之后，盛大的拜佛仪式开始了。硕垒乌巴什命令他的先知呼图克图，率领诵经班照经卷诵经，诵经后，硕垒带领众领主，设宴款待俄使。

第二天，是宗教仪式的高潮，硕垒和诵经班和众领主一起，高举黄金铸成，形如孩童的神像，进行跪拜。

至此，呼图克图礼拜寺拜佛仪式便宣告结束。

拜佛仪式后的第四天，硕垒委派两名使臣，带上礼物，与俄使同行，前去觐见沙皇。他还向使节赠送了礼物，食品：每人良马三匹，饰有海狸、紫貂皮的羊皮斗篷一件，年轻姑娘一个、生羊十六只。

善良的和硕特蒙古人仁至义尽。可那表面伪善、背地里狼子野心的沙俄又是怎样领受他们的善意呢？得意洋洋的丘麦涅茨和彼得罗夫到处吹嘘说“阿勒坦汗已归附俄国”，并绘声绘色地描述那神秘的“入侵籍仪式”——实际上是拜佛仪式。蒙古人根本没有宣誓效忠的习惯。他们向佛像献上哈达，并随着音乐缓缓举起，只是一个古老相传的仪式罢了。

俄国人从硕垒呈给沙皇的菲薄礼物中悟出了事实的真相，但仍然自欺欺人。

就在丘麦涅茨和彼得罗夫出使和硕特部的同时，沙俄也派使节立陶宛托米尔科·彼得罗夫来到了哈萨克帐落。达里是准葛尔首领巴图尔的游牧地。

剽悍的蒙古族人平日里牧马放驼，当钟声响起时，便跨下马背、驼峰，用那健壮的大手执定经书、摇铃，虔诚地诵经、磕头。战时，则乘骏马，佩快刀，奋勇冲锋。

这里的游牧人象敬奉佛祖那样敬奉明朝皇帝。他们心悦诚服地向皇帝交纳贡赋，骆驼两百峰，马、羊各千头；他们尝试着信汉人的宗教——佛教，学习汉人的文字。

显然，这里已经成为中华大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解到实情的托米尔科知趣地离开了这里。

侵略成性的沙俄不达到目的和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一年后，肩负着同样使命的托博尔斯克哥萨克头人伊凡科·萨雄利耶夫，再度出使准噶尔部，来到了哈萨克帐落。

巴图尔对俄使的再度来访极度厌恶，命令手下人给他们安排住处，就让他们在离台吉营帐三箭射程远的地方落脚。受到冷遇的沙俄使节用毯子和大袍勉强搭了个宿处。

入夜，哥萨克使节饥寒交迫。他们依偎着度过了一个漫漫长夜，简陋的帐子外，天阴沉，风怒吼。

翌日，巴图尔下令召见俄使。

营帐内毡毯铺地。威武的巴图尔盘腿而坐，两旁侍立着儿子、正妻和喇嘛。

内心空虚的俄使者调重弹，劝说巴图尔归附沙皇。巴图尔谈笑风生，不置可否。沙俄使节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声称“阿勒坦汗已归附俄国”。精明的巴图尔十分警觉，决定答应俄使派人觐见沙皇的要求，想趁机派人刺探虚实。

巴图尔考虑到沙俄诡计多端，阴险狡诈，于是就选派了老成持重的布噶和能言善辩的科沃丹，随俄使去朝见沙皇。

布噶和科沃丹受到了沙俄使节事务部秘书们的接见。

使节事务部的秘书们盛气凌人，象连珠炮一样发问：

“你们奉巴图尔台吉派遣出使俄国的使命是什么？”

“你们是否持有巴图尔的书信？”

老成持重的布噶从容应对：“我们没人识字，更没人会书写，因此并没带来什么书信，但我们愿意转达巴图尔让我们向陛下陈述的事。”

狡猾的秘书波亚科夫说道：“金帐汗国的阿勒坦汗，衷心希望臣服，事事听从沙皇陛下，这是明智的！”

科沃丹机智地问：“阿勒坦派使臣到这里，那未免太远了。来见沙皇的，大概是他兄弟派人来的吧？”

“你们对真实情况一无所知，怎么可以这样说呢？”萨瓦秘书有点沉不住气了。

“你们有什么可以让沙皇高兴的东西？你们应该明智些，早早寻求沙皇庇护。”波亚科夫加重了语气，目露凶光。

科沃丹鄙夷地说道：“你们要什么干脆直说。至于别的，我们没奉巴图尔台吉的命令，绝不能轻易答应！”

言毕，科沃丹、布噶就要求返回准噶尔部。

沙俄无计可施，只好以礼相待，送他们回国。

四处碰壁的沙俄决定改变方式。他们从出使通好的过程中了解到，准噶尔部和和硕特部之间有矛盾，于是企图从中挑拨，削弱中华北疆边防，坐收渔人之利。

真可谓机关算尽！

蒙古高原上的游牧人豁达、克制，嫉恶如仇。他们决心以火与剑迎接那凶残的哥萨克，以哈达和美酒善待那些“和平”使节，水来土掩，兵来将挡。他们的光明磊落、爱憎分明，他们的一言一行，无不凛然昭示：我是蒙古人。

与之相反，在谦谦君子面纱掩盖下的沙俄，却是一副可憎，卑劣的面孔。

二、聪明反被聪明误

沙皇亲自出马了，他要扮演“渔翁”的角色。

全俄罗斯专制君主，拥有许多王国的领主，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大公，亲自致函顿垒乌巴什·巴图尔。在信中沙皇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他一面声称硕垒面临巴图尔的进攻，一方面又装成对被侵扰者绝不袖手旁观的诈子，明确表示他的西伯利亚总督们会保护他的安全的，他以同样的手段欺骗巴图尔。

性情暴烈又缺乏冷静思考的蒙古人，原本多摩擦，再加上沙皇的从中挑拨，干柴烈火，哪有不燃之理？

于是，同室操戈。

美丽的额尔齐斯河畔，刀光剑影，血雨腥风；静谧的哈萨克帐落，杀声震天，尸横遍地。

莫斯科的沙皇从西伯利亚总督们那里闻讯，喜不自禁，在宫中摆酒宴庆贺，击节称快。

在和顿部蒙古人征战连绵的日子里，首领顿垒乌巴什病逝。长子俄木布继位。

沙俄频频派出使节，拉拢俄木布。

年纪尚轻、阅历尚浅的俄木布，依先王旧制，恭谨克制，以礼相待。

沙皇把俄木布的谨恭礼让理解为态度暧昧，于是，又于 1636 年派斯捷布格列恰宁出使和硕特部。

库逊塔凯河畔，俄木布营帐里，事务繁忙，对沙俄没什么好印象的俄木布，下令接见俄

使。

他端坐在毡帐中，不怒自威。

他手下的一名礼仪官，一本正经地向俄使问候沙皇的健康。

格列恰宁对此十分不满。他急促地说：

“尊敬的汗，如果您想问候沙皇的健康，就该站起来，亲自开口！”

俄木布息事宁人，制止了欲动武的部属，接受了俄使的请求。

格列恰宁对俄木布的向候作了回答，并呈上国书、礼品。之后，他开始宣读训令：

“……我的奴仆，你理应使吉尔吉斯，这个桀骜不驯的民族循规蹈矩，理应亲自宣誓效忠……”

俄木布闻言，勃然大怒：

“蒙古人耻于受人奴役，在我们的传统中不允许由首领本人出面向别国君主宣誓效忠！”

克制已久的俄木布拂袖而去。

格列恰宁呆若木鸡。

几周以后，精明的俄木布还是克制着与沙俄做了笔交易，沙俄提供少数武器装备，用“臣属”代替“奴役”；和硕特部迫使吉尔吉斯等异族部落就范。

此时的俄木布，似乎不敢过分违反先王旧制，所以很克制。故而，格列恰宁总算不辱使命，但两年后，俄木布已经更清楚地看到沙俄狼子野心；1638 年再度出使的瓦西里·斯塔科夫、斯捷潘·涅维罗夫的遭遇，与格列恰宁就有天壤之别了。

斯塔科夫和涅维罗夫一行，翻过白雪皑皑的山岭、河湖；途中还险些命丧民风强悍的牧民之手，并且花费了许多“买路钱”，才终于抵达库逊塔凯河畔。

他们苦苦等了三周，才受到接见。

接见仪式上，双方对谁先问候谁一事产生了分歧。

最初，双方都保持缄默，都要求对方先讲。

斯塔科夫坚持说：“既然你们已承认了沙皇的宗主权，就理该先向沙皇问候！”

而俄木布的幕僚则说：“我们台吉既蒙你们尊为‘汗’，并且身为成吉思汗的后裔，出身

高贵，怎么能先问候沙皇？”

双方各执一词，争执不下。

俄木布命令手下，把讲使赶出金帐，把沙皇的礼物扔出去，收回分给他们的食物。

当夜，俄木布率众迁往克穆齐克河冬营地。临走前下令，不准供给俄使食物。

俄使整整饿了四天。侵略者的嚣张气焰被打了下去。

后来，又经通融贿赂，俄木布又重新接见了他们，仪式草草收场。

在归国途中，准噶尔属部吉尔吉斯人截住了他们，涅维罗夫经哀求、送礼才免于拘禁，吉尔吉斯人藐视地对他说：

“今后不准俄国使节再通过我们的地区！”

斯塔尔科夫·涅维罗夫倍受羞辱，仓惶归国。

一直是恭谨克制的蒙古人，已经失去了那种委屈求全的耐心，已经明白贪恋财物极为危险。

沙俄“派使通好”之举，已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沙皇为使节遭受的冷遇而震怒。他咆哮如雷，而其远行的急先锋——哥萨克更是摩拳擦掌，扬言要蛮人尝尝北欧海盗子孙的厉害。

“北极熊”的脚步向蒙古地区迫近，形势越来越严峻。

游牧的蒙古人纷纷归附新兴起的清朝。祖国也对这些远方的游子张开了博大的胸怀。这正应了中国一句古话：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

1640年。在塔尔巴哈台，蒙古四十四部首领共同议事，制定了《察津·必祉克》，即《1640年蒙古——卫拉特法典》。各部首领一致同意：联合抵抗外敌入侵，严惩发动内战的败类……

会后，准噶尔部巴图尔洋台吉怒斥俄使，决意不惜一切力量抗拒沙俄。有其父更有其子。巴图尔病逝后，长子僧格继位。同样是怒斥俄使，拒绝称臣；并且与土谢图汗联合，严惩内奸额琳沁（俄木布之子）。

大清王朝，威名远扬。

神圣《法典》不容亵渎。

游牧人的心并不游离。多年来，他们曾互动刀兵，兄弟相残。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

头，他们尽释前嫌，携手御敌，此情此义，天地可鉴。

苍茫朔漠，众志成城。

三、图穷匕首现

硬来不行，拉拢又不成。坐镇莫斯科的王公们殚精竭虑，苦思不得良策。

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要死了，但仍没忘记告诉其子孙……征服那桀骜不驯的民族。继位的沙皇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也未达到其目的。继之，“遗训”又被性情粗野的彼得一世承继。

1686年，莫斯科的王公贵族一片惊慌。

一向自负强劲的俄罗斯人实在不愿相信，大清帝国一举收复了雅克萨，北欧海盗的子孙——哥萨克被打得溃不成军。

众位王公垂首侍立，彼得大帝在焦躁地走动，他那冷酷、旁若无人的吼叫，令在场的人心惊胆战，宫殿似乎都在瑟瑟发抖。

冷静下来的沙皇敏感地意识到，大清已经开始了军事行动，有必要忍让一下，签订和约，但也有必要采取强硬措施，给那些游牧人点厉害。

签约。动武，这项使命非同小可。它要求使节具有高度的机智，又有军事征服时必需的组织能力。谁能当此重任呢？沙皇选中了一个年轻人：三十五岁的费·阿·戈洛文。

戈洛文虽然年轻，但学识渊博、精明强干，为人自负又很残忍。他善于外交应对，又颇懂攻城掠地之术。深受沙皇器重。

野心勃勃的戈洛文欣然领命。他亲自挑选译员，文书、两副使、20余名随员和500名火枪兵，组成了一个“大全权使节团”，也许是因为这次出使不同以往吧，沙皇特授戈洛文外交和行政全权。

大权在握的戈洛文审时度势认为当务之急是掌握蒙古王的确切消息。于是，他派出了得力干将斯捷潘·拉罗文，先行一步在使团未达之前，便已向蒙古诸王公送礼、送信联络感情。

戈洛文一行沿途又招募了六百名骑兵，浩浩荡荡地经西伯利亚、伊尔库斯克、乌丁斯克。最后抵达色楞格斯克。

1687年秋，色楞塔斯克。

阿尔泰山这不住那强劲，凛冽的西伯利亚寒流，高原清冷异常，色楞格河已经被厚厚的坚冰封住。

经过长途跋涉，他有些面色憔悴、疲惫，但他不肯休息，反反复复地问自己：“怎么办？”

回想起途中跟蒙古使节的接触：尽管自己威风凛凛，身边站着雄纠纠的火枪兵，可是那些车臣汗、土谢图汗的蒙古使节不仅不惊怕，反而敢于大声斥问：既为友谊和安宁而来，为什么还要率军人带枪械，究竟意欲何为……

戈洛文凭直觉感到，在俄满冲突中，蒙古人与大清是一条心的。他也深知，自己拥兵而来，很难使蒙古人相信，是单纯为了保护使团安全。

他信手翻开了桌上的案卷，取出一份份驻军呈报来的材料，挑选出那些关于“蒙古人骚扰”的材料。他翻阅着，忽然计上心来，猛地一掌击在桌上：总算师出有名了！

几个月以后，戈洛文下令：严惩“蒙古马贼”。

武器装备精良、凶狠异常的哥萨克们，首先闯入蒙古族塔帮古特部。

侵略者们用火枪打死马匹，然后用军刀对付那些手无寸铁的蒙古人。他们惨无人道地杀人取乐，剖心为食。色楞格河畔，血流成河。

以“严惩蒙古马贼”为借口的侵略者们最关心两样“东西”的得失：貂皮和女人。

他们在用军刀杀人前总忘不了只恨恨地追问：

“貂皮藏在哪里，说！”

他们到处追逐妇女。把未能逃脱的妇女装入布袋，扔上马背，作为战利品带回营地，肆意蹂躏。

穷凶极恶的戈洛文又把眼光转向了希洛克河畔的游牧人。

他明目张胆地命令哥萨克：“多杀几个人，没关系，但要尽量保住马群、牛羊和帐幕！”

尝到甜头的哥萨克倾巢而出。

他们冲入蒙古毡帐，杀死奋起反抗的蒙古族壮汉，奸淫妇女，毫无准备约蒙古游牧人无法应付这种突然袭击。

哥萨克们大施淫威后，把妇女、马牛羊和毡帐带回了色楞格斯克。

蒙古人尸横沙漠冶流成河，但杀人成性的戈洛文仍不满足。

他的真正意图是杀一敬百，要让所有的蒙古人臣服，逼迫他们臣服！

1683年冬，色楞格斯克。

在戒备森严的议事厅中，面色阴沉的戈洛文端坐上方，面前的长条桌上，摆放着黄金铸成的俄罗斯时钟和一套办公用具。

在他下面，站着十余名伤痕累累，衣衫槛楼、仍然怒气冲天的蒙古人。

他们是被哥萨克俘虏的喀尔喀台吉。

在侧面，一位翻译正在宣读一份文书：

“……永世臣服沙皇，永不背叛，无论什么入侵犯沙皇臣民，都要率领军队，协同沙皇军队作战；对沙皇臣民，不得有任何侵害，违者严加惩处。每个台吉每年向沙皇缴纳牛羊各五十只……”

当那译员念完冗长的文书后，戈洛文下令：

“来人。帮诸位台吉签约！”

野蛮的哥萨克士兵用绳索捆起台吉们的双手，把军刀架在他们的脖子上，逼使他们去亲吻俄军火枪枪口。

之后，他们又用军刀斩杀了八条狗，威逼台吉们去用舌头舔剑。剑在滴血，蒙古人的心也在滴血！

最后，野蛮的哥萨克强令台吉们每人喝一杯冰冷的水，并松开众台吉的手，让他们动手签字。

为人父、为族长的台吉们一个个老泪纵横，他们很想一死了之。但是，素来强劲的“头鹰”们不愿舍下族人，让他们遭受欺辱。

骂信黄教（喇嘛教）的台吉们相信因果报应，干尽坏事的沙俄终究会受到天谴！值此危难之际，他们决定以自己的下地狱，换得后辈子孙的生存。

台吉们忍辱签约，带着精神和肉体的严重创伤，回归部落、他们向民众的血泪控诉，使得辈古人愤怒了。

游牧人心中腾起一股怒火。先人那铁骑西征的历史激励着威武不屈的蒙古人，他们绝不屈服，一定要用血来偿还血债。

第二节 迎头痛击

一、血战贝加尔湖畔

胸挂显示尊荣的金锭，

身着标志官阶的盛装，

俄国使节涌出克里姆林巍峨的宫门，

遍访东南西北，

异域殊方。

沙俄一面派使与克尔木克蒙古人“通好”，实行“文明入侵”。一面对其他游牧部落则采取血与火的征战！

贝加尔湖畔，生活着布里亚特蒙古游牧部落。布里亚特人归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车臣汗管辖。

贝加尔湖畔是一个美丽、肥沃的地方。

四周群山环绕，山势巍峨起伏，山顶浑圆整齐，仿佛刹那间凝住的巨浪，一个挨着一个浮积着，在贝加尔湖上空勾划出一道线纹：夏天，饰满常青松林的波浪；冬天，饰有参差多变的银边。

贝加尔湖安坐在群山怀抱中，无拘无束，波澜壮阔。当地人传说，它不容异物。无论人还是畜，溺水而死湖中后，都会被抛上来。故而当地人称之为“圣海”。

身材魁伟、体格强壮的布里亚特蒙古人，世代生活在这里。他们骑劣马执强弓，围猎、放牧。他们敬奉这里的山和湖，经常献上祭品，顶礼膜拜。

生于斯、长于斯的布里亚特人安居乐业，与世无争。

十七世纪二十年代，灾难开始降临到布里亚特人头上。那灵异、神奇的群山，和那波澜壮阔的“圣海”，都无法保全自己的子民。

1634年，贝加尔湖畔。

一伙黄发凹眼凸鼻的异族人忽然出现在这里。他们也骑马，手里端着一种布里亚特人从未见过的东西，腰里佩着长长的弯刀。

布里亚特人无法知道他们的来意，也弄不清他们的归属。好客的蒙古人为他们建起了房子，送来了肉食，并派人服侍。

这伙人的头目叫瓦西里·杜纳耶夫，是六十人长。

“远方来客”休息了几天后，突然开口讲话。精通蒙语的通译告诉布里亚特人：

“我们是全俄罗斯专制君主、受许多国的领主拥戴，大沙皇差遣来探视他的臣民的。你们世代安居，全仗沙皇庇护。知思应图报，他们要献上好的貂皮……”

一向自由散漫、无拘无束的布里亚特人，当即表示：“我们只有先祖成吉思汗，从没听先人说过沙皇。貂皮不能给异族人！”

奸诈的杜纳耶夫低估了蒙古人的实力。他命令兵士开枪，当场行死数人。

愤怒的蒙古人纷纷上马，分成四路，象围猎野兽一样、勇猛冲杀过来，箭如雨，马如虎。

哥萨克们挤成一团，来不及装火药就死于箭雨之中。贝加尔湖畔，留下了五十二具入侵者的尸体。

侥幸活命的杜纳耶夫，只带着八名哥萨克逃走了。

神圣的贝加尔湖不容异物。

一年以后，杜纳耶夫卷土重来，他率领一百多名分副武装的哥萨克，气势汹汹地来到了贝加尔湖畔。

蓄意报复的哥萨克见人就杀，见帐篷就烧。从不畏强暴的布里亚特人，奋力反击。他们先是纵马射杀敌人，马被射死后就步战，用猎刀箭作武器，与敌人展开贴身肉搏。

一时间，贝加尔湖畔血流成河，手持刀剑的布里亚特人伤亡惨重，但没有一个蒙古人心甘情愿地放下武器。

齐布齐贵是布里亚特人的英雄。他精于骑射，骁勇过人。他率兄弟与俄军激战数日，马被打死，身边人所剩无几，自己又身负重伤。当狂喊着遇向他的哥萨克们靠拢时，他大喊：“哥萨克们，我决不活着落到你们手里！”

他手执猎刀、连续杀死数名哥萨克，最后身受重伤，壮烈牺牲。

此次一役，哥萨克们胆战心惊。

从此以后，沙俄用了六十年的时间，强行占领了布里亚特蒙古人的游牧地。

他们先后建立了伊尔库斯克、色楞格斯克、和乌丁斯克。

暴虐的异域人妄图长治久安。然而，不屈的布里亚特人从未停止过抗争。因为，保佑他们的“圣海”训诫时刻激励着：异物总会被逐走。

他们不断袭击哥萨克，缴获武器，夺回原本属于自己的马匹，杀死狂妄的沙俄征税官。沙俄统治者也多次征伐。他们取得的每一份利益都是以剑和血作代价的。

对于沙俄的侵略行径，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车臣汗一方面派使节去莫斯科抗议，另一方面，刀兵相见。

1668年。贝加尔湖以西，耀武扬威的哥萨克终日高枕无忧。虽然不时受到蒙古人的“骚扰”，但哥萨克们深信，那成不了多大气候，所以，有许多哥萨克离开了色楞格斯克、乌丁斯克、在贝加尔湖以西建立了一些堡垒。

土谢图汗决定派骑兵突袭哥萨克堡，杀一下沙俄的威风。

精锐的骑兵从天而降。妄自尊大的哥萨克面临“天兵”，惊慌失措，匆匆应战。

蒙古骑士的铁骑如风，在枪林弹雨中前赴后继，勇猛冲杀，把哥萨克打得溃不成军。当闻讯急忙赶来接应的大批哥萨克到来时，迎接他们的只有满地尸体和冲天的火光。

蒙古铁骑，雄风犹在！

几年以后，土谢图汗再次重创俄军。

1685年。色楞格斯克城郊。

驻守城内的哥萨克结队出城，到散居郊外的村落里去抢牲畜，好久不曾掳掠的哥萨克们得重洋，带着抢来的牲畜往回返。一路上，哥萨克们欢声笑语。

闻讯的土谢图汗认定，这是一个打击沙俄的好机会。当即命令铁骑兵拦截敌人。

蒙古铁骑卷起漫天沙土，直追哥萨克。

在离色楞格斯克约三十里的地方，双方交锋。蒙古健儿视死如归，歼敌迅捷，很快，俄军就溃散了。刚刚抢来的牲畜又被夺回。

侵略者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他们希望和土谢图汗等人正面交锋，以便报仇雪恨。

1688年，色楞格斯克。

土谢图汗的弟弟巴图鲁琿台吉，亲率十万蒙古铁骑，兵临城下。

蒙古铁骑迅速、准确地袭击哥萨克侦察部队，烧毁哥萨克储备的杂草。并且切断了色楞格斯克和外界的联系。

沙皇宠臣、“全权大使团”团长戈洛文心急如焚。

入夜，城外土坡上满布着蒙古铁骑，灯火通明。

戈洛文想乘夜派人去乌丁斯克求援。他派出五名哥萨克，连夜出城。结果，蒙古铁骑戒

备森严，他们刚出城就被发现，两人被当场追杀，其余的逃回城内。

戈洛文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他只好下令出战。

仓惶出城的哥萨克人们然敲着鹿皮战鼓，列成方阵。但显然已经惧怕了。

三军可以夺帅，但不可以夺志。已经被夺“志”的哥萨克，刚与铁骑军接触，便退守城内，再也不敢出战。

铁骑军士气大盛。

只可惜，祸起萧墙。准噶尔部首领、沙俄走狗噶尔丹，突然从背后袭击。色楞格斯克侥幸保全下来。

二、碾碎俄罗斯之梦

森林尽处便是茫茫草原，
一名射手正在弯弓搭箭，
木条构架的蒙古包在他背后出现，
里面铺着毛毯，
外面盖着毛毡。

这首描写蒙古风情的诗，是俄罗斯人为那些替沙皇效力的蒙古人所写的赞歌。

厄鲁特蒙古人本来是荣耀异常的。

早在十七世纪初，厄鲁特蒙古人就率先给北欧海盗的子孙一记响亮的耳光，迫使沙皇改变初衷，由武力征服改为拉拢利诱。

在伪善的沙俄不断“遣使通好”的岁月里，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和和硕特四部，由恭谨克制到严辞拒绝。逐渐认清了沙俄的狼子野心。

他们的确不曾辱没蒙古魂，不曾有愧于大清龙庭，不曾亵渎神圣的《1604 年蒙古——卫拉特法典》。

准噶尔部一直是厄鲁特蒙古人的骄傲。巴图尔洋台吉、僧格琿台吉，都是抗俄英雄，都曾为民族存亡而奔波。

可惜，子孙不肖，辱没了先人英名。

僧格是在权力倾轧中即位的，沙皇俄国对强硬拒俄的僧格恨之入骨，暗中收买僧格政敌，害死了僧格。

曾经以“呼图克图”名义，表示愿意臣服的噶尔丹，甩掉喇嘛袈裟，在兄长尸骨未寒之

际就杀死了兄长僧格的次子，夺取了统治权。

沙俄拍手称快。

七十年来力主抗拒，桀骜不驯的准噶尔部名存实亡。噶尔丹领导下的准部，成了残害民族兄弟、分裂祖国的急先锋，成了实足的沙俄帮凶。

沙俄不遗余力地拉拢、收买噶尔丹，允许他使用西伯利亚牧场，声称不准本国臣民进入准噶尔部……

噶尔丹感激涕零，不但派使称臣，而且还与沙俄结成军事联盟，分裂民族，分裂祖国。

1688 年，噶尔丹武装进攻喀尔喀蒙古兄弟，解除了色楞格色克城戈洛文的窘境，以取悦沙皇。

1690 年。噶尔丹营地。

噶尔丹心神不安。他派往伊尔库次克去的特使达尔罕至今杳无音信。噶尔丹派他去是为了请求沙俄援助，可俄国方面一直没有消息。是吉还是凶？阴险的噶尔丹实在猜不透。

正狐疑间，侍从来报：

“达尔罕宰桑陪贵客到！”

噶尔丹顿时喜上眉梢，急步迎出帐外。

来客叫基比列夫，他带来了戈洛文的文书和一份协同作战计划。

戈洛文在信中许诺：

“只要您博硕克图汗去进攻蒙古人，沙皇陛下就不会停止攻打蒙古乌卢斯。”

基比洛夫亲自为噶尔丹讲解协同作战计划，帮噶尔丹分配兵力。

噶尔丹有恃无恐。

1890 年，噶尔丹率军二万，挥师南下。大清王朝洞悉沙俄阴谋。9 月，裕亲王福全大败叛军于乌兰布通。

噶尔丹贼心不死，沙俄意犹未尽。

沙俄答应派火枪手一千名、大炮若干门、火药、铅弹若干，帮助噶尔丹。

噶尔丹借沙俄之势，二次南犯。

大清龙庭震怒了，康熙帝御驾亲征，一举平定噶尔丹叛乱。

沙俄利用噶尔丹控制蒙古、进逼中国的阴谋虽然被击得粉碎，但其扩张野心仍然不死。

1756 年。哈萨克阿布汗汗营地。

阴险狡诈的阿睦尔撒纳由于准噶尔人民的反对，避居此处。他谋杀政敌、投顺大清、发动叛乱。其目的只有一个：专制西域。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阿睦尔撒纳只能寄人篱下。他失意、消沉，但野心未泯。

他每日游来逛去，看似无聊，实则在等待机会，东山再起。

无孔不入的沙俄见有机可乘，便秘密派使者拜访阿睦尔撒纳。当他从使卡斯基诺夫手里接过奥伦堡总督的亲笔信时，才相信这是真的。他捧读信札，当他读到“请来奥伦堡，这里将有您的宁静和安全”时，不由得热泪盈眶，豪气勃发。

阿睦尔撒纳那潜伏着的野心又活跃地跳动了。他潜回了塔尔巴合台。

这里曾是神圣的《1640 年蒙古——卫拉特法典》诞生之地。对沙俄感激零涕的阿睦尔撒纳就选择了它作为反叛基地。

阿睦尔撒纳派使求援可沙俄正和普鲁士作战，无力他顾。阿睦尔撒纳只演出了一幕闹剧，最终兵败塔尔巴合台，客死他乡。

沙俄再度竹篮打水——一场空。

历史无情地戏弄了三番两次编织美梦的沙俄。

第三节 两强勘界

一、委屈求全

1689 年 8 月 9 日。尼布楚城外，石勒喀河、涅尔查河之间。

中俄双方的帐篷紧挨在一起。俄罗斯帐篷覆盖着鲜艳的土耳其毛毯，内设铺有豪华毛毯的桌子和圈椅，桌上陈设着精美时装和金质墨水瓶。清使帐篷是用朴素的麻布制成的，一张普通的桌子后面摆了一条宽板凳，板凳上铺着毡子。

在贝加尔湖畔大施暴虐的戈洛文趾高气扬。他身穿金黄色锦缎水袍，外披金黄色斗篷，在三百多兵护卫下，来到了这里。

此时的戈洛文，外表显得极为平静。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他无须做作就能自然而然地显

示自己的身份，也不仅仅是因为他精明老练，更主要的，是战场上的暂时优势使他有恃无恐。

清使中不乏聪明、稳重的人。索额图，佟国纲和阿尔尼，无一不是大清重臣。但是。他们都缺乏对中国以外世界的经验。所以，他们一开始就很谨慎，生怕陷于对方圈套。

由于会谈地点设在两河之间，所以清使必须渡河。对此，大家意见不统一，佟国纲认为：“沙俄阴鸷，我们必须严加防范。如果俄方在船上胁迫我们，或者把船打沉，那如何是好？”大家都不无担忧。

随行的译员，葡萄牙人张日升（托马斯·贝瑞拉）则认为：

“如果花了这么多钱，许了这么多诺言，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我们竟没有打开我们所敲的门，到了俄国人的家竟没有和他们见面，这会使皇帝奇怪，成为全世界的笑柄。”

虽然大家也认为有理，可仍然不愿渡河。最后，稳重明达的阿尔尼同意渡河，别人也只好同意。

清使乘三只船渡河。

谈判开始。

两国使团同时进入各自的帐篷，同时在桌后就座。俄罗斯使节戈洛文和伏拉索夫坐在圈椅上，谢苗·克尔尼茨基坐在板凳上，随从军职人员侍立。清使索额图等人盘腿坐在一条宽板凳上，众随行文武官员、随从呈半圆形侍立。

互相寒暄过后，戈洛文请求俄使审查他的授权国书，并要求索额图出示国书。

索额图沉声答道：

“我大清一言九鼎，以信义为尊。不必验看什么国书，我持有我皇御玺。自然拥有全权。”

言毕，恭谨地捧出御玺。

在谈判中，双方在我国蒙古地区和中俄中段边界上分歧较大，双方相持很久。

谈判开始后不久。我大清首席使节索额图就提出：

“修建涅尔琴斯克（尼布楚）、阿尔巴津（雅克萨）和色楞格斯克（色楞格城）的那些地方、以及这些地方附近的布里亚特人和其他族贡民游牧的地方，一直到贝加尔湖整个这一个地区，都属于我国，因为这些地方全都在南部地区，而且曾经领有这些地方的那些酋长们，如今还健在，居住在他们那里。”

清使力主在蒙古地区划界。

戈洛文坚决反对。他申辩道：“许多异族人居无定处，至今住在双方，既住在沙皇陛下

方面，也住在博格德汗殿下（中国皇帝方面：从来都不应以这样的逃亡者划分疆界。”

戈洛文主张以阿穆尔河（黑龙江）为界。清使断然拒绝。

谈判陷入僵局。

双方三番两次地重复自己的观点，完全不接受对方的反驳。

戈洛文等人从高高的圆椅上不时伸手去取那些银杯，饮水频频。我大清使臣则按老习惯频频从那些只深有薄薄一层漆的木杯子里饮茶。

谈判从上午持续到苍茫黄昏，双方没能达成协议。

次日，谈判继续进行。

寒暄之后，索额图再度提出从蒙古地区划界，再次指出：

“贝加尔海这边的土地，完全属于我皇所有，因为贝加尔海这边的土地全是蒙古汗的领地，所有蒙古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臣民。”

戈洛文申辩，这些地区是属于沙皇陛下的，呼吁：“停止其他不必要的谈论，着手确定边界。”

索额图据理力争，并宣布：“贝加尔地区属于我皇，所以边界必须在它之外，如果员大使根本不曾奉有考虑这种边界的指示，那也不必再谈什么。”

清使臣表示，必要时不惜退席复命。

戈洛文再也沉不住气了。他大声嚷道：

“难道。大使们奉本国君主之命，不是为了缔结永久的和平条约的划分边界吗？”

索额图审时度势，用满语跟佟国纲、阿尔尼商量了一番，决定作出让步，提出以尼布楚为界。

戈洛文见状，便提出了相应的新建议，沿阿穆尔河支流结雅河划界，从结雅河开始，阿穆尔河左岸属俄罗斯，右岸属中国。

已经放弃蒙古大片地区的清使团立即拒绝了这一无理建议。

索额图怒气冲冲地说道：“除尼布楚外，我们不再提议其他边界，没有什么可谈的了！”

谈判再度陷入僵局。

两国使节团客气地道别，各国驻地。

当夜，索额图命令随从：“开会已无必要，从会议地点将帐篷撤回。”

谈判几乎到了破裂的边缘。对沙皇极为不满的索额图决意不再让步。

后来，由于形势变化，索额图等人为保全大局，派张讯升知会戈洛文：“奉我皇谕旨，提出以同样从左面流入石勒喀河的格尔必齐河为界，这是最后的意见。”

戈洛文严辞拒绝：“如此划界，沙皇陛下将让出阿尔巴津堡和颜尔古纳堡。我未受权划分蒙古诸汗和俄国领地。”

双方又几经努力，终于达成了协议：

第一条：以绰尔纳河附近自左面流入石勒喀河之格尔必齐河为界。南侧河流归中国，北侧河流归俄国。阿穆尔河附近的河流、山岭和土地，留待后议。

第二条：以额尔古纳河为界，南岸归中国，北岸归俄国。

第三条：拆毁阿尔巴津，居民及军队撤回俄国。

第四条到第六条规定了交换逃人、贸易和边界纠纷等问题。

这就是《中俄尼布楚条约》。

大清使臣虽然据理力争，要求解决蒙古问题，但由于沙俄早就把蒙古视为自己版图内的一部分，极力回避这一问题，所以谈判未能就中俄东段边界达成协议。

大清使臣委屈求全，蒙古地区搁置一边。贪欲无穷的沙俄利用中段边界未划定的机会，紧锣密鼓地侵略扩张。大清龙庭也洞察沙俄的扩张意图，以及那潜在威胁，制定了相应的对蒙政策。

表面恢复了往日平静的蒙古游牧地，实际上正经历着一场无硝烟的战争。两强相较，到底“鹿”死谁手呢？

二、讹诈订约

千年流淌的额尔齐斯河那苍老的面颊上，接着一丝难得的微笑。这里曾经有蒙古族兄弟相残，这里也曾有过“北极熊”那凄厉的吼叫。如今：这里获得了片刻的安宁。没了刀光剑影，也没了血雨腥风。

媚态十足，狡猾异常的黑狐，又开始和轻信的猎狗嬉戏。安居乐业的蒙古重操旧业，骑马执箭，弯弓围猎。

一派太平盛世的气象。

这里是《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出的“两不管”地带。但利欲熏心、侵略成性的沙俄不可

能袖手旁观。沙俄商人打着和平贸易的招牌，巧取索夺；俄罗斯军人奉令窃取情报，深入额尔古纳河以西地区，测查自然资源，绘成地图；哥萨克还强行修筑工事。当然，大清龙庭也不会旁观，索额图等王公重臣，念念不忘尼尔楚谈判的委屈求全，刻意扶持喀尔喀蒙古人，发展与蒙古人的贸易。

一派祥和的额尔古纳河畔，实际上正经历着一场激烈的角逐。只不过，没有刀光剑影，硝烟弥漫。

野心勃勃的彼得一世深知，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他很想了解清朝博格汗（皇帝）的意图。但是，要想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因为，狡诈的彼得一世不想做出一种过分关心边界问题的姿态，以免被清朝小瞧或抓住把柄。那么，怎么办才能两全其美呢？

正当彼得一世一筹莫展的时候，荷兰人、外交事务衙门长官、韶皮库司库维尼乌斯前来遇见。他向沙皇求情。请赐准他的同乡伊兹勃兰特·杰义斯，到中国经商。

伊兹勃兰特·杰义斯，是荷兰人。他曾在德国汉堡经商，后来，为了更好地施展自己的经商才华，来到了俄国，起了个俄文名字叫叶利札里。‘他通过同乡、沙皇宠臣求请，想望批准他取道西伯利亚前往中国，他同时想请沙皇恩准，借国库六千卢布，一半付现金，一半付貂皮和其它毛皮；为了便于跟中国人做生意，他还想请沙皇赐他个官商衔。

此外、杰义斯别无奢望。

得知此事的沙皇正中下怀。这不仅是因为，杰义斯是“自费出国”，经费全部借支，他从中国运回绸缎及其他货物出售后，就清偿贷款；更主要是因为，解了他心中的一个难题。

彼得一世当即召见杰义斯，当场批示：

“……命你出使中国，办理本大君主对中国皇帝之事务，并授予你，叶利札里，本大君主致中国博格达汗之亲善国书。”

杰义斯喜出望外，他本来只想去中国做主意，向沙皇贷款，可如今竟成了使臣。

外交事务衙门受沙皇之命，给了杰义斯一份训令。维尼乌斯再三叮嘱：

“应亲自将训令作为绝密文件保存、除和你同行的外交事务衙门司书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内容！”

这份神秘的训令包括：

“探悉博格达汗陛下是否愿意信守和约”；

“释放沙皇陛下的俘虏，交还俄国逃犯，交还大君主沙皇陛下的布里亚特人和翁克特人”；

“准许在中国境内建教堂”；

“应必要时告知清廷大臣，无极讨论边界问题；探询清廷希望如何解决待议地区的问

题”；

1693 年 11 月，杰义斯一行来到北京。

清政府深知俄罗斯人狡诈，来者不善，因此严加防范。他们把俄罗斯使团安置在“四夷馆”。由于不明来意，他们委婉拒绝了倘使自由进入市场的要求，限制他们行动。

十天后，康熙帝下诏，在皇宫接见俄罗斯使节。皇家威仪，规正矩方。一切都是按礼制行事：召见，迎送，赐宴……

康熙帝当时出于礼貌，接受了信和礼物，但第二天便派人专程送回了信和礼物。

杰义斯只是在与康熙宠信的耶稣会士、法国人张诚交谈时得知，皇上欣然接受和约，无意侵扰沙皇城寨。

受命而来的杰义斯只带回了康熙的和平意向这一令人宽慰的消息。清朝官员严加提防，他无法得知大清想在何处划界，因为一直有清朝官员陪送，所以他也无法记下边界上的标志。

回国后，杰义斯传达了口信，并交上了清朝“理藩院”致沙皇的文书。

结果当然不能令人快慰。大清王朝义正辞严地驳斥了沙俄的种种无理要求。

杰义斯只是一个“使臣”，而不是戈洛文那样的“全权大使”，因而杰义斯使华不能说是外交失败，但至少，彼得一世美梦落空。

得知大清王朝和平意向的沙俄，变本加厉。哥萨克明目张胆地修建堡垒哨所，强占恰克图；俄罗斯商人牟取暴利，掠夺财富；一心向道的神甫高举十字架，传福音，收教徒；俄罗斯官员四处送礼，拉拢蒙古王公。

彼得一世一方面扩展势力，另一方面，想作出和平的姿态。1720 年，他决定再派使使华。

这次，沙皇选中拥有军人和外交官双重身份的列昂·瓦西里也维奇·伊兹玛依洛夫，近卫军上尉，驻丹麦外交官，

在出发前，沙俄外交事务衙门、商务部，都分别对伊兹玛依洛夫作了详细训示；另外，也对随从的一等秘书劳伦特·朗克作了同样训示。

沙俄训令冗长，商贸是主旨，其内容之详，简直抵得上一部商务法典。由此可见，沙俄仍想重施故会，玩弄那回避边界谈生意的游戏。

1720 年 11 月，伊兹玛依洛夫一行抵达北京。

康熙帝先后十二次接见来使，其中，三次为正式跟见，包括递交国书、正式觐见、辞行

觐见，另外还有九次私人会见。

在私人会见中，心胸开阔的康熙帝声明：

“……且我两国无必争之理，俄国为严寒察远之国家，联如派兵前往，必致全军覆没，且纵有所获，于联究有何益，俄国君主亦同。假如为对抗朕躬而调兵遣将于贵国人民所不习惯之炎热地带，岂反使之无端而死耶？战争究于两国有何利益？两国皆有许多土地以图自存也。”

伊兹玛依洛夫当即表示，一定将陛下的这番好意转达沙皇。

在会谈中，康熙帝顺便请俄使转告沙皇，清朝曾经多次致函，商讨蒙古边界问题，不知为什么一直没有回音。

对此，伊兹玛依洛夫早经外交事务衙门授意，不涉及细节问题。

沙俄分明在回避康熙帝已经察觉到这一点，但恭俭礼让的圣主还是以礼相待，为了表示大清诚意，他授意理藩院，允许劳伦特·朗克留在北京，充任沙俄驻华代表同意让一块地给沙俄，作建教堂之用倡议为防止私人商队入境，中俄双方实施印信制度。

伊兹玛依洛夫大喜过望。

临别前，康熙帝把自己的披风和留皮帽子赏赐给他，并和伊兹玛依洛夫握手道别。

沙俄闻讯，举国欢腾。

小人之心沙俄，错误地把我大清龙廷的诚意解为屈服沙皇陛下。对于康熙的国书所提的归还选民，议定完边界等问题顺之不理。

康熙龙颜震怒。

理藩院议定，采取强硬但不过激的措施，以示不满，扬我龙廷国威。

他们召见沙俄驻京代表，对沙俄的回避，以及拉拢蒙古王公等事实，表示强烈抗议。

狡猾的朗克声称，他本人不是外交官，无权对沙皇陛下的事务作出解释。

与此同时。清政府派到色楞格斯克，交涉归还越境蒙古牧民的和节，也遭到西伯利亚总督切尔卡斯基的托辞拒绝。

潘政府忍无可忍。理藩院郑重声明治中俄两国的边界问题和进入俄境的蒙古族牧民归还问题未得到解决以前，中国政府不允许俄国人在中国停留。

之后，朗克被强令离境。

俄国商队被赶走。

中俄贸易完全中断。

风景秀丽、独赋神韵的额尔古纳河畔，依旧是景致可人的太平盛世，仍旧是大清龙廷和沙皇俄国争夺的焦点。

岁月不饶人。戎马一生、威震八方的圣主康熙帝驾崩。康熙第四子雍正继位。不可一世，攻城掠地的沙皇彼得一世也已作古。继位的是女皇叶卡特琳娜一世。

雍正秉承先皇遗志，决意解决蒙古边界问题。

大沙皇则急于解决商务问题。

沙皇惯使武力征服的伎俩。可如今，大清旗帜飘扬的蒙古地区，满蒙铁骑严阵以待。沙俄纵有狼子野心，也不敢轻举妄动。

万般无奈，女皇只好派使。名义上，使华是庆贺新皇帝登基，宣布女沙皇叶卡特琳娜继位，而实际上另有所图。

女沙皇最关心的是中俄商贸问题，因此她命令外交事务衙门，一定要选一个精明的商人。外交事务衙门斟酌再三，选定了萨瓦·卢其迟·务拉的恩拉维赤。

萨瓦出身于高贵的波斯尼亚家庭，他很早就开始经商。1702年，他只身一人来到俄国，开设商号经营毛皮。他曾经多次为沙俄政府办事，深得彼得大帝赏识。彼得大帝赐他房屋并多次派他去威尼斯、罗马，参与各种谈判。因此，他养成了条理、准确和清楚的习惯，非常着于应付微妙的商业谈判和外交事务。

女皇认定，俄国在它的对华谈判中，从来没有找到过这样有才智，这样称职和这样忠诚的人物。她任命萨瓦为“特遣驻华全权大使”。外交事务衙门和商务部分别对萨瓦进行训戒。其中外交事务衙门强调：

利用一切手段和一切人，尤其是耶稣会教士与中国缔结商约，或者至少也应恢复中断了的商务关系；如果中国方面坚持要先解决边界问题，可以让步。当然，要要求延迟划定国界，越迟越好。

商务部仍是旧话重提，把当时寄托在伊兹玛依洛夫身上的希望，又再次寄托在萨瓦身上。

踌躇满志的萨瓦，携带了价值一万卢布的礼物、国书和一件“秘密武器”——一封意义重大的信。在离开彼得以前，萨瓦把房子租给了法国大使康普里顿。感恩戴德的大使为他起草了一封给法国耶稣会教士的介绍信，它把萨瓦和以巴多明为首的耶稣会士拉近了。后来，这帮了萨瓦的大忙。另外，萨瓦还带了三千卢布活动经费，供行贿之用。

1776年11月25日，中俄双方开始了第一轮会谈。

会谈一开始，气氛就很紧张。大清兵部侍郎图理琛首先指出：

“沙俄侵我大清所属蒙古大片领土，拘我喀尔喀牧民，我皇圣心仁慈，唯愿和为贵，不愿刀兵相见，便望速还我河山！”

之后，清朝会谈代表提出一个个条约草案：在从贝加尔湖到安加拉河流域，一直扩展到托博尔斯克的地方划定疆界。

城府颇深的萨瓦，惊诧于中国方面的气势。他不理解，图理琛为什么会暴躁易怒。不象贤明使臣的样子。他暗下决心，任你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

萨瓦玩弄推诿、搪塞、偷梁换柱等口舌之技，尽力回避敏感的边界问题。

会谈陷于争论之中，先后多达三十多次，双方提出的条约草案多达二十几个。谈判席上，双方斗智斗勇，谈判桌下，双方也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大清不屑于做那些离间、拉拢的卑鄙勾当，但深知俄使居心区测，所以对俄使所驻的四夷馆严加防范。

俄使则极尽拉拢利诱、刺探之能事。他们在谈判前就已经跟巴多明等耶稣会上取得了联系。经介绍，俄使结纳了康熙老臣马齐。在雍正殿下不得志的马齐，把先皇皇恩忘得精光，暗中自俄使通风报信，使萨瓦能及时了解清朝的态度。

1927年4月1日，中俄双方商定了不在北京签订条约。双方初步议定，对乌第河区未定界问题，另行议定；互相引渡边民，俄商可以来华贸易。

萨瓦急忙派使通报女皇，说谈判顺利，中国方面敬畏女皇，渴望和平。女皇当然很高兴。

1727年7月4日，色楞格斯克以南的南布尔河畔。

当年，就在这里，我大清使臣索额图、佟国纲、阿尔尼等人，委屈求全，与沙俄以戈洛夫为代表的使团，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弹指一挥间，已是四十年。当年重臣、圣主已作古，只留下那苍老的、没有羁绊的名城作证。

今天，迎接清使的又将是怎样一种命运呢？我大清代表隆科多等人，追忆先人，胸怀坦荡，决意据理力争，以求无愧于皇恩。

隆科多富于智谋，辩才出众，又天生威仪，他力主归还河山，划定中俄东面边界。

萨瓦感事态严重。他对隆科多的固执和坚定，无可奈何，谈判几乎停顿。

隆科多算好，沙危急于解决中俄贸易问题，不会一方中止谈判，所以一点也不肯让步。

无计可施的萨瓦只好“挖墙角”。他深知隆科多才是真正的劲敌，而图理积、领附策芬等清使对于边界没什么科学概念，是蠢才，只要弄掉隆科多，事也就成了一半。

于是，萨瓦再次利用巴多明神父联系，托他贿赂康熙老臣马齐，弹劾隆科多功高欺主，仗势凌人；阻挠谈判，一意孤行。

偏听偏信、性情暴烈的雍正当即下旨，调回隆科多。

忠心报国的隆科多无可奈何地离开了南布尔河畔。

萨瓦等卑鄙小人如愿以偿。

精明的萨瓦，面对一群资料缺乏的平庸之辈，当然轻易就能占上风。

8月31日，在谈判不利的情况下，清朝代表，俄使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规定：

以恰克图和鄂尔怀图山之间。作为两国国界，由此东至额尔古纳河，西至沙华纳依岭，为两国边界线，南归中国，北归俄国。

在恰克图和鄂尔怀图山之间，适中平分设立鄂博堆，分界标志，作通边贸易地点。

疆界划完后，边民不得随便越界。

紧接着。中俄双方又分别于10月23日，11月7日签订了《阿巴哈依图约》和《色楞格界约》。

1728年6月25日，中俄双方在恰克图河畔互换文本，称《喀尔喀会议通商条约》，也就是《恰克图条约》。

至此，中俄中段边界正式确立。

沙皇俄国攫取了贝加尔湖一带的广泛地区。而这里原属我华夏河山。

狭路相逢，勇者胜。谈判桌远比沙场残酷，“主帅”应该勇冠三军、先声夺人，了解对手的目的，把握稍纵即逝的机遇。隆科多无疑是个中奇才，只可惜圣主偏信，致使后院起火，而这一切，全是沙俄的计谋。

南布尔河畔，再次留下了一点缺憾。不知那当年曾委屈求全的索额图、佟国纲、阿尔尼，在九泉之下作何感想？恐怕，伤心总是难免的。

不过，当时清庭几代以来，费尽心思，要解决中俄中段边界问题。从圣主康熙到暴烈的雍正无一不竭尽全力。而今，不动刀兵，就正式解决了一个遗留下的争端，委实不易。

中俄东段。暂时出现了各事其中、睦邻友好的场景。额尔古纳河畔，风光愈发迷人。这里已经结束了旷日持久的无硝烟的战争。蒙古族人悠闲自得，骑马执箭，弯弓围猎。

百余年后，沙俄侵吞的野心再次狂喜地跳动，这里又是硝烟弥漫……

第四节 土尔扈特部万里归中华

一、身在曹营心在汉

千年流淌的额尔古纳河哟，
你悄悄地诉说什么？
谁的悲哀。
谁的忧愁，——溶进了你那宽广博大的胸怀

这是一首古老的民歌。很难说清楚，这首苍凉的歌子确指什么。不过至少有一点，那就是后人对往昔的追忆，在情怀激越时也难免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虎，是惆怅，是感慨、是哀怨。总之，不会轻松就是了，如此，当然物也如此、因为人能托物寄情、喻事。正因为此，所以后人反思及古老的额尔古纳河畔曾经发生过的事、存在过的人时总觉着额尔古纳河最可信，最有情、最公正。

果如此，那么额尔古纳河该不会忘记土尔扈特人吧？远行的游子最令母亲挂怀，归来的游子母亲最喜欢。这是人之常情，想来灵异的母亲河许不会例外吧。

额尔古纳河曾经哺育过一个神勇的民族——厄鲁特蒙古人。那时，母亲河还风韵犹有。她沉默、宽容、非常宠爱自己的子孙。

那时，厄鲁特蒙古人有四支：准噶尔部、和硕特部、杖尔伯特部和土尔扈特部。或许是由于母亲河的大度，使他们活得满意，所以在骑射谋生之余，有了那种互相攻击的问心，各兄弟之间经常刀兵相见。

蒙古族上有过征服世界的历史和桀骜不驯的传统。更兼当时的蒙古各部位位于天高皇帝远的北疆，游离开祖国边陲，各部只能自成一统。缺乏象先祖铁木真那样的“一代天骄”式人物，所以很难保全。

同样是骁勇异常的土尔扈特人，可以舍身而赴敌，可当时是兄弟相残，于心何忍？

煮豆燃豆其，
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土尔扈特蒙古人首领和鄂尔勒克心灰意冷。他挚爱骑射游牧的中华北疆，眷恋那豪爽勇猛的手足同胞，可他忍受不了那种兄弟相残的情景，他更不愿自己的族众受到欺凌。他决定率族众全身而退，另寻乐土。

1633年，和鄂尔勒克率领族众，携带毡帐等生活必需品，赶着畜群，北上寻找安身之地。

苍茫河山，何处可以安家立命？土尔扈特人远离故土，只身北上。那漫长的旅途留下了多少酸楚的泪，那多情慈善的额尔古纳河记下了多少次再回首！

游牧人离不开水和草。历尽艰辛的土尔扈特部族人终于遇到了一块乐土。伏尔加河下游。这里荒无人烟，水草肥美，正适合骑射民族生存。土尔扈特人感激上苍慈悲，慨叹终于找到了一块乐土。

善良的土尔扈人定居下来在他们心目中，这里是个安居乐业的好地方。而实际上，造化捉弄人。他们那辛酸的历史就从这里开始。

客居异域的土尔扈特部恪守祖先传下来的规矩。他们仍然住毡包，穿皮袍，骑骏马，仍然骑射游牧。那多少年来约定成俗的东西、仍旧约束着每一位蒙古人：集体决定部中大事，和平解决纠纷，礼佛敬喇嘛……

只可惜，好景不长。对我中华北疆垂涎三尺的“北极熊”来到了这里，从此，乐土有了许许多多的纷扰，有对沙俄逼迫的愤慨，也有对故土的眷恋。

沙俄对当年铁骑西征、威震欧亚的蒙古人心存敬畏。他们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土尔扈特人就范。

沙俄看中了土尔扈特部的皮毛，牲畜，于是，就不惜豁免原来每年三千卢布的关税，变相地进行商业侵吞，妄想成为蒙古人最可爱的伙伴，达到结成同盟的目的。

狡诈的沙俄深知，让草原上的游牧人臣服很难，所以他们声称，如果不敢订约，那么哥萨克人会经常光顾这里。用武力逼迫的方式，先后和土尔扈特部签订了十二个条约。

为了民族生存，深明大义的和鄂尔勒无忍辱负重。他深感这里很难成为真正的乐土。

寄人篱下是蒙古人所不愿的。一向来去自由、桀骜不驯的蒙古人，戴上了枷锁。处在那异域的伏尔加心胸开阔，赐予了远方游子衣食丰足，人丁兴旺，可那伏尔加

河的不肖子孙，却在排挤他们，压榨他们，土尔勒克又何不是如此！土尔扈特部心系故国。

和鄂尔勒克死后，他的儿子书库尔岱青、罗卜藏诺颜曾感到习惯不同，言语又不通，还是祖国好啊！

言毕，一饮而尽。他命令手下，拿大碗来，要与诸位大人一醉方休。

来访的客人深为土尔扈特部的气氛感染，他们很理解也很同情这些游子。对于这种眷恋故国之情。任何话都无法宽慰。他们也尽情地豪饮，与族众同乐、同醉。

在他们居庄的十四天里，每天都有盛情的宴会，每天都能听到思念故土的言辞。看到那酸楚的眼泪。

没有不散的筵席。大清来访的使臣要离开了。阿玉汗派自己的亲信阿扬尔，携带礼物、信函回访永熙帝，阿玉汗的小儿子策楞敦多布还向康熙帝敬献一杆鸟枪。

“娘家人”要上路了。阿玉汗率族众送行，阿从汗恳切、诚挚地请佛祖保佑圣主康熙，并再三请殷扎纳等人转达他向康熙的祝福。

土尔扈特族人手捧檀香，双手合十，恭谨垂首，口中称诵：

“尊贵的客人啊，佛祖保佑！”

殷扎纳等人也非常激动，有这样的子民，确实是皇上鸿福啊！他们饮下壮行酒。然后上马，与土尔扈特部族众挥手道别。

草原上，清朝客人的马队已渐渐远去了。阿玉汗等人仍然立在那里、木然、凄楚而又哀怨。他们那饱经磨难的心，跟着那来自故土的人去了，远去了……

殷扎纳等人回国后。面见圣上，详细描述了出使情况，和土尔扈特部的心愿。圣主康熙嗟叹不已。

礼尚往来。旅居他乡的土尔扈特部、不断派人来清廷，或者礼佛，或者进贡通好。清政府一直是礼遇有加，待如上宾。

1731年，土尔扈特部台吉多尔济派遣阿尔巴图、沙喇布丹津等人来到北京，请求拜见达赖喇嘛，言辞恳切，唯恐皇帝不恩准。雍正帝不但很痛快地答应了他们的请求，而且还就这件事给理藩院下了一道圣旨：

“……他们住在遥远的北疆，多年来受俄罗斯压制，竟有这样诚挚的愿望，实是我大清的荣耀。应该好好地提供粮草等物，送他们去礼佛，回来后，要多给他们些茶叶、钱币。”

阿尔巴图等人在清廷的帮助下，顺利完成了拜见达赖喇嘛的神圣使命。土尔扈特部欢欣鼓舞。

1756年，阿玉汗之子享罗布喇什，再次派遣吹札布借道俄罗斯，历尽千辛万苦，花了三年时间，来到北京，进贡通好，顺便去西藏礼佛。乾隆帝接见了吹札布，并派官员陪同他去西藏。

第二年，吹札布结束了西藏之行，回到北京。

乾隆帝再次召见，询问西藏一行的状况并表示慰问。吹札布表示！

我们只是依附俄罗斯，而不是投降他们。我们怎么肯做俄罗斯的臣民？”

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他画出了土尔扈特部的疆域图，献给乾隆。

土尔扈特部和清廷又亲近了一层。

派人互访、准许理佛，从政治上和宗教上缩短了那横在北京和伏尔加河之间的茫茫万里路。血浓于水。身处异域的游子们心系故国，思念哺育他们先人的故土。

善良、淳朴的蒙古人，在祈求佛祖保佑时，常常不约而同地提出同一个要求：

“佛祖保佑，让我们的灵魂回到故土。”

伏尔加河畔。蒙古人为生计日益艰辛，这里少了那蒙古人豪爽的笑语、骂声，多了那苍凉悲壮的长调。他们在一次又一次吟哦那故老相传的英雄史诗，追忆雄风摩然的老人和那惊心动魄的丰功伟绩。那一声声令人心酸的长调，仿佛在呼唤，在催促：

魂兮归来！

二、杀条归国血路

伏尔加河下游，一片凋零的气象。

体格健壮、性情粗野的彼得大帝，精力过人，智谋也过人。他企望走出内陆。因为他已经拥有无数顷土地和领土、游牧为生的臣民，他想称雄海上。为此，他不惜穷兵黩武，

“钱是战争的命脉”。是彼得大帝的至理名言。为了钱，为了战争，残暴的彼得一世不惜榨出人油。伏尔加河下游的蒙古人受尽盘迫。

精通用兵之道的彼得非常看重蒙古人的勇武。在他看来，沉静果断的蒙古人远比面目狰狞、杀人越货的哥萨克更胜任刀兵之事。于是，他不断抽调土尔扈特铁骑，

强迫他们去杀人，去攻城掠地。

彼得大帝死后，继位的叶卡特琳娜一世仍然挥师南下，征战不息。

与此同时，沙俄不忘同化土尔扈特蒙古人。大批东正教士刻苦学习蒙语，操着蒙语讲经布道，借上帝之名强行给蒙古人施洗礼。

土尔扈特蒙古人忍无可忍。

1770 年 11 月，伏尔加河变得出人意外的温顺。她没有冻结那仁慈的心，仿佛在真诚地挽留那饱经沧桑的游子。

游子意已决。

北岸的一万多户土尔扈人也渴望与南岸兄弟携手南归，只可惜，温柔的伏尔加河居然未结冰，留下了这些心系故国的子民。

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毅然向北岸兄弟辞行，率领十六万九千余人，和大批牲畜，离开了七代人居住了 70 余年的伏尔加河。

南归之路茫茫。土尔扈特人扶老携幼，众志成城。

他们选派身强力壮的旅众，组成蒙古铁骑，攻克了四座阻拦他们的俄国城镇，阻击了围追堵截的俄国骑兵，奋力南下。

由于匆忙，土尔扈特部迷了路，进入了无水也无草的戈壁滩。由于环境恶劣，老人和孩子死去很多。伤心欲绝的蒙古人不得不横下心，擦一把那难以擦干的泪水，带着那亡人的灵魂，南归，南归！

苍茫渤海，留下了难以数计的血泪，父子诀别、夫妻永离，土尔扈特人心都碎了。

八个月的万里行程中，土尔扈特人无法找到饮水，只好喝畜牲的血，结果瘟疫肆虐，死者无数。

1771 年 6 月，土尔扈特部终于抵达伊犁。

“终焉思故国，遂而别殊伦。”

远方的游子终于回到了祖国大家族。

渥巴锡在会见伊犁将军时。含泪诉说那屈辱的历史，和那南归途中的艰辛。在场的人无不泣下。渥巴锡为表示归国的诚意，献出了祖先 1410 年永乐年间受明朝策封的一颗汉篆玉印。

中华北疆的各族人民齐心协力，很快就帮助土尔扈特人安了家。

游子们又可以安居乐业了。

1771 年，热河木兰围场。

乾隆行幄里，红毡铺地，彩灯高悬。江南那巧夺天工的织锦饰物，挂满了行幄，把看似简陋的帐子，装扮得富丽堂皇。

渥巴锡奉圣旨来到了这里，面见圣上。

当兴高采烈的宾仪官高呼“贵客到”时，乾隆帝亲自便服出迎，双手挽起匍匐在地的渥巴锡，携手进入帐内，并让他坐在自己的近旁。

最令渥巴锡的激动的是，乾隆帝竟然会讲一口流利的蒙语！

乾隆一声“赛音拜闹”（你好啊！）使历尽万险，受尽凌辱的渥巴锡激动万分，虎目垂泪。

接着，乾隆用蒙语和渥巴锡亲切交谈。谈历史，谈现状，十分关心土尔扈特人。

之后，赐宴款待渥巴锡。酒不能使豪爽的蒙古人醉倒，但这种故乡人的热诚，却真的使他们醉了。

同年九月，仿西藏布达拉宫建成的普陀宗乘庙在承德落成。乾隆携渥巴锡前去，参加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盛大法会。

乾隆帝向各界人士介绍了游子渥巴锡，并封他为卓里克图汗（刚毅之意），立碑为证。另外，分封土尔扈特请领主。把他们安置在准噶尔盆地南部和西部。

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再次感受到了浩荡皇恩。土尔扈特部人民更是难忘圣上恩典。

土尔扈特人扬眉吐气。

乐土就在脚下。百余年前，和鄂尔勒克率族众北上，为的是回避兄弟相残，另寻农家立命处。当年，荒无人烟的伏尔加河流域收容了他们，可还未抚平他们那还在滴血的心，灾难就降临到他们头上。从此，再无宁日。终点又回到起点。不屈的蒙古人心系故土，万里回归，终于找到了一片真正的乐土。

是啊，祖国母亲的臂膀最坚实；最可靠。想那当年负气出走的游子和鄂尔勒克，总该相信这一点了吧？

永远留在他乡的人哟，魂兮归来！

第一节 趁火打劫

1. 南下！再南下！直至中国的长城！！

“呜呜”火车的长鸣声刺破茫茫原野的寂静，喘着粗气费力地行驶在土拉至莫斯科的铁道线上。

列车上所有车窗都封闭得严严实实，生怕露出哪怕是一小点缝隙。列车中段是一节华贵的包厢。包厢里暖气烧得热烘烘的，沙发上坐着一个头戴假发的高大男人，手里拿着报纸，毫无兴趣地翻来翻去。

“先生，您要的咖啡来了！”“喏，端过来吧。”

这个男人放下手中的报纸，接过咖啡，急不可耐地呷了几口。“再取一块方糖来！”

男人放下杯子，挥挥手示意仆人赶紧取糖。少顷，仆人手端糖盘，匆匆回来。男人取过糖块，轻轻投入咖啡杯。

“先生，这样的天出门，真是糟透了！现在才九月份，怎么冷成这样啊！”

仆人握握手，极力向主人证明天气的寒冷可咒。这个男人抬起头，把目光从方糖移到仆人脸，对他瞪眼说道：

“天是够冷的，大概糖也给冻住了，要不，就是被你偷吃了！对吗？雅克！”

仆人赶快说道：“先生，没有的事！我从不偷吃您的糖，您是知道的——”顿了顿，他又说：“先生，您怎么这么着急，非要在这种鬼天气下出门回莫斯科？”

“哈哈！”这个男人一阵狂笑，站起身来，走到车窗边，用手在玻璃上划了一个大大的圆圈，仔细欣赏着自己的杰作。

“雅克，你知道个屁，不是我急，是沙皇陛下急。”

仆人不解地呆看着这个男人。

“我这土拉省省长刚当一年，沙皇陛下就不乐意了，他要重新给我找事干！哈哈！雅克，你把东西收拾好。告诉赫尔曼上尉，让他把手下的人集合好了。咱们很快就要到莫斯科了！”

“是，先生。”仆人回答一声，转身步出包厢。

这个自称是土拉省省长的男人名叫穆拉约维夫。他出身于贵族家庭，少年时代就在皇家军事学院受训，在宫廷任过少年侍从。十八岁入伍，在皇家近卫军中任骑兵大尉，二十岁出征波兰，镇压波兰人民起义，后来又参加过俄罗斯与土耳其之间的战争……由于作战拼命，手段凶狠而战功卓著，很受沙皇器重，于是官运亨通，二十岁便被破格提升为少将，二十七岁升任土拉省省长，受男爵之薪俸。

穆拉约维夫平步青云，这在沙俄官场中非常罕见。不管他到什么地方，总会立即成为当地政界、社交界的头条新闻，男人们想方设法讨好他、巴结他；女人们则一个劲儿向他抛媚眼，拿出最温柔的字眼来献殷勤……

上任土拉省省长刚刚一年，沙皇给他一道紧急公文，让他尽快赶回莫斯科，接受新的委任。简单收拾先行李，带上几个随从侍卫便坐上这趟开节莫斯科的快车。

傍晚时分，蒸汽机车喷着白气，缓缓驶入莫斯科车站。

站台上，停着数辆华丽的四轮马车，马车后面是数名全副武装的哥萨克骑兵，头戴金黄头盔，肩背快枪，腰挎长刀，座下都是高大膘肥的黑马。

列车停稳后，从包厢里跳下几个穿着制服的官兵。随后，赫尔曼上尉和雅克站左扶梯两旁，垂手而立。

穆拉约维夫在车厢门口整整礼服，不紧不慢地走下车厢。

“报告爵爷，皇帝陛下请您立即去皇宫，车已比准备好了！”

领队的哥萨克骑兵队长左手扶着军刀，右手敬礼，全身毕直站定。随后又道：“请您随我来。”他领着穆拉约维夫走到一辆马车前，打开车门，待穆拉约维夫坐进车厢之后，小心翼翼具地关上车门。骑兵队长紧跑几步，翻身上了一匹大白马，右手一挥，“立即赶往皇宫，驾！”

一行车马急驰而去，地上只留下凌乱的马蹄印和车辙。

莫斯科皇宫中，沙皇尼古拉一世身着便装，在室内踱来踱去，不时看着壁上的挂钟。桌上的十二支蜡烛光焰飘摇，沙皇的身影在墙上不断晃动。

“陛下，穆拉约维夫男爵求见。”

“好！好！快让他进来！”沙皇十分高兴地答道。

穆拉约维夫急步进来，摘下帽子，向沙皇行了大礼。

“快坐！快坐！”待仆人退出时，尼古拉一世又说：“东方的形势你都知道了吧？英格兰凭着 48 艘军舰、4000 名士兵，就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大清帝国的定海、广州，炮轰厦门，上

海以及距北京很近的天津大沽。大清帝国抵挡不住，赔款割地、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地为通商口岸——”

说到这里，尼古拉一世摇摇头，叹气不止。

“后来，我们把清帝国的实力估计得过高了！以致于错失大好良机唉。”

“陛下，我并不认为如此！”穆拉约维夫以轻松的口吻对沙皇答道。

“哦？那么男爵，你对我们俄罗斯的未来是成竹在胸罗？”

穆拉约维夫摸摸刮得发青的下巴，不无得意地说：

“陛下，中国人有句话叫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我们现在行动也不晚嘛！”

“男爵的高见是？”

穆拉约维夫从圈椅中站起身，目光紧盯着接在大厅正墙上的十字架，若有所思地说：

“目前，虽然我们没有摸到实利，但是，仁慈的天主却赐给俄罗斯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我国与清帝国直接接壤。两国之间却有着许多尚未明确的辽阔边界：自古以来，中国各朝代的政府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战火不断，他们真正控制偏远的蛮族相当吃力，中国在边疆地区的影响力并不是十分强大。他们对此十分清楚，但无能为力，只能长叹一声“山高皇帝远”罢了！”

说着，穆拉约维夫耸耸肩，轻轻摇摇头，摊开双手做了个无可奈何的姿势。

尼古拉一世的眼中飘闪过一丝欣喜，心中暗道：

“你小子还真有一套，老子还真没认错人啊：看来，总督的职位还非你莫属。

穆拉约维夫在沙皇旁边的椅子中坐下，询问道：

“陛下，您这次急召我回宫，是不是让我去东方？”

尼古拉一世把目光转到别处，对穆拉约维夫的话不置可否。

“陛下，我已经准备好了对付中国人的策略：首先是擦亮军刀！在俄清边界的所有重镇要地派驻重军，立即扬威；同时，派遣特工深入清帝国，搜集清国军事、政治、经济、交通方面的所有情报，知彼知己，静观其变，打和在我。

“然后是乱而取之！采取各种必要手段，挑拨清帝国边疆的少数民族，鼓励他们投入俄罗斯帝国的强大怀抱。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成吉思汗的子孙，然后是维吾尔族人、回族人……蚕食鲸吞，把俄罗斯的国旗插到秦始皇修筑的长城上！”

穆拉约维夫说到这儿，不知不觉地站了起来，手臂不断弯曲，毛茸茸的手攥紧了手中的茶杯，脸上的肌肉不断抽搐，在烛光照射下，森然而令人恐怖。他一动不动，仿佛自己正站在长城脚下，手中握着战刀，哥萨克骑兵顺着他的军刀疾驰而过，喊杀震天……

尼古拉一世走到壁橱前，取出两个酒杯，再找出一瓶窖藏了三、四百年的法国白兰地，满满斟上，亲自端到穆拉维夫跟前。发呆的男爵清醒过来，看着面前的酒，受宠若惊，忙不迭地伸手接过，向尼古拉一世举起了酒杯。尼古拉一世拍拍他的肩膀，满意地说：

“我任命你为俄罗斯东西伯利亚总督！为了你光荣的使命，干杯！”

穆拉纳维夫一仰脖，喝干了这杯价值数百卢布的名酒，脸上的表情也平静下来。

“男爵，你在到任之后立即着手开展工作。你可以根据形势需要自行决定军队的数量，在非常时期可以随时调动你辖区的军队，勿须请示陆军大臣；另外，你的财政预算报告要准备两份，一详一略。详细的送交财政大臣，简略的呈送给我。为了俄罗斯的利益，你在金钱问题上不可吝啬，以免因小失大。一周之后出发，来得及吗？”

“陛下！”穆拉约维夫又狂热地站起身，给尼古拉行礼。“我心肝情愿为您效犬马之劳，感谢您对我的信任，为了俄罗斯帝国的利益，为了您皇帝陛下，我二天之后动身！”

尼古拉一世起身，连声夸奖：

“好！好！你真是我最忠实的大臣啊！我要亲自为你送行！”

“谢陛下的恩典。到任之后，我要立即给中国人、点颜色看看，让他们尝尝俄罗斯拳头的份量！”

男爵举起右手，对沙皇又道：

“陛下，我向您保证，我将指挥勇敢的哥萨克小伙子们消灭一切敢于抵抗的敌人！使俄罗斯帝国的边界南下！南下！！”

穆拉维约夫声嘶力竭的声音在大厅中嗡嗡作响，许久才慢慢消失。

2、狼烟又起

1842年8月29日，在停泊于南京江面的“皋华丽”号上，清廷大臣耆英，伊里布等在英国侵略者的胁迫下，与英国全权公使璞鼎查订立了屈辱的《南京条约》，接受了英国提出的全部勒索条款。

占领定海达半年之久以及占领广州的英军终于撤走了。沿海员也时常有几艘英国巡洋舰示威巡游。但所幸的是，天朝与夷人相安无事，清廷虽然觉得英舰的确有损大朝“威仪”。但这总比出现血光之灾强些吧。

咸丰皇帝生来胆小。英军攻打天津那阵儿，北京城里人心惶惶，传闻四起；“什么英军神勇、枪炮坚利”啦，“夷人会使妖法，连观世音菩萨也拿他们无可奈何”啦……咸丰虽然深居禁卫森严的紫禁城。但传闻却一点没少听，于是整日提心吊胆，恨不能地上生出条缝，躲里边儿藏起来。

于是，咸丰帝便只得“破小财化大灾”，以求息事宁人，自己也落得安宁。此后又相继同美国和法国分别订立《望厦条约》与《黄埔条约》，料想日后便万事大吉，谁知却打错了算盘。

咸丰皇帝和清廷都不愿得罪洋人，认为以“仁怀之心待彼，即可无战事纷争”。但他们的想法太幼稚简单了，无异于异想天开。

侵略者的狼子野心是不会知足的！

在清政府屈悔地割地赔款求和之后，英法侵略者也曾大掠夺得逞后安宁过几年。不过，高潮之后，他们的满足感很快如烟云般散去，于是，其侵略的欲望越来越强烈、掠夺的野性也逐渐膨胀，《中英南京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的条款已远不能满足其欲望。

英、法两个侵略者暗中集结兵力，俟机以动，同时不断无理滋生事端，以寻找进攻清国的借口。自 1850 年后，清帝国与英法等国之间的矛盾纠纷越来越多，英法随之亦愈益强横，步步进逼，孱弱的清帝国求息事宁人，步步退让。

弱小之下的忍让，根本无法避免强敌的宰割。

1856 年，英法总算找到了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借口：亚罗号事件。

是年，清朝水师因缉查凶犯，在广州港逮捕了一艘名为“亚罗号”船上的涉嫌水手。”亚罗号船主是中国人，船员也是中国人，广州水师便按律法审讯了该船的水手。表面上，此案似乎与英法发动侵略战争风马牛不相及。

但是，该船是在香港注册的，而香港当时已经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因此，“亚罗号”可以悬挂英国“米”字国旗。英国人狡猾地在“米”字旗上做起了文章：闻讯而来的英国驻广州署理事巴夏礼，赶到广州总督府衙门，口口声声指责清朝水师是故意借侮辱“克罗号”来侮辱英国国旗，攻击大英帝国女王……强词夺理，肆意扩大事端，并提出各种无理要求。

作为两江最高官员，两江总督叶名琛向巴夏礼明确表示：逮捕“克罗号”船员完全是大清帝国的内部问题。

他还列举大量事实驳斥了巴夏礼所谓侮辱英国国旗的无耻谎言，指出英国的无理要求，特别是那些露骨的人城要求是与“克罗号”事件完全不相干的。

但是，侵略者们是永不会有“公理”和“正义”之心的，他们信奉的是武力和赤裸裸的强盗逻辑。

1856年10月27日，英法侵略军的联合舰队开进珠江口，用舰队轰毁了广州城墙，城外房屋许多被焚为平地，仗其船坚炮利，英法侵略军才攻进广州城。

1860年9月，英法联军攻占大沽，直逼京城咸丰皇帝不仅不指挥清军抗击。反而抢先带领后宫佳丽，仓惶出逃，躲到热河行宫。

由于清军未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英法联军很快打到北京。10月8日，联军闯入圆明园，驻园清军进行抵抗，但很快被侵略者攻陷。7日，英法联军司令部下令：官兵可以自由抢劫三日，圆明园遭到空前的蹂躏。

园中之物，凡能搬动的。他们就用车装，用麻袋扛，而且装满腰囊，不能搬走的东西，便以棒击碎，直至完全毁坏。短短一天之中，这个举世无双的皇家园林，被洗劫一空；园里收藏的所有金银财宝、绫罗绸缎、精美物品、珍贵文物、名人字画被一抢而光；许多古铜器皿、名瓷器、象牙雕刻、珊瑚屏风、楠木装饰被彻底毁坏……

10月18日，联军司令部再次下令、并以几十支马队，三四千人从四面八方冲入圆明园放火焚烧，顷刻间，世界最壮丽的园林，成为一片火海，无数珍贵文物、历史典籍，都在烈焰中化为灰烬。侵略者记述道：

“一百码外就可以感到那种炎热的气息，火声噼噼啦啦响着，足以令人跑震，随后，一声巨响，屋顶倒塌，真是惊心动魄。”“圆明园上空的烟团经风一吹，经20多里，直飞到京城，灰尘都直落到城中巷街内。”“雨天中，天空暗淡，就象日蚀一样。”……

腐败的王朝！野蛮的侵略者：是你们，把勤劳善良的中国人民推进了血与泪的苦难深渊。是你们，残酷宰割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生生不息的大好河山！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必将遗臭万年！

3. 伪善的“调停者”

再说穆拉约维夫男爵，自1847年9月上任以来，按期向沙皇呈述侵华计划，亲自着手其军刀计划。尼古拉一世在克里姆林宫也不断给这个东西伯利亚总督撑腰。1848年新年的钟声敲响之后，俄罗斯各地的报刊对遥远的西伯利亚显示出异乎寻常的“热怀”：不断有人撰写有关西伯利亚，近邻清国蒙古地区的游记，散见，揭示神秘东方富庶丰饶的秘闻……俄罗斯宫廷用这种巧妙的手法煽起了年轻的热情和野心，他们都梦想早日到东方去发财，捞回大把金灿灿的黄金，然后一世不愁花天酒地地生活。

陆军部不失时机，以双份的薪俸引诱青年人去西伯利亚当兵。短短几天，便很快在俄罗斯各地征收了数万新兵。陆军大臣按照穆拉约维夫之意，把这批新兵整编

为十二大队，每大队各二千人，并按步兵、轻骑兵、重骑兵、长枪兵、炮兵、特种兵等类别加以训练，将其组成“外贝加尔哥萨克军团”。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消息传来后，穆拉约维夫欣喜若狂。他迅速向沙皇上书，声称这正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之良机。建议沙皇一方面发表外交声明，支持英法联军的侵略行动，以作为日后与英法分享侵略果实的依据，另一方面派出秘使，借“调停”之名，暗中讹诈清国以捞取实利。

尼古拉一世也十分重视清帝国与英法两国的战争，他的想法与穆拉约维夫之计不谋而合。但他对此仍不放心，依然多次召集大臣，商讨对策。1857年12月，尼古拉一世正式派普提雅廷为代表出使中国。

1858年4月的一天，伊尔库次克春光明媚。一辆马车在伊尔库次克分署门前的广场上停下，车厢中走出一个头戴圆形礼帽，身穿浅灰色派力斯西服，脚登一双白色鹿皮鞋，鼻梁上架着一幅宽边眼镜的人。他快步来到公署卫兵面前傲慢地说：

“进去通报，说从莫斯科来的一位先生要见总督。”

一卫兵见他来头很大，怠慢不得，赶忙转身进去通报。旋即出来，抢过来人的行李，恭恭敬敬地说：

“总督大人有请大人！”

来客用手指掸掸衣服，神气地走进公署。

穆拉约维夫此时已是一身军服：肩上托着两个大红的圆章，圆章是用绒线织成的，好似两只染色的小哈巴狗，神气活现地盘坐在肩上。胸前接满了勋章和金黄色的数条长穗，显目地表明了其荣耀的身份，两边绣制了金线的紧身军裤扎到了乌黑的皮靴中。

来人正和他面对面低声密谈。

“普提雅廷特使先生，现在咱们都要准备同中国人开仗了！不过，你开文仗、我开武仗！咱俩都是沙皇陛下的左膀右臂。”

“总督大人所言极是。皇帝陛下深通为君之道，晓悉松弛之辩，实为俄罗斯昌盛之由，臣民之福。”

穆拉约维夫听罢，心生厌恶，暗讨：这真是个咬文嚼字的书呆子；不过用他去对付迂腐的清国官员，或许倒也合适。于是，重又打起笑脸。

“特使先生，你到北京之后，一定要相机和中国人讨论我们的边界方案。”

普提雅廷点点头。“总督大人，机会还要靠您来制造啊！”“军事方面的配合

你尽管放心：特使先生。“穆拉约维夫满口答应，然后一字一顿地说：

“如果中国不同意我国提出的分界线，你就告诉他们：既然英法具有使用武力来保护他们利益的权利，那么俄罗斯帝国也享有这种权利！我将使用武力强迫他们承认我国提出的方案！具体战略是：兵分两路，一支夺取库伦，一支攻占援琿。”

说完，穆拉约维夫笑着拍拍普提雅廷的肩膀，“特使先生，你说，那时候中国人还有胆儿跟凶猛的哥萨克小伙子对阵吗？”

二人狂笑的尖厉之声好似深夜密林中猫头鹰的怪叫。

普提雅廷离开讲尔库次克之后，穆拉约维夫立即在中国黑龙江上游和外蒙古边境调集了步兵一万六千人，骑兵四千人，炮兵一千人，野战炮四十门，以武力为后盾帮助普提雅廷进行外交讹诈。

普提雅廷原准备由陆路前往北京，但遭到清政府的拒绝，便在7月13日在庙街约乘“亚美利加”号轮船南下赴天津。8月到达天津后，向清政府提出中、俄两国举行边界谈判，中俄在东方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为界的无理要求，遭到清政府拒绝。

普提雅廷便南行上海，鼓动英国与俄国合作，共同侵略中国；11月中旬，他又赶到香港和英、法、美三国侵略军头目进行密谈为他们出谋划策。12月29日，即英法联军攻下广州的当天，他从香港发电报回俄国政府，建议对中国采取“有力的强制措施”；并且。“一旦联军将战争北移，我们便及时建双议法和我海军于此海域配合行动、以达到共回目的和俄国一国的目的。”

1858年春，英法联军的炮口已指向大沽，沙俄政府利用清政府处于内乱外患交迫的灾难性困境，指示穆拉约维夫要不失时机地结束中国的谈判。5月20日英法联军占领大沽，22日穆拉约维夫便利用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率领兵船直趋瑷珲，以武力恫吓与黑龙江将军奕山谈判。奕山被沙俄的炮舰政府征服，被迫签订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沙俄割占了中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1859年6月，沙俄派少壮派军人伊格纳切夫少将出使中国。抵达北京后，他便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法，以“保护中国”、“助华防英”为由，向清政府提出要求割让中国领土上的《补续和约》六条，被清廷代表肃顺拒绝。伊格纳切夫根据沙俄外交教训令，勾结英、法侵略者，企图借英、法以武力威胁清廷之时从中渔利。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咸丰帝逃往承德，留恭亲王奕訢在京主持和局。伊格纳切夫却摇身一变，以“和平使者”的面孔出现，表示俄国愿在中国和英、法联军之固调停“战事”，假惺惺地说什么“俄国不仅不愿意利用你们现在这种走投无路的处境，而且还决心向你们证实它对贵国所抱的善意。”最后勾结英法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和《中法北京条约》、使英法的侵略要求得以满足。

随后，伊格纳切夫借口调停有功，应有报酬，向清政府提出续约草案15条，并

声称其条款“一字不能更易”、只能签字画押，同时威胁到：如果清政府不接受俄国之条款，他就要把英法联军召回北京。昏溃无能的清政府被迫于 1860 年 11 月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割让了中国乌苏里江东 40 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而且强行规定了中俄西部边界走向，这就为沙俄进一步侵略中国西北地区创造了条约“根据”，成为分裂我国外蒙古地区的祸患。

《中俄天津条约》以及《中俄北京条约》的签订，使俄罗斯在我的蒙古地区获得一系列特权。条约规定：俄罗斯在蒙古地区享有免税和自由贸易特权，俄罗斯可以在蒙古地区增设领事馆，条约签订后，沙俄立即任命派遣正三品大臣傅巴尔伊经为驻库伦首任领事，修建库伦领事馆，直接指挥和操纵沙俄在外蒙古地区的各种侵略活动。沙俄在蒙古地区还享有领事裁判权，俄国人在中国犯法不受中国法律制裁，这就为俄国商人和各类罪犯在俄占地区的横行霸道，为非作歹在法律上给以保护。此外，沙俄在条约中还说弄阴谋诡计，故意篡改条约内容，使其又在 1854 年的《塔城条约》侵占了我的斋桑湖、图克勒淖尔、特穆尔淖尔及其附近的广大领土，吞并了蒙古族聚居的阿勒坦淖尔乌梁海二旗，唐努乌梁海十佐领等地，割占我国巴尔喀什湖以东约四十四万平方千里的大片领土。

自此，沙俄已疯狂地展开了其侵略中的“穆拉约维夫战略”。

第二节 商人？强盗？

1861 年，尼古拉一世亲自主持阿穆尔委员会，重新讨论俄国在中国蒙古和满洲的政策。会议指出，进军满蒙将促使欧洲列强加紧瓜分中国的其他部分，从而迫使俄国同远比中国危险的近邻打交道，因此武装占领不是上策。次年，阿穆尔委员会提出：

“为了俄国的政治和商业利益，以及广阔的陆地边疆的安全……一旦清帝国覆灭，我们的一切活动应以能使蒙古和满洲组成独立的领地为目的。”

这就是说，要对蒙古实行以“和平”方式为主的征服政策，逐渐使它变为处于俄国“保卫”之下的“独立国”。

按照这种策略，沙俄加强了对外蒙古的经济渗透。《北京条约》一经生效，凑集在恰克图桥头堡上的俄国商人，像出笼的猛兽一样疯狂地扑向蒙古地区，在恰克图·库伦、张家口一线；进行猖獗的经济掠夺。俄国洋行在蒙古地区纷纷开张，1860 年在库伦开设了第一家沙俄洋行，到 1883 年在库伦和其他中心城市的俄国洋行已发展到十家之多。其中较大的洋行每年平均贸易额约为五十万卢布、中等的也有二三十万卢布。

来蒙古的俄国商人，大多实行以货易货和以畜产品为抵押，由蒙民联保的赊购贸易。通常，他们将运来的货物，如棉织品、呢绒、食品、铁器和其他日用杂品，以比市价高得多的价格赊给当地居民，然后收取折价低于市价的畜产品为偿；如到期不能偿还，俄国商人便通过俄国领事照会盟旗长，对蒙古居民处于二倍、三倍的罚款，直到夺取蒙古人可能拥有的一切财产为止。

为了攫取高额利润，俄国商人往往以“附加费”为名，把商品价格提高到原价的百分之百至百分之二百五十出售，通过这种巧取豪夺的残酷手段，每个俄商可获的纯利不低于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十。否则，其经营者将被蔑视为低能的失败者。

俄商还在外蒙古各地遍设贸易站、代销店铺、流动帐篷等，经常乘蒙古居民手头紧、紧急需现款之机，压低牲畜、毛皮和其它原料的收购价格，用卢布向他们定购次年的畜牧产品，如果到期不能交货、或有短欠、也要受到罚款二倍到三倍的高额盘剥。

这些所谓的信贷贸易，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高利贷。二十世纪之后，俄商向蒙古居民发放以土地财物为抵押的高利贷也日益增多。使当地居民负债累累、苦不堪言。1902年7月，土谢汗部盟长揭露、乌里雅台和蒙古其他旗的蒙民“没有考虑后果，以自己的财产作抵购买俄国商人的商品，……由此负债一千两的占绝大多数。”

1802年3月，清政府屈服于沙俄武力的淫威，被迫签订《中蒙陆路通商章程》。借助这一章程，沙俄垄断了蒙古和新疆地区的通商贸易，严重阻碍了我国内地同边疆之间的贸易发展。并致使蒙古和新疆的万里边境地区成了沙俄独占的无税贸易区。由于俄商在这一地区的商业贸易概不纳税，而华商逢关纳税，遇卡抽厘。难以与俄商竞争，很受排挤。狡诈的沙俄还诱使华商加入俄籍，或买取俄国“空白执照，运货小条”，冒充俄商、贩运土货，逃漏税收，甚至还在中国边境地区擅设关卡，巧立名目，强行抽税。

由于沙俄政府的种种无耻行径，使我国蒙古地区的商务税务，被包揽殆尽，中国主权受到严重破坏，财政税收遭到巨大损失。不仅如此，沙俄政府公然违背条约，在百里内的俄国地段，对中国输入俄国的货物，强行征税，甚至还将中国银钱扣留，强迫把货物退出俄境等等。而在百里内的中国地段，沙俄商人从不纳税，这就充分暴露了沙俄蛮不讲理、横行无赖的强盗嘴脸。

俄国不仅在蒙古地区的城镇进行大规模的商业贸易，还涌入多伦诺尔的新旧庙，哲盟科右前旗的葛根庙、内蒙地区呼伦贝尔的甘珠尔庙（混为寿宁寺）等处的集市贸易。据文献记载，在甘珠尔庙会期间，除当地群众和商人参加外，大批俄商蜂拥而来，列帐数十里，商贩云集，俄国劣货充斥市场。他们用棉、生活用品、毛织品、农牧生产工具换取驼、马、牛、羊、毛皮、药材和土物产等，满载而去。俄国销售于蒙古的货物占毛织品约占百分之六、七十，工业制品约占百分之二十。据沙俄莫斯科之声报报导说：蒙古“每年供给俄国几十万普特毛类、旱獭及各种毛皮，供给几十万只羊、大牲畜。”

蒙古地区已应为俄国倾销工业品的市场和掠夺牲畜毛皮的基地。

中俄陆路贸易是沙俄伸向蒙古地区的吸血管。签订《章程》之前，俄国在外蒙古的贸易额仅为二十一万八千多卢布，签订《章程》后逐年增加，1885年增为一百七十万卢布，1900年激增到一千六百九十万卢布。1861年——1900年间俄国对外蒙古的贸易额增长了八十倍。

下面的几个故事。已足以反映出沙俄对我国民占地区的经济掠夺和俄商的强盗流氓行径，而类似的例子是数不胜数的。

1. 暴富的穷光蛋

毕斯克小镇上，黄昏时分，天空像吸足了水的海绵，沉沉的垂在城镇上。街上冷冷清清，街灯也亮起来了，但灯光昏昏暗暗，好似睡下醒的瞌睡虫的眼睛。

维亚泽斯基正坐在一家下等酒馆里，醉眼惺忪地瞪着手中的酒瓶，桌上还躺着一个空瓶，维亚泽斯基每喝一口，嘴里总要吐出几句舌头打直的酒话，然后把酒瓶重重往桌上一顿，空瓶就会在凹凸不平的桌面上滚来滚去，而这是唯一能使他开心的事。

酒馆中又进来两个同样穿着破烂的家伙，维亚泽斯基眼皮都不抬，仍在重复着他的滚瓶游戏。

一会儿、两个家伙渐渐粗沉的谈活声使维亚泽斯基一向好奇的外朵竖了起来。

“听说啊……去，去蒙古做生意……特别发、发。还有啊！杀人，放火、抢女人……不算犯罪，咱们官官府保证……保证给你撑腰！要不，嗯，咱们哥俩也，也去看看，捞一笔。嗯，小财？”

“好……好主意，啊！可是，哪儿去弄，弄钱？嗯，没钱。没钱你卖什么？是不是你想把，把你老婆卖了？”

“不，不，没钱、咱……咱去借，借高利贷也照样，照样发大财！”

夜已深沉，毕斯克小镇上只有小雨落地稀稀疏疏的声音。

维亚泽斯基跌跌撞撞地从酒店走出来。细雨落在脸上，倒使他清醒了许多。

“干！干！”维亚泽斯基快活地自语道。“一、一转手，赚、赚五倍的钱！天哪！仁慈的主真的显圣了！哈！”

第二天一大早，维亚泽斯基便敲开了本镇专放高利贷的苏林家的大门，待他结结巴巴地说明来意后，一向“慷慨”的老板反倒有些迟疑：

“小伙子，借一百五十卢布，该不是打酒喝吧。你还得起吗？”

“苏林先生，我用自家的那几间屋子做抵押，总可以吧！”

高利贷商权衡半天，还是贷给了他一百五十卢布。

二天后，维亚泽斯基赶了个太早，雇来一辆马车，把好几麻袋、的布匹、小刀子、捕兽器、衣物，满满地塞进了车厢，然后急不可待地向西奔去。

半年后，维亚泽斯基大模大样地他又敲开了高利贷商家的大门，大模大样地递给吃惊的老板一个沉甸甸的布袋。

“小伙子，你还要借？？？”

“放屁。老子是来还钱的！”

老板一听，满脸堆笑，把他推到椅子上，讪讪地问：“你不是偷银行吧？”

“呸，蒙古就是老子的聚宝盆呢！在那儿，咱俄国人想干啥就干啥，杀个中国人象踩只蚂蚁，咱们官府给兜着，清国官府只有乖乖听活的份儿！你说，是不是比偷银行自由？”

看着头点得象啄米的鸡似的苏林，维亚泽斯基更加得意；

“蒙古虽是清国的，但那儿不收税：他们也不敢收税！老子用一只捕兽器换了五十张拔鼠皮，用一丈厚棉布换了一头绵羊……把这些东西带回俄国，一出手老子就赚到一千二百卢布。还有啊，我用五十把小刀换了五张黄貂皮，用烟熏了两天，就摇身变成了黑貂皮，后来用这五张“黑貂皮”一共换了六十张黄貂皮，拿到莫斯科后，老子就卖到三千卢布。还有啊……”

三年后的毕斯京小镇面貌依旧，唯独维亚泽斯基家修建了一幢本镇最华丽的别野。一个冬日的中午，维亚泽斯基右手搂着一个妩媚迷人的女人，左手端着银制的酒杯，舒服地靠在放着羽绒靠垫的沙发上，满意地闭上眼睛，心想：这清国的蒙古真是仁慈的主赏给我的一个钱袋啊！

是啊，我国蒙古居民千辛万苦的血汗，就这样被收刮进像维亚泽斯基这种暴富的穷光蛋的钱袋中去了。

2，如此茶“商”

砖茶是蒙古族居民生活的必需品，自清朝以来，我国内陆许多江、浙一带的茶商，都不远万里跋涉到外蒙谷地，开设茶栈，在外蒙行销茶叶也成为许多商人世代相传的职业。

《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签订后，形形色色的俄商如狼虎一般扑向外蒙，俄商的货物似潮水一样冲击着市场，更威胁着每一个华商。不平等的《章程》使俄商免于纳税，而清朝的官府则不愿意减少损夫，于是“墙外损失墙内补”，本国茶商变本加厉征收更高的税额，由于在 1805 年后沙俄在汉口、九江等地成立了大规模的砖茶厂、以蒸汽机代手工机制县，成本比我国茶商低，又兼俄商心狠手辣，以次充好。致使华商的生意惨谈，许多茶行纷纷倒闭。

科布多城原有华商茶行三十多家，可在《章程》签订之后不到十年，就有近二十家亏蚀破产，余者也岌岌可危，朝不保夕。为了对付奸狠的俄商，一位来自江苏的林老板联合了其余的华人茶商，成立了华怡胜茶叶公司，让他们分别从事进货、运输、销售等某一环节的工作。此后，由于治理有方，且华商茶叶公司的货物质量高、价格公道，商人诚而有信，使华怡胜公司颇得蒙民青睐，又赢回了市场。

眼见华商起死回生的经营，俄商初时吃惊，继而妒嫉眼红。为了他们的共同利益，俄商莫勒恰诺夫也伙同俄国茶商，纠集成西伯利亚茶叶公司，欲彻底挤垮华商的茶叶公司而后快。

西伯利亚茶叶公司开张的头一天，莫勒恰诺夫便假惺惺大摆筵宴、请来华怡胜公司的林老板等人。席间，莫勒恰诺夫先夸林老板的经营如何有道，再海阔天空地大谈一通“俄清友好”之类的鬼话，最后，厚颜无耻地提出：由俄、华两家茶叶公司共同瓜分科布多乃至其它蒙古城镇的茶叶市场，随即拿出一份合同，要林老板签字。林老板早知今日酒席中俄人必有所图，于是有备而来，当时接过合同一看，心里便明白了：俄人提出，由他们负责砖茶的进货和运输，再把运抵科布多的砖茶按 7:3 分给西伯利亚茶叶公司和华怡胜公司出售，其目的昭然若揭：一是限制华商的销售，二是垄断砖茶货源，逐步算计华怡胜茶叶公司。

林老板当场加以拒绝。狡猾的莫勒恰诺夫见状，便暗示林老板，签订合同将使他捞上一大笔由俄方支付的外快，妄图收买林老板就范。正直的林老板见俄商的卑鄙无耻的念头竟打到自己头上，当即怒斥俄商的丑恶行径，离席而去。

莫勒恰诺夫恼羞成怒，见软的手段不行，便撕下伪善的面皮，杀气腾腾地要用强硬手段把华怡胜公司连根拔掉。

随后几个月，华怡胜公司的运输商队屡屡遭到袭击，袭击者总是先把茶叶付之一炬、然后再抢劫其它财物；茶叶公司的伙计在晚上常常遭蒙面人毒打；每当华怡胜公司顾客云集之时，门口便有人提刀舞棍打起架来，吓得顾客四散而去；林老板在柜台突然被一伙人捅了几刀、奄奄一息……

重伤养病的林老板，见公司遭到俄人如此算计，心急如焚：当地的官兵根本不管，也不敢管这种事，华怡胜茶叶公司犹如束手待毙的羊羔一样羸弱，任由俄商如虎狼一般外来而无力抵挡……

伤病未愈又兼急火攻心，林老板很快就病入膏肓，几天之后便含恨而去，客死他乡。

一个月后，科布多的华人茶商聚集在华怡胜门口，默默取下“华怡胜茶叶公司”的招牌，泪水如涌，久久不愿离去。当天晚上他们拖家带口，结伴同行，悄悄离开了科布多城。

卑鄙无耻的俄国茶商们，便是用这种手段彻底垄断科布多和其它蒙古城市的茶

场市场的。

3. 火烧贸易圈

我国外蒙地区盛产金矿，沙俄对此早已垂涎三尺。

在塔尔巴哈台地区有一个雅尔噶图金矿，以蕴藏量大，黄金品位高而著称。它不仅吸引了当地的蒙古族人民，还吸引了万里之外的汉族人民。冶金矿开掘以来，在雅尔噶图金矿淘金的蒙汉矿工日益增多，1850年以后，大约有矿工一千多人。

为了加强管理，清政府驻乌里雅台将军专门派了一名游击率三百官兵驻守，游击属于武官官衔中的正三品，官帽顶上有蓝宝石，还插有孔雀羽毛的“花翎”。官兵驻守之后，矿藏秩序井然，每日的黄金产量也大大提高。

然而，雅尔噶图金矿的滚滚黄金，使一境之隔的俄罗斯商人红眼万分。1855年，俄国外贝加尔哥萨克军一个大队强行开进雅尔图山，包围清军驻地，驱逐在那里挖掘金矿的民夫，声称雅尔噶图是俄国的地盘，永不准许中国矿工前往采金。随后，俄罗斯商人得意洋洋地成群结伙而来，大肆掠夺我国金矿。

驻守清军势单力薄，被迫撤走。然而，蒙汉人民不畏强暴，蔑视沙俄禁令，继续前往开采。沙俄侵略者凶相毕露，竟然动用武装，开枪杀死我国手无寸铁的蒙汉矿工十余人。挖金民工向清地方官申诉，但官吏畏俄如虎，不予受理。

咸丰五年七月十四日夜，塔尔巴哈台人民忍无可忍。聚集五六百人、满怀义愤地焚烧沙俄贸易圈内的领事、商人等房屋七十余间。平日不可一世的俄国领事和商人，都被吓破了胆，狼狈逃窜，远避无踪。

事件发生后，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英秀要求伊犁、迪化等处派兵支援，以防俄国出兵报复。但咸丰皇帝却生怕激起“边衅”，斥责英秀办理不当，要他从严惩治火烧俄国贸易圈的人犯，以息事宁人；如果俄国出兵，也只能劝说，不可开仗。

由于咸丰皇帝妥协退让的政策，致使1858年中俄在塔尔巴哈参赞大臣衙署，就火烧俄国贸易圈一事进行谈判时，俄国代表孔哈罗夫“手持利刃而入”，随身带了数十名护卫“各背大枪。身带刀矛”。面对俄国代表如此耀武扬威、公然藐视中国官府的蛮横行为，清朝代表明谊曲意忍受，没有提出任何抗议。

最后，明谊在1858年10月与孔哈罗夫签订了屈辱的《塔尔巴哈台议订赔款条约》。这个条约规定：（一）惩办烧毁俄国贸易圈“人犯”；（二）为俄国修理贸易房屋；（三）赔偿俄商30万2千5百卢布，折中国白银13万6千82两，以5千5百箱中国武夷茶作抵。

塔尔巴哈台采金矿工火烧俄国贸易回事件，便以签订这个屈辱设的条约而告终了。

第三节 落入“北极熊口”

1. 铁路加银行战略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沙俄向中国疯狂推行输出资本、扩张领土的侵略政策，妄图把我国的东北，内外蒙古长城以北地区划为它的矿力范围，进而吞并整个中国。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沙俄财政大臣维特狂热鼓吹和积极推行一种所谓“银行加铁路的战略”。

维特出生于俄国一个大贵族家庭，曾任俄国西南铁路公司经理，同俄国工商业大资本家有着密切联系。和那种实行赤裸裸的军事占领的主张不同，维特推行的是更加阴险毒辣的银行加铁路征服政策：在中国开设银行，把西伯利亚铁路伸进中国。他认为订立银行协定。施加非常隐蔽的外交压力与进行“和平投资”乃是既向外扩张，又避免战争的最可靠办法。

中日甲午海战后，沙俄勾结法国资本家在中国开设了由沙俄控制的“华俄道胜银行”。通过这个银行，沙俄从中国攫取了修铁路、开矿山、设工厂和代收税等一系列特权，进一步操纵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沙俄驻日公使罗森承认：

“这个银行，是一个政治金融的混合机构。”

道胜银行在我国蒙古和内地的库伦、乌里雅台、满州里。海拉尔等城市设立了分行。它擅自发行的货币有金卢布纸币、银元纸币和银两纸币三种，发行额约为四千五百万卢布，连同以后的军用纸币，总数达三亿多卢布。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沙俄视外蒙为满州的“后方”供应基地，用卢布在蒙古购置马匹，以充军需，俄币于是大量流入外蒙，造成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和内蒙北部市场上的沙俄纸币泛滥。

为了抵制沙俄货币的泛滥，1907年清政府在库伦东营子设立大清银行分行，发行中国银元和纸币。但由于俄币流通范围日广、势力膨胀，大清银行的银元和纸币根本无力与沙俄的抗争，很快就作为流通单位的伪币被排挤。俄币在蒙古不仅是流通手段，而且由于购买俄货必须使用俄币，所以它本身又成为可以交易的对象。这不仅破坏了中国币制的统一，损害了中国的主权，而且因俄币对中国银两的汇价时有涨落，直接使蒙古居民“吃亏受损”。

1894年俄人何乐德去窥探外蒙库伦以北、恰克图以南地区的二十一处金矿后，道胜银行在1897年筹集五百万卢布资本、组织“以开发中国矿藏为目的”的银团，并指使柯乐德贿赂清朝驻库伦办事大臣，以俄中“合办”为名，攫取外蒙金矿租让权，设场开采。1907年该银团改为蒙古金矿公司，资本为一百八十万卢布，俄国的股份占60%。由道胜银行组织的这个公司，在外蒙开矿十五处、雇佣蒙汉工人数千名。头三年采量就达两吨，沙俄资本家分得大量利润。据统计，蒙古金矿公司成立十八年，共采了价值一千万卢布的黄金。

蒙古金矿公司疯狂掠夺和大量侵占土地，引起蒙古族人民和王公上层的激烈反对。清政府被迫决定暂时停办。柯乐德大耍手腕，先以“订立合同时已耗去资本数百万，损失甚巨”相讹诈，继而以“愿将每年出井金矿除开销外，报效国家百分之十五”为诱饵，软硬兼施，又攫取了二十五年的开采权。从1904年到1914年、道胜银行的蒙古金矿公司共采黄金二十六万六千五百七十五两。沙俄银行就这样以“繁荣”蒙古经济、增进“友谊”为幌子，掠夺了我国的大量财富。

2. 游动的吸盘

沙俄通过道胜银行向中国输出资本主要是修筑铁路。它要把西伯利亚铁路延伸到我国东北、扩大侵略权益，进而吞并东北。

1896年2月，李鸿章前往彼得堡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时，维特对李鸿章使用贿赂和威胁手段，说什么西伯利亚铁路通过中国境内。是俄国为了调兵，援助和保护”中国以防御日本侵略，并许诺事成之后，“赠给”李鸿章三百万卢布。于是，李鸿章与沙俄在莫斯科签订了《中俄密约》。

《密约》规定，西伯利亚铁路由中国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境内通过，经满州里，海拉尔，穿过黑龙江和台林两省直接海参崴，这就是东清铁路即中东铁路。这条铁路全长二千八百公里，在内蒙古境内一是，共长三百八十二公里。修筑这段铁路时、当地万余名蒙汉各族人民被迫作苦工。茹苦含辛，每天只得到十戈比的生活费。在沙俄工头虐待下，我国工人每天起五更、睡半夜，却不得温饱。为了往南取得海口和抢占不冻港，沙俄又修筑了从哈尔滨到旅大的东清铁路支线，即南满铁路。

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成一“厂”字形，纵贯东北和内蒙古地区。就这样沙俄通过银行中铁路，双管齐下，把我国东北和内蒙古又纳入了它的势力范围。

铁路和银行合在一起，俨然在中国领土上形成一个国中之国：它有自己的法庭、军警，城镇居民点、纸币、学校等等，并以“护路”为名，派来七万多名军队驻扎在铁路沿线，从政治、经济、军事乃至文化教育上进行控制。

维特得意地说：

“从政治和战略方面来看，这条铁路在最短的路上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到海参崴及集中于满洲，黄海海岸及离中国首都的近距离处。相当数量的俄国军队在上述据点出现，一种可能性是大大增加俄国不仅在中国并且在远东的威信和影响，并将促进附属于中国的部族和俄国接近。”

这段话将沙俄侵略中国的野心暴露无遗。

通过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这两条大吸盘，沙俄在我国蒙古和东北地区强占土地。采掘煤炭、金矿、砍伐森林，进行掠夺性的贸易，抢走各族人民的大量财富。

它在中东铁路首站满洲里，把西伯利亚铁路车站措置其间，并派军队建立营房，妄图霸占满洲里。这个阴谋虽未得逞、却占去额尔古纳河以东属于我国的阿巴该图、孟克西里、验牛圈等一百多个河中陆地。

沙俄又以修筑中东铁路需用地商为名，明目张胆地在呼伦贝尔占去蒙汉人民的良田、牧场四十一万九千一百一十亩，占去著名林场火燎沟（长约三十里，宽十里），皮洛沟（长约三十里、宽十里）和极林河（由河口逆流而上长五十里，右岸宽二十里，左岸宽十五里）、还占去绰尔河以西至巴嘎依拉利大义河以南、乌图本克特河间约一千一百平方公里的大林场地。

扎费诺尔是内蒙古呼伦贝尔著名产煤区。百里煤海，滚滚乌金，是中国人民用血汗开发的。沙俄以“铁路用煤”为理由横加霸占。并迫使中国工人在毫无安全设备的煤窖里，手刨背驮，进行采掘。据估计，该矿年产煤为三十万四千二百吨，截止 1919 年，沙俄掠定煤炭达七百八十万六千多吨，乌黑的燃煤通过中东铁路源源不断地运进俄罗斯。

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以为沙俄在我国蒙古和东北地区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渗透的魔爪：是掠夺我国矿藏、原料等战略资源的一只游动吸盘！

3. 熊掌之下

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沙皇早已把蒙古、满洲、新疆等地区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从十九世纪下半叶起，沙俄就接连不断地派遣间谍、特务，以“科学考察”、“游历探险”为名、组成所谓“考察队”，成为沙俄向我国长城以北、以西地区进行侵略的先遣军。他们携带枪枝弹药，由武装哥萨克护送，对我国漠北蒙古以及域西进行侦察，测量地形，偷绘地图，寻找矿藏，盗窃文物，搜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民族、气象等方面的情报。

在这些狂热的殖民主义者中，有一个叫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披着沙俄皇家地理学会会员的外衣，以“旅行”，“考察”为名，在俄总参谋部指使下，四次考察中国的北部和西部。他叫嚣：制服中国只要三件东西：

囊中有钱，一手拿枪，一手执鞭。

狂叫“只要有一个俄国兵就可以征服从贝加尔湖到喜马拉雅山的整个亚洲，”他在给沙俄政府的报告中提出：

“蒙古是富饶的地区，库伦城位于我国边境附近，而且处于我们的强大影响之下，它是佛教徒，尤其是蒙古人的圣城，……三百万游牧民族，对我们的利益来说，也是有用的。”

因此，沙俄政府要“安抚它、笼络官”，方能达到吞并的目的。

1895 年，伊尔库次克军区司令部采纳总参谋部建议，用该军区的机动部队，

“占领西蒙古的科布多和乌里雅苏台两城。”

由于害怕军事占领会招致其它帝国主义的干涉，因而沙俄一直按兵不动，采取其“和平”的“铁路加银行”战略，并不断寻找出兵蒙古的时机和借口。

1900年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各族人民，高举“反帝”大旗，发动了震撼世界的义和团运动，早已蓄谋瓜分中国的外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武装反抗，攫取在华的更大利益，英、美、法、德、日、俄、意、卷等帝国主义拼凑了一支“八国联军”，对中国又发动了野蛮的武装侵略，侵略战火由津京两地扩大到河北、山西、山东及东北诸省，在八国联军疯狂的烧杀淫掠下。中国人民蒙受了极大的灾难。

沙俄政府见时机已到，便以保护本国侨民的财产与安全、护卫铁路、打击义和团为借口，杀气腾腾地从我国东北至西北侵略进来。从1900年6月至7月，沙俄在东起海参崴，西至热河省的地区，分面实行军事动员；此外，还从莫斯科、基辅等地动员大量兵员和作战物资、从陆上、海上调往中国。

七月上旬，沙俄以5000步兵，3000骑兵和大量炮兵为武力后盾，占领我国海兰泡、江东六十四屯等地，残杀我国居民，发生了“海兰泡大屠杀”、“江东六十四屯血案”等骇人听闻、惨绝人寰的屠杀事件。

1900年6月，义和团反帝斗争的消息传到外蒙古。蒙汉人民群情激愤，俄商十分恐慌。沙俄驻库伦领事施什玛勒多夫溜进清朝库伦办事大臣官署，恳请出兵保护科布多城

“闻警后，谣言四起，人心浮动。”

俄商“多欲奔回本国”。平日趾高气扬、作恶多端的俄商在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威力面前吓得发抖，有的竟携带盘剥中国人民的金银细软仓惶而逃。有的为了尽快逃命。“竟多将货物抛弃大漠，不复回顾”。来不及逃走的俄商头如阿萨诺夫等人，以重金贿赂清朝科布多大臣瑞洵，请求保护。施什玛勒多夫多次致函瑞洵，希望“仍念和好有年”。哀求庇护俄商，连称甚为感谢。

尼古拉二世以此为口实，命令陆军大臣库巴特金对外蒙古实行军事占领。

1900年7月，沙俄驻库伦领事施什玛勒多夫指使邮电局俄国职员突然停止收发民用和商业电报，掐断库伦和北京的联系。

7月中旬，沙俄以义和团要进入外蒙古，“库伦续来之人甚生，情形可疑。”为借口，以保护俄人利益为名，不顾国际公法，悍然派出彼什科夫率领土乌丁斯克团第四、第五两连哥萨克骑兵，共三百余人，越过清俄边界，强行进驻库伦。沙俄侵略军在俄国领事馆四周架设铁丝网，并在领事馆背后山上，挖掘构置掩体，修建炮台，占据高点，控制了库伦城。

仅在一个多月前向清朝科布多大臣瑞洵苦苦哀求庇护的施什玛勒夫，眼见俄军控制了库伦坡，这时一刻脸就凶相毕露，以“免于启动兵灾”威胁瑞洵，要他对俄商的生命财产负责、把俄商逃回俄国时扔掉的货物找回来，有些俄商见有哥萨克士兵撑腰，便象蛇蝎一样乱窜乱咬，乘机逼赶华商，抢劫华商店铺。

狡猾的沙俄混水摸鱼，就这样造成军事“保护”我国外蒙的既成事实。

4. 狗与狗之争

沙俄出兵占领我国东北和蒙古地区后，激化了它和日本的矛盾，于1904年2月爆发了争夺势力范围的日俄战争。俄日两个帝国主义强盗，竟以中国的东北为战场，互相火拼起来。而腐败的清政府对在自己领土上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竟厚脸无耻地宣布“局外中立”，任敌宰割和蹂躏。

战争之初，沙俄的军事部署是：陆军两个师约四万人固守旅顺要塞；陆军两个师三万人布防在鸭绿江一线狙击日本主力。编为两个军团，第一军团集结在海城、辽阳、沈阳一带，等待援军，迎战日军主力进行决战。第二军团部署在哈尔滨一带作为后援，沙俄陆军的战略方针是以逸待劳，等待时机，在辽阳或哈尔滨同日本会战。沙俄海军更把太平洋舰队充实增强，集结于旅顺、等待波罗的海舰队到来，在形成强大的海军优势后同日本海军决战。

日军的战略布署是，在第一阶段，以三个师在朝鲜登陆，占领朝鲜进驻鸭绿江，海军在此期间展开争夺制海权的战斗；第二阶段，用三个师加两个旅的兵力，在辽阳登陆，然后和先期在朝鲜登陆的军队会合，在辽阳附近同俄军主力决战；第三阶段，迎击俄军从哈尔滨方面来的反击，进行决战。

日本海军偷袭旅顺军港后，八次攻击俄国舰队，把俄国舰队封闭在旅顺港内，为日本陆军在辽东半岛的登陆作战创造了条件。

后来经过了辽阳会战、旅顺要塞争夺战，太平洋舰队被歼，使日军逐渐占据了优势。1905年，日军与俄军在沈阳会战。是役，日军作亡七万，俄军伤亡九万，日军占领沈阳和铁岭，沙俄陆军战败。1905年5月，沙俄远道增援的波罗的海舰队在马海峡被日军联合舰队截击，经过多次激战，沙俄主要舰艇被击沉击毁，残存舰队投降。波罗的海舰队的覆灭，标志着沙俄军事上的败局已定。

5. 军刀与地图

日俄战争结束后，无论是胜方的日本与败方的俄国，都无力再进行大规模的战争，于是，双方都接受了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调停建议。谈判前，尼古拉二世在接见沙俄全权代表维特时指示俄国的条件是：

“不能赔一文战费，不割让一寸俄国的领土。”

从双方所提条件看，日本和俄国都想用中国和朝鲜的领土和主权来进行它们之

间的肮脏交易。

1905年8月，日俄在美国的朴茨茅斯开始和谈。9月签订《朴茨茅斯条约》，将沙俄独霸中国东北的局面调整为由俄日共同控制。

以后，俄日帝国主义为了确保既得利益，进一步瓜分中国，共同抵制以美国为首的列强势力插手东北及中国北部地区，他们又暂时化敌为友，相互勾结，于1907年和1910年签订了第一、第二次俄日密约。划分了俄日在中国的势力范围。

第一次侵日“秘密协定”分四条，其要点是：沙俄以承认日本在朝鲜的支配地位和“南满”（即中国东北南部）的特殊利益为条件，换取日本承认俄国在外蒙和“北满”（即中国东北北部）的特殊利益；事实上就是与日本重新瓜分中国东北。外蒙古、内蒙古东部以及朝鲜，确定各自的势力范围。

从此，沙俄除加紧侵略中国东北部外，便把侵略重点转向蒙古地区，加紧进行经济渗透行政治控制。为直接吞并蒙古地区积极准备条件。

第四节 巴德玛耶夫的毒谋

1. 一个布里亚特人官场发迹之谜

沙俄在加紧推行维特的“铁路加银行”侵华政策时，作为这一政策组成部分的所谓巴德玛耶夫侵略计划也出笼了。

巴德玛耶夫原名叫扎玛萨拉因，1849年生于布里亚特蒙古族封建牧主家庭。从1871—1875年在彼得堡大学的东方语言系接受奴化教育，大学期间，他逐渐笃信“俄国至上”的观念，狂热地鼓吹俄国应该出兵中国的蒙古和满洲，早日把蒙古及满洲并入俄罗斯的阿穆尔省。校方也十分欣赏这个并非俄罗斯族，但观点比俄罗斯族人更激进更狂热、善于使用三寸不烂之舌，诡计多端的布里亚特人。

毕业后，凭借校方的竭力保举，巴德玛耶夫作为蒙藏事务专家在沙俄外交部亚洲司任职。为了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他又积极要求加入军队，并在步兵中混过几年，他服役的步兵正是驻扎在西伯利亚靠近我国外蒙的外贝加尔军团。退役后又回到沙俄外交部，凭着他的见风驶舵，溜须拍马之术，使他在俄国官场中崭露头角，如鱼得水。

巴德玛耶夫通过乌赫托姆斯基伯爵的引荐，又投身于俄国重臣——财政大臣维特的门下，于是借机向维特不断鼓吹侵华计划。维特也很赏识这个愿为沙皇效劳卖命的异族野蛮人，对巴德玛耶夫鼓吹的阴谋计划也很感兴趣。

后来，又经过官庭侍卫长杰柳辛等人从中推荐，巴德玛耶夫又凭其学过几天医术而当上了沙皇的御医。于是，更加奴颜卑膝，极尽讨好献媚之能事，为了表示对沙皇的忠诚，他认沙皇亚历山大为教父，并取教名为彼得。很快便以机智、能干而深受沙皇亚历山大宠幸，自此平步青云，竟然能在克里姆林宫中随意地出入。

2. 阴谋的巴德玛耶夫计划

1893年2月，沙皇尼古拉二世召开御前会议，商讨俄国的东方战略。

陆军大臣、海军大臣等没有什么高明的主张，仍然重弹当年穆拉维约夫战略的老辞，令尼古拉一世深为不满。

沙皇扫视面前的文武大臣，这一干重臣都纷纷低下头，不敢接触沙皇询问般的眼光，但是，当尼古拉一世把眼光望到众人的尽头时，却见巴德玛耶夫神态自若，目光依旧，一点也不回避沙皇。尼古拉二世将目光停在巴德玛耶夫身上；表面平静的神色却掩盖不住狂热的眼神，尼古拉知道他有话要讲，便问他：

“我亲爱的巴德玛耶夫，你大概不会同意刚才各位先生所提的旧战略吧？”

巴德玛耶夫向沙皇先施一礼、答道：

“陛下，我的确认为俄罗斯帝国还需要采取另一种秘密行动！”

巴德玛耶夫的回答语惊四座，大臣们纷纷交头接耳。巴德玛耶夫定定神，成竹在胸地说道：

“陛下，仅仅凭借武装哥萨克兵的进攻，俄罗斯是不可能把蒙古和满洲夺过来的！直接的军事行动不仅会遭到清帝国的抵抗，而且可能引起英法等国的干涉而导致前功尽弃，所以，军事占领不是上策。”

“你的上策是什么呢？”众臣七嘴八舌地问道。

“想取之，必先予之！”巴德玛耶夫微微一笑。

“陛下，我们可以借援助为名，把我国的西伯利亚铁路修建到中国，一条从恰克图通过库伦修到北京，另一条从贝加尔湖西南通过蒙古草原修到兰州。

修建这两条铁路至少具有这样三个好处：一是增加了我国军队的威慑力，使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调集兵力对蒙古乃至北京进行快速的军事进攻；二是可以获取大量的农产品，畜牧产品和原材料物资，并为俄国商品扩大更大的市场；三是在铁路通过的地区扩大俄罗斯的影响，再派遣俄罗斯的特工人员，打入当地的蒙汉人居住地。

预先秘密组织一个蒙、藏、汉三族反清暴动之政治中心，在暴动以后、就由这些民族之外商名流向俄皇呈一自愿的请求书，以请求收容他们作为俄国的臣民。

这样，俄国就可以不费一兵一卒而颠覆清国，达到把蒙藏汉之今部东方并入俄国版图的宏伟目的。”

尼古拉二世于手捻胡须，听得津津有味，不断点头表示赞赏。

“陛下，我还构想了实施这个计划的大概步骤，蒙古人信仰喇嘛教，崇拜活佛，如果控制了蒙古族的喇嘛教首领库伦活佛以及他下面的大喇嘛、那就不愁蒙古不投向我国了：另外，我国边境的布里亚特人与蒙古人有同教同族之谊，我们可以训练几千名布里亚特人，让他们借参拜佛祖，贩卖日用商品之名，深入蒙古，广泛联络当地有势力、有影响的僧侣和王公，许之以利、诱之以财，鼓动他们反对中央政府、背叛清国。”

“要实施这个计划，统一指挥从事秘密行动的布里亚特人和其他特工，就需要在蒙古各地建立一些公开机构，以作为进行指挥、联终、中转的活动中心……”

“要建立一支在东方从事秘密活动的精干的特工队伍，就要训练一批愿为俄罗斯利益奋斗的年轻人，因此还需要成立一所专门的特殊学校，以充实我们的后备力量。”

巴德玛耶夫滔滔不绝，一口气把自己几年来精心策划的侵略战略和盘倒出。

“好一个完整的巴德玛耶夫计划啊！”

向来以稳健保守著称的财政大臣维特，此时竟然一改往日沉吟不语的习惯，带头叫起好来。他看着沙皇，兴奋道：

“陛下，巴德玛耶夫先生发表了一些很重要的见解、这在政治的实际问题中造成了一种新观点、在眼下尤有意义。如果该计划能够实现，则低国于太平洋岸上及喜马拉雅山上，不仅能控制亚洲的政事，并且能控制欧洲的政事。”

参加御前会议的其它大臣，一听维特那样的稳重人物大声称赞，又见尼古拉二世兴致勃勃，满心欢喜。便你一言我一语地赞扬巴德玛耶夫的计划，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见状，灵机一动。对尼古拉二世建议道：

“陛下，巴德玛耶夫先生的见解很独到：这个计划的成功必然大有益于俄罗斯帝国的利益。您不妨就任命巴德玛耶夫先生专门负责实施这项计划得了！”

尼古拉二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我亲爱的巴德玛耶夫，你的计划复如此美妙，以致这样新奇而虚幻的东西使我很难相信它会获得成功！你的计划太有趣了，太诱人了！好吧——”

“现在，我宣布。由巴德玛耶夫全权负责执行这项计划！请维特先生尽快拨出200万卢布来支持巴德玛耶夫先生的宏大计划！”

巴德玛耶夫大喜过望，卑膝跪在尼古拉二世面前，轻轻吻了吻尼古拉二世的手。随

后抬起头，仰望着沙皇说道：

“陛下，我发誓永远忠心为您效劳！”沙皇点点头说：

“我很感谢你，先生。但愿你像一个伟大的魔术师，能轻而易举地从中国人那儿割下一块肉，把你的美梦变成现实！”

3. 倾巢出动的“北极熊”

一年后。在我国蒙古地区和东北的各个重要城镇中，都出现了“巴德玛耶夫商务公司”的招牌，公司的大老板自然是那位巴德玛耶夫。

巴德玛耶夫商务公司的生意做得“沸沸扬扬”：每日“客商云集”，“买卖红火”。为了扩大公司“业务”，巴德玛耶夫向蒙古和东北各地派遣了数千名“推销员”“收购人”、“事务员”，以经商为名专门从事各种阴谋活动。公司“职员”的主要活动都是把精力放在利用蒙古人上的。

沙俄在日俄战争中失败后，便把侵华重点转向蒙古地区。在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激烈争霸中，沙俄“铁路加银行”和军事占领的侵华计划遭到挫折，于是，转而不遗余力地疯狂推行巴德玛耶夫侵华计划。沙俄几乎动员了所有能够利用的政府部门、军事机关、社会团体和驻中国各地的使馆和领事馆，并派出各种身份的间谍特务，利用一切机会进行阴谋活动。

他们的活动同巴德玛耶夫商务公司密切配合、互为表里。从十九世纪来到二十世纪初，在我国新疆、西藏、东北，尤其是内外蒙古，建立了一张相当庞杂的间谍网，四处猖獗筹建“暴动的政治中心”，妄图把我国北部的大好河山一举从祖国的领土中分裂出去。

在外蒙古、沙俄以驻库伦领事馆，“巴德玛耶夫商务公司库伦办事处”为这个阴谋活动网的中心。巴德玛耶夫在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等地，以及各主要商路驿道，都设立了暴动的据点，安排了大量的特工人员。沙俄驻库伦领事馆在恰克——库伦——张家口，以及库伦——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大道的每个台站，都派有一个名为“学习蒙语”的坐探。沙俄散在外蒙古各地的军人，商贩等形形色色的人都经常与清朝官员、蒙古王会接触，贿赂馈赠厚礼，刺探情报。

在东北和内蒙古东部，以沙俄驻哈尔滨领事馆为这个阴谋活动网的中心。沙俄驻卜魁（今齐齐哈尔）、海拉尔、奉天（今沈阳）等地的领事馆也都是从事这项阴谋活动的据点。1901年，沙俄政府电令驻卜魁领事巴克达调夫专门负责办理“蒙古各部经营联络事宜。”为此，巴克达耶夫曾专程赴北京与俄国驻华公使商谈对策，后来便在哈尔滨特设“蒙务机关”，专事接待经东清铁路来哈尔滨的蒙古王公，处心积虑，纯粹采用威胁利诱的手段作为拉拢蒙古王公的“秘诀”。

1904年，巴克达耶夫死后，沙俄政府电令由驻卜魁领事官参将希得罗夫接替，名义上，希得罗夫中校驻在哈尔滨，但他实际上却常年神山鬼没，秘密往来于蒙古

各旗。哲里木盟扎萨克图旗都王乌泰的王府，便是他勾结煽动蒙古王公的落脚点。当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内拉萨逃到库伦后，希得罗夫暗暗加紧活动，甚至

“在接近达赖的人士中建立密探机关”，从事颠覆等不可告人的勾当。

巴德玛耶夫还派遣了一批以“喇嘛”身份为掩护的高级间谍，借布道讲经之机，接近蒙古王公，暗暗灌输沙皇就是佛教的保护者和庇护者的思想”，从中挑拨蒙汉两族人民的矛盾。

1890年，巴德玛耶夫派出俄国卡尔梅克人丹必占灿喇嘛，以参拜活佛为名，潜入蒙古。丹必占灿自称是阿睦尔撒纳后裔，在赴蒙途中曾向土谢图汗部杭达多尔济亲王“讲经”数次，鼓吹杭达多尔济王应推动“蒙古之独立”。并暗示利欲熏心的亲王：俄国政府极其赞同“蒙古人民自己的选择”，俄国政府愿意调停清朝中央政府与蒙古的关系。在丹必占灿的煽动下，杭达多尔济亲王逐渐走向背叛祖国，投靠俄国的卖国分裂道路，成为1911年策划外蒙独立、乞讨俄国援助的罪魁祸首之一。

丹必占灿喇嘛的秘密活动也引起了清朝官府的注意。1891年秋在由西藏返回俄国途中，丹必占灿喇嘛被乌里雅苏台官府拘捕，但由于他持有俄国身份证明，令乌里雅苏台官员不敢为难他。巴德玛耶夫商务公司驻乌里雅苏台办事处闻讯后，火速赶来，先是以“商务公司”的名义担保，后来又重金贿赂办案官员，便使丹必占灿很快获释。他随身携带的一箱“号召蒙民推翻满洲统治”的宣传品，也得以侥幸蒙混过关。

被拘留过后的丹必占灿喇嘛，对中国更加憎恨，他曾咬牙切齿地扬言：沙俄要把蒙古人从中国的羁绊下解救出来；为此，希什马廖夫不久将从俄国率领部队打过来。

此后，他一度前往科布多，返回乌里雅苏台后即与在当地活动的希什马廖夫同去库伦，然后去恰克图，在我国境内猖狂从事颠覆外蒙的罪恶活动。

1910年，丹必占灿又由新疆喀什噶尔潜入中国，赴往科布多一带，他外穿长袍马褂，内穿全套沙俄军官官服，阴谋煽动当地反动王会上层，策划叛国暴乱。

4. 达赖活佛身边的“炸弹”

1885年，巴德玛耶夫在俄国外交部和总参谋部的帮助下，向西藏派遣布里亚特蒙古人多尔济耶夫，蒙古名为阿旺·德尔智，他以学经为名来到拉萨。

德尔智在拉萨“学经”期间，为人“慷慨大方”，出手阔绰。他以巨额钱财布施西藏各大寺院，结交藏族权贵，逐渐博得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首席噶伦等高级僧侣贵族的好感和信任。经他们的鼎力举荐，很快被选为达赖身边的三大堪布之一，当上了深受达赖宠信的经师和卜卦人。于是，阿旺·德尔智得以朝夕跟随达赖喇嘛，他借侍奉达赖起居之机，不断向达赖灌输亲俄思想，竭力挑拨西藏地方政权和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

1904年。英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我国西藏的战争。沙俄便命令潜伏了近二十年的间谍德尔智，裹胁达赖离藏。七月二十六日，达赖会同此时掌握了西藏财政和防务大权的德尔智。仅率少数随从弃城北走，取道青海、甘肃等地、于十一月到达外蒙库伦。

达赖到达库伦后，沙俄驻库伦领事向他递交沙皇的慰问电和礼物。1906年2月。沙俄外交部拟定的方针是：

将达赖牢牢控制在手，利用他在喇嘛教中的领袖地位和巨大影响，在所有信奉喇嘛教的地区（特别是蒙古地区）扩大和支持俄国的威望，为俄国的利益效劳。

并任命科兹洛夫为俄国地理学会驻库伦代表，专门负责联络达赖的工作，从春天到夏天，科兹洛夫几乎每天都到甘丹寺和达赖见面。妄图以达赖为旗号，召集蒙古各地的反动王公上层到库伦，密谋暴乱。

1905年6月，希得罗夫派手下军宫向扎萨克图郡王乌恭手下的叛乱头目席勒喇嘛和布彦等人，盗用哲里盟各旗人民的名义，“带八旗文书赴库伦与西藏佛喇嘛商为联俄之策”。8月，布和布彦得意万分地返回本旗，告诉乌恭：沙俄答应援助他一百五十尊大炮，二十万枝步枪，要他赶快把枪械分到各蒙旗。

清政府为切断达赖与沙俄的非法联系，一九零五年初一再电令达赖立即返藏，沙俄阴谋指使乌泰暴动的诡计才告破产。

阿旺·德尔智这个巴德玛耶夫的得力干将，从此成为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心腹。

5、“你的代号黑桃皇后”

巴德玛耶夫不仅在蒙古各地设置“暴动的政治活动据点”，派遣各种身份的布里亚特人和卡尔梅克人间谍。同时，还按其上报沙皇的侵略分划，在彼得堡开办了一所特殊学校，规定学生毕业后，可以进入彼得堡大学东语系深造两年，合格者以九品官员录用，然后派往东方“执行任务”。

每逢毕业典礼或其它重要节日，巴德玛耶夫便以学校“董事”的身份亲自赴校，发表一通鼓吹俄罗斯如何伟大的演说，以振奋学生的“为国献身”热情。

1895年彼得堡特殊学校毕业典礼的前一周，巴德玛耶夫为了表现自己对学生的关心，告诉校长：我要观看学生的技能表演！

第二天，巴德玛耶夫在校长的陪同下，来到学校大礼堂观看学生的毕业表演。

最先是十几个俄罗斯族学生演唱几首蒙古民歌，巴德玛耶夫一边听，一边不断向校长指出他们发音的错误之处。

然后是两组布里亚特蒙古人表演徒手格斗术。精彩的对打使巴德玛雅夫看得津津有味。

最后，礼堂里响起《天鹅湖》主题曲。四只由俄罗斯族姑娘装扮的洁白小天鹅，轻盈地随着舞曲节奏飞向场中，舞姿翩翩，一忽儿戏水，一忽儿游戏。领头的那个姑娘，满头金发，蓝色明眸，几乎瓷器般透明的皮肤，纤巧而莹洁的颈窝，充满贵族风韵的苗条身材，诱人的娇滴滴的慵倦，飘忽的眼神充满挑逗性。

“我的上帝，她真漂亮啊！”

校长瞥了瞥神色贪婪的巴德玛耶夫，一本正经地讨好道：“巴德玛耶夫先生，她叫柳芭，的确是个很不错的姑娘啊！待会儿，我叫她来见您！”“好！我要见见她！”

巴德玛耶夫眼睛死死盯着小天鹅修长的大腿，头也不回地答道。

汇报演出结束后，校长照例请巴德玛耶夫发表讲话，但被满脸不耐烦的巴德玛耶夫拒绝了。

校长心下明白原因何在，立即把准备卸妆的漂亮小天鹅匆匆带到贵宾休息室。

“巴德玛耶夫先生，这就是我向您提到过的柳芭姑娘！她聪明机灵，成绩优秀，是出了名的校花！”巴德玛耶夫压制着身体中不断升腾的欲望，慢吞吞地走到柳芭面前装出长者般的慈祥，湍柔地打量这个妙龄少女。

“柳芭姑娘，你知道这位尊敬的先生是谁吗？”

小天鹅睁大美丽的眼睛，摇了摇头。巴德玛耶夫细细地欣赏着姑娘长长的眼睫毛。

“这位尊敬的先生是沙皇陛下最得力的办事大臣——我们的巴德玛耶夫大人！”“啊”柳芭惊讶而又兴奋地尖叫一声。

“原来您就是那个巴德玛耶夫大人！我读过好多好多的报纸，上面都登载了你在东方创造的许多神奇业绩！对了，还有，还有您的“商务公司”！”

小美人兴奋得脸蛋通红，好似一枝含苞待放、娇艳欲滴的红玫瑰。

飘飘然的巴德玛耶夫心里乐不可支，顺势把柳芭搂在怀里，坐到沙发上。校长见状，知趣地把门带上，悄悄出去了。

“柳芭小姐，作为你们的老板，我对你刚才的表现并不满意！但是——”

巴德玛耶夫先板起面孔、随后又嬉皮笑脸地柔声说道：

“作为我个人，你刚才那番话使我感到很快慰！”

柳芭推开巴德玛耶夫，一言不发。

“柳芭小姐，你生气了？”

“不，大人，作为您的属下，我对刚才的表现极为满意；但是——作为柳芭本人，却不太满意。”柳芭冷冷地答道。

这一番对答使巴德玛耶夫颇为尴尬，休息室里只有他“嘿嘿”的干笑声。

忽然，柳芭猛转过来对着巴德玛耶夫，做出最迷人的笑靥：

“您希望我是您的属下好呢？还是柳芭本人好？”

说完，柳芭拢拢垂下的长发，摆出一个最具挑逗性的姿势，一双碧眼钩住了巴德玛耶夫。

巴德玛耶夫急不可待，一把将柳芭拥到怀里，吻了吻她的前额：

“我的乖乖，你做我的属下当然再好不过了！”

说罢，抱起柳芭，站起身来，淫笑着说：

“我要亲自考察你作为女特工的特殊技能，是不是和你的身体同样迷人！”

欲望满足之后的巴德玛耶夫，惬意而疲惫地喘着粗气，轻轻摩挲着柳芭白曾圆滑的胴体，把嘴轻轻凑到她鼓鼓的胸脯上，悠悠地吻去。半晌抬起来，轻轻用下巴蹭着。

“柳芭，亲爱的，我要带你去彼得堡，给你买最豪华的礼服、最漂亮的首饰，住最华贵的别墅！”

“不！亲爱的，我向往东方！一直梦想着有朝一去开拓大俄罗斯的疆域！我过去的选择、以及将来的作为都必须是为了这个目的，我谢谢你！”

巴德玛耶夫愣住了！双手捧住柳芭的脸庞，着急地说：

“咱们是情人，你不应该对我说这种堂而皇之的骗人的话！”

“不，亲爱的，我说的是实话！”

柳芭平静地答道，巴德玛耶夫紧盯着那双妩媚的大眼，试图找到一丝撒谎留下

的痕迹，但很快彻底失望了。他垂头丧气地闭上眼。

“听我说，亲爱的，到蒙古当间谍并不象你想象的那样浪漫！更不象在这张床上做爱那样美妙，使你高潮迭起！亲爱的，去那种地方简直是活受罪！你快收起这愚蠢的念头吧！还是跟我去彼得堡吧！”

柳芭又平静而毫不思索地摇摇头。

巴德玛耶夫大失所望，把这只刚刚到手，但未来得及仔细赏玩就要飞远的一丝不挂的白天鹅，使劲地贴在怀里，双手一刻不停地抚摸着她细嫩圆润的肌肤。心中十分惋惜。

巴德玛耶夫沉默了好一会，才最后下定决心：“我的心肝，我答应你的要求。”

巴德玛耶夫叹了口气，不无遗憾，眷恋无比地吻吻柳芭。

“我派你到蒙古库伦去执行一项非常重大的任务，你明天去找伊凡诺维奇，他会告诉你详细计划的。唉！”

“你的代号是：黑桃皇后。以后，如果你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可以用黑的“Q”落款，然后差人送给我！”

“是，大人！”

随即，两个光溜溜的身子很快扭作一团。

6、蒙古地区俄国暴动中心

所有从事巴德玛耶夫计划的阴谋活动网点，都受身处彼得堡的巴德玛耶夫的领导，并由沙俄驻东北侵略军总头目关东省总督和历任驻北京公使直接指挥和掌握。

为了加紧在第六地区筹建“暴动的政治中心”，为尽最大力量来组织引导蒙古贵族转向沙皇而努力。

巴德玛耶夫于 1904 年，亲自到北京和蒙古各地活动。日俄战争后，他又派出大批被着“喇嘛”外衣的布里亚特蒙古人，打着“游历拜佛”的幌子，在内外蒙古大肆活动，拉拢和收买封建王公贵族和上层喇嘛。

1911 年 8 月 17 日沙俄政府公报说：

“很久以来我们就对蒙古人给予援助和保护，我们在蒙古的某些代表在说服蒙古人方面贡献很大，使他们确信如果和中国破裂，他们是会得到俄罗斯的帮助的。

到我国辛亥革命前夕，沙俄通过巴德玛耶夫罪恶计划，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

已经有库伦，扎萨克图扎、海拉尔等地建立了许多暴动的政治中心，并且在内蒙古库伦首先步燃了叛国的“独立”的导火线。

第五节 库伦活佛府中的俄罗斯女人

1. 神秘的俄国女来客

1895年十月的一天，蒙城库伦天气晴朗，蓝湛湛的空中无一尽云彩。一群白鸽，带着脆响的鸽哨，在蓝天中自由自在翱翔。

巴德玛商务公司驻库伦分公司门口，聚集着一群人。他们不时引颈往北翘望，急不可待地走来步去，在繁华的大街上引了许多人好奇的眼光。

只听两个过路赶集的人边走边交谈：

“喂，这帮人好象是在等什么，要不怎么那么焦急？”

“对。上午集市上听人说，这家大名赫赫的商务公司的新经理要来库伦了！”

“来个经理有什么稀奇？大惊小怪！”

“你知道个屁。新经理不稀奇，可听说他们一家人稀奇啊！”

“是吗？”问话人瞪着眼睛不明白。

“听说，新经理是个高鼻子大眼睛的洋人，他老婆是个长得很俊俏的布里亚特人，这两口子有个宝贝女儿，可这女儿一点不像她娘，倒像是这个洋人在什么地方落下的野种！嘿嘿，还听说啊，这丫头会说蒙古话！光凭耳朵不用眼睛，谁让人认为是个蒙古姐儿呢。”

“真的？”吃惊的嘴张开得难以合上，半晌，问话的又说：

“咱去找个瞎子来试试看？”

“你想吃鞭子了，是不是，你忘了洋人皮鞭的厉害了！”

说罢，两人逃跑似地离开了。

“来了！来了！”正当那群人站得腰酸脖子疼时，有个眼尖的人叫了起来。顿时人群一阵骚动。

一干车马飞驰而来，停在商务公司门前。马上跳下一个头发卷曲，面庞瘦削，留着两卷胡子的中年俄罗斯人。他就是巴德玛耶夫商务公司驻库伦的经理——伊凡诺维奇。

伊凡诺维奇从后面一辆马车中扶下他的“太太”，一个身穿红色袍子，风韵犹存的高个蒙古女人；接着，头戴貂颖皮帽，穿浅红袍子，脚上套着油光锃亮的黑皮靴的妙龄少女也从车中走了出来，白皙光滑的皮肤，高高的鼻子，大大的眼睛有如两汪纯洁的清泉，两瓣鲜花般的嘴唇轻轻一抿，浅浅露出两排白玉般的皓齿。她落落大方地站在“母亲”身边，苗条的身材亭亭玉立，十分耀人眼目。

伊凡诺维奇向等待已久的公司职员介绍道：

“诸位先生，这是我太太——这是小女，那仁高娃。”

“啧啧！真不愧是高娃（注：蒙语“高娃”的意思是“花朵”）！”其实，那仁高娃便是柳芭，巴德玛耶夫的“黑桃皇后”。

此后，这一家三口的日子过得平平常常、安安稳稳，男的每天忙着处理公司的一大堆商务，母女俩每日在家收拾家务，做做针线活。来了客人，一家人就偶尔在晚上抹把骨牌，很少出去登门访客。

不过，母女俩都是虔诚的喇嘛教信徒，每逢寺庙讲经布道之日，母女总是一太早起身，打扮得整整齐齐地赶到寺庙，参佛念经，风雨无阻。法事完毕后，母女俩总要去庙里的吉索（注：喇嘛教中寺庙内的大总管），由女儿亲手布施大笔的香水油钱，一次不拉。

每逢寺庙向穷人济施，母女俩总会提前准备许多炒米、奶酪。砖茶……在济施前一天用车拉到寺庙。

寺庙的房屋要修葺，佛像金身要重髹，灵塔需要上金……每当寺庙里的喇嘛愁眉不展时，母女俩总会不声不响地额外捐出大笔的钱财，有时甚至把女人的耳坠、金簪、手镯，玉环等等也放在布包里捐献出来，而母女俩的穿戴却一直十分朴素。

时间长了，库伦周围寺庙的喇嘛们都认识了这虔诚万分的二位女信徒，对她们的善良德行称诵不已。待听说她们是巴德玛耶夫商务公司俄国经理伊凡诺维奇的娇妻与爱女后，喇嘛们不仅赞叹这两位菩萨般心肠的女信徒，而且也很敬佩那位从未谋面、却慷慨乐施的俄国人来。

库伦城里，两们俄籍女信徒的善行便越来越广地流传开来。

2. 面见库伦活佛

一年后，彼得堡。

巴德玛耶夫坐在办公室里，反复看着那封以黑色“Q”落款的私信：“……一切极顺，速安排接近活佛之事。”

“柳芭，小心肝儿啊，想不到你还是天才间谍！让我再看看你又能用什么手段来拉拢库伦活佛。”

巴德玛耶夫自言自语。他的眼睛紧盯着那黑“Q”，“Q”字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模糊。

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第八世是外蒙古地区喇嘛教的最高首领，对蒙古地区，有着巨大的影响。

1878年，哲布尊丹巴第八世由西藏转世。

巨大无比的宗教光环效应的“灵光”。降临到了未见世而的第八世活佛哲布尊丹巴身上。他由西藏到库伦继位时，年仅四岁，然而，一路上，虔诚的教徒们成群结队头顶松针跪拜在路边，极其诚心地祈祝他们的活佛吉祥如意，更期盼这位大慈大悲、大智大尊的活佛能给他们洒下一点，那怕一点点阳光雨露。

护送哲布尊丹巴的喇嘛、王公、奴仆，对这位八世活佛的关心胜过自己的双眼和生命，有需必百依百顺，没需，也想着法子满足活佛，以讨活佛的欢心。四岁的哲布尊丹巴就是在这种人世间少有的、养尊处优的环境中开始了他的生活。唯我独尊、一切的一切以我为中心、不容别人有半星丁点儿违抗的心理深深积淀在他的心底深处。

沙俄驻库伦伦事施什玛勒夫抓住机会，经常给年轻的哲布尊丹巴“赠送”许多欧洲的新式玩具、从俄国专门印刷的精美的小人书，还送给他英国矮种马、波斯猫等数十种温顺驯良的小动物……

在哲布尊丹巴后来，这个大胡子的俄罗斯人好象会卜卦的喇嘛，知道他爱玩什么、想玩什么；每次都能给他带来新奇的小东西……久而久之，大胡子施什玛勒夫便成为年幼的哲布尊丹巴欢乐幸福的唯一温泉。

1896年，哲布尊丹巴年满十六岁。生日那天，施什玛勒夫又按惯例来到活佛府，看望哲布尊丹巴。

“大胡子，你好！”

“恭喜活佛金寿！”

施什玛勒夫恭恭敬敬地向哲布尊丹巴行了一个俄式宫廷礼。随即掏出一份电报，说：

“沙俄皇帝陛下专门发来贺电：

祝库伦活佛寿安：

并专程差人送来贺礼。金椅两把，非洲大象一对，翡翠屏一个……”

哲布尊丹巴听罢，站起身来走到施什玛勒夫跟前，紧紧握着他的手说：“你们的沙皇陛下待我太好了！真让我不知如何感谢才好！”

施什玛勒夫意味深长地说：

“活佛不必见外，俄国是您唯一的肝胆相照的朋友。”

十六岁的库伦活佛未解其话中之适，赞同地说：

“是啊，俄国才算真正的朋友！”

施什玛勒夫拉过年轻的库伦活佛：

“活佛，今天我给您介绍几位新朋友！”

伊凡诺维奇一家三口走进来。

“这是伊凡诺维奇，德玛耶夫商务公司驻库伦的经理！这是伊凡诺维奇的太太！这是他的女儿——那仁高娃！”

伊凡诺维奇也向库伦活佛行了个俄式大礼，而那母女俩，却双膝跑下，连连磕头，口中同时念道：“伯乐哼！伯尔哼！（注：蒙语，伯尔哼是‘佛’之意）

活佛伸手摸顶之后，母女俩才站起身来。

哲布尊丹巴打量着这“母女俩”：此时的那仁高娃，妖而不媚，美而不艳，宽大的蒙古袍掩盖不住地她高高耸起的胸脯和苗条的身材，水灵灵清秀秀，一副大家闺秀的模样。

“你多大了？”

“回活佛，刚满十八岁。”那仁高娃娇羞而不失大方地答道。

“你会说蒙语？”

“是的，回活佛。”

年轻的哲布尊丹巴听到这个与自己年岁相仿的金发碧眼的俄罗斯姑娘会说蒙语，好奇心顿起，改用蒙语问道：

“你跟谁学的蒙语？”

“额吉。（注：额吉即阿妈、母亲）”

“什么时候开始学的？”

“阿妈一生下我，就教我说蒙语。”

“你会唱歌吗？”

“会！阿妈教我唱了好多好多的歌！”

哲布尊丹巴心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如果这个长着金发碧眼，会说古话、会唱蒙古歌的美丽姑娘，能陪我一起玩耍，那该多好啊！他便试探地问道：

“你愿不愿意和我说话！”“我很，很——”

那仁高娃装作害羞，故意吞吞吐吐。哲布尊丹巴一听没了下文，着急地问：“你快说呀！很什么？”

“我、我，当然——当然很高兴啦！”

哲布尊丹巴兴奋得跳了起来。“噢。太好了！太好了！那以后你就天天来甘宁寺，和我说话吧！”

慈祥的“母亲”乐得裂开了嘴，轻轻推推故意楞神的“女儿”。“女儿”才恍然大悟似地羞红了脸，跪在哲布尊丹巴面前磕了一下头。年轻的库伦活佛忙不迭地把她扶起来。

“慈祥的母亲”眼里含着泪，扑通跪在地上，哽咽着说：

“伯尔哼，我女儿是修了哪世的福，居然也有今天的造化。”

说罢，略略地使劲磕着响头。

“那仁高娃，你可千万要侍候好活佛啊！”

站在一旁的施什玛勒夫会心地看着母女俩的一举一动。心想：巴德玛耶夫果然有眼光，这二个难辨真假的演员间谍，真他娘的有办法！看来，哲布尊丹巴会牢牢陷进俄罗斯帝国的圈套了！

哲布丹巴猛地想起一件事，忙问：

“大胡子，我正想向你打听一件事：近来下边寺庙里的吉索纷纷告诉我，有两个德行善良的贵国女子，常常到寺庙听经讲佛，并且慷慨仁慈、大笔向寺庙布施钱财。你知不知道这两个女信徒是谁？”

施什玛勒夫摸着络腮胡子，和伊凡诺维奇彼此相视一笑，却不言语

哲布尊丹巴见状，心中猜想得以印证，便笑着自答：

“原来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啊！”

心中对那仁高娃又增添了几分亲近之意。

此后，那仁高娃每天一早便来寺陪伴年轻的库伦活佛，晚上方离寺回家。

每天，那仁高娃听完哲布尊丹巴讲过佛经，便陪年轻的活佛一同玩耍。她给他唱蒙古歌，甜美清纯的歌喉使他陶醉；她给他讲故事，讲彼得堡、莫斯科的繁华，讲俄国的风土人情，讲俄罗斯的历史和传说……妩媚温雅的语调，奇异繁华的生活常常把他带入一个似乎神往已久的人间世界，后来，她又唱许多俄文歌曲，表演《天鹅湖》……俄罗斯艺术又令他美不胜收，感叹不已……

当那仁高娃离寺回家之后，年轻的哲布尊丹巴心中顿感孤独寂寞、烦躁不已，十分惦念活泼聪明、温柔美丽的俄罗斯姑娘。

3. 痴情入迷的哲布尊丹巴

半年之后，年轻而倔强的哲布尊丹巴不顾许多年长的喇嘛们的反对，命令小喇嘛们在首宁寺内收拾了一间屋子，专门让那仁高娃在此休息。沙俄“以狐媚手段，行其狼吞之心”。“女弟子（活佛妇）既生小佛爷，俄人亦献一女子，事于活佛，讳之曰乳母，以为联络活佛之手段。”

这些情况均详细记录在 1911 年的一本《蒙古考察日记》里。

清政府得悉此事原委后，甚感蹊跷，怀疑这又是俄国政府的一个阴谋，于是。让清政府驻库伦办事大臣劝阻哲布尊丹巴。但是，适得其反，哲布尊丹巴不仅顽固抗拒清庭的命令。反因此憎恨清朝中央政府、更加愿意和俄罗斯驻军伦领事施什玛勒夫来往。

见到鱼儿已牢牢上钩，那仁高娃十分得意，忙又写了一封秘信，以黑色“Q”落款，派人送到巴德玛耶夫手中，以单独邀功请赏。

经过中间的这段曲折之后，那仁高娃更加温柔，使出在彼得堡特殊学校中所学的特别技能……

年轻的库伦活佛也把那仁高娃当做自己的亲姐姐，无论是政务大事，还是生活琐事，都毫不隐瞒那仁高娃。而慧根不浅的那仁高娃还经常给他提出一些高明的计策，这就更伊哲布尊丹巴欢喜不已。从此，每逢有政务要事，哲布尊丹巴便要请那仁高娃一同商量。

沙俄政府一见柳芭已经得手，便百倍疯狂地活动起来：到处拉拢蒙古王公贵族，暗中加紧建立“暴动的政治中心”，拿出大笔的钱财来贿赂收买喇嘛……

1900年，施什玛勒夫代表沙皇向哲布尊丹巴赠送了镶金象牙筷子、天鹅绒、孔雀裘、白狐皮、海豹皮……等奇珍异宝。

1908年，沙俄就任驻华公使科罗斯托维茨在赴北京途中，特意绕道库伦送给哲布尊丹巴价值二万多卢布的金银珠宝和哲布尊丹巴象牙的西欧精制钟表。

沙俄还令俄国商人每到库伦，都要先向哲布尊丹巴“奉献”新式的奢侈品。沙俄政府还专拨款项，给哲布尊丹巴修建一座富丽豪华、珠光宝气的俄式避暑官。后来还私下运送了大批俄国快枪，以武装库伦活佛的卫队。

哲布尊丹巴和俄国政府打得越来越火热，以至“活佛庙中时有俄女出入”，“活佛门首，每日必有多数俄人往来。”

其间，并有俄文信札往返。

沙俄政府几下里阴谋夹攻，便把哲布尊丹巴第八世紧紧地挂到了裤腰带上。

4. 毒瘤生根

日俄战争后，尤其是1907年第一次《日俄密约》签订之后，我国外蒙古地区就完全成为“俄人势力范围”了。

一些关心边疆事务的清朝官员已经看出沙俄阴谋吞并蒙古地区的野心，对此感到极度不安。给事中左绍曾奏说：

“俄人潜煽喇嘛，喇嘛潜煽蒙古王公”，认为，俄国是外蒙地区的“隐患”。中书章启榘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沙俄在蒙古积极培植亲俄势力，是：

“欲以无形侵略主义、席卷大漠南北数千里之地。”黑龙江巡抚程德全也奏说：蒙古“强邻环伺，大有外诱内离之忧，隐患方深，更有土崩瓦解之惧。”蒙古地区的危迫形势，已使清政府必须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1907年6月，两广总督岑春煊、科布多办事大臣锡恒、喀喇沁郡王贡桑诺尔布等人，先后提议改革蒙古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主张设立行省、实行“新政”，编练新军兴办学校、招民垦荒。设立银行、建设铁路、安设电线、创办实业，以利于改变该地区的落后状态，从而达到巩固边疆和防止强邻入侵的目的。清政府采纳了上述大部分建议，决定在外蒙古地区实行“新政”，1909年11月，任命热心“新政”的署归化城副都统三多署库伦办事大臣。

三多在库伦整顿蒙旗、实行改革的目的是：

“安中夏两御强邻”他推行的新政主要是兴办学校；开放蒙地，废除了不准内地人民到蒙古地区开垦地亩的禁令，移民实边，开拓边疆；设立兵备处，等练新军，扩大清政府驻库伦的军队；奏请修筑张哈铁路，使北京同库伦、恰克图连接起来。另外，三多还在库伦设立宪政筹备处、交涉局、卫生局、商务调查局和实业调查局等推行新政的诸多机构。

清政府在外蒙地区实行新政，这纯属中国内政，却遭到沙俄帝国主义的强烈反对和无理干涉。因为清政府实行这些开发边疆，巩固边疆的措施，将使沙俄妄图变外蒙为其殖民地的阴谋难以得逞。于是，沙俄一方面通过发表所谓的“外交照会”表示反对，同时加强向外贝加尔军区增派军队；另一方面，又通过使用各种卑鄙手段，煽动外蒙的喇嘛和蒙古王公背叛清朝、投靠沙俄。

以哲布尊丹巴第八世为首的一些上层喇嘛和王公贵族，担心清政府实行“新政”后，喀喀在行政上同内地各省置于同等的地位，损害他们原有的统治特权和经济利益。所以他们非常仇视新政，把它污蔑为“对蒙人的彻底奴役。”

一天傍晚，天色渐暗，夜色笼罩着库伦活佛府，晚归的鸟雀惊慌的叫声在殿宇楼阁间游动，更使寂静的甘宁寺显得阴森森的。

哲布尊丹巴双腿盘坐，心中六神无主、极其慌乱，连掌灯之事都懒得顾及。屋里黑漆漆的，微弱的星光之下，只模糊看得见哲布尊丹巴盘坐的身影。

那仁高娃轻轻推门进来，悄然地点上灯，又给哲布尊丹巴端来一壶奶茶，然后静静地站在他的身旁。

哲布尊丹巴默默看着那仁高娃，好一会儿，才开口问道：

“这三多搞‘新政’的事。你听说了吗？”

那仁高娃轻轻一点头。

“三多的新政，对我们喇嘛和王公都很不利，我想奏清朝庭立即撤换三多，停止所谓的新政。你觉得这样行吗？”

狡猾的那仁高娃故意皱眉思索，半晌才反问道：

“朝廷会答应您的要求吗？”

库伦活佛摇摇头，叹了口气：

“不知道啊，但是从目前情形看来，朝廷很可能不会同意的。”

“那你不是白费力气吗？！”

“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我总不能把三多赶回北京去罢！”

汉罢，年轻的库伦活佛十分沮丧，似乎已是穷途末路之时。

那仁高娃一见时机已到，便根据沙俄驻库伦新领事刘巴给她的指示，说：

“活佛，中国人说条条大路通北京！你对策多的是！”

哲布尊丹巴似乎看到了一线生机，急切地问道：

“你有什么对策？”

“活佛，如果进行答应您的要求，你这回可以平安无事，可谁能向您担保；以后再也不会再在蒙古搞新政呢，所以这不是长久之计。

“如果朝廷不答应您的要求，那您就更得任他们奴役了！——

“所以，说来说去，您那样就永远会被攥在别人的掌心中！”

“活佛。您是佛祖转世，生来就是要统治蒙古的，为什么要听清朝官员的摆布呢？”

哲布尊丹巴闭目盘坐很久，又说：

“你说的都很在理。可现在早已不是成吉思汗横扫千军的时代了，我的臣民可抵挡不住他们的进攻啊！”

那仁高娃欣喜若狂，娇滴滴地嗔怪说：

“活佛，我看您又忘了施什玛勒夫先生的话了，是不是？”

哲布尊丹巴醒悟过来，咬着牙点点头：

“对！对！俄国才是我忠实的朋友！”

哲布尊丹巴站起身来，在屋内踱来踱去。“该和他们摊牌了！明天，我要贝杭达多尔济、察克都尔扎布、棍布苏伦这些王公，和他们商议反清独立之大事……”

第一节 磨刀霍霍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古老的华夏大地和她的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的儿女们，载着五千年的灿烂文明，驮着难以数计的沉重包袱，艰难地跋涉进了二十世纪的第一个辛亥年：公元 1911 年。

1911 年，祖祖辈辈生息在黄土地上的平民百姓不会忘记，一直被奉为至尊至圣的王公老爷不会忘记，历史学家更难忘记，就连高鼻梁黄头发对华夏这块肥肉有特殊嗜好的大小小洋人也铭刻在心，因为武昌起义的枪声掀翻了中国的天，昏睡的国人睁开了眼，紫禁城的皇帝退了位，这可是开天辟地头一回！

中国的大变样，大大小小的军阀磨拳擦掌，高高低低的洋人磨刀霍霍，他们要抢夺胜利果实，他们要再造奴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还没来得及喘口气，不明不白的屠刀就又一次降临到了头上。

在洋人的磨刀曲中，最卖力，胃口最大的莫过于沙俄这把已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屠刀。就是这把刀，把满清王朝驯服成了自己的忠实奴仆，还是这把刀，抢占了上百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丢了奴仆的沙俄，睁着血红的双眼，在华夏大地扫来扫去。他看准了，找着了，双眼定格，紧紧地盯住了一地方——外蒙古

一、主子丢失了狗后的暴怒

圣彼得堡皇宫的不眠之夜

夜已经很深了，圣彼得堡皇宫的后宫里七色彩灯在均匀地闪着柔光，后宫的宫门口几个尼古拉二世的贴身宫人，个个耷拉着脑袋，上下眼皮直打架，略显疲惫的面部诱发出一股无可奈何的神色。他（她）们必须在厄古拉二世点宫后，万分小心地安排好二世皇帝的晚事，才可或在宫门口坐更，或回自己的小屋和衣躺。且夜夜如此。

而今晚却一反常态，二世皇帝兴致颇高地刚刚点完他钟爱的妃子安娜爱莎，一名一等宫人匆匆来报，外交大臣沙查诺夫和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急见陛下。

以二世皇帝特有的政治嗅觉，他预感到在这黄昏时分，两大臣急见，必有大事无疑。为求隐密，他把平时不离其前后的贴身宫人也滞留在后宫。

此时此刻，最难熬度的还数据子安娜爱莎。她清楚地记得，自从上次得幸至今已整整三十五个日日夜夜了。每当日落黄昏后，月上柳梢头之时，她一边默念着二世皇帝分开时对她讲的话“安娜，我的妃子，我们会很快再见的！”，一边浑身发热地在宽大的官床上辗转反侧，漫漫长夜，似乎专和她过不去，太难熬了！她有时也斗着胆子恨二世无情，但她明白，并非全是二世之故，二世周围几个妖艳的骚货一定从中又作祟了。

今晚突接挑灯笼宫人送来的点幸牌，她都不知自己是如何在洁白的玉池中沐浴，也记不清自己往身上喷洒了多少法国威娜宝摩登香水，她只盼着二世能早一刻跨进她的宫室，早一分宽衣，早……

安娜爱莎的宫室是一处极具为究的欧式后宫，毛茸茸的澳式地毯上摆放着墨绿色的法制钢琴，金壁辉煌的垂式大吊灯悬在屋子的中央。一尘不染的各色小古董错落有致地摆放在精美的木柜中。

安娜爱莎怀着难以言表的急切心情，两眼又仔细地审视起她居室中的这一切，生怕出了半点差错，她有时甚至怀疑起二世皇帝不送点幸牌来的缘故，是自己居室的摆设引发了皇帝的厌恶。

“叭哒！叭哒！”正墙上金钟的计时声打断了安娜爱莎的思绪和审视。她不由的掀起那美丽的睫毛抬头望了一眼金钟；

“啊！三点了！”

是的，金钟并未走快，安娜爱莎也没有看错，这时确实已是次日凌晨三点了。

凭着她接纳幸事的经验，她预感到宫中今晚一定出了大事，虽然她对两大臣急见尼古拉二世之事丝毫不知，因为按宫里规矩，是不会有人告诉她这事的。

不错，安娜爱莎的预感是正确的。

两大臣急见尼古拉二世，并非宫中出了什么大事，也不是俄国有了乱子，而是专为中国的辛亥革命而来。

武昌起义前后在尼古拉二世的授意下，沙查诺夫和摩罗巴特金密切注视着中国的动向，这两大臣曾联合发布命令，增调大批兵力开往中国东北和北京，不遗余力地在筹划着再演一场镇压义和团的运动。

出乎意料的是。就在武昌起义的次日下午，两大臣几乎同时收到了俄国驻北京领事米勒尔的急电，电文大意是中国武昌起义发生了，其它各地风起云涌，满清政府看来靠不住了，速请发布谕旨。

沙查诺夫收到急电时。正在和二位相好玩牌，今天他手气很好，几轮下来，手边的黄豆（一粒黄豆相当于5卢布）就有好几堆小山。而他平日最宠爱的卡秋莎却似下树的桃子，一圈不如一圈，手边的黄豆顺溜溜地移到了对手的领地。卡秋莎娇艳过人，粉嫩嫩的细白肉，柔纤纤的笋指手，特别是那一头金黄澄亮的秀发下那双双汪汪的杏仁眼儿，没有一个男人不想多看几眼，就连女人也无不是在极度的羡慕中又生出无限的嫉妒。再加上卡秋莎天生一张会说话的嘴，八字没有一撇的事，经她一说，让人觉得还满是那么回事。

看着卡秋莎手气越来越臭，沙查诺夫手心发热，心里发毛，他要继续玩下去，一直玩到卡秋莎眉开眼笑。他不能让自己的这朵鲜花在牌场上扫兴，他要尽一百倍的努力让她事事满意、时时顺心。

正在这时，他的大臣助理急匆匆地出现在他的面前，随即递上了发自北京的一份急电。

沙查诺夫看完急电，双眼瞅着卡秋莎，艰难地离开了牌桌。他不能不如此，他深知北京急电的份量，心理的天秤一时发生了巨大的倾斜，虽然他心理实难掩盖那偶尔萌发的当官不如老百姓的莫名惆怅。

沙查诺夫抓起电话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多年的外交生涯，使他深信，没有枪杆子作后盾的外交简直是小孩儿的游戏。

就在他拨通库罗巴特金电话的时候，侍卫长正笔直地立在库罗巴特金的办公桌前，一字一句地给自己的顶头上司陆军大臣读着北京急电。

就这样，两大臣相约双双来到克里姆林宫。

在克里姆林宫的小会客厅里，围绕北京急电，尼古拉二世和自己这两位心腹大臣从晚霞初照，一直谈到次日东方露出鱼肚白。

谈论的话题，争议叠出，纷繁复杂，但有几条却是毫无疑义的，“像现在这样中国苦于内患的时刻，如果我们提出种种要求，会很容易地使之承诺下来的”；

“应乘机把俄国国境推进到接连内蒙古的戈壁沙漠”，其具体方法：“如能使蒙古实行自治，完全脱离中国的制度的话”，就“可把北蒙古和地方置于俄国保护之下，使之符合偏国的利益去行动”。

三人密谋接近尾声时，尼古拉二世用手摸着自己下髭，不高不低地摔出了这样几句：

“把中国分为几个独立国家，从我们的观点看来，最适合我们的广泛利益，这就是我们的帝国理想”。

“俄国应当保护外蒙古的‘独立’。使它脱离中国”。

“俄国有扶助全蒙自治责任，……凡不服从各旗，须以蒙古主命令，由俄人强制执行之”。

也许世人都不会想到，就是这个不眠之夜，就是克里姆林宫小客厅的三人之谈，定下了二十世纪初沙俄策划外蒙古“独立”的基调，中国辛亥革命后，沙俄在外蒙古问题上演出的一幕又一幕丑剧，都能在这个基调中找到它的源头。

二、“非划出一条血线不可”

或许是旷日已久的沙俄大国沙文主义，在俄国人的心底发生了深深的积淀，或许是吃不着鸡腿也能吃个鸡屁股的既得利益的欲火中烧，沙俄的各种喉舌在中国辛亥革命发生后，使出浑身解数，个个披挂上阵，一派杀气腾腾。

当时尤以报纸《新时代》最为典型。

1911年11月30日的《新时代》头版全幅登载了中国武昌起义的报道和评论。现录几条原文如下：

“俄国应当迅速派遣国防军，进入中国各个已经倾向于俄国的地区”，“首先发难”，与英、法、日等国“共同瓜分这个世界的赘物”。

《新时代》把具有悠久历史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亚洲第一大国，为世界和全人类文明做出巨大贡献的中国用“赘物”来喻之，这说明在俄国人的眼里，当时的中国是何等的低贱，又是多么的可怜。这也反证了俄国人又是多么的狂妄和不可一世。在这种心态支配下的俄国口出何言，付之何行都是不足为奇的。

《新时代》本以为这样一来，完全可以来个轰动效应，以此获得沙俄政府的褒奖和恩赐。然而，过高的期望还是带来了一定的失望。除了当日报纸在全俄各地被抢售一空，大街小巷互相传阅之外，并未引起政府的震动。因为报纸所言早已是政府蓄谋已久的如意打算，政府的阁限已大大升值。

《新时代》见一着不灵，随即又在《新时代》之上加了号外，巨大的篇幅上赫然落墨：“不利用我们邻国中国的衰微以完成我们帝国的理想，实在是愚蠢之极。”

这里还需一提的是沙俄的《远东评论》杂志。

本来，《远东评论》素有沙俄政府“远东顾问”的雅号，其权威性和轰动性在全俄是公认的。但是，由于杂志的周期性和灵活性差之报纸一截，这次在报道和评论中国辛亥革命这一问题上，让《新时代》一开始就占了上风。

《远东评论》煞是不平，为了保佐“远东顾问”的雅号，全社组织了最得力的精兵强将，个个忙得脚后跟都朝前了。

真可谓功夫不负苦心人，《远东评论》一经发行，上白尼古拉二世、下至平头百姓无不啧啧称道，给“远东顾问”这个雅号上又加了一圈耀眼的光环。

据说尼古拉二世看到《远东评论》卷首的第一句“给予亚洲俄国以保障的手段只有一个，就是只有修正国境，此外再没有其他办法”，即拍案叫好！

当读到“蒙古和北满……应该是属于我们的。俄国要在有可能用墨水来划分的限度内，务必尽快早些来划这条线。如果把这种企图拖延下去的话，恐怕会要到非划‘一条血线’不可的地步”时，兴奋之情难以言表，竟然大手一挥：“拿酒来！”

三、一级战备号令的发出

彼得堡郊外，与满是烟囱的居民院格格不入的一片开阔地上，耸立着一幢壁垒森严的三层楼房，楼房的四周架设着高压电网和密密歪歪的铁丝网，网的外围有荷枪实弹的卫兵在穿梭巡行。

附近的居民从外观上都猜测到、这不是一块平凡的地方，但都搞不清这是不是一座监狱。

直到苏联“十月”革命以后，人们才搞清，这个神秘的地方原是沙俄政府的最高陆军作战室，沙俄的许多重大军事行动的号令都是由此发出的。其中楼房的第三层是全封闭的防弹室，楼底还有一个地下室，地下室平时由作战室工作人员居住；战时，突击变为秘密机要室。

1912年10月，世界诸多国家还暖洋洋的时候，莫斯科已是冰天雪地，阵阵刺骨的寒风吹起地上的层层积雪，堵的人们喘不上气来，睁不开眼睛，厚厚的羊皮袄上总是靖着一层薄厚不一的雪渍。

10月7日一太早，附近的居民突然发现这座神秘的地方，在铁丝网的外围冒出了好几层全副武装的俄国土兵，一个个威严正立，如临大敌。

居民们互相交换着眼色，传递着谁也说不清的信息，胆大点的在窃窃私语，交头接耳，互相对问“又出什么事了？”

此时的三层防弹室里，十几张长方桌子一字排开，桌子两旁，两肩扛着各色肩章的高级军官们双手压膝，挺胸抬头正在恭听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的训话和命令。

武昌起义暴发后，沙俄政府紧锣密鼓，先是在武汉帮助清朝政府疯狂镇压革命党人，后又勾结窜通其它帝国主义共同上阵。无奈得了死症候的清政府，再打什么活命剂也无济于事了。

沙俄眼巴巴看着清政府是丢定了，但是，他们决不甘心到此为止，狗丢了，肥肉不可丢；大狗完了，小狗还得养！

抱着这个信念，又恪守着沙皇在外交大臣沙查诺夫关于蒙古问题的报告上的批示：“冷静观察——但不要因此竟将机会错过！”一年来，沙俄跃跃欲试，但总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向中国出击。

机会终于来了，1912年1月到8月，沙俄派往中国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的特务起了效用，这两地的上层王公纷纷发动叛乱，中国军民奋起抵抗，大大小小的战事接连不断。

进入10月后，中国的叛乱渐渐被平息，一份份战败情报飞回沙俄，飞到尼古拉

二世的面前。处心积虑的沙皇和他的大臣们深感厄运和机遇同时降临，悲的是苦心经营的内部反叛被各个击破，养小狗的计划实属不易，喜的是有了借口，可以大打出手，给中国重重一击，以此实现帝国理想！

10月6日，尼古拉二世密调库罗巴特金进宫，面视机宜，发布谕旨。

库罗巴特金领旨后，马不停蹄速速召回了陆军几乎所有的高级将领，齐聚陆军最高作战室，这已是10月7日的事了。按照军纪军规，10月6日午夜，在陆军最高作战室特布下一个特种连进行警戒。

三楼防弹室里，库罗巴特金训话已经完毕，他用眼环视了一下静得几乎连空气流动都可听见的作战室和两列整齐威武的部下，突然发话，“下面，我命令！”

话音未落，所有军官，包括库罗巴特金在内，“刷”地一下齐刷刷地站了起来。

紧接着，静得可怕的作战室里响起了库罗巴特金那尖细但颇有凶性的声音：

“所有沿中国边界的驻军。立即进入一级戒备状态，听候命令！不得有误，违者严惩不贷！”

四、寐生前的骚动

寤生，即小孩倒着出生，数不清的母亲由于胎儿的寐生，栽倒在血泪变混的地方，再也未能起来，永远永远离开了人世。断了气的母亲倒是什么也不知，也就无甚痛苦可言了，而最难忍受的却是小孩寐生时，阵阵骚动和躁行似尖刀直刺母亲的心。

外蒙古“独立”这个怪胎，在其寐生前，即中国辛亥革命前夕，已无比狂热地开始骚动，而这些骚动，后人看来确实是一幅幅耐人寻味、独具“情趣”的画面，这画面沾满了血，也洒满了泪，它会告诉人们一个脉络，而给人们的思考却是好多、好多……

历史不会忘记这一天

夜色茫茫，月暗星稀，为向自己无比尊崇的活佛哲布尊丹巴进献一年一度的“丹书克”（祭礼），从外蒙古各地赶来的僧侣整整忙乎了一天，他（她）们兴奋，他（她）们激动，他（她）们祈盼活佛摸顶，若这个企盼落空，即使能望到活佛一眼，他（她）们也感到受宠若惊，是一种莫大的满足，因为这样一来，他（她）们全家这一年就吉祥如意、事事顺利，此时的他（她）们绝大多数，带着无限的遗憾已进入了梦乡。

他（她）们怎么也搞不明白，以往历年的这一天——旧历六月十五日，记忆中总是天高气爽。极少数人鸿福降临，接受：活佛的摸顶，绝大多数或远或近，或正或背可观望一眼。

而今年——1911年的这一天，活佛刚刚出现，天气骤变。黑云压顶，倾盆大雨从天而降。当他（她）们从污泥浊水中抬起头来的时候，心中的圣灵和一切的一切都化为乌有，没有人受到至高至上的，活佛的摸顶厚爱，更没有……

他（她）们受到的只有湿淋淋雨水的浸渍，莫大的失望和遗憾塞满心间，剩下的就是颇带哀求的祈盼和疑窦：“活佛啊，你在哪里？”

话说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一大早在众多王公、喇嘛的簇拥下，来到预先专为他搭好的豪华蒙式祭坛上，此时的哲布尊丹巴早已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还有更重要的事等待着，且是决不可耽误的大事。

也许是“天公作美”，不一会儿狂风顿起，大雨漂泼，这正是骑驴碰了个炮台、瞌睡遇上了枕头。

哲布尊丹巴急不可耐地伙同流达多尔斗、察克都尔扎布、棍布苏伦等十八个王公、喇嘛，按预定计划秘密来到库伦城外的一片茂密森林里，钻进了一个硕大的蒙古包，开起了策划外蒙古“独立”的第一次特别会议。

会议进行得特别艰难，对“独立”问题，赞成者慷慨陈词，反对者痛陈利害，双方唇枪舌剑，大有剑拔弩张、一触及发之势。

为会议保密起见，当日下午，会议移到了库伦附近一个叫博克多乌拉山的山坡上，黄昏时分又移到俄国侨民的住宅里。

值得一提的是晚间的会议，参加人略有变动，反对“独立”的宗教上层额尔德尼商卓特巴喇嘛巴德玛多尔济被清除，而沙俄驻库伦领事刘巴亲自出席，左右了整个会议的进程。

一直到夜半时分，一封哲布尊丹巴请求沙皇援助外蒙“独立”的信件初稿基本“拟成”，刘巴这时才心满意足地起身离去，一天的秘密会议终告结束。

如果说克里姆林宫小客厅的三人密谋，给沙俄侵略外蒙、制造外蒙“独立”定下基调的话，那么，1911年旧历六月十五日的外蒙王公、喇嘛秘密会议就成了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外蒙王公、喇嘛追随沙俄、甘当奴仆、分裂祖国的起跑线，历史终将记住这一天，人民也决不会忘记这一日！

彼得堡迎来了这样一群“贵宾”

本世纪初的彼得堡在接待外宾上已有了一套规格分明的模式，凡重要的贵宾来访，沙俄政府总要忙碌一阵，巷尾街头布满各色彩旗、彩带，隔不远的大杆上插着俄国和来访国的国旗，大大小小的店铺门前悬挂着各式横幅。当地政府还会以金钱和物质，利诱彼得堡城附近的居民赶着马车，或乘坐政府的大卡车，手举三角小旗在贵客经过的沿途摇旗欢迎。

1911年8月15日，杭达多济以“蒙古君主”哲布尊丹巴“钦命外交大臣”的头衔，率领“蒙古代表团”抵达彼得堡。

车站上的欢迎仪式极其隆重，代理外交大臣涅拉托夫以及陆军大臣、数十名专职外交官亲到车站迎接，数千名手举小旗的欢迎群众在警戒线外围摇旗喊号，礼宾乐队高奏《迎宾曲》。

握手寒暄过后，涅拉托夫先致热情洋溢的欢迎辞，多次强调沙俄一定全力支持和援助外蒙古脱离中国。宣布“独立”，以及合并内外蒙古的要求。

杭达多尔济也随后致辞，他感谢沙皇的隆重欢迎，并言此次来访主要是向沙皇呈递外蒙古接受俄国“保护”的“请求书”。

受到这种国宾的盛礼，杭达多尔济是有生以来头一回，一种莫名的虚荣感油然而生。不过，惊喜的另一面却又是颇多的惶恐和外交上的极度幼稚，以致在车站当记者问到“请求书”的内容时，杭达多尔济这位“钦命外交大臣”竟张口结舌，连说了五通“这个”，却未吐出一字下文，这种场面窘得在场的“蒙古代表团”所有成员个个涨红了脸，杭达多尔济当在此列。

有家俄文小报在报道杭达多尔济时，说杭“口吃得惊人”。

俄文小报对抗的报道不知是俄国人的幽默，还是真的产生了误会。其实，杭达多尔济与口吃丝毫无缘、连讲五个“这个”，仍旧原地踏步，除了杭外交经验欠缺这个次要原因，最主要的是“请求书”的内容实难以见人，羞于出口。也不敢出口，然而白纸黑字却写的清清楚楚。甘做奴仆的一点廉耻心就在于书面文字和口头语言之别了，书面的东西可以尽情表达，而口头语言却有难言之隐。

8月16日，在克里姆林宫的一个亚细亚式会客厅里，沙俄内阁总理斯托雷平接见了杭达多尔济一行，抗把哲布尊丹巴给沙皇的信件交给了斯托雷平。哲布尊丹巴等人、在这封信中提出。以出卖外蒙古地区的通商贸易、修筑铁路、开办邮政等主权，换取沙俄对将要成立的“蒙古国家”的援助和保护。

为了博得沙俄的青睐，杭达多尔济等人还向沙皇和沙俄政府的许多权贵大臣馈赠了名马、鞍鞯，金佛等名贵礼物。其中的一尊金佛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珍宝，至今还放在俄国故宫的中国馆中。

沙发为了实现他的帝国理想，对“上门乞求”的“蒙古代表团”来了个慷慨“施舍”。

为了全力支援库伦“独立”，沙俄陆军部命令伊尔库次克军区，将步枪一万五千枝，骑兵军刀一万五千把，弹药七百五十万发交给布尊丹巴为首的外蒙古叛国集团，并派出一营步兵和几百名哥萨克骑兵，以加强库伦领事馆的防卫为名开驻库伦。同时，沙俄还指使其豢养的陶克陶胡带着几十名行军赶到库伦，参加“独立”奠基。

1911年10月中旬，俄蒙公路上，绵延数十里的沙俄侵略军，由骑兵开道，耀武扬威地源源开进外蒙古境内。杭达多尔济等人也从俄国回到了库伦。

在沙俄的幕后指挥下、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叛国王公喇嘛加紧筹划“独立”，并组成了以杭达多尔济为头目的“临时总理蒙古国务衙门”，具体领导外蒙古的“独立”运动。

第二节 如此“独立”令、驱逐令下的清朝大臣三多

1911年11月30日一早，清朝库伦办事处办事大臣三多就起床了。

近一个月来，他心情颇不宁静，时时处在一种焦虑、惶恐和困惑之中。看上去，明显消瘦了好多，且愁容满面，气色不好。他不能忘记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库伦时，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王公、喇嘛的兴灾乐祸，洋洋得意，而自己所辖的办事处的沮丧，难捱和尴尬尤使他度日如年；他更难放下心的是，11月28日，在沙俄军官的率领下，库伦附近各旗的台站驿卒四千人全副俄武装，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库伦城，这支军队的急速组建和进城，其用意是不言而喻的。

办事处仆人刚把早点端上来，食欲甚弱的三多为了稳定办事处所有官员、奴仆的心，只好强装镇静坐到餐桌前。

就在这时，办事处门卫匆匆来报：杭达多尔济求见。号称“蒙古通”的三多心里不禁一惊：他要干什么？

说起三多，清朝政府几乎无人不晓，无人不知，他博学多才、尤以蒙古历史、风俗研究最为拿手，蒙学功底很深、造诣极高。令别人员佩服的还是三多为人正直，清政廉明，这在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中确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到的。为了祖国的统一为了报答大清皇恩，三多在库伦一呆就是三十年。

还未等三多出去迎接，杭达多尔济已带着几个随从来到了院当中，这是三十年来，三多碰到的第一位未经他允许就来到院中的蒙古官员。

杭达多尔济给三多递交了一份公文，称哲布尊丹巴已征调蒙古军队准备进京保护大清皇帝，要求办事大臣三多立即发给粮饷，并限三小时内答复。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哪里是什么公文，分明是一篇威胁诡骗书，是故意和办事处找茬。

进退维谷的三多一面火速答复杭达多尔济的公文，言明利害，粮饷之事也决非他三多所能定夺，需向上呈报；一面同驻防库伦的清朝军队联系，筹商制止外蒙王公的叛乱。

当哲布尊丹巴和几位心腹王公、喇嘛看完三多的答复件，禁不住开怀大笑，他

们早已预料到三多的答复与他们的要求的格格不入，所谓的公文不过就是为进一步行动找个借口而已。

随即，也就是当天下午，哲布尊丹巴以“蒙古君主”名义交给三多一份预先拟好的驱逐令，宣布外蒙古决定脱离中国“独立”，限三多等清朝官员即日离开外蒙古。驱逐令发出后，几位能说会道的外蒙古上层王公轮流来到办事处，对三多实行轮番轰炸。有的恫吓，有的利诱。

困境中的三多表现出了非凡的机智和才干。众说客不但未能自圆其说地说动三多。反而被三多或驳得哑口无言，或说的起了共鸣，有的甚至和三多站在了一条战壕，巴德玛多尔济就是其中的一位，不幸的是他因触怒了外蒙古上层狂热追求“独立”的王公、喇嘛，被五马分尸，惨死在生他养他的草原上。

库伦办事大臣三多坚守办事处、力图挽回局势的消息，不断经俄国特工人员传送到沙俄驻库伦领事刘巴的耳里。11月30日，刘已整整一夜未眠，他时刻在注视着驱逐令的进行情况，他清楚地意识到，赶不走三多及其清朝官员，外蒙古“独立”就是有名无实，帝国理想就又蒙上了种种阴影，沙皇的重托就难以实现，最重要的是他这个领事也就寿终正寝了。

想到这，刘巴心乱如麻，多么渴望能在午夜前接到三多等清朝官员被赶走的音讯。

然而，直到12月4黄昏时分，三多及其清朝官员仍没离开办事处。刘巴重重地把手中的茶杯摔到了地上。他要从幕后移到前台了。

就在这天晚上，乘着夜幕的遮掩，刘巴派领事馆翻译人员带着全副武装的俄国士兵突袭办事处，收缴了办事大臣卫队的枪枝，驱散了卫队，三多等清朝官员已处在软禁之国，行动失去了自由。

12月4日晚，天上黑云滚滚，地上伸手不见五指，三辆四车在一辆警车的带引下，风驰电掣地开进了办事处。

从警车内钻出二个黑影，在车灯的照烁下，可以看的出三个黑影全是俄国人，其中一个模模糊糊，看上去象刘巴，三辆囚车里也跳下十几个俄军。

办事处会客厅里三多及其清朝官员已被枪实弹的俄兵强行集结在一起，刘巴端坐于张临时安排的桌子前，他的双手压着一式汉文和蒙文分别写就的两份“声明书”。

这份“声明书”是在刘巴的一手策划下拟成的，大意是，清朝驻库伦办事处大臣三多自己郑重声明。由于外蒙古已“独立”，三多本人及其随从官员已完成使命，求速速离开库伦。为安全起见，特请求沙俄军队护送出境。

阴险毒辣的刘巴而露杀机，他简单地讲了几句。通过翻译告知了在场的所有清朝官员，“现在需做的事只有两件，一件是三多在两份同样内容的声明书上签字划

押，另一件是规规矩矩地上车，全部让俄军送出外蒙古。

刘巴冷笑一声，给分列左右的俄国士兵递了个眼色，霎时间，五六个膀粗腰圆的俄兵扑了上去。三多被打翻在地，顿时鼻青脸肿、皮开肉绽。

一向斯文的清朝官员：看到三多被如此毒打，个个怒目圆睁，不约而同地扑向了三多，无奈赤手空拳怎能抵得住明晃晃的刺刀，在场的所有清朝官员很快被制住，给五花大绑了个结结实实、他们在的一些上年纪，跟随三多多年的老官员，看着血肉横飞、昏死过去的办事大臣，禁不住老泪横流、失声痛苦起来。

会客厅里，喝斥声，叫骂声、痛哭声混成一片，合成了中俄外交史上的一个极不协调的曲章，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这一页的！

三多及其随从官员终于被俄军以保护为名押解出外蒙古，囚车里、马路上洒下了串串辛酸的泪花，也留下了沙俄铁蹄的片片印迹。

三、黄道吉日的“登极盛典”

经 36 位上层喇嘛 13 天苦心计算、占卜、看星相等一系列繁琐得再无法繁琐的宗教活动，最后经哲布尊丹巴本人裁决，把“大蒙古帝国日光皇帝”“登极”的日子定为 1911 年 12 月 28 日（十一月初九），言此日乃“大蒙古帝国”最大的黄道吉日。并以“共戴”为纪元年号。

12 月 28 日来到了，盛大的“登极”仪式在王府人蒙古包中举行，一切都仿照成吉思汗登极仪式；在大蒙古包中正间悬挂起成吉思汗的遗像和哲布尊丹巴的标准像，像上面挂着很长的哈达，像下面的桌子上摆着九只整羊及其他物品等，蒙古包门上交叉竖起两面外蒙古“国旗”。

“登极”仪式开始时，由哲布尊丹巴率领所有僧俗向成吉思汗遗像行叩拜礼。尔后分级分类地由王公、喇嘛向哲布尊丹巴行“君臣礼”。

行礼后，哲布尊丹巴以成吉思汗三十世孙的资格宣读“登极”誓辞。誓辞的主要内容是：“我以大蒙古帝国日光皇帝誓愿能继承成吉思汗的伟大精神，收复蒙古所有疆土，完成民族复兴大业”。

誓辞宣读完后，由刘巴代表俄国方面致祝词。祝词大意是“俄蒙携手，亲密分作”。

随后，所有参加“登极”盛典的蒙人签名划押，而对成吉思汗像和高居“皇位”的哲布尊丹巴，举手宣誓，痛饮奶酒。

最后就是摆上全羊席招待全部参加“登极”盛典的僧俗和外宾。

一边是热气腾腾的全羊席，一边是蒙族倩女祝酒歌，好不“热闹”的一场宴会，

僧俗们各怀心腹事，大喝起来，直喝得东倒西歪、烂醉如泥。

哲布尊丹巴“登极”之后，组成了“独立政府”。“政府”设内务、外务、财政、军事、司法等部，由叛国集团的主要头目达喇嘛车林齐密特任“总理”兼“内务大臣”，杭达多尔济任“外务大臣”，察克都尔扎布任“财政大臣”，棍布苏伦任“司法大臣”，那木萨赖任“军事大臣”。

沙俄为了进一步在内蒙古策动“独立”，积极伙同哲布尊丹巴在政府内网罗了一批内蒙古的王公、喇嘛。如乌泰当上了“司法大臣”，海山当上了“内务部”司官，陶克陶胡也当上了哲布尊丹巴的亲卫队长兼“军事部”司官。

办了使外蒙古在形式上象个独立国家的样子，在沙俄的授意下，哲布尊丹巴等人成立了上层王公喇嘛组成的“上、下议院”。

上、下议院在本文诸多国家中，的确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在外蒙古。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三、科布多的血和泪 48个日日夜夜

1912年春，在科布多附近杜尔伯特旗潜伏活动的沙俄特务丹必占灿，勾结杜尔伯特王公上层，发动了暴乱。丹必占灿公开鼓动民族分裂，归附库伦“政府”，投进沙俄的怀抱。

就在这时、科布多附近发生了一件仇者痛、亲者快的事件，这事件象一阵风，很快成了科布多僧俗欣喜谈论的热门话题，事情是这样的，哲布尊丹巴派了一位满腹经纶、能说会道的“使者”到科布多进行游说劝降。

说来这位“使者”运气实是不佳，还未溜进科布多，就被附近的牧民识别出来，五条马缰一下子把“使者”绑了个大气喘不上来，还未绑送到当地办事长官处，在有的牧民提议下，这位“使者”很快被分装到了几条牧犬的狗肚子里。

这件事发生后，沙俄看到劝降不成，就命令哲布尊丹巴派兵伙同丹必占灿的军队武装攻打科布多。

1912年6月18日，夜幕刚刚降临，科布多城头顿时火星乱窜，枪声大作，还不时夹杂着“冲啊！杀啊！”的呐喊声。

城头上，清朝科布多参赞大臣博润亲自督战，花白的银须在这血雨腥风中已失去往日那“一丝不苟的恬静，但老人两眼有神，浑身上下看上去有一股使不完的劲。他看着城头的一千多军民越杀越勇，看着鬓发斑白的老人们送粮送弹，呀呀学语的小孩儿在城内举旗呐喊，他几个月来为坚守国土，呕心沥血加强备战的辛劳和疲乏似乎全都压到了地根深处，心情之激动难以言表。

大大出乎哲布尊丹巴和丹必占灿的意料，科布多军民在博润率领下以一当十，势不可挡，6月18日的攻城战大败而归，且被润尚的守军追杀十余里。

吃一堑，长一智。哲布尊丹巴和丹必占灿在沙俄的操纵下，增调几千援军，其中包括号称“蒙古第一匪”的陶胡率领的一百多人，把科布多团团围住，来了个围而不打。

三千多人口的科布多一下子成了一座坐吃山空的死城。

城内的粮食在一天一天减少，三千民众的不安心情却在一天一天增大。到7月中旬，不少人家已开始宰杀自己的家畜：牛和羊了。

万没想到的是，围城的叛军竟毫无人性地在供给城内居民饮水用的渠道中投下了毒药。……

几百人纷纷丧生，有的全家没留下一个。整个科布多陷入了有灾以来最痛切最难插的时日：到处是哭声，到处是僵尸。

进入7月下旬、城内已时不时发生人食人的现象，喝马尿、吃鸡粪已成普遍。

博润，这位参赞大臣、眼望臣民一个个在死亡线上挣扎、他多么企盼援军早到、击退叛军，救出全城军民！可他那里知道，中国政府命令增援科布多的驻新疆部队，已被沙俄军队强行阻住，不准前行一步！

沙俄领事一手武力阻止，一手又向中国政府再三照会：外蒙地方“暂归俄国保护”，“若你们官兵前来，我必有以回敬”。

8月6日，这是科布多小城历史上极其难忘的一页：

从这天黎明时分，外蒙军队向科布多发起全面猛攻，先是用沙俄的73门新式火炮开始轰击科布多的城头和守军，炮弹象暴雨似的扯天扯地落在城头上，顿时，城墙坍塌，弹片横飞，科布多守军一个个倒在血泊之中，殷红的鲜血浸湿了城头的泥上。

随即是十个方阵（每个方阵500骑兵）同时出击，铺天盖地向科布多杀来，马上的骑兵个个腰挎寒光闪闪的马刀，手持俄式快枪，颇有当年忽必烈骑军之威势。

马队之后，又是如蝗蚊一股的步兵尾随而上。

两军亦城头相接、战斗相当激烈。守军只剩三百多人，但他们殊死抵抗，弹尽了用刀，刀卷了用石，石完了，三百壮士一涌而上

时近中午，被守军坚守48个日夜的科布多陷落了。比饥饿和死亡更可怕的灾难降临了，外蒙军队象一头饿狼似地扑进了科布多。

四、女人的血！女人的泪！

唐在礼、唐在章在《蒙古风云录》中记述科布多陷落后的状况时写到：“科境商民，一任鱼肉、掳人劫物，惨无天日。”

布满灾难和恐怖的科布多，最令人发指的要数发生在小自女婴，大至老妇身上的沙俄侵略者的种种罪行。

为了使这些当今在世和不在世的女性少一点辛酸的回忆和灵魂的震颤。在此权且将她们的真名隐去，或许能使她们那些伤痕累累的心稍趋平静一些吧。

1912年8月9日晚饭后，四个醉醺醺的外蒙士兵腰挎马刀，吆五喝六地闯进了一家独门小院。

小院内住着母女仨，母亲王大妈已年过半百，大女儿小A和别入已订婚，本欲上月过门，因为战事不停，只好一拖再拖，小女儿小B今年17岁。两女儿不但长得如花似玉，而且对老母甚是孝顺，左邻右舍，一提起这两个姑娘，没有一个不竖大拇指的。

母女仨黑着灯匆匆吃了点便饭，刚欲上床休息，突然，听到院子里进来了几个外蒙军。

怕鬼偏有鬼，还没等她们醒悟过来发生了什么事，四个蒙兵已跨进了门坎儿。

为首的满脸络腮胡子的大个子蒙兵，第一个扑向了蜷缩在屋角的小A，一张臭嘴重重地压向了小A那红润的双唇……

被突如其来的强暴吓得魂魄散的小A，本能地拼命哭喊、撕咬。

王大妈和小B也被眼前的场面一下子给弄怔了，就在小A大叫一声的同时，王大妈和小B不约而同地象疯了似地朝大个子蒙兵冲了上去。

说是迟，那时快，其余的三个蒙兵一涌而上，两个连踢带打把王大妈摔翻在地，一个老鹰抓小鸡似的把小B抛倒在床上。

可怜的王大妈因拼死救女，被打得七窍流血，绑在屋内的灶台上。小A先是被大个子蒙兵脱光下衣，当着王大妈的面强行奸污，洁白如玉的肌肤上流下了斑斑血迹。王大妈在女儿撕心裂肺的叫喊声中昏死了过去。尔后，另两个蒙兵又轮奸了小A。钻心的疼痛和莫大的耻辱，再加上大量出血，小A也晕厥昏死在屋角。

小A倒下了，三个禽兽不如的蒙军却哈哈大笑，三双血红的眼睛一齐投向了被绑在柜旁，破口大骂，高喊“救人”的小B身上。

在大个子蒙兵的授意下，二个家伙先把小 B 的上衣剥得一丝不挂，用燃灼的烟头烫乳房、乳头、小腹，钻心的疼痛和巨大的恐惧，小 B 浑身上下象筛糠似的，豆大的汗珠滚滚而出。

三个蒙兵烫够了，笑好了，又轮流压在了小 B 的身上……

1912 年 8 月 11 日，丹必占灿为庆贺攻克科布多大捷，特召集全体参战人员在科布多街心举行盛大庆典。

科布多人民最喜爱的青年女歌手琴斯，被强行拉到庆典会场助兴。

琴斯不光歌喉超群，而且娇美过人，大有倾城倾国之貌。她一登台，整个庆典会场顿时象开了锅似的，叫喊声、嘘声、口哨声乱作一团，这些以胜利者自居的外蒙将士眼下的心态就是占有，而且是任意的占有，随心所欲的占有。这种狂热不羁的自大心理，自从进入科布多来愈演愈烈，今天的相聚，又是这种心理的总碰撞。

随着一浪高过一浪的噪音合奏曲，靠近看台的蒙军“哗”地冲上了台中。一个多么圣洁的倩女，一刹那变成了这帮乌台之众可以随意玷污的猎物，恣情发泄的对象。

被抓扯得披头散发的琴斯，已从台上拖到台下，整个会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丧心病狂的蒙军们拼死往里钻、往里挤……

琴斯的衣服越剥越少，数十双、甚至数百双罪恶的手落在了她那玉骨冰肌的皮肤上，有的摸一把，有的拧一下，有的……

也许是苍天不灭吧，琴斯最后还是活下来了，然而，由于下身被严重撕裂，她留下了终身残疾、终身不育。

这是发生在二十世纪初，中国科布多街心光天化日之下，由外蒙古军队一手制造的一幕罪恶。诸如此类的实在太多了。

据记载，拥有三千多人口的科布多，城内和平居民被外蒙古军队屠杀的就有半数以上。丹必占灿因叛乱屠杀有功，被哲布尊丹巴授以“西部参赞大臣”和科布多“总督”。

外蒙古独立内幕（5-2）第三节 不泯的中国心

国破山河碎，悠悠情恨深，中国心不泯，光华鉴来人。中华儿女捧着那赤诚而不泯的中国心走过了数千年的历程，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铸就了瑰丽的民族魂。几多天灾人祸，几多内忧外患，中华民族依然顽强地生存、繁衍、融合、延续、壮大，生生不息。我们都有一颗共同的心——中国的心。

如今，在沙俄疯狂的铁蹄和冷酷的屠刀下，这颗心在呻吟、在颤抖、在淌血、在抗争、在燃烧！

一、“你们投敌叛国，要我做帮凶，我不干！”

——巴德玛多尔济喇嘛直面车裂

1911年7月10日（旧历六月十五日），库伦城沸腾了。外蒙古一年一度的向活佛进献“丹书克”（祭礼）的盛节在这里隆重进行。座座修葺一新的蒙古包上扎满了五彩六色的彩带，那高大庄严的祭坛上旗锈悬挂，坛前列案上祭礼份呈，宛若小山。翠绿的草地上匍伏着大片僧俗男女，他们在阵阵弦歌和幽幽香火中极其虔诚地向他们的活佛膜拜。有的圣徒还不时地嗅闻着活佛刚才走过时踩下的脚印。这个盛大的祭拜仪式因为在露天举行，阳光辉映，绿茵作衬，显得甚是壮阔而神秘。

仪式接近尾声，时刚过午。晴朗的天空上卷起了滚滚乌云，一阵狂风过后，大雨如注而下，倾刻间，这里变成了一个白茫茫的泥水世界。虔诚的圣徒们依然执著地跪伏在泥水浸泡的草地上、祈祷、唱诵。他们中的体弱者，早已禁不住暴风雨的吹打洗涮，脸色青紫、浑身瑟瑟发抖，有的已栽倒在泥水中再也起不来了。

善良虔诚的圣徒们谁也没曾注意发生在他们眼前的一件事。高居祭坛，接受礼拜的他们惧仰、崇慕的活佛早已走下了祭坛，不知去向。还有，刚才与他们一起朝拜活佛的几个王公大人也踪影全无。不知道，发生在他们眼前的事，他们全然不知。他们不敢抬头，不敢仰视那祭坛，他们只是一个劲地唱诵祈祷，一个劲地瑟瑟发抖，

夜幕降临了，黑暗笼罩着整个大地，草原一片黑暗，一片沉寂。

库伦、这个草原明珠，在这漆黑、死寂的夜晚，更显出几分恐怖与不安。

这是一座超大豪华型的蒙古包。周围，几个高大粗壮的人影在来回走动，人影下显然还有几只狗的影子。定近，但见几个骤悍的蒙古武士、人人手持寒光闪闪的蒙古刀，脸上表情木然；那狗，是体壮硕大的上等猎犬，眼睛闪着幽幽的蓝光。

装饰考究，陈设豪华的包帐内，几十支粗大的蜡烛拔起高高的火苗，将整个包内照得通明。一个特别的宴会正在这里举行。当中摆放着两张特大号的八仙桌、一色的锃光闪亮的银餐具、银酒具摆放在桌上，里面盛满了丰盛的肉食，奶食和酒，烤全羊、煎牛排、手扒羊肉……火辣辣、热腾腾的气息交混在一起，散发出略带腥气的诱人的香味。

这个宴会真是特别。如此丰盛的酒菜却未见有人痛嚼狂饮，既看不见蒙古人那种酒席间惯有的豪举，更听不到蒙古女那种爽朗，高亢的祝酒歌。这里的人们个个衣着华美，神色诡秘。十八个人分座在两桌周围。主席上首端座着一个削瘦而略显矮小的男子，他面色阴郁，用低沉的蒙语向众人讲话。他就是被蒙古人奉为活佛的哲布尊丹巴喇嘛。他讲话的大意是：各位王公、各位喇嘛，今晚把你们召来，是要商讨一件对于我们大蒙古族来说极其重大的事宜。我佛保佑，我们要重振大蒙雄风，建立大蒙古帝国。为了稳妥起见，我们必须请求友邦大俄帝国的援助，今天还特地

邀请了沙俄帝国驻员，库伦领事刘巴先生参加这个秘密会议，并且回避了一些靠不住的王公、喇嘛。此用意，我想你们是很清楚的。如何对付清廷的阻挠并彻底摆脱他们的控制？如何统一我外蒙上下的认识，如何求得友邦沙俄的大力支持？这是建立大蒙古帝国的重要保证。不过，就眼下情况来看，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应当是尽快求得友邦的支援，为此，我提议今晚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商讨并起草给沙俄皇帝尼古拉二世的求援信。就此，请各位发表意见。

活佛话音刚落，几个早已喜形于色的王公喇嘛便踊跃发言，各自陈述自己对活佛上述发言的衷心拥护和对脱离中国，“独立建国”的迫切“愿望”以及对沙俄帝国效忠之“诚心”。先后发言的有杭达多尔济、察克都尔扎布、棍布苏伦等十几人。

会议一直开到东方破晓。然而“求援信”尚未出台。

如此的会议继续举行。

这些极少数的王公喇嘛，生怕泄露其密谋叛国的罪恶企图，在哲布尊丹巴的率领下，千方百计地避开大多数前来会盟的其他王公，先后在库伦城外的森林里、库伦附近博克多乌拉山的山坳里，甚至躲进俄国侨民的私人住宅进行密谋。其间，作为沙俄的忠实走狗、民族败类哲布尊丹巴和杭达多尔济等人，利用其在政治和宗教上的影响，在外蒙僧俗各界极力鼓吹和散布叛国投俄的言论。在他们的煽动，欺骗和威胁下，秘密王公会议终于在7月30日炮制了哲布尊丹巴请求沙皇援助外蒙“独立”的密信。并且决定，派杭达多尔济以“蒙古君主”哲布尊丹巴“钦命外交大臣”的头衔，率领所谓“蒙古代表团”秘密前往俄国首都彼得堡面呈尼古拉二世。此是后话。

这封信何以如此难产？不难想见，即使在活佛选而又选，挑而又挑的极少数密谋者中也有难与其合拍的人。

爱国宗教上层人士额尔德尼商卓特巴喇嘛巴德玛多尔济，在这首叛国投敌曲中奏出了自己的不和谐音。在数次秘密王公会议上，巴德玛多尔济对哲布尊丹巴等人的叛国投俄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哲布尊丹巴逼迫他在给沙皇乞援信上签名时，他再也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义正辞严地正告这尊活佛：“你们投敌叛国，不得人心，要我做帮凶，我坚决不干！”断然拒绝在乞援信上签名。

事后不久，清廷对此事有所察觉。清朝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立即查询。巴德玛多尔济迅速“当日如何会议，何人主谋，何人赴俄”等情况一一作了报告，并对三多说：“我受大清国恩厚，彼等会议时，逼我署名，并未盲从。”“若能速筹善策，或许尚可挽回。”这番言论和举动虽然包含着浓厚的封建忠君思想，但他作为一个上层喇嘛，所表现出的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叛国投敌的正义行为实可受到历史的赞许。

库伦宣布“独立”后恼羞成怒的哲布尊丹巴罗织罪名将这位巴德玛多尔济喇嘛处以车裂之极刑。当一声炮响，五匹黑色蒙古马将巴德玛多尔济喇嘛裂为五块时，善良、正直的蒙古人民为他流下了痛惜、同情和悲哀的热泪。

巴德玛多尔济！你用自己血肉之躯的撕裂，证明了你坚决维护祖国统一的崇高信念；你用自己飞洒的热血浇铸了你爱国主义的坚定立场和高尚的民族气节！

人民和历史将永远记着你，巴德玛多尔济！

二、“抓住他、宰了喂狗”——科布多牧民绑杀活佛“使者”

武昌起义的枪声正在作响，库伦“独立”的丑剧也紧锣密鼓地进行。

在沙俄政府的军事支持和包护下，哲布尊丹巴开始真抓实干了。12月3日（旧历十月十三日）。库伦街头贴出了“独立文告”。12月28日（十一月初九），举行了哲布尊丹巴自称“大蒙古帝国日光皇帝”的“登极”仪式，并以“共戴”为纪元年号，组成了伪“独立”政府。

沙俄为了使库伦傀儡政权摆脱孤立局面并控制整个外蒙古地区，一面加紧指使分散在外蒙古各地的沙俄特务和亲俄分裂分子煽动叛国暴乱，一面积极鼓动和支援库伦伪政权出兵强占外蒙古各地。

1913年1月，沙俄驻乌里雅苏台领事策动当地王公发动叛乱，勒逼清朝乌里雅苏台将军奎芳退出该地，遭到拒绝后，沙俄领事便亲自出面进行威胁。以保护为名派哥萨克骑兵将奎芳强行逐出乌里雅苏台。

同年春天，在科布穿附近杜尔伯特旗潜伏活动的沙俄特务丹必占灿，勾结杜尔伯特反动王公上层，发动了暴乱。丹必占灿公开煽动民族分裂，归附库伦伪政权，投靠沙俄，广大僧俗极为不满，分裂活动一直未见大的起色。

活佛“日光皇帝”哲布尊丹巴曾多次派能言之士以科布多进行游说劝降，均未奏效。

这是一个清爽的早晨。科布多却充满了骚动与不安。惯于早起的牧民们不知是谁首先发现的。在大街上到处都散落着五颜六色的纸片，捧起来，见上面绘有佛像，佛像下面印有整齐的字样，他们不识字，也从来没见过这种奇怪的纸片，心里拿不准，但凭着他们笃信佛教的宗教情感，觉得这事似乎非同小可，因为那上面有佛祖的像。

一传十，十传百，整个科布多都在因这神秘怪异的纸片而不安。

这纸片从哪里来？上面的字是什么意思？人们疑惑不解。

丹珍喇嘛在当地人的心里是个百事皆通的“饱学之士”。人们于是想到了他。请丹珍看看，或许能搞清楚。人们纷纷去找丹珍。这位丹珍喇嘛手捧纸片默诵片刻，沉思良久，说道：“这是佛的旨意啊！”人们相视默然，而后向丹珍求问：您给我们详细说说。丹珍手持念珠慢慢说道：“佛说，我们科布多僧俗儿女要听从哲布尊

丹巴活佛的话，团结起来，脱离中国，建立独立的大蒙古帝国。不然的话要遭灭顶之灾”。人们面面相觑，将信将疑、谁也不说话。

忽然听见奔马嘶鸣声传来，只见一行六骑从西急驰而至。六人中一老五少，表情严肃。站定后并辔下马，老者（这老者其实也不太老，顶多五十岁的样子）从怀中掏出一幅黄绢，高声宣念，内容与刚才丹珍喇嘛解说纸片的意思一样。说这是“大蒙古帝国日光皇帝”哲布尊丹巴的“圣旨”。人们默默地听着，默默地站着。

有人突然喊了一嗓子：“这人是那个马贩子！”这一嗓子提醒了众人，人们将眼光投向他，都认得出来了，这就是那个前些日子住在丹珍家的马贩子，怎么今天一下子成了活佛的特别使者了？人们纳闷。找丹珍问问，丹珍不见了。那使者见被人们认出来了，拨马就想溜。反应迅速的几个牧民小伙子，一齐上去将他们围住，质问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使者支吾半天说不清楚。人们由疑虑转为愤怒，几个小伙子一齐动手将使者拉下马来，马上的五个年轻人还未来得及动手也被拉了下来。有人从使者坐骑的马兜里发现了很多与散落在街头一模一样的彩色纸张。

人们明白过来了。这是个骗子，是个想借佛伦圣名来挑动叛乱的坏蛋。人们气愤极了。

“绑住他！”“打死他！”“杀了他！”“把他喂狗！”喊声响成一片。

活佛“日光皇帝”派来诱降科布多人的使者很快分装在牧犬的肚子里了。

这只是沙俄及走年傀儡库伦政府劝降丑剧的一幕小剧而已。

清朝科布多参赞大臣博润，在附近各旗爱国军民的积极协助下，征集了蒙古武装一千人，加强战备，坚守国土。

沙俄看到劝降不成，就唆使哲布尊丹巴派兵伙同丹必占灿的叛国武装攻打科布多。1912年6月，沙俄侵略军一部和由丹必占灿，海山等人带领的数千叛军往犯科布多。路上，叛军“兵心摇动，纷纷逃匿”，不甘心叛国投俄。6月18日，叛军进攻科布多，科布多守军在博润率领下奋起反击，打得敌军清退十余里。随后库伦法王增调了几千援军，其中包括陶克陶胡带领的叛匪一百多人，继续围攻科布多城。

这时，中国政府立即命令驻新疆部队前往增援。沙俄驻乌鲁木齐总领事和驻乌里雅苏台、科布多领事、一再发出照会进行威胁，并派人前往阻拦。沙俄领事在照会中称：外蒙地方，“暂归俄国保护”，“若你们官兵前来，我必有以国歌”。科布多各族爱国军民不畏沙俄的威胁，继续英勇战斗，殊死抵抗。一直坚守了几十个昼夜。直到8月6日，终因寡不敌众而全城失守。

科布多失陷，沙俄侵略军和外蒙新军强迫中国政府官员交出印信，随后又将博润和其余中国官员、士兵、内地商民七百多人强行押解出境。之后科布多惨遭屠城，拥有三千多人口的科布多，城内和平居民被屠杀的达半数以上。

血，鲜级的血！你是沙俄侵略军暴行的明证，你更是赤诚爱国心的泉涌。

三、“俄国人挑拨外蒙与祖国的感情，”
我们心里很难过”——车林多尔济“部长”如是说

1915年10月，中国驻库伦办事大员陈篆和驻乌里雅苏台等地的佐理专员到达外蒙任职。根据《恰克图协约》，1916年7月，在库伦举行了中国大总统册封哲布尊丹巴为呼图克图汗的典礼。

中国政府大员为恢复外蒙古同中国政府和内地人民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做了很大的努力。

1915年11月，在外蒙经商的内地商人在库伦成立了商务总会，1917年，为了整顿在沙俄控制下处于严重混乱的外蒙财政金融，在库伦设立了中国银行，之后又开辟了张家口到库伦的公路运输。

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少数叛国王公上层喇嘛，在外蒙古的广大人民和上层中，一直是很孤立的。库伦“独立”初期，就有许多外蒙的爱国王公上层亲自或派代表到北京，表示他们反对沙俄侵略、维护国家统一的诚意。哲布尊丹巴等人卖国投俄的一系列罪恶行径，都曾遭到许多爱国王公喇嘛的抵制和反对。在广大人民和爱国王公上层的强烈压力下，哲布尊丹巴被迫先后毒死了沙俄的忠实走狗杭达多尔济和那木囊苏伦。

沙俄的疯狂侵略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使外蒙广大人民和王公上层恢复国家统一的要求更加强了。同时，一些在哲布尊丹巴等人的极力怂恿煽动下一度赞助“独立”的王公上层喇嘛逐渐醒悟了。

1915年12月12日，外蒙“自治”政府的“外务部长车林多尔济曾私下对库伦办事大员陈篆说：“外人深忌中蒙接近，种种挑拨感情。所最难堪者，即诱引外蒙开罪中国，实非所愿”。

1916年1月，哲布尊丹巴和外蒙古“自治”政府在爱国舆论的压力下，派“司法部长”、车臣汗部盟长那旺那林和“军事副部长”札木彦多尔济等到北京，向民国总统和中国政府赠送了大批礼品，表示恢复国家统一的愿望。

中国政府和内地人民同外蒙古政治经济联系的恢复和发展，引了沙俄的极大不满。在册封哲布尊丹巴、设立中国银行、开辟张库公路和那旺那林前往北京等事情上，沙俄极力反对，百般阻挠。沙俄政府指令其驻库伦领事米勒尔警告外蒙“自治”政府，外蒙未经俄国同意而直接与中国政府发生联系，违反了外蒙对俄国的义务，如果再发生类似事件，俄国将不予支持和援助。米勒尔还说，那旺那林到北京后，如果与中国政府有所商谈，必须随时告知俄国驻北京公使。那旺那林等人到达北京后，沙俄驻华公使库朋斯齐一面极力挑拨中国政府和外蒙地方之间的关系，一面严密监视那旺那林等人在北京的活动。可谓费尽心机，劳顿筋骨。

沙俄的阴谋可以造成中国和外蒙地方的某些隔隙，沙俄的武力可以强占中国的某部分土地，然而他断难混灭中华民族的中国心。

四、“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
藏诸地为一国，即自汉、满、蒙、回、
藏诸族为一入，是曰民族之统一”——孙大总统的豪言。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所发出的庄严宣告阐明了维护国家统一，实现民族团结的严正立场，充分表达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心愿。

孙中山先生对沙俄帝国侵略中国的行径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以满腔的爱国主义热情大声疾呼，要组织五十万人的大军反击沙俄侵略者，收复失地。他慷慨激昂地说：“这个军队失败了，必须还要编成第二军。第二军也被打败了，兵数还要增加到三百万，非占领黑龙江以北和蒲里摩斯克不可”。说出了全中国人民与沙俄侵略者不共戴天，誓死战斗到明的决心。

当库伦宣市“独立”和签订“俄蒙协约”的消息传到全国后，举国上下舆论大哗，群情激愤，有如开锅。人们一致认为，这肯定是俄国人在里头捣的鬼。全国各政党、各团体、各族各界纷纷集会、游行示威，发表通电，怒斥沙俄帝国主义妄图吞并我国蒙古地区的侵略行径，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

北京，各界群众举行集会，愤怒声讨沙俄罪行。各种报纸大声疾呼：全国应该联合起来，以保护昔日中国在蒙版图。

上海、香港、烟台等地的码头工人拒绝装卸、搬运俄国人的货物。

汉口，俄商各砖茶厂中国工人，举行了同盟罢工。

各地群众纷纷抵制使用华俄道胜银行的纸币，拒绝向该银行存款。天津，人们手持华俄道胜银行纸票一齐涌向该行天津分行要求兑银。道路拥挤，门户堵塞。

北京，华俄道胜银行三天内就被提取现金二百五十万元，致使该银行所发行的纸币不能在市面上流通。

在全国人民抗俄呼声的推动下，民国总统也曾电告哲布尊丹巴，“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伊如一家”，“各蒙与汉境，唇齿相依”，“蒙古与内地、宗教种族、习尚相同，合则两利，分则两伤”，“切勿惑于邪说、贴外蒙无穷之祸”，并命令他取消独立。

蒙古地区广大爱国王公喇嘛和各界爱国人士，在国土丧失、民族危亡的严重时刻，也纷纷集会，痛斥沙俄侵略者的暴行和哲布尊丹巴的叛国行径，强烈要求取消“独立”，废除“俄蒙协约”。

在北京的蒙古王公喇嘛组织了蒙古王公联合会，外蒙古那彦图亲王任会长，积极开展抗俄爱国斗争。

蒙古王公联合会发布通告，严正声明：“中华民国建立以来，内蒙全部六盟及科布多、乌梁海、青海、新疆各盟，均经赞成共和，协同汉、满、回、蒙人民共建新国。惟外蒙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勾结图什业图（即土谢图）部落、车臣汗部落内三数王公，妄称独立；伪立政府。实则外蒙四部落其迤西两部落各旗并未赞同”。并郑重宣布，不承认库伦政府，伪库伦政府“如有与外国协商订约等事，无论何项事件，何项条约，自应一律无效。”

民国政府蒙藏事务局总裁、内蒙古喀拉沁郡王贡桑诺尔布，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指出：“蒙古王公多数反对《俄库条约》，其赞成之少数亦为俄国所胁迫，不得不然耳。总之，《俄库条约》损失蒙古领土，侵害蒙人自由，此吾人所得一德一心极端以图取消此约也”。

内外蒙古名地的爱国王公喇嘛和上层人士，也同全国人民一道投入抗俄爱国斗争。

1912年10月和1933年10月，哲盟十旗王公、札萨克在长春先后两次召开东蒙王公会议，强词五族共和的利益，警告库伦必须在年内取消独立。

1913年初，内蒙古西部二十二部三十四旗王公、札萨克，在归绥召开西蒙王公会议，愤怒声讨沙俄及哲布尊丹巴的罪行。会议一致决议“联合东蒙，反对库伦”，如活佛怙恶不悛，将对他采取军事行动。并强烈要求民国政府为保全国起见，赶快征派大军予以平息。会后，乌、伊两盟和萨克发表通电，要求立即废除“俄蒙协约”。通电声明：“库伦仅外蒙一隅，本不足以代表全蒙，哲布尊丹巴又系教主，更不能干预政权。乃敢背叛祖国，私与外人订约，殊属冒昧，本盟万无承认自取灭亡之理。现经本盟各王公，一再会议，……电请迅该外交部通知俄使，立废此约”。西盟王公札萨克还电告哲布尊丹巴，声明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立场。

伊克昭盟蒙古族人民传统的反帝反封建组织“独贵龙”，在其著名的首领锡尼喇嘛（即乌勒吉吉尔格拉）的领导下，积极投入了反对沙俄策划外蒙“独立”的斗争。当库伦宣布“独立”后，曾在“独贵龙”群众的打击下，被革职的乌审旗札萨克察克都尔色楞及其哈屯纳仁格日勒，勾结额尔敦仓、贡布扎布等贪官污吏，向该旗衙门呈文，要求响应库伦“独立”。经全旗文武官员会议，一致商决反对库伦“独立”，诚心拥护民国。察克都尔色楞等人的阴谋未能得逞。但是，他们仍私下串通，准备马匹，待机叛逃，投奔库伦伪政权，以效犬马之劳；他们还拟勾结外蒙叛军，劫走成吉思汗陵寝，以请功领赏。“独贵龙”群众闻讯后，当即捉拿谋叛罪魁纳仁格日勒、额尔敦仓等，令其交待罪行，索取供词，并在全旗游斗示众。伊盟盟长也在“独贵龙”的强烈要求下，会同该旗官员、审讯罪犯，分别轻重定罪惩办。鉴于启事罪魁纳仁格日勒已被“独贵龙”群众处决，不再追究；对于同谋额尔敦仓等革职严办，永不叙用，并交由所属管区严加镇慑，对于台市贯布札布，因已潜逃外蒙，充任伯政权官吏，待其返回，罪加一等，严予惩处。

“独贵龙”群众的这一抗俄爱国举动，沉重地打击了该旗图谋叛逃的一小撮反动上层，坚持了蒙古族人民反对沙俄策划外蒙，独立”的坚定立场。

中国人民的反帝怒潮汹涌澎湃，蒙古地区各国族人民抗俄斗争如火如荼。推动这场伟大斗争的巨大精神力量就是那不泯的中国心。

中国，心不泯！不泯，中国心！

第四节 肮脏的交易

一、这是谈判吗？

外蒙古的冬天来得很早，1912年10月的一天，库伦城雪花飘飘，放眼望去，一派冰天雪地，阵阵寒风袭来，吹得人透骨地凉。

哲布尊丹巴用过早膳，刚在自己的阅奏桌前坐定，“外务大臣”杭达多尔济就慌慌张张地频了进来。他向面前的这位“日光皇帝”匆匆而又一字一眼地报告了沙俄代表廓索维慈来到库伦十多天来的举措，以及和大“蒙古帝国”谈判俄蒙缔约的进程，特别是昨晚谈判的一幕……

为了进一步控制外蒙古，加速外蒙古的全面殖民地化，沙俄政府决定直接与外蒙古政府签订协约，造成外蒙“自治”的既成事实，迫使中国政府承认。

沙俄特任命前驻北京公使廓索维慈为与外蒙古“政府”缔约谈判的全权代表。

临行前，沙俄内阁总理柯科甫杰夫亲自到廓索维慈的官邸密议数小时，分手时，柯科甫杰对廓索维慈说了这样一番话：

“既然俄国以全力支持和援助了外蒙“独立”，甚至愿以武力作后盾，外蒙就必须满足俄国的各种特权要求，以报偿俄国的‘恩惠’，只有满足这些‘最低限度极客气之要求’，才能换取俄国的‘实力相助’。如果外蒙“政府”不答应俄国的要求。就将放弃对外蒙政府的支持和援助。”

廓索维慈望着钻进轿车，一溜烟消失在视野之外的柯科甫杰夫，心中有了老底儿，有了上方宝剑。这其中的真谛并不在那数小时的密议中，而恰恰是最后的这一番道白。此时此刻，廓索维慈不禁想起了中国的一个寓言故事：《画龙点睛》。

廓索维慈满脸横肉上的“五线谱”会心地荡漾起来。

1912年10月3日，廓索维慈带着沙俄政府事先拟好的缔约草案秘密来到库伦。

在举行谈判的前一天晚上，库伦“政府”把外蒙方面的缔约草案送交了廓索维慈。在不愿变外蒙古为沙俄殖民地的许多王公喇嘛的影响下，蒙古方面的缔约草案提出，沙俄不得在外蒙购买土地和经营高利贷生意，并说这种经营方法曾使外蒙

“大受其害”。

草案还提出了许多限制沙俄特权的要求。

就在廓索维慈接到外蒙方面的缔约草案，为外蒙的不知趣大发雷霆之时，又收到了沙俄外交大臣沙查诺夫的来电。电文大意是，俄方预先拟订的协约条款不能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动！

廓索维慈，这位在沙俄政府号称“横向外交家”的鼎鼎名人，久经无硝烟的战场，屡为沙俄立下奇功，他不能在俄蒙缔约上栽了跟头，不能将亨通的官运就此寿终正寝。想到此，廓索维慈涨红的横向上又暴出了条条青筋，他向来是一把常胜之刀，他已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刀又该用用了。

哲布尊丹巴听着杭达多尔济哆哆嗦嗦的报告，已明白了结局的一大半。

这位不可一世的“日光皇帝”当听到俄人对外蒙古的缔约草案如此不满时，他的屁股也坐不稳了，他非常清楚，没有沙俄的支持和操纵，他这个“皇帝”是一天也难以当下去的；他也非常明白，沙俄培植他，只不过是设下了一个傀儡而已。然而，在爷爷面前是孙子，而在众多孙子面前又是爷爷的心理，使哲布尊丹巴这位“日光皇帝”当了一天又一天。

哲布尊丹巴挥了挥他那只被数不清的信徒景仰无比的左手，打断了杭达多尔济的喋喋不休，一直默不作声的哲布尊丹巴猛然发问了一句：“昨晚谈判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杭达多尔济今天也不知犯了什么病，想说的没说清，不想说的却老也说不完。他被自己的“皇帝”这一问，才如梦初醒，是早该禀奏昨晚的事了。

一座并不算大的蒙古包内，灯火辉煌，七张拱圆形的桌子围成了一个椭圆形的会桌，会桌的一旁是两位高鼻梁、黄眼睛的洋人，其中的一位脸形别致，横向堆着不少；会桌的另一旁分明是三位蒙人，坐在靠左的一位架着一副金丝眼镜、颇有一股文人斯文气。

这里不是别处，正是以廓索维慈为全权代表的沙俄代表团和外蒙古“政府”谈判签订协约的场所，廓索维慈旁边的俄人是沙俄驻库伦领事刘巴，戴金丝眼镜的激人是哲布尊丹巴最钟爱的“大臣”（“内务大臣”）车林齐密特，另外两位是“内务总理大臣”即木累苏伦、“外务大臣”杭达多尔济。

这时，北辰星已升得不低了。

廓索维慈的总结性谈判发言语音未落，一向以斯文著称的车林齐密特再也难压心中多日的积急和怒火，蹭地站了起来，指着廓索维慈破口痛击。他大声疾呼：“现在所谓俄蒙条约，对于蒙人并无实利可言，只将蒙人置诸铁砧之上，铁锤之下，任意敲击而已”。“勒令蒙古无条件的接受俄国要求”，无非是欲“使蒙古成为布

哈拉和高而第二而已。”

由于太激动，车林齐密特的金丝眼镜斜滑到鼻梁上，他下意识地用手向上报了推，这一推，反倒使他平静了好多，他暗暗警告自己，不能发火，应冷静地表明自己的态度。想到此，他和刚才判若两人似地摔出了最后一句：“外蒙还是应该等待中国政府代表那彦图的到来，看看北京的意图。”

不听“北京”还好，一听“北京”二字，廓索维慈怒火中烧，若外蒙一听北京的意见，沙俄苦心经营多少年的辛苦和代价，将在他这个谈判桌上消灭掉，沙俄的帝国理想就成泡影，他本人的政治生命也就永远画上了句号。

一刹那，内阁总理何科甫杰夫的音容，外交大臣沙查诺夫的电文、近在腿尺的这位外蒙“内务大臣”的金丝眼镜和他一针见血的言语，一齐出现在廓索维慈的眼前、耳边，他象挨了一刀的凶狮，嗖地跳了起来，一边朝车林齐密特怒吼，一边一把抓起外蒙方面的缔约草案扔在地上。

那木囊苏伦、杭达多尔济一看大事不好，连忙上前劝慰廓索维慈。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廓索维慈当即拂袖而去。

哲布尊丹巴脸色越来越不好看，他恨沙俄的无理，更气他钟爱的“大臣”车林齐密特，对洋人怎么能那样说话，这不是成心在坏朕的江山吗？车林齐密特为外蒙“独立”东奔西走，日理万机，一枝笔足抵上万把毛瑟枪，朕知你功高盖世，封你高官厚禄、荣华富贵，而你，你怎么能和洋人吵架呢？外蒙“独立”离不开这些洋人啊！

事已至此，他这个一国之主必须果敢决断，再不能犹豫了，否则，后果不够设想。

内谱已定，他望了望一脸倦容、还在喋喋禀告的杭达多尔济，又是习惯性地用手一点，杭达多尔济嘎然止声。随后吩咐宫门的贴身宫人，取来了纸墨笔砚。

当天午前，车林齐密特接到了圣旨，上书一句：“特撤去喇嘛车林齐密特政府内务大臣的职务，钦此！”

1912年11月3日，那木囊苏伦等外蒙王公“大臣”终于在沙俄拟定的“俄蒙协约”及其附约“俄蒙商务专条”上签了字。

“俄蒙协约”规定，沙俄有保护外蒙“自治”、援助外蒙编练军队，阻止中国在外蒙驻军和移民的权利；外蒙保证沙俄享有附约“商务专条”中规定的各种特权，并保证其他国家在外蒙的权利不得超过沙俄，外蒙要同其他国家订立条约、必须事先经过沙俄许可，并以不违背此项协约及其附约为前提。

更令全世界震惊的是多达十七条的“俄蒙商务专条”。当时中国政府驻俄公使指出，“这将标志着中国在外蒙一无所有，并完全放弃领土。”主持公道的国际舆

论也尖锐地指出：“俄蒙商务专条注定了蒙古最后被吞并的命运”。

现将十七条的个别条目大意录于此，窥此足可见一斑：沙俄在外蒙全境任意居住、往来；任意占据、租借和购买土地，自由经营各种商业贸易。开办各种企业、事业；设立邮局、银行，免除所有贸易关税；无偿使用驿站驿马，无偿使用牧场，进行渔猎刈草；……

革命导师列宁在他的《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中愤怒地写到：“俄国同‘独立的’蒙古订立条约，唯一目的就是掠夺！”

二、“北极熊”和“日不落”创下世界外交史上的奇迹

沙俄策动外蒙古宣布“独立”后，激起全中国各族各界的强烈抗议，也遭到世界舆论的谴责。于是，沙俄帝国主义两手出击，一手给它卵翼下的“独立”外蒙古披上一层“自治”的外衣，伪装成是蒙古人民“自治要求”的产物，以欺骗舆论，逼使中国政府承认，掩盖其变相吞并的实质；另一手，沙俄四处活动，拉拢和勾结日、英帝国主义，企图使他们承认在外蒙的独占权益。这一手肮脏表现，最淋漓尽致致的要数北极熊和“日不落”的这一场了。

英帝国主义是世界上数得出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其殖民地遍及全球，号称“日不落”帝国。“日不落”归日不落，英帝国可不敢小瞧沙俄这只北极熊。

于是，1912年9月，沙俄同英国在圣彼得堡举行密谈。之所以言其淋漓尽致，是这次密谈创下了当时两国谈判史上的一大奇迹：整个会谈前后没超过十分钟，两家一拍即合。

沙俄承认英国在西藏地区的侵略特权，换取了英国承认沙俄对外蒙古的“保护”，以及在适当的时机，英国政府出兵强占中国西藏。

肮脏的交易，在北极熊和“日不落”的碰杯声中化作了白纸黑字的密约，化作了宰割中国人民的屠刀。

第五节 向内蒙古开刀

一、刺向咽喉的第一刀

沙俄在一手导演库伦“独立”以后，就唆使哲布尊丹巴以“蒙古君主”的名义写信给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的王公上层，鼓动他们响应库伦“独立”，脱离中国。哲布尊丹巴还派人潜入呼伦贝尔进行秘密活动。

就在哲布尊丹巴卖力鼓动呼盟“独立”的同时，呼盟已有一千名旗蒙兵武装了起来。

沙俄驻呼伦（今海拉尔）领事乌萨蒂操纵和指使额鲁特总管胜福、陈巴尔虎总

管车和扎和索伦旗总管成德等人调集附近各旗蒙兵一千人，用沙俄援助的五百校枪武装起来，以反对共和、组织“大清帝国义军”的名义紧锣密鼓地干起来了。

1912年3月14日，北风呼啸，雪花横飞，胜福派出的十人特别行动小分队，踏着积雪，神出鬼没地溜进了呼伦城的驻防军营。

他们到处散发传单，一时间搞得军营人心惶惶。后来，他们看到呼伦道台不敢把他们怎么样，干脆来了个明火执仗，聚众宣称：明天早八点蒙兵攻城，城内驻军商民应挂白旗，否则一律攻杀。

呼伦道台非常气愤，当晚传下命令，所有驻军一律进入戒备状态，炮兵随时准备反击！

夜半时分，沙俄领率乌萨蒂率领卫队，驱车直闯呼伦道台官邸，气势汹汹，公然扬言：“双方交战，炮弹若落入站界，即行调兵干涉。”

面对强大凶悍的沙俄，呼伦道台泪水只能往肚里吞，为避免惹起国际争端，被迫率军躲进东清铁路战界，并将情况火速电告黑龙江巡抚。

胜福骑着高头大马，第二天耀武扬威地率领蒙兵开进了呼伦城。当即宣告呼盟“独立”，并成立了隶属于库伦政权的“自治政府”。

哲布尊丹巴闻讯，大喜过望，随即授胜福为“参赞大臣”，作为“大蒙古国”驻呼伦的“总督”。

二、洋人辨洋尸

呼伦城的唾手可得，极大地滋长了胜福的贪心和胃口的储量。

在沙俄侵略军的支持和配合下，派出数百武装进兵胪滨（满洲里）。

骄兵必败。1912年3月2日，天刚麻麻亮，伪装成蒙古武装的一营俄军，伙同数百名蒙兵，从满洲里车站出发，突袭胪滨府。

驻守胪滨的少量政府军早就料到叛军会来突袭，所以格外戒备。2月1日，坚守了一夜的政府军，眼看天空放亮，正欲撤离。

突然，发现府外黑压压来了一片。等待了数日的守军，只待对方送上门来了。在指挥官的一声令下，四处开火，密集的子弹象倾盆大雨突泻而下，有的叛军还没来的及扣动扳机就被送上了西天。

经过数小时激战，敌军狼狈逃窜，在胪滨府前留下了一具具僵硬的尸体。

清理战场时，当地的英、德等国的记者闻信赶来，他们亲眼看到了四具特殊尸

体：黄头发、兰眼睛、高鼻梁、外裹一身蒙族服装。

一帮洋记者象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又是拍照，又是翻尸，这可能是职业记者要求新闻的准确性所致。良知不灭的众洋记者，离开现场时，满足了政府军官的一点要求，他们在尸体鉴定书上留下了一串串不同文字的签名。

虽然庐滨府激战胜利了，但呼伦这个张家口到库伦的咽喉要地却被沙俄操纵的外蒙古死死给掐住了。

三、砍断的第二刀

外蒙军队在内蒙古各地大肆骚扰，内蒙古人民度日如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中国各族人民和各界舆论强烈谴责，中国政府也多次与沙俄交涉，弱国无外交，沙俄根本不把中国政府放在眼中。

忍无可忍，中国政府遂命令热河、张家口、山西、绥远等地驻军随时准备反击。

1913年7月7日，外蒙军队凭借俄人指挥，又有俄军助阵，纠集二千余人，大举向归绥（今呼和浩特）进发，开始了刺向内蒙古的第二刀。

当日，归绥驻军主动出击，在黄沙图庙和外蒙军遭遇。巍巍大青山下，血流成河，横尸遍地，徒具虚名的外蒙军队被打得一败涂地，残兵败将纷纷逃窜，最后龟缩到厂汉。

归绥驻军乘胜追击，在厂汉激战四小时，直打得枪炮欲裂，血肉横飞。外蒙军队实难支撑，随即负尸狂奔，退却到举世闻名的佛教圣地百灵庙。

7月10日，归绥驻军又追到百灵庙，先用大炮轰击，又派步兵绕击其后，数名王公胸背受弹，恼羞成怒，竟一把大火把宏伟的寺庙殿宇付之一炬，价值连城的国宝就这样化成了一片废墟。

中国军民英勇反击战的胜利，大长了中国各族人民的志气，大灭了沙俄帝国主义的威风。为内蒙古的保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六节 唐努乌梁海在哭泣

一、美丽富饶的唐努乌梁海

在浩莽的外蒙古地区的西北部，北靠萨彦岭，南抵唐努山脉，两山之间夹有一个狭长的地带，这就是唐努乌梁海。

唐努乌梁海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世代相传居住在这里。远在汉代，臣属于匈奴的丁零人（丁零人准居在这一带）在唐代占铁勒部落联盟

（即丁零）中的都波人所居。（或称都播，也称土瓦）。公元 646 年（唐贞观二十年），都波和铁勒诸部落首领到吴州（今宁夏灵武）朝见唐太宗，表示愿“得天至尊”作唐朝局部的可汗，并请求设置唐官，将其地方设列州县。次年，唐朝在漠北广大地区设置府州，唐努乌梁海地区的都波部归渤海都督府管辖。辽金时期，先后为辽、金王所辖。1206 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以后，派长子术赤率兵征服了南西伯利亚各部落，其中的秃巴思部就是世代居住在唐努乌梁海的都波人。在元朝，归岭北行中书省管辖。明代蒙古瓦剌部和鞑靼部都统辖过这里。明末清初则为外蒙古扎萨克图汗部辖地。1686 年（康熙二十五年），清朝政府令尚书阿喇尼荏临承制，阿喇尼授扎萨克图汗和托辉特的根敦以扎萨克的头衔，管理唐努乌梁海。1865 年（康熙四十四年），根敦死后，其子博贝承袭唐努乌梁海扎萨克辅国公。

1727 年（雍正五年）中俄（布连斯奇条约）明文规定以萨彦岭为两国的分界，设立鄂博为界牌。1869 年经双方勘定又新立界牌鄂博八座，再次标明两国边界。清朝政府在唐努乌梁海地区分设唐努乌梁海总管和克穆齐克总管，并设置五旗四十六位领，统归乌里雅苏台定边左付将军管辖。

唐努乌梁海地区，四周山峦叠障，森林密布，适于狩猎。这里盛产珍贵皮毛，矿藏丰富，尤以产金著称；叶尼塞河发源于此地，其上游各个支流遍布全境，沿河地带土地肥沃，水草丰美，适于放牧和耕作。

这原是中国北部边陲一块美丽富饶的疆土。

乌辛斯克州，这个乌梁海的边缘地区，这里看不见惊险的悬崖峭壁。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翠绿清爽的植物、轮廓柔和的山岭，道路沿山谷蜿蜒迂回，两旁是徐缓起伏的山峦。一望无际的落叶松、白桦和稠李的翠绿幽深祥和。长得很高的青草、野花像厚厚的色彩鲜艳的绒毯铺展在树下。鸟儿鸣啭啁啾，彼此呼应。

肥沃的黑土地上有这样一个大村镇——图兰镇。镇上居民过着富裕而闲适的日子：土地想耕多少就耕多少，有两三匹马和四五头牛的庄稼汉就算是穷人了，小康之家都有四五十头牛和一二匹马。

高耸的林木丛生的山头，遮住了半边世界，绿茵如毯的草原向另一头无限地延伸开去，山崖下雷勃诺耶湖蔚蓝色的湖面光明如鉴，北岸中部湖尖处有一座颇大的石山高耸于水面之上，石山上用树枝搭成一个阿瓦神。湖的另一边，一座座帐包闪光耀眼，一群群数不清的山羊牛马在草地上吃草，草原的远方又是重重迭迭的山峦。湖面是那样平静，可爱。湖岸很低，满是小小的卵石。湖水的颜色不同寻常——碧绿中微泛灰蓝。你若脱衣下湖定有落到大海的感觉。透过水面那宛若珊瑚丛一般的藓苔清晰可见，即使在湖水深处也清澈见底，这些藓苔就大片大片地蔓生在湖底，时而呈深棕色，时而又显出浅绿。湖里的鱼鲜美极了！然而当地居民禁忌捕食，他们认为这里的湖是圣湖。

小叶尼塞河顺流而下，到维兰，这是小麦的王国，就土壤说，这是乌梁海最肥沃、最富饶的地区。

无边无际的荒漠平原在这里消失了，大地淹没在绵延不断的小麦、黑麦、大麻和黍稷的欢快绿波之中。有的地方可以看到瓜园，地上爬满卷曲的墨绿色的西瓜和甜瓜蔓。这里峡谷很多，有些峡谷里的小树林一直延伸出来，铺展成半圆形，快活地喧闹着。偶尔还可看到村庄。凡有青草和绿茵的地方，都有坎尔井。成群的大雁、野鸭和黄色的海番鸭栖息生活在这里。

大叶尼塞河谷与小叶尼塞河谷迥然不同。这里的山脉比较险峻，覆盖着连绵不断的古老的原始森林，各种野生动物出没其间。这个寒冷的地区是猎人们的宝地，但也完全会成为农耕者的宝地，这一带的许多谷地全是湿润的黑土，抓一把泥土准能挤出油来。

大叶尼塞河及其上游湖泊中，鱼非常多，因为居住在这里的索约特人不吃鱼，鱼儿们一直自然地繁殖着。

河岸上，长满了高大的白杨。这些杨树丛生在水边，然而忽高忽低的石崖脚下，在那没有一撮泥土、不长一颗青草的地方，竟然也有杨树从岩缝中生长出来！实在奇怪而有趣。

无论往哪里看，映入眼帘的只是环立于蓝天之下的山头。颜色有的暗红，有的微绿、有的金黄。山头之上，雄鹰在无垠的碧空盘旋。

时而有雁群和鸭群拍打着正在脱毛的翅膀，溅起一团团的水花，从岸边逃开。老的并不飞，而是浮水奔逃，其速度之快令人惊奇，小的则拼命跟上。

唐努乌梁海，是个神奇、宁静、美丽、富饶的地方。对于这样一块地方，沙俄侵略者早已垂涎欲滴，图谋攫取。自从有了沙俄的插足，这里的宁静便打破了，待到侵略者的铁蹄践踏过来的时候，这块美丽富饶的宝地便淌出辛酸的泪水。

二、“1 盒火柴=1 只羊”或“10 盒火柴=1 头牛”

——沙俄对乌梁海的经济掠夺

从十七世纪初，沙俄的侵略魔掌就伸进了唐努乌梁海。1616 年曾有沙俄哥萨克从托木斯克到萨彦岭一带窥探，接着沙俄派瓦西里丘麦涅茨和伊凡，彼得罗夫首次潜入唐努乌梁海地区进行活动。从 1634 年到 1666 年间，沙俄曾先后数十次派人到这里活动，企图拉拢当地一些封建上层归附沙俄。

沙俄侵略者在向该地区不断移民强占这里的土地、森林、水流和矿藏的同时也向这里输入商品，并采取不等价交换和欺骗性的高利贷活动掠夺财富，在其移民中培植地主和资本家，而把当地人民变成沙俄地主和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建立实质性的殖民统治。

最初，只是沙俄哥萨克在边境同当地居民进行零星贸易，每年最多不超过六千卢布。到 1840 年，俄商在唐努乌梁海地区的贸易额不断增长，每年达一万卢布左右。

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中俄边境实行免税贸易。西伯利亚俄商纷纷涌入唐努乌梁海地区。他们在这里建商站、修仓库、开店铺，俄商逐渐增多，并有部分定居下来。俄商在唐努乌梁海地区经营的行业达七十多种，1907年，俄商在唐努乌梁海的交易总额达二百万卢布，约占唐努乌梁海地区商业总额的一半。到1911年，整个唐努乌梁海市场都被俄商独占了。

沙俄在唐努乌梁海地区进行的不是贸易，而是掠夺。他们用布匹、烟草、斧头、菜刀、火药、火柴等小商品，不等价换取当地人民的牲畜、羊毛、兽皮、黄金等。

1小盒火柴换1只羊，10盒火柴换1头“托尔巴克”，即1岁的小牛犊，它是乌梁海主要的货币单位：在那里用羊、小牛犊“托尔巴克”，还有“领头的”公牛（4岁）进行计算。

当地居民索约特人酷爱和平而不好争斗。他们还特别喜爱赊购商品。俄商抓住他们这些特点对他们进行敲诈。俄商们想方设法把各种杂七杂八的东西尽可能多地赊给他们，因为索约特人在每个“苏尊”（乡）里都有连环保，过后，商人就通过官吏和诺颜向“苏莫”加价补利地索要全部债务。未能如期付款的欠债人连最后一只羊也被牵走，而他们自己还要在脊背上挨鞭子以向村社“补付”欠债。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有一位俄商分别赊给索约特人400包火柴，说好到春天索约特人向他交同样数量的小牛犊“托尔巴克”。

到了春天，这位商人来了，又分别赊给了一批货物，关于小牛犊“托尔巴克”的事却一字未提。索约特人也没有主动去提自己的债务，这商人就走了。

过了一年他又来了，关于小牛犊“托尔巴克”还是一字不提。最后到了第四个年头，他来了就说：“喂，老弟，把我的公牛给我赶来吧！”

“什么公牛呵？”索约特人惊奇地问，“我欠你的是小牛犊，托尔巴克”。

“喂！”狡猾的俄商慢条斯理地说道：“这位老弟怎么这么糊涂，三年前我买下它们的时候才是小牛犊呢，现在它们还能是小牛犊吗？我想它们已经长大啦！把四岁的牛给我赶来吧！”

索约特人提出抗议。于是商人向头人们去“说理”，那些头人左左为难，但迫于俄国人的压力，最后还是判定商人有理。

四百头上好的公牛就这样被讹诈走了。

这位“天才”的俄国商人把牛经由蒙古发送到伊尔库次克。这是一条牛群通常走的道路，三个月期间走的全是可以无偿使用的广阔牧场。到伊尔库次克时，牛都腰肥体胖，可以直接送屠宰场了。

在乌梁海俄国商品价格如何，看着下面这个事例就清楚了：在俄国一盒二百五十只的子母扣售价二十到四十戈比，在乌梁海，俄商按只数着卖给索约特人，十个收一张灰鼠皮，即三十五至四十戈比。

俄商通过这种不等价交换，获得了千百倍的利润，致使唐努乌梁海人民负债累累。牧民自己无力还债时，俄商就向其父母亲戚追索，若父母亲戚也无力代还，便由其部族抵偿。

在俄商的残酷榨取下，唐努乌梁海人民过着窘困不堪的生活。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阿努钦曾说过：“商人肯定可被指控为有意剥削不发达的邻国居民。他们用高价赊给这些居民质量低劣的商品，讨债时毫不留情，根本不想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只是企图更快地发财”。

三、“科学考察”——“依据”难产，——军事占领

1904年以来，沙俄总参谋部波波夫上校多次率众以“科学考察”为名，到外蒙古和唐努乌梁海地区进行军事间谍活动。

经过“考察”，他反复向沙皇陈述“迅速占领唐努乌梁海的必要性”。

他曾建议从乌里雅苏台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修筑一条马车道，与西伯利亚快路连接起来。沙俄总参谋部批准了这个建议。并且明确指出：“计划修筑的这条马车道必将有利于加强我们在乌梁海地区的影响，一旦与中国发生冲突也便于占领乌梁海，并将使我军的小部队更易进入蒙古，以便把从土尔莫斯坦和外贝加尔发动的更大规模的战役联系起来。”

1907年，沙俄政府派工程师罗杰维奇以勘察叶尼塞河流域啊源为名，进行军事侦察。

罗杰维奇经过侦察后，向沙俄政府内阁会议报告说：“乌梁海确实是俄中边境上抵抗力最小的一个点，但在这薄弱点的后面却是一个富饶的省分。如果中国开始对黑龙江一带地方施加压力的话，那么乌梁海地区就是适于俄国进行反击的地区，在这里可以花费最小的力量取得最大的成功。从米努辛斯克径由乌斯往乌梁海修一条设施完善的大道，同时在米努辛斯克再集结一定的兵力，就足以调整俄中关系，而且在必要时也可非常迅速地占领乌梁海。”

这个报告得到了沙俄内阁会议的极大重视。

1910年，沙俄总参谋部派波波夫上校率领“经济考察”远征队，再度入唐努乌梁海地区，进行了军事侦察。

为了给沙俄在唐努乌梁海的殖民活动作后盾，沙俄政府指定波波夫为国境委员，专门管理俄国与唐努乌梁海相毗邻的国境地带。

同年，沙俄派人偷偷拆毁了萨彦岭上的察布齐雅勒达坝界牌鄂博，中国政府向沙俄政府提出抗议，沙俄驻京公使廓索维慈竟说，中俄在唐努乌梁海的边界是尚未解决的问题。1869年所立界烤鄂博是不妥当的，俄国政府概不承认。……1911年初，沙俄政府的喉舌《新时代报》公然指出唐努乌梁海“当属俄境”。

沙俄外文部下令搜集“当属俄境”的依据。

沙俄驻华公使廓索维慈居然真的找到了一个“依据”。

那天，沙俄驻华使馆二等秘书阿布里科索大使档案库中找到几份文件。按照这些文件的说法，五十多年前，伊尔库次克总督手下的一个官员，在档案库里找到叶卡特林娜一世时代的一份文件。上面讲，唐努乌梁汗曾向女皇归顺过，答应每年送几张貂皮作为贡品。随着时间的消逝，汗也找不到，貂皮也没有收到，这块地方同蒙古其他地方一样，成为中国领土了。总督派遣这个官员到唐努乌梁海去，他在那儿发现几块石头的记号，可以作为证据，证明按照旧的边界，这块地方应该属于俄国。接着，总督就给彼得堡递了一份报告。沙皇批示说，决不允许这一块俄国领土归入中华帝国的版图。这份报告转到外交部，外交部怕引起麻烦，向沙皇作了些解释，整个事情便被完全忘记了。

公使大人廓索维慈听到有这个：发现就忙把整份文件要来连夜加以研究。

第二天一早，笑逐颜开地对阿布里科索说：“这份文件对实现我的打算，是极其理想的。”

廓索维慈得到这个“依据”，如获至宝，马上报告沙俄外交部和伊尔库次克总督，总督立即派国境委员波波夫上校赴北京。同廓索维慈密商。

在沙皇的指令下，沙俄政府召开了讨论侵占唐努乌梁海的内阁会议。会上研究了廓索维慈找到的所谓“依据”。结果大臣们失望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原有这些外交文件，是远在十八世纪时候的东西，对于要求乌梁海地区属于俄国，显然不能作为进行辩护的有力论据。

关于“依据”的争论整整进行了三个月也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1912年2月28日，沙俄外交大臣沙查诺夫向沙皇报告：“谨将驻北京代办豆月四日急件第8号呈请皇帝陛下御览，五等文官世清在情报中表示我们立即占领乌梁海区的益处，论证采取此种措施的理由时说，一方面我国对此一地区无疑有法律上的权利，另一方面顺在的政治形势适合这样做。对于上述两种情由的第一种，我认为有义务启奏陛下：波波夫上校证明乌梁海边区属于俄国的依据，波波夫本人也不认为是充分的和完全的，已被奥斯科总档洛库罗夫根据十八世纪初（约当我国和中国缔结布连斯奇条约时）的原件及地图材料得到下列结论：1727年由俄国和中国全权代表依布连斯奇条约所划界规定了沿萨摩岭线疆界。划界以后在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监督下绘制的边界地图对此也作了肯定。因此，必须承认俄国在乌梁海地区并没

有法律上的权利，而我们要占领萨彦岭至唐努乌拉山脉之间的土地的动机，可能仅由我们利益的观点才有采取此种措施的必要”。

沙皇却在这个报告上批示：

“恰好相反，我完全同意驻北京代办的意见，从讨论乌梁海地区问题以来，业已三月有余，中国发生了一些巨大的变化，我们必须更积极地解决这个问题，否则我们在中国边界上就得不到利益。请回忆一下我们占领阿穆尔边区的历史”。

瞧！沙皇尼古拉二世根本不管什么法律依据了，但是下决心要强占唐努乌梁海地区了。他所说的“利益”，就是要霸占中国的领土；他所说的“回忆，就是要用强占中国黑龙江以北广大领土的惯伎霸占唐努乌梁海。

四、漂亮“二毛”小姐的遭遇

沙俄强占唐努乌梁海以后，为了加强侵略势力，大规模地向这里移民，殖民洪流蔓延而来。1914年底，居住在唐努乌梁海的沙俄移民增加到一万二千多人，当地居民总共才六万人。沙俄移民局打算在未来较长的一个时期内，使俄国居民数量增加为1915年的十倍。

1915年，沙俄移民局的年度报告说：“我国新边区‘萨彦岭南的俄罗斯’的未来远景就是如此。富饶的乌梁海边区接纳了新移民之后，应该完全变成俄国的地方，因为俄国移民在数量上正在赶上土著居民，也许将来可能超过他们。”

这些披着移民外衣的入侵者，除了强行霸占唐努乌梁海人民的牧场和耕地，大搞物质资料生产，个个暴富外，还凭借殖民者之高位随心所欲地乱搞人口生产，演出了诸多人间的悲剧。当时，唐努乌梁海漂亮的“二毛”小姐成群降临人世，而残酷的人世却并不因“二毛”小姐的漂亮而使她们少受劫难。

阿尔戈里克河畔，位于五颜六色高人云霄的山岩中间垂直地劈开的一条五到十丈宽，而又曲曲弯弯的缝隙间，流水轰鸣不绝于耳，湍急的河水存流于岩行之固。在雷雨交加、春汛水涨的时候，这里的景色之美，非语言所能形容！

就在这美丽的河畔中游，有一个叫丘尔根的小村。村民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虽然个个头发蓬乱、面目漆黑，从不知洗澡是什么意思，但他们生活得恬静、安详、舒坦。

自众沙俄移民闯进他们的家园后，这里的一切都开始骚动起来，沙俄警察所长的喝斥、毒打、沙俄移民的抢夺马匹，任意杀食，沙俄军队的严兵守卡，所有这一切，对一向以忍耐著称的丘尔根村民来说还犹可说笑，而最不能忍受的要数沙俄移民对丘尔根人新婚“初夜权”的强占。

随着沙俄移民势力的骤增，沙俄人为所欲为的胃口愈来愈大，警察所长擅自作出一项决定，丘尔根人新婚之夜，新郎应退避三舍，由俄人充任。就为这项决定，

丘尔根人奋起反抗。而最终被逐出该地区，流落他乡的不计其数。

当时有个名叫宾宁格先的沙俄伯爵。带着妻子到乌梁海边区这一带地方来做蜜月旅行。这对新婚夫妇还带着哥萨克卫队以及厨师、家仆等一大帮人。这位伯爵路过丘尔根，嗅到了“初夜权”的腥味，竟一住数户，亲尝了十几次“初夜权”的滋味。

“初夜权”占有的后果。是给丘尔根人增添了为数不少的“二毛”小孩儿。说来也怪，这些混血种的“二毛”小孩儿又大都是女孩儿。

这些小女孩，一头金发，碧兰的眼睛，再加上洁白的肌肤，着实惹人喜爱。她们是无辜的，然而，她们哪里知道，她们的降生又意味着什么？

沙俄人纯粹是为满足殖民者膨胀起来的兽欲，对她们根本弃之不理，丘尔根人把“二毛”小女孩的降生当成家族、民族的一大耻辱，有辱历祖历宗，哇哇坠地后，有的即刻被扔到尿缸里溺死，有的被抛冤荒野，有的被当地的教徒收养，过着乞丐的凄惨生活。

偶尔生存下来的“二毛”女孩儿，处处低人一等，常常是十五六岁还不敢蓄发，甚至眼睫毛都要剪去。无辜的“二毛”女孩们就是在这种扭曲的氛围中艰难地步着自己的人生之路，年龄越大，心理压抑越强，不少漂亮的“二毛”女孩儿正是春意勃发、青春荡漾之时却走上了绝路，走到了另一个世界，永远永远离开了生她养她的人世……

五、苏联红军的“战果”

沙俄侵略军对唐努乌梁海人民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激起唐努乌梁海人民极大愤慨，他们对侵略者“侧足而立，道路以目”。唐努乌梁海人民和爱国的王公上层，热爱祖国，不畏强暴，进行了英勇的反抗斗争。他们多次以“暴力反对暴力”，“消灭和杀死那些最凶恶、最贪婪的剥削者”，“抢劫俄国商站”，要求重归中国。

1930年，唐努乌梁海人民喜出望外，苏联红军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唐努乌梁海，协同唐努乌梁海军民把沙俄残余白匪军统统赶了出去。几年的殖民地生活结束了，唐努乌梁海人民欢天喜地，在1921年，唐努乌梁海成立了土瓦人民共和国。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大沙俄主义的根深蒂固，1944年8月，土瓦人民共和国被迫并入苏联版图，中国历届政府未予承认。

第七节 峰回路转

一、活佛的毒药给谁服用

进入1915年后，中国同外蒙古的关系发生了“回复”性的变化，引起举世瞩目。这是由于俄国被牵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无力东顾，外蒙古当局岌岌自危。中国政府

采取了一些行动。

1915年10月，中国驻库伦办事大员陈萧和驻乌里雅苏台等地的住理专员到过达外蒙任职。

1916年7月，根据《恰克图协约》，在库伦举行了中国大总统册封哲布尊丹巴为呼图克图汗的典礼。

同年11月，在外蒙经商的内地商人在库伦成立了商务总会。

1917年，为了整顿在沙俄控制下处于严重混乱的外蒙财政金融，在库伦设立了中国银行，其后又开辟了张家口至库伦的公路运输。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16年1月，哲布尊丹巴和外蒙古“自治”政府在爱国舆论的压力下，派“司法部长”、车臣汗部盟长那旺那林和“军事副部长”扎木彦多尔济等到北京，向民国总统和中央政府赠送了大批礼品，表示恢复国家统一的愿望。

然而，逐渐醒悟了的外蒙民众和王公上层喇嘛是不满足于外蒙“自治”政府的上述举措的，他们要清算造成外蒙假独立，真傀儡的罪魁祸首。

在广大人民群众和爱国王会上层的强烈压力下，哲布尊丹巴被迫抛出了杭达多尔济和那木星苏伦这两个替罪羊，不过，这两只羊即使不替罪，也是罪大恶极，十恶不赦，别的不说，单就他们和沙俄私下进行的肮脏交易就足够了。

1912年底，杭达多尔济带领的外蒙“政府代表团”至达彼得堡。为了“奖励”杭达多尔济对俄国的忠诚，尼古拉二世把他“当作一个宫廷贵客招待，其在彼得堡之一切费用，皆由皇帝之私库支取”（引自当时的《国闻周报》）。

杭达多尔济飘飘然，欣欣然，在彼得堡过了数日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的“天堂”生活。纸醉金迷、神魂颠倒的杭达多尔济，在彼得堡期间，同沙俄签订了聘请俄国教官、组建伪蒙古族的特别协定；以外蒙各地金矿作抵押换取了沙俄的二百万卢布的贷款和一些武器装备。

祖祖辈辈留下的金矿，在杭达多尔济的谈笑声中，一下灰飞烟灭，全落在了沙俄人的手里，诸如此类事情，恐怕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也是稀有的。

再说说那木囊苏伦。1912年11月初，刚刚当上“总理大臣”的那木囊苏伦，就迫不及待地带领外蒙代表团”到达彼得堡乞求援助。

沙查诺夫在给财政大臣的信中十分露骨他说“必须利用三音诺颜汗到圣彼得堡的时候把他完全拉拢到我们这边来，以作我们在蒙古一切活动之支柱。……应该以二百万或三百万卢布的新贷款借给蒙古政府，……因为它能维持三音诺颜汗之地位——我们还十分需要这个人的帮忙。”

沙查诺夫的意愿在沙俄政府上下产生了共鸣。尼古拉二世先后两次接见了那木囊苏伦，并特意在豪华的宴会厅里，一本正经地授给那木囊苏伦一枚沙俄最高荣誉勋章——自鹰徽章。

受宠若惊的那木囊苏伦也大慷外蒙古之慨，乖顺地在“蒙古族特别协定”的续签合同上签了字。

在这个合同里，沙俄虽然答应给外蒙政府二百万卢布的新贷款、但是这笔贷款必须由沙俄财政顾问监督使用；并以外蒙的课捐关税收入做抵押。沙俄提出的聘请财政顾问合同规定，沙俄顾问除监督使用新贷款外，还有权管理外蒙整个财政事务，负责外蒙“国家”行政部门的改革，有权自行开办煤矿、电信等企事业。

从这个合同中，不可一世的哲布尊丹巴也深深地体味到了太上皇的厉害和儿皇帝的难堪。

替罪羊抛出后，按照外蒙法律，由哲布尊丹巴赐毒酒于杭达多尔济和那木囊苏伦。

据说，杭达多尔济服酒前，泪如雨下，感慨万千，发誓若有轮回，来世决不再戴乌纱帽。

二、彻底失去了保姆

俄国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俄国的专横统治。建立了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社会主义政权。而这种政权是站在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立场上建立起来的，因而与一切以封建主为代表的政权格格不入。

1917年2月开始，“自治”的外蒙古随着沙皇的倒台也失去了“保护者”。10月革命以后，“自治蒙古”的哲布尊丹巴政府，由于害怕苏俄输出革命，因而更倒向了中国的北洋军阀政府，同时也同日本帝国主义和帝俄的残余势力勾结，力图巩固“自治蒙古”的地位。日本帝国主义和帝俄残余势力试图取代沙皇俄国在蒙古的保姆地位，但这种地位却是非常脆弱和不稳定的。

“自治蒙古”本来是沙皇俄国趁中国满清政府崩溃之机，向中国政府进行政治要挟的产物。当时的中国政府由于面对国内的严重危机形势、几乎无力反击。在沙俄的压力下，北京政府在保证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前提下，允许外蒙“自治”。可以说，沙俄是“自治”蒙古的保姆，它一手控制着蒙古的政治、经济、外交事务，哲布尊丹巴政府只不过是沙皇俄国的傀儡而已。

而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对“自治”来说，好比是釜底抽薪。沙俄的倒台使“自治”蒙古丧失了自己的靠山，在社会各个方面丧失了依托。哲布尊丹巴面对这种突然出现的国际形势茫然不知所措。

“如果俄国的革命烈火烧到自治的蒙古，那我们就全完了！”哲布尊丹巴焦急

地对他身边的慕僚、封建主和僧侣领袖说，“俄国的十月革命，革的就是他们当中那些有权有势又有钱的人的命！他们新建的政权，全是为穷人说话的，象我们这些蒙古的王公贵族和喇嘛僧侣，肯定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不管怎么说，俄国人是再也靠不住了。”

站在旁边的沙皇俄国的领事对哲布尊丹巴鼓劲，他说：“阁下，苏维埃在俄国的胜利只是暂时的，请你不必担心。现在以恩琴将军为首的沙皇俄国的军队。仍然在同苏维埃的叛乱分子作战，我相信，过不了多久，沙皇的帝国会重新崛起。沙皇对蒙古的“自治”与“独立”也将竭尽全力。

哲布尊丹巴以感激的微笑看了这位已经丧家的沙皇走狗，并不冷不热地说：“多谢贵国的关照，只是面临这样严峻的国际形势，只怕沙皇的帝国再难有昔日的威严了。”

这时，默不作声的日本领事走过来，以一种傲慢而又温柔的语调对哲布尊丹巴说：“阁下高见，眼下沙皇的帝国已经不比昔日了，而蒙古的地位也处于危急的关头，如果弄不好，苏维埃的势力插入进来，只怕到那时，蒙古的王公贵族和喇嘛僧侣们的脑袋都督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早去哟！”

他一边说着，一边斜着眼睛看了一眼哲布尊丹巴的脸色。只见这位蒙古王公满面焦急的神色好象马上要大祸临头了似地。当这位日本官员向他说话的时候，他的脑子里闪现出了1914年私下给日本天皇的一封信。在信中，他请求日本天皇对蒙古的“独立”和“自治”政策表示支持。果然在第二年，日本就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其中要求把内蒙古东部变成日本的殖民地，也就是说，日本帝国主义成了“自治蒙古”的邻居。哲布尊丹巴对天皇的反应既怀着恐惧和戒心，又抱有感激和希望。所以，他对日本领事授以信赖的目光。

日本领事见他脸色较好，于是接着说：“依我之见，不如联合我日本、中国和沙皇帝国的残存势力。加上英、美、法等国的支持，共同去消灭苏维埃政权。”

“对，现在消灭苏维埃是我们共同的心愿。”中国的驻蒙古官员随声附和，“我们中国政府绝不允许俄国革命的种子撒在包括蒙古在内的中国领土之上！”

这位中国的外交官北洋军阀所委派，多少还有一点民族自尊。还记得蒙古本身就是中国的领土，因俄国的压力才迫使允许其“自治”。

哲布尊丹巴在这些建议面前终于作出了决定，联合沙俄残余势力。把日本、中国、美、英等国团结起来，抵制苏维埃对蒙古的渗透和入侵，同时巩固蒙古的“自治”地位。

三、中国军队重出外蒙古

这时的东北亚地区，成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同日本帝国主义，以及英、法、美、沙皇残余势力、中国北洋军阀和“自治”蒙古封建主的对抗的地区。日本想在这次

对抗中扩大自己在远东的战果，中国则想趁机把外蒙古收回，取消自治，重新画入自己的版图。而外蒙古贵族们在这种局势面前，不得不屈从中国，同时投靠日本。

1918年3月，中国军队有一营在外蒙古的库伦驻扎。这是“自治”蒙古哲布尊丹巴政府的不得已的抉择，也是“自治”蒙古第一次接受中国的驻军。一年半以后，北京政府外交部长发表声明：“鉴于1918年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传布和各地的骚动在西伯利亚造成的局势，中国不得不认真处理和北京安全有密切关系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库伦官方不但拥护中国政府的立场，而且坚持有派遣军队的必要。”而实际上，中国政府一直在找机会恢复在外蒙的主权，进驻库伦只是一个开始。”

4月5日，第一批日本海军陆战队在海参崴登陆，到了同年9月的时候，海参崴已经集结了日本军队10万多人。同时还有英国和美国军队。

这年秋天。远东地区的一沙俄军队在谢苗诺夫和卡尔米高夫的指挥下，靠着外国干涉军提供的物资和军火发动叛乱，推翻了远东区的苏维埃革命政权。逃亡在蒙古的许多沙皇俄国的贵族和军官都盼回到俄国境内，力图消灭苏维埃政权，恢复沙皇的统治。

“自治”蒙古见形势有所转变，就开始新的打算，想重温他们的祖先开创的帝国梦。

“有日本帝国的大力支持，我们一定能建成崭新的蒙古帝国！”一位被日本收买了的喇嘛教首领纳依赛格根说：“我们不应被中国的统治者捆住手脚，也不应被俄国的势力所压服。我们应该弘扬祖先成吉思汗的遗志，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在邻邦日本的协助下，重建自己的“大蒙古国”。

显然，这位天真的喇嘛教首领把中国、俄国看成是外蒙古的敌人，而把真正的敌人日本当作了朋友，甘心认贼作父，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

四、日本的险恶阴谋：“大蒙古国”计划

谢苗诺夫在远东地区的胜利，使日本、英美在苏俄的干涉军取得了初步的胜利。日本认为有机可乘，就打出了他吞并蒙古的王牌。

那天晚上，日本军阀头子小松井找到沙俄军队统领谢苗诺夫，向他详细地讲了日本的设想。谢苗诺夫开始有点犹豫，听着听着，逐渐眉开眼笑。

“谢苗诺夫将军，日本帝国十分赏识将军的才干。你面临国破家亡的紧急关头，挥戈剿匪，取得了远东地区的胜利，真是可钦可佩啊！”日本的小松井面带微笑地说。

“哪里哪里，这全仰赖贵国的大力协助和支持，多亏了小松井将军的坦诚相助啊！”谢苗诺夫被小松井的阿谀之词吹昏了头。

日本的小松井立即正色说道：“眼下苏维埃政权时刻准备向东方进兵，而将军身后无强有力的后盾作支撑。中国又时刻想把外蒙古归入他的版图，不知将军有何打算？”

谢苗诺夫答道：“这个么，本人还不曾有过考虑。不知将军你意下如何？”

小松井见谢苗诺夫的反映正中下怀，心中暗暗高兴。他一本正经地向谢苗诺夫说：“将军有所不知，我日本帝国乃仁德宽厚之国度，一心想扶持东亚兄弟国家摆脱贫困，实现富强，所以想借将军的威望，组建“大蒙古国”，把布列雅特蒙古、内蒙古、外蒙古、巴尔虎、青海以及其他蒙古民农居住的地区联成一片，建立一个大统一的国家。不知将军是否愿接受这个请求？如若愿意，我将代表日本政府向将军致谢！”

日本军阀本来想吞并中国北部的大部领土，但是，由于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绝不会允许日本的野心得逞，所以日本把自己的侵略计划伪装起来，打扮成扶助东亚蒙古走向独立的天使。所以，当小松井向谢苗诺夫谈到自己的计划时，象是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一样。谢苗诺夫受到日本方面这样的器重，当然喜不自胜。不过，他又不无忧虑地说：“这个计划好倒是好，只怕蒙古的贵族和平民不肯接受。”

松井笑着说：“将军尽管放心，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他于是从内蒙古收买了那位显要的喇嘛教首领纳依赛格根和几位俗家的封建主，还有其他地区的几位蒙古族野心家，依靠他们的力量兴起所谓的“泛蒙古运动”。

假如这个计划成功，可以想象出，日本是最大的受益者。一大片广阔的领土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这片领土以几千公里长的界线从东南包围苏俄，从西北包围中国，使日本可以稳坐在亚洲的中心，各地的矿产、能源和物资，可以源源不断地流往日本。而中国则无疑是最大的受害者，尤其是很早就属于中国管辖的蒙古族兄弟。

令人高兴的是，“泛蒙运动”只是日本军阀和部分蒙古族败类的一相情愿的想法。日本军阀想利用谢苗诺夫作挡箭牌吞并北亚的“大蒙古国”计划遭到外蒙古哲布尊丹巴“政府”的反对。哲布尊丹巴不敢参加“泛蒙古运动”，怕会引起中国政府的武装干涉。同时也怕“泛蒙运动”削弱他自己的地位。

中国政府得知这个计划以后，坚决反对这个运动。并以此为理由增强了在“自治”蒙古的驻军，到1919年，把驻军增加了好几倍。英国、美国 and 法国也反对日本的这个狂妄的计划。谢苗诺夫也在内部的矛盾冲突中不得不放弃这个打算。这样，“大蒙古国”的梦想还未出生，就流产了。

“大蒙古国”计划的流产，对气焰嚣张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来说，算是迎头一击。日本侵略的爪牙在中国的上空飞舞，但他的力量还不足以把中国击溃，所以，他采取在中国扶持军阀走狗的方式来控制中国。这时，他选中了安徽系军阀段琪瑞。日本军阀通过段琪瑞政府，想得到他通过谢苗诺夫所没有得到的东西。这样，他既不必背负干涉外蒙古事务的责任，同时还能在外蒙古捞到同样的好处。所以日本转而支持中国政府占领外蒙古，并要求中国政府保护日本在外蒙的利益。

经过这些风波，外蒙古那些企图闹独立的人再一次以失败告终。外蒙古“政府”也意识到日本吞并蒙古的野心，所以，他决定同中国北京政府谈判，有条件地取消蒙古的“自治”，重新恢复中国在外蒙古的主权。

五、浪子回头

自 1912 年清帝退位以后，哲布尊丹巴集团一直想谋求外蒙的“独立”，这是中国政府坚决不答应的。经过中国同俄国政府的交涉，终于答应了外蒙古的“自治”要求，但同时强调，外蒙古仍然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实际上，外蒙古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大权都落入了沙皇俄国的手中。沙皇俄国成了外蒙古“自治”政府的保姆，哲布尊丹巴成了沙皇的傀儡。

十月革命以后，沙皇俄国土崩瓦解，自治蒙古成了没有保姆的孤儿。经过一番周折，最后终于决定取消自治，回归到中华民国的怀抱。

哲布尊丹巴在对他身边的蒙古封建主和喇嘛教首领宣传自己一的主张时说道：

“各位蒙古的同胞们，几年以前，当统治我们近三百年的清朝崩溃以后，我们曾力图获得自主权力，脱离中国的中央政权。为此，我们不惜向沙皇俄国和日本求援。但事情的结果却并不理想。日本还无力与中国以及国际压力对抗，而俄国则为了它自己的好处，不愿意让外蒙古脱离中国而独立，只要求我们在中国的范围内，实现自治，迫不得已，我们走上了自治的道路。实际上，自治蒙古的内政与外交基本上都是依赖俄国进行的。现在，俄国爆发了革命，建立了什么苏维埃政权。他们翻想天，把俄国的贵族们杀的杀、赶的赶，闹得一路糊涂。这种赤化的思想也随时威胁着我们的生命、财产的安全。为了防患于未然，抵制苏维埃的革命在蒙古中间传播。我们只有与中国政府联合，取消自治，共同建设新的蒙古。因此，我们有必要同中国政府谈判，以讲好取消自治的条件。”

他的主张得到了蒙古上层阶级的支持，他们认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必须防止赤化的思想和活动，所以取消自治回归中华民国是巩固他们地位的最好选择。

1919 年夏天，库伦城凉风习习，景色宜人，中国政府驻库伦总督陈毅同“蒙古自治政府”哲布尊丹巴开始谈判。陈毅劝其自动放弃“自治”而服从中国政府的领导，中国政府则答应给封建主阶级保留一切特权和优待。自治政府却一再刁难，这样，开始了长期的讨价还价。谈判异常艰难，气氛很不融洽。

谈判讨价还价的中心是关于交出 1911 至 1912 年阿拉特大众所占阵地的条件。

以巴特玛多尔济为首的“政府”向陈毅取得了有利于哲布尊丹巴、寺院、王公以及其他封建主的一些让步。陈毅有意用和平的手段来埋葬“自治”，他力主妥协解决这一问题。

长期的拉锯谈判，终于出现了一个文件：“改善蒙古未来地位的 64 条”。其主要条款如下：

（一）、蒙古自治政府“自动”取消；（二）、蒙古受中国驻库伦总督及驻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和恰克图的副总督管辖；总督及副总督的助理均由蒙古王公充任之；（三）、中国不向蒙古移民；（四）、恢复汗、王、公及台吉等的俸禄；此外，规定上层喇嘛及哲布尊丹巴本人的薪俸；赴京领薪的规定被取消，薪金在当地发给；（五）、封建主向阿拉特牧奴征收年贡及一切其他捐税，令其服劳役的权利全部保留；（六）、准许外蒙王公领主派遣代表出席中国议院；（七）、哲布尊丹巴保留大汗称号，每年大汗为自己及其妻领取薪俸白银 6.000 两；（八）、中国驻蒙古军队的费用由阿拉特负担。

文件一出笼，即刻被 1919 年 7 月召开的“咨询议会”否决。“议会”对别的条款甚感满意，唯独不同意取消“自治”

为此，哲布尊丹巴和“议会”翻了脸，他满心清楚，有这 64 条，取消“自治”实属虚名，而这 64 条对外蒙古的王公上层有说不尽的好处。于是，“议会”立即被解散。

与此同时，苏维埃红军向远东进军取得了不断的胜利，迫近俄中蒙边境。日本为了获取在蒙古的好处，也极力支持段琪瑞政府解决蒙古问题，驻军库伦。因此，当陈毅的协商政策在外蒙古受到反对的同时，中国政府决定尽快解决外蒙古问题。

1919 年 11 月，西伯利亚的寒流裹着北国的黄沙滚滚南下，把大地变成飞沙走石的世界。初冬的萧条带给人一种逼人的杀气。整个世界似乎都被这股杀气压得喘不过气了。中国大地上，军阀割据，混战不止。搞得民不聊生。但为了争取外蒙古的主权，中国政府毅然授命能干的徐树铮将军进驻外蒙古，以迅速解决蒙古问题。

第八节 徐树铮快刀斩乱麻

一、“小扇子军师”徐树铮

在中国近现代史的风云人物中，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段琪瑞，而世人却不知段氏的一系列重大措施，均出自一人策划，段氏对此人近乎言听计从，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在民国历史的几次重大转折关头都留下其深深印迹，尤其是在处理举世震惊的外蒙古“自治”问题上力创奇迹的徐树铮。

徐树铮字又铮，江苏省萧县（今属安徽）人，生于 1880 年 11 月 11 日（清光绪六年十月初九）。他的父亲徐忠清是拔贡生，一生以教书为业。

1892 年徐树铮十二岁时中了秀才，十七岁到南京考举人，没有考中。1901 年冬，他到济南上书山东巡抚袁世凯，企图由此谋取出路，不成功，却无意中结识了段琪瑞，受其赏识，当了书记官，从此成为段的亲信人物。

1905年由段保送去日本士官学校，两年后以第七期步兵科毕业。回国时，年方二十七岁，入段幕府，运筹帷幄，青年“得志”，十分自豪。先后任第六镇军事参议，第一军总参谋。

1917年春，黎、段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徐树铮代表段到徐州，极力煽动张勋反黎。5月，黎下令免段职，徐即以同意清朝复辟为诱饵，策动张勋于7月1日把黎元洪赶下台。事后，他又以“讨逆军”总部参赞的名义，追随段讨平了张勋复辟。接着，直系军阀首领冯国璋继任总统，皖系军阀首领段琪瑞仍以国务总理的名义掌握北京政府。8月徐又被任为陆军部处长。

徐树铮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植，在当时的政局中，纵横挥洒。他于1918年初到奉天勾结张作霖，自任奉军副司令，随奉军入关，压迫冯国璋同意对南方“护法”军作战。3月，冯国璋被迫再度任命段琪瑞为国务总理。徐和王揖唐等人组织“安福俱乐部”，收买政客，操纵选举，包办新国会，把持北京政府。徐又谋杀了在直系中策划主和的陆建章，拉拢直系军阀曹錕，进攻南方。

徐树铮的所作所为，给当时的政坛影响颇大，故有了“小扇子军师”之称。然而，谋杀陆建章，却给他埋下了杀身之祸。1925年12月四日，徐树铮在京见段琪瑞后赴上海。冯玉祥对徐树铮谋杀其有知遇之恩的内姑丈陆建章早已怀恨在心，当时政治冲突又趋尖锐，遂密令部下，于30日晨当徐乘火车到廊坊车站时，把他逮捕枪杀，这是后话。

徐树铮一生的所作所为，至今在人们心中留存的恐怕微乎其微了，但是，他以超人的手腕，在处理外蒙古“自治”这个相当棘手的问题上，所创造的惊世骇俗之举却永载人史册，不会磨灭。

二、奇迹是这样创造的

徐树铮将军带领自己的嫡系部队，浩浩荡荡地向库伦进发。所到之处，彩旗招展，锣鼓喧天，大有当年左宗棠出兵新疆的气势。经过几天的急行军，徐树铮赶到库伦。一见到陈毅就大发脾气，对64条大加指责，说陈毅是“捧着银碗讨饭吃”，因为库伦有六千中国驻军。

次日，徐树铮将陈毅革职，令其12小时内离开库伦回京。随后，徐树铮把驻库伦的所有中、高级军官速速召到自己帐里，慷慨陈词，申明大义。徐树铮这张天生的利嘴，再加上他饱经沧海，博古通今，一阵演说还真把在座的所有军官给感动了，会场气氛异常激动，群情振奋，纷纷请战。

徐树铮一看火候到了，趁热打铁，发出道道命令。

这命令中，有两条是死令，完不成任务的必斩无疑。一条是把“内阁总理”巴特玛多尔济请来，一条是包围博克多格根的宫殿及几位重要王公的官邸，把他们牢牢软禁起来。

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徐树铮的这一招还真灵！巴特玛多尔济被“请”到徐树铮帐篷里时，浑身哆嗦，说不出一句话来，徐树铮说：

“巴特玛多尔济阁下，本人此次受中央政府委派，专程来解决蒙古问题。以前，总督陈毅大人曾跟你们商议过此事，但遗憾的是未能妥善解决，故民国大总统特派我来查问此事。中国有句老话：‘敬酒不吃罚酒’。面对国际国内形势，我希望巴特玛多尔济大人以国家大局为重，弃小利而全大义，自动宣布：你们自愿无条件放弃自治，并请求将外蒙古收归中国版图。限你一天之内，立即呈递由哲布尊丹巴签署的呈文。否则，格杀勿论。”

徐树铮将军的这通最后通牒式的话，吓得巴特玛多尔济浑身直哆嗦。急急忙忙逃回到政府办公室，谁知徐树铮将军早已派兵包围了哲布尊丹巴的宫殿以及大臣的官邸，把他们通通都软禁起来。

巴特玛多尔济见此情形，更是六神无主，不知所措。连忙请求哲布尊丹巴作出决定。哲布尊丹巴气愤地对他说：“哼，当初我劝大家听我的话，自动取消自治，那还可以保留我们的各种经济利益。可是你们这些混蛋拒绝接受我的主张，结果怎么样，招来了杀身之祸！活该！”

哲布尊丹巴用眼睛瞪了巴特玛多尔济一眼。接着说：“事已如此、只好听天有命。我们还是立即签署命令，无条件地取消自治，接受中华民国的领导吧！”

这句话象一颗定心丸，使巴特玛多尔济重新来了精神，他激动地对哲布尊丹巴说：“大人高见，小的立刻就去照办。”

1919年11月17日，巴特玛多尔济向徐树铮将军递交哲布尊丹巴及其政府各委员签署的呈文，声明自愿无条件地放弃自治，并请求将外蒙古收归中华民国的版图。

五天以后，即11月22日，徐树铮将军公布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公告：

“鉴于外蒙古自治政府声明，愿无条件放弃自治，归国中华民国的领导，本大总统深感欢欣，并诚意接受，同时，满足外蒙古原政府首脑哲布尊丹巴及各王公的要求，把外蒙古重新归入中国的版图。”在库伦设立中华民国西北筹边使公署，归徐树铮将军节制。

错综复杂，悬而不决的外蒙古“自治”问题，在徐树铮这位“铁腕”手里，好象玩了个小球似的，痛快淋漓地得到了解决。

这里有必要提及的是，在解除蒙古军队的武装时，竟也没费吹灭之力，“自治”蒙古当局顺溜溜地交给了徐树铮九千余枝步枪、五尊大炮、十挺机枪及大量炮弹与子弹。

这在常态下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但这却是实实在在的事实。其中的无穷奥秘至今仍是谜，有待历史学家和关心外蒙古的仁人志士们去努力发掘吧！

外蒙古独立内幕（6）第五章 重温帝国梦

第一节 革命党投靠苏俄

1919年夏季，列宁领导的苏俄红军向高尔察克政权和远东的日、美、英等国的武装干涉军发起反攻。红军战士怀着拯救祖国的高昂激情，在人烟稀少的广阔的西伯利亚原野上勇猛战斗，终于巩固了苏维埃在东部的政权。

苏俄红军在远东的胜利无疑象一记闷棍，击散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企图侵吞远东领土的美梦。英美等帝国中义国家再也不敢小看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了。

苏俄军队节节胜利的消息不断在外蒙草原上传播着，蒙古包里，人们在议论着、热烈地争论着。人心浮动了。

此时。苏俄解放贫民的思想开始波及外蒙，大批早先流亡到外蒙古，深受苏维埃革命思想影响的俄国工人和知识分子，四处奔走，积极宣传。

苏维埃革命思想渗透到了中华民国的外蒙古地区。

1、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

1893年2月2日，外蒙古首府库伦东郊的买卖城（题名阿木古郎巴托尔），降生了一上婴儿，此人就是后来成为红色外蒙古首脑的苏黑巴托尔。

苏黑巴托尔的父亲是一位贫穷的阿拉特牧民，在苏黑巴托尔五岁时，为了养活一家老少，不得不举家迁往库伦。那时，大清帝国的统治已是气息奄奄、日薄西山。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政府元气大伤，为了维持摇摇危坠的统治，把危机转变成对内残酷的钳制和剥削。《马关条约》签定以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沙皇俄国野心勃勃，一心想把中国的外蒙古和东北居为己有。在沙皇俄国的挑拨下，一小撮外蒙贵族蜕变成成为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蠢蠢欲动。库伦成为一个矛盾冲突非常激烈的城市。

苏黑巴托尔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家庭的贫困迫使他从小就出外谋生。14岁时，他被雇到库伦至恰克图的驿道上当了一名马夫。亲眼目睹了清庭官吏腐化糜烂、穷奢极欲的生活，也亲身感受到外蒙古封建主、喇嘛教首领对下层阿拉特牧民的剥削。后来，苏黑巴托尔到库伦当短工，利用空闲时间，坚持不懈地学习了蒙古文学。

1912年，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满清皇帝在一片讨伐声中惊恐地宣布退位。外蒙古震动了，各种道听途说的传闻，街头苍尾的谣言到处流行，深夜的草原上，再也听不到马头琴弦哀伤的旋律，只有从蒙古包里传出的

切切私语。这一年，19岁的苏黑巴托尔参加了“自治”蒙古军。

苏黑巴托尔当兵不久，即被派到俄国人主办的士官学校学习，出来后当上了骑兵连长。那时，外蒙古的封建主中，一小撮分裂主义分子头脑发热，急不可待地企图凭借沙俄的扶持搞分裂，在遭到拒绝后。他们私自组建军队，力图同中央政府对抗。苏黑巴托尔曾多次参加同日本人扶持的巴卜札卜军队的作战，在战斗中表现出勇敢和机智的才能，获得了几枚奖章和巴托尔以士（勇士）的称号，该称号后来甚至成为他的名字的一部分。

苏黑巴托尔在军队里，接触到了苏维埃的思想。当时，在“自治”蒙古军里，有几个同情革命、同情苏维埃政权的俄国‘教官’和“顾问”，苏黑巴托尔从他们那里多少了解到一些有关俄国革命运动的情况，来自北边的那场革命激发了苏黑巴托尔的反叛精神。而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和残暴，更加速了他思想上的转变。

1918年底，苏黑巴托尔回到了库伦，在一家印刷所当排字工人，苏黑巴托尔的生活十分艰难。却很讲义气。因此，很快就有一帮穷哥们聚集在他周围，慢慢形成了第一个革命党小组。这个小组还仅仅是一个萌芽，在思想上、组织上都还不够成熟。

另一位红色蒙古的首脑名叫乔巴山，1895年2月8日出生在车臣汗部（即现在的乔巴山省）克鲁泡河畔一个贫穷的阿拉特浩尔勒的家中。和苏黑巴托尔一样，乔巴山的童年十分艰苦，由于家境清贫，乔巴山的母亲只得忍痛把他送进了喇嘛寺院。乔巴山在寺院里忍饥挨饿，熬了两年，便从那里逃了出来，那年他才17岁。

1912年，乔巴山流落到了库伦，在经历过一段辛酸的生活之后，进入“自治”蒙古“外交部”附设的一所学校读书。乔巴山学习很刻苦，1914年，他被送到俄国伊尔库茨克，接受了俄化教育。在伊尔库茨克期间，正值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是一个风起云涌、险象环生、天崩地裂般的年代。战争激化了俄国境内的阶级矛盾，俄国爆发了革命，沙皇的统治象建筑在沙丘上的房子禁不住劲风的呼啸，转瞬之间便土崩瓦解了。苏俄革命给了乔巴山异常深刻的影响，他从对苏维埃政权及思想的了解向往开始，进而产生了投身革命、解救被剥削阶级的愿望。

苏俄十月革命后，乔巴山回到了外蒙古。那时，“自治”外蒙古的地方统治集团，由于惧怕革命，阴谋闹分裂的态度有所软化。乔巴山目睹统治者的腐朽和下层民众普遍的不满心态，敏锐地意识到这是社会行将发生重大转折的良好契机。他四处活动，把和自己有相同愿望的人聚集在一起，逐渐形成一个革命小组。乔巴山深知自己的力量是单薄的，设法同中国北洋政府抗衡，他决定同苏维埃俄国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并成为分裂外蒙古的又一段势力。他们所依赖的力量同博克多格根提出的“自治”主张一样，都源于北方，只不过博克多格根依靠的是沙皇俄国，乔巴山依靠的是苏俄。

2、革命党的诞生

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面对外蒙古急剧变化的形势，受苏维埃俄国的影响，都意

识到需要一个强大的领导核心来组织外蒙古的，群众。他们开始了建党的筹备活动。苏、乔二人的活动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博克多格根政府把外蒙古出卖给了中国的北洋军阀政府，北洋军阀想侵占外蒙古，取消外蒙古的自治权。所以，必须组织外蒙古民众反对中国军阀分子的侵占，寻求“独立”的外蒙，并获得苏维埃俄国的支援。

1919年秋天，国内取消外蒙古自治的呼声日益高涨，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加紧了活动。这一年，苏、乔二人首次见面，经反复磋商后决定两人领导的小组进行合并，形成统一的革命组织。年底，当徐树铮将军用武力解决了外蒙古问题时，他们开始向中国政府靠拢，但中下层封建主的要求和愿望却受到忽视。

苏黑巴托尔决定到苏俄去，寻求苏俄的支持。1920年初的一天，风沙滚滚，遮天闭日，苏黑巴托尔企图利用恶劣的天气作掩护，越境进入苏俄，结果在中俄边境被忠于徐树铮将军的部队哨兵发现并扣留。经过一番周折，苏黑巴托尔才得以逃脱。

不久，外蒙古自治宣布取消。徐树铮遵照中国政府的指示，封闭了外蒙古“自治”时期的“政府”机关。免去了“自治政府”的官员，并解除了“自治”蒙古军的非法武装，官兵一律被遣散还乡。完全按照中国行省的方式来管辖外蒙，这一点并不是明智之举。此时，苏俄红军正乘胜向远东挺进，解放了一座又一座城市。1920年1月7日，红军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城全歼了高尔察克残军。

苏俄红军在远东的胜利给情绪低落的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注入了兴奋剂似的，他们苦口婆心地恳求共产国际协助他们成立自己的革命政党，以领导外蒙古的革命。1920年6月，在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的倡议下，革命小组通过了建立党组织的决定。此后，他们不仅同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还同苏俄政府秘密来往。显然，从今天国际准则来看，插手别国事务，煽动他国内部矛盾，显然是不合伍的举动。但当时腐败无能的北洋军阀政府却对此一筹莫展。

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的首要目标便是肃清外蒙境内的“敌人”，即中国政府在外蒙的军队和拥护中国政府的博克多格根集团，修正外蒙地方政府的内外政策。这些主张明确把反对中国政府作为首要目标，暴露出分裂中国、寻求外蒙古“独立”的企图。

外蒙古革命党的口号和主张，显然违背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危害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外蒙古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不可侵犯的一部分。清末，外蒙封建主曾提出过“独立”要求，遭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一致反对。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曾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身份致电外蒙古王公贵族，要他们放弃“独立”要求。沙皇俄国迫于中国政府的压力和世界各国的反对，亦不敢公开支持外蒙古独立，只是实现了外蒙古名义上归属中国实则是俄国附庸的“自治”。现在，博克多格根的“自治”主张象泡沫一般破灭了，这些亲苏俄分子急不可耐地挑起了“独立”的旗帜，企图利用苏俄的力量达到外蒙“独立”的目的。

3、投进苏俄的怀抱

1920年6月间，以乔巴山和苏黑巴托尔为首的两批代表，先后从外蒙古的库伦出发，秘密潜入了苏俄境内。两批人马的目的相同，都是为了寻求到苏俄的干涉。

代表们一路上躲躲闪闪，行踪诡秘，生怕被徐树铮将军的哨兵发现而掉脑袋。经过一番周折，乔巴山和苏黑巴托尔在苏俄境内的土乌丁斯克城相会。

两批代表汇合在一起，衣衫槛褛地来到了土乌丁斯克城的苏俄地方政府机关大楼。一位身材矮小却很健壮的俄国人接见了他们。

乔巴山用流利的俄语向俄国人介绍了外蒙古的状况，最后十分激动地恳求：“请帮助我们去解放外蒙的劳苦民众，我们非常需要你们的支持。”

这位苏俄地方政府要员的态度十分谨慎，他客气地说：“我们远东共和国非常想帮助我们的邻居（指外蒙古）也建成社会主义，可是，我们的力量十分虚弱，无论是从物质上还是军事上，都很困难。”

他建议乔巴山和苏黑托尔前往莫斯科，直接向苏俄政府求援。

外蒙古代表团受到冷落，一部分代表气馁了，封建官僚出身的鲍陀、丹增抱怨：“我们作中国的贵宾不好，干吗要跑到这鬼地方来受人冷落呢！”

一部分代表附和鲍陀、丹增，反对以革命组织的命义向苏俄谋求外援，他们吵吵嚷嚷要返回库伦；主张继续和中国保持某种联系。

但乔巴山和苏黑巴托尔没有动摇，他们坚持继续北上，不达目的尝不罢休。经过数天激裂的辩论、争吵、谩骂甚至拍桌子，乔、苏的主张开始占上风。于是，代表团被分成了三个组：一个小组北上莫斯科，游说苏俄政府，另一小组返回库伦，在外蒙加紧鼓动宣传，乔巴山和苏黑巴托尔担心回去有危险，就留在伊尔库茨克城，从境外领导外蒙古，并与赴莫斯科代表随时联系。

到莫斯科去的代表手中拿着由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起草的信件。信中说：“我们蒙古人民党的同志以人民的名义向伟大的俄罗斯请求援助。我们和我国服役分子（外蒙军队）同盟，指望你们的军事力量，力图恢复蒙古的自治，并宣布实行以呼图克图博克多为国王的、而权力有限的君主政体。以后我们打算进行适当的措施来限制了王公们承袭的权利，国家独立后，我们采取别国的经验，即展开为人民争取权利和利益的斗争。阿拉特民族自尊心的增长，使我们可能在一二年内把革命向前推进一步，以便最后取消领地王公的权利。”

然而，赴莫斯科代表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因为十月革命后，苏俄正处于内外交困的艰难境地，根本无力顾及外蒙事务。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仅仅得到一点道义上的鼓励而已。乔巴山和苏黑巴托尔想借助苏俄支持把外蒙古从中国版图上割裂出去的企图已经暴露无遗。

第二节 陈毅二出库伦

1919年的北京，充满了骚动和不祥的气氛。亲日派皖系军阀段琪瑞，在日本怂恿下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紧跟着又步帝国主义之后尘参加了企图扼杀苏俄的干涉活动。欧战结束后，由于中国政府在瓜分殖民地的巴黎和会上软弱无能，拱手把德国在山东的权力全部转让给日本，从而引发了震惊世界的“五四运动”，皖系军阀由此臭名昭著。

1920年夏天，段琪瑞政府垮台，直系军阀曹锟执政。徐树铮将军随着皖系军阀的倒台回到北京，躲进日本驻北京大使馆闭门不出。中国政府改派原来的外蒙古总督陈毅代替徐树铮。陈毅以西北筹边使的身分来到库伦。

面对外蒙古动荡不安的形势，北京政府企图运用陈毅曾实施过的协商策略来巩固外蒙古，加强控制，但对外蒙古的军事防备却掉以轻心。

陈毅临行前，北京执政的实权人物曹锟召见了，叮嘱陈毅到外蒙后加强控制，严加防范，勿使外蒙上层贵族王公和僧侣滋长分裂野心，对游荡在外蒙草原上的赤化分子，要严加惩治，勿使俄人生凯觎之心。

吴佩孚也召见了陈毅，对他说：“时值天下群雄给起，军阀拥兵自重。我欲以犬马之劳效忠国家。现中原战事吃紧，无力顾及外蒙，尚望君多多努力，以文韬武略智胜群凶，保外蒙不被列强吞并，不被叛逆分裂。”

陈毅忧虑重重，再次返回库伦。一年前，日、美、英等国武装干涉苏俄，谢苗诺夫在远东恢复了沙皇政府。日本乘机企图借助谢苗诺夫的影响在外蒙建立“大蒙古国”，结果苏俄的胜利粉碎了日本人的梦想。博克多格根无可奈何地目睹了沙皇俄国的倒台，日本人的反复无常更令他感到恐惧，最后不得不取消自治，投靠北洋军阀政府，以此来防范苏俄势力的渗透，维护王公贵族和上层僧侣的利益。在四面楚歌声中，博克多格根与陈毅讨价还价草拟了《改善蒙古未来地位的64条》。但“64条”还没有最后通过，风云突变，徐树铮带兵进入外蒙，就以武力解决外蒙问题。陈毅被迫返回北京。外蒙古的部分王公贵族在武力弹压下，忍气吞声，背地里却一直贼心不死，蠢蠢欲动。所以，外蒙古“自治”虽然取消了，但问题并没有解决，相反却带来了诸多不稳定因素。所以，当陈毅再次踏上外蒙古的草原时，他就明显感到似乎有种力量在暗中骚动着，库伦城里亦不见了往日的平静。许多人都在回避他，谣传四处流行。

太阳又落山了，夜幕降临，满天的星斗神秘地眨着眼睛，静静地注视着草原上低声吟叫的羊群、牛群。库伦城里，稀稀疏疏的灯火闪动着，柔和的夜风中隐隐约约传来男女的嬉笑声，一切都似乎宁静极了。然而，陈毅的内心却感到格外沉重和不安。他想到与此地相邻的苏俄土地上，革命的裂火正在熊熊燃烧，到处都有穷人在革富人的命，工人、士兵和农民都起来造反，而外蒙古竟然也有人在肆无忌惮地宣传苏俄的思想，煽动人们起来闹事，局势不妙啊！那些心怀鬼胎的外蒙古王公贵族和上层僧侣，也不知道他们在作什么梦。或许他们正在暗中酝酿着什么勾当呢。

纷乱的思绪一般脑儿钻进了他的脑海里。时而令他感到烦恼。而今他心惊胆

颤。

“身居是非之地，弄不好我就将成为千秋罪人啊！”陈毅辗转反侧、一夜未眠。

第二天，陈毅召集了部分外蒙古的王公贵族和僧侣，转达了中国政府对外蒙古的密切关注和自己对外蒙赤化分子的担忧。

陈毅没有规劝王公世族中少数闹分裂的人，他知道此举关系到外蒙地方政局的稳定，眼前亦只有点到为止。

博克多格根向陈毅保证，已派人盯住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等赤化分子的活动。

当陈毅得知苏、乔二人已逃往苏俄时，他才略感放心。

“绝对不能允许他们回到蒙古境内！”陈毅果断地下达命令。

第三节 风波又起，闹剧重演

1、沙俄白匪再行计谋

自1919年日本人企图扶植“大蒙古国”的计划破产后，1920年日本在中国的代理人皖系军阀段琪瑞也下台了。然而，日本侵吞中国的贼心不死，他们想利用被苏俄红军打败的沙俄残余军队恩琴男爵的势力再次达到侵略外蒙古的目的。日本人对这位沙皇时代的男爵寄予厚望。

“只要将军阁下肯接受我们日本的帮助，我们将保证你获得在外蒙古的权力，”日本人小野原三向恩琴许下了宏愿。小野是日本军阀派到恩琴身边的参谋。

恩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得到日本人的许诺，欣喜之余便一头栽到了日本人的怀中。

日本人的武器弹药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恩琴残军手中，恩琴野性勃发，有点飘飘起来。

1920年10月，恩琴狂妄地率领着近800名用日式武器装备起来的士兵，号称“亚洲骑兵师”进犯外蒙古边境，恩琴手下的残军被苏俄红军冲杀得失魂落魄，一心想尽快攻下库伦，在外蒙寻找一块安身之地。

狡猾的恩琴深知外蒙古的局势，他制止住手下士兵的野蛮冲动。

“如果我们象强盗一样横冲直撞杀进外蒙，就将被视作侵略者，心然得不到外蒙古人的欢迎，那是自投罗网。”

恩琴向手下面授计谋：“为了达到在外蒙站稳脚跟，反对苏维埃，我们要利用

外蒙古对中国军阀的不满情绪，打开通往库伦的通道。”

的确，恩琴这一招可谓阴险狡诈，当他的所谓“亚洲骑兵师”进入外蒙古时，就高高挑起反对中国军阀侵占库伦的旗帜，恩琴每到一处，就假惺惺地把自己说成是为了恢复自治蒙古和博克多格根的“神圣”权利而战的斗士，恩琴的伪装着实迷惑了一部分外蒙古人，一些封建主为他提供粮食、服装、马匹。

恩琴则尽量保护蒙古王、公、汗和呼图克图的财产，并积极扶植自己在外蒙古的傀儡，封建主扎姆扬和鲁布桑策文凡为首的所谓“临时蒙古政府”。

1920年11月，一些上当受骗的外蒙古人和想利用外蒙反对苏维埃的恩琴残匪勾结在一起，向中国政府驻守库伦的高在田将军、陈毅筹边使发动了猖狂进攻。高在田将军率中国军队顽强抵抗，挫败了恩琴的阴谋。恩琴妄图攻占库伦的计划未能得逞。

恩琴兵败后，流窜到特特勒金河流域，同从苏俄逃亡到西蒙古的原沙俄残匪建立了联系，并将之收归麾下，同时继续骗取部分外蒙古封建主和上层喇嘛的好感，为他提供物质给养。

恩琴还极力拉拢博克多格根。他深知博克多格根的宗教威信在蒙古人心目中的份量。1912年1月，在恩琴的引诱欺骗下，博克多格根秘密离开了库伦。博克多格根的到来，使恩琴心花怒放，今后他可以打着为外蒙古的“自治”和“解放”招兵买马，和中国军队抗衡了。

2月初，在少数封建主和博克多格根的帮助下，恩琴积聚了相当的兵力，再次向库伦发动进攻。

中国驻军和恩琴匪帮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结果中国驻军在外无援军的情况下寡不敌众，被迫撤离库伦。2月4日，恩琴及其同党耀武扬威进占了库伦。2月21日，博克多格根在库伦粉墨登场，演出了一场“重登汗位典礼”的闹剧。博克多格根恬不知耻地宣称：“蒙古自古为独立之邦远古受满州统治近300年，清朝崩溃后，我们承载沙皇俄国的声援，取得了自治，受中国政府统辖。但中国军阀政府置蒙古人利益于不顾，以武力胁迫我们，故深遭蒙古同胞反对。今沙俄恩琴男爵以武力驱除中国军队恢复自治，实乃万幸。愿大家协力，重新建立独立的蒙古。”

恩琴的阴谋得逞后，便暴露出他的狰狞面孔。他在外蒙古实施专横的独裁统治，对蒙古封建主和阿拉特牧民中的反对者进行残酷镇压，尤其对潜伏在外蒙古的苏俄社会活动家和受苏俄影响的蒙古人更是残酷打击。他把被苏俄红军打败的沙皇残余势力收罗起来和高尔察克、安聂科夫、杖托夫、巴基奇等残匪纠合在库伦一带，梦想有朝一日打回苏俄去。

中国驻军撤出库伦以后，高在田将军率领的军队一部分返回内地，另一部分转移到买卖城（即今阿勒里——布拉克），准备积聚力量再次打回库伦，收复中国在外蒙的主权。

陈毅鼓励将士们不要气馁，要为中国领土的完整而战。

2、买卖城的激战

恩琴匪帮攻占库伦之后。在当地实行的残暴统治，很快便激起了外蒙古人民的反对。由于恩琴仇视苏俄，以苏俄为敌，那些倾向苏俄政府的人自然站到了恩琴和博克多格根的对立面。

恩琴和博克多格根在外蒙内部，严密监视革命者的活动，杀害了许多进步人士。如潜伏在蒙古的俄国人布里亚特医生、车洛克塔罗夫，库伦革命委员会委员库切林科，格姆巴尔热夫斯基等，还有许多倾向革命的蒙古人，都命丧恩琴残匪的屠刀下。

恩琴的野蛮统治激怒了流亡在苏俄的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苏、乔认为，恩琴的暴行，使外蒙古人民陷入了无底深渊，只有完全按照苏维埃思想，发动群众，推翻中国军阀、恩琴分子以及蒙古封建主和僧侣的统治，蒙古人民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

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决定筹建纪律严明、有统一领导核心的政党——蒙古人民党。

1921年3月三日，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在靠近边境的城市恰克图召开了蒙古人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代表了全蒙古150名党员。这些党员绝大多数出身下层的阿拉特牧民，极少数出身官员和喇嘛。

苏黑巴托尔在大会上口若悬河，高谈阔论。他说：

“各位同志，蒙古民族曾经有过它辉煌过去，我们的祖先成吉思汗曾在这块土地上创建过规模空前的大帝国。可是后来，我们的民族衰落了，继而遭到满州人的宰治近三百年。现在，满州人的统治结束了，按理说，我们蒙古的同胞应该获得自由了。但是事实却是，我们的民族仍然象一个没有脊梁骨的动物直不起腰来。我们民族中的上层统治者博克多格根阶级，一心想利用外来力量。的支持使自己独立，但却得到的是不伦不类的自治。沙俄扶持博克多格根时，蒙古的内政外交受沙皇的控制，日本支持博克多格根时，蒙古的政权又遭受日本和受日本控制的中国军阀蹂躏。我们的蒙古象一个软弱的妇女任人宰割，任人欺辱，实在是太可怜了。我们蒙古民族的儿女谁能不为之痛心呢？

现在。受日本收买的沙俄残余势力在恩琴男爵的带领下，打着解放蒙古的旗号进入蒙古，并控制了政权，中国军队被他们赶到了离恰克图不远的买卖城。同志们。解放我们民族的时刻已经来到，我们的目标是推翻库伦政府，赶走恩琴的占领军，驱除出中国。的占领军。实现蒙古真正的自治，复兴和发展我们蒙古民族的力量和文化！”

苏黑巴托尔的讲话把蒙古人民的解放同外蒙古的独立牵强附会地扯到一块，并

把它作为蒙古人民党的奋斗目标。客观上讲，这是一种狭隘的民族心理，把旧政府的压迫看作是一种民族欺压，其实当时广大汉族人民又何尝不是深受反动政府的压迫。怎样评价这一段历史，不是我们的任务，我们仅提供客观材料，读者会自己去思考。

苏黑巴托尔的发言在当时颇具有煽动性，激起了代表们一阵阵狂热的鼓掌。

乔巴山宣布了蒙古人民党的纲领：“我们的解放事业，是全人类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一部分，因而必须同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建立密切的联系。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列宁的思想，我们的革命目标是实现蒙古人的真正的自由！在现阶段，我们要建立一支由人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用武力驱除中国军阀、沙俄白匪的力量，推翻库伦的政府，建立人民的自治国家。”

1921年3月13日，乔巴山和苏黑巴托尔在持罗伊茨科萨夫斯克召开了边境各旗劳动者，游击队和党组织的代表大会，在大会上选举了临时蒙古人民政府。大会决定设立军事部部长和武装力量总司令，由苏黑巴托尔兼任该两职，乔巴山担任主管政治的副总司令。

苏、乔二人首先把散布在各地的零星游击队收拢起来，改编成正规军，下辖四个骑兵团。还从苏俄境内获得了大批武器弹药，大大提高了战斗力，眼看时机成熟，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决定向中国军队驻夺的买卖城发起进攻。

当时，买卖城驻扎着高在田将军率领的一万多中国官兵，其中有一部分是库伦战役后撤退到买卖城的中国士兵，高在田将军准备固守待援，陈毅也急匆匆赶回到北京四处游说，请求北京政府出兵增援。然而，当时国内各派军阀正在神州大地上打得热火朝天，执掌北京政权的直系军阀一心想同奉系军阀和南方各派拼个你死我活，哪里还有力量和精力去支援支远在千里之外的小小孤军。

1931年3月18日晨，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带领军队向买卖城的中国驻军发动了进攻，在此之前，他们曾向中国驻军递交了一份最后通牒，要中国军队放下武器，交出城市。

当地中国驻军长官郭松龄根本就没有把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的队伍放在眼中，而是重点防范恩琴的沙俄残匪和苏俄红军。他见到最后通牒后不以为然，搁置在一边，便陪同一群军官喝酒打麻将牌去了。结果，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沉寂的蒙古草原还沉睡的薄雾笼罩之中时，一声凄厉的枪响划破了黎明前的寂静，几百名蒙古骑兵象离弦之箭扑向买卖城的城墙。当几个蒙古人冲上城墙时，站岗的哨兵才回过神来，赶紧举枪射击，有的跑回去报告。

此时，中国士兵因昨晚闹了一晚上还在东倒西歪躺在床上作梦呢。听到枪响中国官兵仓促应战，乱作一团，城里局势非常糟糕。

驻军长官郭松龄预感情况不妙，赶忙组织守军反击。可这时已经晚了，那些刚刚组织起来的蒙古骑兵个个都剽悍凶猛得象头公牛，他们用粗绳套住城墙上的箭垛，

然后抓住绳子一个接一个跃上墙头。守兵和蒙古人展开了肉搏，有的惊慌失措往城内逃。

郭松龄正准备组织各营官兵增援各城门守军，一个士兵脸色煞白，跌跌撞撞冲进来报告，四个城门已有三个被蒙古人攻占了。

郭松龄大吃一惊，手下军官们也不知所措。忽听一声猛烈的爆炸声，震得郭松龄的指挥所摇摇欲坠，枪炮声、厮杀声从四面传来，越来越近了。

最后，中国驻军在面对着越战越勇的蒙古人的冲杀下，不得不慢慢撤出买卖城，囤积的粮草及武器弹药大部分都被丢弃在城中。

买卖城就这样被占领了。

攻占买卖城，这是蒙古人民党取得的第一个胜利。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兴高采烈，亲自登临城头，宣布买卖城的解放。以后，3月18日就变成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建军日。

3月19日，苏黑巴托尔领导的蒙古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和蒙古临时人民政府迁到买卖城，召开了联席会议，成立了军事、财政、内务三个部。人民革命党终于在外蒙古的土地上找到了一个立足点。从此，中国军队再也没有回到这座城市。

第四节 “邀请”来的红色占领军

1、革命的召唤

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领导的蒙古军在买卖城的胜利，点燃了一大批向往革命的蒙古民众埋藏在心头的火种，革命热情以很快的速度传播、四处蔓延。在他们看来，买卖城的胜利已经使他们站在了天堂的大门口，只要再前进一步，就能进入美妙的天堂。

这些蒙古的革命者，个个欢欣鼓舞、磨拳擦掌，时刻准备去迎接新的战斗。

1921年3月19日，临时蒙古人民政府发表宣言，宣告“蒙古临时人民政府”成立了，临时人民政府宣称：“蒙古临时人民政府是蒙古境内唯一合法的政权机构，除蒙古临时人民政府发布的法令和法律外，不得实行任何别的法令和法律”。宣言“号召全体蒙古人起来与俄国白匪和中国军阀进行斗争。”

苏、乔集团是以列宁的苏维埃思想和理论武装起来的，其革命对象是外国帝国主义，包括俄国残匪、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军阀以及外蒙的博克多格根等封建主。

苏、乔集团也曾把中国人民同中国的军阀区别对待。1921年3月，蒙古人民政府中央委员会发布了一个《告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工会、学生和各革命民主党派、中国真正的爱国人士宣言》。当时，北京政府对买卖城的失陷十分关注，准备

再次派兵外蒙，以武力解决外蒙问题。

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向中国内地呼吁：

“为了全世界劳动人民、一切受世界帝国主义者压迫和奴役的人民，特别是亚洲不自由的殖民地人民的团结和共同利益，为了，同样受本国的和外国的吸血鬼和强盗剥削和压迫的中国人民和蒙古人民的深刻的共同利益和理想，蒙古人民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全体蒙古劳动者和知识分子坚决要求北京政府立刻停止向蒙古派遣军队，同时向中国人民和上面提到的最优秀的、最高尚的人士致以友好和诚恳的谢意，并请求支持我们的要求。”

2，悲哀的中国

苏、乔起草的宣言书传到北京，军阀曹锟浏览后苦笑着说：“整个一副苏俄的面孔。”

他向吴佩孚叹息道：“没想到苏俄的赤化力量如此嚣张，短短两年时间就在蒙古搞出个什么革命党。苏维埃俄国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目前尚不清楚，仅仅几个蒙古小骑兵就那么厉害吗？看来要收回外蒙的主权并不象想象的那么容易呀！

吴佩孚对外蒙古革命党驱逐中国守军，投靠苏俄十分恼火，他极力纵恿曹锟使用武力解决外蒙问题。

“如果苏俄赤化阴谋得逞，无疑将成为中华民国身边一头凶狠的雄狮。”

曹锟看着气头上的吴佩孚，半晌不吭一声，他想得比吴佩孚更远。

“老兄，眼下我们正同奉系张作霖交战，战事吃紧呀！一旦出兵外蒙，你我都将后院起火，后果不堪设想啊！”

曹锟不愧为老谋深算，那番话说得吴佩孚连连摇头，叹息而去，就这样，曹锟身为北京政府的实权人物，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坐视外蒙局势的变化，竟没有采取一点维护国家主权的措施。

然而，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在恰克图买卖城的举动却激怒了奉系军阀、号称东北虎的张作霖，当获悉郭松龄在恰克图买卖城失败的消息后，张作霖破口大骂：“他那个八字胡，这帮兔崽子竟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老子生剥了你们的皮。”

张作霖盛怒之下，准备调兵遣将，出征外蒙古。

然而，日本顾问反对张作霖的轻举妄动，他提醒张作霖道：“眼下内战正在火头上，若出兵外蒙，一旦苏俄插手，岂不是腹背受敌，只有等内战获胜后，方能用武力解决外蒙。”

张作霖终究是一个地方军阀，地盘、军队是他的命根子，他不能为了外蒙古的不毛之地而丧失掉自己苦心经营的东北。

他愤愤不平地咽了一口气，骂道：“总有一天要跟他妈的王八羔子算帐。”

3、气急败坏的恩琴

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在买卖城的胜利和他们发布的宣言，也让库伦傀儡政府的官员上上下下如坐针毡。

恩琴万万没有料到，俄国的苏维埃分子自己还没有去征讨，外蒙古土地上竟又冒出这样多的赤色分子，他气得脸色发白，嘴角翘起的两撮胡子在颤抖着，他厉声叫喊：“这是苏维埃赤化分子的叛乱，消灭他们，一定要消灭他们！”

一大批从沙俄逃亡到外蒙古的军官，对苏、乔领导的蒙古人民党恨之入骨，他们极力怂恿恩琴要象对待瘟疫一样消灭这股正在兴起的赤化势力。

恩琴伪政府以博克多格根的名义对受赤化影响较大的土谢图汗部的官民发出特别告示，大肆称赞“蒙古人民”的“救星”恩琴的功绩。斥责苏、乔领导蒙古临时人民政府是对蒙古现政府的反叛，人人都应奋起而痛杀之，恩琴这种往自己脸上贴金的做法其用心是试图在舆论上压倒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

然而，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识破了恩琴的险恶用心，他们针锋相对，极力拉拢那些可以联合的封建主站到自己一边。共同反对恩琴和博克多格根的傀儡政府，一封经由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签名的写给蒙古封建主的信中写道：

“如果曾经拥护过恩琴的僧侣、封建主回心转意，认识了自己的错误的话，那么人民革命党和临时人民政府能把他们吸收到解放祖国的队伍中来，不然的话，他们就不能逃避对人民的责任。”

苏、乔的统一战线政策引起了恩琴和博克多格根的忌恨。

“假如他们掌握了权力，蒙古世代的王公和活佛都将被送进监牢。”博克多格根威胁外蒙古的封建主和上层喇嘛。“要知道，苏俄的革命就是穷人革富人的命。一旦他们成功，我们的命就没了。”

最令博克多格根担忧的是，叛乱分子暗中正加紧同苏俄的联系，一旦苏俄直接插手外蒙事务、后果不堪设想。对此，恩琴和博克多格根决定必要时寻求日本、美国和英国的支持。

恩琴的阴谋是有根据的。早在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向苏俄寻求援助的时候，他就采取了相应的措施，1921年3月，恩琴派人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中国的旅顺和大连，后来又在北京秘密召开了几次会议，制订了一套从蒙古、东北和苏俄远东沿海地区向苏俄进攻的计划。

4、我们“邀请”红军吧

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清醒地意识到，要打败恩琴白匪军、推翻博克多格根伪政府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这不仅因为恩琴匪军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而且白匪军中还有许多戎马出身的沙俄军官，在武器弹药方面也明显占有优势。不仅如此，恩琴白匪军还占据了大片的外蒙土地，有博克多格根伪政府和一些被欺骗和蒙蔽的蒙古封建主和僧侣的支持。更重要的是恩琴的后台老板是日本人，日本早就有吞并蒙古的野心。

面对强大的敌人，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不得不投向苏俄的怀抱。在蒙古人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苏黑巴托尔说：“我们虽然在买卖城赶走了中国人，但恩琴白匪军和博克多格根的势力仍然要比我们强大得多。为了战胜敌人，我们必须谋求苏俄政府的大力支持。”

“我们去莫斯科，请求列宁派红军支援我们。”代表中有人大声喊道，一些人热烈鼓掌表示同意，一些人则沉默不语。

然而，严峻的形势不容代表有更多的争议，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在蒙古人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具有绝对的权威，即然他们作出了决定，其他人只有服从，虽然有些人心里抱着反对态度。

求援信很快便飞向了莫斯科。

4月的一天，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列宁正坐在办公室审阅大量的文件，卫士送赤了一封外蒙古人民革命党十万火急的求援信。列宁停下手边的工作，仔细阅读着这封由乔巴山用俄文书写的言词感人的信件。外蒙古人民的革命斗争感染了列宁，列宁心里十分兴奋。

他迅速召来库佐耶夫元帅和斯大林总书记，商讨有关向外蒙古派遣远征军的事宜。列宁对他们说：

“蒙古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蒙古人民正在拿起武器反抗他们的反动政府。可是目前，蒙古的同志正面临着恩琴白匪军和博克多格根封建主的武装威胁，日本正向恩琴输送屠杀人民的枪炮，我们不能坐视不管。”

“列宁同志，目前国内局势已经基本稳定，我们可以从远东抽调三个团的兵力支援外蒙。”库佐耶夫元帅提出一个建议。

列宁沉吟不语，若有所思。

一旁坐着的斯大林猛站起来说道：“我们在远东有一片领土，出兵外蒙，消灭恩琴白匪军，一可以加强西伯利亚地区的防卫，扩大对中国施加的影响，解放蒙古人民，同时还可以警告日本人，推动亚洲地区人民的革命事业。”

斯大林激动地说着，一边挥舞着手臂，俨然是一副救世主的神态。

列宁对斯大林的意见十分赞赏，同意了他们的主张。

不久，一支苏俄远征军雄纠纠气昂昂从远东开向蒙古大草原。苏俄红军唱着革命歌曲，乘着烟雾腾腾的火车奔驰在西伯利亚广宽的高原大地上。

5、恩琴的如意算盘

在库伦，恩琴早已磨刀霍霍，作好了进攻苏黑巴托尔的战略准备。

1921年5月22日恩琴在库伦召集党羽。通电各地，号召“全蒙古人民联合起来，为捍卫大汗的神圣尊严。为蒙古民族免遭苏维埃革命的蹂躏，一起消灭乔巴山和苏黑巴托尔叛乱分子。”

在出兵动员大会上，恩琴为白匪兵们加油打气，他狂妄至极，大言不惭地高声喊道：胜利就在你们前面招手，勇敢的士兵们。我们已经被苏维埃的瘟疫逼得无家可归，现在，这瘟疫又要越过边界来侵害我们的友好邻邦，俄罗斯的将士们，我们坚决不能容忍！我们坚决不能容忍！我们要消灭乔巴山和苏黑巴托尔，帮助蒙古人民走向自治和自由。还有，得胜后有大大的奖赏，小伙子们，好好干吧，痛快地烧吧，杀吧，有黄金和美女奖赏你们。”

博克多格根伊然以喇嘛教主的口吻为白匪兵们的凯旋祝福，他和恩琴扮演的这场闹剧居然起了作用，好久没有打仗的白匪军兵一个个野性勃发，狂呼着扑向买卖城。

此时正值夏季，太阳照在人的脸上火辣辣的痛，草原上生起的凉风吹送着天边浮着的朵朵白云，由库伦出发的白匪士兵们，一个个脸孔被太阳照得红彤彤的，象滴血的生牛排，他们杀气腾腾，根本就不把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领导的蒙古人民军放在眼里。

恩琴把白匪军分成三路：一支是主力，直接杀向恰克图买卖城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的总司令部，力图一举全歼革命党的武装力量；另一支沿库伦到恰克图的西部挺进，并在特罗伊茨克萨夫斯克与主力部队会合。第三支部队从库苏古尔湖、唐努图瓦、以及鄂伦河和克伦河方向进入苏俄境内。

6、苏俄红军入蒙参战

5月25日，恩琴的白匪军进抵买卖城，同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率领的蒙古人民军展开了激战。

白匪军指挥官巴雅尔公把军队驻扎在买卖城外，妄想包围城市，全歼蒙古人民军。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乘匪军立脚未稳，率部主动出击，当头给了匪军狠狠一击，

白匪被迫后撤。

但白匪毕竟人多势众，装备精良。他们喘过气来后，便在巴雅尔公的督战下，气焰嚣张地朝人民军扑来。

双方在买卖城展开激战。

战斗从太阳初升一直打到西落，双方死伤惨重。蒙古人民军的实力受到削弱，弹药也越来越少了。

白匪眼见人民军的抵抗渐渐变弱，他们更加紧了进攻，形势对人民军异常严峻，买卖城危在旦夕。

紧要关头，从苏俄远东共和国出发的苏俄骑兵部队及时赶到了。红军在城外向白匪军进攻。

枪炮声、厮杀声，牛角的号声混杂在一起，白匪在蒙古人民军和苏俄红军的两面夹攻下，死伤盈野，全线崩溃，巴雅尔公来不及逃命，当场被红军俘虏，剩余的白匪军四处逃散了。

苏黑巴托尔领导的蒙古人民党异常隆重地欢迎苏俄红军的到来，苏黑巴托尔紧握着苏俄红军先头部队领导人的手，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列宁万岁！红军万岁！”蒙古人民军的战士欢呼着、把苏军领导抬起来，高高地抛入天空。

苏俄红军怎么来的这么及时呢？

1921年6月，苏俄红军的三个团全部进入了外蒙古地区。

苏俄红军完全是按照列宁的理论组建起来的，具有高昂的革命激情，战斗力很强。苏俄红军出兵外蒙古，主要是为了帮助蒙古人民党，帮助蒙古人民军消灭恩琴白匪军。博克多格根怕政府，驱逐中国在外蒙的军队。当然，苏俄此举也是为了巩固苏维埃政府在远东地区的政权。斯大林认为，只要帮助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在蒙古地区建立了革命的人民政权，美、英、日等西方帝国主义就少了一块武装干涉苏俄的阵地，苏俄的安全就多了一份保障。所以，出兵外蒙可谓是一箭双雕之举。

这是一个革命的年代，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革命激情激励着受苦受难的人们。为了革命，人们不惜抛家别妻、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不惜为别的民族上阵厮杀。

大批年轻的苏俄红军战士乘坐着烟雾腾腾的火车，沿着伸向西伯西亚的沙漠、戈壁、森林、冻土地带的大铁路浩浩荡荡开来了。年轻的战士一路高唱国际歌，热血沸腾着，为能参加解放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斗争而激动。

苏俄红军在远东下火车后，便骑马进入了漫漫的蒙古大草原。从此，苏俄红军一直留在了外蒙古。

此时，中国国内，各路军阀正在混战，谁也顾不到进入外蒙的这支外国军队。

在西伯利亚通往远东的崎岖小道上，曾经铺盖着好几代俄罗斯人的尸骨。早在十七世纪，中国清王朝还十分强盛的时候，俄罗斯的哥萨克匪军曾流窜到中国的东北部烧杀抢掠，犯下了滔天罪行。为了巩固中国的东北部边疆，康熙皇帝保驾亲征，消灭了哥萨克匪徒。以后中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中国把外兴安岭以北的大片领土让给了俄国。二百年后，沙俄又利用清朝政府腐败无能的时机，夺走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近 150 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巴尔喀什湖以南的中国西北约 150 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亦在此时期被沙俄吞并。

沙皇俄国是一个侵略成性的国家，他们侵占了大片中国领土后并没有就此罢休，而是继续实行蚕食政策。辛亥革命前夕，沙俄曾把外蒙古和中国的东北划作自己的势力范围。触犯了日本在中国的利益。1905 年的日俄战争，就是沙俄和日本为了争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而爆发的战争。1912 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朝封建统治被推翻，沙俄趁机在中国的外蒙古扶持了博克多格根傀儡政府，妄图把外蒙古从中国版图上分割出去，结果遭到了中华民国政府的反对，沙俄的阴谋未能得逞。但从那时起，沙俄势力步步深入外蒙，他们控制了外蒙的政府、外交，‘帮助’蒙古王公贵族训练军队。十月革命爆发后，沙俄垮台，沙俄在外蒙古的势力受到削弱，恩琴匪帮的窜入，又使得外蒙古重新落入俄国手中，这不能不说是一场悲剧。

苏俄红军出兵外蒙古，从表面上看，似乎是苏俄为解放外蒙古人民而伸出的援助之手、但从实质上，这仍然是一种带有浓厚的扩张主义色彩的举动。

苏俄红军进入外蒙古，便昼夜急驰，直奔恰克图买卖城，恰好守城的苏黑巴托尔已危在旦夕，便从背后打得恩琴匪帮大败，解救了苏黑巴托尔。

第五节 攻占库伦

随着苏俄红军的参战，外蒙古的形势急转直下，僵持局面被打破了。进攻买卖城的白匪军被苏俄红军全歼城下，巴雅尔公也被苏军俘虏。

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率领的蒙古人民军由于苏军的介入士气大振，他们在得到苏军的武器装备补给下，一鼓作气攻克了恰克图周围大片的城镇和村庄。

苏、乔领导的军队力量迅速壮大，解放全部外蒙古的时机已经成熟。

这天，在有苏俄军官列席的军事会议上，苏黑巴托尔慷慨激昂，他紧握苏军领导人的手，对苏联红军的参战表示感谢。

“由于苏维埃兄弟的帮助，我们才得以反败为胜，并迅速壮大革命力量。”苏

黑巴托尔热泪盈眶，他挥舞着拳头激动地说，“现在，我们应该积聚力量，发动群众，一举夺下库伦，解放蒙古，彻底消灭恩琴和博克多格根反动派。”

“苏，我们将帮助你们以及你们的人民。”苏俄红军的一位团长卢基耶夫紧接着苏黑巴托尔的话说。

卢基耶夫话音刚落，只见一位身材魁伟的蒙古人民军军官猛地站起来，冲动地喊道：“请让我充当先锋吧，我愿为解放库伦拼死效力。”

苏黑巴托尔笑着看了他一眼，轻轻点了点头。

1、先锋的艳史

这位毛遂自荐争当先锋的蒙古青年名叫布麻曾德。年仅二十六、七岁光景，是蒙古人民军第一骑兵团的团长。他身高体壮，生就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透露出一股精明强干的气质。

布麻曾德出生于一个贫苦的阿拉特家庭，从小给人家当牧奴，过着受人欺压的生活，但艰难困苦却练就了他吃苦耐劳的性格和强壮的体魄。17岁时，布麻曾德同主人家的千金阿斯高娃产生了爱情。爱情冲昏了他的头脑。每天当他到山坡上去放羊牧马时，这位怀春的姑娘就跟着来到草坡下，在溪流边玩耍、摘花，唱着绵绵的山歌：

天苍苍哟，野茫茫，
河边的小鸟为什么不飞翔。
只因哥哥在山坡上哟，
妹妹我心中多欢畅……

布麻曾德一听到这缠绵的歌声，心儿就象小鸟一样飞到了天外。他浑身热血沸腾，忍不住骑上一匹烈马，狠抽一鞭，便在辽阔的草原上尽情狂奔起来。

布麻曾德迷恋阿斯高娃，但他深知，作为一个贫贱的牧奴，要娶一位牧主的千金小姐，比上天去摘星星还要困难。可是，倔强的阿斯高娃又偏偏迷上了这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这使布麻曾德又兴奋又害怕。

布麻曾德和阿斯高娃就这样偷偷相爱着，从没有人发现他们的恋情。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转眼布麻曾德已到了二十岁，阿斯高娃也已经十八岁。他们之间的恋情一天比一天热烈、冲动，但无情的现实却又把他们隔开。他们不敢公开在一起。

一无傍晚，天气异常闷热。劳累了一天的布麻曾德从草坡上放牧回来，躺在马棚旁边的小屋里休息。忽然，阿斯高娃乘着朦胧的夜色悄悄溜进了小屋。这天，阿斯高娃打扮得格外漂亮，脸上红扑扑的，充满了青春少女特有的魅力。

布麻曾德想不到阿斯高娃竟然会跑到这一间肮脏还有股怪气味的小屋。他楞住了，惊慌之下竟一句话也说不出。

爱情使阿斯高娃忘了一切、她走近来轻轻依偎在布麻曾德粗壮结实的肩膀上，轻声说：阿爷阿妈出去了，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我怕！”

布麻曾德的心头涌起一阵阵异样的感觉，他只觉得得空气憋闷，胸口象被什么堵塞了似的。他慌乱地扭过头去，无意中接触到了阿斯高娃那一双火辣辣的眼睛和温软丰满的身体。一时间，布麻曾德晕弦了，积聚了多日的情欲的火焰在一瞬间喷发出来，他发疯似地一把将阿斯高娃搂进了怀里。

夜深了，草原陷入一片太古般宁静谧的气氛之中。满天的星斗在夜幕中闪烁着，悄无声息地观看着人世间的各种苦难、忧伤、幸福和欢乐。沉默的月亮象把锐利的镰刀，高挂天际，似乎正在等待着什么人用它来收割夏季草原上芬芳复郁的沃草。夜幕下的蒙古包被笼罩在一片银白色的薄雾中，偶然传来几声牧羊犬的叫声，轻轻的人语声，伴随着草原上星星点点浮动着的灯火。撩拨人们的情思。

布麻曾德和阿斯高娃在马棚里度过了温存的一夜，万般柔情使他们紧紧搂抱在一起，唯愿永远就这样下去，永不分离。

可惜好梦不长。这一夜也成了他们最后的一次相聚。

第二天，博克多格根伪政府派来的征兵人马便把布麻曾德抓走了，他被送进了“自治蒙古军”作了一名士兵。

阿斯高娃眼看心上人被活活带走，她躲进房间呜呜痛哭起来。此后她神情恍惚，整天失魂落魄，若有所失，阿斯高娃的父母以为是女儿到了年纪的缘故，不久把她嫁给了一个封建主的儿子。

布麻曾德在军队里混了三年。当他终于从军队里逃出来时，他便疯托地跑回到原来曾经放过牧的地方。这时，阿斯高娃的父亲已经病故，而阿斯高娃早已嫁到了远方。布麻曾德悲愤至极，一把大火烧毁了牧主家的马厩便投进了游击队。

当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组建蒙古人民军时，布麻曾德以勇猛善战被任命为第一骑兵团团长。他以其多变的智谋，为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领导的蒙古人民军立下了汗马功劳。

此刻，面对库伦恩琴白匪劲敌，布麻曾德早已按捺不住，他真想立刻率军出发，杀向库伦，消灭白匪、消灭博克多格根。

2、困兽犹斗

苏俄红军的迅速参战使恩琴大吃一惊，他惊慌失措，召集白匪军官开会研究怎样对付苏俄红军。恩琴的手下是一群乌合之众，本来就是被红军打败后落草外蒙古

的。当他们得知红军已经突入外蒙，生擒了巴雅尔公之后，一个个吓得心惊胆战、乱了方寸。

“我们决不投降？和赤匪拼了！”一个匪首气急败坏地狂呼。

“找日本人去，我们要请求日本政府的援助！”

“对，找日本人！还有美国、英国政府。”

白匪军阀们吵吵嚷嚷，乱作一团。他们自知对苏俄曾犯下滔天罪行，不可能得到苏维埃政府的饶恕，因此唯一出路只有背水一战，决一雌雄。

恩琴率部在托洛依酱郭萨市斯克镇摆开了阵式，准备和红军拼个鱼死网破。结果是螳螂挡车，恩琴白匪全军溃败，受到红军致命打击。恩琴率残部撤退到第三路军指挥部，重振旗鼓，转而进攻苏俄，企图逼定外蒙境内的苏俄红军。恩琴指挥第三路军攻入苏俄境内，一度占领了苏俄远东共和国的色楞金斯克，但好景不长，苏俄红军再次击溃了恩琴。恩琴带着剩余的残兵败将，狼狈逃回了库伦。

3、红旗插上库伦城

恩琴兵败后，苏俄红军和苏黑巴托尔领导的蒙古人民军乘胜追击，直捣白匪巢穴库伦城。

布麻曾德率领蒙古人民军第一骑兵团，一马当先，冲在大部队的前头。这时，恩琴白匪军的主力已被歼灭，恩琴和博克多格根终日龟缩在库伦城中，惶惶如丧家之犬。

布麻曾德的心里十分激动。一想到革命胜利在望，他使不禁满怀喜悦之情。他催马加鞭，率部象旋风般向库伦城疾驰而去。

草原上的牧民们睁着疑惧的大眼睛，呆呆看着这支队伍的经过。刚开始，他们不敢接近，因为博克多格根的人威吓他们说，这些人都是受苏俄赤化的叛乱分子，不但会抢夺牧民们的牛羊，而且还要糟蹋他们的妻子、女儿。可是，一支又一支的队伍开过去了，他们平安无事。牧民们开始和苏黑巴托尔的蒙古人民军接触，他们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

“好人啊！他们真是天上下来的菩萨兵，是为咱牧民们打天下的。”牧民们奔走相告。

许多牧民准备了牛奶、开水，给过路的蒙古人民军和苏俄红军送去。一到晚上，总有成群结队的牧民从家里拿来毛毡给士兵们作褥子。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领导的蒙古人民军以秋毫不犯的严明纪律赢得了广大牧民的拥戴。许多青壮牧民踊跃投到蒙古人民军的队伍里。

1921年7月6日，布麻曾德率领的第一骑兵团抵库伦城下。库伦城城门紧闭，城内听不到一点动静。布麻曾德一面派人给博克多格根送去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的联名信，要博克多格根认清形势、当机立断，站到人民一边，同时又积极作好攻城的准备。

库伦城里，博克多格根惶惶不可终日。自恩琴被苏俄红军打败逃回库伦后，他就知道恩琴已经靠不住了。博克多格根并不想逃离外蒙，他留恋他的地位和财产，一旦他出走，他就会失去一切。

卫兵送来了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的信件，博克多格根战战兢兢地看完了信，紧张的心情稍稍松弛了一些。这时，博克多格根的一些心腹眼看大势已去，纷纷劝告博克多格根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和解，有人干脆主张逮住恩琴，献出城池，以换取苏、乔的好感。

博克多格根犹豫不决。

布麻曾德向博克多格根发出了最后通牒，限令他24小时内交出库伦城，否则人民军将发动进攻。

博克多格根的王宫乱成了一团，有的人慌慌张张收拾金银细软，准备逃跑；胆小的妇女躲到角落里闭目合掌，颤抖着诵经祈求菩萨保佑。

恩琴也急匆匆赶来了。

此时的恩琴男爵，象一只斗败的公鸡，再也看不到往日那股骄横的气焰了。只见他嘴角边的两撮小胡子耷拉着，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

博克多格根见到恩琴，气便不打一处来，他讥讽地说道：“恩琴将军，你给了我们什么样的许诺？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召来了苏俄的军队，可是你呢，请来了日本人吗？我们蒙古看来就要败在你们俄国人的手里。”

若在平时，敢有蒙古人这样责备他，他一定会是跳如雷。可是如今，手下的士兵死的死，逃的逃，身边仅剩下了为数不多的残兵败卒。恩琴山穷水尽，已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他现在把博克多洛根当作了最后救命的稻草。

“尊敬的大汗，局势的变化实在出乎我的意料，没想到苏俄这样快便出兵了。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借助您的威望先稳住赤化分子，然后坐待日本人的支援。”恩琴可怜兮兮地说，脸上露出一副摇尾乞怜的落魄相。

“哼！死到临头了，还想利用我，作梦去吧！”博克多格根心里愤愤地想。

最后通牒限定的时间临近了，草原上忽然刮起了大风，一时间，飞沙走石大有吞没库伦城之势。

卫兵匆匆跑来报告，城外布麻曾德的骑兵正向城边靠拢。

博克多格根心里象有十五个吊桶在打水，七上八下，一时竟拿不定主意。

“开枪射击！抵抗，坚决抵抗！”恩琴象遭到电击似的，猛地跳起来，气急败坏地命令。

但是，没有人理睬他。博克多格根在屋内来来回回踱着步子。他感到悲哀。他不明白，为什么蒙古总要受到俄国人的控制。他当然不明白，脱离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怀抱，哪里会有真正的自由和独立。

卫兵接二连三冲进来，向博克多格根报告布麻曾德骑兵的动态。离最后通牒的期限只有一小时了，蒙古人民军作好了攻城的准备。

博克多格根不能再犹豫了。他猛的把手一挥，大声说道：“开城，迎接布麻曾德！”

卫兵二话没说冲出去，执行命令去了。

恩琴大惊失色。转身想逃，哪里还逃得掉，几十粗鲁的蒙古士兵已把门堵住了。

恩琴气急败坏，破口大骂：“博克多格根，你出卖蒙古，出卖朋友，忘恩负义！”

“把他捆起来！”博克多格根眼露凶光，咬牙切齿地喝道。

蒙古卫兵早就对恩琴白匪不满。这些白匪平时胡作非为，欺侮蒙古人，奸污他们的妻子，干了许多伤天害理的坏事。所以，一得到命令，蒙古卫兵便一轰而上，拿了条绳子把恩琴捆得龇牙咧嘴地叫唤。

博克多格根指着恩琴愤愤不平地骂道：“你们这伙畜牲，被苏俄红军赶得走头无路，逃到我蒙古土地上。我收留了你们，可你们却胡作非为，反客为主。我要把你献给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

恩琴被博克多格根手下囚禁起来。

库伦城里的残余白匪，得知恩琴被擒，博克多格根献城的消息后，吓得魂飞魄散。一部分残匪，携带着家眷，冲出城去，企图逃命，结果除一部分逃脱外，其余的被布麻曾德的骑兵消灭了。

其实，博克多格根这是在玩弄一个花招。他想，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固然想推翻他领导的政府，但主要目标是为了消灭恩琴等俄国人。现在，他把恩琴抓起来交给布黑巴托尔，立功赎罪，再凭着他博克多格根在蒙古人心中作为一名宗教领袖的威望，谅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也不能把他怎么样。

博克多格根不愧为一只经风见雨的老狐狸，为了表现自己真心报效革命者，他派人武装押着恩琴，在庫倫街頭游街示眾，並到處張貼安民告示，表明自己真心站到蒙古人民一邊。

庫倫城城門大開，布麻曾德騎着高頭大馬，率領着蒙古人民軍第一騎兵團，雄糾糾氣昂昂開進了庫倫城。

庫倫城萬城空巷，深受恩琴白匪欺壓的老百姓扶老携幼，都來觀看被博克多格根偽政府稱為“赤匪”的蒙古人民軍。博克多格根也來了，他騎着一隻白馬，率領手下侍從來到城外，親自把布麻曾德迎進庫倫城。

“瞧！多威武，真帥！”姑娘們手挽手站在街頭人群中，對粗壯剽悍的蒙古人民軍戰士發出嘖嘖嘆聲。

有的人給士兵們送上了熱水甚至牛奶。

博克多格根把布麻曾德的部隊安排到原來恩琴白匪軍的駐地後，便邀請布麻曾德等人到王宮用飯。

傍晚。布麻曾德帶着幾個衛兵，身穿俄式軍服，腳踏高皮鞋，腰里系着明晃晃的馬刀，威風凜凜踏進了王宮。博克多格根一臉謙恭的神態，媚笑着迎接布麻曾德。

富麗堂皇的蒙古王宮，使布麻曾德感到吃驚，他從小以牛羊為伴，哪里見到過如此奢華的場景。

在王宮的殿堂里，布麻曾德看到無數的金銀珠寶、各式古玩、字畫以及五顏六色的綾羅綢緞，他覺得自己彷彿步入到了天堂一樣，恍恍惚惚的。

“小心：千萬不要大意、別中了別人的圈套。”布麻曾德暗自叮嚀自己。

博克多格根今夜換上了一套輕鬆的禮服，顯得隨和、精神多了，他言談舉止間，流露出一種滿清遺老所特有的雍容華貴的气质。身邊還立着兩位侍女。

桌上佈滿了山珍海味，博克多格根媚笑着請布麻曾德入席。

“來，都是蒙古自家兄弟，何必拘束。過去我們受俄國人欺負，受滿州人統治，真是多災多難啊！今天，有你們這些勇敢的蒙古壯士的努力，蒙古才獲得了自由。我作為蒙古大汗先敬你們一杯！”

博克多格根時刻不忘他的蒙古大汗的身份和地位。

布麻曾德正言說：“功勞應當歸於蒙古人民黨的正确領導，蘇俄紅軍也給我們幫了大忙，應該感謝他們！”

博克多格根一听到“苏俄红军”几个字，心里就象吃着腐肉一样难过。他知道，一旦把苏俄红军召来，就很难再让他们回去了，只要俄国人在蒙古一天，蒙古就不会有安宁。现在，这帮赤匪竟然召来了俄国人，以后天知道会怎么样呢！

博克多伦狠心里隐隐绞痛，脸上却没有露出半点神色，他勉强笑着说：“如果不是苏俄红军，恩琴至今还在欺压我们蒙古人呢！”

“是的，列宁的红军是我们的亲密的战友。”布麻曾德回答说。

博克多格根看了一眼这位一口一个苏俄红军的蒙古青年军官，心里在无可奈何地叹息着，他本想利用丰盛的晚宴，拉拢这位以勇猛出名的青年军官，现在看来一切都徒劳无功，他亦只好听天由命。

晚饭后，布麻曾德对博克多格根说：“我们蒙古人民军先头部队的任务是为主力部队的前进扫除障碍。我们将全面接管库伦城。请你协助我们。”

“库伦已经属于你们了。”博克多格根垂头丧气地回答。红旗高高飘扬在库伦城头。

第六节 “蒙古君主立宪国”的出台

1、苏黑巴托尔的“独立”宣言

1921年7月巴日，也就是布麻曾德率领的先头骑兵团进驻库伦城后的第三天，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领导的蒙古人民军和苏俄红军一起，浩浩荡荡开进了库伦城。

库伦的群众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声势浩大，较之前天迎接布麻曾德的先头部队更为隆重。

博克多格根也亲自率领蒙古王公贵族和僧侣，组成一支庞大的欢迎队伍，鸣枪放炮，敲锣打鼓欢迎蒙古人民军和苏俄红军。博克多格根伪政府的官员们，一个个心里都忐忑不安，不知道革命军将会怎样对待他们。

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身着整洁笔挺的军服，骑着马在博克多格根和蒙古王公贵族的簇拥之下，信马穿过大街，直奔博克多格根的王宫而来。

博克多根的王宫广场上，彩旗招展，布麻曾德早已派人布置好了群众大会的会场。广场上，聚集了许多库伦城的平民百姓和蒙古王公贵戚，人们正在翘首等候。

苏黑巴手尔在苏俄红军军官的陪同下，精神抖擞地健步登上讲台、发表了著名的演说：

“各位蒙古的兄弟、姐妹们，今天应该是我们蒙古民族永远庆贺的日子。伟大的蒙古人民军和友好的苏维埃俄罗斯红军一道，解放了我们蒙古民族的——库

伦。

“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和无比崇高的敬意，向为蒙古民族的自由和解放勇敢战斗过的蒙古人民军和苏联红军表示忠心地感谢！”

“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我们通过无比艰苦的努力，克服了重重困难，打败了中国军阀的武装徐树铮，郭松龄，取得了买卖城战役的胜利，又多次击败了沙俄白匪残余势力恩琴的匪军。今天，伟大的库伦又回到了蒙古民族的手中，我们应该为之感到骄傲和自豪！”

“为了从外国侵略者的手中解放我们的国家，为了争取蒙古人民的自由和权利，我们选举了人民政府。并决定在完全是另一原则下建立国家政权，把国家的权利归还给广大的阿拉特牧民，而不再是少数封建主和喇嘛僧侣。

“人民政府来到库伦本可以按革命方式行动，但看到你们，喇嘛和王公们，在人民革命军进军库伦时没有反抗，同时还照顾到国内的情况。政府决定组建新的政权机构，有秩序地移交权力。”

苏黑巴托尔的宣言，煽动起了蒙古人狂热的民族情绪，他们狂呼着“独立”、“自由”的口号，为苏黑巴托尔的“独立”宣言鼓掌。

苏黑巴托尔的革命，使许多外蒙古人追随着他投入到苏俄的怀抱。

1921年7月10日，库伦正式成立了“蒙古人民革命政府”。苏黑巴托尔被任命为军事部部长，乔巴山为副部长，掌管全国的军事工作。总理职务则由鲍陀担任。

早在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考虑政权建设的时候，他们就注意到，封建主阶级虽然过去一次又一次地投靠外国势力，出卖“国家”利益，但是，由于蒙古人对博克多格根和上层喇嘛还是抱有难以动摇的宗教感情，因而在考虑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的时候，就不能不照顾到群众觉悟的程度。所以，他们保留了以博克多格根为首的封建主的有限权力，决定成立以博克多格根为国王的君主立宪政体。

但是，作为共产主义者，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反复申明，这个以人民政府为基础的君主政体，已经不是1911年封建主们在沙皇政府的支持下所建立的君主政体，也不是在1921年3月恩琴白匪军所扶植的君主政体。因为在这个政体中，主导力量是人民政府，君主仅仅是名义上的。它将受到人民政府的制约。

所以，从实质上看、这个所谓的“君主立宪”政体只不过是苏黑巴托尔为照顾蒙古人的宗教信仰和感情而设立的一种过渡形式的政体。

2、“君子协定”

入城仪式完结后，布麻曾德在驻地为苏黑巴托尔、乔巴山，以及苏俄红军司令卢卡斯基准备了一个小型招待会。午饭后，召开了人民政府第一次会议，由于时间

紧迫，所以蒙古人民党的会议也同时在一起召开。博克多格根也应邀参加了会议。

会议在前博克多格根伪政府的一间不大的会议厅内举行，由乔巴山主持。出席会议的有苏黑巴托尔、鲍陀、布麻曾德、卢卡斯基、博克多格根，蒙古人民军的其他几位骑兵团长彭楚克、哈斯巴托尔和囊札特等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中心议题是制定国家的政权形式。

乔巴山首先发言，他简单回顾了蒙古人民党和蒙古人民军的建立过程和艰苦奋斗的历史、提出了建立新的完全“独立”的国家政体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苏黑巴托尔作了正式发言。他说：“按照人民政府的情况，我们本来可以建立苏维埃模式的蒙古政府，但考虑到蒙古的具体情况，我们作了变通。当我们在恰克图分析蒙古社会内部的形势时就已经意识到，照蒙古现状来看，蒙古离开中世纪的制度并不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急于求成。目前，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所以，决定建立保留大汗有限权利的君主立宪政体，人民政府将在这个政体中发挥领导作用。”

鲍陀作为人民政府的总理，对政府与大汗之间的关系作了补充说明。他看了一眼坐在角落里的博立多格根说：“我们必须在宗教和政治之间划清一个界线。宗教范围以外的事情，由人民政府行使权力，大汗则可以享有宗教范围以内的权力，但是，二者必须统一在党的领导之下。”

会议经过反复的讨论、磋商，最后制定了一个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誓约》，主要内容有：

第一条，蒙古国大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是黄教教主，他不得干预国家的政务，但是在一切宗教事务上享有权力。

第二条，蒙古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其大汗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对外的一切行文都必须通过人民政府主席。

第三条，政府为了巩固蒙古国的基础，为了人民的福利而主张颁布的各项法令，只有在报告大汗之后才能予以实施。大汗不得对这些法令加以反对或取消。其他性质的立法草案，在报告时，得由大汗退回政府重新讨论，但以一次为限。

第四条，国家发生政变或内部叛乱时，政府得变更平时规章，无须报告大汗即可独自采取重要措施或颁布法令。

这些条款的制订、奠定了外蒙古作为一个“国家形式”的政治基础。博克多格根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人在隆重的仪式中宣誓就职。

会议一直持续进行了几天。最后还选举产生了人民政府的各部领导人。

任命如下：

鲍陀任国务总理兼外交部长，
丹尚任财政部长
苏黑巴托尔任军政部长兼总司令
乔巴山任军政部副部长兼政治副司令
马克索尔任司法部长

一些封建主和上层喇嘛也被保留在人民政府内，他们对政府仍具有重要影响。

经过一系列条款、法律措施的制订颁布，“君主立宪”制的“蒙古国”具备了初步的政治基础。但是，潜在的矛盾依然存在，这些矛盾后来成为革命党不断分化的重要原因。

人民政府请求苏维埃政府允许苏俄红军继续待在蒙古，直到把外蒙古境内的俄国白匪肃清为止。

在致苏俄政府的信件中，苏黑巴托尔直接了当地写道：“蒙古人民虽然经过了一场深刻的革命，但是他的生命力仍然十分虚弱。为了保护蒙古革命势力健康壮大，使蒙古不遭受外国侵略者的入侵，同时保证国内民主政权不受封建主的颠覆，请求伟大的列宁和在他的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红军依旧停留在蒙古，以保护蒙古人民革命的成果。”

莫斯科的领袖们分析了远东和亚洲的革命形势。他们认为，蒙古正受到日本军国主义及其中国代理人张作霖的武力威胁，还受到由英美撑腰的北京政府的威胁，同时，外蒙古境内还有沙俄白匪残余势力以及反对革命的蒙古封建主和上层喇嘛。因此，红军必须屯驻外蒙古协助蒙古革命党完成解放蒙古人民，建立社会主义的伟大使命。

列宁委派苏军参谋长库佐耶夫通知苏俄远东共和国军分区，传达了莫斯科高层领导的决定。

大批苏军就这样留在了外蒙古广宽的草原上。

3、一石激起千层浪

外蒙古宣布“独立”和建立“蒙古国”的消息传到内地，立即在中华神州大地上掀起了千层巨浪，一时间舆论大哗。国内各民间团体、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宣言，反对蒙古王公贵族分裂祖国的倒行逆施，谴责苏俄对中国外蒙古的武装占领。

北京街头，身挎帆布包的报童狂喊着穿街而过，惊恐的声音回响在大街小巷。

“看报、快看报，外蒙古宣布独立，俄国人进入外蒙！”

国人纷纷驻足。登载有外蒙古“独立”消息的各种报纸转瞬间被抢购一空。

外蒙“独立”的消息震惊了北京市民。街头巷尾，到处都聚集着议论纷纷的人群。有人大骂北京政府是败家子，软弱无能，有的则对苏俄的出兵愤愤不平，一时间惊惶不安的气氛笼罩了北京城。

北京政府内部对外蒙古的“独立”也感到不能容忍，大小官员议论纷纷、争吵不休。许多官员要求出兵外蒙，惩治分裂主义分子，也有人寄希望于日、美、英等列强对苏俄出兵外蒙古的干预上。

可悲可叹的是，当时中国国内连年战乱，大小军阀为了抢夺地盘正打得不亦乐乎，国家正在走向四分五裂。

北京政府的实权人物曹锟和吴佩孚，早就对外蒙人闹独立感到十分恼火。可是他们北边要对付奉系军阀张作霖，南边还有南方各省军阀的威胁。他们生怕出兵外蒙会丧失自己在北京政府中的实权，因此只有隔岸观火，无可奈何。

作为一种外交形式，北京政府发布了一份措词严厉的声明，谴责蒙古王公贵族企图分裂中华民国的行径，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

外蒙“独立”和苏俄红军进驻蒙古的消息传到了东北沈阳，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恨得咬牙切齿，他一拍桌子站起来骂道：

“妈那个巴子，俄国这帮兔崽子，占不了东北就占我外蒙，蒙古这帮混蛋，作堂堂中国人，有什么不好。”

1921年1月，张作霖在沈阳召开了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除张作霖的亲信军官外，还有流亡到东北的外蒙古的封建主代表，日本的军事顾问。会议主要讨论外蒙古问题。

张作霖虽然是草莽出身的军阀，可是还有一点“爱国”之心。他对俄国人非常痛恨，对外蒙古的“独立”异常愤慨。他一时冲动，竟准备用兵外蒙，以武力解决蒙古纠纷。

流亡东北的蒙古封建人士非常激动，他们在会上向张作霖哭诉：“外蒙古与华夏水乳交融，近世又成为中国一部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外蒙从中国领土上分割出去。现在蒙古一伙败类勾结苏俄，妄图独立，中国政府理应速发义兵征讨，以保我外蒙百姓平安。”

张作霖麾下的东北官兵群情激愤，他们都盼望“张大帅”速下命令，出兵外蒙，以武力维护中华的领土完整。

但是，日本的军事顾问坚决反对。苏俄红军在粉碎了日、美、英等国对新生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干涉后，力量日益壮大，驻扎在远东的苏联红军，无论在数量上还

是军事装备上，都占绝对优势。日本人害怕与苏俄发生冲突，会影响到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利益。

张作霖毕竟是日本人在东北扶植的傀儡，没有日本的支持，他不敢对外蒙贸然行事，况且，北京的军阀曹锟、吴佩孚之流、早对张作霖心怀叵测，他不得不时刻提防着。

象上次一样，张作霖这次未遂的举动再次耽搁了外蒙。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张作霖咬着牙咽下了这口气。

4、博克多格根的阴谋

“君主立宪”制的“蒙古国”成立以后，博克多格根的权力在名义上被保留下来。他深为自己在蒙古人所享有的至高无上的威望和地位而感到沾沾自喜，时间一长，他故态复萌，渐渐不把“蒙古人民政府”放在眼中，一些被解除职务的前伪政府的官员和部分仇视新政府的蒙古封建主逐渐集中在他周围。

当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领导的“人民政府”建立以后，他们的影响还仅仅局限于蒙古东部地区，广大西部蒙古依然被蒙古封建中和俄国白匪残余势力控制着。库伦解放后，革命的火种迅速散布到外蒙古的各个角落，西部蒙古的人民党哈丹巴托尔、马克萨尔札市在乌里雅苏台发动起义，杀死了恩琴白匪的走狗施帖亦思和汗达诺夫。但由于革命力量的弱小，广大西边地区的反动势力依然十分猖獗。

1921年8月间，蒙古西部边区人民政府和蒙古人民党西部边区委员会向西部蒙古的广大阿拉特牧民发出号召，呼吁他们为肃清白匪残余势力和反动封建主而战斗。

这时，西部蒙古的斗争十分激烈，革命党正和白匪残余势力，反动封建主展开拼杀，双方打得难解难分。

博克多格根一直对苏黑巴托尔领导的“人民政府”心怀不满。他投靠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也是迫于形势，并非出于真心。特别是新政府成立后，他的蒙古大汗的权力和地位名存实亡、言行举止处处受到限制、整天忍气吞声。西部地区蒙古封建中和沙俄白匪残余的活动使博克多格根心中产生了一线希望，他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蠢蠢欲动。

一个漆黑的夜晚，博克多格根唆使一些人潜入蒙古人民军驻地，杀死卫兵，放走了被囚禁的恩琴。

恩琴逃跑后，很快便窜到了蒙古西部重镇乌里雅苏台，重新打起了反对蒙古革命党和苏俄政府的旗帜，流窜在外蒙草原各个角落的沙俄白匪行反动封建主纷纷投到恩琴的手下，一时同在蒙古西部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动势力。他们向西部游击队发动了猖狂进攻，使西部的革命力量受到了严重损失。

恩琴在西边取得暂时胜利后，便忘乎所以，他率领沙俄军官巴基奇、索科勒尼茨基的部下，再次窜入苏俄境内，一路烧杀劫掠，但很快便被苏俄红军击溃了。恩琴率残部退回蒙古西部。

5、苏俄和外蒙协同作战，控制全境

为了支援西部蒙古的游击队，苏俄远东军分区向西部蒙古派遣了一支骑兵部队。这支人数不到三百人的小分队，在苏俄军官贝加罗夫指挥，突入到托勒布诺尔湖畔，和当地蒙古游击队汇合了。

贝加罗夫是一个机智多谋的苏俄军官，他在苏俄国内战争期间，曾以勇敢善战获过多枚勋章。此次贝加罗夫率孤军深入外蒙，目的是为了加强当地蒙古游击队的力量。配合苏军主力攻打恩琴白匪的老巢乌里雅苏台，消灭沙俄白匪在外蒙的残余力量。

宁静的夜晚，圆圆的月儿高悬在天空。月光流水一般倾泄在漫漫无际的大草原，给草原笼罩上一严柔和、神秘的色彩。星星不堪和月亮比美似的、羞惭地消隐在月色融融的天幕中。晚风吹拂着沾满露滴的牧草，送来缕缕诱人的清香。整个世界都沉侵在一片祥和的气氛之中，仿佛昨日发生在草原上的仇恨、默杀、流血，都已经成了遥远而古老的传说。

半夜时分，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而近，划破了夜半的宁静。恩琴白匪仗着人多势众，在明晃晃的月光下，从四面八方扑向了苏俄红军和蒙古游击队的秘密驻营地。

由于内奸的告密，乌里雅苏台的恩琴白匪掌握了贝加罗夫和蒙古游击队的行踪。他们跟踪而至，把苏与俄分队和数量不多的游击队团团包围起来。

贝加罗夫从梦中被枪声惊醒，立即组织苏军和游击队同恩琴匪军展开了殊死搏斗。

沙俄匪军跃马扬刀冲上来了：他们黑鸦鸦的一片，疯狂地叫喊着，马刀在月光映照下闪着令人胆战的寒光。

苏俄红军和游击队奋力还击，机枪、步枪、土枪一齐向匪军射击。匪兵们被打得纷纷落马，但是前面的被射倒了，后面的又疯狂地扑上前去，包围圈在一步一步地缩小。

战斗进行得十分残酷，双方都死伤惨重。天亮后，匪军停止了进攻，但仍把苏军和游击队死守的小镇紧紧包围着。

蒙古游击队队长哈斯巴托尔在战斗中牺牲。他身中数弹，颈上脸上布满了匪军马刀的刀痕。

紧要关头，蒙古游击队的少数队员动摇了，他们被匪军在人数上的绝对优势吓住了。悲观情绪一度在队伍中滋长。

贝加罗夫提着冲锋枪从一个阵地跑到另一个阵地。他鼓励战士们说：“虽然敌人十分猖狂，但这仅是暂时的。我们的支援部队很快就要到来，咬紧牙关坚持住，守住阵地就是胜利”。

此后，匪军又向小镇发动了几次冲锋，均被守军击退。他们把苏军和游击队铁桶般围住，想把贝加罗夫困死在小镇里。

时间在相峙中一天天熬过去了。苏俄红军和游击队的弹药行将耗尽，粮食吃完了，他们不得不乘黑夜把匪兵丢弃在阵地前沿已经腐烂的死马拖回来烧熟以后充饥，伤亡人数每天都在增加，但贝加罗夫拒绝投降。

到了第十三天，剩余下来的苏俄红军和游击队已经精疲力竭，他们紧握着拉出了火绳的手榴弹，有的身体下压着炸药包，准备一旦匪军冲击阵地便和敌人同归于尽。

此时，从库伦和苏俄远东派出的大批苏俄红军。正向乌里雅苏台和托勒布诺尔湖疾进。苏俄远东司令部在获悉贝加罗夫被白匪围困的情报后，便迅速出动正规骑兵部队，又电令库伦的俄军迅速西进，准备两个合围，全歼恩琴匪军。

苏俄援军在巴加罗夫和蒙古游击队抵抗到最后关键时刻赶到了。援军从托勒布诺尔湖畔向围困贝加罗夫和游击队的匪军发起进攻，久攻不下的匪军一触即溃，仓惶向乌里雅苏台退却。

从苏俄远东共和国派出的红军，在团长古尔雪夫斯基的率领下，和从库伦西进的苏军汇合，把恩琴匪军围在了乌里雅苏台城。贝加罗夫的小分队和蒙古游击队参加了消灭恩琴匪军的战斗。他们向苏俄正规军提供了大量有关恩琴匪军的情报，为全歼恩琴匪军作出了重要贡献。贝加罗夫后来受到苏维埃政府的嘉奖。

1922年7月，经过将近一年的战斗，流窜在外蒙的沙俄白匪被分部歼灭。恩琴在红军攻陷乌里雅苏台后被俘，后被送交苏维埃军事法庭，被判处枪决。

至此，外蒙古全境被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领导的“蒙古人民政府”控制。

第七节 外蒙全境“赤化”

1、苏俄“承认”外蒙独立

在驱逐了沙俄白匪残余势力之后。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的蒙古“人民政府”成了外蒙古境内唯一的政权机构。它是在新兴的苏维埃俄国的革命思想指导和军事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新型政权。在摆脱了沙俄白匪残余势力的控制后，外蒙古便更迅速地走上了脱离中国政府的道路。

外蒙古革命领袖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清楚地意识到，要在外蒙古建立完全“独立”的国家，没有苏维埃政府的帮助是不可能的。蒙古“独立”的基本保障是依靠苏俄，留在外蒙古境内的苏俄红军是“国家”自由发展的最可靠的“支柱”和“捍卫者”。因此，在革命政权建立后，如果不寻求苏俄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援助，蒙古“独立”的政权就不会有稳固的基础。

出于对维护“独立”的国家政权的考虑，苏黑巴托尔于1922年10月亲自率领“蒙古人民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积极谋求苏俄道义上的支持和经济、军事上的援助。

当苏黑巴托尔的代表团乘火车到达莫斯科车站时，苏维埃政府的外长和共产国际的代表亲自在车站迎接。代表团被安置在距离克里姆林宫不远的共产国际的招待所里。

这批蒙古的革命者受到了苏俄政府的热情接待。十月革命五周年纪念日这天，苏黑巴托尔和来自世界各地的革命者，有幸登上了克里姆林宫墙头，参加了苏维埃国家隆重的国庆典礼，荣幸地见到了革命领袖列宁。

不久，苏黑巴托尔作为“蒙古人民政府”的领袖受到了斯大林的接见。苏黑巴托尔这时才二十八岁，英俊威武，身穿笔挺的军装，胸前系首好几枚金光闪闪的勋章。显得格外精神。

“苏，你很勇敢，不愧为蒙古人民的优秀儿子。”斯大林操着一口带有浓厚的格鲁吉亚口音的俄语，对苏黑巴托尔大加称赞。

苏黑巴托尔的心里非常激动，在斯大林面前，他感到紧张和不安。

“不，斯大林同志，一切都是在苏维埃革命思想的指导下取得的，苏联红军给了我们很大支持，蒙古人民忘不了他们。”

看到苏黑巴托尔局促不安的样子，斯大林象父亲一般笑了。他握紧苏黑巴托尔的手说道：“苏，你在蒙古人民的革命斗争中，表现出了十分优秀的才能。蒙古人民会感谢你的，世界被压迫民族也会为你的伟大精神而感到骄傲：苏联人民和政府将全力支持你们。”

苏黑巴托尔听了斯大林的话。心中顿时觉得明亮了许多。他恳请斯大林给予蒙古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更多的援助。

斯大林愉快地答应了苏黑巴托尔的请求。

不久，苏黑巴托尔率领的“蒙古人民政府”代表团便和苏方举行了商谈。苏联政府承诺给予蒙古在政治上的支持和政治、军事上的援助。苏黑巴托尔则代表“独立”的“蒙古人民政府”，同意苏军队长期驻扎在外蒙古。双方最后签订了一份友

好协定。这是外蒙古“独立”后同外国签定的第一个协议书。

协议规定：过去沙皇俄国政府和前蒙古自治政府之间所签定的一切条约和协定均为无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承认蒙古人民政府是蒙古唯一合法政府。双方在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方面必须执行最惠国待遇的原则。并且不允许在自己的领土上建立任何对另一方有敌对行动的组织活动。

通过这个协议书、苏联政府正式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

苏黑巴托尔同乔巴山、哈丹巴托尔被苏联政府授予红旗勋章。此后不久，“蒙古人民政府”也以最高的荣誉表彰了苏黑巴托尔的功绩，授予了他“卓力克图——巴托尔”（勇敢的英雄）的称号。

2、起来，贫苦的阿拉特！

蒙古代表团回到蒙古后，根据列宁和斯大林的指示，为新获得“独立”的蒙古选择了一条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苏黑巴托尔认为，苏俄的经验表明，任何社会要越过资本主义顺利地走向社会主义的主要条件，是改善党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必须发展合作社，采用新的经济和文化形式，把阿拉特群众团结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周围。

苏黑巴托尔指出：只有一条道路，即只有摧毁经济、政治方面的封建基础，才能为社会主义发展准备条件。而只有依靠走这条道路，才有可能保障蒙古的封建制度和民族压迫不会重演。

在苏维埃思想的指导下，“蒙古人民政府”在蒙古境内实施了大张旗鼓的社会主义化政策，强行摧毁蒙古封建主阶级的经济基础，由此引起了激烈的阶级斗争。

1922年11月，札萨克图汗部一个旗的阿拉特牧民起来反对本族王公巴音吉嘎勒和他的儿子鲁托奥其尔，因为他们企图向阿拉特牧民强制征收已被“人民政府”宣布废除的捐税和劳役。阿拉特牧民请求札萨克图部的人民政府解除巴音吉嘎勒和鲁托奥其尔的掌旗官职。人民政府满足了牧民们的要求，剥夺了他们父子的官职。阿拉特牧民在人民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下，摆脱了千百年来俯首听命、逆来顺受的奴性，他们扬眉吐气，纷纷起来向蒙古王公贵族挑战。

不仅如此，阿拉特牧民在反对世俗封建主的同时，还反对喇嘛僧侣的盘剥，拒绝向寺院纳税。在土谢图汗部，巴托王旗的阿拉特拒绝给博克多格根的马匹准备饲料。并要求博克多格根把草场分给阿拉特。

全蒙古的阿拉特觉醒了，他们掀起了一股反对蒙古王公贵族、上层喇嘛僧侣的政治运动。1923年12月，“蒙古人民政府”根据阿拉特牧民的愿望，对拥有领土的王公制定了一条法规。根据规定，旗札萨克应由旗代表会议负责，旗代表会议有权解除札萨克的职务，并选举今后的札萨克，呈请人民政府批准。

这条法规废除了领地王公世代占有旗土地、牧场和牧奴的特权。封建主虽然可以被选为旗代表，但是必须在得到全旗阿拉特的同意后方可管理旗务。

根据规定，一切政权机构必须由人民选举产生。一切担任职务的人，从政府委员到十户达尔嘎。必须从那些了解人民疾苦，诚实，而且能保护人民利益的人中间选举。选举过程以不记名投票的方法进行。

在这个法律条款的基础上，从1923年冬到1924年复，蒙古各地广泛开展了地方政权机构的选举活动。通过阿拉特会议，先后选出了十户、巴嘎，苏木、和顺、艾马克等地方政权机关。最后选举结果，使从前领地王公中百分之九十的人被免职，由阿拉特取代。

这场席卷整个外蒙古地区的声势浩大的选举运动，沉重打击了世代享有特权的大批王公贵族和喇嘛僧侣，使他们不得不灰溜溜地夹起尾巴做人。从此，在外蒙古地区的政治生活中，千余年来受压榨的阿拉特牧民，开始掌管起各级政权机构。

由于外蒙地区迅速向着国家化的方向发展，“蒙古人民政府”于1923年10日宣布取消过去以领地封建主之名作为各部名称的沿袭，代之以新的行省制度。从此，土谢图汗部改为博克多汗乌拉省，车臣汗部改为抗肯特乌拉省，三音诺颜汗部改为齐齐尔里克曼沟尔省，札克图汗都改为杭特希尔乌拉省。

通过这些从形式到内容上的全面变革，外蒙古内部走向了具备一切国家形式的“独立”。但从外蒙古的政治、经济、军事到文化生活、风俗习惯都更多地受到苏联的影响。

第八节 沙其喇嘛：为僧侣利益而战

苏黑巴托尔仗着有苏联的支持、在外蒙古推行了激进的社会变革措施。他在政治上除了实行阿拉特选举制度外，还在经济上实施了减免租税、平均领地等措施，试图在短时间内摧毁传统的经济基础，建立起苏俄式的社会主义国家。

苏黑巴托尔的激进政策严重地损害王公贵族和喇嘛僧侣们的切身利益、遭到了他们强烈的反抗，上自博克多格根、下至一般王公僧侣、都对人民政府的措施恨之入骨。沙其喇嘛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沙其喇嘛本是西藏的一个高利贷商人，与博克多格根关系密切，经常来往于西藏，蒙古之间。在清朝，由于西藏和蒙古同属于高度自治的地区、双方接触比较频繁。辛亥革命后，西藏宣布归顺中华民国政府，外蒙古则在沙皇武力支持下建立了“自治”蒙古政府。沙其喇嘛是博克多格根的支持者，他从西藏窜到蒙古后，在外蒙古获得了许多特权。

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政府向外蒙古派遣了军队。沙其喇嘛怂恿博克多格根，秘密勾结恩琴白匪，赶走了驻守库伦的中国军队。沙其因此而成为博克多格根的心腹，在博克多格根伪政府中担当要职。

“蒙古人民政府”掌管外蒙政权以后，沙其使一直在暗中活动，企图颠覆人民政府。特别是在 1922 年“蒙古人民政府”实施激进的经济政策后，沙其喇嘛暗中秘密联络各地被阿拉特赶下台的王公贵族和对人民政府心怀不满的上层喇嘛，密谋发动武装叛乱。

参加沙其喇嘛反动组织的成员，大都是在革命以前享有特权的封建主和上层喇嘛。革命使他们丧失了一切，他们准备以武力推翻人民政府。

沙其喇嘛煽动他们说：“武力消灭的东西必须依靠武力来恢复。我们不能容忍赤化分子夺走我们的牧场，抢夺我们的牛羊。现在，到了拿起武器为自由而战的时候了！”

在沙其喇嘛的积极策动下，这帮破落的王公贵族和反动喇嘛，暗地里收罗党羽，秘密从西藏等地偷运进武器弹药。他们秘谋于 1922 年 12 月在库伦发动叛乱。进攻人民政府办公大楼。

“蒙古人民政府”很快便获悉了沙其喇嘛一伙的阴谋。蒙古人民军在库伦一带进行了大搜捕，反动组织的成员纷纷落网，沙其喇嘛也在逃往西藏的途中被截获。

在审讯沙其喇嘛的过程中，博克多格根为了保全自己，推御责任，他把沙其喇嘛说成是自己身边隐藏的反动分子，把杀死蒙古人民军卫兵，放走恩琴的罪状一股脑儿推卸到了沙其喇嘛头上。

沙其喇嘛被执行了枪决。

第九节 鲍陀求助张大帅

1、到底是朋友，还是敌人？

在蒙古走向国家化的江程中，产生了一个富有神秘色彩的传奇式人物，此人便是“蒙古人民政府”的总理鲍陀。

鲍陀的经历、思想和最后的结局都是耐人寻味，非同寻常的。在蒙古的现代历史上，怕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象他这样复杂，褒贬不一的人物了。有人骂他是老谋深算的内奸、也有人说他是深谋远虑的英雄。

鲍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还得从他的出身谈起。

鲍陀出生在一个封建主家庭，受到过良好的蒙古文化的教育。他精通汉文，对中国文化也颇有研究。在苏黑巴托尔发动革命以前，鲍陀正在一个喇嘛寺庙里做喇嘛。革命党发展到库伦以后，他从宗呼勒庙里跑出来，加入了革命党，受到了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的信任。

由于鲍陀在库伦深孚众望，又有学问，所以，当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建立“蒙古人民政府”时，他被推举为总理兼外交部长。苏、乔想借助他的威望来加强人民政府的影响。

鲍陀在他的施政纲领中提到：“蒙古自古是一个有很强的生命力的民族，他曾诞生过成吉思汗、忽必烈这样一些具有雄才大略的英明君主，也曾有过明清时代叛乱与顺服、战争与和平交替的年代。蒙古的生活更多地是同中国的历史发生关系，因而当我们建立我们的新蒙古时，不能不考虑时代的要求。目前，我们蒙古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仍处于中世纪的水平上，我们所要努力的是让我们的生活更多地同世界的发展趋势保持一致，说白了，就是迅速实现现代化。

“所以，我们在政治上要保证每个人的权力都得到尊重，经济上每个人的利益得到保护，生活上更加与现代世界保持一致，这样，我们才能建成一个崭新的蒙古民族。”

鲍陀基于这种使蒙古民族现代化的思路，他不赞成仅仅同苏俄保持联系。主张同中国、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都保持来往，向外国学习，以更好地发展自己。因此，他的政治主张同深受苏维埃思想熏陶的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等人大相径庭，这为以后他们的决裂种下了祸根。

2、“要留辫子，我就不当总理！”

1922年3月，鲍陀作为“蒙古人民政府”的总理召开了“国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人民政府各部的部长和大汗的代表。

鲍陀向到会成员汇报了自1921年3月，人民政府建立以来的一系列工作情况。鲍陀满腹韬略、能言善辩，他为与会成员的热情鼓掌所感染，兴致勃勃地阐发了自己对蒙古大政方针的看法和主张。他声音宏亮地说：

“目前，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为了加快蒙古的建设，必须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着手，推行一系列有助于蒙古现代化的政策。在政治上，我们要完善君主立宪政体，在蒙古传统信仰同现代社会政治之间保持某种稳定和谐。因此，人民政府必须充分保证大汗及其社会地位不能动摇，各地的寺院僧侣也要受到国家的保护和尊重。在最近一段时间，常常听到说一帮阿拉特牧民擅自闯入喇嘛寺院，抢劫僧侣们的东西，这种现象要严加禁止。当然，对违反了《誓约》的喇嘛僧侣也寻毫不留情，严加查办。在经济方面，我们目前刚刚着手减免了一些捐税，领地王公和僧侣们的利益也应适当地予以照顾。不能过于激烈地剥夺他们的财产，引起国内形势的混乱。在文化方面，我们应主动地吸取先进地区的文化营养。不仅包括俄罗斯社会主义文化成就，同时还有同中国文化、日本、美国以及西欧各国建立文化的沟通，使蒙古人民更快脱离中世纪的封闭、保守和落后的状态，而更快地进入现代世界的开放、进步和文明的社会。”

鲍陀充满激情地发言赢得了与会代表经久不息的掌声，有人兴奋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向鲍陀欢呼。一些参加会议的封建主和大汗的代表，跑上前来和鲍陀握手。

列席会议的苏俄代表在翻译把鲍陀的讲话翻译成俄语后他听懂了。他板着僵硬的面孔不满地看着苏黑巴托尔，嘴里不停嘀咕着什么。

苏黑巴托尔对鲍陀的宏篇大论感到吃惊。此刻，他象椅子上有针刺似的扭来扭去，局促不安。

鲍陀没有注意到苏黑巴托尔脸上细微的变化，他加重语气说：

“蒙古民族现代化进程必须加快，这里有一个十分滑稽的现象。我们蒙古人原来是没有辫子的，当 1609 年满州人努尔哈赤联合蒙古王公与明朝作战的时候，依然是短发。清朝入关后，强迫汉人象满州人那样留起长辫，我们的蒙古祖先也从那时起留起了长辫，至今快三百年了。现在满清统治已被推翻，汉族人掀起了一般剪辫子的浪潮，连女子也剪成了短发，既大方又方便。我们蒙古民族正对于变革时期，应该改变旧习俗，男子剪掉长辫，重新塑造崭新的国民形象。”

苏黑巴托尔再也忍不住了。他不喜欢中国人，他认为中国是使蒙古民族遭受奴役的罪魁祸首。他站起来反驳道：

“鲍陀同志，我们蒙古民族有自己的民族传统和生活方式，为什么要效法外国人呢？留辫子已经是我们蒙古民族的生活习俗，为什么要把它提到民族现代化的高度来讲呢？”

苏黑巴托尔的当众顶撞使鲍陀感到尴尬，因为鲍陀已经年过五旬，是位深受敬重的长者。而苏黑巴托尔则年轻气盛，具有军人直爽的气质。他是列宁主义的忠实信徒，是紧跟苏维埃的蒙古斗士，他不能容忍在蒙古民族的社会生活中渗进西方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渣滓。

鲍陀看到这位年轻的领袖冲动的样子，并没有生气，他耐心地解释说：

“苏黑巴托尔将军，目前蒙古最紧要的不是苏俄的支援，而是蒙古民族的觉醒。剪去男子的长辫子，可以促进蒙古人的民族意识，跟上现代西方文明社会发展的步伐。”

苏黑巴托尔严肃地说：“鲍陀同志，这不仅仅是一个剪不剪辫子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是倾向苏俄呢，还是倾向中国和西方帝国主义的思想路线问题。”

其实苏黑巴托尔的内心并不在意剪不剪辫子的问题。他是害怕鲍陀散布的倾向西方资本主义的言论引起人们思想上的混乱，导致蒙古革命党的政治方向发生偏转。所以，他在寻找借口试图削弱鲍陀在人民政府中的影响。

乔巴山、布麻曾德以及一些具有权威的蒙古人民党的领导旗帜鲜明地站在苏黑巴托尔一边。

鲍陀没有料到苏黑巴托尔竟然把剪辫子同蒙古人民党的政治路线牵扯到一起，他深感震惊。其实，鲍陀早就对苏黑巴托尔之流狂热地推崇苏联的作法十分反感。他认为过分依赖苏联的做法最终将导致蒙古丧失独立，再次沦为寄人篱下的境地。

鲍陀明显意识到自己和蒙古人民党之间存在的距离。他感到气愤。他要阻止苏、乔一伙人把蒙古民族引向危险途径的作法。

“如果要留下辫子，我就辞去总理职务。”鲍陀寸步不让，他以退出人民政府相威胁。

这场剪辫子风波很快便导致了蒙古人民政府内部形成了政治主张相左的两派。一派以苏黑巴托尔为首，主张走苏维埃道路，另一派则以鲍陀为首，主张通过温和的改革使蒙古民族迅速走向现代化。斗争的结果，苏黑巴托尔一派占了上风，鲍陀愤慨地辞去了“蒙古人民政府”总理的职务，同时也辞去了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的职务。

在鲍陀看来，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仅仅看了几本列宁的著作，就头脑发热，想在苏联红军的扶植下推行苏俄式的政治体制，这对蒙古民族来说与其说是一次革命，不如说是一场灾难。他对蒙古人民党感到失望，决心重新寻找拯救蒙古民族的道路。

3、请张大帅出兵

鲍陀辞去了人民政府总理的职务以后，决心重振旗鼓，寻找一条新的“拯救”蒙古民族的道路。他拜访了博克多格根，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赢得了博克多格根的同情。

鲍陀还在库伦积极活动，他向蒙古人宣传自己的思想，向他们指明创建一个崭新的不受外国军事力量所控制的完全独立和民主的“蒙古国”的途径。

鲍陀在库伦的影响愈来愈大，一些政治主张相同的人逐渐聚集在他周围。但同时，鲍陀也遭到了苏黑巴托尔的忌恨，他的行动受到限制，言论也越来越不自由。

鲍陀在苦闷彷徨中，忽然想起了中国东北的军阀张作霖。鲍陀在担任“蒙古人民政府”总理时，曾和张作霖有过书信往来。张作霖敦请他不要与中国脱离传统上的关系，不要投靠苏俄政府，损害中华民国的利益。

此刻，鲍陀突发奇想！——他想，与其成为俄国人的傀儡，还不如暂时保持和中国的某种联系，求助中国驱逐外蒙内的苏俄军队，然后再寻求其他途径重建独立的蒙古。

1922年5月，鲍陀秘密来到了东北沈阳，张作霖十分客气地接待了他。张作霖已经知道鲍陀辞去了“蒙古人民政府”总理的职务，他对此感到很高兴。

鲍陀对张作霖抱有很大的希望。他深知张作霖的脾气，鲁蛮而不乏爱国之心。

他恭敬地说：

“久仰将军大名！实不相瞒，外蒙现今已沦为苏俄的附庸，外蒙的王公贵戚，喇嘛和百姓，都寄厚望于中华民国政府。恳请将军速发义兵，驱逐俄国人、拯救蒙古人民”。

“你们蒙古不是已经独立了吗？中国政府岂能干涉他国内政？”张作霖语中带刺，幸灾乐祸地看着鲍陀。

“将军，中国有句话，叫作唇亡齿寒。俄国人的野心不小啊！”鲍陀这一招很厉害，它触动了张作霖的隐忧。张作霖惧怕蒙古独立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害怕苏俄军队驻在外蒙地区，会对东北形成合围之势，威胁他的统治。

张作霖用手慢慢捻着嘴角的两撇胡子，沉默不语。

鲍陀趁机说：“将军，中国政府并没有承认外蒙独立呀！出兵外蒙，是理所当然的事。”

张作霖眉头一跳，凑近鲍陀说：“只要蒙古王公贵戚不再闹独立，出兵外蒙只是早晚的问题。”

鲍陀的沈阳之行，是出于万般无奈的选择，请张作霖出兵外蒙，亦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只要苏俄军队撤离蒙古，可以再和中国谈判。

然而、张作霖只给了鲍陀一个含糊的答复。他怕出兵外蒙会和俄国人发生武装冲突，弄不好会引火烧身的。

鲍陀回到库伦后，并没有悲观失望，他继续以自己的思想说服碰到的每一个蒙古人，力图去影响他们，转变他们的看法，使他们站到自己一边。同时，鲍陀暗中继续和张作霖来往。

4、悲惨的结局

天有不测风云。鲍陀的行动早为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所不容，他们在平定一次由封建主和喇嘛发起的骚动时，以同党的借口逮捕了鲍陀。同时被逮捕的还有人民政府的两位要员：沙克杖尔札布（前司法部长）、达赖喇嘛（前内政部长）。

苏、乔二人最后以勾结中国军阀张作霖，妄图推翻人民政府的罪名杀害了鲍陀。

至今，对鲍陀这个人物仍然褒贬不一。贬低他的人，把他说成是蒙古人民的敌人；褒扬他的人，则把他说成是蒙古最杰出的领袖人物。但是无论怎样讲，都抹杀不了一个事实，即鲍陀的思想、及其政治主张，对蒙古民族脱离蒙昧无知的中世纪，对蒙古民族走向现代化，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第十节 外蒙克格勃——内防处的设立

自从苏黑巴托尔乔巴山领导的蒙古人民党和军队在苏军协助下解放库伦以后，便在外蒙古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由于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脱离了蒙古的实际情况，强行对蒙古进行苏维埃式的社会改造，因而使得相对平静的社会各阶层掀起了轩然大波。一些丧失了权力、牧场的蒙古贵族纷纷起来反对，持有改良思想的人也谴责人民政府激进的政策。

作为蒙古封建主的总代表，博克多格根虽然大汗的地位得到保持，表面也表示拥护人民政府，但内心深处却始终敌视苏黑巴托尔领导的蒙古人民党。早在蒙古人民军进入库伦以前，博克多格根就曾以蒙古“最高圣僧”的名义向蒙古全境内发布文告

“广大的阿拉特牧民们、现在，我们自治蒙古正处于危机之中。一伙受苏俄共产党操纵的赤化分子，忘图推翻自治政府，使我们变成苏俄的附庸。所以，请不要听从赤化分子的谣言，安心放牧，使蒙古进入更美满的福境。”

这个文告在阿拉特中造应了很大影响，许多人把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等人当作叛乱分子。

库伦解放后，博克多格根虽然反动气焰收敛了一些，但由于他在蒙古人心目中的威望极高、影响极大，他对人民政府的风言风语也时常搅乱着一部分人的头脑。

1921年12月。以沙其喇嘛为首的一小撮上层封建主和喇嘛，阴谋发动武装暴乱。进攻人民政府的办公大楼，结果被一网打尽。

1922年，鲍陀又暗中国军阀张作霖往来，串联人民政府中的许多高级官员，形成了一股反对人民政府的政治势力，影响了蒙古政局的稳定。

继沙其喇嘛，鲍陀事件之后，还发生了喇嘛月比赞桑的叛乱。他利用当地的喇嘛组成僧兵，与人民政府派驻地方的人民军发生冲突，后请来了苏俄红军，才把叛乱平定。

此外，博克多格根也蠢蠢欲动，并唆使策连不勒与日本人暗中来往，想得到日本人的支持。

接二连三的反革命暴乱和妄图颠覆人民政府的地下活动，震惊了蒙古人民党的高层领导。

“这太可怕了！”在一次蒙古人民党的会议上，苏黑巴托尔心存余悸说道，“在我们的革命队伍里竟然混进了这么多的反动分子，国内反动的封建主和喇嘛僧侣如此仇恨人民政府。革命的成果能不能得到巩固，关键在于我们的队伍是不是纯洁，是不是拧成一条绳，共同反对我们的敌人。所以，我们必须时刻提高警惕，既要提防外部的敌人，更要提防内部暗藏的敌人，尤其是那些披着革命外衣的敌人。”

由于蒙古社会各种矛盾的尖锐化，迫切需要蒙古人民党加强自身的防卫力量。于是，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决定建立一个秘密内卫组织，这就是 1922 年 7 月组建的“国家内防处”，后来改称“内务部”。

蒙古人民党“内务部”的官员和工作人员，都是完全仿照苏俄全俄特别委员会和国家统一政治保卫局，即克格勃的方式训练的，具有克格勃的精明强干，同时也冷酷无情，对蒙古人民党加强内部控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第十一节 “元首”暴死之谜

1、暴死的 30 岁“国父”

蒙古境内层出不穷的反革命事件，使得苏黑巴托尔殚精竭虑，日夜忧思。不久，长期的高度紧张和疲劳使苏黑巴托尔病倒了。

刚开始，苏黑巴托尔感到头有些晕，他没有在意，硬是撑了过去。不久，他便感到心力衰竭，力不从心。苏黑巴托尔的妻子乌丝诺瓦，是一位体贴的少妇，她觉察出丈夫的气色不大对头，立刻叫来了医生。医生经过诊断，说是苏黑巴托尔神经紧张，用脑过度的缘故，只要休息几天，就会恢复过来。苏黑巴托尔经不住乔巴山的反复劝说，勉强停下身边繁忙的工作，住进了蒙古人民军的医院。

在医院里，苏黑巴托尔遵照医生的叮嘱吃药、休息，生活很有规律。不久，他的精神渐渐好了起来，又开始关心党内的各种事务。

每天清晨，他都要仔细阅读当天的《蒙古真理报》，思考蒙古党和政府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难题。自从鲍陀被处决以后，他总是感到惶恐不安，担心党内会潜在着许多类似的人，因而神经整天又绷得紧紧的。

“外面没有人闹事吧！”时不时地，他总是显得很幼稚似地爱向护士说这一句话。

有时，他一个人静静地坐在花园僻静处的椅子上，默默地回忆起自己的一生：从一个贫苦的阿拉特牧民家庭出身的苦孩子，到成为蒙古人民党的领袖，这期间他经历了作学徒、当兵、加入革命党、流亡俄罗斯等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和惊心动魄的生活，也享受到了解放库伦、创建国家的喜悦和激动。到莫斯科会见了列宁和斯大林，是他一生政治中涯的顶峰，是他一生当中最值得骄傲和幸福的时刻。

今年，他才三十岁，正是为革命事业卖力的好时候。他想到了广大的阿拉特牧民，想起了列宁的教诲，他立志要消灭蒙古境内所有的剥削阶级，把蒙古建设成为象苏俄那样的国家。

蒙古人民党和政府的领导很少来看望，他们怕打搅他的休息。时间一长，苏黑巴托尔感到寂寞，他决定提前出院。可是，死神的阴影正向他笼罩过来。

一天夜晚，苏黑巴托尔用过药后正躺在病房读报。忽然，他感到腹部一阵绞痛，随即头晕目眩，四肢无力地瘫倒在病床上。

当医生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昏迷不醒，口吐白沫，气息奄奄。医生对他进行了紧急抢救，可是为时晚矣，他在清醒了短时间之后便永远停止了呼吸。他临死前挤出的最后一句话是：“转告人民党，必须使一切工作都维护劳动的阿拉特的利益。”

经后来检查，苏黑巴托尔死于中毒。这一天是 1923 年 2 月 22 日。

苏黑巴托尔是蒙古人民共和国早期革命史上的英雄人物。他创建了蒙古的革命党，在苏联支持下赶走了外蒙境内的中国驻军，推翻了封建主和上层喇嘛对蒙古人民的压迫，并使外蒙古摆脱了中国的管辖，倒向了苏俄的怀抱。

1923 年 2 月 26 日，库伦举城悲哀，蒙古人民党和政府为苏黑巴托尔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后来，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首府乌兰巴托修建了苏黑巴托尔的陵墓，碑石上镌刻着他的遗嘱：

“注意！别让我们所争得的自由再落到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封建主手里。为了不失去这自由，必须深入革命，对敌人进行无情的斗争！”

2、凶手之谜？

苏黑巴托尔之死，震动了整个外蒙古。乔巴山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捉拿凶手。但是，蒙古“内防部”的“克格勃”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未能侦破毒杀苏黑巴托尔这一事件，最后逮捕了医院的几位医生、枪毙了医院院长，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围绕着苏黑巴托尔之死，人们议论纷纷。整个事件扑朔迷离，如同巫山云雨，真相始终隐而不露。

事隔二十年后，在 1940 年 12 月，乔巴山元帅在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全会上声称：“以丹尚为首的人民公敌，使患了病的苏黑巴托尔和其家属隔离，借口医病，用毒药害死了他。”他解释说，丹尚企图用毒死苏黑巴托尔的办法，引起蒙古人民党内部的混乱，以达到阻止阿拉特反对封建主的目的。

但是，事件的原委果真如此简单吗？凶手到底是谁，至今仍是一个谜。

第十二节 哭泣的中国

在近代历史上，中华民族饱受列强的欺侮，大好河山，被沙俄政府恶魔一般一口一口吞食着。外蒙古的分裂，使得剩下的象美丽的秋海棠树叶一般的中国版图的北面，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缺口，象是被害虫咬掉似的。

的确，中国这棵美丽的秋海棠树正在患病，她病得不浅，树叶剥落，美丽的树叶虫痕斑驳，支离破碎。啊！美丽的秋海棠紫红色的秋海棠清香温雅的秋海棠。

令人魂牵梦绕的秋海棠。

美丽的秋海棠在秋风中飘落了！

在近代史上，中国政府曾有过几次解决外蒙问题的绝好机会。

一次是在十月革命中，沙俄统治被推翻，沙俄扶植的博克多格根“自治政府”惧怕十月革命的烈火烧到蒙古土地上，于是慌忙向中国政府求援，这本来是恢复主权的好机会，可惜中国政府派遣的徐树铮，率兵占领库伦后，蛮用武力，结果失去了蒙古王公贵族的人心，导致博克多格根倒向了沙俄白匪恩琴的怀中。中国军队也被排挤出外蒙古。

再一次是苏黑巴托尔革命后，投靠苏俄，激起了蒙古王公贵族和上层喇嘛的普遍不满。苏黑巴托尔凭借苏俄政府作后盾，在蒙古强制推行苏维埃式的改造政策，逼得蒙古王公、上层喇嘛以及民间人士纷纷跑到中国内地，寻求援助。然而，这一次机会，却又再次断送在中国军阀的手中。曹錕、吴佩孚、张作霖及中国的其他大大小小的军阀，置外蒙分裂国家于不顾，一心忙于内战，耽误了解决外蒙问题的最佳时机。

从此，外蒙便在苏、乔领导下，一步一步走向了苏维埃化的道路，距离中国也愈来愈远，愈来愈陌生了。

从此，美丽的“秋海棠叶”不完整了。

外蒙古独立内幕（7-1）第六章 夹缝中的独立

第一节 活佛之死

1、忧郁烦躁的活佛

1924年的春天，从太平洋海域吹来的热带季风，登上了深居内陆的蒙古高原，把覆盖在这片土地上的西伯利亚冷空气赶进了北冰洋。转眼之间，枯黄的草原披上了一层绿装，南下的飞鸟，这时也顺着季风的方向返回了北方的家园。草原显得一片生机勃勃。

蒙古的草原上，开始出现了牧民们放牧的身影，充满青春活力的少男少女们，穿上各式各样的蒙古服装，骑着健壮的马儿在自由自在地奔驰、追逐戏嬉；有的姑娘悄悄地躲在河边的草丛中，脱掉自己的衣服，一边洗澡，一边欣赏着大自然的美妙。春天给她们带来了感受生命的勇气，春天也给她们带来了思念情人的契机。

可是，在这美妙春光的另一面。这个世界却依旧是在残忍地撕杀和冷酷地对抗以及无休无止地征伐之中。蒙古草原上，也有寸草不生的戈壁滩和荒原。这也正是外蒙古人民当时命运的写照吧。

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共产主义的“幽灵”就一步一步地走向了外蒙古这片封闭、落后、保守的土地。经过几年的激烈斗争，终于实现了苏维埃化，整个蒙古国家完全按照俄国革命后的形式进行发展。

到1924年的时候，全国都已经控制在以乔巴山为首的“蒙古人民政府”的手中。外蒙的“克格勃”们在国内实行红色恐怖政策，把一切可疑的动乱因素都除掉了。外蒙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获得了苏维埃式的发展。从库伦的政府，到外蒙古的各个地方政府，都建立了人民的政权，剥夺了领主王公和僧侣喇嘛们的权力和地位。

作为蒙古民族的精神领袖的喇嘛教“最高圣僧”博克多格根，面对红色蒙古的一系列措施，忧心忡忡。他不禁对蒙古民族在近代的命运感到悲哀，但又毫无办法。虽然他们靠过沙皇俄国，也勾结过日本天皇，同时也曾同中国的军阀们有过来往，目的都是想成为成吉思汗的大汗，脱离外来势力的干预。可是现在，自治的蒙古是没有了，蒙古也“独立”了。

有时，他一个人靠在活佛宫殿的宝座上独自冥想，也不禁黯然神伤，叹气道：“唉！想不到我堂堂的蒙古喇嘛教活佛，如今却落到这步田地、真让人寒心啊！”

当他见到年老的僧侣喇嘛时，也情不自禁地发一通感慨，“蒙古啊，说是叫蒙古，其实却快要变成苏俄的一个共和国了，遍地是苏俄红军，到处是平民的造反活动。我们这些世代继承下来的领地，财产和地位，只怕再也保不住了”。说着说着，禁不住流下了苦涩的眼泪。

的确，当俄国发生革命的时侯，博克多格根最担心的就是俄国的红色思想传入蒙古，所以，他防止赤祸象防止瘟疫一样谨慎。后来，为了保证外蒙古的“自由”，他主动提出归附中国，取消自治，也是为了让外蒙古免除俄国的赤祸。再后来，徐树铮领兵进了库伦，使博克多格根对中国也大为失望，于是转向投靠沙俄白匪恩琴。可是，流亡在苏俄的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却竟把苏俄红军招引到了外蒙古、占领了外蒙古。他这位在蒙古至高无上的活佛变成了一个虚假的摆设——聋子的耳朵，一切都沿着他不愿发生的方向发展下去，每每想到这里，他都感到十分痛心。

于是，他阴谋促成恩琴出进西部蒙古，鼓励沙其喇嘛反抗。然而，与他有共同想法的原人民政府总理鲍陀，早已横尸法场，多少熟识的牧主和僧侣都相继死去。他为这些人的死感到悲痛，同时内心也感到深深的歉疚。因为，正是他鼓动他们反抗人民政府的。

事情一天天地过去了，博克多格根想推翻人民政府的梦想也一天天地化为泡影，他感到一阵阵的凄凉和辛酸，也感到一种梦幻灭后的绝望。他的心事一天天加重，

精神也慢慢地消沉下去了。

2、走向死亡

到四月中旬，天气渐渐暖和起来了，但博克多格根的脸色却越来越阴郁。他们在豪华的库伦活佛宫殿里，进出都有喇嘛侍候，但却终日无事可做，也无活可说，闷闷不乐过着“囚徒”一样的生活。

在前年沙其喇嘛事件中。他开始时是竭力支持沙其喇嘛组织起来反抗人民政府，可在沙其被人民政府逮捕以后，他又感到十分为难，最后被迫当着沙其的面揭露沙其的罪证，以图能自保。当时“人民政府”首脑苏黑巴托尔认为还不到让博克多格根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就欣然把他当成革命的“朋友”加以赞扬了一番。博克多格根算是逃过了这死亡关口。

在鲍陀事件中，他做得十分秘密，因而没有被“人民政府”发觉。但“人民政府”里的人都十分明白，博克多格格是反对人民政府的总代表，只是暂时还没有找他算帐罢了，博克多格根因此既感到庆幸，又十分害怕，终日提心吊胆的。

苏黑巴托尔在库伦被毒药毒死，使博克多格根预感到大祸即将临头。他对身边的亲信说：“这件事足以看出蒙古人民对这位新兴起的独裁暴君的恨恶到了何种程度。但是，杀一个苏黑巴托尔又有什么用呢？整个蒙古都被苏俄红军牢牢地控制着，有他们作后盾，蒙古就不会有自由的另年天。现在，杀了苏黑巴托尔，只能招来他们在全国更大规模的赤化。蒙古的一切都将打上苏俄的标签啊！”

博克多格根预料得不错，“人民政府”在苏黑巴托尔被谋杀之后，进行了一场严厉的整肃运动，剥夺了一切封建领主的特权和财产，如果稍有反抗，蒙古人民军和苏俄红军就立即进行镇压，用武力推行苏维埃式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以继承苏黑巴托尔的遗志。

在乌里雅苏台，有一位地位很高的世俗王公，在过去的日子里，他一直追随博克多格根。他在地方上德高望重，深受当地官民们的尊敬。当苏黑巴托尔推行的改革进行到乌里雅苏台时，他也主动配合，把自己的一部分家产让出来捐给“人民政府”，因而受到的当地人民的加倍信任与爱戴；

但是，在苏黑巴托尔被杀以后，各地都进行了反封建主的斗争。这位王公在乌里雅苏台也不能幸免地受到了镇压。当他偷偷逃到库伦，找到博克多格根诉苦时，博克多格根悲伤地对他说：“事已至此，哭也没用。你最好是回到内蒙古去，请他们带中国军队来，赶走这帮俄罗斯强盗和他们的走狗！”

这位王公后来果然逃到了内蒙古，但打回外蒙古的梦想却最终落了个空，贫弱的中国怎么能和苏维埃俄国发生重大的对抗呢？博克多格根面对剧变的国内形势，感到自己被“人民政府”一脚踢开的日子不远了。所以，内心的焦灼日益加重，久而久之，又因年老体衰，终于一病不起。

1924年5月20日，这位曾经在外蒙古翻云覆雨奔走一生的活佛静静地死在他自己的宫殿里。

蒙古人民听到自己的精神领袖、最高圣僧博克多格根活佛的死讯后，有的跪在地上为他祈祷；有的为之抱头大哭；有的来到喇嘛寺院祈祷他早日轮回。人们都感到在精神上失去了一种支柱。蒙古传统的宗教信仰，使他们对自己心目中的圣僧感到无比的崇敬，而活佛的死自然就使他们的心情无比伤痛。

3、活佛升天之后

就在博克多格根死后的当天，“蒙古人民政府”在乔巴山、丹尚等人主持下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决定把博克多格根的大汗印鉴交还给“政府”，也就是说，政府从此废除蒙古大汗的位置，取消“蒙古人民政府”之上的这种虚位。

乔巴山在会议上说：“现在，我们蒙古在苏俄红军的帮助下，经过一段艰苦的阶级斗争，已经取得了社会改革的巨大胜利，剥夺了封建主阶级的财产和权力，把它还给了广大的阿拉特贫民，这是苏黑巴托尔同志的遗愿，也是我们革命的目标。但是，国内各种反动势力是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的权力的，他们时刻想着如何推翻‘人民政府’，重新恢复他们的特权。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反对‘人民政府’的总代表博克多格根死了，这对广大的宗教信徒来说可能是一种损失，但对我们革命的蒙古人民而言，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同志们，我相信在不久，我们的蒙古就会变成一个崭新的国家了！”

人们对他的这段话报以热烈的掌声。

接着，当时的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军政部长对到会的人说：“博克多格根死了。帮助我们‘人民政府’解决了一个心头的隐患。因为博克多格根是封建主势力的象征，而且在蒙古人民的心目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当我们的‘人民政府’刚刚建立时，群众基础不够稳固，因而保留了他做我们的大汗。现在，我们的革命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了，正好他也死了，这可以减少‘人民政府’与封建主之间的矛盾，迅速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具体地说，就是让蒙古毫无顾虑地从君主立宪过渡到人民共和国。”

这句话说得十分响亮，大家都报之以热烈的掌声，好象博克多格根的死给他们带来了幸福的兆头似的。

博克多格根的葬礼举办得十分隆重，这是按照蒙古传统的宗教仪式举行的，博克多格根的棺材被高高地抬起，走在送葬队伍的中间；前面是长长的喇嘛，边走边散着白纸花；接着是吹鼓手吹着沙哑的号角；再后面是各地僧侣的领袖，还有一些幸存的王公贵族。“人民政府”派丹尚发表了讲话。西藏也派喇嘛教代表前往参加葬礼。送行的队伍很长，有的人甚至在队伍里哭泣。到处都站着革命政府派的武装警察，以防坏人暗中捣乱。

博克多格根的那些贫苦的阿拉特信徒依然跟在道路两旁，为他们的活佛送行，

同时也祈祷着新的活佛转世成人。

第二节 “蒙古人民共和国”出台

1、别了，封建的君主制

1934年6月7日，乔巴山、丹尚等召开了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由丹尚主持，乔巴山做了主题性发言。

乔巴山说：“同志们，我们蒙古人民革命党是在蒙古民族遭受外来帝国主义的重重侵略和压迫，内部封建主和剥削阶级的残酷剥削的历史条件下成立的。从1921年发动革命以来，经历了风风雨雨的考验，今天，终于获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其中也有很多令人吃惊的错误：我们把革命的敌人鲍陀当成了革命的同志，结果导致他利用党对他的信任，阴谋改革党的路线，妄图把蒙古拉回到帝国主义的老路上去。幸亏苏黑巴托尔和党的其他领导及时发现了他的阴谋，使我们的革命免受了一次可怕的危险。

现在，苏黑巴托尔离我们而去了，但他的遗愿却有待于我们去完成。为了广大的贫苦的阿拉特人的利益，为了彻底消灭人吃人的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我们推行了政治和经济的全面改革，已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就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博克多格根死了，这对于我们的革命事业来说是件好事情。他活着，蒙古人民心目中多了一个活佛，但却得忍受贫苦的折磨；现在，他死了，我们可以彻底告别旧蒙古，这有利于我们建设一个崭新的蒙古。”

他接着说：“我们必须告别昔日的君主立宪政体，建立共和的政体，把最高权力还给人民”。

“人民政府”按照人民革命党的方针，通过了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决议。

乔巴山的讲话引起了与会人员的强烈反响。

“这样做是不是太冒险了一点？国内局势才刚刚稳定，就急急忙忙建立共和政体。是不是会与蒙古的具体情况相脱离呢？”一个中等个子的军官说。

“用不着担心，咱们有苏维埃红军当靠山还用怕谁？革命只是迟早的事，晚革命不如早革命，小革命不如大革命嘛！再有，咱们死了一个苏黑巴托尔，还有乔巴山在为我们顶着，革命就不会失败的！”另一个穿蒙古服装的中年人对这位军官说。

“是的，我们有苏俄红军的支持，我们还有乔巴山将军的领导。但是，我们不能置蒙古民族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于不顾，我们不能有了权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应统观全局，从整体利益出发！”那位军官显然有点急了，跟这位中年官员争执起来。

乔巴山听到他们的争论，走过来问：“你们在争论什么问题？”

那位军官说：“报告将军，我对我们这个决议中的某些建议还有点不能理解。”

“有什么不明白的？”乔巴山问。

“我觉得，我们现在推行的政策已经脱离了蒙古的实际了。”军官回答说。

“这话怎么讲？”显然，乔巴山对这位军官的提议感到吃惊。

“我觉得，在对内政策方面，不应该把阶级斗争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实，在蒙古民族中，贫富对立并不象俄国那么严重，而且在王公贵族和僧侣喇嘛当中，也有许许多多深受人们尊敬的人，他们是我们民族的真正支柱。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凡是有钱有势的，就一块儿杀掉，这只能使我们民族的生命力受到摧残。所以，我认为，不能太早地成立人民共和国，而应继续保持现在的状态，让那些很有名望的封建主和上层喇嘛也来参与我们国家的建设。”

军官一口气说了很多，说得很痛快，乔巴山沉默不语。他说到这儿，稍停了一下，看了看乔巴山的脸，乔巴山抬起头，看了他一眼，问道：“还有呢？”

那位军官见乔巴山还想听下去，就来了精神，接着说：“还有，在对外政策方面，也不应该一切都向苏俄看齐，象是人家的附庸一样，而应堂堂正正地与中国、日本、美国，还有欧洲各地建立外交关系，这才象个国家的样子。”

即位军官满以为乔巴山会给他几句奖励的话，没有想到乔巴山只是冷冰冰地回答到：“多谢你的指教，不过，你这个想法倒与鲍陀十分相似。你要记住，鲍陀因为他的思想可是掉了脑袋的呀！”

那位军官听了这番口话，象是吃了一口沙子一样，没法子咽，也没法子吐，只是向乔巴山敬了个军礼，就走出了会议室。

这份军官名叫彭楚克，在军事部担任要职。他出生在一个阿拉特牧民家庭，小名叫木贴儿，长大以后改名彭楚克。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病逝了。他与年老体弱的母亲相依为命，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过着十分艰难的生活。为了供养全家，彭楚克到牧场主那去当牧奴，挣几个钱，后来，他实在忍受不了牧奴的悲惨生活。因而，就到库伦给清朝驻蒙古的老爷去当听差，对清朝的政治生活了解得较多，清帝退位后，沙俄扶持博克多克根建立“自治蒙古”，彭楚克出于生计加入了由俄国人操纵和训练的自治蒙古军。沙俄十月革命后，中国军队回到库伦后，解散了非法组织的自治蒙古军，彭楚克就落草了，练就一身胆识，为人精明强干，处事十分干练，深为蒙古弟兄们推崇。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起来时，彭楚克已经三十五了，就投奔过去，因满脸胡子，被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尊称为“胡子大哥”，被任命为第二骑兵团团长，与布麻曾德地位相同。

彭楚克出外谋生以后，他的母亲和弟妹因为一场疾病全都病死了，这在彭楚克的心灵投下了很大的阴影。当他参加苏黑巴托尔的人民军的时候，只有一个简单的

想法，让每一个蒙古人都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而苏俄传播来的列宁主义正是宣传这种思想，所以，他很快成为人民党的骨干。

在人民军进入库伦以后，他一直负责库伦的保卫工作，直属于军事部。每次举行党内重要会议，他都参加。但在过去的日子里，他很少明确地表述自己的意见，今天，在这次决定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重要会议上，他觉得有必要讲明自己的观点。于是向乔巴山讲了这一番话。设想到，乔巴山给他了一个令他失望的回答。

2、向苏俄看齐

乔巴山听了这位军官的一番话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回到家以后，他独自一人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正当他在愁思冥想之际，他的妻子伊斯娃端着一杯烫烫的茶水，轻轻地走了过来，对他说：“刚刚开完会，又在想什么？”

“我在想，我们革命革了半天，终究是图个什么？整天这样忙忙碌碌的，而很多人对我们的行动还说三道四的。现在，苏黑巴托尔去世了，很多事情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了。”乔巴山不无忧虑地说。

“你应该对自己的行动有足够的信心才对，尤其是现在，博克多格根刚死，你们又想取消君主政体。建立共和国，所以最好还是谨慎从事，既不能过于武断，也不能太优柔寡断。”伊斯娃对乔巴山关切地说。

“你说得对，在这个时候，如果我过于武断，很可能造成革命阵营的严重分歧；而如果我过于优柔寡断，那么。几年的革命成果很可能会毁于一旦。”乔巴山说着，心中依然感到格外沉重。

伊斯娃和他是在患难中结识的朋友，也是革命道路上的战友伴侣。当乔巴山在俄国念书的时候，正好在那所学校里见到了伊斯娃，两人一见倾心，彼此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伊斯娃出生在外蒙古一个小封建主的家庭，生后虽不富裕。但也不贫寒。由于她天资聪明，被当地工会送到俄罗斯去读书，希望将来能成人才。

乔巴山与伊斯娃在俄国念书时，就十分关心蒙古民族的命运，经常在一起讨论一些问题。也就在那时，他们接触到了一些苏维埃革命的思想，逐渐产生了共产主义信仰。

十月革命以后，乔巴山和苏黑巴托尔联合组建人民革命党，她也是积极支持者之一。在恰克图、伊尔库茨克等城市流亡期间，她既是乔巴山的妻子，同时又是乔巴山的秘书。直到革命一步一步地发展，伊斯娃都毫无保留地帮助和照顾乔巴山，尤其是苏黑巴托尔死后，乔巴山的工作更加繁重，伊斯娃也同时背负起了更加重要的担子。

现在，蒙古人民政府成立不到三年，就出现了沙其喇嘛的阴谋反叛，鲍陀的阴谋反叛以及苏黑巴托尔的暴死，此时，乔巴山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真有点拿不准主意了。乔巴山又想到彭楚克：“这位出身贫苦的革命干将思想怎么会和鲍陀一样，

这是很危险的，这会把蒙古引回到帝国主义的怀抱，让蒙古再次受帝国主义的压迫，这不行。我们只能和苏俄建立很好的关系，绝不能和那些军阀和资本家的政权勾结。”接着又陷入了沉思。

伊斯娃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她只能通过话语言安慰丈夫，给丈夫以新的勇气和力量。

经过一番认真的思考，乔巴山终于下了最后的决心。他对身边的伊斯娃和其他工作人员大声地说道：“不能再犹豫了，革命是残酷的，但革命是推动历史前流的动力，我们今天的革命，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幸福。为了这个目标，我们杀一批人，剥夺一批人的财产和特权是应该的！所以，革命不能手软，手软就不要革命。苏俄是我们革命的航标灯，一切向苏俄看齐，是的，要向苏维埃俄国看齐，同苏俄兄弟一道，反对中、日、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一个真正的蒙古人民的儿子。”

说到这儿，乔巴山又捧起了 1921 年在恰克图召开人民党第一次大会时的纲领，其中主要的一条就是驱逐外国侵略者，反对国内封建压迫，建立人民政权的自由国家。他好象找到了归宿一样，坦然地笑了。

就在这次全体会议之后十天，蒙古“人民政府”于 1924 年 6 月 13 日公布了会议的决议，宣布“蒙古为人民共和国，不设总统，共和国的最高权力属于大呼拉尔。”这也就是说，大呼拉尔成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最高决策机构，而在大呼拉尔休会期间，由人民政府行使其权力，人民政府则自始至终负责执行全国人民的一切决议。

第三节 两虎相争

1、一个会场，两个派别

1924 年 8 月 4 日，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库伦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对蒙古人民在新的历史阶段的奋斗目标作了详细的讨论。在大会召开的第一天，会议的观点就分成了截然不同的两源。

这次代表大会由人民政府副总理兼人民军总司令丹尚主持。在大会的开幕式上，丹尚很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观点：

“我们蒙古民族是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的伟大的民族，我们的祖先曾经在人类历史上创造过光辉灿烂的历史篇章。但是，自从元朝灭亡以后，我们的蒙古祖先就退居在蒙古草原，直到明朝末年，满洲旗人努尔哈赤与我蒙古联合，攻占了中原，于是满蒙联合统治汉人近三百年。满清灭亡后，中国成立了中华民国，蒙古则投入了沙俄的怀抱，建立了不伦不类的“自治蒙古”，博克多格根软弱无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人利用，使我们蒙古民族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蒙古人民的英雄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元帅，经过艰苦努力创建了我们人民党。在我们人民党周围，团结了蒙古民族的优秀儿女，为了蒙古民

族的解放奋不顾身，经过革命斗争，取得了革命的政权，建立了人民政府。

但是，作为贫苦人民利益代表的人民政府，并没有狭隘地从小处着眼，而是从民族整体利益着眼，分析了蒙古的现状，认为，我们现在的社会离中世纪并不远，因而，在考虑社会改造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这一个事实。因此，在我们人民军占领库伦以后，我们选择了君主立宪政体，保留了蒙古人民精神领袖大汗的地位，使革命处于稳步的前进中。

现在。我们宣布成立了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归于蒙古人民。我们的目标仍然是为了蒙古民族的繁荣和富强，为了蒙古儿女的自由和解放，我们必须对内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把积极向上的封建主、喇嘛教僧侣以及蒙古的各行各业的人民团结起来，建成统一战线，发展国民经济，推动社会的进步。对外，我们必须联合一切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国家，与外国广泛地建立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联系，为建成崭新的蒙古而努力奋斗。鉴于目前我国生产力极为低下的现实，我们要允许一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存在，作为发展社会经济的加速器。

这一段长篇大论，讲得十分精彩，在座的人大多数都被深深地打动了，满怀热情地准备为蒙古的建设出力。

但是，坐守主席台上的乔巴山听着听着就感到不是滋味了。尤其是那位曾经在西部蒙古被围困四十二天，现在做了苏联驻外蒙古大使的贝加罗夫将军听了以后，更感到不是滋味，因为，他听着丹尚的讲话，好象在外一位西方自由主义演说家的演说一样。丹尚对苏俄政府及其红军给予蒙古的援助似乎已经淡忘了，对苏俄红军为蒙古的自由解放而流的血已经记不起来了，这使贝加罗夫将军大为恼火。心里骂道：“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第一天的会议开始后，就在会场内产生了骚动，两种不同路线的思想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一些人反对丹尚的讲话，认为这是向帝国主义暗送秋波；一些人则支持丹尚的讲话，认为这是蒙古振兴的必由之路。

这样，就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两种意见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导致彻底的决裂。

2、内斗仍在继续

由于乔巴山感到丹尚的讲话与他的政治观点大相径庭，于是决定召开紧急会议，由人民政府和党中央的重要代表参加。在会议上，苏俄驻蒙古大使贝加罗夫将军也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发言。

贝加罗夫说，“今天的党代会、我作为苏俄的代表，是来旁听的，本来不想发表意见，但是，听着会上某些同志的讲话，实在让我无法再忍受了。蒙古是我们苏俄的邻邦，而且是在列宁的思想指导下建立起了人民党，人民政府，现在又建成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在这条革命的道路上，苏俄一向都是以蒙古人民最可靠的朋友的身份出现的，可是，现在却有人提出要同中国、日本、美国，甚至西欧各国建立友好关系，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对我们苏俄表示不信任呢？我作为为蒙古人民解放而吃过苦流过血的老战士，深感痛心啊！”

他的话让大家都感到震惊，尤其是丹尚，当他听到贝加罗夫的这种质问的口气时，感到很有必要对自己的观点再作一番解释。于是他转过脸，对贝加罗夫说：

“贝加罗夫同志，你作为我们的朋友，我们是表示热烈欢迎的。对苏俄朋友在过去的几年中，从物质上、军事上和精神上给予蒙古人民的支持，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这一点请你放心，我们是有恩必报的。只是目前蒙古的形势实在不容我们过于乐观。我们只能面对蒙古的具体情况去实行合乎时宜的政策。所以，我们不能一切都向你们俄国看齐，更不能受你们政府的控制。我们不能一切都听从你们政府的调度，我们应按照本国的法律去做我们自己的事情。至于同中国、日本、美国以及西欧建立外交关系，这是我们的内政，应由我们自己来决定，所以，请贝加罗夫同志不要误解我的意思。”

丹尚的话句句在理，使贝加罗夫哑口无言。坐在丹尚旁边的乔巴山却一下子站起来对丹尚说：“丹尚同志，我们的人民党党纲中并没有提到说与资产阶级政府建交的事啊，只是反复强调了同苏俄政府和苏俄红军建立亲密的友谊。你一心想把蒙古拉到帝国主义的阵营中去，一心想包庇国内的封建主阶级，究竟你用心何在？”

这一问，反而把丹尚给问呆了；他没想到乔巴山居然会怀疑他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他感到十分气愤，据理力争地说道：

“我的居心是让蒙古民族重新走向繁荣和富强，每一个蒙古人及其家庭都能过上舒适的生活。”

“不，丹尚同志，我不会相信你的这一套漂亮言词的。在你上午的讲话中，你口口声声强调的是蒙古的自由和富强。可是，你有没有从人民党的利益出发去考虑过问题呢？”

“乔巴山同志，这话是什么意思？”丹尚反问道，心里一阵不舒服。

“什么意思，我告诉你。还有我们党内的一些在阶级立场和思想方法上有问题的人，请你们记住，蒙古人民党是在列宁的指导思想和原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她的使命是推翻外国侵略者在蒙方的势力，推翻国内封建主阶级，解放劳苦的阿拉特人民，并为阿拉特人民的利益而战斗到底。我请问，你们有谁还记得苏黑巴托尔元帅临终前的遗言？”

一位年老的官员说道：“苏黑巴托尔临终时嘱咐我们：要神圣地保持人民已争得的自由，必须永远使党的政策和政府的措施服从于劳动阿拉特群众的利益，使阿拉特摆脱内外敌人的枷锁，巩固他们的自由。”

“说得好！他要我们一切都必须服从于阿拉特的利益，”乔巴山说：“在苏黑巴托尔同志的墓碑上刻着什么话，谁还记得吗？”

另一位比较年轻的官员回答说：“苏黑巴托尔同志的墓碑上刻着他的遗言：

“注意！别让我们争得的自由再落到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封建主的手里。为了不失去这个自由，我们必须深入革命，对敌人进行无情的斗争！”

“答得对！他要我们为了不失去争得的自由，必须同敌人进行更加艰苦的斗争。我们的革命路线是列宁的路线，他要求我们在国内要实行彻底的阿拉特革命，先建立君主立宪的民主国家，等时机成熟后，再跨越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而直接建成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是非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

丹尚听到这儿，已经忍无可忍了，他狠劲地拍了一下桌子说。“乔巴山同志，你在过去的革命中是深受人民尊敬的。因为你的思想与蒙古人民十分接近，所以，也得到了他们的爱戴。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人们会把你的错误见解也当作真理来接受。请你注意：刚才你向我提出的几点意见都有值得重新考虑的必要性，你说人民党是在列宁的革命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目的是为了推翻当时的沙俄白匪和中国军队，推翻反动的封建主阶级，这是对的。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就忘记联合一切国内的可以团结起来的力量，联合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们的国家。应该把民族的振兴作为我们党奋斗的目标。

“在自立自强方面，我们摆脱了沙俄的欺辱，打退了中国军阀军队的入侵，恩琴白匪的独裁，可是现在，上十万的苏俄红军驻扎在蒙古境内，难道不样会加重蒙古人民的负担吗？作为独立自主的蒙古，在独立之初需要苏俄的支持，但在独立以后，为什么还要让这么多的军队留下来，这难道不正说明了我们在政治上的软弱吗！”

“至于苏黑巴托尔同志的遗言，我想提醒一句，苏黑巴托尔的话，就一定是真理吗？我们为什么要用一个死人的思想来捆绑住活人的灵魂呢？我们为什么不面对现实，去实实在在地处理实际问题呢？”

丹尚的话使乔巴山瞠目结舌。他厉声说道，“丹尚同志，你作为蒙古人民政府部长会议副主席，同时又是我军事部总司令，怎么可以这样地说苏黑巴托尔同志呢？对你这种肆无忌惮地攻击革命，攻击革命领袖的行为，人民党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在坐的到会代表，面对丹尚和乔巴山这种针锋相对的争论，都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因为这两个人现在在党内都有很高的威望。

正在这时，代表大会上的一位年轻的代表巴伐桑站了起来，向乔巴山说：“我认为，丹尚同志的某些建议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例如：对内政策方面，对封建主的确应该放宽政策，不应该打落水狗。他们手中的财产除了用非法手段获得的以外，大都是经过几代人的积累才建立起来的，我们借用革命的力量剥夺他们的财产，是对他们的一种侵略和过激行为。”

乔巴山听见这位代表为丹尚帮腔，十分气恼地转过脸，对巴伐桑说：“是吗？你说不打落水狗，落水狗可是会跳到地上来咬你的。历来的封建主的财产都是阿拉特的劳动果实，剥夺他们的财产和特权，是我们革命的职责。你要当心自己的头脑，别被某些人的妖言迷惑了！”

大家都楞着不说话，乔巴山终于宣布休会，下午继续召开全体党员代表会议。

3、被苏联红军逮捕后处决的“蒙古人民军总司令”

这次会议散了以后，大家心里都感到闷闷不乐，忧心忡忡的，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天慢慢地阴沉下来，不久就下起了细雨。大家的心请更加沉重了。

丹尚回到休息的住地，心中象浪涛翻滚一样不能干静，他感到大祸要临头了。今天上午，从与乔巴山之间发生的那场口角中，可以后出，乔巴山是不会轻易向他屈服的，而如果他丹尚失败了，那只能是死无葬身之地。

丹尚一边想着乔巴山那张难看的脸，一边考虑自己的处境和对策。这时，他忽然想起鲍陀来了。鲍陀由于把蒙古民族的利益看作是高于一切的东西，因而与苏黑巴托尔发生了争执，结果主动提出辞职，却被苏黑巴托尔的秘密警察抓获，执行了枪决。后来苏黑巴托尔本人也被谋杀了。难道说乔巴山会用苏黑巴托尔对付鲍陀的办法来对付我吗？

他对自己说：“在这个关键时刻，不能有半点犹豫，如果乔巴山对我下毒手，我该怎么办呢？只能先下手为强，对，我先把自己的卫戍部队拉到会场周围，如果他们敢动手，我就朝他开枪，逮捕他们这些苏俄的走狗，还有贝加罗夫。”

经过精心的布置，他的卫戍部队偷偷地把会场包围了起来。

下午，会议照常进行。会议的主题是乔巴山讲人民革命党的改组计划。但乔巴山却把矛头指向了丹尚。

他非常尖锐地攻击丹尚的政治阴谋和野心，要全党都要起来反对丹尚。他列举了丹尚的几大罪状：

“丹尚是潜藏在人民革命党内部的帝俄间谍。在 1921 年革命以前，他是博克多格根自治蒙古政府的小官吏，后来受帝俄收买，成了蒙古人民的内奸！帝俄被十月革命推翻以后，这个老奸巨滑的间谍又投靠了自己的新主子——日本帝国主义者，他奉日本军阀政府的指使，于 1921 年潜入了苏黑巴托尔的革命团体，骗取了党的信任，窃取了重要的职位，成了人民革命党和人民政府中最危险的敌人。

他为了达到个人发财的罪恶目的，利用蒙古中央人民合作社，成为许多中国商行和企业的股东，与中国的资产阶级建立了很深的联系。他利用自己作为部长会议副主席的地位，命令齐齐哈尔省公署向该省人民索讨他们在革命前欠一个中国商号的旧债，这些债务是被革命法令所废止了的，而丹尚却还要人民去为资产阶级还清债务，在此之前，据蒙古人民政府内务部调查，丹尚曾秘密同中国军阀头子联络，力图作为内应，为中国军队入侵外蒙准备条件，以实现他早已梦想的外蒙中国化的所谓“中国梦”。

丹尚听着乔巴出所列举的这一系列罪状，实在听不下去了，他从主席手里拿下话筒，向坐在台下的几百名党员代表说：“各位蒙古弟兄们，你们刚才听到的一切，我向大家证明全是真的，我丹尚全部接受。但有一件事情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要伤害任何一位蒙古的弟兄。我只想让他们变得更加公正，合理、自由！。

乔巴山站起来，命令会场中的军队把丹尚捆起来，丹尚顺手掏出手枪对天放了一枪，把人们都吓坏了，会场顿时大乱。

听到会场里传出的枪声，站在门外的一连士兵立刻冲开会场，封锁了所有的出口，但他们都是来捆绑丹尚的。

丹尚一看，冲进来的不是他手下的蒙古人民军，而是贝加罗夫带领的苏俄红军，心里一下子全明白了。他狠狠地跺了一下脚，束手就擒。嘴里大声骂着乔巴山：“乔巴山，你这个俄罗斯的走狗，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蒙古人民总有一天要跟你们算帐的，蒙古自由万岁！”

丹尚的卫兵没能冲进会场来，原来，当上午的会议结束时，乔巴山顶料到丹尚可能会用武力包围会场，他十分担心自己的处境，于是到苏联红军驻蒙部队司令贝加罗夫那儿寻求帮助。贝加罗夫十分高兴。他对乔巴山说：

“乔巴山同志，你是我们苏俄的好盟友，丹尚是我们的敌人。要知道，他手里掌握着蒙古人民军的大权，我们一定要防备他。”

乔巴山说：“下午如果丹尚带兵冲进会场，那我们怎么办？”

贝加罗夫笑着回答：“没关系，那我们就把丹尚和他的军队一起搞掉！”

乔巴山用感激的目光希着贝加罗夫，并紧紧握住他的手说道：“贝加罗夫同志，我代表蒙古人民再次感谢你的帮助！”

下午开会的时候，乔巴山和贝加罗夫照常参加。

那时，丹尚的军队已经埋伏在离会场不远处的一座小楼里，而贝加罗夫则乘会议正在进行之机悄悄离开会场，把苏俄红军整整齐齐地拉了出来，包围了会场，同时也包围了会场周围的房子。而丹尚军队中的一位士兵不小心暴露了自己，被苏俄士兵发现，立即，苏俄士兵包围了那座小楼，逮捕了所有埋伏在那里的士兵。

所以，当丹尚的枪声响起的时候，正是苏俄红军而不是丹尚自己的军队，冲进了会场，并很快控制了整个会场。

逮捕了丹尚以后，会议继续进行。会议最后通过了乔巴山起草的关于蒙古实行非资本主义的宣言，大体内容如下：

“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通过革命由农奴制阶级地位解放出来的阿拉特经济，本身包含着两个发展趋势：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趋势和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社会基础是从阿拉特中分化出富牧阶级来。得到帝国主义者和某些封建主支持的资产阶级分子企图把蒙古转向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对蒙古走上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这种想法的代表，就是丹尚。他想让蒙古的经济永远依赖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

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社会基础是广大的贫苦的阿拉特牧民阶级。他们在蒙古人民革命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剥夺了剥削阶级的特权和财产，实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合作社制度，把蒙古引向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通过避免发展资本主义，从而实现向社会主义的顺利过渡。这是我们人民革命党通过对蒙古的形势的分析、制定出来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能够顺利发展的主要条件就是苏俄朋友给予我们的大力支持！

同时，大家也应该注意，在实际的革命过程中，不能操之过急。有人说，我们应该立即过渡到苏维埃制度去，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我们一定要在防范丹尚的右倾思想的同时，警惕“左”倾分子的捣乱。

会议接着组成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对丹尚进行了短期审讯，然后，就把丹尚和巴伐桑推出库伦城外，执行了枪决。

阴风凄凄，天气阴暗，见不到阳光，丹尚和巴伐桑的尸首躺在库伦城外的荒野上。雨仍在下个不停。

第四节 1924 年“宪法”

1. 大呼拉尔万岁！

1924 年 11 月 8 日，“蒙古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大呼拉尔在库伦开幕。出席这次大呼拉尔的有四省、科布多区、库伦市、沙双管理机构和居住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代表。到会的共 77 人中，71 人是下层阿拉特牧民，其中有部分是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员或共青团员。

大呼拉尔听取了“蒙古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和地方政权机关的报告，并批准了 1921 年 11 月 5 日同苏维埃俄国建立友好关系的条约，同时责成“人民政府”不断地加强“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之间的兄弟般的友谊，把它作为蒙古独立和自由民主地发展的主要保障。也就是说，“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都应应以苏联作为不可动摇的靠山，亲苏的外交政策是不可更改的国策。所以，苏联红军从此驻扎在库伦和蒙古其它地区，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在国家建设方面，大呼拉尔责成“人民政府”在中央和地方政权机关以及司法制度进一步地进行民主化，广泛地吸收阿拉特代表参加政权机关，把政权牢牢地掌握在贫牧民和中牧民手中，而不要让原来的封建主和富牧阶级参加。这也是大呼拉尔的使命。

在军事力量方面，要加强武装力量的建设，并使全体劳动者都能受到军事训练。

在经济政策方面，大呼拉尔责成人民政府加强国营企业和合作社化的商业，发展国营和合作社工业，邮电通讯，提高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实行货币改革，对牧民中的贫牧户给予经常性的帮助，真正做到人人都有衣食温饱。没收原来封建主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使国家按照国民经济的总体规划，按比例协调地进行。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请求苏联政府的有条件援助。

在人民教育方面，大呼拉尔表示，要“人民政府”不断地扩大学校的数量，并提高学校的教学水平，使更多的蒙古阿拉特子弟都能进学校读书。发展专科学校，培养专业技术人才，以此来准备国民经济各部门所需要的干部。并且能使悠久的蒙古民族文化能在新的历史时期获得新的发展，使蒙古人民早日脱离愚昧、落后的状态，进入到文明，发达的状态。

所有这些措施都是建立在对封建主的剥夺的基础上而进行的，它使广大的阿拉特牧民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获得了极大的提高，使他们的政治地位、经济收入和福利待遇都有了明显的改善，这也是革命政府为蒙古人民做的一点贡献吧，它使“人民政府”在阿拉特牧民心中有了更高的地位。

大呼拉尔会议的召开，在形式上给了蒙古人民一次享受政治权力的机会。所以，他们都认为达到了革命的理想目标。有人高呼口号：“大呼拉尔万岁！”

2、我们也搞个“人权宣言”

大人民呼拉尔经过近二十天的讨论，终于在 1924 年 11 月 26 日通过了蒙古历史上第一部“宪法，因而，使第一届大呼拉尔成为蒙古的“人民制宪”会议。

“宪法”的序言部分《蒙古人民权利宣言》中的内容，基本上概括了“宪法”的核心：

一、蒙古是独立的人民共和国，一切政权属于真正的人民。人民通过大人民呼拉尔及其选出的政府来实行其最高权利。

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基本任务是铲除封建神权制度的残余，巩固以国家管理完全民主化为基础的新的共和制度。

所有靠自己劳动为生的年满 18 周岁的共和国男女公民和人民革命军战士，都享有在呼拉尔（包括大呼拉尔，小呼拉尔和地方呼拉尔）的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

全国土地、森林、水力等皆为全民的财产，在此方面不允许出现私有的状况。

国家拥有经济政策的领导权，不允许私人对外进行贸易。

为了保证人民共和国不受内外敌人的侵略，“人民政府”可以使用一切办法来巩固蒙古人民革命军并普及全体劳动者的军事训练。

全国实行政教分离，宣布信仰是每个公民私人的事情，人民政府不加干涉。

一切居住在蒙古本国内的部族，男女一律平等，国家保证言论、出版、结社、集会和游行示威的自由。“人民政府”保护人民的这些自由。

在“宪法”的条文里还按照全世界劳动者团结的原则，在宪法里规定：

“鉴于全世界劳动人民力求把资本主义根本消灭并达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人民共和国劳动人民应该实行符合全世界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和革命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基本任务的外交政策。”

通过“宪法”的制定，“蒙古人民共和国”以立法的形式把蒙古人民革命的成果巩固了下来。它的内容是模仿《苏联宪法》来制定的，它的原则和基本精神都完全遵循了苏维埃的模式。

大呼拉尔第一次会议的 77 个代表，基本上都是受教育不多的阿拉特牧民，他们对于“宪法”上的各种漂亮的口号，什么主权归于人民啦，政教分开啦，出版，结社自由啦等等内容都是云里来雾里去的，所以，蒙古的“宪法”对于广大的蒙古人民来说，只是一外华而不实的梦。

三、华而不实的梦幻

蒙古人民在中世纪的等级专制制度生活了几千年，想让他们一夜之间都成长成为成熟的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太现实的，也出现了一些不太和谐的现象。

在大呼拉尔期间，乔巴山，布麻曾德，彭楚克，还有贝加罗夫等一些，与参加大呼拉尔的阿拉特们接触，商量国家的未来。

“老兄，你是从乌里雅苏台来的吧？”乔巴山问一个年纪有四十岁左右，但眼睛十分明亮的人，想从他那儿了解西部蒙古的情况。

“是的，我从西部的乌里雅苏台来。”那位中年人回答道。

“这几年，你们那儿变化如何，你对我们的宪法有什么意见没有？”乔巴山问。

“这几年，我们那儿的的变化太大了。过去那些有钱有势的老爷们，现在死的死，逃的逃，留下来的都象缩头乌龟一样，不敢出门。他们的日子活得真惨啦。你们这些当领导的，也该给他们想想啊，不能把人家一棍子打死。我们人民革命竟是要让每一个蒙古人都能过得上好日子，而不是为了专整治人家有钱有势的人。请领导好好想想。至于这个宪法么，说真的，我没有读几天书，对这些问题都弄不太懂，所以，只要是你们领导说同意了的，我们举手赞成就是了。”中年人回答。

乔巴山低着头，想了一想，默不作声。大概这位中年人的话勾起了他对丹尚的愤恨和怜悯。可怜的丹尚，这儿还有你一位同志呢！

乔巴山走到布麻曾德面前，问他：“你对我们的宪法有何感想？”

“乔巴山同志，我坚决同意你所起草的宪法。我们应该象苏维埃那样，建成一个无阶级、无剥削，无压迫的社会。所以，对我们的宪法持赞成票。”布麻曾德显然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也是苏黑巴托尔的信徒。

乔巴山转身问旁边的彭楚克：“彭楚克将军，你对我们的宪法看法如何？”

彭楚克自从上次受到乔巴山的冷淡以后，心中仍然有余悸。此时，也被迫说了违心的话：“不错，我们的宪法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宪法，这表明我们蒙古人民的觉悟也在迅速提高，文明程度在不断加深。这也是我们人民革命党的骄傲。”

乔巴山听后，心里充满欢喜。他终于在蒙古实现了自己在很早以前就想实现的梦幻。在他的身边，再听不到博克多格根的牢骚，也听不见鲍陀的叫喊，也听不见丹尚对他的谩骂。苏黑巴托尔死了，现在，彭楚克服从了，布麻曾德仍然是坚定不移的革命者。今后的道路将是越走越宽了！

第五节 苏俄言不由衷，外蒙主权属于中国

1、以强凌弱，以大欺小

从历史上讲，自从近代中国遭受外国列强的侵略，在北方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俄罗斯。从康乾盛世开始，俄罗斯强盗就从西伯利亚到我国的新疆和东北地区进行抢掠。

鸦片战争以后，他们强迫清朝政府割地赔款，侵占了东北和西北地区的大片领土。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沙皇俄国又将贪婪的黑手伸向了北方的外蒙古。

清帝退位以后的1912年，沙俄政府竭力扶植外蒙古的博克多格根集团为傀儡，力图把外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上独立出去，沙俄政府的这一举动，遭到了中国政府和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中国与俄国鉴定了“中俄声明”，宣称蒙古的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人都不能把它从中国割裂出去。但是，外蒙古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大权实际上都落到了沙皇俄国的手中。”

1919年，博克多格根为了防范俄国十月革命的火陷烧到外蒙古，曾经提出取消自治，于是外蒙古再次回到中国的怀抱；但是，过了不久，白俄匪军首领恩琴率领他的“亚洲骑兵团”，以解放蒙古为口号，赶走了驻扎在库伦城的中国军队，恢复了外蒙古的“自治”。

1921年，苏俄红军直接开进了中国的外蒙古，扶植起了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为首的“蒙古人民政府”，他们无视外蒙古主权属于中国这一事实，一心想把外蒙古从中国独立出去，尤其是俄国苏维埃政府也支持外蒙古搞独立，这就使中国政府感到难以容忍。

当外蒙古成立“人民政府”宣布成为“君主立宪国家”，“看成”是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中国北京政府立即向苏俄驻华大使馆提出严正抗议：“外蒙古历

来都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苏俄红军未经中国政府许可，擅自进占中国领土，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干涉。外蒙古的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允许任何国家以任何理由来加以干涉。因此，中国政府拒绝承认在他自己领土上建立的任何傀儡政权！”

这份严正的抗议书让苏俄的扩张主义者看到，中国广大的人们对外蒙古的所谓“独立”是坚决反对的，那种把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的做法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为了避免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避免两国的直接对抗，为苏维埃俄国争取一个好的国际环境，苏俄政府只好在 1921 年同外蒙签定《蒙俄协定》，协定规定了“蒙古人民政府”同苏俄人民政府之间的友好关系，但苏俄始终不敢公开提出蒙古独立的事情，所以，只能以非法的形式驻兵中国外蒙古，并给予外蒙古以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援助。不过苏俄的援助绝不象他们自己吹虚的那样高尚，外蒙古为此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外蒙古的各种自然资源，马匹、牛奶等物资都源源不断地流进了苏俄境内。苏俄在外蒙古的驻军，使得他在远东地区拥有了一个更具有威慑力量的军事基地。

当时，北京政府的曹锟、吴佩孚想用武力消灭这个背叛中国的政权，但由于当时直奉两系正在展开激战，吴佩孚无力北伐，所以只好忍气吞声用外交的和平手段向苏俄施加威胁，拒不承认外蒙古独立。当时，在东北沈阳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想一举拿下库伦，免得夜长梦多，但由于他的内应鲍陀被杀，加上直奉战争打得正紧，所以都没能够顾得上外蒙古的事务，只是在舆论上给苏俄施加压力。

苏俄政府因为未经中国政府的许可，单方面出兵中国外蒙古，严重违反了国际公约和法则。他们利用中国军阀正在大规模内战的有利时机，肆无忌惮地干涉中国内政，在中国政府的不断抗议之中仍然不断地向外蒙古派兵，推行苏维埃制度，造成外蒙古事实上的独立，这种大国沙文主义是应该受到谴责的。

2、中苏开始谈判，苏俄大使戏弄中国总理

1923—1924 年与苏俄的谈判。旨在恢复中国与苏俄间的外交关系。当时苏俄方面的代表是加拉罕先生，他以特使身份来到中国，在此以前，苏俄曾派越飞先生出使远东。

越飞先生在中国的主要目的是想同中国制定一个他称之为两国合作的计划。虽然他在中国停留了相当长的时间，但未能达到莫斯科的预定目的。

加拉罕先生就是来接替他的职务的。1919 年和 1920 年，加拉罕先生曾以苏俄外交部副部长的身份两次向中国发表声明，宣布了一项非常开明的对华政策，并宣布废除沙俄帝国同中国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所以他的名字在中国并不陌生。早在他到达中国之前，他就曾企图与满州的张作霖大帅达成一项解决办法，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恢复俄国对中东铁路的既得利益。苏俄当时对满州以及西伯利亚和朝鲜境内白俄的活动感到不安。中东铁路局总经理就是一名白俄分子。这个白俄总经理能力很强，在中国住了多年，对中国的国事民情都很了解，但苏俄不信任他，所以加拉罕要与张作霖大帅达成协议的目的之一就是想用一名莫斯科指定的人来接替这个白俄总经理的职位。但加拉罕失败了。之后，他便动身前往北京。当时，以作为中国

知识分子和激进分子的中心而著称的北京大学的教职员和学生们，多次为加拉罕先生举行欢迎会和宴会。

加拉罕通知中国外交部，他作为特命全权代表到中国来的目的是想通过谈判，就所谓指导两国关系的总原则与中国达成一项协议。实际上，他同时还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即中国先同意与苏俄恢复正式外交关系。才能开始谈判。而此时，中国对俄国人在外蒙的活动已经非常恼火。俄国人采取了一系列严重损害中国利益的措施，致使外蒙这块领土实际上从中华民国分离出去。存在着破坏或取消中国在外蒙的利益和中国在外蒙的地位的企图。这些事件不仅在中国政府内，而且在中国国民中引起了强烈的不满。

因此，中国之所以不愿意与加拉罕先生谈判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在外蒙问题上有自己的条件；二是加拉罕先生提出了中国先同意恢复外交关系的先决条件。这两个条件妨碍了谈判的举行。

本来，只要苏俄发表一个正式声明，承认中国在外蒙的主权，放弃在外蒙所采取有损中华民国地位的措施，那么在外蒙问题上的僵局就可以打破。但苏俄对此颇为犹豫。数月之后，莫斯科企图把俄国人在外蒙古的活动说成是由谢苗诺夫将军领导下的白俄分子干的。

以北京大学学生为主的强有力的中国舆论界对于谈判的迟迟不能开始大加指责，非常不满。北京大学是中国知识界的重要堡垒。当时蔡元培是校长，而且也是公认的所谓“自由主义运动”的领袖。直至大选完毕，曹锟就任总统职位，并且组成了在他领导下的第一届内阁之后，政府才得以着手准备举行谈判。

谈判的第一步是指派王正廷为中国政府的全权代表与苏俄的全权代表进行谈判。1923年3月4日，黄郛将军任外交总长时，王正廷被任命为中苏谈判代表代表团团长。根据外交部的决定，此项任命是由王正廷本人通知加拉罕先生。两位全权代表之间通过书信往来，并不通过外交部。这样，王正廷有权进行谈判，拟定一个协议草案，但无论他与谈判对方达成什么样的协议，都须以政府同意为准。

谈判如期开始。王正廷的助手有一部分是从外交部选派的，其中包括外交部外政司第一科长赵权等人。谈判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

直到3月，王正廷和加拉罕才在加拉罕的下榻处，原俄国大使馆草草签署了一个协议草案。

那天的谈判在天黑以前就开始了，由苏方设晚宴招待王正廷，饭后继续进行谈判，直至次日黎明前两位代表在协议草案上签字方宣告结束。

签字程序刚一结束，苏方就拿出了香槟酒，加拉罕先生为两国友好关系的恢复祝酒干杯。并将酒杯伸向王正廷，称之为“未来的中国总理”。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种言语有失外交官的身份的，有干涉中国内政之嫌。

当时的外交总长顾维钧，得知协议草案已经签署后，立即给王正廷打电话，认为王没有向他汇报就在协议草案上签字，是失职行为。王正廷听罢此言，只好解释说，协议草案尚未正式签署。于是，顾维钧想看一看草案全文。

一、二天后，那个被称为指导两国关系的总原则的协议草案送到了顾维钧的手中，当他仔细审阅那个草案时，不禁大失所望，极不满意。于是顾维钧认为其中的一些条款必须加以修改。他起草了一个报告，把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归纳为二条：

第一条是有关涉及外蒙的一些问题。协议规定废除沙俄同中国签署的以及同其他列强签署的有关中国的一切条约。但苏俄同所谓的“独立外蒙”签署的条约和协议却没有提到。既然特别指明是沙皇政府所签定的条约，这就是默认了苏俄与外蒙的条约。顾维钧认为，中国政府绝对不能轻易作出这一重要的让步。

第二条是苏俄从外蒙撤军问题。苏俄正是依靠这些军队来维持他们所谓的外蒙“独立”的。虽然双方代表对撤军问题曾进行了讨论，但协议草案中的有关条款却规定，一旦中国同意撤军是有条件的，从而使自己处于完全听任苏俄摆布的境地，而苏俄则可以认为中国提出的条件根本无法接受而长期屯兵外蒙。此外，这一特殊条款的含意也令人十分不快，似乎苏俄在那里驻军是合法的，而且有权在撤军之前提出种种条件。

顾维钧认为这种修改是必须进行的，因此他起草了一个报告，连同王正廷与加拉罕签署的协议全文一起呈交内阁。

或许有人会问，王正廷如此匆促地与苏俄特使达成协议，他个人动机究竟何在？这个协议在内阁又能否通过呢，还是让历史来告诉你吧！

3、内阁否决王正廷——加拉罕协议

顾维钧的报告呈交内阁之后，内阁成员们都对此事极为愤慨。原因有二：第一，王正廷实际上没有注意到他是在代表一个政府谈判，从而表现出对政府的轻蔑态度；第二，他们也极力反对有关外蒙的二项条款。

不过，财政总长王克敏更加反对的是与处理庚子赔款有关的条款。庚子赔款是苏俄政府于1919年宣布废除的不平等条约的一项内容。沙俄在庚子赔款中占有可观的份额，虽然苏俄在协议草案中再次声明废除这一条约，但该条款又同时规定，扣除以庚子赔款为担保的各项义务所需之后，所剩余的款项要由苏俄确定其用途。王克敏先生坚决反对这笔余款的支配完全交给苏俄，因此，他建议立即解除王正廷的职务，并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来调查他的一切活动。

顾维钧外长的态度比较缓和。他认为王正廷确实犯了严重的错误。但这一事件的处理方式必须无损于中国的国际声誉。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孙宝琦总理并没有为王正廷辩解。在内阁会议期间，报据孙宝琦的要求，王克敏提出的“免职查办”一辞未被列入政府颁布的命令之中。命

令只是简单地说，政府代表与加拉罕先生所进行的谈判将转由外交部继续进行。

命令发表之后，加拉罕肯定是大吃一惊。他立即致函外交部，要求中国政府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宣布接受这一协议。理由是这一协议是由具有全权的中国政府代表正式签署的。他还威胁说，如果中国不在所限时间内给予圆满答复，中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

顾维钧外长在复函中认为，王正廷签署协议草案的行为，超出了他的职权范围。证书上明确规定，他所达成的任何谈判结果，都必须呈报政府，并应经政府批准。

虽然王正廷签署的协议草案没有得到孙中山和南方政府的明确支持，但在各省的高级将领中的确得到了支持。除此之外，苏俄使用的宣传机构在王正廷的政治盟友们的协作下，也开始产生了一定的宣传影响。北京大学派了一个代表团来到外交部要求与外长面谈。代表团的团长是李大钊。他的主要观点是王正廷与加拉罕先生所达成的协议草案是中国外交史上最好的协议。他了解政府予以否决而不批准的原因所在。

于是，顾维钧外长便向他们解释了协议草案中的各点，并着重指出，外蒙问题是中国对该地区的主权和中国领土完整问题，不容随意侵犯。在谈判中，王正廷无权将过去俄国与中国或任何其他方面所签署的有关外蒙的条约排除在外面不置于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列，从而默认外蒙不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但李大钊教授的回答使顾外长极为震惊，他说即使把外蒙置于苏俄的支配和统治下，那里的人民也有可能生活得更好。

顾维钧对他说：“作为个人，你当然可以发表或坚持个人的见解，但是我，作为中华民国的外长，有责任设法维护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使之免遭任何外国势力的侵犯。”

由于李大钊与顾外长的见解完全相反，于是顾维钧说了句“请原谅”，便起身告退了。

顾维钧还收到了一份由北京政府所管辖的各个省份的高级将领和督军们拍来的电报，认为协议草案是表明中国能够使人承认它是与一个外国处于平等地位的国家的第一个协议。

现在顾维钧外交总长所能采取的，而且也的确采取了的唯一措施就是将此问题呈报曹锟总统。尽管总统本人对外交和对外政策问题不甚熟悉，他自己也曾多次对此公开承认，但他完全理解内阁对协议草案所持立场，并且表示百分之百地赞同内阁和外交部的观点。他对拍来电报赞同协议草案的吴佩孚将军非常生气，他认为吴干涉了与他无关的政治事务。为此，他将派自己的私人代表马上去见吴将军，让他住口。

通电指责外交部，拥护协议草案等等，显然都是在苏俄使团、王正廷的煽动下

干的。他们的行动肯定出于某种更加重大的政治目的，即推翻北京政府，夺取政权。然而，外交部和内阁对此问题所持的态度却完全出于对维护中国的威望负责，没有夹杂任何政治企图。

最初，加拉罕先生企图用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得到答复的办法对外交部进行恫吓，但以失败告终。

由于僵局仍然存在，我外交部的立场又坚定不移，所以在最初的几天里，加拉罕先生便致力于煽动中国的舆论界对顾维钧外长施加压力，但最终也只好改变战略，转而采取了和解和谈判的方针。

4、中国外交总长家里的“炸弹事件”

协议修正本签署之前还发生了一次完全出乎意料的事件——炸弹事件。

这一事件，是拥护加拉罕——王正廷协议者，为了影响顾维钧外长的观点，对顾施加压力以便让他改变立场的一次事件。

那是在秘密谈判之前，在顾维钧外长家发生的一次炸弹爆炸事件。大概是由于炸弹事件仍丝毫未能改变外长的态度，所以加拉罕先生才被迫建议进行谈判。尽管炸弹事件本身并无任何重大意义，但因为涉及到中苏谈判，所以倒也值得在此一提。

加拉罕——王正廷协议签署后大约一周到十天左右，顾维钧外长到孙宝琦总理的官邸参加午宴。回家之后，顾象往常一样，急趋书房，以便查看一下是否有需要他签署的重要电报或急件。当时，外交部有一个惯例，即每当外长不在部里时，他们便将收到的或要发出的重要电报及其它急件送到外长家。

那天，当顾维钧跨进书房。目光落到写字台上的时候，桌子一件样子十分奇怪的东西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那东西看来似乎是一根直径大约三英寸，高约数英寸的生铁棒，外观是一个圆柱体，上面有张红纸条，纸条上写道“敬赠中国外交总长”，左边的赠者落款为“河南南阳考古研究所”。

当顾维钧小心翼翼地用双手捧起该物时，觉得份量很重，而且上面还有一个小小的玻璃管。这使他感到此物极不寻常。因此立即派人将他的管事老崔找来，让他小心谨慎地把它拿走，扔到铁狮子胡同的顾家花园中的人工小湖里。

老崔将该物携出后几秒钟，就传来骇人的爆炸声，顾维钧立即意识到爆炸声肯定是该物发出的，便立即冲出书房，向出事地点赶去，但却被管家拦住。

“我已听到爆炸声，一定是在大门附近有什么东西爆炸了。”管家着急地说。

“不对，声音一定来自人工湖的方向”，顾维钧肯定地说。

当他们走近中国式主体建筑进入外国式的那部分住宅时，发现那里烟雾弥漫，

有两个人躺在地上。一个在外面，一个在厨房里。隔壁的房间里还有一个人。屋里和桌子上都各有一个洞。

当警察查看现场时，一位女佣人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她说管事老崔刚才捧那件东西来到这里之后，便大声呼唤所有的人都来观看这件宝贝。他说此物外边写的是“白金”肯定值很多钱，不知主人为何却让把它扔掉。由于想看一看里边是否有块秦朝的印，他将炸弹放在走廊上的一张木桌上，试图用刻刀把它打开，但他刚一打开，炸弹就爆炸了。

警察厅长认为这件暴行自然会影响到他的声誉。因为他要对首都的治安以及政府官员们的安全负责，这件事会显得他无能。于是，他便下令进行调查，并几乎每天都向顾外长汇报调查进展的情况。

事隔大约十天之后，警察厅长亲自来向顾外长报告说，线索已经查明。他们对两名被怀疑与炸弹有关的学生进行了审讯，从他们那里得知，炸弹是在哈德门外一家玻璃匠店铺中用土法制作的。他们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他们供认以上情况，但不直接承认自己与事件有关，只是供认他们是在一些高级人员的唆使下订购监制这颗炸弹的。

他们不愿披露这些人的姓名。警察厅长肯定，这一事件是由一些中国政客策划的。他还怀疑此人与谈判关系重大，并得到加拉罕先生的鼓励。

很难断定谁是炸弹事件的幕后策划者，但可以肯定，这一事件与中苏谈判及顾维钧外长所坚持的立场有关，但炸弹事件并未能使顾维钧改变态度。

5、1924年5月31日签署的协议

炸弹事件之后不久，加拉罕派他的秘书前往外交部，问候顾外长的安全与健康情况。

当加拉罕先生听说顾维钧外长因高烧卧病在床时，他到了顾外长家，似乎尽力做到通情达理，非常急于打破僵局。

于是，加拉罕的秘书和顾外长的秘书在中国外交都外政司的工作人员的协助下，进行了一系列的非正式谈判。外交部和苏俄使团有协议中有意见分歧的条款交换了修正案。其中两点与外蒙有关，即维护中国对外蒙的主权和苏俄从这一领土撤军。

最后，加拉罕先生对此两点都作了让步，同意所提出的修正意见。双方就需要修改的各点，曾多次互换照会。显然是为了挽回苏俄代表的面子，加拉罕先生提出了如下方案：协议草案仍保持签署时的原样，通过交换照会进行修改。因此声明中明确规定，互换的照会是协议草案的一部分，并与协议具有同等的效力。最后剩下的程序只是选定日期——1924年5月31日——请加拉罕先生到外交都来签署修改过的协议了。

这些间接的谈判有个有趣的特点，即都是秘密进行的。实际上，这是加拉罕先生为修改条款问题而提出的条件。由于考虑到刚刚与王正廷签署协议后自己所处的境地，加拉罕先生特别希望谈判能秘密进行。

互换照会的签署仪式于1924年5月31日片外交部正式举行。签字后，加拉罕与顾维钧握手，从此，中苏两国又恢复了外交关系。

《中苏协定》包括《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协定》、《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及7个声明书。协定规定，外蒙古主权属于中国，苏俄将在第二年初将苏俄红军撤出外蒙古。

1924年《中苏协定》的签署，对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体系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但是，《中苏协定》未能完全解决外蒙古问题。虽然1924年协定承认外蒙古为中国之一部分，但没有废除承认外蒙古为独立国家，同意苏军驻扎外蒙的《苏蒙条约》，从而种下了日后接连不断发生冲突的种子。

6、冯玉祥大骂“俄国佬”

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制定了自己的“宪法”，声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1924年10月，直系军阀内部的高级将领冯玉祥在北京发动了政变，逮捕了当时的中华民国大总统曹锟，重新在北京组建了新内阁，并通电全国，邀请孙中山先生北上，商量召开国民会议之事。吴佩孚却因在战场上失利，逃回了河南，而张作霖则长驱直下，进了北京。后来，为了政治上和平解决即内争端的需要，又请出了山东的段琪瑞出山主政，建立了北京联合政权。

当冯玉祥发动政变时，苏俄驻华大使曾同冯玉祥会面，向他介绍苏维埃革命的经验，想借他在中国的地位，使中国向苏俄靠拢。

“冯将军，你作为出身寒微的高级将领，可以说很了解贫民的生活疾苦。我们都深知将军有一颗为天下百姓着想的赤子忠心，以深感敬佩，我们苏维埃俄国是为工农服务的政权，一切为贫苦人民的生活着想。在中国也建立起贫民的政权。”那位苏俄驻华大使说。

“多谢贵国的盛情。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不能与俄罗斯一概而论。你们革命成功的某些经验，也许值得我们去借鉴，但要想在我们中国建成俄国那样的政权，恐怕不大可能。中国有四亿人口，有广大的土地。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大都蒙昧无知，没有什么政治觉悟。中华民国建立十几年来，各种势力互相争斗，相待不下，混战了十几年，弄得国破家亡，民不聊生。所以，我实在忍不过去，发动了政变，要让这些没有良心的军阀们把枪放下，共同协商建国事宜。对了，我还邀请了南方的孙文，他们在南方发展革命的力量，听说还得到过苏俄的帮助呢！”冯玉祥

客气地笑着说。

第二天早晨，当冯玉祥从睡梦中醒来时，天已经大亮了。当时正值初夏，天气非常晴朗。古老的北京城象似刚披上了一层绿装似的，漂亮极了。

吃过早饭，冯玉祥坐上了一辆黑色的美式轿车里，从住地前往政府办公楼。一路上，他看到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心中充满了喜悦。

他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刚坐下不久，那位苏联驻华大使又来了“冯将军，我是想找你商量一下关于外蒙古的问题，可以吗？”苏联驻华大使十分谦虚地对冯玉祥说。

“当然可以。不知你们政府对外蒙古最近的事态有何看法，听说最近那儿的苏俄红军增加了许多，而且独立分子的行动十分猖狂。”冯玉祥十分随和地答道。

原来，这时外蒙古的大汗博克多格根死了。接着，外蒙古的乔巴山又决定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公开背叛了中国。中国得知这个情况以后，向外蒙古人民政府通电表示：“外蒙古主权属于中国，在中国领土上不允许有第二个独立国家政权。所以，奉劝外蒙古的朋友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取消独立的计划。具体事宜可以和北京直接协商解决。”

同时，中国政府还向苏俄通电指出：“苏俄红军 1921 年单方面侵入中国外蒙地区，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干涉和践踏。中国政府曾多次发出严正抗议，但苏俄方面至今未能作出反映。有鉴于此，中国政府要求苏俄政府在一个月之内，无条件撤兵。否则，一切后果由苏俄方面承担！”

苏俄政府接到中国政府这份最后通牒式的电报后，不禁吃了一惊。他们没想到中国政府的态度怎么会一个子变得如此强硬。不知中国方面究竟想通过什么方法来解决外蒙的问题。于是，苏俄政府向苏俄驻华大使发出指示，要他争取北京临时内阁中的冯玉祥将军，争取能让中国承认外蒙的独立。

苏俄大使见冯玉祥并不拒绝自己的拜见，于是就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通苏联政府的观点：

“情况是这样的。外蒙古在明朝的时候，并不是中国版图，只是到了清朝以后才被并入了中国。清帝退位以后，外蒙古的喇嘛活佛博克多格根请求沙俄帮助他们实现独立，但由于中国的反对，只实现了自治。后来，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博克多格根又主动取消了自治，将主权归属中国。但 1921 年，蒙古人民的英雄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到莫斯科，请求苏俄政府出兵帮助他们在外蒙古建立了独立的政权，苏联红军这才应邀出兵外蒙古。现在，他们在全国已经建立了人民政府的苏维埃体制，并且同苏俄建立亲密友好的关系。不久，他将公布‘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所以，我们请求中国政府也能以蒙古人民的利益为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主权。”

冯玉祥听着听着，不禁火冒二丈虎手猛地一下拍击桌面，站起身来，大吼一声，

“住嘴！”

然后，他从桌子后面定到苏联大使坐的地方，厉声地责问：“你们这些侵略成性的俄国佬，在你们眼里，中国是个什么东西？喔，你们想要打，就可以打；要想怎么欺负，就可以怎么欺负吗？”

这句话问得苏联大使目瞪口呆，无言以对。

“我告诉你们这些俄国佬，不要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我们中华民国是堂堂正正的世界大国，她的主权是神圣的，是不允许外来的侵略者干涉的。我虽然是一个当兵的大老粗，但我也多少懂得，我们中国的事情用不着你们外国人来管！”他停了一下，又接着说：

“外蒙古的事情，纯属于我们中国的内政，外蒙的主权，居于中国，而不属于你们苏俄，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告诉你们，我们中国人绝对不是好惹的！”

冯玉祥越说越激动。

“回去告诉你们的政府，请他们按照通电上的要求，在一个月之内，从外蒙古撤军。如果拒不听从，那么，就不要怪我们中国人不客气了！”

他故意把“不客气”三个字说得重重的。

这位苏联大使被冯玉祥大骂了一通，心里很不是滋味，灰溜溜地回到了大使馆。

第二天，这位大使是这样向苏联政府报告的：“中国政府执意不肯承认外蒙自治，严格要求我方从外蒙撤军。如不服从，可能有军事冲突的危险。”。

苏俄政府由于受到中国政府的巨大压力，加之国际社会对苏俄的压力，所以它被迫采取措施，缓和中国与苏俄之间的紧张关系，以避免冲突。但从实质上，苏俄从未改变想把中国的外蒙古置于他的保护之下的野心，无论他采取和平、还是武力手段，企图控制外蒙古是它的一贯策略。

这样，1924年5月中苏签署的协议，只是苏俄政府言不由衷的表示，中国政府表面上收回了外蒙的主权，但实质上外蒙仍被苏俄所控制。

正因为这样，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在张作霖、段琪瑞和冯玉祥联合主政以后，在外蒙古问题上准备一致采取强硬措施，以迫使苏俄撤军和外蒙古取消一切独立的活动，以恢复中国的主权。并且为实现这一目标，不惜诉诸武力。

于是，苏俄又演了一场欺世盗名的“撤兵”丑剧。

外蒙古独立内幕（7—2）第六节 “撤兵”与增援

1、欺世盛名的“撤军”

苏俄政府迫于中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同中国签定了一个《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苏俄言不由衷地承认外蒙古主权属于中国，它将于 1925 年初把进入外蒙古的军队撤出来。而实际上，这只是它惯用的一种缓兵之计。它真正的用意是，利用签定协约的方式来缓和双方的矛盾冲突，并转移中国人的注意力，然后再趁此机会大力推行其俄罗斯化政策，在外蒙古搞苏维埃化改革。所以，正是本着这种邪恶的动机，才演出了一场欺世盗名的“撤军”的闹剧。

苏俄在名义上虽然承认了外蒙主权归属于中国，但是并没有改变他们对外蒙古政治、经济的控制。乔巴山依然忠实地奉行列宁、斯大林的学说来改造蒙古社会。他们为防止鲍陀、丹尚的思想再次抬头，实行了更加彻底的革命，完全剥夺了原来封建主和喇嘛的经济政治权力，使他们处于人人监视的境地，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

经过改造以后的外蒙古，已经不象是中国开发了好几百年的一个行政区了，反而象是苏俄刚刚革命后的共和国。全国到处都建立了合作社企业和国营企业，绝大多数的阿拉特牧民经营集体经济，过去那些封建王公、寺院喇嘛僧侣、阿拉特畜牧、高级官吏和蒙古商人，都被镇压或者被剥夺了，在 1923 年至 1924 年，阿拉特会议所选出的什户、巴格、苏木、县和省的领导工作人员中，大部分都不会读上级发下来的文件，不会答复询问，不会传达，更不会写报告或作报告。

苏联正是利用外强古贫民蒙昧无知这一致命的弱点，扶植乔巴山等人在外蒙古实行统治的。外蒙古看上去好象是蒙古人在自治，在独立，但是，在这个面具后面作支撑的，正是贝加罗夫的苏联红军。与此同时，苏联开始进行自己的国家建设，国力逐渐地开始强盛起来。

1925 年 1 月 24 日，苏联政府通知“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撤退从 1921 年起驻扎在外蒙古的红军。苏联政府在大会中说：

“在蒙苏两国军队的保卫下，由于人民政府的革命行动，贵国国内已经建立了安定的秩序，贵国进一步的民主化和成立共和国及召开全民大呼拉尔的条件有了保障。又因为残余的白匪帮已被完全肃清，苏联政府认为苏联红军的解放使命已经完成，再无驻扎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必要了，所以，决定将苏联红军撤回苏联国内。”

这个照会给人一种印象，仿佛苏联红军到蒙古来，就象是世界警察到一个出了乱子的地方去维持地方治安似的，而不象是在（协定）中所说的“外蒙古主权属于中国”这类动听的话语。由此也可以知道，苏联红军的行动，只是为外面的舆论作掩护罢了，并没有什么实质内容。

三天以后，“蒙古人民政府”部长会议主席兼外交部长采林多尔济签署了蒙古政府给苏联的照会：

“尊敬的苏联朋友们，我们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经过认真的研究，决定同意撤退兄弟友邦苏联现在驻扎在本国境内的红军部队。苏联红军是世界上最伟大、最优秀的军队。他们在军事素质上具有严格的训练，作战勇敢，所向无敌；在教养、纪

律和对人民的忠诚方面都给我们树立了榜样。象你们这样的外国军队，不但不欺辱我们，不打骂我们，相反却来跟压迫、侮辱和蹂躏我们的那些敌人作战，这是我们头一次看到的创举。你们不是敌人，而是朋友，不是侵略者，而是保卫者，我们蒙古人民共和国怀着最大的满意和最高的感激，向苏联红军表示致敬！”

蒙古所以能从强盗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走上发展自由的现代文化，发展经济，建立真正人民政权的大道，苏联红军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也是不可忘怀的。请贵国政府将蒙古劳动人民的最大谢意，他们的永远感激和不变友谊的保证，转致贵国的工人和农民，转致世界上唯一坚决保卫被压迫与被奴役大众的英勇红军，转致他们的领导机关和贵国的政府机关，以及伟大的列宁同志。列宁同志虽然已经离我们而去了，但他的精神却会永存。

蒙古劳动人民及其政府认为，从此以后，贵国人民和我国人民将被不可分割的共同命运，不可分割的共同利益以及人民政（权）的共同的伟大理想联系起来，贵我两国今后的生活，将在真挚的友谊以及患难时相互的援助中渡过。特别是，我共和国人民和政府坚信，如果一旦发生类似 1921 年所发生过的那种事情，苏联政府和苏联红军一定会来援助我们的。”由这份长长的照会，可以看出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外蒙古以后，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给外蒙古带来的巨大变化。在这份照会里，你找不出丝毫的外蒙古曾作为中国领土几百年的痕迹，也找不到丝毫的外蒙古几千年的民族传统的痕迹，剩下的只有苏联精神和行动。

在这样一个已经彻底苏联化的世界里，即便你宣布它是中国的领土，也未必真的就能属于中国。因为外蒙古人的心灵，外蒙古人的生活方式已经从中国的大家庭中被割裂了出去、而硬被嫁接到了俄罗斯苏维埃的树枝上去了。所以，苏联红军即使真的撤走了，外蒙古也同样会被牢牢地控制在苏联的手中。

然而，事实上，苏联的所谓“撤兵”只不过是一场欺世盗名的游戏罢了。他向世界公开宣称自己撤了兵，但在实际上，并没有撤兵，相反，他的部队依旧在蒙古的草原上纵横驰骋。苏联所撤的，只是服役期满的第一批进入外蒙古的贝加罗夫的红军部队，但紧接着，又迅速派来了新的苏联红军，而且数量比原来增加了好几倍。从乌里雅苏台到塔克图。在今天的苏蒙边境线上，也到处都是苏联红军，而且，还有一部分部队驻进了库伦。

2、着急的“外长”：撤兵后可怎么办？

采林多尔济是一位贫苦的阿拉特出身的牧民，从小就跟苏黑巴托尔认识。他曾和苏黑巴托尔一起学习蒙古语文，受到了一点教育。后来，他在苏黑巴托尔的部队里当兵，颇受苏黑巴托尔的赏识，并很快同乔巴山、布麻曾德以及贝加罗夫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他经常跟人说：“哎，如果我今生能见到列宁一面，那真是不白活啊！”

不过很可惜，直到列宁去世，他也没能见到列宁一面。当他得队列宁逝世的消息时，不无遗憾地说：“哎，后来这辈子真要白活了。”

乔巴山听了他这丧气的话，就鼓励他：“我说老兄，只要你好好地按列宁说的

去干，没准将来还能成为个大人物呢！”

“我还能成个大人物？别开玩笑。瞧我这副奴才象，天生就是给人当差的料！”采林多尔济时常这么说。

不过，他待人倒是挺老实的，好决有什么宏伟的理想，这也使他比那些目标远大，理想宏伟的人活得更轻松自在些。

他小的时候给人家打工，雇主经常扣他的工钱，他不敢当面提出，只好背地里生气。后来他想了一个办法，想报复一下他的主人，他表面上装出一付可怜兮兮的样子，要求老板给他多一份工钱，老板不答应，他就跑到老板饮水用的缸里撒了一泡尿，以泄他心头之恨，他的老板倒从来没有发现这件事，后来他又干了好多次，然后暗地里看着那位可恶的老板喝他的尿。长大以后，他仍然有这个癖好，跟人从不当面较量，却总是事后在暗地里报复对方。

丹尚被枪毙以后，乔巴山身边没有了得力的助手，经过反复斟酌，最后决定起用这位年仅三十多岁，虽然识字不多，但却很靠得住的老战友，让他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兼外交部长”的职务。

“采林多尔济同志，经过组织上的认真考虑，决定任命你为我们的部长会议主席，同时兼任外交部长，你看怎么样？”乔巴山亲自到采林多尔济的家，向他宣布了这个决定。

“我，别开玩笑。我的能力你是知道的，要文，我不能识字读书；要武，我不会调度军队。你还是找别人去吧！”采林多尔济说。这几年的风雨，教他学会了沉默。

“不行，采林多尔济同志。现在苏黑巴托尔同志去世以后，国内又出现了丹尚的叛变，国家急需人，你虽然说阅历不多，但至少是我和苏黑巴托尔同志信得过的人，有这一点，也就够了。”乔巴山苦口婆心地劝说着。

最后，采林多尔济终于被乔巴山说服了，就任“部长会议主席兼外部长。”

正在这时，苏联政府向他提出要撤兵，他惊奇得不知如何是好。他知道，“蒙古人民共和国”要不是靠着苏联的支持，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早就在恰克图被恩琴的白匪军碎尸万段了。可是现在，苏联政府突然想撤兵，采林多尔济不知将要发生何事，急忙跑到乔巴山的办公室，向乔巴山询问具体的对策。乔巴山回答说：“这件事是明摆着的，如果苏联不撤兵，那么，它就会在国际社会受到谴责，尤其是他同中国鉴定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向中国政府表示要在今年年初撤兵，所以，苏联政府向我们发出照会是合情合理的事情。”

采林多尔济有点迷惑不解：“那么，我们蒙古就全靠我们自己的军队来支撑了。”

“不，我们自己的军队数量少，战斗力也不强，根本保证不了蒙古的独立和安

全。我们只能仍旧求助于苏联！”乔巴山语气坚定地对采林多尔济说。

“那么，我们有什么办法？既然已经签约要撤兵，还有什么办法可以留住苏联红军呢？”采林多尔济问。

“这么办，我们请苏联红军撤离以后，重新调军队驻扎在外蒙古与苏联的边境上，同时，派一部分军队秘密驻扎在庫伦，一旦有事，苏联红军会立即采取行动。保证万无一失。”乔巴山十分自信地对采林多尔济介绍他的计划。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去回答苏联政府的照会呢？”采林多尔济问。

“这很容易！把最好的赞颂和感谢送给他们，把他们送回苏联，然后又悄悄地请进来，谁会把咱们怎么样？”乔巴山胸有成竹地回答说，并开心地大笑起来。

这样，才有了采林多尔济签署的那份给苏联政府的照会。

第七节 “复辟时期”的外蒙古

1、丹巴多尔济主政

乔巴山在外蒙古推行的“赤化”政策，激起了蒙古人民党内的极大震动，很多人对乔巴山的这种残暴的独裁统治严加指责，认为这是一种极左的错误。

因此，乔巴山在党内的地位很快下降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些具有较高的修养的“政治精英”，如丹巴多尔济、札丹巴和札穆察拉诺等人。这时期，由于列宁的逝世，苏俄上层正在进行错综复杂的斗争，正处在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期，对外蒙事务无心进行过多的干预，因而外蒙古才可能有这么一个宽松时间。

丹巴多尔济出身于乌里雅苏台的封建主家庭。他从小受到中国《四书》、《五经》的儒家影响，同时又笃信喇嘛佛教。他的家庭在西部蒙古地区具有很高的威望，而且对人十分和善，因而深受西部蒙古地区的封建主、喇嘛僧侣和下层阿拉特的爱戴。

丹巴多尔济的父亲曾在清朝为官，为政廉洁奉公，深受官民爱戴，清帝逊位以后，博克多格根投靠沙俄，搞“自治蒙古”，他依然维持地方的稳定和繁荣，不干预“自治”闹剧，受到中华民国政府的多次嘉奖。也受到当地人民的拥护与爱戴。十月革命后，苏黑巴托尔领导的人民革命党的革命兴起后，他极力反对。苏俄红军进庫伦后，他多次请内蒙古和北京政府出兵，均未获成功。后来，他孤身逃到了内蒙古。丹巴多尔济认为，革命事关蒙古族兴亡，他不能置身事外，于是主动向贫穷的阿拉特分发财产、粮食和土地，也受到了人民政府的赞扬和提拔。

丹巴多尔济亲眼目睹了发生在外蒙古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他看到苏黑巴托尔为了实现苏维埃制度，而打倒了鲍陀；看到乔巴山为了坚持苏黑巴托尔的路线，而枪决了丹尚。因此，他对乔巴山等人的统治很不满意。经过精心准备，他联合了几百

名党员代表，在第四次蒙古人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苏俄上层困于权力斗争，对此偏远地区顾不上干预。从此，他掌握了外蒙古的命运。

他上台以后，对过去“革命”的过激行为作了一些纠正，禁止人们向各地的封建主和喇嘛寺院发动进攻，鼓励各地的资本积累和生产，同时大力宣扬，吸引外国商人到蒙古投资。

在思想上，他一改过去那种空喊口号式的单调的苏维埃宣传，而是高举蒙古民族主义的旗帜，要蒙古人要实现蒙古的振兴而奋斗。同时保全喇嘛教，并使喇嘛教适应新的社会形势的需要。

当时的蒙古思想家札穆察拉诺打出口号：要把佛教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或者用佛教思想来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组织上，人民党大量吸收喇嘛和封建主入党扩大党的基础。

在一次党代会上，丹巴多尔济向全体会员发表演讲说：

“蒙古民族和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其他民族一挥，都是伟大的民族。”

“今天，我们蒙古民族经过艰苦的努力，实现了独立自主，我们的命运掌握在了我们自己的手中，因此，我们要把目光放远大一些，视野放宽一些，去为我们蒙古的美好未来而奋斗。我们自从 1921 年独立以来，走过了一段极为不寻常的道路。我们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有不少的缺点。我们人民党的使命就是为了蒙古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努力奋斗，可是，在过去的岁月里，有的人却把党的利益同民族的利益对立起来，为了实现党的不切实际的目标，不惜牺牲一大批优秀儿女的生命！这是我们的错误！”

他扫视了一下全体与会人员，又接着讲：

“为了使我们蒙古人民有一个幸福的未来，我们要联合国内外一切可以联合的人，包括一些善意的封建主、商人、资本家和政府官员，为了蒙古的富裕而努力。同时，我们还要保护喇嘛僧侣的利益和信仰的自由，不允许私自侵犯僧侣们的权力。在思想上，要把佛教的慈悲度的思想同共产主义的理想结合起来，建设一个崭新的蒙古。”

丹巴多尔济的演讲，博得一片热烈的掌声。

丹巴多尔济的执政，确实使一大批恢复权利的有知识的封建主走上了建设蒙古的道路。蒙古民族也因此大有“复兴”的迹象。

丹巴多尔济政府的对内政策，明显是比较宽松的。他们取消了乔巴山过去奉行的那种“红色恐怖”的高压政策，而尽量使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有较大的余地，让他们比较自由地发展。丹巴多尔济大量地吸收喇嘛和封建主进入人民革命党，这一方

面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另一方面又影响着党的政策朝着比较“自由”的方向发展。

当时通过的《临时党纲》中就指出：“在国家建设和经济建设的领域内，党将推行的政策是把一切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集中在国家手里，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以代替能使国家重新被外国侵略者奴役的私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私人资本主义制度，同时党将努力推行社会集体管理经济的方法……发展合作社的方式等等，借以使国家实现这样的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之下，国家既没有压迫者，也没有被压迫者，就是说实现了共产主义社会。”

这个“党纲”，保护了国内封建主、王公、贵族和寺院的经济。

虽然“宪法”上已经剥夺了封建主的选举权，但由于很多封建主在地方上的崇高威望，使他们仍然在中央或地方继续担任领导职务。尤其是新兴的阿拉特干部，绝大多数都是不识字的文盲，他们既不会阅读文件，也不会传达会议精神，因此不得不请那有知识的贵族和喇嘛来主持政务。这样一来，阿拉特对封建主阶层的态度也由过去的对抗变成了联合。

丹巴多尔济在人民革命党五次党代表大会上报告说：“作为政治力量来说，过去的封建主在国内已经是一种无力夺权的‘死货’了，他们决不致于发动任何反对革命制度的叛乱行为，他们已经成为一些政治上的僵尸。而那些逃到中国和其他地方的封建主们是没有危险的，只要我们的政策合适，他们反而会支持我们搞建设的。”

对外蒙古允许自由市场存在的做法，党中央副主席札巴丹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札巴丹是出身于库伦的官吏家庭，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蒙古式的教育。他同样是怀着为重新振兴蒙古的民族精神而走向革命的。乔巴山推行强硬的“赤化”政策时，他就深感忧虑，后来，他终于联合了丹巴多尔济等一批人，通过党代会的选举控制了人民革命党。对蒙古的经济政策，他主张不加干涉的放任自由。

1927年春，札巴丹在当时开幕的全蒙古集市大会的讲话中，说：

“我们蒙古过去一直是传统的自然经济，处于封闭、落后、保守的状态中，这种状况对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具有严重的压制作用。在旧经济制度中，只有贵族、王公和上层喇嘛们才拥有财产的主权。而现在，我们允许每一个蒙古人通过自己的正当劳动获取自己的劳动成果，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发财致富机会。有人说，这样，我们的蒙古就会变成资本主义，但我告诉你们，蒙古没有商业资产阶级。”

在这种趋势下，蒙古经济委员会主席所发表的计划也向蒙古人民表明：“蒙古现阶段的经济水平十分有限。需要大量的外国资本的支持。以带动本国的民族资本的发展。要把外国资本从国内商业中排挤出去，至少需要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只有到那时，蒙古合作社才能开始掌握国内商业。”

当时的蒙古共青团中央书记布扬聂姆呼也认为：“在当今世界上，由于除了苏联以外的所有国家都是由资产阶级当权，所以，在蒙古发展点资本主义并不是可怕的事。当我们蒙古的资本主义发展起来，消灭了封建主义以后，新兴的劳动者一定

会消灭资本主义，并最终实现我们的共产主义理想的。”

丹巴多尔济政府的对外政策，也改变了过去的做法。过去，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完全把苏联作为自己的唯一盟友，而把其他的国家都当作帝国主义而拒之门外，他们一切都要看苏俄的脸色行事，没有自己独立的外交主张。丹巴多尔济主持政务以后，他知道，蒙古要想迅速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不借助西方各国的支持，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当时的欧洲，已经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创伤中复苏过来，经济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迅猛增长，因此，丹巴多尔济决定向欧洲学习，放弃过去的亲苏政策。

1926年初，丹巴多尔济派札丹巴率领了一个规模宏大的代表团，经苏联到欧洲参观访问。他们到了德国、法国，并同两国政府建立了友好联系，并签定了协议，允许派遣留学生到德、法两国去学习。

丹巴多尔济决定向德法派留学生的决议，是他外交政策的重大突破。他说：“蒙古要想成为世界瞩目的先进国家，就必须放开视野，拚命学习别人的先进技术，尤其是欧洲的先进技术，这是我们最重要的成功捷径。”

他派遣教育部长巴图汗亲自率领留学生前往德法两国留学，给他们在国外提供了充足便利的学习、生活条件，以便更好地学习欧洲的先前的科学文化技术。

1926年秋，蒙古政府派人到德国外交部，同德国面谈关于购买德国机器设备的事宜。并要求德国政府向蒙古派遣医疗卫生队和专家考察团。

1928年底，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丹巴多尔济率领了一个代表团亲自到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三国考察，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

2、班禅活佛的冲击波

蒙古族在元朝的时候，采取宗教宽容政策，他们对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不太限制，而是任其发展。基督教在那时也称也里可温教，有很多传教士从欧洲到中国传教。但蒙古民族主要还是接受西藏的佛教——喇嘛教。一直到明代后期，满蒙联合，满族人也接受了喇嘛教。此后清朝几百年里，喇嘛教一直是蒙古民族的精神支柱，蒙古人民十分虔诚地相信他们的佛的化身博克多格根（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因而，宗教信仰在蒙古人心目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班禅活佛，也就是班禅喇嘛，在喇嘛教世界中是仅次于达赖喇嘛的人物，在喇嘛世界中拥有十分崇高的地位。他的影响力不仅波及到西藏的喇嘛，而且对青海、蒙古、满洲人的影响也很大。当外蒙古发动革命时，班禅活佛对蒙古的喇嘛僧侣们也十分关切，要他们无论如何要阻止任何违反宗教信仰的行为，维护寺院的权利不受侵犯。因此，外蒙古的喇嘛都十分严格地执行班排的号召，维护喇嘛教在外蒙的地位。尤其是博克多格根死了以后，转生佛还没有寻找到，外蒙古的喇嘛僧侣就更加亲密地以班禅活佛为领袖，坚定自己的信仰。因此，班禅活佛虽不在外蒙，但却吸引了千百万蒙古喇嘛的心。

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建立了人民政府以后，强硬地推行赤化政策，剥夺了封建主和上层喇嘛僧侣的财产和权力，并向喇嘛寺院征税。于是，寺院的僧侣们激烈地反对苏黑巴托尔的法令，他们认为“政府”所推行的累进征税原则，征收寺院牲畜税，推行市民的职业捐及所得税等，只会使“人民政府”的收入大大地增加，而广大喇嘛僧侣的生活却只会越来越苦。他们纷纷联合起来，反对“人民政府”的措施，并准备联络一些封建主王公贵族，反对“人民政府”。

丹巴多尔济主持政务以后，对喇嘛教采取了十分宽容的政策，并把佛教的思想提高到民族精神基础的地位，使蒙古喇嘛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蒙古的喇嘛们可以自由地举行自己的宗教仪式，政府绝对不会干涉。正因为这样，国内喇嘛的数量迅速地增加了。1925年，蒙古境内的喇嘛是87300人，到1928年，增加到了94900人。尽管人民政府的法律禁止寻求呼毕勒罕（转世佛），但他们还是在罕恭什利省找到了礼尔罕札呼图克图的化身。最后喇嘛僧侣请求丹巴多尔济的许可，请了新的博克多格根（活佛）第九代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化身佛转世。但是，到了1928年底的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乔巴山再次得势，把丹巴多尔济的政策全部推翻，重新实行“赤化”政策。乔巴山还掀起了整党运动，把一些政治观点比较温和的人清除了出去。喇嘛僧侣再次遭受到打击，宗教信仰自由被取消。大批封建主的财产被没收。乔巴山政府强迫寺院喇嘛交税，对喇嘛的牲畜、住所、家庭用具、祭扫用品等征收赋税。为了限制喇嘛数量的增长，他们还兴起了喇嘛还俗运动，实际上是强迫喇嘛还俗。所有这些行动，激起了蒙古人民的强烈反对。尤其是乔巴山政府组织的反宗教宣传运动，实质上变成了对宗教信徒的粗暴的嘲笑，结果极大地伤害了阿拉特信徒们的宗教感情。但蒙古的喇嘛教信徒们并没有屈服。政府的迫害不但没有削弱喇嘛教，反而加强了喇嘛教；不但没有分化喇嘛教，反而使喇嘛教的上层僧侣和下层阿拉特信徒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在这种形势下，班禅活佛对蒙古的喇嘛僧侣的生命和安全深感担忧，于是决定亲自到外蒙古去。

第八节 忧心忡忡的蒋介石

1、蒋介石究竟是个什么人？

1923年8月，孙中山派蒋介石赴苏联考察。

1923年8月16日，年轻的蒋介石将军率领代表团动身前往莫斯科。

孙中山的这位使者于9月2日抵达莫斯科。他在苏联逗留近三个月。尽管孙中山在临别赠言中曾经要求蒋介石了解箪（布）在群众中做政治工作的经验和征求该党对国民党在华南组织政治工作的意见，但是蒋介石却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争取军事援助的问题上了。

当时列宁正患病，蒋介石就去拜会了托洛斯基以及齐契林（外交人民委员）、俄共（布）中央书记鲁祖塔克等人。

这位代表团团长对鲁祖塔克说：“我们几个人是被派到莫斯科来的国民党代表，到这里来主要是想通过俄共（布）中央了解俄国共产党。”

当时，苏维埃国家正在进行一场关于建设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的激烈辩论。

鲁祖塔克用了两个小时，向蒋介石讲述了布尔什维克党创建时的条件，回顾了俄国发生的主要革命事件，介绍了新经济政策和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同蒋介石的交谈中他还谈到，俄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性质方面是接近的。蒋介石边补充说，国民党“一向认为俄国共产党是自己的亲妹妹”。

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孙中山的这位使者，首先对苏维埃政权的军事经验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考察了红军的组织政策和政治委员制度以及军事干部的培养情况，参观了步兵第二学校，军用化学学校、高级射击学校等。

这位看上去比较年轻、比较瘦弱、长着一对机灵黑眼睛的中国官员，并没有引起周围人的特别好奇。在莫斯科，他曾经见过各种民族的人士，其中有不少中国人。在那些年代，中国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和知识分子代表的一个明显倾向，就是渴望学习和领悟社会主义及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的原理。旅居莫斯科的中国人都在关注着孙中山的这位使者。他们很感兴趣的问题是，蒋介石究竟是个什么人？是一个普通军阀，还是国民党的一般工作人员，10月初，他们聚集在一起，听取了蒋介石所作的关于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报告。孙中山这位代表的讲演在听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难道马克思没有讲过？……难道俄国的经验没有证实？……”没有多久，听众就感觉到，报告人在理论方面是贫乏的，他在回答问题时，对革命者的国际主义政治经验表现出一种冷漠态度。蒋介石挑衅似地说：“我不是在讲俄国！……我是在讲中国。你们在谈外国理论以前，还是应该研究一点你们自己国家的情况”。听众中有人立即作出了反应：“民族主义！臭名昭著的民族主义！”

此后，蒋介石对苏俄从内心里就十分反感，反对苏俄的赤色政权，更反对他们进行的“革命输出”。

2、苏联对外蒙有野心

苏联共产党的领导者们，对于蒋介石一行代表团的接待，虽然显得很殷勤，但一涉及攸关苏联利害的问题，便会突然改变态度；尤其显得异常关心的，是“外蒙古问题”。

早在帝俄时代，当1911年12月正是中国辛亥革命的纷乱之际，便已经趁火打劫，卵翼外蒙古“独立”，并且更向演变为其属国的方向推进。

及至俄国革命之后，在表面上对于亲俄时代的外交方针和行动已经有所修正，苏联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外长）加拉罕曾于1919年和1920年两度发表宣言“放弃帝俄时代有关中国的一切特权”。又有访问中国的苏底代表越飞和孙文于1923年发表《共同宣言》，声明“绝无使外蒙古脱离中国的成向。”然而蒋介石访回苏联，积其党和领导者及政府负责人谈起来，却可以从他们的语气中听得到对于外蒙古的侵

略野心。

外交人民委员契林便曾表示：“蒙古人希望脱离中国人的支配。”于是，蒋介石便在他会谈之后写了一封劝告的信给他，内容是这样的：

“那天，你说‘蒙古人怕中国人’这句话，要知道外蒙古所怕的，是现在中国北京政府的军阀，决不是怕主张民族主义的国民党。蒙古人惟其有怕的心理，所以急急要求离开怕的环境。在国民党正想快把他能够从自治的途径上，达到相互亲爱协作底目的。如果苏俄有诚意，即应该使蒙古人免除怕的状况。”

蒋介石的这封信，对苏联对外蒙存有野心感到忧心忡忡。

3、苏联的话只能相信三成

在苏联的旅行，使蒋介石隐隐约约感到了苏联片外蒙古的野心。

蒋介石回国后，把这三个多月旅行、考考和会谈所得的资料和印象，写成《游俄报告书》寄奉孙中山。1924年1月16日，蒋介石到广州后，又向孙中山作了口头说明。

对于苏俄之旅所得印象，蒋介石认为：“一言以蔽之，就是俄共政权一旦致于强固，其帝俄沙皇时代的野心复活，则并非不可能。”

他说：“每言念及此，我不禁担心到对于我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前途，会不会带来灾祸？”

当时，有一些相信苏联是真正友好的中国国民党员对于访俄报告书有所批评。廖仲恺就是其中之一。

于是，蒋介石乃将在正式报告中所未能尽情披露的本意，毫无保留地写在答复廖仲恺的手书中。信中有一段内容是这样：

“对俄党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信仰，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信可言。即弟对兄盲农人之盲只有三分可者，亦以见过苏俄人而不能尽扫见之兴趣也。”

蒋介石供认不讳地说：“在我未往苏俄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示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断定了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主义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和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是危险。”

这就是蒋介石到苏俄访问归来后的印象所得。

4、“我们不怕苏联！”

蒋介石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虽然坚决反对同苏俄结盟，但由于有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也只好暂且忍耐着。孙中山逝世以后，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逐渐掌握了国民党的党、军大权。后又发动北伐战争，打败了孙传芳，吴佩孚等人，1928年，东北易帜后，蒋介石基本实现了对全国的“统一”。于是，外蒙古的主权问题就提到了议事日程。

其实，早在1927年，当蒋介石在上海、南京等地大批屠杀共产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苏联政府就对他进行了指责，同时，苏联政府在外蒙古也硬是又扶持起亲苏左派势力乔巴山，推翻了以丹巴多尔济为首的右翼政府。这时，苏联就曾向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了外蒙古的独立问题，但遭到了国民政府的坚决拒绝。蒋介石在给苏联政府的回电中是这样写的。

“外蒙古主权属于中国，外蒙古的事务属于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政府都无权干涉。苏俄红军应无条件撤离中国外蒙古，如果拒不听从劝告，后果将由贵国政府负责。”

这种语气是相当强硬，措词也十分严厉的。不但不承认外蒙古的自主权，而且勒令外蒙古的当前执政者放弃独立的立场，回到中国的怀抱。

蒋介石曾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们不怕苏联，为了外蒙古的主权，打一仗也值得。苏联不过是一只看起来可怕的“北极熊”，只要我们强大了，它就会乖乖的回到它的欧洲去。”

5、1929年的中苏冲突

1928年，张作霖在中国东北被日本人炸死后，张学良表示归顺南京国民政府，悬挂起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东北三省的军队也处于南京国民政府的统帅之下。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也一心想吞并中国东北三省，同时想利用班禅活佛来控制外蒙古，让它听从日本的调遣。

而当时的外蒙古，由于刚刚推翻了丹巴多尔济的统治，所以外蒙的局势正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人心惶惶，而苏联又借口平定外蒙古境内的叛乱，派军队进入了外蒙古，这对于本来就动荡不安的外蒙古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外蒙古的一些封建主和喇嘛终于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了请求出兵的请愿书。

书中这样说：“我们外蒙古的王公以及忠于中国政府的文武官吏，恳请你们出兵外蒙，协助外蒙古的人民消灭人民革命党，赶走苏联的驻军，以便恢复我们的生活和宗教信仰自由，并请求你们邀请第九代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转生佛和蒙古人民众望所归的班禅额尔德尼来外蒙古。”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中国军队向外蒙古东部边境的苏军发起了一场进攻，于是双方发生了一场小规模冲突。

由于苏联政府不愿把事情闹大，所以苏军很快就又声称撤出了外蒙古。中国军队也没有进入外蒙境内，而是希望通过和外蒙古的和平谈判，来解决外蒙的主权问题，更重要的是，当时蒋介石正忙于在南方“围剿”红军，所以没有更多的顾及外蒙古事务。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沦陷，中国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抗日问题上，外蒙古的问题就被暂时搁置了下来。

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忙于抗日，因此，外蒙的亲苏的乔巴山势力又乘机得到了发展，加之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三省搞了个“满洲国”，并妄图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吞并外蒙和苏联远东地区，这就更使外蒙古的主权受到严重威胁。对此，蒋介石曾忧心忡忡，但又无可奈何，只是三令五申地强调：“外蒙古的主权属于中国政府，任何国家和地区不得以任何方式侵略中国领土。”

直到 1945 年，中苏谈判中再一次提出了外蒙古问题，1946 年，外蒙代表同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商谈外蒙问题，于是，外蒙古的主权归属问题又重提了出来。

第九节 38 人爱国集团大惨案

1、山雨欲来风满楼

乔巴山在苏联政府的强大支持下，在外蒙古重新实行了革命刚刚开始时的那种过激政策，使外蒙古的那些王公贵族和喇嘛僧侣们深感忧虑和不安。

1928 年 10 月 23 日，蒙古人民革命党举行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撤消”了以丹巴多尔济、札丹巴为首的执行温和政策的中央委员会和政府，“选举”了以乔巴山为领导核心的政府。乔巴山在大会上讲话时说：

“蒙古革命从 1921 年开始，经历了许多的屈折，我们的政策也有较大的波动，为了保证我们的革命成果不被出卖，我们必须时刻防止右倾错误，我们曾打倒了鲍陀的反党反人民集团的阴谋，也战胜了以丹尚为首的右倾路线。但是，右倾路线在我们党内依然很有市场，在我们过去的几年中，革命的成果几乎被一扫成空。

现在，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加强人民政府的职能，我们决定进行整党运动，把那些对党的路线持怀疑、反对态度的人清除出党。在对内政策方面，要再次发起对封建主义的猛烈进攻。同时，决定减低税收，用实行生产合作的方法来组织对雇牧和贫牧的援助，在对外政策方面，要把摆脱资本主义国家的束缚，争取蒙古人民共和国经济上的独立斗争进行到底，完成建立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国家，以便在苏联的援助下加速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上去。”

乔巴山在外交上奉行完全的亲苏政策，使蒙古成为苏联工业化的原料基地。

苏蒙的经济贸易迅速增长，同时，苏联也大量地派遣医疗队等人员进入外蒙古，以加强对外蒙古的控制；另一方面，苏联还吸收大量的蒙古青年到苏联去学习技术，作为对外蒙古工业的援助，尽管如此，外蒙古的社会经济发展依然很不景气。

乔巴山的赤化政策极大地伤害了那些在蒙古社会经济中占重要地位的封建主和商人。由于乔巴山对他们采取了“革命”的镇压手段，所以，遭到了这些人的强烈反抗。

1929年登记的729户过去的封建主当中；有86户的财产被没收。国家只给每一户人家留106胡比的钱，其余的财产全部都收归国有。经过这次打击，“人民政府”获得了巨大的财政收入。

此后，1930年和1931年，“人民政府”又没收了837户封建主的财产，其中的205户是寺院封建主。在没收过程中，他们只要稍有反抗，乔巴山就通过“人民法院”或用行政命令的方式予以镇压，把他们逐出所居的地方。象丹巴多尔济、札巴丹等封建主最终也难逃被镇压的命运，被分配到一个边远地区劳动去了。

在剥夺封建主的同时，“人民政府”又遵照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关于举办阿拉特的生产合作社的建议，着手建立集体牧场，把从封建主那里没收来的那些财产，留给集体牧场，并把阿拉特组织起来实行共同牧畜，共同掘井、共同割草、共同利用收畜的政策。

在外蒙古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下，国家的经济还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蒙古人民对集体牧场根本无法适应，用人为了强制手段成立的集体牧场，无异于竭泽而渔，杀鸡取卵。但是，这些“革命者”们，为了实现他们不切实际的“理想”，根本不去考虑人民的承受能力，也不去考虑集体农牧场给人民带来的不利因素，只是一个劲儿地想尽快实现苏维埃化。于是，连下层的阿拉特牧民也只好跟着遭殃。

从1929年到1930年，外蒙古成立了400个这样的集体牧场，场员达43000人，这些集体牧场中有152个公社。为了领导这个集体牧场运动，1929年11月，乔巴山组织了“全国集体牧场中央管理处”。

此外，“人民政府”也剥夺了喇嘛僧侣的财产。“人民政府”修改了税则，实行按所得收入累进征税的办法，这样一来，就不仅要征收寺院的牲畜税，而且对喇嘛的住所、家庭用具、祭仪用品也要征税，同时，还把喇嘛看成是一个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

1930年，蒙古人民革命党搞了个喇嘛还俗运动，最后竟变成了强迫喇嘛还俗的运动。为了削弱喇嘛在蒙古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他们还搞了大规模的反宗教宣传，但实际上，这种宣传最终变成了一种粗暴地干涉人们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活动。他们什么也不向阿拉特解释，只是武断地批评宗教是愚昧的精神枷锁。这种不分青

红皂白的做法，极大地伤害了阿拉特人民的宗教感情，使他们对“人民政府”产生了极大的不满情绪，于是喇嘛教信徒们远离了“人民政府”，并在班禅活佛的鼓动下，坚决与“人民政府”对抗。

第七次蒙古人民革命党大会颁布了关于限制资本主义在蒙古成长的法令，他们决定以按所得累进征税原则为基础的新的税务条例，代替旧的税务条例。为此，“人民政府”把财产在二十胡比（六百蒙元）以下的牧产宣布为贫牧，二十胡比到一百胡比的牧户为中牧和富裕中牧，一百胡比以上的是富牧。这项措施的种种规定，最终把大批中牧推到了反抗政府的阵营中。

另外，乔巴山政府还决定用高捐税的办法来反对私营贸易，私营手工业和私营运输业。由此带来的后果是：蒙古中央人民合作社成了“垄断者”，成了全国各地唯一的购买者和销售者。1929年11月创立的苏蒙合资企业——蒙古运输公司，则成为全国唯一的货物运送者。本来就非常稚嫩的手工业也被挤垮了，大批手工业劳动者无以为生。

这样的政策，其结果是导致了商品的严重缺乏，各种生活用品、日常用品以及生产原材料等都十分短缺，社会经济停滞不前。

蒙古人民革命党走上这条极“左”的路线以后，不但没有从实践的经验中发现错误从而及时纠正，反而在1930年召开的第八次党代会上给这条极“左”的路线作了理论上的证明，并且认为：只有“左”的路线才是真正的革命。他们硬说蒙古的革命已经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阶段，而进入了反对资本主义的阶段，即进入了直接的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他们在会议中指出：

“集体牧场引导社会经济循着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前进，使劳动阿拉特牧民全体参加生产合作社建立高度商品性的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并向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成份坚决进攻。”

他们向合作社提出了协助居民走上“文化定居形式”和协助经济向畜牧业、农业发展的任务。在有关五年计划的各项指令中，代表大会提议，到五年计划完成时，使贫牧中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中牧中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实现集体化，一切计划都应从这个任务出发。这时，人民革命党把中牧排除了出去，认为，人民革命党的群众基础不再是贫牧和中牧，而是广大的雇牧和中牧。大会还把喇嘛僧侣不分上下阶层，都通通地当作寄生的剥削阶级，对他们进行限制和消灭。对富牧、商人及国内其他资产阶级分子，则采取一律否定的政策。

在这些极端脱离实际的理论和思想的指导下，外蒙古的社会遭到了灾难性的破坏。

原来在丹巴多尔济统治时期，刚刚有所恢复的外蒙古经济，又被折腾得一干二净。在第八次党代会结束时，人民革命党发生了全盘集体化的号召，开始强制阿拉特编入各公社或各劳动组织中。这时，向资本主义的进攻变成了向富裕中牧的进攻，对富中牧要征收个别的捐税，学校也不收他们的子女。这样，从蒙古的上层王公贵

族，喇嘛僧侣，到地主畜牧，富裕的中牧、商人、资本家，都变成了乔巴山的人民政府“专政”的对象。

为了追求“大规模的商品性生产经济”，“人民政府”成立了六个大规模的农业和畜牧的国营牧场。实际上，这些国营牧场既不是大商品性的，也不是大生产性的。但是，他们却需要政府的大量资金援助。银行的贷款就象洪水一样向它们流去。从1930年到1932年，蒙古银行发放给公社的贷款约有八百万美元，其中集体牧场得到的约二百万蒙元，国营牧场得到约416万票元，蒙古中央人民合作社购买农业机器和种籽的贷款是178万蒙元。“人民银行”拒绝贷款给私人，并且用人为的方法扩大贷款基金，把国家推上了通货膨胀的边缘。

所有这些政策，使蒙古的国民经济迅速走向崩溃的边缘。由于把私人资本从商业中“排挤”了出去，大部分省份在1932年春就出现了严重的商品短缺，实际上，并不是国内没有商品，而是由于成为蒙古经济绝对垄断者的蒙古中央人民合作社没有能够发挥其应有的效用。对私人货物运送者的排挤，使蒙古运输公司变成了货运方面的绝对垄断者。旧的手工业的消灭，使以前由手工业者制造的商品在市场上绝迹。

在畜牧经济中，集体化政策使阿拉特失去了增加畜牧的积极性。财产在一百胡比（约三千蒙元）以上的阿拉特也被课以各项捐税，并被看作是和封建主、资本家一样，再没有权力利用牧场，没有权力获得商品，子女也再不能受到教育了。这样，一部分受到委屈和剥削的阿拉特，一方面得不到商品，另一方面又受到了喇嘛和班禅活佛在精神上的鼓励，使他们坚决地站在了反政府的立场上，人人大杀牲畜，几年之内，就杀了七百多万头牲畜。

所有这些，就象一层层阴云遮蔽了外蒙古那明朗的天空。山雨欲来风满楼，那些被剥夺了权力和财产的封建主以及喇嘛、商人、资本家、阿拉特富牧、中牧们，那些受到压迫的牧民们，被人民政府的“专政”连结到了一起，终于走上了反对“人民政府”的道路。

2、向南京国民政府求援

乔巴山的高压政策，立即激起了外蒙古封建主和喇嘛僧侣们的强烈不满。他们纷纷抗议政府的“残忍无道”，反对政府剥夺他们的私有财产。随着政府的政策一步步地向极端激进的方向发展，反对政府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时，以尤高济尔呼图克图、曼楚什列呼图克图、德里勃呼图克图、那马扎布贝于等为首的反政府“38人爱国僧俗集团”成立了。

“我们的使命只有一个，那就是推翻残暴专横的人民政府，解救蒙古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为此，我们必须联合蒙古内外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同政府当局对抗到底！”尤高济尔呼图克图在他们第一次碰头会上就这样讲，“自从乔巴山的人民革命党控制了我们的外蒙古以后，我们就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整天打打闹闹，搞得人心惶惶，前几年，丹巴多尔济刚刚把蒙古搞得象个样子，可没过多久，乔巴山又回来了，如果我们不推翻他的统治，就永远不会有好日子过。”

他的话很有激情。

“乔巴山这小子，也太不象话了。他不知何时到俄国去念了一点马克思的圣经，就回到我们蒙古来贩卖他的马克思主义。”曼楚什利呼图克图十分愤恨地说。

“他们人民革命党把我们排挤在国家政权之外，剥夺了我们的世袭王爵，还没收了我们的财产，这是不公正的！”

尤高济尔大声说：“弟兄们，我们聚到一起来不是要骂人的，而是要采取实际行动去推翻那所谓的人民政府。光骂不是战斗，我们要把这股子仇恨化为动力，去为我们的目标而战斗！”

尤高济尔声音洪亮，说话有力，深得大家的佩服。他出生在库伦的高级封建主家庭，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进库伦的时候，他父亲和他都曾热情地接待过人民革命军，后来，丹巴多尔济执政，他担任库伦地方的行政长官。丹巴多尔济被赶下台以后，尤高济尔也被撤了职。他眼睁睁地看着蒙古所发生的灾难性的变革，心急如焚，一心想改变政府的政策。后来，他眼看着乔巴山变成了一个十分专断独裁的暴君，于是就对人民政府彻底绝望了。他到处联络人，决心推翻乔巴山的人民革命党的统治，拯救蒙古民族。

这时，一位年轻人站了起来，对大家建议说：“我倒有个主意，不知是否可行。”

尤高济尔看了这个年轻的小伙子一眼，不禁一阵惊喜，因为这个叫额利格登达格巴的人他认识，他也是蒙古世代的王公贵族，曾经在库伦卫戍部队当过军官。

额利格登达洛巴十分清晰表达了他的见解，他说：“目前，我们的蒙古政权掌握在极少数失去了理智的苏维埃走狗身上。他们想把蒙古变成一个俄国式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但这种制度是我们蒙古人不能接受的。现在，乔巴山的政府之所以能这样肆无忌惮地搞赤化运动，完全是因为有苏联政府给他们打气撑腰。所以，我们最真正的敌人不是乔巴山，而是苏联，乔巴山不过是苏联扶植的一个傀儡而已。但要依靠我们外蒙古的力量去同苏联对抗，那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也必须寻找自己的靠山。

中国现在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得到了美国、英国的支持。我们外蒙古的主权至今仍然属于中华民国，所以，最好是能请中华民国出兵，同苏联交涉，这样里应外合，乔巴山必灭，蒙古必兴！”

大家听了省禁不住鼓起掌来，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尤高济尔说：“对！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苏联，只要制服了苏联，乔巴山就不敢在蒙古肆无忌惮了。我们最好起草一份给南京国民政府的电文，向他们反映我们的要求。

曼楚什利高兴地说：“起草电文的事就交给我来办吧！”，尤高济尔拍了拍曼楚什利的肩膀，笑着说：“好，就这么定了。电文要写得恳切真诚，同时把我们蒙

古王公的处境也反映上去，以便引起他们足够的注意。”

“是！”曼楚什利十分爽快地回答道。

尤高济尔和大家继续开会，曼楚什利则到另一间屋里去起草电文，电文是这样的：

“尊敬的大中华民国政府，我们蒙古的王公、喇嘛、以及广大的阿拉特牧民，向你们发出请求。由于苏联政府一心扶植乔巴山的人民革命党在苏联红军的支持下，在外蒙古推行强硬的赤化政策，弄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民不聊生，人民生活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人民革命政府和人民革命党仿照苏联的革命，取消了各王公，呼图克图、呼毕勒罕以及文武官吏的爵位，同时也剥夺了他们占有阿拉特贡民的权力，并且财产也被没收了。现在，中下层牧民也开始被剥夺要实行集体农场。为了外蒙的繁荣与稳定，为了外蒙免受苏联的影响和控制，为了外蒙古更好地与大中华民国维持亲密的关系，为厂外蒙古的王公、僧侣以及阿拉特牧民的民生疾苦，请你们协助我们消灭人民革命党，以便邀请第九代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转世活佛和蒙古人民众望所归的班禅额尔德尼活佛来蒙。”

曼楚什利起草完后，把电文交给了尤高济尔，他看后非常满意。“好！这样最好。”于是派人把电报发往南京。

尤高济尔同时派额利格登达格巴前往中国，同南京国民政府商谈出兵事宜。以尤高济尔为首的三十八人僧俗爱国集团由此成立。

3. 38人被枪决

1930年5月的一天，额利格登达格巴装扮成一个商人的样子，准备前往中国，与南京国民政府详细商议有关中国出兵外蒙古的事宜。

当时，暖风习习，蒙古的大草原又是一片绿色的生机。天空蓝蓝的飘过几缕白云，一路小鸟在空中自由地飞翔。但是，大地上却阴云密布，找不到阳光。

自从1929年美国黑色星期五以后，世界陷入了经济危机的恐慌之中。德国的法西斯正蠢蠢欲动，日本的法西斯正虎视眈眈，凯觐中国东北，中国国内正在军阀混战之中。苏联的肃反运动也正在进行得如火如荼。真是一个不景气的时代。

额利格登达格巴走到布鲁努尔特镇时，遇到了“克格勃”的跟踪，他机智地甩掉了“尾巴”。但当走到通往中国的关卡时，却被人抓住了。蒙古人民革命军的哨兵仔细地搜查了他的全身，后来在衣服的夹缝里找到了一封信，这是尤高济尔给蒋介石的亲笔信，信中的主要内容是要中国出兵外蒙古，把乔巴山和人民革命党消灭，让外蒙古重新回到中国。

哨兵看后大为吃惊，问额利格登达格巴：“你是干什么的？”

听到的只是沉默。

“是谁派你来的？”哨兵又问。

听到的还是沉默。

“是从库伦来的吗？”哨兵不耐烦地问。

听到的依旧是沉默。

哨兵急了，用枪背打了额利格登达信巴的肩膀两下，见他始终不开口，就用绳子捆住他然后用车押回了库伦。

“人民政府”内务部经过详细查询，终于找到了线索。当尤高济尔一伙 38 人正在开会的时候，把他们全部逮捕了。

1930 年夏天，“人民政府”开庭审理此案，起诉他们犯有阴谋叛国罪。尤高济尔义正辞严地反驳说：“我们不是卖国的叛徒，我们是真正的蒙古人。我们的目的是蒙古的自由和幸福。你们这些俄罗斯的走狗，总有一天会被蒙古人民丢进历史的垃圾堆去的。”

法庭当即宣布这三十八人处以死刑，立即执行枪决。这些爱国的僧侣们被送到库伦城外的一片荒地上，那儿正是丹尚和巴伐桑被枪决的地方。

只听一阵机枪的扫射，“哒哒哒……”，三十八个爱国的僧侣倒在了荒地上。

4. 难割难舍中国心

三十八僧侣封建主被枪决的事件发生后，仍然没有阻止人们回归中华民国的愿望，外蒙古境内到处掀起了反对乔巴山政府的斗争。

1930 年 9 月，一群喇嘛和阿拉特信徒在乌布沙诺尔省的台古斯布扬图胡烈集合，向自治公署进攻。他们的口号是：“停止没收封建主财产。”“打倒蒙古人民共和国！”“打倒阿拉特贫牧和中牧的党！”“宗教和国家合一，恢复给喇嘛的贡物！”

1931 年，哈尔蒙多尔济在北杭爱省和南杭爱省建立了反政府的集团。

1932 年，哈尔蒙多尔济跟库苏古勒省的喇嘛集团联合起来，在同年春季发动武装“叛乱”，势力发展到库苏古勒、扎布汗、北杭爱及南杭爱省，声震外蒙古全境。

真是难割舍中国心啊！

外蒙古毕竟是中国一部分！

第十节 东洋鬼子又染指

一、“满洲国第二”的迷梦

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在给日本天皇的奏折中写道：“要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要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洲和蒙古。”这条建议后来一直被定为日本的既定国策。

到1932年，日本侵占了中国东三省，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被“请”到东北当上了伪“满洲国”的皇帝，圆了他多年的美梦。为了保住并控制溥仪的江山，日本在东北派驻了号称“皇军之花”的强大军队——关东军。为他们在远东称霸的基础。

然后，他们又把目标转向了中国北方的外蒙古和内蒙古。

早在1921年前后，日本曾插手外蒙事务。当时，他们趁世界帝国主义各国都以武力镇压苏联之机，在远东纠集了近十万军队，同时联合外蒙古的封建主进攻苏联。

在干涉苏联的过程中，外蒙古自治“政府”的博克多格根利用机会同日军方面联络，指望日本能够给蒙古以支持。后来，博克多格根迫于形势，决定取消“自治”，归服中国政府。日本收买了白俄军官恩琴，帮助博克多格根把中国在库伦的驻军赶走了。恢复了外蒙古的“自治”，中国军队被迫驻扎在恰克图附近的买卖城。

1921年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把苏联红军“请”进了外蒙古，把恩琴的军队和中国的军队都赶出外蒙古，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日本占领满洲以后，其在远东的力量明显加强，因而对外蒙古进行干预也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实力。

负责满蒙事务的日本外交官井口十分狂妄地宣称：“大东亚只有在我们日本的领导下才能获得安全、自由和发展。没有日本的领导，亚洲就会被白人控制，北方的俄国、太平洋对岸的美国，还有老牌的殖民帝国英国，他们都想吞并东亚，我们必须提前控制东亚包括满洲、朝鲜、蒙古和中国。这是我们的国策，也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为了在外蒙古建立象“满洲国”一样的政权，日本政府招引在喇嘛世界中享有崇高地位的班禅活佛，并向他许诺，将来在蒙古集立了新政权，将由班禅活佛作蒙古的国王。

1932年春季，哈尔藏多尔济联合了外蒙古库苏古勒省、扎布汗省、北杭爱省以及南杭爱省四个地区的许多王公、喇嘛和人民，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叛乱。日本人与他们相互勾结，给他们提供战略物资、武器弹药，还向他们提议，让班禅活佛到外蒙古来主持大事。

哈尔藏多尔济虽发动了叛乱，但对于前途也心中无底，他知道班禅在蒙古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倘若能借助他的声望，则大事定然有望。

他决定答应日本的要求。在与井口派来的间谍秘密会面时，他说：

“我们愿意请班禅活佛到外蒙古来，如果我们反对乔巴山的武装力量获得成功，我们一定尊班禅活佛为蒙古的大汗。”

“好！一言为定。我们大日本国将尽一切努力支持你们的军事行动，争取能把俄国在外蒙的代言人乔巴山消灭掉，让外蒙古重新回到外蒙古人的手中。”日本间谍向哈尔藏多尔济打下保证。

“我们这里缺少的武器和粮食，只要你们提供足够的枪炮和粮食，我们就一定能消灭乔巴山！”

哈尔藏多尔济如此保证。

这场叛乱波及面很广，杭爱山南北很多人都对乔巴山的红色统治恨之人骨，因而，一听到哈尔藏多尔济发动了武装叛乱，便纷纷前来投奔。叛乱还波及库苏古勒省和扎布汗省。

库苏古勒省位于苏蒙边境的库苏冶周围，有著名的木伦河流过，那儿的草肥水丰，是十分富足的牧场。

扎布汗省在库苏古勒西面，境内有扎布汗河，著名的乌里雅苏台就是扎布汗河岸之重镇，也是原来外蒙王公贵族和清朝驻军居住的地方。

乔巴山面对全国这么大范围内的叛乱，不免有些惊慌，于是他向斯大林发电，请求苏联政府的援助。

斯大林详细了解了外蒙古的情况后，便向外蒙古政府运送大量武器和弹药，并派一批富有作战经验的军事参谋入蒙，协助乔巴山平叛。

乔巴山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才将哈尔藏多尔济的叛军消灭。

日本企图把外蒙古变成“满洲第二”的幻想破灭了。

二、日本扶植的“第五纵队”

日本这次在外蒙古的失败，并未改变日本要侵略外蒙古的野心。他们千方在计地准备武装侵略，扩大他们的军队，派遣间谍和军事活动分子潜入外蒙古境内，收买那些反对乔巴山政府的外蒙王公、喇嘛，利用他们的反政府思想，实现日本吞并蒙古的目的。实力脆弱的乔巴山政府自从平定哈尔藏多尔济叛乱之后，首要任务就是建立足以击退日本军事进攻的十足的现代化国防力量。

随着日本军从中国东北向华北的渗人，他们越来越感到局势的危机，迫使他们在政治上容纳更多的群众、取得群众的支持，巩固他们的红色统治。与此同时，对于国内阴谋夺权的叛乱分子则进行残酷镇压，并肃清国外主要是日本的特务、间谍。

乔巴山一心投靠苏联，想通过苏联的支持，保证人民政府在外蒙古的地位。

1934 年，乔巴山以蒙古人民政府的名义致电斯大林，表达了他的思想和感情：

“我们向您保证，我们所达成的党、政府和阿拉特的统一局面，一定会在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得到进一步巩固。在苏联不变的友谊和支持下，这个统一、团结的局面保证我们有可能在必要时保卫共和国的民族独立，击退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发展阿拉特游牧经济，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加强人民革命军的威力。”

而斯大林也借乔巴山之影响，间接控制外蒙古的内政和外交。

对于苏联在外蒙古势力的扩张，日本极为不满，他们也积极扶持日本在外蒙古的代理人，以图把他们推上外蒙古的政治舞台，控制外蒙古的内政外交。

由于日本已经在东北、内蒙和华北地区对中国造成强大的军事威胁，并随时有向外蒙武装侵略的可能，所以，在外蒙古内部也出现了许多亲日派的政治人物，他们自愿充当日本侵略外蒙古的工具，运用两面手法，表面上对乔巴山十分尊敬，暗地里却同日本特务间谍密切往来，听从日本人的命令。

“助力社”就是反对乔巴山政府的一个十分有战斗力的秘密组织。他们起初只是对乔巴山的残酷手段感到不满，因而结成一个小团伙，目的是联合更多的人，打击人民革命党的势力，恢复蒙古人的自由。但后来被日本特务收买，成了日本人控制的一个政治组织。他们到处搞破坏，打击人民政府正常的政治经济设施。

1935 年 6 月 9 日，助力社在日本人指令下，企图纵火烧毁乌兰巴托工业联合工厂所属的纺织厂，但纵火未遂，反被蒙古人民政府内务部查获，助力社遂被镇压。

住在东方省的札免季布喇嘛听到这件事以后，深感不安、因为他知道，助力社是打击乔巴山等亲俄派的一把钢刀。失去了助力社，就如同掉了他的一个膀臂。

札免季布是东方省德钦格根寺的住持。他十分崇拜班禅活佛，一心希望班禅能到外蒙古出任大汗，又由于东方省接近满洲边境，所以他经常到境外去拜访班禅活佛，并与日本人挂上了勾。

“我们一定要打倒乔巴山，驱逐苏联的走狗，把蒙古还给蒙古人！”这是他的目标。

“我们蒙古的王公和僧侣喇嘛阶层由衷希望得到日本的支持，依靠你们的力量把苏联人赶回欧洲，依靠你们的力量把班禅活佛送到外蒙古去，好让我们过自由自

在的生活。”这是他对日本的请求。

一天，当札免季布又准备去边境，与日本特务和班禅活佛会见时，被人民革命军的哨兵发觉，并逮捕了他。

接着，蒙古内务部又在东方省东南边境十七座喇嘛寺院里找到了一百多名喇嘛组成的反叛组织。他们在日本特务的指使下，阴谋发动武装叛乱，推翻乔巴山政府，建立班排活佛为人汗的新蒙古。他们的多次活动均被蒙古内务部的克格勃查获。

三、祸起萧墙。

七月的一个午间，乌兰巴托的天气骤然变化，天空浮起了乌云，刹那间便遮住了整个天宇，雷声隆隆，不一会儿，一场雷阵雨降临了。

闪电耀人，外蒙古军政部的一间办公室，军政部长兼人民革命军总司令杰米德正在与蒙古人民政府部长会议主席耿冬商议国家大事。

耿冬、杰米德都是身经百战的蒙古老革命，他们对乔巴山过于依赖苏联、一味反日的政策都十分反感。

“杰米德将军，您作为蒙古军界的最高领导人，对现在蒙古的战略形势作何估计？”

杰米德答道：“就目前的世界局势后，以德、意、日为核心的轴心国界有军事上的明显优势。德国想称霸欧洲、打败英法和苏联；意大利想吞并地中海，而日本则想在远东亚大地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相反，以英、法、美、中等国为核心的同盟国，则一心想让苏联同德意日为敌，便自己从中渔利。”

耿冬连连点头，杰米德的分析也正是他的想法，他认为苏联马上就要被德国消灭。于是他说：

“照您的分析，苏德战争的爆发也许为期不远了，那么我们怎么办？”

杰米德忧虑地叹了一口气，缓缓说道：

“我们蒙古虽然在主权上属于中国，但在实际的政治生活和国际关系中则是苏联的盟国。从目前的国际局势看，如果我们单方面投靠苏联，恐怕会遭到日本首当其冲的进攻。”

耿冬的脸上也浮上阴影，他说：

“日本自 1932 年占领中国东三省，建立‘满洲国’以来，可谓如虎添翼啊，其国力、军事战略、武装力量都比我们强大数十倍，一旦战争爆发，无异于鸡蛋碰石头，后果不堪设想啊！”

“是啊，所以我一贯主张蒙古不能单方面地听从苏联支配，而必须联合国际社会的各种力量，同英、美、法，甚至日本建立友好关系，使日本不把蒙古当作敌人。”

杰米德似乎有些激动，说到这里顿了一下，又继续说：“蒙古应该是蒙古人的，不是任何大国的附庸，一味地依靠苏联，在国内实行红色统治，恰恰是为日本人侵略我们找到一个借口。”

耿冬摇了摇头，对杰米德说：

“杰米德将军，我很为您的爱国热情所感动，但是只怕乔巴山不会同意您的意见。”

果然，当耿冬和杰米德去找乔巴山商议有关外蒙的战略决策时，乔巴山对他俩的思想十分吃惊。

“什么？你们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在没有同日本交战之前，就首先承认自己不如人，没出现难道你们忘了，我们身后还有强大的苏联红军的支持？难道你们忘了，我们面对的是几百万蒙古阿拉特期待的目光？你们这么快就被日本的军事力量吓倒了，将来真的打起来，你们会是什么样子？”

见乔巴山大发雷霆，杰米德仍然十分镇静，他很有礼貌地说：“乔巴山同志，不是我们的怯懦，也不是我们被日本的武装力量吓倒了。我们作出这种决策，实在是出于战略目的。您得承认，如果我们不公开宣扬我们和苏联的同盟关系，至少可使日本在侵略外蒙时少一个有力的借口，可推迟日本入侵的时间。”

耿冬也说：“我们的国家实力经过这几年的努力虽有较大进步，但总体上依然是十分弱小的，争取更多的时间搞国内建设、积极备战，这是良策啊！”

乔巴山哪里听得进这种劝告，他那永不示弱的性格使他有些妄自尊大，尤其是在部下面前。

他说：“我不相信，我们有斯大林的几百万苏联红军作战友，我们有几万的人民革命军，我们有用马列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坚不可摧的意志，还会败在日本手下？为什么要去考虑什么妥协政策呢？”

耿冬与杰米德还想继续争辩，但乔巴山把他们打断了：

“我担心可怕的不是我们的国力和军事力量不足，而是你们头脑里的垃圾！”

过了几天，在一次蒙古人民政府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乔巴山突然说：

“现在，日本的势力已经影响到了我们的某些高级干部中间，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防止这些人反革命的阴谋和瓦解人民军队和人民政府的决心。同时，我们决

定，请求苏联政府公开驻军的事实，并增派军队来蒙古，帮助抵抗正在酝酿中的日本武装侵略。”

这突如其来的发言把耿冬、杰米德及其他一些政府要员惊呆了，个个提心吊胆，心情十分沉重。

正在这时，蒙古人民政府内务部，通过各种手段，破获了乌兰巴托寺院住持姚恩、董汉鲍及国内 48 座大寺院的住持为首的一个反政府的喇嘛组织，这个组织拥有二千多名上层喇嘛。

据传，姚恩、董汉鲍和耿冬、杰米德有密切联系，因此，蒙古人民政府决定逮捕军政部长杰米德和部长会议主席耿冬，经过简短的“审讯”，他们都“承认”与日本特务暗中有来往，希望能与日本建立长期的友好关系。

乔巴山下令，将耿冬、杰米德两人立即枪决，并公布全国，这让外蒙全境的人都感到十分吃惊。

就这样，日本想通过外蒙古内部政治瓦解手段染指并控制外蒙的梦想又成了泡影。

第十一节 苏联应邀重发兵

日本在满洲制造紧张局势，弄得草木皆兵，把中国的东三省变成了亚洲的火药桶。与此同时，希特勒在德国进行法西斯专制统治，得寸进尺地践踏凡尔赛和约，积极准备发动战争，使整个世界都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之中，而处在内陆的外蒙古，现在又处在苏联、中国和日本的夹缝之中，因而处境也十分艰难。

外蒙古实行亲苏政策，把一切和平的希望都寄托在苏联的支持之上，因而成了苏联在远东的一个前沿基地；中国虽然拥有外蒙古的主权，但这只是一个名义和一种形式；日本则一心想在占领东北三省后，如法炮制一个“大蒙古国”将中国的外蒙古，内蒙古和青海等省都归入其中。

外受日本军国主义的强大威胁，内有耿——杰米德等亲日派，加上接连不断发生的叛乱，使外蒙古最高统治者乔巴山坐卧不安。

他似乎看到了：强大的日本关东军势如破竹，横扫外蒙古，把蒙古变成其又一殖民地，而他——不可一世的乔巴山却成了日本军的阶下囚……

不久前，他走出了狠毒的一招，把耿科与杰米德两位地位显赫的要员置于死地，并宣布将向苏联政府“借兵”，苏联在外蒙古秘密驻军的事实。这样，他更无保留地投入了斯大林的怀抱。

1936 年 3 月 12 日，外蒙政府曾与苏联政府签订《蒙苏互助协定书》，议定“无论协议双方的那一方遭受了敌对国家的侵略，另一方都应无条件地支持该国的反侵略

战争。”

根据这一协定，乔巴山致电苏联政府和斯大林，请求军事援助。电文如下：

“苏联人民政府和苏联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鉴于目前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制造的紧张局势，使蒙古人民直接遭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的威胁。为了保护蒙古人民共和国不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武装侵略，我们衷心地请求苏联政府派遣军队援助蒙古。”

苏联政府和斯大林接电后，立即下令，派遣红军第 57 特别军进入外蒙古，增援原秘密驻蒙苏军。

这是斯大林早有部署的。

早在 1936 年 2 月的时候，莫斯科政府就曾对日本驻苏大使声明，如果日本方面对外蒙古有任何违背国际公约的行为，苏联将对日本采取必要的报复措施。

日本在蒙满边境上制造的各种冲突事件，不能不引起从 1921 年起就一直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维持着友好关系的苏联政府的关注。

1936 年 3 月 1 日，斯大林也明确表示：

“蒙古人民共和国是我们在远东最亲密的朋友，如果日本决定进犯并侵害其独立，我们就不得不进行援助，我们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者在蒙古领土上横行。我们的外交政策，是永远忠于自己的国际主义原则和义务。

1937 年 9 月，从北冰洋刮来的西伯利亚寒流，夹杂着北冰洋的阵阵寒气，向蒙古高原上的蒙古袭来，带给人一股深秋的寒意。

一列大型的火车在西伯利亚的山岭和平原之间奔驰着。

一座山接着一座山、一条河接着一条河，一个村接着一个村，都被列车抛在身后，它只知道不住地喊：“前进——！前进——！”

这列火车是从莫斯科开往外蒙古的军用列车，车上坐满了从苏联来的红军战士。

他们奉最高统帅斯大林之命，到远东、到外蒙古长期执行任务，完成抵御日本侵略军的使命。

他们的脸上露着激动而欣喜的神情。他们把能接受这神圣的使命当作自己最大的荣幸。

斯大林告诉他们，蒙古人民和苏联人民是手足兄弟。蒙古虽不属于苏联，但却同苏联的本土一样重要。

他们也知道，他们的上一代红军战士，曾奉伟大领袖列宁之命，到蒙古执行军事任务，好多人整整呆了四年才撤离蒙古。

今天呢？他们也需要这么久的时间吗？

这一群年轻的红军战士，正处于幻想、浪漫的岁月，有的是刚刚走出校园的大学生，有的则是刚刚跨入结婚殿堂的新郎，有的正在热恋之中……

瞧，克谢尼耶夫卡正在思念他的情侣，想象着他与情侣的幽会，甜甜蜜蜜。

“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
只有风儿在轻轻唱，
夜色多么好，心儿多爽朗，
多么迷人的晚上！
小河静静流，微微泛波浪，
水面积着银色月色，
一阵轻风，一阵歌声，
多么幽静的晚上！”

是啊，多么幽静的晚上！可是他离开家乡、离开情人却越来越远了……

列车经过五天的奔波终于来到了外蒙古的边境城市阿尔坦布拉克。

年轻的红军战士纷纷跳下火车，踏着整齐的步伐，迈进了异国的千里草原上。

第十二节 血战诺门坎

一、关东军历史上唯一的一次象样的战争。

关东军是日俄战争爆发后不久到太平洋战争结束后驻扎在中国东北扮演了日本侵略中国急先锋的一支日本殖民军队。

关东军在战前的人们留下的印象是独断专行。即使今日，一个组织机构的下属单位，如果无视周围大多数人的意志而为所欲为，也还会被指责说：“唉，那是我家的关东军！”

日本关东军是一支野蛮的殖民军队，从成立之日起，它就以俄国为假设的敌人。日俄战争后，来自北方的威胁逐渐消除。但另一方面，就在关东军的鼻子底下，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直至蒋介石完成北伐，中国内战连年，一片混乱，关东军看在眼里，认为干预中国内政的时机已到，并想藉此实现其侵略满蒙的旧梦。

九·一八事变以后。苏联因国防线直接与日本接触，神经变得极紧张，日本和“满洲国”共同担负防卫责任之后，苏联马上与外蒙古缔结同样的协定与之对抗。

伪“满洲”国为开发边境而着手建设军事铁路后，苏联也加速了完成西伯利亚的复线工程，全力开发东西伯利亚。

西伯利亚铁路从赤塔绕着“满洲国”边境延伸到海参崴，故苏联的国防线东自沿海，北经东部西伯利亚，西绕外蒙古，三面包围了“满洲国”，而且“满洲国”的边境直接接触苏联最活跃的动脉干线，故此常常发生边境纠纷。

在苏“满”边境发生纠纷，还因为边境线不清。原来环绕满洲的国境线，是由中俄 1689 年的尼布楚条约等 11 个条约和协定划定的，伪“满”政府不得不继承这些规定，但有些规定往往十分含糊，可以任意解释，而且界标设置得很少，且长年累月经风吹日晒雨淋，已失去界标作用，尤其是从兴凯湖到图门江的 600 公里的东郊边界和“满”蒙接壤的西北部呼伦贝尔草原一带。

日本关东军和参谋本部一厢情愿地确定了对自己有利的边界线，并准备随时发动闪电战，攻占外蒙古。

苏联军队进驻蒙古，也是作好了最坏的打算，决心与日本决一死战。

“满洲”的建立，使关东军迎来了新阶段。因为“满洲国”的建立，使得边境直接和苏联与外蒙的边境联结在一起。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关东军原来就有的“对付北方敌人”的性质，在与苏联直接接壤后直接行苏军对峙，更变得现实了。

1936 年，关东军又有染指外蒙的迹象。1937 年春，曾在外蒙军内有人秘密策划反暴动。同年 7 月，传来日军在平津地区的军事行动消息，在外蒙人中间引起很大的波动。

于是，苏联远东军“被邀”进入外蒙古。这样，一手包揽了“满洲国”的军权的关东军同不断加强军事力量的苏联，直接在国境线上对峙起来，边境争端不断发生。

在这些争端中，有些甚至发展成险些造成全面战备的极其危险的局部战争。

诺门坎事件就是其代表之一。在关东军的历史上，这是唯一的一次象样的战争。在这次边境冲突中，关东军败在以机械化为主的苏军手下，使日关东军大失军威。尽管 1937 年发生了中日战争，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苏联对日宣战，关东军一次也未体验到对苏俄战争的滋味。这使它错误地估计苏联的实力，阻碍了其自身的装备与战术的现代化。

二、暴风雨之前

“满洲国”叫诺门坎的地区，是指府拉尔南约二百公里纬地方，即从汗达盖——将军庙——阿穆内部一线到哈拉哈河的地区。在苏联的地图上，哈拉对河叫哈勒欣河。苏联所以把诺门坎事件叫做哈勒欣铁河的战斗，就是起名于这条河的。

而外蒙方面则主张，哈拉哈河是他们的领河，双方边境线是通过哈拉哈河东侧和北侧。他们主张的这条线，是早在 1734 年哈尔加族和哈拉哈族互相争夺地盘时，由清政府裁决而划定的分界线。

因此，在“满洲国”建立之后，苏满边境就不断发生冲突。到 1935 年，具体边界冲突急剧增加。1937 年，终于发生了日关东军击沉苏联炮艇的干岔子事件，

干岔子事件，是围绕着满洲北部边境黑龙江中的一个小岛进行的。2 月，曾有日本人和满洲人登上干岔子岛和大别基切夫岛。对此，苏联曾多次向“满洲国”方面提出抗议。到了 5 月，也许苏联认为只提抗议无济于事，于是派出少数兵力在二岛登陆。

这时关东军调集一个师团的兵力到这里，苏联也调集了炮舰、炮艇。于是两军形成对峙。

本来日参谋本部认为，对这样一个地处偏远的小岛。不值得倾注兵力，采取了不扩大的方针。但是关东军不满这一消极态度。6 月 30 日，竟独断专行地擅自向苏联炮艇开火，击沉了其中一艘。于是日苏冲突加剧。

1938 年 7 月 1 日在西伯利亚与东满、朝鲜北部接壤的地方，日苏两国发生了军事冲突。这一事件是以事件发生地，一个名叫张鼓峰（苏联方面叫哈桑湖）的地名命名的。在日苏两国边界冲突中，这是第一次投入大量军队进行的真正战斗。

张鼓峰是苏、满边界附近一个标高为 150 米的丘陵，除满汉铁路由它身边通过外，在战略上并无多大价值。“九·一八”事变后，日苏两国军队都在这里配备了国境守备队，围绕着不明确的国境线。日苏少数军队开始对峙，由张鼓峰到沙草峰一带，一直维持着由两国军队轮流占领的局面。

7 月 11 日，当日陆军总部得到情报说，约 40 名苏联士兵在张鼓峰山顶构筑阵地时，他们的反应是复杂的。因为当时日本陆军正集中中国派遣军全部兵力进行武汉会战。因此，对在这里同苏联打一场真正的战争，多持批判态度。日本天皇也下令当地日驻军立即撤出战斗。

当然，一直在等待着进攻命令的当地驻军，对这样的命令很难心悦诚服。他们迟迟不愿撤回原来的防线。29 日，当他们真正撤退时，在当地又发生了第二次冲突，终于卷入了一场真正的战争。

三、独断专行师团长

29 日上午 9 点多。

当尾高师团长接到苏军在沙草峰以南构筑阵地的报告后，他怎么也坐不住了，立即命令日国境守备队长对其发起进攻。他认为这一事件与张鼓峰事件不同，因此

就强辩说，这与行前下达的当地守军返回原防地的命令并不矛盾，请求朝鲜军司令官允许他再次集结兵力。

朝鲜军和大本营虽然同意这一事件与张鼓峰事件另作处理的意见，但原则上仍坚持不扩大的方针，禁止他们在追击时越过边境。

然而尾高师团长本来就属于对苏强硬派，常常为没能参加在中国进行的战争而抱怨不已。他不满意这一方针，事先也未向朝鲜军司令部请示，就独断专行地擅自决定向苏军进攻。

31日拂晓，日军向张鼓峰到沙草峰一线苏军阵地发动夜袭击，总共投入一个联队约1600人的兵力。进攻基本获得成功，苏军向东撤退。

日军刚一行动，远东方面军司令员布留赫尔元帅便命令驻波谢特地区步兵第40师各部队作好战斗准备，同时派出两个加强营派往齐纳纳山和扎奥纳山，很快爆发了激烈战斗。

苏军于8月初投入了相当多的兵力，布留赫尔元帅把哈桑湖战争交给远东军区参谋长格奥尔基·什捷伦军长直接指挥其本部开始策划一次进攻。

8月6日，首先对高地进行了轰炸和密集炮轰，随后苏联步兵发动攻击。

8月9日，在双方遭到沉重伤亡之后，战斗实际上停顿下来，日军放弃了对有争议领土的占领。

四、 下达“满苏边境纠纷处理纲要”

1939年4月，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命令所属务兵团司令官要执行“满苏边境纠纷处理纲要”。这个纲要中的14点是国境问题，它典型地表示出关东军对边界冲突的强硬态度。

这个纲要主要内容是：

1. “我不犯人，也不准人犯我”，这就是关东军对待边境线的根本立场。如果要突袭并歼灭越境苏军（包括外蒙军），则可以“暂时进入苏联境内”。

2. 在边境线不明确的地区，各地防卫司令官可以“按自己判断划定边境线”，并要明确告诉前线部队。

3. 一旦发生纠纷，要求前线部队“断然采取坚决果敢的行动”，至于对由此而产生的事态进行处理的收拾局面，要“信赖上级司令部”。

从以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要用武力解决纠纷的思想，现在比过去更明显了。

这样一来，只要当地军队忠实地执行司令部命令，或者苏联方面不作出让步，就不可避免地迟早会在为境上发生一场大的冲突。

诺门坎事件的第一份报告，传到关东军司令部，就是在这个“要纲”下达后不到 20 天的时候。

五、第一次诺门坎事件

1939 年 5 月 11 日，数十名外蒙骑兵过哈拉哈河进入诺门坎布尔特·欧波西南约十五公里的地方。“满洲国”警备队立即把他们赶回西岸。

12 月，外蒙骑兵再次进入东岸，并同“满洲国”警备队进行交战。

发生“诺门坎事件”的第一份报告，是在 1939 年 5 月 13 日下午送到关东军司令部的。

5 月 23 日，驻海拉尔的第二十三师团长司令部，正召开联席会议，向各部队传达“满苏边境纠纷处理纲要”。这时，从诺门坎送来了首批报告，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中将是诺门坎方面的防卫司令官，他决心与外蒙部队战斗。当即下令部队出动。

5 月 13 日下午，小松原道太郎中将在给关东军司令部的电报中说：“约七百名外蒙士兵十二日晨，在诺门坎地区涉过哈拉哈河侵入满洲国境，与满洲军之一部交火。由于其后方似乎有增援部队，已令师团所部之一部和满军将其歼灭。”

不过，这次交火是在 12 日还是 11 日说法不一，关东军特别是当时的关东军作战参谋很部卓四郎中佐和政信少佐等人，坚持说是在 12 日，而苏联方面却说是在 11 日。由于这一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素有常胜之称的日本陆军的唯一污点。因此，关于战斗的真相，至少现在还有许多地方无法弄清，恐怕今后不少地方也还会是个谜。

日军奉命出动的部队，于 5 月 15 日，在一个轻轰炸中队配合下，把外蒙部队直赶到哈拉河西岸。之后，于 5 月 17 日返回海拉尔。当时，第二十三师团以为事件到此结束，不会扩大。

第二十三师团出动部队撤回后，外蒙国境警备队再次进入哈拉河东岸。带有苏军标志的飞机也开始在发生纠纷的地区上空飞行。与第二十三师团上述估计相反，苏军部队介入了纠纷。

5 月 21 日，第二十三师团重新下令部队出动，由步兵连队长指挥。人数约 2000 名。这支部队于 5 月 28 日凌晨在哈拉河东岸发动进攻，但遭到猛烈的炮轰，伤亡很大，因而攻击没有取得进展。师团长迫不得已命令这支部队从战场撤退。

5 月 31 日，部队借着夜幕离开战场。

接到诺门坎事件的第一份报告时，关东军参谋中没有人知道这个地名，以至花了很长时间才在地图上找到。

六、东骑兵联队全军覆没

真正的战斗是在 5 月 28 日以后。

5 月 13 日，小松原师团长以两个步兵中队配属给东八百藏中佐率领的骑兵联队，编成东支队派赴战场；又把海拉尔的全部满军（约三百名）拨归支队指挥。

东支队在空军支援下发起进攻，外蒙军 15 日撤退到哈拉哈河左岸。因此，东支队退回海拉尔。便在东支队撤退后，外蒙军又到了右岸，并构筑阵地。对当面之敌如何处置，在小松原师团长和关东军司令部之间意见有些分歧。司令部主张对外蒙军的入侵采取静观态度，伺机一举击败它；而小松原却主张立即予以打击。结果采纳了小松原的意见，然而等待它的却是整个骑兵联队全军覆没的惨剧。

小松原师团长决心确保哈拉哈河一线，又给东支队配属了一个步兵大队和一个炮兵中队，编成山县支队，而且空军也得到加强，与外蒙古军以及新派来的以机械化部队为主的苏军对峙。

28 日，由于日军发起进攻而重开战端。日本方面把以步兵为中心的主力配置在苏蒙军方面，派东骑兵联队迂回到敌人侧面进攻，以断其退路。但是，苏军的坦克、炮兵的进攻异常猛烈，使日军主力陷于困境，特别是派去进攻苏军侧背的东骑兵联队反被切断退路，被坦克包围歼灭。东骑兵联队士兵或撞在一起倒在一处，或横卧在烧毁的汽车上活活被烧死，其惨状真是令人目不忍睹。师团长又派了三个炮兵中队上去，以与苏军对抗，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终于难挽败局。

31 日，日军撤离战场。

这就是第一次诺门坎事件。

这次事件用关东军的话来说，是“胜负各半”。但除了空军的胜利外，日本方面根本无胜利可言。由于真实情况连参谋本部也未能及时准确地报告、以致日本参谋次长还打来祝捷的电报。不难想像在这种事态面前，小松原师团长万念皆灰。在“边界纠纷处理纲要”的重压下，几乎以师团长独断专行的形式进行的这场战斗，以一个联队被歼而告终。

七、朱可夫临危受命

进入 6 月，苏联步兵第五十七特别军军长已经由朱可夫担任。看来，由于某种原因前任军长弗克连科已被撤职。当时，军司令部设在哈拉哈河以西约 130 公里的塔木扎克·布拉科，即塔木斯克。

新任军长朱可夫，就是后来的朱可夫元帅。他生于 1896 年，于 1915 年被征召加入沙俄军队，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 年 8 月，他参加红军骑兵部队，并于第二年入了党。在国内战争时期，他转战南北，任骑兵排排长等职。之后，他历任骑兵团团长、旅长、师长和军长等职务。在被调到外蒙以前，他是白俄罗斯军区代理司令。

朱可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接任军长职务后，他认为仅靠现有兵力很难阻止日军的行动，因而向国防人民委员会提出增加兵力。”他要求增派的兵力是航空部队、三个以上的步兵师、一个坦克旅以及炮兵部队等。

6 月 8 日，红军参谋部接受了这项要求，立即采取了必要措施。

从 6 月中旬，西伯利亚铁路的军事运输增多。初期，几列军用列车为一批，每隔一定的时间持续东进。但到后来，各批军用列车在时间上的间隔越来越短。有时甚至由三十列军用列车织成一批运行。

这一切表明，苏军在集结兵力

八、日军轰炸外蒙古

6 月 19 日，第一次诺门坎事件的善后工作还未处理完毕，关东军又接到小松原的电报。

电报内容是：

- (1) 苏军在诺门坎不断增兵、18 日把“满洲国”军驱逐出去；
- (2) 苏军飞机轰炸温泉一带和甘古尔庙，造成损失。而且师团长在防卫责任上，建议主动给以严惩。

关东军司令部接到电报后，立即召开作战会议，20 日命令向诺门坎方向调集兵力。调集的兵力有补充后的第二十三师团全部，由第一坦克团和第七师团的一部组成的安冈支队，还有配属的第二飞行集团。这是边界争端中没有先例的大规模调集兵力，其方针是不惜与苏军展开正面冲突，态度非常强硬。

这一方针的确定，可以说经过了不少波折。大部分作战参谋认为，考虑到中日战争和在天津租界问题上的日英谈判，主张慎重。独有迁政情少性力排众议，主张强硬对敌，作战主任参谋服部卓四郎同意这一意见。结果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军司令官冶田谦吉大将也被强硬派说服。最初的作战计划中，确定由驻满日军中战斗力最强的精锐之师第七师团担当主力，后来军司令部命令，改由第一次诺门坎事件当事者第二十三师团担任主力。之所以开始计划由第七师团担任主力，是因为第二十三师团于上一年刚刚组建，对其战斗力不甚放心，因而一下子投入精锐部队，可见其决心之大。

对关东军这一方针，陆军总部持否定态度，但鉴于在第一次诺门坎事件时，它

与关东军之间没有多大分歧，暂时同意了这一计划。这个计划包括用飞机轰炸外蒙境内一些目标。只是关东军估计会遭到反对，而事先未予提及并请示。

当参谋本部在偶尔的情况下，听到这个轰炸计划时，害怕扩大事态，立即拍电报表示不当，又派作战次长有未次中佐去满洲，企图说服关东军不要轰炸。可是在有未作战次长赶到的6月27日那天早上，关东军已对外蒙境内据点塔木斯克进行了轰炸。于是，第二次诺门坎事件便发展成大规模的战争。

为确保制空权，日军出动了130架飞机，对苏蒙空军基地进行了空袭。

据报导，日军取得了击落、击伤苏机百架以上的赫赫战果。

这次对塔木斯克的大轰炸使苏联知道了日本决心大举进攻，结果苏联在诺门坎周围继续增兵。这就使参谋本部和关东军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

据说稻田正纯作战科长在接到关东军报告战果的电话后，竟破口大骂：“混蛋，什么战果！”他命令关东军司令官谨慎从事，这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另一方面，关东军司令部强烈反对陆军总部的这一态度，强辩说轰炸是一种报复措施。与此同时，依然坚持强硬论，企图强行打下去。

这样一来，日军出动了几万大军，进行了一场真正的局部战争。这场战争是在没有得到陆军总部支持的情况下，由关东军独断专行进行的，苏联方面也作了大规模的动员。

九、兵败如山倒

关东军制定了大胆的作战计划：预定7月1日开始进攻。集结于诺门坎的第二十三师团和安冈支队，由于日本方面已夺取制宝权，认为可以放心大胆地渡过哈拉哈河，冲入左岸的敌人阵地，一举把苏军歼灭。

7月2日夜，第二十三师团主力按预定计划到达哈拉哈河左岸。对此，苏联方面的抵抗非常激烈，出动了数百辆坦克回击。在这次战斗中，日本的反坦克炮和用燃烧瓶实行近战击毁行军坦克的战术发挥了威力。

3日下午，战局开始转为对日本不利，二十三师团撤退到哈拉哈河右岸与安冈支队会合。另外，左右岸对敌人阵地实施进攻，安冈支队也损失了四十辆坦克败退下来。

5日，日本再次发起进攻，由于受到坦克和重炮的火力拦截未获成功。

10日以后，战线呈胶着状态。

看到这种情况，参谋本部知道在诺门坎短期以内很难取胜，准备由日本方面作出让步（具体来说承认外蒙和苏联主张的边界线）以结束这场战斗。但关东军却坚

持说苏联方面的损失也很大，主张再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进攻。

于是，参谋本部 20 日调关东军参谋长矶谷回京，拿出“诺门坎事件处理纲要”（主要内容是把事件限制在局部范围，坚守在哈拉哈河右岸，通过外交途径加以解决）给他看，他却说苏联无进行全面战争的意向。所以，只有彻底予以打击，问题才能解决，他把参谋本部的指导一下子给顶了回去。

关东军深感苏联的兵力比预想的要强大得多，而自己的炮兵力量不足。因此，又由内地调来了三个重炮联队，7 月 23 日发动了第三次进攻。结果也失败了，战场仍处于胶着状态。

在这其间，关东军解散了 6 月中旬受到打击，损失惨重的安同支队，在满洲全境实施防空管制。

8 月，日大本营陆军部发出命令，在海拉尔组织第六军，直接指挥作战。第六军司令官由狄州立兵中将担任。战争由此转入了持久战。

苏联方面在朱可夫指挥下组建了第一军团，以五个装甲师（坦克、装甲车各 420 辆）为中心不断增强兵力。

8 月，苏军重新夺回了由日本夺去的制空权。在日本方面开始考虑持久战和越冬的时候，苏联方面准备好了大规模的 8 月攻势。8 月 10 日前后，苏联方面进行了小规模的战斗，由 26 日开始转入真正的进攻。在这之前，这一带集结的兵力有三个狙击师，五个装甲师，两个骑兵师，远远超过日本方面的估计。

关东军继续采取强硬态度，苏联也决心保卫自己主张的边界，而且决心在这里进行一场短期决战。之所以采取这一方针，也许是考虑到欧洲形势的发展，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就是在 8 月 23 日签订的。总之，苏军 30 日在大批飞机有力支援下全线展开攻势，在重新补充的新式坦克群的掩护下。大部队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一步步地向日军压过来。23 日，已形成一个大的包围圈，切断了日军的退路。

对此，关东军将主力第七师团投入战斗。25 日，又决定将第二、第五师团投入战斗，力图改变战场上的被动局面，重新站稳脚跟。但为时已晚，退路已被切断，防御阵地也被穿插分割成几块，只能在几个孤立的据点进行抵抗。

这样，苏蒙军确实是出其不意地进攻了关东军。8 月 20 日这天是星期日。据朱可夫回忆说，特意选择星期日作为发动攻势的头一天，是趁第二十三师团部队官兵不戒备的机会。

不过，这种出其不意，并不在于选择星期日发动进攻，而是在这之前就已产生的其它因素。正如前面所述，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关东军作战参谋过低地估计了敌军的力量。

对于苏军的进攻，日军曾企图突出包围，但只能白白增加伤亡。孤立的据点一

个接一个地被攻克，29日，日水军队完全被驱逐出外蒙古主张的边界线以外。

其中最悲惨的是第二十三师团。它在第一次诺门坎事件时已失去一个联队，之后虽然进行了补充，但没有很强的装备，依然被配备在第一线。

在24日苏军发动攻势时，小林恒一少将指挥的一个步兵团，被配备在赫尔斯坦河以东第一线。经一天苦战、黄昏时终于冲入苏军阵地。但是，苏军坦克马上反攻，在阵地上来回乱轧。日本的反坦克炮和燃烧瓶对苏军的新式坦克已失去作用（在第一次战斗中坦克被打中后多马上起火燃烧，而这次却几乎都不燃烧），于是，步兵团陷入一片混乱，受到毁灭性打击，不得不后退。在这次战斗中，小林团长自己也被坦克轧成重伤。其他士兵被坦克轧死轧伤的也很多，这一切都说明战斗的激烈和日本方面的无谋。

28日到29日，当师团司令部准备撤往赫尔斯坦河以北去时，突然受到来自高地的攻击，整个师团完全被坦克群包围起来。开始时在第一线的山县武光联队长烧掉军旗，拔刀自裁，小松原师团长给军司令官写好遗书，也准备发起最后一次冲锋，以死相拼。由于军司令官的劝阻，才率领残兵败将撤了回来，据说连密码本也烧掉了。

第二十二师团死伤一万一千多人。死伤率超过了百分之七十，可以说是不折不扣地被歼灭了。而且许多指挥官战死，侥幸活下来的也有许多怕擅自退却，军司令官会追究责任而剖腹自杀。师团长自己于事件后回到东京待罪，结果一命呜呼。

第二十三师团组建刚刚一年就被歼灭，这一历史事实具体说明了诺门坎的悲剧，由于师团长自己的强硬论引起的这一事件，由于关东军也转向强硬而得到扩大，终于使师团自身走上进退维谷、难以自拔的境地，最后遭到灭顶之灾。

十、关东军内的强硬派被一扫而光

日参谋本部面临着决定性的失败，即使条件多么苛刻也决心接受，以了结这次事件冲突。

8月30日，日军参谋次长中岛铁藏去长春说服关东军首脑。但关东军司令部仍坚持即使事已至此，也要在短期内集中兵力再战。参谋次长也只好答应他们，预定9月10日发动对苏的进攻。

参谋本部知道这一消息后，大为震惊，再次派中岛参谋次长去长春，严令他们9月4日前，停止一切对苏联的进攻，把军队撤到有争议的地区以外。

对此，关东军仍然要求允许他们进行一次小规模的战斗，打扫战场，以收回阵亡将士的尸体，并且扬言，这一请求如得不到允许，军司令官准备辞职。但参谋本部没有答应关东军的请求，而且像追魂一样，从6日到8早接连下达两道命令，免去植田军司令官以及矶谷参谋长、矢野音三郎副参谋长、寺田雅雄作战科长的职务，服部等两位作战参谋也被免职，副参谋长以上一律退出现役。

这样，关东军内的强硬派被一扫而光，诺门坎事件由外交谈判解决。

梅津美治郎中将被任命为新的关东军司令官。

十一、停战协定在凌晨签字

值得注目的是苏军再也没有发动新的攻势。如果苏军乘第二十三师团败退之机进行追击，打到海拉尔，则易如反掌。但是，苏蒙两军不愿越过外蒙主张的边界。这也许是因为欧洲战线发生了一些情况吧，9月1日，德国进驻波兰，苏联也在日苏间签订停战协定的第二天（9月17日）进驻波兰。

9月3日，日大本营陆军部命令关东军司令官，停止实行原定的等待增援兵团到达后重新发动攻势的计划。日本政府开始通过外交途径收拾局面了。

于是，关于诺门坎事件的处理交给了在莫斯科举行的谈判。对准备作出全面让步的日本来说，以意外宽厚的条件达成了协议，停战协定于9月16日凌晨签字。

关于边界，经多次磋商，于1940年7月日本全面接受了苏联的主张，最终达成协议。

事件总算解决了，这一切，关东军都未曾参与。

十二、关东军到底能走多远

“打倒苏联”，这已是日本陆军的传统使命，每年的年度计划都主要是以苏联为假设敌制订出来的。其主力当然是“对付弱方敌人”的关东军。因此，关东军强烈地意识到它是保卫“帝国生命线”的满洲的“尖兵”。

诺门坎之战终于以日本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这场战争不但对关东军是唯一的一次真正的战斗，而且对整个日本军队来说，也是一场以用现代装备武装起来的军队为对手的第一次战斗。关东军对苏军兵力的估计太天真了，就拿这一点来说，苏军仅坦克战就打出许多新战术，日军方面几乎无法招架，无计可施。这对于自封为“常胜不败”之军的日军来说，当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但又很难说它已接受了教训。虽然强调了机械化，但在日本陆军中依靠白刃格斗的想法依然根深蒂固。而这种“精神第一”，随着战局的恶化，越发强调起来。

正如朱可夫所评价的一样，日军军官尤其是佐官（相当于校官）和将官“缺乏训练和积极性，有教条主义倾向”。而“军士级干部的训练良好，他们不顾一切地顽强战斗。他们从不投降，能毫不犹豫的自杀。”

如此这般，关东军究竟还定得多远！

第十三节 苏德战场上的骠骑兵

一、风云变幻

日本关东军在诺门坎战役中的失败，使他们成了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饿虎，直到日本最后投降，再未能打过一次象样的战争。

为了保证其在整个太平洋地区的优势，日本终于在让步的情况下，于1939年9月在莫斯科同苏联政府签订了协议书，保证了苏联和外蒙古在远东的边界要求。

就在日苏协议刚刚达成不久，欧洲的局势却发生了激烈的变化。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进攻波兰，并以闪电战术攻下了瑞典、挪威和比利时，接着又于1940年攻占了法国。英美中各国宣布同德意日宣战。

苏联为了保卫祖国，把军队开进了波兰，仓促地采取了行动。

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规模巨大的空军、坦克部队、摩托化部队和步兵向苏联发动了全面进攻，苏德战争终于爆发了。

苏联红军毫无防备，仓促应战，节节败退。

外蒙古乔巴山政府立即作出“反应”，当天下午，乔巴山召开了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蒙古人民共和国小呼拉尔主席团和部长会议联合会议，大会作出决议，决心全力以赴支援苏联卫国战争。

“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访苏联政府相脑……我们蒙古人民的同情完全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一边，我国人民随时准备与苏联人民并肩作战，奋起捍卫自由和独立，保卫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

1941年6月25日，也就是德国入侵苏联的第四天，乔巴山和小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布麻曾德致电斯大林，电文说：

“我国人民决心和苏联人民一起挺身捍卫劳动人民的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神圣领土。”

在乔巴山和布麻曾德的领导下，蒙古人民开始兴起大规模的支援苏联的全民运动。他们纷纷举行集会，向蒙古人民宣讲世界战争的形势，号召蒙古人民也投入到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去，打倒希特勒，保卫苏联。

不久前，苏联军队帮助蒙古打败日本关东军，保证了蒙古的边境安全。现在，该是蒙古人向苏联回报的时候了。

乔巴山向蒙古人民演讲时说：

“目前，我们最重要的基本任务是尽量援助苏联各族人民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作战，因为不战胜那以奴役来威胁全世界各族人民的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就不可能有蒙古人民共和国进一步的顺利而自由的发展。”

在他的鼓动下，很快形成了一个全蒙古的支援苏军的“募捐”运动。

二、全民“募捐”，支援苏联

1941年10月，第一趟满载蒙古人民“赠”给苏军战士礼物的列车徐徐驶出小呼拉尔车站。

列车上载有15000套冬服，约3000个个人寄的包裹，其总值达1.815图倍里克，此外，还有587000图倍里克现款汇往苏联国家银行。

为了支援苏军，乔巴山和布麻曾德在外蒙掀起了一个战时经济的“总动员”，号召蒙古各行各业人员加倍地劳动，使国内经济获得巨大增长，有了相当储备，然后向苏联红军捐献。

蒙古人民革命军中央委员会收到无数封牧民、工人、职员和人民军战士请求派他们上前线的来信。各工业企业单位纷纷保证超额完成生产计划，提高生产率和节约材料，以便更多地支援苏军。

乌兰巴托一家皮革工厂和一家制呢厂的全体工人放弃了1941年度的例行假期，并请求把假期中生产出来的产品转交给苏军战士。

蒙古首都一家工厂的250多名工人提出保证：愿意放弃所有休息日，直到战争结束。

1941年11月召开的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全会规定了党和人民在战争年代的政治和经济任务。加强对苏军的物质援助，大力发展经济，巩固国防，这些都是全会的基本内容。

此外，全会还作出了“关于利用蒙古人民共和国当地资源和发展日用品生产”的重大决议。并根据这一决议制定一系列具体措施，如大力增加牲畜头数和尽可能增多剪集和收购毛类的数量，同时，还必须在工业、主要是日用品工业的发展上取得进展，以改变过去依靠苏联进口的局面。

全会的精神是：“一切服从于苏德战场的利益。”

全会次定：“在中央和地方都设立专门负责组织援助苏联人民工作的委员会。

从战争开始到 1943 年 4 月，即战争后的 21 个月内，蒙古共发出了 8 趟列车的粮食和服装，共值 25385391 图格里克，还运去了 6 万多包私人赠给苏军战士的礼物。

德军在斯大林格勒附近被围歼以后，一度被德国占领的苏联领土开始获得解放，支援解放地区居民的运动在外蒙也开展起来。这时，外蒙人民捐献了几百万图格里克和四万多头牲畜作为支援在战争中受难苏联公民的基金。

在蒙古，用人民募集的资金购买器材和技术兵器献给苏军的增援形式也具有很大规模。

1942 年 1 月 16 日蒙古小呼拉尔第 25 次会议的决议中写道：“为了表达蒙古人民的意愿，小呼拉尔第 25 次会议决定……购买坦克建立一支以‘革命蒙古’命名的坦克纵队，作为礼物献给英勇的苏联红军……”

会议决定公布以后，筹集“革命蒙古”坦克纵队资金的活动立即“开展”起来。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作了宣传。

42 年 2 月 10 日，外贸银行收到了大宗款项。

中央省一位名叫恰德里巴尔的医生捐款了 34000 图格里克，这笔钱超过了他一年的工资。她还把一批心爱的马匹赠给苏联红军。

哈勒欣河战役参加者曾德将自己的几乎全部财产 100 头绵羊和 40 匹骏马献作坦克纵队建设基金。

“革命蒙古”坦克纵队终于建立起来了。53 辆坦克被运往莫斯科外州的纳罗弗明斯克区。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红旗坦克第 112 旅于 1942 年 12 月底开往该地接收。

1943 年 1 月 22 日，乔巴山，布麻曾德率蒙古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抵达该地，正式移交这批坦克。

曾经历过莫斯科会战的红旗坦克第 112 旅在接收了“革命蒙古”坦克纵队后，都参加了库尔斯克会战，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规定的任务，因此，1943 年 10 月 30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将该旅改称为近卫红旗坦克第 544 旅。以后，又曾参加过基辅争夺战、科尔松——舍夫钦科夫斯基战役、解放乌克兰和波兰战役，战争最后阶段还参加了攻克柏林之战，威名远扬，其战旗上级饰着 8 枚苏联和蒙古的战斗勋章。旅长古萨科夫斯基两度荣获苏联英雄称号。

蒙古党政代表刚从苏联回国后不久，又召开了 36 次小呼拉尔会议。决定：

1. 用蒙古人民筹集的资金充分保证独立红旗“革命蒙古”坦克旅的全部被服和粮食供给，直到对德战争结束。

2. 在全国募集资金购买飞机建立“蒙古牧民”航空大队，作为献给英勇红军的

礼物。

3. 今后将继续赠送红军战士礼物，作为支援前线基金用……

1943 年 7 月，蒙古拨给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 200 万图格里克。并用“募集”的资金购买了飞机，组建了“蒙古牧民”航空大队。

1943 年 9 月 25 日，在斯摩棱斯克州维亚佐瓦亚车站附近的野战机场上将飞机移交给苏联歼击航空兵第 322 师近卫第 2 团。

这个航空大队后来也一直打到柏林，立下赫赫战功。

整个战争期间，蒙古对苏联的这种固定的支援关系从未中断过。

三、外蒙骑兵援苏联

当日本关东军在外蒙古东部的哈勒欣河向外蒙古军队进行挑衅时，苏联红军在朱可夫将军指挥下旗开得胜。而当苏联西部边境遭到德国军队的疯狂进攻时，外蒙古首领觉得他们应该回报苏联而奔赴前线。

布麻曾德在小呼拉尔会议上向蒙古人民提出倡议：“在 1921 年，当我们蒙古人民军遭到恩琴匪军的袭击时，是苏联红军帮助了我们；在 1939 年，当日本军国主义妄图从东部边疆进攻我们的时候，又是英雄的苏联红军帮助了我们，使我们免受满洲人的亡国命运。而现在，当德国法西斯向我们的盟友苏联发动大规模武装侵略的时候，我们蒙古人该怎么办？”

“支援苏联红军，打倒法西斯德国！”

“组织志愿军，奔赴前线！”

会场上大呼大喊大叫不绝于耳。

布麻曾德见此情景，他高声说：

“好！现在我宣布！我们蒙古人民革命军决定组建‘蒙古骑兵团’，奔赴苏德战场，帮助苏联人民保卫祖国！”

会场上响起了一片掌声。

当布麻曾德这位二十年前冲锋陷阵的老骑兵团团长，向乔巴山汇报小呼拉尔会议的情景时，乔巴山听后说：

“是啊，反对希特勒是正义的行为，谁也阻挡不了！虽然我们的兵力也很有限，但为了正义的事业，我们可以组建两个骑兵团，奔赴苏德战场！具体的事务由你去

安排吧！”

布麻曾德走出乔巴山的办公室，刚走了几步，忽然在见一个十分健壮的青年军官。他叫丹纳多济，出生在蒙古西部的科布多省。自幼家境贫寒，今年刚满二十六岁，是在蒙古革命以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将领，他是小呼拉尔大会的代表，今天上午开会的时候，就是他建议派军奔赴前线的。

丹纳多济曾在苏联伊尔库茨克军官学校读书，对苏联和共产党有特殊的感情，在 1939 年的反日战役中，身先士卒，屡立战功，被提拔为人民革命军某团团长，是蒙古人民革命军最年轻的团长。

这时，他拦住布麻曾德，说：

“布麻曾德主席，请答应我一个请求，如果我们组建骑兵团，一定要让我参加，好吗？”

“你才结婚几天，就这么急着要上前线，家里怎么办？”布麻曾德关心地问。

“不怕，家里是我个人的事，可抗击法西斯是民族国家的事，我怎能因小失大呢，我不去，真感到不舒服。主席，还是答应我的请求吧！”丹纳多济十分恳切地请求道。

“那好，你先回去跟新娘子说一声，如果她同意你去，你就去；她不让你去，你就得乖乖地在家里呆着，”布麻曾德半开玩笑地说。

“是！我这就回去请示！”丹纳多济高兴地敬了一个礼，转身跑回家去了。

对于妻子，他是很有办法对付的。

第二天，布麻曾德召开大会，商议有关组建骑兵团的事。丹纳多济也在场，他已说服了妻子。

“现在，我宣布，我们决定组建两个骑兵团，共一万人，配备精良的马刀和冲锋枪，于 1942 年 2 月开赴苏德战场，支援苏联的卫国战争！”

他扫视了一下全场，目光停留在丹纳多济身上，继续宣布：

“蒙古人民军骑兵团第一团团长，由丹纳多济同志担任！第二团团长由阿尔拜格同志担任！”

丹纳多济和阿尔拜格同时站起，立正，向布麻曾德行军礼，然后说：“是！”

他们俩是校友，都毕业于苏联伊尔库茨克军官学校。不过阿尔拜格比丹纳多济高三级，年龄大五岁。

现在，这两位由苏联培养出来的青年军官，接受了远征德国的任务，都深感责任之重大。

1942年2月1日，蒙古骑兵团一万人乘坐一列专用列车向东欧平原驰去。

这是蒙古军队首次到欧洲参战。

四、马背上的英雄

外蒙古两个骑兵团来到苏联军事参谋部听候调遣，被放在朱可夫大将手下，这使丹纳多济十分高兴。

早在1939年哈勒欣河战役中，他就曾接受过朱可夫的指挥，他对这位传奇的大将充满崇拜之情。

当丹纳多济和阿尔拜格率骑兵团到达莫斯科的时候，莫斯科保卫战正打得难解难分。

希特勒用了他最精锐的部队和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攻打莫斯科。而苏联红军在斯大林元帅领导下，利用天时、地利、人和，在大雪覆盖的冬天，积极作好战备，组织力量，不惜一切代价要坚守莫斯科，坚守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心脏。

两军对垒，已僵持一个多月了。

朱可夫大将接见了丹纳多济和阿尔拜格。

“丹纳多济上校，我们在跟日本人作战的时候合作得很愉快，不是吗？你带领的骑兵小分队，在日本的后方神出鬼没，让他们分不清我方究竟有多少人马。结果我们一发动进攻，他们不是伤亡，就是逃跑！”

朱可夫大将一边说、一边笑。虽然现在苏军处于劣势，可他充满必胜信心和乐观情绪。

丹纳多济用敬佩的目光望着朱可夫大将，然后说：

“你们帮助我们打退了日本的进攻，保卫了蒙古几百万人民免受亡国奴的命运、现在我们来为苏联尽一分菲薄之力，请把我们派到最重要的地方去吧！”

朱可夫看了这位年轻的骑兵团长一眼，赞许地说：

“有志气！我们正需要你这样的好青年。别看现在法西斯很猖狂，但我们已经打掉了他的锐气，他们正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希特勒日子也不好过呢。我们正准备集中最大的兵力，围歼这些法西斯军队。你们来得正是时候，”

“那么，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丹纳多济迫不及待地问朱可夫。

“关于你们的作战任务，将由科涅夫上将具体安排，他是苏联西方面军的总司令，也是莫斯科保卫战的直接指挥官。”朱可夫一边说，一边把丹纳多济和阿尔拜格介绍给坐在旁边一言不发的科涅夫上将，

“你们过来看。自去年5月22日德军入侵我国领土以来，他们已经占领了我国大片的国土。从列宁格勒到基辅，从基辅到斯大林格勒，都被德军包围或占领。现在，希特勒决心在莫斯科实施‘台风’计划，妄图一举拿下莫斯科，他调集了76个师、2个混成旅、7000辆坦克、几万门大炮，还有2300架飞机，对我军发起进攻。”

说到这里，科涅夫上将冷峻的脸忽然露出一丝嘲讽的冷笑。

“敌人来势凶猛，但我们已在第一阶段阻挡住了他们的进攻，使希特勒‘闪电’计划彻底破产，而且，自去年12月起，我们已发动了小规模的反攻，今年，我们要组织大规模的反攻，敌军虽有180万军队，但经过一个寒冬，早已不堪一击。我们的任务是围困这些敌人，消灭他们。”

丹纳多济听得十分专心，并将之记录在一个小本上。

“鉴于你们的骑兵团机动、灵活的特点，你们的作战方针是绕过敌人最猛烈的炮火和坦克的阵地，从侧面插入敌人后方，使他们的步兵背部受敌，我们再从正面发起猛攻。”

科涅夫上将说完话，才收起他冷峻的神色，亲切地说：

“怎么样？小伙子，还有什么问题吗？”

丹纳多济坚定地回答说：

“没有问题了，上将，我们保证能配合主力，完成这次反攻任务！”

反攻的日子终于来到了。丹纳多济率领蒙古勇士们，就如猛虎下山，骑着强悍的骏马，踏着厚厚的积雪，绕过了德国的坦克和炮火，从侧面夹击德军后路。他们个个手拿着马刀，有的端着冲锋枪，冲向敌军。

德军背部受敌，也不知是什么“天降神兵”，四处躲藏，很多人被马踏在地上，如烂泥一样。

丹纳多济一马当先，以一当十，冲在队伍的最前头。

到4月20日莫斯科会战结束，丹纳多济出色地完成了十余次冲锋任务，科涅夫上将高兴地称他为“马背上的英雄”

法西斯德国在莫斯科附近的失败，是德军在二战中的第一次惨败，苏军粉碎了法西斯宣传所吹嘘的希特勒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从此，德军由防御转入反攻，从而使战争形势得到了扭转。

外蒙古独立内幕（8） 第七章 强权政治下的悲剧

第一节 在雅尔塔阴暗的角落

1. 雅尔塔三国联盟，阿尔戈英雄聚会

在古希腊的传说中有一个悲壮的故事。

希腊英雄伊阿来受叔父珀利阿斯之怂恿，前往科尔喀斯的埃厄忒斯国，夺取神物——金羊毛。

珀利阿斯是希腊国王，他担心伊阿来谋夺他的王位，便希望伊阿来死于这次冒险。

伊阿来却以神圣的诺言答应了。他邀请了几乎所有著名的英雄，参加这英勇的壮举。

在咱利愈山下，希腊最优秀的造船者在雅典娜的指导下，用在海水里不会腐朽的木料造成希腊第一艘华丽而巨大的船，这就是“阿尔戈”航海号。

“阿尔戈”外的英雄们历经千辛万苦，九死一生，终于在埃厄忒斯国王的小女儿——美丽多情的美狄亚的援助下，夺取了金羊毛。

当伊阿来携金羊毛和美狄亚归国的时候，却受到了珀利阿斯国王的驱逐，无家可归。

故事中的科尔喀斯，就是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

在公元 1945 年的 2 月 3 日，又有一艘现代“阿尔戈”号载着世界上最著名的人物——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来到了雅尔塔。

仅仅在半个月之前，罗斯福冒着刺骨的寒风，举行了美国历史上时间最短、也最为阴沉的总统就职仪式。

没有游行，也没有举行豪华的舞会。总统既不戴帽子，也不穿大衣。

宣督时间不到五分钟。

他期待着在雅尔塔即将同斯大林、丘吉尔的重大会晤：

“正如埃默森所说的那样：‘只有当朋友，才能交朋友’。”在宣督中，他这样说。

当他和丘吉尔到达雅尔塔的时候，看到的到处都是遭受破坏和蹂躏的遗迹。

大约在一年前，苏联红军把纳粹分子赶出克里米亚半岛，所有这儿的别墅被洗劫一空，大部分房屋被预先安置的炸弹炸毁。

除了断壁残垣之外，雅尔塔几乎一无所有，连一些最简单的住宅也未能幸免。

年高七十的温斯顿·丘吉尔看起来重精神。眼睛上方宽阔的前额皱着，一条深纹从鼻子笔直地向上延伸，由于前额的重量似乎紧压双目，两片薄嘴唇噘在一起，在额顶有两绺头发弯弯曲曲，给人以一种印象，好象他的头发比实际上要浓密些。

当他再度见到罗斯福总统时，他半开玩笑半抱怨地说：

“如果把有可能举行高级国际会议的地点都编进一台计算机的程序里，然后指示计算机选择一个最糟糕的地点，它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雅尔塔。”

罗斯福宽容地笑了，说实话，尽管在乘坐“昆西”号巡洋舰前往马耳他的途中得到了充分的休息。到马耳他后又换乘专机“圣牛”号飞至雅尔塔，但这次旅行对他来说，的确也算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选择在这样一个地方举行决定世界命运的“三巨头”会议，实在是斯大林一意孤行之过。

丘吉尔和英国代表团的主要成员被安顿在一幢很大的别墅里，这幢别墅是在十九世纪时由一个英国建筑师为俄国亲王沃隆佐夫建造的，亲王曾一度出任过驻圣詹姆斯朝廷的帝国大使。

为了抵抗流行的斑疹伤寒、虱子和臭虫，首相带去了大量的威士忌酒。

罗斯福总统下榻在利瓦吉亚宫，由于条件简陋，16位美军陆军上校只能挤在一间卧室里，而且整幢别墅只有一个洗澡间。

1945年2月4日。星期日。天气晴朗。

罗斯福总统眺望窗外，看到了雪山连绵、大海观日的动人景象，和风从窗外吹进来，软绵绵的，略带咸味。总统十分快活，因此特地换了一身铁灰色新西服，系了一条鲜艳的领带。

下午四点，传报斯大林元帅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已经从莫斯科乘专列来到了他设在科列兹别墅的司令部。自从上次飞往德黑兰在空中伤了耳朵之后，斯大林再也不愿乘飞机了。

罗斯福在设有护墙板的舒适的书屋里接待了斯大林，向东道主为客人所作的种种舒适和方便表示感谢，接着又谈到在这里所看到的破坏情形。

斯大林说：“同乌克兰相比，这里简直算不了什么。因为在这里德国人受到侧面包抄，没有时间实行原定的破坏计划，而在乌克兰，德国人却以虐待狂式的心计和方法破坏一切。”

罗斯福转开了话题。他笑着说：“在途中，我与我的随从多次打赌：是苏联人先进柏林呢，还是美国人先进马尼拉呢？斯大林元帅，您看结果会怎样？”

斯大林笑了起来，他说：“我认为那些把赌注压在马尼拉的会赢。”

下午五点。移往大舞厅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议。这是一个具有古典风格的房间，沿墙竖着科林斯式的壁柱，高高的天花板上有豪华的装饰，房间两侧是法国式大拱形窗，因此它看上去象一个大凉廊，镶木地板有几英亩面积，在房间一端，壁炉的前面摆着一张铺了白桌布的大圆桌。

丘吉尔从沃隆古夫别墅来了，身穿英国军服，头戴苏联人赠送的黑色熊皮大帽，所有的英国人都在骚痒，心绪极为不佳。

“我早就告诉过你，这地方尽是臭虫。”首相悄悄地对总统说。

“我这儿倒没有，”总统轻松地说：“我这儿的小伙子们已喷了三次药了。”

斯大林提议由罗斯福担任会议主席。罗斯福答应了。

他说：“能主持本次会议开幕，对我是极大的荣幸，首先我想对给予我的殷勤接待表示感谢。同时，为了会议的保密性，我提议这次会议将以密码命名。”

丘吉尔沉思了一会，说：“依我看，就叫‘阿尔戈’航海号吧！”

罗斯福笑着说：“您和我都是‘阿尔戈’的直系后裔啊！”

2. 旧宫殿忽起暗潮 三巨头私署密约

会议在争吵、妥协的不断交替中已进入第五天。

这天下午，罗斯福总统正靠在轮椅上休息。他的健康状况是越来越糟糕了，尽管在会场上他总是显得那么激昂。他是如此的疲惫不堪，以至于他自己也怀疑会不

会突然倒下，永远地离开他的祖国和人民。

门被推开了，侍卫进来报告：斯大林元帅来访。

“请他进来，”罗斯福一边吩咐，一边披上人们所熟悉的斗篷，褶纹清晰可见。

斯大林情绪高昂，大踏步进门，他的后面跟着他那年轻的翻译巴甫洛夫。

两位巨人相互寒暄了一阵，斯大林用那双严峻而又不太老实的黄眼睛注视着罗斯福老态龙钟的身体，转入了正题。

罗斯福早就知道这位共产主义“沙皇”要说什么。果然，斯大林用简练而沉着的口气说：

“总统先生，您是否清楚去年底我与哈里曼大使的谈话内容？当时我向他阐述了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

那是 1944 年 12 月 14 日，哈里曼大使遵循罗斯福的指示，问斯大林，苏联在这方面有何要求。斯大林走到隔壁房间，拿出一幅地图。

他说：“千岛群岛和库页岛南部应归还苏联，日本人现在控制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人口，我们认为苏联人有权保卫通往这一重要海港的交通线，而通往太平洋的出口目前都在敌人手里，或被敌人卡断了。”

斯大林又拿起一支铅笔，在包括旅顺港和大连在内的辽东半岛南部画了一个圈，说：“苏联希望再次租借这些港口及其周围地区。”

哈里曼说：“我记得罗斯福总统和您曾在德黑兰讨论过这个问题。如果我记得不错，总统所设想的是一个国际自由港。”

斯大林说：“这可以讨论。此外，我希望租借中东铁路。”

哈里曼问：“您最关心的那四条铁路呢？”

斯大林回答，“从大连到哈尔滨，再向西北到满洲里，向东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不过，我绝无意干涉中国对满洲的主权。”

哈里曼自然明白：随着对铁路管理的控制，以及苏联军队的护路，苏联的影响毫无疑问将会很大。

但他没有点明，他在等待着斯大林进一步的要求，而且，没有总统的指令，他是无权擅发议论的。

斯大林顿了顿，又提出了在德黑兰没有谈到的问题：“另外，我希望承认外蒙

古的现状——保持蒙古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

这一点虽出意外，但哈里曼并不吃惊，许多年来，苏联一直希望保卫他们西伯利亚南部漫长的边界。

关于这次谈话，罗斯福是清楚的，于是他说：

“是的，我已收到了哈里曼大使的报告，我觉得，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在战争结束时归还苏联，无论如何是不会有困难的。”

斯大林又问：“那么，关于苏联在远东的不冻港呢？”

罗斯福坐在轮椅上的身子转动了一下，语气颇为模棱两可：

“元帅。您还记得我们在德黑兰的谈话吧？当时我曾建议给苏联使用南满铁路终点的不冻港——大概是辽东半岛的大连吧？不过，很遗憾，我一直没有机会同蒋介石元帅讨论此事，因此，在这里我不能代中国人讲话，”

罗斯福这种含糊的回答，显然不能使斯大林感到满意，他说：

“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得到满足，我和莫洛托夫就难于向苏联人民解释，为什么要参加对日作战呢？当然，这些条件能得到满足后，人民就会理解这是涉及国家的利益，而且非常容易将这项决定向最高苏维埃解释。”

罗斯福让步了，他说：“苏联要获得这个港口的使用权有两个方法：第一，租借；第二，使之成为某种形式的国际自由港。”

斯大林看出了罗斯福对于苏联对日作战的愿望之迫切，便又提出了其他的几项要求。

他说：“另外，关于外蒙古长久自治和苏联使用满洲铁路的问题，大概是应该给予允许吧。”

罗斯福显然中了斯大林的圈套，欲拔不能了，在考虑远东的所有问题时，他最关心的根本问题就是美国对日作战计划，当时，先后在硫磺岛和冲绳岛的牺牲惨重的作战正要发动，而在 1945 年秋季大举入侵日本本土岛屿的计划也正在制订。罗斯福的失策是他高估了日本的反抗实力，他认为，没有苏联参战，太平洋战争因此会延长，美国将要付出惊人的伤亡代价。

他承认：“去东京的路途，遥远艰巨。德国的失败，并不意味日本的屈膝，相反的，我们要准备在太平洋上付出惊人的代价。”

善于利用机会的斯大林，焉能轻易放过这天赐良机？

罗斯福一退再退，他说：“外蒙古永久自治，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至于苏联使用满洲铁路，虽然我未曾同蒋介石元帅商谈，但有两种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一，通过租借，由苏联直接经营管理；第二，置于由一个中国人和一个苏联人组成的委员会管理之下。”

罗斯福停顿了一会，又接着说：“我还没有同蒋介石元帅会谈；我觉得同中国人讲话的困难之一是：同他们讲的任何事情，不出二十四小时，全世界都会知道。”

斯大林深有同感：“是的，中国人的确让人不放心，我认为现在还没有必要同中国人去讲，我担保苏联最高苏维埃会保密的。”

罗斯福也作了担保：“除在座各位外，我保证不向其他任何一个人提起此事。”

斯大林又说：“关于中国人方面，宋子文预期在4月底要访问莫斯科。我认为，当能够从西线腾出一些苏联部队、调二十五个师到远东的时候，就可以同蒋介石谈这些问题了。”

罗斯福说，“一旦苏联部队完成这种转移，我特派遣一个美国官员取道莫斯科，前往重庆，把这些条件通告蒋介石元帅。”

斯大林坚持这些条件必须以书面形式写下而且必须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

罗斯福表示：“这可以办到。”

两天之后，下午2时。哈里曼大使应莫洛托夫邀请，拜访了苏联代表住处——科里阿斯宫。莫洛托夫把斯大林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的英文译本交给哈里曼。

哈里曼看了文件之后，指出：他认为总统必将提出以下几项修正意见：旅顺口和大连应是自由港，满洲铁路应由中苏联合委员会共同经营，而且所有这些协议必须得到中国人的同意。

回到利瓦吉亚宫，哈里曼即取得罗斯福对他所提出的修改意见的同意。

下尔4时。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及随从人员在大舞厅举行第七次全体大会。休息时，斯大林向哈里曼解释，他心目中的协定有待进一步的修改。

哈里曼：“总统正在这儿，您何不趁机直接向他提出呢？”

斯大林转向罗斯福走去。他对总统说：

“总统先生，您的修改意见的确更为合适，我同意满洲铁路由中苏委员会共同经营，也非常愿意使大连港成为国际自由港，但是旅顺港的情形有所不同，我已计划好把它作为苏联海军基地，因而需要租用，您看如何？”

罗斯福考虑了一下，终于答应了，但他又补充道：“不过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取得蒋介石元帅的同意，在此之前，我不愿对这种与中国有利害关系的事作出最后处理。”

斯大林说：“那理当如此。但蒋介石也应该同意外蒙古维持现状。”

总统又问：“您是否愿意在宋子文抵达莫斯科时，与他商谈这此事项呢？”

斯大林回答道：“我作为当事的一方，还是由您向蒋介石提出为妥。”

总统接着提出：“考虑到保密问题，这件事应该什么时候同蒋介石讨论？”

斯大林说：“我会通知您的。”

总统说：“那好，我等您的信，届时我将派人去重庆，送给赫尔利大使一件指令。”

这时，丘吉尔打断了讨论，他对此事一无所知，便问斯大林：

“您决定对日作战，对远东有什么要求？”

斯大林也不详述，只是说：“我需要有一个象旅顺口那样的海军基地。”

丘吉尔笑了，他说：“我们将欢迎苏联船只出现在太平洋，我们也赞成苏联在日俄战争中的损失得到补偿。”

2月10日晚。罗斯福寝宫，哈里曼把刚刚与莫洛托夫草拟的协定递呈罗斯福，罗斯福阅后，拿起笔签上了他的大名。

他知道这份协定对他意味着什么，但苏联终于同意对日宣战，他的心血总算没有白费，至于中国，他想，蒋介石尽管有损失，但对于有助于维护他的政权生存的一项协定，有什么理由反对呢？这时的罗斯福有一种顽固的思想：战后的世界：还不是美苏两国说了算吗？

2月14日。这个秘密协定又放在了丘吉尔的办公桌上。“对于远东的事，少管为佳！”他想到，于是拿起笔，在末端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协定

1945年2月11日于雅尔塔

苏美英三国领袖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二十月或三十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为：

- 1、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
- 2、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权益须予恢复，即：

甲、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

乙、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

丙、对旅顺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3、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

经谅解，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铁路的协定尚须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根据斯大林元帅的提议，美国总统将采取步骤以取得该项同意。

三强领袖同意，苏联此项要求须在击败日本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

苏联本身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俾以其武力协助中国达成自日本枷锁下解放中国之目的。

J. 斯大林

富兰克林·D·罗斯福

温斯顿·B·丘吉尔

3. 凡尔赛幽灵未散，蒋介石触目愁肠

密约签署之后，罗斯福虽则极端保密、甚至连对副总统杜鲁门都未曾透露，可是。“好象签有密约”的情报则自各方向传到中国。

蒋介石早有预感、凡尔赛会议的幽灵时时缠绕着他。凡尔赛的悲剧难道真的会重演吗？

“今日见罗、邱、斯黑海会议第一次公报，一如所预料，其果与英、俄协以牺牲我乎？（2月8日日记）

“俄国对我交涉迁延，中共态度转劣，当受三国会议之影响也，但余毫不动心，无论其态度好坏，必待罗斯福之来报，详悉其内容而后再定方针，此时不必臆测，可不必焦灼也。”（2月10日日记上周反省录）

蒋介石首先过目的。是驻英、苏两国大使顾维钧、傅秉常的密电报告。

“阅傅大使秉常来电，以美驻俄大使通知其罗、斯谈话大意，俄斯之对华方针到此完全明了，其中尚有难言之内容，未能明以告我者，证明顾大使之言，俄国对东北与旅大特权恢复之要求，当非虚传也，国势之危已极，不知何日有济？”（2月21日日记）

直到6月15日，中国才接到由赫尔利大使正式递交的雅尔塔协定有关中国问题的副本，就是说，在雅尔塔会议闭会四个月之后，蒋介石才基本上了解了三巨头在雅尔塔的所作所为，作为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盟国，被列为“四大国”之一的中国。在以它的主权和利益为对象的讨论中，却被排斥在外，协定产生之后，又不被马上告知，苦苦隐瞒，实在是无视中国的主权和尊严。

在全面了解雅尔塔协定并指清美国的意图之前，蒋介石无法公开表态。在雅尔

塔、斯大林曾告诉罗期福说，宋子文可以在4月下旬访问苏联，2月底，苏联驻迪化和重庆的代表告诉蒋经国，苏联欢迎中国提出的扩大中苏合作的建议，包括双边安全条约和发展新疆经济，在4月份的旧金山联合国会议上，莫洛托夫发表演说，再次邀请中国派代表团赴莫斯科会谈。

随着雅尔塔协定内容的逐渐明朗、蒋介石作出了外交答复。他制订了两种战略：一方面，他试图离间苏美关系，并把美国拉入满洲以阻止苏联的行动，用中国的一句成语说，叫做“狐假虎威”——聪明的狐狸利用猛虎的威风吓唬人，如果这一着能引起美国怀疑苏联，或者苏联怀疑美国，就算大功告成了。但是，苏美紧张状态加剧，可能会逼着苏联铤而走险，支持中共并赖在满洲不走，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美国就会不惜一切压制重庆以安抚苏联。第二种战略是，作出明智的让步以赢得苏联的支持。最重大的让步之一是中国同意苏联的国际一体化方针，莫斯科显然很希望维持战后苏联边界的稳定状态，并且希望，当苏美关系紧张时，中国不介入美国的任何反苏行为。

30年代末苏日关系紧张时，蒋介石于1937年与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向苏联保证不参与反共产国际协定；现在，1945年，蒋介石则打算通过宣布不参与任何美国倡导的反苏协定，来换得苏联同样的态度，即不采取任何对中国的敌对行为。

6月1日，苏联新大使阿波隆·彼得罗夫抵达重庆，受到中国舆论界人士的热烈欢迎。这些人是主张改善中苏关系的。彼得罗夫到达重庆的第二天，蒋介石接见了 him 并正式提议中苏会谈。6月3日，蒋介石与彼得罗夫会谈时，表示欢迎苏联参加抗日战争，并敦促苏联对中国采取明智和富有远见的态度，以确立真正的中苏友好合作的基础。他告诉彼得罗夫，如果苏联帮助中国恢复了满洲，中国愿意为苏联提供满洲铁路和商业港口的使用权，并“联合使用”满洲的海空军基地。

6月12日，蒋介石再次召见彼得罗夫，彼得罗夫提出了中苏订立友好条约的五项先决条件，即根据雅尔塔协定精神提出的，包括旅顺大连、满铁铁路、蒙古人民共和国、南萨哈林群岛和库页岛问题。他声称，如果蒋介石同意这五项条件，苏联将准备开始与中国谈判，签订友好条约，

6月15日，赫尔利终于送来了雅尔塔协定的全部条款，同时还有一份杜鲁门总统托交的备忘录副本，该备忘录是斯大林5月28日对霍普金斯作出的附加保证，根据这一备忘录，斯大林同意全力以赴支持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统一，并希望蒋介石的领导一直持续到战后，斯大林还同意了中国对新疆和满洲所作的声明，支持中国在满洲重建行政机构。

蒋介石当天就向赫尔利大使提出了三项建议：第一，美英加入中苏之间的任何协定；第二，四强联合使用旅顺；第三，四国一起而不只是中国同苏联讨论南萨哈林和库页岛的移交问题。

赫尔利走后，蒋介石通知彼得罗夫说，他得到了“美国提出的条件”，美国将作为调停人参加苏中谈判。

蒋介石试图通过美国在谈判中的作用来节制苏联，然而，美国又一次让他失望了。6月22日，赫尔利代表美国政府表示，美国不打算参与使用旅顺海军基地。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美国表示完全同意苏联的要求。

蒋介石实行的离间计破产了。

6月26日，蒋介石再次召见彼得罗夫。简要提出了四天后宋子文赴莫斯科会谈的立场，他说：

“美国认为这一备忘录上的问题都已在黑海（雅尔塔）会议上讨论过，前总统罗斯福同意，现总统杜鲁门也赞成。我本人认为，涉及中苏关系的问题、应由中苏两国直接讨论，与美国是否同意毫不相干。”

蒋介石的这个声明。实际是一把不太锋利的双刃剑：一方面，它提醒斯大林，中国不会自动接受苏美作出的决定，尽管中国的要求对于苏联和美国既定条约无能为力，在谈判前还是要表明态度；另一方面，蒋介石暗示，在将来苏美发生冲突时，中国准备保持中立。

然而，蒋介石还是谨慎地试探美国的反应，宋子文在抵达莫斯科后不久，就请赫尔利转告杜鲁门，他将把中苏谈判情况随时通知美国。

第二节 斯大林：“不得到外蒙古，我就不甘心”

1. 斯大林翻云覆雨，宋子文忍气吞声

1945年6月30日，中国代表团乘坐美国飞机抵达莫斯科，在机场受到了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一些高级将领和全体外交人员的欢迎。中方主要成员有宋子文外长、王士杰、蒋经国、傅秉常等。

当天下午，宋子文会见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彼得罗夫。在与斯大林初步讨论时，宋子文表示，中国愿意恢复20年代初的那种中苏合作关系，他认为，苏联的充分理解和同情对中国来说是十分必要的，没有这种理解和同情，中国就难以建设国家。

斯大林致欢迎词，他指出，现在苏联领导人与沙俄时期有天壤之别，那时沙俄的目的是勾结日本反对中国，而现在，苏联的目的是联合中国遏制日本。

翌日晚上8点，斯大林和中国外长开始正式谈判。由于斯大林的习惯，谈判时间都定在晚上。

斯大林一开始就盛气凌人，搬出了雅尔塔远东协定的副本，指着上面罗斯福、丘吉尔和他本人的签名，粗暴地让宋子文看清楚。

宋子文也不示弱，拿出了5月28日斯大林与霍普金斯会谈的备忘录副本交给斯大林，并特别强调指出，这份备忘录是杜鲁门亲自交给中国政府的。

接着，双方就一系列问题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和主张。

在旅顺问题上，斯大林作了一个小小的让步。当宋子文提到这一问题时。斯大林说：

“为了满足蒋主席的愿望和要求，我们准备用‘联合使用’代替‘租借’一词，我不愿开创有损中国的先例。”

斯大林早就知道蒋介石极力反对“租借”旅顺，也知道蒋介石反对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对旅顺问题上的声明，便一直把“租借”旅顺当作一张有用的“小牌”，可以随时抛出，随后就利用这一“重大让步”，迫使中国在外蒙古问题上投桃报李。

在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中国应该是一个独立而完整的政治实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中国可能会出现或长或短的分裂，但是经过一段时期之后，就必然会或者应该重新统一而成为唯一的、伟大的“中国”。在中国古代，那些把“中国领土”交给“野蛮人”统治的当权者仍被后代当作卖国贼而唾骂。

在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自13世纪元朝建立后，外蒙就一直是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蒋介石如果同意把这么大的“中国领土”变成一个独立的蒙古，将会大大削弱他作为中国民族领袖的威望。

而且，外蒙问题涉及的远不只是民族主义象征，它还与未来中苏边界力量的长期均衡有直接和现实的关系。外蒙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如果它受反苏维埃国家（比如日本、美国或即将强大的中国）控制，将对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大动脉构成严重威胁；相反，如果控制在苏联手中，苏联红军就能轻易对北平实行有效的打击，并能扼住南满的脖颈。

蒋介石和斯大林都意识到这一点。蒋介石的目标是，在名义上长期维持中国对外蒙古的宗主国影响，等中国强大以后，再进行控制，而斯大林的目的恰恰是阻止出现这种局面。

6月26日，蒋介石在重庆接见彼得罗夫时，已表明了对外蒙的态度，他认为，外蒙“现状”是，中国对外蒙仍保留宗主权。这一点苏联在1924年的中苏条约中已经承认。但是，中国政府愿意继续允许外蒙保持高度自治、包括军事、外交领域的自治。蒋介石认为，外蒙问题和西藏问题也有联系，中国在外蒙问题上向苏联让步，就会使英国对西藏提出同样的要求。所以最好先不要提外蒙问题，如果不得不提，中国愿意正式宣布外蒙为高度自治地区，但中国仍保留宗主权。这种解决方案意味着：蒋介石政府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

7月2日，在第二次会谈中，斯大林明确表示，苏联根本无法接受蒋介石对外蒙的立场。他告诉宋子文，蒙古人民不想再受中国的统治，而希望独立，而且，外蒙已经正式宣布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并已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进行行政管理和从事外交活

动，中国必须承认这一事实，必须维持现状。

斯大林不同意蒋介石对于“现状”的解释，他认为，莫洛托夫参与了雅尔塔协定的起草，有关外蒙问题的条款在圆括中写上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一条，这表明，“现状”是包括承认这个国家的独立存在的。

他蛮横地说：“协定的创立者难道不知道协定的内容吗？”

斯大林还列举了很多理由，指出苏联的国家安全要求中国承认外蒙的独立，他指着远东地图解释说：

“一旦敌国以外蒙进攻西伯利亚，比如日本就曾打算这么做，那么苏联的远东地区将陷于严重的孤立状态。现在中苏结盟了，并将共同使用旅顺海军基地，这也只能在今后的二三十年里保持西伯利亚，再往后就难以预料了，而一个独立的、与苏联结盟的外蒙，将会保证苏联的长期安全。”

宋子文向斯大林保证，中国不反对苏联军队进驻外蒙，也愿意保证外蒙的高度自治，只不过希望斯大林改改主意。

斯大林态度强硬地说：“中国除了承认外蒙独立，此外别无选择。”

他还威胁宋子文道：“中国是否承认外蒙独立，关系着苏联在满洲和中共问题上是否接受中国的要求。”

谈判陷入僵局，宋子文开始等待蒋介石的指示。并把哈里曼的主张转告了蒋。哈里曼认为，罗斯福已不能再进一步考虑这一问题了，假如他还健在的话，他也会从国内政治的角度考虑，阻止中国否认外蒙独立。第二天，宋子文向蒋介石请示，如果斯大林再提出这一要求，是否中断谈判。

蒋介石决定实行个人外交，他命令蒋经国代表他个人会晤斯大林。

蒋经国当时只是三青团干部学校的教育长，他与当时中央政府的政务特别是外交，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何以能肩负外交特派员的使命呢？其一，蒋经国长期在苏联留学，熟悉苏联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情况，谈判时可助宋子文一臂之力，同时可兼任外交翻译；其二，他是蒋介石的私人代表，派他去，是对斯大林的一种信任和亲善。必要时，可以“个人资格”去见斯大林。蒋介石要儿子私下会晤斯大林，盘算比之“国府”代表，更见功夫，更有成效。其三，蒋经国和苏联有“联姻”之亲，斯大林对蒋门有“外公”之情。据说，斯大林很关心蒋经国夫人蒋方良和爱伦（蒋孝文）的情况，他曾送给爱伦一支俄国的旧式步枪，说：“我祝愿你们在我们苏联生的孩子好好成长，将来能和你一样成为一个大有作为的战士。我送给他一支步枪作纪念，这是我们红军战士打击德国侵略者用过的枪，是致胜的武器，希望他以后紧紧掌握决胜的武器。”

蒋经国受父命去见斯大林，他对斯大林申诉道：

“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七年抗战，就是为了把失土收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尚未收回，一切土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将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去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种情形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同意外蒙古归并给苏联。”

外交一向以实力作后盾，空泛的言词，所谓据理力争，都与事无补，蒋经国的这番话，并没有改变斯大林对外蒙问题的态度，他直截了当地告诉蒋经国：“今天并不是我要求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2. 警告频施蒋公为难，忍辱陈词宋氏让步

7月5日，蒋介石收到宋子文来电后，在重庆召开了党政要员会议，讨论莫斯科会谈事宜。一些官员主张，完全拒绝斯大对外蒙的要求。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苏联对满洲和新疆问题的保证不可忽视，同时，不制订一个限制性条约，苏联红军不仅可以占领满洲、新疆和内蒙，还有可能侵入华北。经过反复讨论，会议决定：接受斯大林的要求。

在当晚的日记中，蒋介石表示他对当天作出的决定承担责任。他写道：如果拒绝了斯大林在外蒙的要求，就不可能达成协议，以保证满洲和新疆的领土及行政主权，也不能解决中共问题。而且，这样一来，外蒙古长期被苏军占领，中国的声明只是“徒有虚名”。因此他认为，为了“追求形式”而去冒“国家蒙难”之险，不能算是明智之举。

第二天，蒋介石召见赫尔利，请他立即转告杜鲁门，总统，中国准备在外蒙问题上，对苏联作出“最大限度的让步”。同时，电告宋子文：

“（一）外蒙独立问题，须待我国国内真正统一，领土主权真正无缺，行政真正完整，始能考虑。

（二）苏俄如能保证东三省领土主权完整，不支持中共之割据，不鼓励新疆之叛乱。

（三）中国政府愿自动提出外蒙独立议案经外蒙投票许其独立，但此议案在抗日胜利后，始能办理。

（四）大连应为自由港，旅顺应作中苏共用军港，铁路干线应由中苏共管，但管理权仍在中国。

与此同时，宋子文仍在作各方努力。他请哈里曼打电报给华盛顿，要求弄清美国对外蒙“现状”一词的确切解释，并告诉他说，从中国的角度看，斯大林在外蒙问题上的要求超出了雅尔塔协定的范围。

杜鲁门拒绝了中国寻求美国介入的意图。

他指示哈里曼说，在任何与莫斯科会谈有关的雅尔塔条款上，美国都不干预。这实际上等于“非正式地”告诉宋子文，美国拒绝讨论在雅尔塔会议提出的“现状”一词，也就是表示，美国同意维持外蒙现有的“法律”地位。

7月7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作出一项新指示，实际上是用在外蒙的重大让步换取苏联减少对东北的要求。蒋介石在电文中说，为了得到苏联在东北、新疆和中共问题上的保证，中国愿意考虑外蒙的独立，斯大林应无条件地同意尊重中国在东北的主权，即，接受中国对大连的管理权，对旅顺的行政管理权，以及“共同经营”而不是“共同管理”满洲铁路。至于新疆。全部“失地”必须变归中央政府控制。在中共问题上，延安必须完全服从中央政府的军事和行政命令，国民议会开会时，经政府认可，共产党可以派一些代表参加，但绝不是成立“联合政府”。蒋介石说，如果这些条件得到满足，那么他将“自动解决”外蒙问题。他提出，战后将举行公民投票，如果投票结果支持独立，将请国民议会承认，如果国民议会赞成了，政府将批准外蒙独立。

尽管蒋介石这一电报7月7日晚11时已到了宋子文手里，就是说在第三次会议开会之前。但宋子文仍想再作一次尝试，劝说斯大林不要割去外蒙。作为外长，他没有在中国放弃外蒙的声明上签字。

他向斯大林解释说：尽管中国原来的立场是在中苏协定中不涉及外蒙问题，但既然苏联反复强调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中国愿意予以考虑并在条约中予以解决。根据雅尔塔协定，中国准备“维持”并“同意”现状。而这一现状包括承认苏联在外蒙驻扎军队的现状及苏联在受到威胁时向外蒙增派军队的权利。中国还准备让外蒙高度自治，包括与苏联签订军事条约。

宋子文小心地避开了使用“承认”外蒙现状这个词。斯大林却打断他的话问：

“那么，外蒙是否仍是中国的一部分呢？”

宋子文没作直接回答，他请斯大林“面对现实”，对中国政府不能“承认”外蒙给予理解：

“中国不能承认外蒙独立的原因很简单，生存是自然法则的第一要素，任何时候割让外蒙的中国统治机构都不可能继续存在下去……我们现在的政府也一样；如果承认外蒙独立，政府将自身难保，甚至中国最极端的自由分子也反对承认外蒙独立。”

但斯大林仍未动摇：“我们不能对此让步，中国现在不反对苏联在外蒙驻军，但是二三十年之后呢？在中国边界驻军可不同于在一些小国。”

在这个问题上，会议没能达成任何协议。下面是会谈结束时宋子文和斯大林的一段对话：

宋子文：斯大林大元帅已坦率地讲了他本人的意见，我对他的远见表示钦佩，

但我们也面临着现在与未来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与生存息息相关。因此，我们提出了关于外蒙的现实性建议。

斯大林：但这一建议并不现实。

宋子文：在我国政府看来，这是最现实的。

斯大林：但我们不一同意。

宋子文：我是奉命行事的。

斯大林：不得到外蒙古，我就是不甘心。

宋子文：很遗憾，阁下不能理解我们的立场，在中国看来，这一立场是极其现实的。

斯大林：很遗憾，阁下不能理解我们的立场。到此为止吧。

中苏第四次会谈开始于7月9日时，宋子文显然已从与莫洛托夫的讨论中看出，苏联对外蒙问题的立场未作改变。于是在会议一开始，他就声明：中国准备作出重大让步。他说：“从1931年起，日本就一直在强迫中国承认满洲独立，但徒劳无益。中国也一直拒绝苏联要求外蒙独立，因为承认外蒙独立，将伤害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还会少使中国政府出现危机。但是现在中国政府愿以最大之牺牲与诚意，寻求中苏关系根本之解决，扫除今后一切可能之纠纷，藉获两国彻底之合作，以完成孙中山先生在日与苏联合作之遗志，愿于击败日本之后，允许外蒙独立，并拟采用公民投票方式通过后公布之，外蒙区域宜以中国旧疆界地图为准。

既然中国在外蒙这一关键问题上作了让步，斯大林也打算在其他一些重大问题上作出承诺。当宋子文提出苏联如何帮助平定新疆叛乱时，斯大林打趣道：“我将派苏联红军进驻新疆，您意下加何？”

宋子文连忙摆手拒绝道：“不、不！请您制止从苏联往新疆运送武器，也许这样更合适。”

接着，宋子文又问：“斯大林元帅，假如苏联红军进了东北，仍将承认中国在东北的主权吗？”

斯大林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已经说过，我愿意根据你们的要求发表任何声明。我们承认中国在满洲有全部主权。”

宋子文吁了一口气，虽说失去外蒙古，愧对委员长和国人，但争得东北和新疆的主权，也算是一种心理补偿了。当然，委员们所最关心的是中共问题，对此，他不能不对委员长有个满意的交待。

然而，斯大林的态度却很含糊：

“我们没有支持也不打算支持中共。我们承认中国只有一个政府。如果中国还有其他政府，或是自封的政府，这当然得由中国自己解决。”

一时间，室内寂静无声。宋子文觉得十分压抑，而斯大林则不住地抽着烟，一根接一根。

全室烟雾腾腾。

宋子文实在忍不住这种气氛，但再次对斯大林欠了欠身，问：

“那么，您个人的看法呢？”

斯大林也似乎有些难以忍受宋子文这种穷追不舍的态度了。他反问道：

“阁下意欲何为？阁下不是已说过希望我们支持蒋主席的政府而不要给中共武器吗？”

宋子文说：“是的。”

“那么阁下还有什么打算呢？难道您希望我们派军队帮助你们消灭共产党武装力量吗？”

“不，我们只希望把中共军队编入政府军之中，并希望苏联对此能尽力。”

“这是合理要求，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一支军队。”

“我们准备让中共参加我们组织的战时内阁和军事委员会，但我们不能容忍他们反对政府。”

斯大林叹了一口气，慢慢地说：“目前的局势确实难以令人满意。”

宋子文所期待的，是斯大林命令中共解除武装，接受国民党的领导，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是受斯大林指令的。

当然，他决意料不到：中共在倔强的毛泽东领导之下，受斯大林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

3、烛残漏滴频鼓枕，密电无补足堪哀

7月13日，因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要赴波茨坦之会，中苏谈判无果而终。

此前一天，宋子文会见哈里曼，介绍了谈判进展情况，并告诉哈里曼，他准备

在最后一次会谈中提出“最大限度的让步”，若不成功，他希望哈里曼向杜鲁门汇报一下这争端。宋子文还请哈里曼转告杜鲁门，“为满足斯大林的要求，我已超出雅尔塔协定范围，同意承认外蒙独立。”他希望杜鲁门在即将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上，能够劝说斯大林改变立场，或者达到一项中苏都能接受的妥协。

在宋子文作了准备工作之后，蒋介石开始亲自行动。7月19日，蒋介石召见彼得罗夫，请他转交给斯大林一封长信，信中回顾了中国在外蒙和满洲问题上的立场，并告诉斯大林，“为满足苏联的要求，我已尽力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最后他说，“既然雅尔塔协定是由美国参与提出的，既然哈里曼代表总统表示美国完全拥护协定，我准备把这封信的内容也通知杜鲁门总统。”

7月20日，蒋介石给杜鲁门发电，转录了给斯大林信件内容，电文末尾说：

“尽管中国没有出席雅尔塔会议，您，尊敬的总统先生，也一定洞悉我们一直在奉行雅尔塔精神，在外蒙问题上我们甚至作了更大让步，为此我们不惜超出了中国人民所能允许的范围。我相信在与斯大林元帅会谈时，您将会劝说他接受我们的合理立场，不再强求不可能的事。等待您的行动和支持。盼复。”

到第一轮会谈结束时，在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上，外蒙问题显然已成为维系蒋介石作为“民族领袖”的威望的关键所在。而来自华盛顿的一个又一个信号表明，美国赞同中国对外蒙“现状”的解释。这种表面的信号促使蒋介石致力于以此投石问路，探询苏联的用意。

杜鲁门在为波茨坦会议准备的文件中，也确实包括提出一项美苏协定，严格限制苏联在满州的活动，并重申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但是，他并没有提出这项建议，因为他的军事顾问们担心，要求达到这一美苏协定，很可能会使苏联推迟对日作战。斯大林在5月份与霍普金斯的会谈中曾说过，苏联红军在远东的作战日期，取决于中国是否接受雅尔塔协定，因此，杜鲁门赴波茨坦时，认为苏联早日参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苏谈判的成功，在波茨坦会议期间，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重申了这一联系。

几天之后，杜鲁门拒绝了蒋介石请求美国调停中苏关系的要求，针对7月20日蒋介石的来电，7月23日，杜鲁门作了冷淡的答复：

“我请你们遵守雅尔塔协定，但并没有让你们作出任何超越协定的让步。如果你们与斯大林元帅之间对如何解释雅尔塔协存有分歧，我建议你们派宋子文重回莫斯科进行谈判，以达成全面谅解。”

蒋介石曾指望杜鲁门在波茨坦会议上提议讨论中苏会谈中的悬案，并特别希望在外蒙问题上得到支持，但杜鲁门的答复根本没有提这些事，而且用的是拒绝的口吻。蒋介石把赌注押在美国对外蒙问题的支持上，输了。

在波茨坦会议上未能赢得美国介入，这导致了宋子文的辞职。杜鲁门回电的第二天，宋子文告诉王士杰，他打算辞去外长职务，希望王接任并继续赴莫斯科进行

谈判。宋子文面临的是签署转让外蒙主权的协定，他担心这会给他的政治前途蒙上阴影，因此，最好的选择是马上辞职。

他巧妙地把那烫手的栗子，留给了王士杰，让后者去扮演现代李鸿章的角色。

第三节 外家骑兵进东北

1. 苏联对日宣战，“皇军之花”仓促应战

8月6日晨，气候闷热，天气晴朗。

在日本广岛上空。两架美军3—29战斗机在盘旋。

8时正，只见一架飞机投下降落伞，随即发出令人目眩的强烈白色闪光。

俄顷，广岛市中央部之上空，发生了大爆炸，整个城市突然卷起烟尘云雾，天空也被暗黑的烟幕所掩，数百根火柱又随即冲天而起。

广岛市一片废墟。

美国的一颗原子弹使世界震惊。使苏联震惊。它摧毁的是日本广岛，但有一半似乎是落在斯大林的心上。

8月8日晚。日本战争指导首长正在期待预定的苏日会谈的结果。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较日本政府预料的为迟，于8月5日始返抵莫斯科。

佐藤大使立即申请会谈，莫洛托夫即指定8月8日夜正式会谈。

与日本大本营的乐观估计相反，苏联的答复，竟然就是宣战。

这样一来，不仅过去几个月的拼命的外交努力，终成泡影，而且却以铁槌代替了答复。

苏联政府声明：自翌日（即8月9日）凌晨零时起，苏联处于对日战争状态。

声明指出：

“在希特勒德国失败与投降后，日本依然是坚持战争的唯一强国。”

“美、英、中三大国今年7月26日关于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已被日本拒绝……”

“苏联对日宣战的依据是：吸取历史教训，保障社会主义祖国远东边界的安全；

切实履行苏联在雅尔塔会议所承担的盟国义务；恢复苏联在早先被日本非法夺占的领土方面的传统权利。

苏联的声明被视为对在日本压迫下呻吟的亚洲各国人民的喜讯而传遍全世界。

“蒙古人民共和国小呼拉尔和政府随即郑重宣布：蒙古将参加同盟国一方对日本进行的神圣战争。蒙古完全同意苏联政府的声明。

宣言指出：“从过去到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始终阻挠着蒙古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独立存在。”

中共军队领导人也致电斯大林：

“我们代表中国人民热烈欢迎苏联政府对日宣战。中国解放区的十亿平民将全力以赴协同红军以及其他盟国军队作战，以击败不共戴天的日本侵略者。”

中华国民委员会蒋介石在8月9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写道：“苏联宣布从今日起对日作战，我全国人民深感欣慰。

谨代表中国政府、人民和军队向您，以及苏联政府、英雄的人民和军队表示真挚的、热烈的敬意。”

苏联远东军共350万，分三个方面军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率领下，已经结集在从蒙古的干旱草原到太平洋海岸这一广大的战场上，等待着冲击的信号。

上百万的红军凝视着漆黑的夜空，不时观看表针……

此刻，东北平原上空，雷电交加、大雨如注，干涸的山地河川和溪谷转瞬间变成了奔腾的洪流，淹没了河谷。

8月9日凌晨0时，伪满洲国首都新京。

日本关东军——“皇军之花”总司令部。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夜的宁静：

“东宁、绥芬河正面遭到苏蒙军队袭击！”

“牡丹江市出现苏军飞机！”

“虎头及五家子我方阵地，遭苏军炮轰！”

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恰恰在前一天去旅顺出席关东神宫的奠基仪式，随即又赴大连，此刻正不在新京。

司令部犹如无头之苍蝇，一片混乱。

总参谋长秦彦三郎召集参谋幕僚商议，并在同伪满洲国总务大臣武部六藏协商后，下令抗击苏军进攻。

接着，他一面火速派人前往大连请回山田乙三，一面又策划召集伪满洲国紧急御前会议，根据大本营指令、决定放弃新京、退守“东方道防线”，并要求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立即迁往临江。

恐慌、焦急的心情袭击了每一个将领。

2. 龙蛇鼓角雄山野，外蒙突骑入东北

外蒙古对日宣战以后，向前线派出了几乎所有的军队。

富有作战经验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元帅乔巴山担任总司令，蒙古人民革命军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泽登巴尔为政治部主任。

在苏联整个卫国战争期间，外蒙古从未置身事外，一直支援苏联的对德战争。

战争一开始，外蒙古就展开了筹集支援苏军基金的捐款运动，提出“一切胁从于苏德战场的利益”的口号。

1941年10月，第一趟支援苏军的列车驶出，其总值达183万图格里克，此外，还有58万7千图格里克现款汇往苏联国家银行。

此后，这一运动很快发展为真正的全民运动，满载御寒服装、粮食和包裹的列车一趟接一趟地从蒙古驶往苏联……

1943年，外蒙古人民军中央委员会，又发动人民，筹集资金购置坦克、飞机，组建了“革命蒙古”坦克纵队和“蒙古牧民”航空大队，为打败德国立下大功。

外蒙古还不断为苏军提供马匹，总数达50多万匹。

在苏联的帮助下，蒙古也加强了军队建设，其坦克部队、机械化部队，炮兵和航空兵有了颇大的增长。

苏蒙的军事合作也十分密切，向苏联提供在外蒙境内驻兵的权利，是合作的形式之一。

战争期间，在外蒙领土上的苏军有第17集团军。德国投降后，苏联又向蒙古派去了其他军团和兵团，组成了后贝加尔方面军。

这是苏联对日战争的主力之一，参战的蒙古军队就加入这一方面军，作为苏军之右翼。

8月9日0时10分，苏蒙联军在漆着红星的歼击机掩护下，借着夜幕，同时在上所有方向上跨过了国境线。

4时30分。苏蒙主力部队开始进攻。他们兵分两路。

一路向多伦方面前进，另一路则自战线右翼末端沿国境线向二连浩特方向推进。

一路之上，尽管大雨倾盆，道路泥泞难行，但各部队的行军速度却异常神速。

担任主要突出任务的军队是诸兵种合成的第17、39、53集团军和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蒙古骑兵机械化集群的任务是在方面军右翼保障主力的行动。

苏蒙骑兵所面对的是日军两个步兵师团、两个步兵旅团和伪满军及德王的近十个骑兵师和步兵师。由于日军第三方面军的主力已撤回新京和沈阳地域，苏蒙骑兵进军阻力较小。

苏蒙联军的行动以蒙古塔姆察克布拉克突击部为中心，各部队向前推进，如同一个中心点发出的无数只简明箭头所形成的扇面。主力从阿尔山筑垒地域旁边通过，向大兴安岭进攻。

蒙古的沙漠和草原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众多的军队。

在方面军的右翼，普利耶夫将军指挥下的苏蒙骑兵机械化集群正越过戈壁滩。

苏蒙士兵并肩向荒漠进军，他们踏着一道道就象火山迸发那样烟尘滚滚的沙丘，越过坎坷不平的荒芜的盐碱地，沿着一望无际的草原向敌军前进。

他们必须穿过五百公里的沙漠，才能达到最近的一条河流。

苏蒙骑兵机械化集群在8月9日消灭了敌人的国境守备队之后，开始成行军纵队快速向前开进。

战役第一天，苏蒙骑兵机械化集群在多伦方向上就推进了五十五公里。

先遣支队到达了那仁宝力格，这个方向上的德王骑兵和日军步兵全部被击溃并放下武器。几乎没有同苏蒙骑兵交锋就向华北退却了。

他们继续推进，主力于8月10日到达了宝尔陶苏木以北二十公里一线。次日，又越过了宝尔陶苏木后面的沙漠，接近了大兴安岭的西南支脉。

3. 天皇胆寒收残局，蒙骑乘胜逼新京

还是在8月9日上午的时候，日本东京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就投降问题展开讨

论。

外相东乡茂德主张：日本战败已成定局，应在保留天皇地位的条件下，立即接受盟国的《波茨坦公告》。

陆相阿南惟几表示反对。他说：

“纵使一亿国民全部战死，也须保持大义，必须继续战斗，对作战要具有充分信心。”

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支持阿南陆相的意见，他说：“对于本土决战，我们已作充分准备，苏蒙参战虽于我不利，但尚未至必须无条件投降之地步！”

双方争论不休，未能作出一致结论。

当天下午 2 时半，铃木首相召集临时内阁会议，争吵了 7 个多小时，仍无法统一意见。

首相进宫面见天皇，请天皇裁决。

当晚 11 时 50 分，皇宫内防空洞的一间办公室，御前会议在天皇主持下召开。

铃木首相提出政府议案：“在上月 26 日发布的三国公告所列举的条件中，不包括要求变更天皇在国法上的地位的谅解下，日本政府将予以接受。”

阿南陆相仍持前议叫嚣道：“纵使茹草啖泥，匍匐山野。只要坚持战斗，相信死地自有活路。”

凌晨一时，首相呈请“圣断”。

天皇发表谈话说：陆、海军统帅部的计划常有错误，失掉了时机。……似此情形，怎能迎击敌军！”

遂决定采纳外相东乡茂德之见接受《波茨坦公告》。

8 月 10 日，日本政府就此决定通告盟国，并附以一项谅解，“上项公告并不包括任何有损天皇为最高统治者权利的要求。”

12 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复函日本政府，称：“自投降之日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力，即须听从盟国最高统帅的命令，日本政府的最终形式将由日本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原来确定。”

然而，顽固的日本并未真正打算放下武器。

在收到贝尔纳斯来函之后，东京电台即播了如下通告：

“皇军和帝国舰队正在履行保卫祖国和天皇陛下的最高命令，在各处均转入反击盟军的积极军事行动。”

与此同时，苏蒙等兵机械化部队在普列耶夫将军的指挥下联合作战，不断发动进攻，击溃了德王的几个骑兵师。

接着，主力部队又向多伦方向发起进攻。

多伦，这个古老的商业城，有着重要的军事价值，它掩护着越过南兴安岭的伸向热河和黄河的通路。

苏蒙骑兵部队穿过三百多公里难行的沙漠后，经过激烈的战斗，终于占领了多伦。

蒙古和苏联军队逾越察哈尔沙漠的神速进攻、骑兵机械化集群向多伦的突击，使日军指挥部在这个方向上组织防御的一切企图归于破灭。

蒙古骑兵机动迅速、善于在各种地形条件下行动。其部队对退却的日军和德王的军队穷追不舍，紧随敌人突入了坚固设防的支撑点和城市。

道尔吉帕杭姆少将、奥憾苏伦、道尔吉和策登达什上校的骑兵在作战中表现得十分骁勇善战。

许多蒙古军人因作战勇敢而获得苏联勋章和奖章。

蒙古和苏联军队在六天的作战中使日本关东军遭受重创，两国军队击溃了十六个筑垒地域内的敌军，后贝加尔方面军推进了二百五十至四百公里，进至多伦、林西、桃安、王爷庙一线。打乱了日军指挥部防满洲的全盘计划。

蒙古骑兵机械化集群攻占了满洲与华北之间的交通线、切断了关东军与侵华军指挥部战略预备队之间的联系。

战役第一阶段结束了。

4. 御前会魍魉末路，关东军寿终正寝

到1945年8月15日，苏蒙军队已击溃日本军掩护梯队，向满洲中心地区快速推进，包围了关东军的主要集团。

日本统治集团陷入慌乱之中。政府内部对是否继续抵抗，观点颇不一致。阿南淮几陆相仍坚持作战。

他给关东军下达训令：

“苏联入侵皇国，不管从怎样掩饰，其侵略和称霸大东亚的野心都昭然若揭，我们只有坚决地把保卫神州的圣战进行到底，”

在关东军遭到彻底失败已很明显的情况下，8月14日上午10时50分，日本最后之御前会议在皇宫防空洞举行。

天皇决定通过电台广播无条件投降诏书。

当天下午，关东军留守人员通过与满洲通讯社的联系，了解到日本即将结束战争的迹象，一位二科的参谋打电话给山田乙三：“东京似乎要作出某种重大决定，务请司令官回新京一趟。”

山田乙三于下午4时乘机返回新京，当晚大本营来了电报：

“明天将有重大广播，务请注重收听。”

8月15日深夜，在收听了日皇的无条件投降的诏书录音之后，关东军总司令部举行了决定其命运的历史性会议。

会议由草地贞吉参谋主持。

大多数将领及幕僚仍顽固主张“作战到底”。

总参谋长春彦三郎声泪俱下，泣不成声：

“我等军人，除了服从天皇陛下的圣命之外，没有忠节之路。不过从不遵从圣命者，将永为乱臣贼子。主张抵抗者，请先斩我头，然后行事。”

顿时。满场雅雀无声，一会儿，传来了一阵低低的啜泣声。

山田乙三作出决定：“本军只能奉戴圣旨，全力以赴结束战争。”

尽管如此，战争仍在持续。

在关东军总司令部下达停止抵抗的命令之前，苏军总参谋部发表特别声明，着重指出：

“1. 日本天皇于8月14日发布的日本投降通告只是一般的无条件投降书。关于军队停止作战的命令尚未下达，因此日军仍在继续抵抗；

2. 鉴于上述情况，苏联远东武装力量将继续实施对日进攻战役。”

8月15日，后贝加尔方面军主力——苏蒙骑兵越过大兴安岭，抵达中满平原。骑兵机械化集群在张家口以北地域实施战斗。

司令员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下令机械化集群于8月17日日终前占领张北、张家口，以部分兵力于8月18日日终前占领丰宁、热河地域。

当天，苏蒙骑兵前进了八十公里，摩托化步兵27旅消灭了日军和德王军队的一些掩护兵力，逼近张北。在张北城下，与敌军交火。

次日晨，向那里调去了炮兵坦克，空军也进入战斗。

激烈的战斗持续约二十小时，日军企图从苏军手中夺回主动权，两次发动反冲击，但均被击退并蒙受惨重损失。

8月16日黄昏，日军停止了抵抗，骑兵机械化集群完全占领了张北。

8月17日和18日，向张家口方向派出的侦察人员查明，敌军在老贝台口、黄花坪地域设有一个筑垒地区。

8月21日，骑兵机械化集群以部分兵力坚决实施冲击，深入筑垒地域后方，占领了通往张家口的公路，但攻占张家口的行动未能成功，不得不退回出发地，转入防御。

骑兵机械化集群多伦集团主力于8月18日到达丰宁，次日到达承德。蒙古人民革命军各骑兵兵团与苏军骑兵第18师相距一日行程，随后跟进。

各骑兵兵团昼夜兼程前进，平均每日达七十公里，六天中推进了四百公里。由于高强度行军，各骑兵兵团的队伍拉得过长，人员和马匹极度疲惫，不得不停止前进，以便稍作整顿并使后勤机关向前靠拢。

正当苏蒙军队在满洲境内粉碎日本占领军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对日军采取了坚决行动。

八路军解放了华北的大部分地区，在张家口、热河地域同苏蒙军队会师。

苏蒙骑兵多伦集团在攻占承德后，进到该城以南长城脚下，各兵团、部队接受日军投降。

——8月17日下午，山田乙三将军向苏联元帅华西列夫斯基建议开始停战谈判，他通知苏军指挥部，他已命令关东军各部立即停止战斗，放下武器。

同一天，一架日机在苏军驻地上空投下了两个通信筒，请求停止作战行动。

华西列夫斯基用无线电报通知关东军司令部：“从8月26日12时起整个战线停止

对苏军的一切战斗行动，缴械投降。一旦日军开始放下武器，苏军立即停止战斗行动。”

8月18日晨，山切乙三通过无线电答复：日军将奉行投降的所有条件。

同日，苏军电台截获发自新京的无线电报，电文说：“1、关东军业已克尽自己的职责，被迫投降。2、各部立即停止军事行动，留守在目前所在地域。3、与苏军直接接触的部队按行军指挥部的指示放下武器。4、严禁任何破坏活动。关东军司令官。”

果然，日军于8月18日开始投降。

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员派了一个特别使团到新京去会见山田乙三。

经过短时间的谈判，山田乙三遂于14时10分在预先准备好的投降书上签了字。

当天晚上，日军总部司令部大楼上降下了日本国旗。

山田乙三和张景惠被迫在无线电广播中对居民发表了讲话宣告投降。

新京日军守备队一万五千人解除武装，苏蒙军队进入新京，卡尔洛夫将军被任命为新京卫戍司令。

到8月22日，满洲的日军主力已停止了有组织的抵抗。

苏军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命令：“凡日军放下武器投降受降的地段，应即停止战斗行动。”

随后，苏蒙武装力量在极短的时间内消灭、受降了百万日本关东军、占领了整个东北。

就这样，这支自日俄战争以来、历经四十载的日本军国之尖兵，终于结束了自己的历史。

似乎象在描绘城市陷落的悲哀似地，关东军司令部的庭院里冒起了黑烟，它是对关东军寿终正寝的一种吊丧吗？

第四节 蒋介石强咽的苦果

1、最后通牒恃威恫吓，新任外长进退两难

1945年8月7日，即美国原子弹在广岛爆炸的第二天，中苏第二轮谈判在莫斯科开始。

新任中国外长王士杰与宋子文不同，他主要关心的不是外蒙问题。而是达成一项协议，以限制苏联在满洲的行动和与中共的联系。

在8月4日的日记中，王士杰写道：没有这样一项协定，就会产生一系列与苏联侵入满洲相连的问题，苏联甚至可能承认中共在满洲建立的政权。

此时美国政府改变了方针，由于原子弹的爆炸，美国对苏联参加远东作战的价值作了重新考虑。

他们认为：苏联的参战已不是迫使日本早日投降的根本因素了。这样一来，允许苏联进驻满洲，代价似乎显得太大了。

美国决定介入中苏谈判。

杜鲁门总统指示哈里曼转告斯大林，美国仍然支持雅尔塔协定，但美国认为，宋子文已经达到了协定的要求，美国希望苏联不要单方面强迫中国再作让步。否则会严重影响美国利益。

哈里曼向斯大林转告了杜鲁门的意见，并坚持根据雅尔塔协定对苏联的权利作出详细解释。

哈里曼认为：罗斯福承认苏联在大连和满洲铁路的“优先权”，仅仅是指保护苏联经满洲铁路到公海的优先权。

斯大林拒不接受，并强调说，雅尔塔协定中的“优先权”是确保证苏联在大连及其港口有行政权，并把该地划入军事区。

会谈期间，事态瞬息万变。8月8日，莫洛托夫就通知王士杰：苏联已对日宣战。

王士杰对苏联的友好行为表示感谢。

8月10日，王士杰从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中获悉：日本已接受《波茨坦公告》，准备无条件投降。

中国代表团立即考虑到日本投降将会对中苏关系产生的一系列影响。如果不迅速达成一项总体协定，一旦苏联红军占领满洲，苏联就会持强硬态度；而且，不签订一项条约、就无从限制苏联对中共的支持，也无法保证苏联最终撤出满洲。

同一天晚上9时，王士杰与斯大林进行第二次会谈。这天晚上，斯大林作出较大让步、取消了苏联通过联合委员会参与大连行政权的要求，并取消了在旅顺选派苏联行政官员的要求。斯大林还同意，在日军投降后三个月之内，苏联开始从满洲撤军。

但在会谈结束时，苏联不允许中国在承认外蒙独立的同时提出边界划分问题。

现在的焦点集中于在承认外蒙独立之后解决阿尔泰地区的争端，并划定新疆和外蒙边界，1911年之前的阿尔泰地区，是外蒙古的一部分，但“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阿尔泰被划归了新疆，20年代的苏联地图都是这么标的。此后，1940年，苏联出版的地图，把阿尔泰地区大约15,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入“蒙古人民共和国”。1944年，在苏联支持下，阿尔泰西部发生叛乱，所有这些事实都使重庆感到担忧，如果不达成一项专门协定明确阿尔泰属于中国，那么，承认外蒙独立就将意味着割出西阿尔泰。斯大林拒绝提供地图证明外蒙边界，更加深了中国的疑虑。

斯大林也怀疑蒋介石以划定外蒙边界为借口，实际上不承认外蒙独立。蒋介石作出这种有附加条件的承认，就能够通过暂不达成边界协定、拒绝批准外蒙问题的公民投票结果等方式，使承认外蒙独立名存实亡。

第二轮会谈开始时，斯大林还表示愿意尊重并考虑王士杰提供的中国地图。但到8月10日第二次会议时，斯大林却断然拒绝划定边界的主张，而坚持说，边界已经十分清楚，近二十年来，外蒙与新疆边界上一直没有发生任何争端，重新划界毫无必要。

斯大林警告说：“如果中国不立即放弃重新划定边界的要求，内蒙古人民将会申请加入外蒙。”

8月12日，蒋介石来电重申，必须在承认外蒙独立之前，重新划定边界，这一指示在中国谈判代表团中引起了争论。大家一致认为，蒋介石的建议是不现实的，再延期下去，形势极其危险。

宋子文、傅秉常、蒋经国都强烈意识到了形势的危急，准备把蒋介石的建议暂搁置一边。

王士杰的理由是：这建议将失去部分公众舆论的支持，并使立法院修改条约面临困境。但至少在外蒙问题上，在达成协议之前还要等待蒋介石的指示。

基于这种考虑，在蒋介石重新作出指令之前，下一步谈判还要推迟。

8月12日夜，王士杰致电蒋介石，建议说，在现有的悬案尤其是在外蒙问题上作出让步是绝对必要的：

“在外蒙问题上，无法按您的指令行事，我们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一致认为，我们必须达成一项中苏协定，如果再拖延，很容易出现意外事故，所以，我们诚恳地请您授权我们在外蒙问题和其它一些悬案上采取应急措施。”

第二天，蒋介石作了简要答复：“在外蒙问题和其它尚未解决的问题上，不需授权只等权宜处置可也。”

这是一个含糊的答复，什么才是“权宜的”适当方式？

仅仅一天前，蒋介石还指示他的代表们坚持划定外蒙边界，8月13日的指令是要改变这一立场吗？

不得而知。

显然，蒋介石是为推脱责任留了后路，万一事后受到舆论谴责，他尽可以说：“我并没有最后允许承认外蒙独立啊！那是王士杰他们的自作主张。”

王士杰与中国代表团仍然左右为难。他们虽然感到与苏联签约刻不容缓，但没有蒋介石的最后批准，都不敢贸然行事。

在这关键的时刻，代表团中的特殊人物——蒋大公子经国出面了。他表示愿承担个人责任，接受斯大林的要求。

8月14日，在斯大林主持下，谈判恢复。中方取消了重新划定外蒙边界的要求，斯大林同意双方交换照会，保证维持现有边界，并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作了让步。

中方外长王士杰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签置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条约要点为：

（一）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当承认外蒙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苏联政府声明苏方将尊重外蒙之政府独立与领土完整。

（二）苏联声明给予中国以道义的、军需的及其他物质上的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给予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

（三）苏联重申中国在东三省之完全主权及领土行政之完整。

（四）苏联声明关于新疆问题，苏方无意干涉中国内政。

（五）关于中东路及南满路问题：中东及南满两路之干线，以中苏共有共营，以三十年为期，期满无偿归还中国，以上铁路纯为商业性质之运输事业，其路警由中国政府组织，不由铁路自办，除中苏两国共同对日作战期间外，该路不运输苏联军队，并同所有与共同经营，应以中东铁路在俄国及中苏管理时期与南满铁路在俄国管理时期，所置之土地及所筑之铁路辅助线，而为该两铁路之直接需要者，以及在上升时期所建置并直接供该两铁路之用之附属事业为限，一切其他铁路支线与附属事业及土地，应归中国政府完全所有。

（六）中国政府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对各国贸易及航运一律开放。中国政府同意依照另订之协定，在该自由港一半码头及仓库租与苏联，租期为三十年，大连之行政权属于中国，港口主任由苏联人员担任。

（七）在中苏旅顺协定有效期间三十年内，旅顺口为中苏共同使用的海军基地。该地区民事行政权属于中国。在该地区设中苏军事委员会，以处理共同使用的有关事项。

（八）苏联进入东北后之行政机构，苏联军队因军事行动之结果，进入中国东

北三省后，有关作战一切事务之最高权力与责任，在作战地带，于作战所需之时内，属于苏联军总司令。中国国民政府派遣代表及助理人员，在业经收复区域内设立行政机构并指挥之，国民政府并派军事代表团驻在苏军总司令部，以资联系。中国政府曾与苏联政府讨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后，其军队由中国领土撤退的问题。斯大林声明自日本投降后，其军队当于三星期后，开始撤退，最多三个月为完成撤退之期。

签字之后，斯大林作了简短演说，再次指出帝俄与苏联的不同：前者是联合日本侵略中国，后者则希望与一个强大的中国协同抗日。

斯大林说，中国现在并不完全相信苏联的态度，但事实的发展将会说明、苏联决不食言。

在当天夜里的会上，斯大林重申，苏联将竭尽全力，帮助中国实现蒋介石领导下的统一。

2. 漫言弧注投壶易，万古澶渊几寇准

中苏友好条约一签订，两国皆大欢喜。

中国外长王世杰表示对此“甚为满意”，并希望“中苏两国政府间应立即办理批准条约和交换照会的工作。”

前外长宋子文告诉哈里曼，他“受到相当大的鼓舞。”

当中国代表团“载誉”回到重庆的时候，国民党大员们弹冠相庆，欢欣鼓舞。

宋美龄电致美国总统杜鲁门，盛赞中苏谈判的这种结果。

孙科声称：苏联保证支持国民党政府和不介入中国内部事务，是对中国统一的“最大贡献”。

是啊，中苏条约虽然出卖了外蒙古，但蒋介石政府却得到了苏联的“友谊”，这不是捡了个“大便宜”吗？

从此，蒋介石受苏美两大国之扶持，何愁共产党不灭呢？历史却无情地嘲笑了他，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并不以他们几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蒋介石告诉赫尔利大使，中苏条约表明：

- （一）苏联方面有意帮助促成中国军队的统一；
- （二）有意支持中国创造一个统一、民主政府的努力；
- （三）苏联有意支持中国国民政府。

他正是由于有了这种虚幻的充实感，才立即接受谋臣策士的建议，大胆地开始

向中共发动政治攻势的。

很难想象，一个被决心以武力消灭异己的国民党如此欣赏的条约，真正会给中国内部问题的解决带来福音，真正会成为远东和平的“基石”。

蒋介石真是昏了头，他哪里料到：在斯大林的手中，一手是盐、一手是氯气，他随时会把氯气变成盐，也会随时把盐变成氯气。

“中苏友好条约，实际上是不折不扣的卖国条约。”国民参政员胡秋原愤怒地指出。

《大公报》和《东方杂志》等有影响的报刊，也对割让外蒙古作了委婉的指责。

作为当事者的外蒙古政府，则极其振奋地欢迎中苏条约的签订。

外蒙古《真理报》在评述中苏两国就蒙古独立问题互致照会一事时写道：

“条约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在同世界人民平等的基础上求得进一步繁荣昌盛开辟了广阔前景……今天，当蒙古人民在本国发展和独立的事业中取得如此巨大成就之际。我们满怀豪情地指出我们多年的、久经考验的朋友苏联在这一事业中的作用和意义。对于苏联的真诚帮助，蒙古人民将永志难忘。”

其亲苏倾向是显而易见的。

3. 雷法章无力回天，发公告百姓哀怨

正当美国策划的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行将结束之际，国民党内政部次长雷法章却乘坐轿车来到重庆机场。

应苏联政府的促请，为履行中苏友好条约之诺言，他奉命离开重庆，飞赴边塞外蒙古观察外蒙古的“全民公决”。

这位虔诚的基督教徒，抱有博爱济众、牺牲奉献精神，淡泊宁静，步入政坛之前，一直从事教育工作，今日当此重担，心情实难平静。

随同前往外蒙的还有国民政府蒙业委员会委员兼处长楚明善等。

外蒙古为办理此次投票，决定由小呼拉尔主席团主持一切筹备和组织工作。

小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布麻曾德宣布：“凡拥有选举权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公民，均得按地方政府制定的投票名单参加全民公决。”

他又任命了一个中央投票委员和一个地方投票委员会，并在各地成立了投票点。

自中苏友好条约签订之后；外蒙独立赫然已成定局。但苏联与外蒙政府对“公民投票”是否获胜仍无确实把握。

根据乔巴山和布麻曾德的指令，每一个列入投票名单的公民，在投票那天必须亲自到指定的投票地点，向主持投票的人员讲述自己赞成或反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的意见。

不仅如此、他们还违反一般民主国家秘密投票的原则。要求投票者在“赞成”或“反对”的意见下签上自己的姓名，以便使反对外蒙独立的人，不敢投反对票。

雷法章对此方案表示不满：

“全民公决，不应用口头的赞成和反对之方式，更不应该让表决者签上姓名，这是一种变相的独裁和恐吓！”

但乔巴山集团对此置之不理，依然我行我素。

投票从10月10日开始，至10月20日结束。全蒙古召开了13000次集会。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牧民和工人参加了集会，还有176000多名妇女举行了3178次妇女群众集会。

经过投票，组织全民投票的中央投票委员会共收到483291票，其余还有10783人因种种原因不在投票地区，未能表决。

结果是：全数赞成独立，无一反对。

这真是天大的讽刺！

雷法章沮丧地回到重庆，向蒋介石递呈了外蒙古“全民公决”的情况记录。蒋介石虽有不满，但也只能认命了。

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正式公告外蒙古独立。其文说：“外蒙古人民于民国34年10月20日举行公民投票，中央曾派内政部次长雷法章前往观察，近据外蒙古主持投票事务人员之报告，公民投票结果，已证实外蒙古人民赞成独立，兹照国防最高委员会之审议，决定承认外蒙古之独立，陈由行政院转饬内政部将此项决议正式通知外蒙古政府外，特此公告。”

此文一公布，国人大哗，不久：中国公开披露了《雅尔塔协议》，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在连续几个月里，学生不断游行，报刊大量登载文章，谴责政府屈从于大国的压力，出卖领土和国家主权。

美国著名学者埃米莉·扬说：“雅尔塔协定的披露，使中国“举国上下，乱成

一团。”

“雅尔塔协定的披露，唤醒了中国民众的高度爱国热情，也激起了人们对秘密外交的强烈愤慨。尽管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官员极力辩解，人们还是认为，以承认外蒙独立为代价，确实太高了。”

国民党右派利用这一爱国热情，对温和派发动了强烈攻击。他们不仅攻击参加签订的王士杰本人，也攻击蒋介石和王士杰制订的对苏温和政策，说他们企图以向苏联让步来达到解决中共问题的目的。

右派们反对一切政治手段，主张用武力解决国内统一问题。

国内反对雅尔塔协定的呼声，也使蒋介石确信，人们需要的是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而不是民主，因此他无须再考虑迅速推进广泛的民主改革了。

但是，埃米莉·扬认为：

“雅尔塔协定的最坏影响，就是使国民党政府在中国民众面前丧失了荣誉。尽管我们不能夸大雅尔塔协定对中国国内政治的全面影响……，但是不可否认，中国的政治浪潮由合作迅速转为冲突，与雅尔塔协定的披露紧密相关。”

毋庸讳言，在抗战时期的蒋介石外交政策是有巨大成就的，他确保了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大力支持。同时又成功地将苏联势力逐出新疆，尽管此举曾使中苏关系一度急剧降温，但蒋介石还是继续得到了斯大林在下列问题上的承诺与许可：将东北和台湾归还中国，中国跻身世界四强和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列。

但是，雅尔塔协定使 1945 年中苏友好条约及承认外蒙古公决结果使他的成就黯然失色。由于在苏美压力下承认了外蒙独立。并且给予苏联在东北以特殊地位和权益，这样，经过多年全民浴血奋战之后，蒋介石却将自己钉在新的耻辱柱上。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不便于直接利用这些协定攻击蒋介石，因为协定与苏联有关。

客观地说，中共是间接的受益者，因为这一系列的事件，在多数国民心目中都形成了一个印象——即在处理中国内政外交方面，国民党政府开不能胜任。

4、蒙政府饱尝白眼，蒋总统状告苏联

外蒙古政府接到中央政府承认外蒙独立的公告后，于 2 月间特派畜牧部长齐米得·多尔新·苏伦扎巴前来重庆报聘观光。

苏伦扎巴率随员八人，于 2 月 6 日飞抵北平，7 月飞抵重庆。13 日外交部以换文方式与外蒙古建立两国邦交，并商讨交换使节及勘定中蒙详细边界线诸问题。17 日苏伦扎巴等离开重庆，仍经北平飞返库伦。

苏伦札巴回蒙后，苏蒙之间又于2月27日签订《友好互助条约》，内容与1936年的《友好互助条件》相同：在两国受到侵略威胁时，双方立即进行协商，以采取为保障它们安全所需的一切措施；如果一方遭到侵略时，另一方立即给予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一切援助。

同年8月间，“蒙古人民共和国”申请加入联合国，未经安全理事会通过。

联合国代理秘书长索到列夫曾致电“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写道：

“库伦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钧鉴：安全理事会籍审并委员会于7月31日开始工作，并训令本人电请贵部长措派可在纽约于该会开会时备供关于贵国申请加入联合国若干情报之咨询之贵国政府代表，即希查照惠复，并通知该代表之姓名为荷。”

又发电文说：“兹应入会资格审查委员会主席之请求通知贵部长，在审查‘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之申请时，若干会员提出问题，入会资格委员会请贵部长对于下列问题惠予供给参考资料。以便利该委员会草拟报告：（一）蒙古对外关系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目前范围如何？（二）关于蒙古政府发展对外关系，尤其对于交换使领之态度如何？（三）、除中苏外，迄今尚有何国家曾向蒙古政府提议建立外交关系及曾如何答复，此外并希望对于（甲）、外蒙之宪法及其政治组织与外交处理情况；（乙）、外蒙预算尤其对国际事务之分配额两点，供给该委员会详细之情报。此类问题之询问，并不会表示该委员会对于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申请之意见，即希查迅予惠复为荷。”

关于此事，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徐淑希曾于8月6日发表声明：

“蒙古人民共和国在数月之前，尚为中国之一部分，称为外蒙古。其独立乃由中国所赋予，职是之故，中国将为欢迎其加入联合国之一国家，吾人固竭诚期望其加入此国际机构。然中国代表团认为对于该问题之考虑，延迟一年左右似属必要。迄今为止，除苏联而外，外蒙古并未与任何国家交换使节。此项事实，或足表示其尚未准备就绪，俾成为国际社会之一员。无论如何，由于疏忽之故，渠并未使联合国诸会员国获得对其深切了解之机会。举世或倍外蒙古爱好和平，将接受宪章所规定之义务，然世人同时有权获知渠是否可能履行此等义务，后者系一事实问题，不能予以假定。

中国于适当之时间到来时，将以全力支持外蒙古要求入会申请。”

中国之立场，获得美、英、埃及、澳大利亚之支持，均希望获得外蒙古更多的情报。

只有苏联代表竭力赞成其希望。要求该会对外蒙古之申请迅速采取行动。

孤掌难鸣，苏联的要求未获通过，事情便搁置一旁。

1946年10月19日，乔巴山致电王世杰外长，要求派代表一员加入远东委员会。

“中华民国外交部部长、外长会议委员王世杰先生阁下，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要求外长会议允许将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一员加入远东委员会。该委员会之设立，系依照莫斯科外长会议之决议……因此申请外长会议允许蒙古人民共和国派代表参加远东委员会。我们认为有提请外长会议注意以下事实之必要。……所有以上各节，使蒙古人民共和国坚信外长会议对于蒙古人民对于联合国所作之贡献，必予考虑。……”

王世杰接电未予答复，其他会员国也接到类似电报，同样未予置议。

1949年9月，蒋介石政府以苏联违反中苏友好条约及联合国宪章为由，向联合国第四届大会提出控苏案。罪状有：延不撤退其在东北的军队，掠夺东北大量物资；吞并外蒙领土唐努乌梁海；支持中国共产党。

1952年2月2日联合国大会表决通过，“……兹判定苏联自日本投降以来，在中国之关系上，未能履行1945年8月14日之中苏友好条约。”

控苏案通过后，联合国虽未采取行动以制裁苏联，但台湾当局主张自动废止该项条约，以打击苏联暴行，舆论界也纷纷响应。

1953年2月25日，台湾立法院通过议案，经蒋介石明令，终于废止中苏条约及其附件，原令如下：

查上项条约及其附件。由于苏联背信弃约，应属无效，着即废止；并保留我国及人民于灭苏联违反该约及其附件所受之损害向苏联提出要求之权。此令，”

中苏条约既已废止，关于外蒙独立的公告当然失效了。

因此，在台湾政府的中华民国版图上，外蒙古仍然是中国的一部分。

外蒙古独立内幕（9）第八章 毛泽东：最后的努力

第一节 愤怒与强硬的毛泽东

一、初访莫斯科

1949年12月16日，莫斯科一片雪白，连续刮了好几天的西伯利亚寒风终于有所收敛，但吹在人脸上的仍如刀割般的疼痛，街上的行人几乎全副“武装”起来——脚上的长统皮靴，身上的皮毛大衣，脖子上的围巾，加上头上的皮帽，将整个身体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两只眼睛探路，嘴里呵出的白气还来不及升腾就凝结在嘴边，使人难以开口讲话。太阳这时终于露出了冻得红彤彤的脸庞，但仍蜷缩着身子，抖

个不停。

然而，莫斯科火车站上热闹非凡的气氛却冲淡了这份严寒。彩旗招展，人声鼎沸。车站的月台旁，排列着除斯大林（按惯例他是从不迎送客人的）以外的几乎全部的苏联党政军领导人，仪仗队，象是在恭迎什么人。

“呜——”。汽笛一声长鸣，一列专车徐徐驶进站来，稳稳地停靠在月台旁。

“当、当、当”，十二点报时的钟声呼应着汽笛声在克里姆林宫响起，雄浑、宏亮、经久不息地在莫斯科上空回荡。据苏方有关人士披露，这是苏联政府有意将专列到达的时间定为十二点，以使这位尊贵的客人一下车就听见克里姆林宫的钟声。

这时，一位身材魁梧，身穿中山装的中年人，步履稳健地走下车厢。莫洛托夫·米高扬，布尔加宁，维辛斯基，罗申等苏联领导人赶忙步上前去，同他紧紧地握手，早已等候在这里的人们立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成立仅两个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毛泽东就在这雷鸣般的掌声中开始了他的苏联之行。这是他一生中首次踏出国门，也是他在国外待的时间最长的一次。他的这次访问与刚刚成立的人民共和国的命运休戚相关。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同时也将为世界瞩目。他的脚步是沉重的，但却很稳健。踩得地上的雪“吱、吱”直叫……。

莫托洛夫担心毛泽东不适应莫斯科的严寒气候，关照把欢迎仪式予以简化，尽量缩短在车站停留的时间，把照例要进行的同欢迎行列的握手程序全都免了。毛泽东只检阅了一下仪仗队，发表了一个早已准备好的简短演说：

“我这次能有机会访问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首都，是一生中最愉快的事情。中苏两个大国人民之间是有着深厚友谊的，我衷心希望这次访问能加深这种友谊并获得成功。”

欢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一行来到莫斯科西南郊 27 公里外的一个原斯大林别墅下塌。这是斯大林在卫国战争期间的住所。这个地方无论是生活设施还是安全设施，在苏联都是最高水平的。同时在莫斯科市内，又为毛泽东安排了另一处住所。

在会见斯大林之前，毛泽东一直在揣测着这位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人物对他，以及对他和他的同志们缔造的新中国的态度。他深知他和斯大林在过去的好多问题上存在分歧，将来也会如此，斯大林最不喜欢，甚至还有些嫉恨跟他“唱反调”的人，而敢和他“唱反调”的也没有几人。毛泽东偏偏便是其中的一个……

二、往事不堪回首

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即在 1935 年 1 月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取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当时中共政治局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络中断了。当长征结束，到达陕西省北部时，毛泽东与共产国际关于和反法西斯资产阶级建立抗日

统一战线的新路线分庭抗礼有一年之久。直到 1936 年年中，毛泽东才终于接受了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指示，但在对待 1936 年 6 月西南军阀反对蒋介石，以及同年 12 月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拘禁蒋介石等问题上，毛泽东仍与斯大林意见相左。这样，当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时，共产国际领导人（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王明）已有充分理由将毛泽东看作是叛逆的共产主义者，因为他拒不服从国际工人运动的“铁的纪律”。斯大林称毛泽东是“麦淇淋式的马克思主义者，（“麦淇淋”是代黄油，不是真正的黄油。）。

共产国际内部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冲突，实际上是斯大林与毛泽东两个人之间的冲突。由于毛泽东试图使中共实现共产国际指导下的独立自主，他与斯大林之间的矛盾加剧了。但是毛泽东很清楚，他自己目前在党内权力并不稳固，同时，中国要最终完成革命变革，还必须有苏联的援助，他不能与斯大林翻脸。

1937 年底，王明告别了居住 10 年之久的莫斯科，回到中国，斯大林准备借王明之手把中国革命引向维护苏联的安全。一位史学家认为，“共产国际通过王之手，打着国际主义旗号，压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蒋介石让步、使共产党军队加入国民党军队之中，而且王明总是唯共产国际马首是瞻，不折不扣地贯彻共产国际的政策。”

王明回国不久，就以共产国际的“代表”身份出席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他通过传达共产国际的三项指示，开始插手党内事务。共产国际批评毛泽东不懂马列主义，缺乏国际主义眼光，只根据狭隘的经验确定党的政策。最后，王明又批评了毛泽东对待国民党的“极端”政策。他说国民党是积极抗日的，中国共产党在这一点上应与国民党充分合作。这是消除日本进攻苏联危险的关键。如果中国能坚持长期抗战，日本就不可能进攻苏联，这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极为有利。斯大林的真实意图在王明的观点中得到赤裸裸的体现。

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经历三个半年头之后，1938 年秋才得到共产国际的最后认可，促成苏联这一重大转变有很多原因，但最重要的也许是后来毛泽东战胜了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这样一来，斯大林如果还想对中共保持一定影响的话，就不得不直接与毛泽东打交道了。

但是，斯大林依然想通过中苏联盟与日本抗衡，这就是说，他不可能因支持毛泽东而惹恼蒋介石。斯大林看到，他有可能利用毛泽东在华北创建的游击力量，但这些力量远远不能弥补放弃国民党军队所带来的损失，因为它不能作为抗日盟军。毛泽东也不愿与斯大林决裂，一是因苏联的武器援助，甚至在特定的时候，还希望苏联红军直接出兵抗日，因而他不愿铤而走险。斯大林在认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的领导地位的同时，要求中国共产党仍支持蒋介石国民政府，他试图使蒋介石解除疑虑，大量事实证明，莫斯科继续不断地向延安施加压力，要求中共节制其扩大革命根据地的行动，以便使蒋介石能坚持对日作战。

1940 年 3 月，共产国际驻延安的代表在一次中共会议上发言。要求中国共主党放弃同国民党进行武装斗争的政策、共产国际代表批评中共没有考虑推行武装斗争政策的时间和环境，批评中共正在激发一场与国民党的战争。毛泽东拒绝了这位代表的建议，甚至要求苏联停止对蒋介石的援助。

然而，斯大林的政策是继续稳住国民党，使它坚持对日作战，把日军拖在中国的领土上，以阻止日本和德国联合起来进攻苏联。

1940年12月的一天，斯大林在克姆林宫召见了崔可夫将军。当时崔可夫将军已被指派到重庆担任蒋介石的军事总顾问，他正准备启程，得到斯大林的召见命令后，他匆匆赶往克里姆林宫，同时在脑子中紧张地盘算着斯大林会跟他谈些什么……

斯大林：将军同志，这次派你到中国去担任蒋介石的军事总顾问，你有什么想法吗？

崔可夫：斯大林同志，我明白，这次任务很重，我将努力搞好同蒋介石政府的关系。另外……

斯大林：你要记住，你必须依照我国同蒋介石政府签订的中苏条约严格履行自己的职责，所有对华援助只能给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另外，你要尽最大努力缓和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冲突。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崔可夫：我想……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冲突若激化，对我国的安全也是极为不利的。”

斯大林：（赞同地点了点头）中国的红军同蒋介石的军队一样，热衷于打内战，丝毫不顾这种内战会使中国陷入种种危机。共产党反对蒋介石会驱使蒋介石倒向日本，一旦蒋介石感到他有可能失去政权、他就会走汪精卫投降的老路。蒋介石很容易地就能与日本联合起来对付中国共产党，然后来对付我们。

崔可夫：那，我们对中国共产党应该……？

斯大林：中国共产党主要是一群农民分子，他们当中工人阶级的力量太弱小，不可能领导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他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赢得群众的支持。他们现在的这个非无产阶级化的社会基础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思想上的缺陷。在这些缺陷当中，包括民族主义的倾向和不能充分发展国际主义的意识。

崔可夫：是的。中共领导人的民族主义倾向很浓，他们不可能在这非常之时为了伟大苏联的安全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中共一直谋求推翻蒋介石政府……

斯大林：现在的帝国主义列强不会容许中国共产党推翻蒋介石政权。我们同蒋介石政府也建立了外交关系，苏联不可能向有这种关系的国家输出革命。苏联不能支持中共。你要清楚这一点，只有蒋介石可以领导中国的持久抗战。

崔可夫得到斯大林的指示后，走马上任了。

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在1939年11月11日给胡适大使的一封信中指出，那时苏联对中国国民政府的支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显得非常慷慨大方，”周

希才也说，1936年6月的贸易协定签订之后，尤其是中国国民政府在1939年12月正式批准该项协定之后，“苏联的各种武器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

1940年1月20日，贺耀组给伏罗希洛夫一张订货单，要求从苏联购买8万美元的装备。随后，在3月中旬，贺又要求从苏联购买80万支步枪和960门榴弹炮。4月28日，贺耀组在交给莫洛托夫一封蒋介石给斯大林的信的时候，又交出了一张长长的订单，列出了蒋介石希望购买的各种武器，其中包括200架飞机，1万挺机枪，560挺高射机枪。

然而，斯大林在中国的同志们——中国共产党人却从来没有得到过象蒋介石那样的殊荣，他们有的只是地雷和梭标，国民党蒋介石曾多次利用苏联给的精良武器对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发动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的进攻。

1941年1月9日，国民党军队向在皖南的新四军发起了总攻。

1月13日，军长叶挺与国民党将领上官云相谈判时被扣押。除千余人在黄火青、傅秋涛率领下突围外，其余7000余人被杀或被俘。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1941年1月16日，重庆蒋介石官邸。

一辆深黑色的苏联伏尔加轿车徐徐驶进了蒋公馆大门，车内坐着一个瘦高个子的俄国人，穿着笔挺的将军服，肩上的肩章和胸前的勋章在车内仍熠熠生辉，脸上却露出一幅忧心忡忡的样子，他就是斯大林派给蒋介石的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将军。他刚刚听到“皖南事变”的消息，便匆匆起来，要面见蒋介石。

蒋介石已得到通报，迎候在他居室的门口。他一面忙着同这位穿戴得象一只“金丝雀”似的将军握手问候，一面在脑子里迅速盘算着如何应付这次“兴师问罪”。“苏联对这次事变态度如何？会不会报复或停止对我们的援助呢？”蒋介石对此很担心，他得在今天的会谈中谨慎行事，得探探崔可夫的口气。

蒋介石：崔可夫将军，您在重庆过得还如意吧？

崔可夫：啊，很好！很好！谢谢蒋先生的关心。不过——

蒋介石暗想，“这个家伙这么快就要言归正传了。”忙咳嗽了一声，打断了崔可夫的话。

蒋介石：崔可夫将军，您还是来一杯俄罗斯白酒吧？

站在了旁垂手而立的秘书忙在一只高脚杯中注满了白色液体，放到了崔可夫面前的桌子上。崔可夫端起酒杯，轻轻地抿了一口。

崔可夫：蒋先生，据我方可靠情报，日本将在华中或华北发动新的进攻。不知您是否知道此事？

蒋介石：（微微地笑了笑）我们也已得到情报。这就请求贵国能继续在军事装备上给予我方大力支持。

崔可夫：没问题，没问题、这您放心。不过——

蒋介石又干咳了一声，不过这次他的确“放了心”，便让崔可夫继续说下去。

崔可夫：不过，蒋先生，最近“皖南事变”使我很不安。我国政府对这事付极为关切。你们是否用了我们援助的武器来进攻新四军？

蒋介石：（微微地笑了笑）这个嘛……这只是一个不服从命令的问题，因此，采取严明纪律的措施是完全必要的。新四军若服从军令，这种事件就可以避免。

崔可夫：可是，蒋先生，我认为撤消指挥员的职务并交法庭审判，不是比向其部队进攻更合适吗？我国政府担心，这一事件可能触发一场内战，从而损害中国的抗日战争。

蒋介石：这一事件只不过是维持军纪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将更有利于我国的抗战。这不会牵涉到国共之间的关系，不可以起内战。

崔可夫：那您今后的政策将是……

蒋介石：我们会继续抗战，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崔可夫在得到蒋介石的“不打内战，继续抗日”的诺言后，犹如吃了一颗“定心丸”，情绪一下子由“低谷”转向“高潮”。他开始兴致勃勃地赞扬蒋介石对中国的领导，并且有力地宣称：所有军队都必须服从蒋介石的命令。

为不致使国民党投降日本，斯大林曾要求毛泽东缓和对国民党的政策，这使毛泽东左右为难。一方面，毛泽东不愿意放慢扩大革命力量的步伐，另一方面，他又不便公开说他愿意接受回答莫斯科的问题，来解脱自己的两难处境：扩大中共领导下的革命力量不会促使，相反更能阻止国民党向日本投降。毛泽东同意共产国际关于国民党投降的危险已经增大，应当制止这一危险的说法。但怎样制止呢？毛泽东不同意共产国际的看法，即共产党向国民党让步。对于莫斯科的批评，毛泽东答复说，中国抗日力量的壮大，即中共力量和影响的壮大，只会减少而不会增大国民党投降的危险。

毛泽东解释说，中国共产党应当了解到，虽然国民党投降的危险性已大大增加了，但是，通过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仍然可能避免这一危险。毛泽东说：

“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愈发展，则克服投降的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可能性愈增加，我党在全国的文章就愈好做。如果采相反的估计和策略，以为我愈发展，彼

愈投降，我愈退让，彼愈抗日，……那就是错误的了”。

在三、四十年代，斯大林曾两次严重伤害了毛泽东的民族感情。一是斯大林曾假手新疆军阀盛世才控制新疆。中国西北部的新疆是一个辽阔，矿藏丰富的地方，又与苏联毗邻，因此 30 年代，苏联对中国的兴趣主要集中在新疆，同时，在整个战争时期，它又成为中苏民族利益直接冲突的地区。斯大林一直想把新疆变成苏联的卫星国。如果新疆能象外蒙古一样，处在苏联的保护之下，或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将会黯然失色。不过，为了维持中苏抗日联盟，斯大林承认中国对新疆的正式主权。同时斯大林企图建立苏联在这一地区的政治、军事霸权，同时，还进行经济渗透，在这点上。斯大林获得了巨大成功。当与中国国民政府的抗日合作对莫斯科不那么重要时，如 1940 年苏联与轴心国合作时期，莫斯科就不那么尊重中国在新疆的主权。

1937 年 11 月王明回延安经过迪化（乌鲁木齐）时，盛世才向他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向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作了汇报之后，斯大林对此表示反对。因为斯大林希望削弱中国人在新疆的影响，无论是国民党人还是共产党人。他知道毛泽东的民族主义倾向，而且可能还认识到，迪化与延安关系的加强，意味着在这场漫长的竞争中，将会削弱苏联的影响。斯大林关于新疆的预言似乎一直是：新疆应坚持自治，平衡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与双方都保持良好的接触，同时又使他们鞭长莫及。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人在新疆的影响将削弱到最低限度，而苏联则能保持优势。

1941 年底，当德军向莫斯科挺进时，盛世才感到情况改变了，于是，开始与重庆改善关系。

中国国民政府和盛世才乘苏联忙于应付卫国战争，从各方面向苏联就新疆问题施加压力。中国日益增加的压力产生了效果。1943 年 3 月，莫斯科决定撤离新疆。显然，莫斯科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严峻的军事形势使它不能在新疆问题上与中国轻启战端。

第二便是二次大战期间，苏美等幕前幕后的交易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深深地伤害了毛泽东的民族感情。

1945 年 2 月，苏、美、英三国在雅尔塔会议上背着中国达成了危害中国主权的秘密协定。蒋介石政府为了换取美国的援助和支持，同苏联进行了谈判并达成了协议。

1945 年 8 月，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正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文件。条约规定，“承认外蒙之独立”，“大连为自由港”，中苏“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基地”。

8 月 14 日，当这一消息从莫斯科传到延安时，毛泽东大吃一惊。按照美军驻延安观察小组成员的说法，当中共领导人了解到条约中有关于苏联特权的条款时，他们相当震惊。而 1945 年早些时候，中共领导人曾经告诉约翰·谢伟恩，苏联不会以要求在中国满洲利益和特权，来作为参加远东战争的代价。他们曾经对谢伟恩说：“俄帝国主义的岁月已经结束了”。

毛泽东当时在延安已对中国的国际国内局势作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写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对包括外蒙古在内的民族问题作了分析和总结，阐述了他的民族自由主张。他说：

“共产党人必须积极地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这个政策而奋斗；必须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切联系群众的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并成立维护群众利益的少数民族自己的军队，他们的言语、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应被尊重。”

8月底，莫斯科拒绝了毛泽东提出的苏联援助中共的请求，并且通知他，苏联不会干预中国的内部事务。显而易见，莫斯科的意思并不仅仅是这些。后来，斯大林对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一位领导人说：

“抗日战争以后，我们告诉（中共领导人），我们觉得在中国武装起义的条件没有成熟，他们应当与蒋介石谋求妥协”。

毛泽东本人后来曾这样说过，斯大林在这一关键时刻，试图阻止中国共产党人进行革命：

“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

按照弗拉吉米洛夫的说法，莫斯科试图拉紧套在中共身上的缰绳是以这样一种观点为基础的，即莫斯科认为，毛泽东始终故意推行一种挑衅性的政策，以便在苏联，美国 and 国民党之间制造不和。毛泽东求助于种种“诡计”来诱使苏联和美国开战。弗拉吉米诺夫没有提到苏联难于启齿的问题：抑制中国共产党是斯大林获得在中国的特权而同意的一部分代价。如果中国爆发内战，那么，国民政府和美国是否继续承认这些特权就很成问题。日本投降后，苏联军队占领了满州，仿佛它是被征服的敌国的国土而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视满洲工业为战利品，把许多工厂所有能拆卸的机器设备和器材物资等几乎全搬往苏联。到1950年《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签订后，人们发现鞍山钢铁厂，沈阳兵工厂，小丰满发电厂等地方只是无偿地移交了一些空房子，连日本高级官员家里的钢琴、沙发和好家具等，还有其他大批缴获物资也都被搬运一空。

1948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已成定局，可斯大林仍象二十年前向陈独秀建议的那样，还试图压毛泽东与蒋介石讲和。中共应暂时满足于用中国分成南北两个不同的政权，但是，毛泽东却异常坚决的提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他的言辞象勇往直前的解放军战上的刺刀一样坚硬。人民解放军从绿色群山中突起，于4月份一举攻占了蒋介石的首府——南京。

当斯大林得知毛泽东全面发动攻势的计划时，却把这个计划斥为鲁莽和不现实的。这位世界上最伟大军队的大元帅是看不起游击队的，对共产主义在中国胜利的

可能性深表疑虑，而且对于没有他的批准和超出他的军事力量范围以外的自作主张的革命也是不信任的。他害怕中共的冒险可能引起美国的大规模干涉，从而使美国的军队和苏联的军队在远东造成对峙局面。

斯大林后来承认：

“我们当时认为，中国的农民起义没有发展前途，中国同志应和蒋介石寻求妥协，他们应该参加蒋介石的政府，解散自己的军队。”

国民党政府南迁至广州。美国大使这次没有随蒋一起走，其他主要国家的大使也都留了下来，他们都继续待在南京。但有一例外，那就是苏联驻华大使罗申随蒋去了广州。当华北地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解放了的时候，他们仍依附在国民党这堆白骨上。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革命的胜利使欧亚社会主义国家连成一片，使苏联摆脱了长期被资本主义国家包围和孤立的境地。

毛泽东肯定思考过这样的问题，假如斯大林通过王明和他的“国际派”控制了中共，他将希望中共作些什么呢？毛泽东认为，假如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了，斯大林可能会通过两种方式利用软弱的中共。一是以中共为筹码压蒋介石作出更大的让步；二是将部分或整个中国置于受苏联指挥的软弱的中共控制之下。在此两种情况下，斯大林对华政策的目标和手段与帝国主义列强并无二致。几十年后，当毛泽东得出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可能象垄断帝国主义国家一样搞帝国主义这一结论时，仍然反映出毛泽东早年与斯大林斗争的影响。毛泽东曾认为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是“功大于过”，但毛泽东没有说明的是。斯大林的功劳实际上也是中共与他进行长期斗争的结果。

上述是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严重不和的起因，也是十年以后斯大林的继承者伤脑筋的冲突的先兆。任何轻率表示和行动都会立即引起爆炸。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十分小心而冷静地行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刚一成立，他就率先承认并邀请毛泽东访问苏联。

如果说，斯大林是最后一个承认蒋介石失去大陆的主要领导人的话，他倒是第一个承认毛泽东赢得了大陆的人。

三、顾全大局缔盟约

毛泽东到达莫斯科的当天，略为休息后，下午6时（莫斯科时间），斯大林率领苏共全体政治局要员在克里姆林宫小会客厅会见了毛泽东。

当时，斯大林已进入古稀之年。几十年接连不断的内患外战，消耗了无数精力，使他须发花白，面部皮肤松弛，明显地有些衰老。但仍然表现得踌躇满志，看上去心情舒畅，身体健康，始终维持着他特有的风度和魅力。讲起话来依然是那套老习惯，吐字很慢，用词准确，态度也相当友善和谦和，尤其是对毛泽东，更是相当

地尊重和客气。

斯大林一见到毛泽东，不等介绍就上前紧紧握手，高兴地说：

“想不到你是这么的年轻和健壮！”

斯大林对毛泽东说了许多颂扬的话。

斯大林“你对中国革命，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祝贺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毛泽东：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及我个人向斯大林同志和在座的苏联共产党、苏维埃政府、红军元帅同志问好！感谢你们对我的邀请。

斯大林：你来一趟不容易的，我们可以谈谈，你有什么想法和愿望？

毛泽东：这次来，一是为祝贺你的寿辰；二是来看看伟大的苏联。

谈话的气氛十分热烈。

然而，对这位叱咤风云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的心里却是热情与冷漠交织，歉意与疑虑并存。他永远也不会忘记，在中国革命问题上自己的功过是非。所以他同毛泽东见面不久就说：

“你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

在此之前，即一九四九年七月，刘少奇曾代表中国共产党赴苏联与斯大林商谈建国问题，斯大林当时就向中国同志表示，他们过去不适当地干涉了中国革命，他曾说：

“我们干扰过，妨碍过你们，我为此感到内疚。”

对这些不愉快的往事，双方都心中有数，所以斯大林似乎想以自己的热情和高规格的接待来弥补这一点。

1949年12月21日，斯大林七十寿辰。莫斯科大剧院内隆重举行庆典。毛泽东作为贵宾，在斯大林身旁就座。庆典上共有十三个国家的代表讲话，毛泽东代表中国第一个致辞，受到盛大欢迎。

为庆贺斯大林的七十寿辰，毛泽东呈送了丰厚的礼物。他在国内时了解到苏联缺少新鲜水果和蔬菜，特地提前打电报给山东，请山东准备好最好的大黄芽白菜、大萝卜、大葱、大鸭梨每样5000斤。还准备了江西景德镇青花瓷器一套；湖南湘绣被面30条，枕套60个；江西南丰桔1000斤，冬笋500斤，还有浙江的龙井茶、贵州的茅台酒和上海的名烟等。斯大林对此非常感谢。第二天，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为庆祝

斯大林七十寿辰的盛大宴会。毛泽东的座位在主桌斯大林的旁边。

1949年12月23日至1950年1月20日期间，毛泽东和斯大林会谈三次。

斯大林与毛泽东的会晤和谈话，通常是在莫斯科近郊孔策沃别墅进行的。时间总是在夜里。这是斯大林的工作习惯。

斯大林坐在长桌的顶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照惯例就座。毛泽东的座位紧靠着主人，他们之间是译员。中国同志都坐在自己领袖一侧。桌上总是摆设齐全：每个座位前都有餐具、高脚杯小酒杯，几瓶格鲁吉亚纯葡萄酒、伏特加酒。桌上还有温室培育的新鲜蔬菜。

大大桌子的一头，有一个摆着饭菜的小桌。各人根据自己口味自取食物。有时，斯大林站起来，走到小桌子跟前，取他喜欢吃的东西。他习惯劝人吃某些菜肴：格鲁吉亚式羊肉串、红菜汤、烤羊肉串。

准备的菜并不多，但味道可口，室内没有服务人员，只有一名女侍者端菜热菜，给主人过目，然后送到小桌子上去。酒是自斟，但是都饮得不多，大多数人都是非常礼貌的沾了沾嘴唇。

白兰地酒瓶放在桌子正中，在向斯大林祝酒的时候，把酒瓶转了一圈，由坐在主人对面的贝利亚祝酒。他击掌，用玻璃杯敲桌子，用这种声音来表示最隆重的时刻到来。他用犀利的目光扫了大家一眼，看看是否斟满白兰地，然后站起来，讲了几句祝酒词，劝大家干杯。

斯大林通常饮一两口自己杯中的葡萄酒，这是从两个瓶子倒出的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掺和的，这两瓶酒放在他左边，只供他一人饮用。

话题是五花八门的，没有严格的议程。谈话实际上在斯大林和毛泽东之间进行的，其余人不讲话。但是在闲谈时，在座的人也就军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问题交换看法。

在开始的会谈中斯大林坚持东北由苏联管理或由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共管；苏联租用旅顺、大连港，还有中长铁路。实质上还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能力有怀疑，对国民党存有希望。

毛泽东在会谈中，坚持独立自由的立场，以大量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有力量解放全中国，也有能力管理统一全中国。他说：

“我们对中国任何一块土地都有不容置疑的主权，我们在管理方面不懂的地方可以请苏联老大哥帮助我们，但自主权是绝对不能放弃的。”斯大林勃然大怒，却强压住怒气。

当时，苏南冲突的余波仍在东欧境内肆虐，不少人因被怀疑是“铁托分子”而

被捕，斯大林对毛泽东的疑虑仍未消除。

毛泽东会不会成为东方的“铁托”？

中共让一些无党派人士和民主党派人士参加政府，会不会执行亲英、美政策？

斯大林始终疑虑重重，但他已经从对铁托的错误中接受了教训，他知道不能对毛泽东“动一动小姆指”，更不用说大拇指了。

但情况还是很微妙的。斯大林不得不侦察一下，而且他还不愿意放弃在满洲的战利品。他拖住毛泽东作长时间的不慌不忙的解释，慢慢地讨价还价。

以后的谈判变得吹毛求疵，一味拖延，毫无成果，甚至可以说企图在中国扩大苏俄帝国的势力。

斯大林把毛泽东送到了莫斯科远郊的乡间别野里。接着又让他参观博物馆、喋喋不休地给他讲述俄国的艺术的历史。

随后，斯大林便让毛泽东象通信员似的等候召见。一连好几天，斯大林没有同毛泽东接触，由于斯大林没有命令别人与毛泽东谈话，竟然没有一个俄国人敢去看他。

毛泽东费了很大气力才使苏联人勉强同意举行一次会谈。会谈中，毛泽东提出俄国不久前兼并中国领土的问题，斯大林听了不免又怒形于色。

蒋介石曾与苏联签约，给予苏联在新疆开采矿藏的权力。蒋介石政府承认外蒙为独立国家，而外蒙与中国的内蒙之间没有明确的界线。雅尔塔会议事实上将中国的旅顺港割让给了俄国。

现在，毛泽东说，中国政府拒绝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包括蒋介石签订的和沙俄时期签订的条约。

斯欠林怒不可遏，他想到 19 世纪沙俄从中国夺取的 100 多万平方英里的土地，问道：

“那家伙是不是还想把贝加尔湖要回去？”

谈判陷入僵局。

毛泽东的脾气越来越坏。他凝视着寝室的天花板，用深思熟虑的词句大声地诅咒，希望屋内安装的窃听器能记录下来。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室内的灯光将毛泽东高大的身影映出窗外。只见他在踱来踱去，象是在寻找冲出这使人压抑的，牢笼一般的屋子。

外面的鸡啼声此起彼伏，莫斯科的必外已渐露曙光。

室内已烟雾蒸腾，烟灰缸里的烟蒂已经积放满了。

毛泽东大步定到窗口，用力推开了窗子。顿时，室内的烟雾象是早子被呛得憋足了劲儿似的，从毛泽东的身边挤了出去。

毛泽东贪婪地吸着室外的新鲜空气，他哪紧缩的浓眉渐渐有所舒展。他深沉的目光在搜寻太阳升起的地方，然后深情地盯着那儿，目光之中充满着希望，但还交织着深深的忧虑。

是啊，那儿有他的祖国，有他一手缔造起来的，朝气蓬勃却还很弱的新中国……

毛泽东多么想早日回到他的国家。他曾在那儿纵横驰骋，叱咤风云。可是此刻，此处……

他深深地吐了一口气。

他的使命还没完成。他有些迫不急待，但又必须等待……

毛泽东深知，中国革命是他毕生的使命。为了尽快地改变将近 40 年内残留下的满目疮痍，遍地饥荒的局面；为了拯救亿万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摆脱孤立无援的状况，迫切需要外部的援助。

新中国刚刚成立，政权还不稳固。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帝国主义虎视眈眈……

而他又只有苏联一家朋友。所以尽管他很有些厌恶斯大林，却又不得不采取谦卑的姿态。

对斯大林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他的一笔巨大的意外之财：在冷战的高潮时，他突然得到了一个伟大的盟友。从此后，中国将保护苏联极长的亚洲边界，使他能够在欧洲集中自己的军事力量。中国的新领导者虽然不会完全听命于自己，甚至可能有一天会公然反抗莫斯科，但是他们暂时还要依靠苏联。不仅指望收回满洲的工厂，而且还指望得到苏联在经济，军事和外交上的援助和保护。

斯大林老谋深算，高高在上，盛气凌人。他深知加大毛泽东身上砝码的重量。他不想轻易撤去这些对他来说特别有用的“砝码”。

毛泽东忍辱负重，含而不露……

又一次中苏会谈。

斯大林、莫洛托夫等苏共主要领导人都在座，斯大林委婉地问毛泽东：

“您这次访苏有些什么打算？想办点什么事情？”

其实毛泽东当时已早有主张。但是他却不明白地说出来，只含蓄地用幽默的语言说。

“我想搞点什么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

苏联领导人感到莫明其妙。

后来还是王稼祥打破了这一僵局。他逐渐摸清了毛泽东的意图。苏联过去同国民党政府订立了一个友好条约。现在新中国成立了，苏联应废止那个条约，同人民政府签订一个新的更进一步的同盟条约。

王稼祥对苏联外长维经斯基作了暗示，透露了毛泽东的打算。

斯大林很“乐意”。

斯大林：毛泽东同志，最好由我们两个来联名签署这一新的中苏同盟条约。

毛泽东：斯大林同志，订立条约是政府间的事，应该让我国总理周恩来同志来办。

周恩来当天便得到了毛泽东的指示。

第二节 周恩来与斯大林、赫鲁晓夫的交锋

一、“虎口夺食”

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到达莫斯科。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外交部长维辛斯基、驻华大使罗申及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等到车站迎接。毛泽东也及时从列宁格勒的观光旅游中赶回莫斯科，迎接周恩来总理的到来。

在莫斯科火车站，周恩来就斯大林元帅正确的国际政策和毛泽东主席坚定地与苏联进行结盟的政策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

“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奉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来参加关于巩固中苏两国邦交的会商，以促进两大国之间的友谊团结和世界和平事业。”

1月22日，斯大林在维辛斯基陪同下，会见了周恩来和王稼祥，会谈开始了。

周恩来温文尔雅，风度翩翩。他的报告简洁、翔实，用中俄文两种文字书写。

谈判桌前，他一坐数小时，毫无倦容，能言善辩，而且喝酒海量惊人，令米高扬和维辛斯基相形见绌。

苏联领导人对周恩来的态度也许较少怀有戒心，因为周恩来曾一度在莫斯科享有崇高的威望。

周恩来不会激怒斯大林，莫洛托夫也因此变得随和起来。

周恩来温和地对斯大林说：

“斯大林同志，我们是第一个加入您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亚洲大国。”

周恩来的这句话表明了中国的态度，肯定了斯大林的地位。斯大林怒火渐消，谈判开始有了成效……

周恩来每天都要向毛泽东汇报谈判进展情况并交换意见。毛泽东要一直在莫斯科住到他得到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利的各种问题的满意答复为止。然而他却避免亲自直接参加友好条约的起草工作。

条约最初的文本是由苏联草拟并提出的。周恩来和毛泽东逐条进行了研究。

周恩来：老头（斯大林）不肯放弃在东北的利益。条约中大国的味儿很“浓嘛”。

毛泽东：我们是要从老虎嘴里掏肉噢。

周恩来：是啊，为了让苏联承担防务义务和获得贷款，我们不得不付出代价。

毛泽东：但是代价不能太高。就互助条约，中东铁路，联合股份公司和边界问题我们要采取两种态度：一种是当对方提出的建议我们不同意时要进行争论；另一种是如果对方绝对坚持的话，我们就接受他们的建议。

周恩来：这也是出于对社会主义利益的考虑。另外，苏联方面还强调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地位问题。他们担心我们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说这是签订条约的前提，要我们先在公报中予以宣布。

毛泽东听到这儿愤怒了，他习惯地抿了抿嘴唇。他知道，此时此刻，愤怒是没有用的。他点燃了一支烟，狠狠地吸了几口，一支烟仅剩三分之一了。他明白，若在这儿卡壳，那一切都无从谈起了。

毛泽东：外蒙古的独立已既成事实，既然苏联人坚持，那就由他们吧。但不要在友好条约中体现出来。我看这里面的好多文字值得推敲噢，这样，后来通过并公布的条约虽无原则上的变动，但在文字上作了很大的修改。这一工作是周恩来直接领导和亲自动手进行的。他将条约的草稿交给代表团和大使馆的同志们，组织发动大家对条约草案进行逐条、逐句、逐字的研究、斟酌和修改。要求人人都开动脑筋，

贡献力量。

周恩来自己更是格外认真，一个字一个字地推敲。这是他一贯的工作作风。要从国家的利益出发，防止出漏洞。他说，

“这个条约不仅要在今天看行。还要在以后看行不行，要经得起时间考验和后人检查。”

条约金文的实质性文字还不到一千，但是每一个字都经过反复推敲，每一个同志，特别是周恩来，为它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例如条约草案中有一段原来是：

缔约国一方一旦受到第三国的侵略。

另一方得以援助。

周恩来觉得“得以”不够肯定，没有表明条约应有的作用，经过再三考虑，将“得以”二字改为“即尽其全力”给予援助，这就更肯定更明确了。为了这后来只有几个字的改动，就讨论甚至争论了很长时间。

几十年前，当列宁宣布废除以前俄国帝国主义在亚洲掠夺的成果时，象周恩来这样年轻的一代中国人曾为之振奋，并留下深刻印象。但现在列宁的继承人并不想信守诺言，没有一个中共领导人对莫斯科满怀热情。周恩来不得不修补尽了最大可能达成的最低限度的协定。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签订。在克里姆林宫本行了隆重的签字仪式。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苏联主要领导人和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等中国同志出席了仪式。周恩来同维辛斯基代表本国政府，分别在两份条约上签了字。

在签订友好条约的同时，双方还就中长铁路的租赁和管理，苏联在大连和旅顺的军事设施，以及有关苏联在北京和东北控制的各种财产等问题达成了协议。这些对周恩来来说是个主权问题，而苏联却大谈美国在重新扶植武装日本，会对中苏造成很大的威胁等等。这些包括中苏铁路和东北军事设施的协议允许维持原状，但最迟不得超过一九五二年底。

苏联认为他们对东北设施的继续管理会有利于中国，因为中国缺乏管理和技术专家。但是，众所周知，使用中长铁路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要比使用他们自己的远东铁路方便得多。

此外，双方还达成了另一项协议，苏联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的信用贷款，年息为百分之一，供中国购买苏联的机器和设备。这个数目使毛泽东、周恩来很失望，因为它只是毛泽东开口要的十分之一。

毛泽东显得心烦意乱，他实际上的确心烦意乱。这些让步触到了他民族自豪感

的核心，根据印度政府的消息来源，接受一笔不足他原来期望十分之一的贷款，是一件丢面子的事。但当时毛泽东觉得，除了在斯大林面前屈下一膝，别无选择。他失去了美国，但他需要北部的安全和抗击日本人的保证，在别处得不到的这笔3亿美元对他很有用。

第三项协议是关于苏联在中国东北和北部从日本和伪满政府手中获得的各种财产。这一协议使大家十分敏感，因为苏联军队对中国东北工业设施的“大肆掠夺”仍使中国人记忆犹新。后来，当苏联把这些财产无偿交还给中国时也表现出了一点宽宏大量的气度。周恩来在1950年2月14日签订友好条约及附件时所发表的讲话中重点突出了中国人民对斯大林元帅这一友好表示的巨大感激。

但是，周恩来没有提到接受了外蒙古的独立。

条约签订后，一些不喜欢苏联的非共产党知识分子评论道：

“共产党要比蒋介石更爱国些。”

用毛泽东的话来说

“我们总算从虎口中夺得了一点食物。”

中苏友好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了中国，传到世界各地……

中国沸腾了——

所有的城市和乡村都举行了盛会和游行。《人民日报》社论指出：

长期存在于中苏两大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已经由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而巩固下来了。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所建立的拥有全球人口三分之一以上的中苏兄弟同盟，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不可战胜的同盟。

苏联《真理报》以“中苏友谊万岁”为题发表社论说：

这些条约和协定使得苏中两国人民友谊的发展与巩固进入一个新的纪元，标志着国际关系发展的新阶段，对于巩固全世界和平与民主的事业是一重大贡献。

共产主义世界沸腾了——

保加利亚、波兰等国报刊报道了本国人民庆祝条约签订的情形。

然而，帝国主义分子傻眼了……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一直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政策，并象行将溺毙的人抓注一根稻草一样，死死抱注中长铁路及旅大问题，因为他们指望这些问题会成为

苏中之间摩擦的缘由。他们胡说什么“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企图“控制中国”等。这些条约的签订表明中国是独立地充分行使着主权的，同苏联的关系是平等的。于是，西方国家的一些官方人士和通讯社不禁惊呼中苏条约“必然成为反殖民地宣传的强有力武器”，“拆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台”。美国“国务院方面伤心地承认了这是一个事实”，是“最黑暗的噩梦”，是表示“世界局势的巨轮在莫斯科——北京轴上旋转。”

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在中苏友好条约签订的过程中已经做出了不小的牺牲。因为他们懂得，一个国家既要保持自己的独立，努力维护自己的主权，又要有适当的外援，必要时也得以小小的妥协换取长远的利益。但是，完全依赖外国以至损害民族利益也是不允许的。因而，面对苏共领导人难填的欲望，他们有理，有利、有节地虚与委蛇，致使不愉快的事情，并未能影响两国双边关系的全面合作。

中苏关系至此展揭开了一个新的篇章。

二、最后的努力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

3月8日，周恩来到达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礼。

斯大林静静地躺在鲜花围拱的水晶棺里，身上覆盖着党旗。虽然一息无存，却比他生前任何一个时候更安详、宁静、柔和。他的棱角鲜明，充满男性美的面孔，仍然焕发出尊严的光泽，好象刚刚发表过讲演，刚刚露出过一抹微笑，就在闭上嘴的一刹那固定了，连同唇上的威武的胡须和向后精心梳理过的头发。他在那一刻陷入了沉思和反省，似乎在沉思未来，似乎在反省过去的历史，并且将永远地继续下去……

周恩来曾饱受斯大林暴躁吝啬之苦。在他迈步走在这个逝去的“共产主义世界的统治者”的遗体后面时，他必定记得他是怎样等待这个人作出冷淡的决定的。他也必定记得，斯大林是如何象一个站在摩天大楼上的警察企图指挥下面街上的交通一样，指导中国革命。但周恩来的思想很快便转到了实际领域。新的苏联领导人与斯大林截然不同，他们公开大肆宣扬同中国的合作的重要价值，那么他可以从这些新领导人那里为中国争得些什么呢？

守灵的苏联党的领袖人物们都垂下了头。

当对，马林科夫已经出任党中央第一书记，但是可以看出，赫鲁晓夫的地位正在升高，并且竭力要使前来吊唁的世界各国共产党的领袖们看出这种提高。从周恩来到达的那一刻，他就表现出与其他苏联领导人不同的活跃与主动。

“斯大林的去世对我国人民，对全世界人民都是极大的震动，我们都感到无比悲痛……”周恩来一见到赫鲁晓夫便迎过来招呼，“他的逝世给世界革命留下的空缺是无法弥补的。

在整个吊唁过程中，赫鲁晓夫不断地过来与周恩来握手打招呼。他一会儿说：“团结，现在我们需要团结”；“现在首要的是维护中央团结……”一会儿又跑过来，眼睛湿漉漉地眯成一条缝，声音悲切：“斯大林是我们生命的保卫者”；“斯大林使我们取得了对敌人的胜利，他的突然去世使我们忧虑担心……”；

“我们要团结，一定要团结起来”。

周恩来回国不久，马林科夫的第一书记职务就被赫鲁晓夫取而代之了。

1954年10月，尼基塔·赫鲁晓夫同布尔加宁一起率领苏联党政代表团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的庆祝活动，受到了极其热烈隆重的欢迎。

这是克里姆林宫的高级人士第一次访问中国朋友。

赫鲁晓夫在苏联党内要巩固他的地位，是需要获得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支持的。

在他第一次访华期间，曾多次与毛泽东、周恩来会谈。

赫鲁晓夫曾提着毛泽东的手说：

“中国人民在您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历尽千辛万苦，走过了坎坷不平的道路，战胜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建立了新中国。现在，英雄的中国人民在朝鲜打败了美国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充分显示了新中国的力量。中国已经屹立在东方，在世界上举足轻重，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世界意义。”

毛泽东：中国革命得到了世界各国共产党特别是苏联共产党的支持和援助。感谢苏联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的无私援助。

赫鲁晓夫：不，不能说是无私的，而应当说是有私的。援助中国实际上也是帮助我们自己。中国强大起来又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

这些新的苏联领导人不仅弥补了过去的疏忽，而且他们甚至解决了过去遗留下来的悬而未决的棘手问题。他们同意从旅大撤军，把过去双方共管的股份联合公司移交中国，给予中国大批发展贷款，并扩大两国的科学技术合作。

中南海紫光阁。不眠的灯光。

毛泽东满脸喜色。他被赫鲁晓夫这次来访解决的那些问题鼓舞着。他靠躺在沙发里，“吞云吐雾”，享受着他的“中华牌”。然后，闭上眼睛，陷入沉思……。他想起了1950年在莫斯科的那个不眠之夜，那次使他感到屈辱的访问……

突然，他感到手指一阵疼痛。冒着丝丝烟雾的烟头已燃到了手边。他扔了烟蒂，

又换了一根，用火柴点燃，“吱、吱”地吸了起来，信步在室内轻轻地踱着。他在等待周恩来的到来……

“主席，我因安排苏联代表团的出游活动而耽误了一下，来晚了……。”周恩来的声音打断了毛泽东的踱步。

“噢，恩来，你来了。快过来坐。你又辛苦了一整天。”毛泽东笑着说。

“主席到现在不是也没休息吗？”周恩来接过毛泽东亲自为他泡的“龙井”茶，说：“主席今天兴致很高嘛。”

“是啊，我看这次新的苏联领导人很有诚意。我为他们这次能这么干脆地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而感到满意。真是应该值得庆贺的事。但是，现在唯一遗憾的是……外蒙古问题。”

周恩来立刻意识到，毛泽东要他在下一轮中苏会谈中，向赫鲁晓夫重提外蒙问题。他犹豫了……。因为他深知外蒙对苏联来说，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苏联是不会轻易“吐出这根骨头的。”

“主席，这个问题恐怕……”

“我知道这是个更棘手的问题。苏联十有八九是不会答应的。但这是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即便抱着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做这最后的一次努力。”

于是，蒙古问题提出来了。

这是周恩来与赫鲁晓夫的正面交锋。

“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蒙古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你会怎么想？”周恩来问道。

赫鲁晓夫楞了一会，接着脸上便显出惊讶的神情。他坐在那儿，一语不发，似乎没有听到周恩来的问话。坐在一旁的布尔加宁轻轻地咳了一声，把赫鲁晓夫的思绪带回了现实中。他看到别人都盯着他，便也干咳了一声，说道：“周同志，你提出的问题使我们很难评论，这是蒙古和中国之间的事情，与我们无关。我们是第三方。你们自己直接同蒙古人谈谈不好吗？”

周恩来心中暗想，“我早就料到你会这么回答。真是老奸巨猾的俄国佬！这个问题真的与你们苏联无关吗？在蒙古驻扎着的大量苏联红军又说明了什么呢？”他微微一笑，接着问：

“说的是。但是我们想事先知道，如果蒙古真的成了中国的一部分，你们的反应会怎样？”

“我们的态度取决于蒙古同志的态度，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个人的意见：我非常怀疑蒙古同志会欢迎你们的建议，另外，蒙古很快就要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了，最近、又同一些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如果蒙古并入中国，它就会失去这些国家的承认。不过，我当然不想代表蒙古领导人说话。

周恩来心里清楚，赫鲁晓夫的这番话其实就是代表着蒙古领导人讲的，因为外蒙古当时仍完全处在苏联的操纵之下。

蒙古人果然开始自己来处理这个问题了。他们与中国交换地图并举行谈判，想把他们同中国的边界划分得更清楚些。

这的确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蒙古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是所谓“独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另一部分在中国境内，即内蒙古。几乎不可能用人种民族历史的标准把这两部分分开。可以这么说，无论怎么分割蒙古，都无法避免不损害蒙古人民作为一个整体的利益。

但最终，还是由于历史的和政治的，甚至还有军事的原因，蒙古分裂了。

蒙中边界划定了。

外蒙古独立内幕（10）第九章 “苏联的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

第一节 世人眼中的蒙古国

一、苦涩的“独立”

1924年11月，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和苏维埃联邦的全力帮助下，亚洲内陆深处又出现一个社会主义的热土——“蒙古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了。然而，在蒙古“独立”的背后，有着难言，的苦衷和凄凉。蒙古的北边，屹立着继承了沙皇俄国传统的强大的“北极熊”苏联，它的南面，是和它有着悠久历史密不可分、任人欺凌的中华弱国。夹在这两个巨人中间的外蒙古人，在哲布尊丹巴封建上层的煽动和猖狂活动下，转而投入了曾经对它俯首称臣的俄罗斯人的怀抱之中。因而“蒙古国”的独立，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是一种名义上的独立，只是写在法律条文上，展示给世界人民的一种展览品，它曾经遭到过不少世人的讥刺，对这种名不符实的“独立”进行了辛辣的嘲讽。美国《纽约时报》外交专栏作家在1973年的文章中曾这样写道：“蒙古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独立国家，虽然它声称将保持国家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然而事实上，它是苏联的附属国和卫星国，是中苏斗争中一个并非十分重要的筹码。这是不容否认的。”这是因为，这个地处亚洲腹部，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在国际上，曾经一度紧紧追随苏联，国内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深受苏联的影响。所以，有的外国记者更不客气地指出：“蒙古是苏联的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了。

二、剪不断，理还乱

直到如今，广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对外蒙古的独立仍深感困惑，在他们根深蒂固的传统思维中，似乎外蒙古那片广漠的草原不应从中国的地图上分离出去。人们仍然把蒙古族看成是华夏民族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人们还常常把蒙古族杰出的英雄成吉思汗当作整个中国的英雄，除中国大陆外，台湾的一些学者名流也对外蒙古的独立表现出相当不满的情绪，有的甚至至今仍对蒙古的独立持否定态度，虽然中华民国政府早在 1946 年就正式承认了蒙古国的独立。台北一位终身从事蒙古问题研究的专家刘学姚就很难接受蒙古独立的事实。他在他的著作中声称“蒙古地区是我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他们（指蒙古族人民）爱国的情绪与内地同胞一样的高。”并且还说，是由于当时中华民国政府对外蒙古采取的措施不当、才导致了外蒙的独立：“过去我们由于国人的无知，以致没有人才，没有地图，没有适当的对蒙政策，所以产生了许多悲剧。自民国后、五族共和，民族平等已为不易的国策。况蒙古地区资源丰富，而地面更适于畜牧，正可补农业之不足。”他认为，外蒙古人民之所以赞成独立，是由于苏联和外蒙当局欺骗宣传的结果。这位先生至今仍不承认外蒙独立，在他的著作中，凡是提到有蒙古国名的，一概称之为“伪蒙古人民共和国”。他在论到外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创始人时，更加赤裸裸表达了他的观点，他说：“外蒙要不是出了哲布尊丹巴、苏赫巴托和乔巴山一类的卖国贼，外蒙没那么容易便被俄帝吞下。”他还认为，“蒙古人民共和国”是苏联的第一个附庸国，他说：“外蒙所谓独立，实为苏联独裁制之同义词。”这代表了相当海外华人的观点。虽然，这种观点并非正确，然而，谁又不心痛那突然从中华版图上消失了的美丽的的大草原呢？他们和日本、美国等许多外国记者，学者的观点一样，认为蒙古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独立国家，最多，也只是苏联的大家庭中的一员罢了。

当然，世界上也有对蒙古的“独立”给予相当高的赞扬的。首先这样做的自然是苏联了。苏联政府曾经置基本的历史事实于不顾，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在苏联社会科学院和蒙古国家合编的《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修改版》中，企图把蒙古说成是“向来就是独立国家”，妄图抹杀中国和蒙古之间源远流长的历史关系，这自然是从苏联自身的利益出发的。

国外有些人，也随声附和或别有用心地同意苏联的某些显而易见的错误观点。日本的江上波夫在他著的《北亚细亚史》中说：“北亚是外在问题之中，还不能说是外在已经安定好了的状态。换句话说，那里象是包括许许多多待解决的问题，例如，朝鲜之分裂为两个朝鲜，蒙古也分裂为两个蒙古，前者是民主主义阵营（指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阵营力量对比关系，后者乃是苏联与中国力量的对比关系。”他在书中挑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他的这部书，是为前日本军国主义服务的，同时也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始终妄图染指中国大陆的表现，有时也不得不令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的人们警惕。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兹伯里也在一篇文章中声称：“由于多种原因，德国分成了两个，朝鲜分成了两个，蒙古也分成了外蒙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蒙古。将来是否有可能出现一个统一的蒙古国家，或者说，将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的观点更加显露无遗，竟然提出了“统一的蒙古国家”的概念，这不是有意地挑拨吗？难道外蒙古独立出去后，有的人还觉得不够满意，还想把中国的内蒙古也挑唆出去，这恐怕也是他们的一厢情愿的痴心而已。

当然，象江上波夫和兹伯里这样的观点，毕竟是很少的，在全世界大多数人的心目中，蒙古国家的独立，只不过是附在苏联这艘大船上的一只小小的舢板而已，它没有自己的航向，只是随着苏联这艘大船的变化而不断调整改变自己的目标。它虽避免了随风漂流，在茫茫的大海上迷失方向的危险，却也不得不吃尽了盲目跟随、亦步亦趋、没有丝毫自主权的苦头，给蒙古国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危害，给蒙古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新的不安。

第二节 苏联的“大牧场”

蒙古宣布“独立”后，立即就和苏联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先全依赖于苏联。而当时的苏联，正四面遭受西方帝国主义和日本的包围和封锁，迫切希望摆脱孤立，扩大自己控制和影响的区域，建立了长期的所谓“友好”关系。此后，在蒙古国家的七十年生涯中，蒙古国家给自己套上了一套枷锁，把它锁了近七十年，直到那位北方巨人轰然倒塌以后，蒙古才摆脱了长久的控制，步履蹒跚地挣扎着走自己的路。然而，在那七十年中，蒙古国家依赖苏联的结果，不仅没有得到较快的发展，反而使蒙古成了苏联的“大后方”，成为其原料供给地和商品倾销市场，整个蒙古变成了苏联的“大牧场”。

1. “你反斯大林，我骂乔巴山”

1953年3月5日，领导苏联达六十之久的铁腕人物、矮个巨人斯大林逝世，和他的导师弗·列宁一起，被安置在红场。而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出身低贱、放过猪的顿巴斯人赫鲁晓夫，此时正谦恭卑顺地把他那颗巨大的头颅尽量往腹部收缩，极力显示出他此时的悲痛心情。然而，细心的人们仍能从赫鲁晓夫那双不时刺向斯大林遗体的略带尖锐的双眼中看出：这位斯大林最亲密和最依赖的朋友，此时心情是复杂的和难于表述的。地位的上升冲淡了他对死者的悲哀，或许赫鲁晓夫此时也正在暗自庆幸，这位躺在鲜花中和党旗下的巨人，既是他得以向上爬的阶梯，同时又是阻止他到达权力顶峰的最大障碍。现在，又一伟人追随他的先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去了。赫鲁晓夫终于长出一口气，顿时觉得臃肿的腹部轻松了许多。他用充满敌意的眼光扫了扫和他处于同样地位的领导人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心中得意地想，咱们走着瞧！

果然，斯大林这位巨人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的亲密朋友和接班人在他们分别后仅三年，即在一九五六年二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斯大林就受到了这位朋友的批判和揭露，其言辞之激烈，即使九泉之下的斯大林听了，也一定会捶胸顿足，后悔当初没有识破赫鲁晓夫的“庐山真面目”。赫鲁晓夫担任苏联共产党第一总书记后，首先倒霉的就是当时的总理马林科夫和外交部长、斯大林的战友莫洛托夫了。1957年，他们被赫鲁晓夫以所谓“反党集团事件”而被开除出苏共中央主席团，马林科夫被解除苏共中央委员和总理职务，莫洛托夫则被贬往蒙古任大使。去掉这两位眼中钉和肉中刺以后，赫鲁晓夫在中央大批安插自己的亲信，最后巩固了他在苏联领导集团内部的地位。之后，在地方上，这位被尼克松总统称为“魔鬼的化身”的苏联领导人，也对各加盟共和国和州的党组织的最高领导进行清洗和改组。从1953年8月到年底，他先后撤换了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列宁格勒州党的书记。1954年，他

又撤换了哈萨克、吉尔吉斯和斯摩梭斯克州及图拉州党组织的书记。1955年，赫鲁晓夫又一口气换了六批州委书记和各加盟共和国内党的工作人员，后又对社会各部门进行改组和清洗，试图在社会各方面消除斯大林时代的影响，并且还想在经济领域实行“改革”。

苏联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它的一举一动，不仅对蒙古，而且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有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一向善于紧跟苏联共产党的蒙古人民革命党，这次自然也不甘落后。1958年，在苏联扶持下，泽登巴尔担任了蒙古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和人民革命党书记。他上台后，秉承苏联的旨意，效法苏联“反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在蒙古全国展开了一场反对前主要追随斯大林的领导人乔巴山的“个人迷信”的运动，大肆攻击乔巴山时期的各项政策和制度。乔巴山是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创始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他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竟会成为斯大林的殉葬品。他和斯大林一样，生前曾叱咤风云，威风一世，令世人瞩目，死后却同样得不到安宁。历史给各国的伟人们开了一个多么残酷的玩笑！泽登巴尔也仿效苏联，在国内，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部门，实行大清洗，把反对他的人绝不留情地打下去，把他的亲信安插到重要岗位上来。

1959年2月，原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人民革命党副书记丹巴怎么也没有想到厄运会突然降临到他的头上。这个经过几十年战火考验的老党员，竟被泽登巴尔指控为“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原则”而被永远排斥在蒙古大人民呼拉尔的大门之外，悲怆地结束了他那曾经看似充满光明的政治之路。1962年9月，在赫鲁晓夫这位太上皇的投意下，泽登巴尔又在“反民族主义”的幌子下，把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图木尔·奥其尔驱逐出中央，蒙古党和国家的机关报《真理报》指责他“怀疑蒙苏两国人民兄弟般的友谊”以及“苏联给予我国的全面无私的援助的国际主义精神。”凡是当时对蒙苏那种不正常的关系有些看法和不满的人，这种意见千万不能流露，否则，厄运将会降临到他们的身上。当时的蒙古全国，处于一片大清洗的恐怖气氛之中，曾经有个笑话，说蒙古的羊互相见了面，也仍是点头而已，再也听不见羊群的“咩咩”声了，整个蒙古大草原呈现出一片死寂。

蒙古高原的西伯利亚寒风比往昔似乎刮得更加猛烈了。然而，死水毕竟有微澜，有些大胆的政治家，又勇敢地站了出来，重新在蒙古社会生活中掀起了细浪。蒙古政治局委员，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二书记曾德，多次不合时宜地说了一些对苏联大哥不恭敬的言论。自然，他也逃不脱被清洗的命运，毕竟，他个人的力量是太小了，要想抗衡当时的泽登巴尔集团，岂不是以卵击石、螳臂挡车吗？1963年12月，他的政治生命结束了，泽登巴尔给他定的罪名是“反苏”。还说曾德的活动“同反党的图本尔·奥其尔的活动只是形式上有所不同，而其内容上是一致的”。一个所谓主权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竟会因谈论另一国的政治而被定罪，这样的政治悲剧也许只有在蒙古和苏联这种畸型的国家关系中才会产生。通过这些例子，人们会更加清楚地看到当时的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是怎样的庞杂了。蒙古的清洗活动并没有到此结束，1954年12月，中央委员洛呼兹等人又被开除出党，蒙古报刊在揭露他们的罪名时指责他们“要求蒙古拒绝同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在经济方面进行合作”，“直接维护民族主义”，还说他们是“蒙苏人民钢铁般的兄弟友谊的敌人。”蒙古国家的领导人的被解职，其罪名大都是“反苏”这一条，可见泽登巴尔集团和苏联是怎样地紧紧依附在一起了。赫鲁晓夫在苏联进行清洗和改组，企图消除斯大林在人们

心目中的形象。相应地，赫氏的代理人泽登巴尔在蒙古也就发动了反对乔巴山为名的政治运动，对全国各级机构也进行了清洗和改组，其手法和苏联的如出一辙，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

泽登巴尔完全执行赫鲁晓夫的政策，赫鲁晓夫的一颦一笑，无不引得蒙古方面的紧张万分，难怪有些西方记者讥刺说，蒙古国家领导人，眼睛并没有注视着国内，而是紧盯着遥远的北方大国——苏联领导人的面孔。这真是一语中的。蒙古不仅在国内政策上紧追苏联，在国际事务中，它也为苏联的对外政策摇旗呐喊，充当先锋，尤其吹捧苏联赫鲁晓夫执政时的“和平外交政策”，全力支持赞同苏联提出的与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尤其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紧张时期，蒙古国家率先站在苏联一边，为苏联摇唇鼓舌、擂鼓助威，攻击中国不遗余力。有时其言辞之激烈，之尖刻，比起苏联来，犹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这样做的结果，蒙古国家并没有从苏联那里得到什么封赏，相反，它日渐遭受合法意义上的掠夺和剥削，成了苏联名符其实的“大牧场”和后勤供应基地。

二、“俄罗斯化”在行动

蒙古是一个地广人稀，资源丰富的国家。它的每个省都蕴藏着丰富的煤炭，东部戈壁地区广布着石油，金、银、锡、钨、铝等贵重和稀有金属广布全国。尤其值得世人称道的是，自古以来，蒙古民族就是一个“马背上的民族”，蒙古地区有着天然优良的大草原，非常适于放牧，所以，蒙古的畜牧业在世界上久负盛名。畜牧业是蒙古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蒙古人把牛、马、绵羊、山羊和骆驼喻为镶嵌在万里草原上的五颗明珠，蒙古全国有百分之七十四的人从事畜牧业，它在世界畜牧业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据统计，按人均拥有的牧畜计算，蒙古的马和山羊占世界首位，骆驼和绵羊均居世界第六位，牛占世界第五位，蒙古人均牲畜拥有数比世界平均数高三十八倍。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畜牧业发达的国家，由于七十年来一直跟随苏联，政治上受到苏联的层层控制，经济上也受到这位老大哥毫不留情地掠夺和压制，使蒙古的民族工业发展缓慢，整个蒙古大草原变成了苏联的原料供应地、资本输出和商品倾销市场，广袤的蒙古草原变成了苏联的“大牧场”。

蒙古是一个地处亚洲腹部的内陆国家，地理环境决定了其经济特点是对外依赖性很大。1921年蒙古革命后，就完全依赖苏联的援助来建设国家。当时的苏联政府，由于列宁仍在世，也许是真心愿意帮助蒙古发展经济，支援蒙古的国家建设，因而派出一批员工，在蒙古援建了一批配件和加工性质的民族工业。例如，从1925年到四十年代初，在苏联的帮助下，蒙古相继建立了中央发电厂，汽车机械修配厂，洗毛厂，锯木厂等。但是，机械工业和象样的畜产品加工工业，则一个也没有。苏联也自有他自己的打算，他并不会完全无私地奉行他口口声声所称的“国际主义原则”，何况，苏联曾经一度继承着老沙皇俄国的传统，有着侵略和扩张领土的野心，赔钱的买卖他们是从来不做。只要他给了你一点利益和好处，你就必须加倍偿还，付出更高的代价。所以，苏联也许并非真的想帮助蒙古这个弱小民族发展它的独立的民族工业，因此，直到1980年，蒙古独立近四十年后，工业仍然没有成为蒙古经济中的一个独立部门，蒙古经济的发展仍相当缓慢。

1961年，苏联共产党召开二十二大后，苏联政府在政治上控制蒙古的同时，在

经济上也对蒙古进行残酷剥削和掠夺。苏联把蒙古作为自己帝国的“后院”，不断加紧对它的控制，以便把它变成可以任其宰割和肆意掠夺的殖民地和附属国。蒙古国家和经济命脉完全操纵在苏联手。根据苏联的需要，蒙古只发展单一的畜牧业经济。大批苏联专家和顾问涌进蒙古的各个部门，参与蒙古的各项经济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以及监督蒙古使用苏联的贷款情况。这些苏联专家和顾问的权力很大，他们可以否决蒙古部长的决定，是蒙古各部门的太上皇。蒙古牢牢地被禁顿在苏联苦心经营的所谓“兄弟国家友好大家庭”里，任凭苏联的摆布。苏联控制蒙古和东欧各国的经济命脉，是在所谓合法的外衣下进行的，那就是通过“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而实现的。

经互会成立于1949年1日，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初期。苏联为抗衡美国提出的“马歇尔计划”而联合当地的社会主义各国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在莫斯科成立的经济组织。它成立的初期，对抵制资本主义世界对社会主义阵营经济的冲击，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经互会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它越来越成为苏联控制其成员国经济命脉的工具。早在1954年春天，赫鲁晓夫上台伊始，就要经互会各成员国搞所谓“生产专业化”与苏联的经济计划“合作”，并拟议成立“统一”或“联合”的经济组织。1959—1960年间，苏联又抛出了精心准备和构思的经互会章程和一整套法规，以法律形式把“国际分工”、“生产专业化”、“协调计划”、“经济科技合作”和“联合投资”等强加给经互会各成员国。苏联二十二大后，1962年，苏联又在成员国党代表会议上，强行把“国际分工”作为经互会的根本原则，赫鲁晓夫还鼓吹“取消国界、提出要“在国际分工广泛的生活专业化和协作化的基础上……将相互补充和逐渐形成一个统一的、协调一致的经济—经营并同体。”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蒙古政府经不住苏联的威逼利诱，于1962年6月正式加入了经互会，正好投入了苏联这只饿极了的“北极熊”的怀抱。这样，蒙古进一步丧失了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权利。苏通过经互会的“国际分工”，“生产专业化”“经济一体化”，使蒙古的国民经济完全纳入了苏联的经济轨道，蒙古国家的畜牧业、工业、矿业、交通、科技、财政和贸易等部门，完全被苏联控制了。

泽登巴尔集团不仅在政治上依附苏联，而且在经济上，也采取完全依赖苏联的方针，根本没有想到要凭自己的力量来发展独立的民族工业。蒙古虽然国力弱小，但它从苏联那儿得到的贷款也不少、所有苏联给蒙古的贷款，绝大部分也都是设备贷款，其投资重点则为农牧业部门，是因为这些部门对苏联来说，有着比较重要的作用，更为有利可图。据统计，到一九六一年为止，苏联给蒙古的各种贷款，合计有5.37亿卢布。1961年—1965年，苏联又给蒙古两笔长期信贷，约有3.15亿卢布。1966—1970年，苏联为蒙古第四个五年计划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五十。这样，人们可以推断出，到1970年为止，苏联给蒙古的长期贷款，至少已达15.17亿卢布，如果按人口计算，蒙古国一九七零年全国为一百二十三万人，平均每个蒙古人从苏联得到的贷款为一千二百三十三卢布。这样，从平均每人所负债务来看，蒙古人是世界上负债最重的。据报道，1971年初，蒙古由于畜牧业减产而陷于严重的经济困难，于是不得不向苏联乞求援助，结果，苏联又给蒙古一笔贷款，这笔贷款比上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贷款数又增加40%，约占蒙古第五个五年计划投资总额的百分之六十八。1971年，在经互会第25次例会通过的“综合纲领”中，还提到要给蒙古更多的援助。纲领说：“其他成员国给予蒙古相当大的投资和援助，将是必要的。”那时，

苏联对蒙古的贷款偿还期已经从 71 年安排到了 1985 年。而且由苏联的贷款援建的企业，全是一些加工和软件性质的工业，而没有冶金制造业和机器制造业，有些工厂甚至完全是为苏联加工半成品，以便使苏联廉价地剥削蒙古的劳动力。

蒙古从苏联要来了巨额的贷款，不仅没有促进经济的发展，反而背上了日益沉重的债务负担。由于苏联援建的工厂，又没有一家是真正能够独立发展的。结果，蒙古仍然不得不仰仗苏联的鼻息，被苏联牵着鼻子走。

近年来，蒙古和苏联还搞所谓的“对口联系”和“直接合作”，把各个经济部门完全置于苏联的控制之下。从 1971 年 5 月，蒙古的农牧业部、燃料动力工业部和地质部分别与苏联的农业部、煤炭工业部和有色工业部建立直接合作以后，现已扩大到森林和木材工业部、建筑和建筑材料工业部，轻工业部、食品工业部等十四个政府部门。苏联对这些部门不仅负责“协调年度合作计划”，还常驻代表坐镇直接控制。此外，还有两万多名苏联“顾问—专家”分布在蒙古的各个具体生产部门，控制了它们的经营管理、生产计划、资金和劳力的分配使用等一切大权，甚至连一些工厂的厂长和主要车间主任，都是由苏联人担任的。这样，蒙古的工厂、企业，实际上完全变成了苏联的附庸加工车间，是苏联大工厂的一个个小分厂而已。它们并不是独立的工厂，只是苏联大工业生产过程中的的一环而已。蒙古这样的工业，即使再给它几十年的时间，如果仍然象现在这样的话，也未必见得就会有多大的起色。

蒙古还按照苏联的要求，处处迎合苏联的意旨，完全按照苏联所需而发展它的工业，农业和畜牧业。蒙古为了满足苏联对其丰富的自然资源的贪婪要求，曾声称：“考虑到采矿业对增加出口资源有重存意义”，实际上即是为了满足苏联对矿业原料的需要，蒙古将把“很大一部分资金用于采矿业，使其产量在 1980 年增加 5—5.3 倍。”为此，将扩大“蒙古有色金属合营公司的有色金属和矿石采掘企业的生产能力。”还要加快地质勘探的速度。蒙古的五年计划中规定：投资首先用于实施苏联和经互会成员国经济技术援助的项目和措施。”自 1962 年苏联把蒙古加入经互会后，在所谓“共同开发”的幌子下，苏联不仅控制了蒙古的矿产的勘察和开采权，而且还独吞了大部分产品。由苏联人当经理的“蒙苏有色金属公司”已垄断了蒙古的布尔弟、哈珠乌兰的萤石矿和苏赫尺特尔省布红朝倍特钨矿及陶勒盖特的金矿。目前开采的萤石，全部被苏联掠走，它占苏联进口萤石的百分之五十。1973 年 11 月，蒙苏签订了“关于建立联合经营额尔敦特选矿企业的协定”，根据协定，成立了“蒙对合营额尔玻符铜铝矿造矿厂”，名义上，苏联的股份占百分之四十九，蒙古占百分之五十一。而实际上，建厂的资金全部是由苏联提供的，更为奇特的是，额尔敦特市的用电，也完全是由苏联供给。这些蒙苏“合资企业”的开办，为苏联掠夺蒙古资源大开了方便之门。苏联为了寻找蒙古的资源，除了以“经互会”的名义派出一支由它操纵的所谓国际地区勘探队前往蒙古外，还专门成立一支苏蒙“联合地质勘探队”，到蒙古各地进行地质普查。该队已对百分之九十的蒙古领土绘制了地质图。1976 年 5 月，该队的苏联队长声称，要对蒙古“全部领土进行研究工作”，并继续寻找“黑色金属、锡和作为矿物原料的萤石。”苏联把蒙古当作原料产地，竭尽其所能，千方百计地把蒙古及东欧各国的资源运往苏联，这就是苏联美曰其名的“合作经营”和“国际分对外贸易上，蒙古几乎完全依赖于苏联，仅据 1976 年统计，蒙古从苏联进口的工业与日用消费品就达四万余种，百分之九十的机器设备、百分之七十的日用消费品，都靠苏联供应。蒙古在对外贸易中，也受到苏联的控制和剥

削，苏联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伊·格里森公开承认：“苏联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对外贸易中一向占主导地位。”蒙古对外贸易的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同苏联进行的。苏联通过贱买贵卖，不等价交换等手段，从蒙古巧取豪夺，牟取暴利，蒙古在对苏联的贸易中，逆差越来越大。1965年—1971年，从苏联进口11亿卢布，而出口不到4亿卢布，而且蒙古从苏联进口的机器设备，都是些陈旧存货，苏联出售给蒙古的这些东西，价格都比世界市场高。例如，苏联卖给蒙古的拖拉机每台售价三千卢布，而同期世界平均价格只有一千八百卢布。又如，苏联卖给资本主义国家的石油价格，比卖给经互会成员国价格还低，它卖给意大利的石油每桶价格是1.31美元。卖给日本是1.26美元，卖给西德是1.27美元，而卖给蒙古则为2.61美元。可见，苏联是怎样地照顾“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成员了。但同时，作为蒙古向苏联出口的畜产品，苏联方面并不客气，不仅进行百般挑剔，而且还竭力压低价格，因而从1963年到1971年的七年中，蒙苏间的相互贸易中，蒙古的逆差就达七亿多卢布。在和苏联做生意时，吃亏的总是蒙古一方，或许他们双方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也算是两厢情愿，也怨不得别人了。

蒙古是一个以畜牧业为主的国家，但令人觉得奇怪的是，在六、七十年代，广大蒙古人民却普遍感到吃肉很有些困难。蒙古政府也向人民大肆宣传起吃蔬菜的好处来，说蔬菜的营养价值如何如何地高，似乎蔬菜真的胜过了肉食。政府还号召人们要“多吃蔬菜，少吃点肉”，令全蒙古人民大惑不解。原来，苏联在“国际分工”的幌子下，要蒙古着重发展它的畜牧业。把蒙古变成苏联的牧场。为了满足苏联的需要，蒙古每年要把大量的活牧畜源源不断地从自己的牧场赶往苏联的加工工厂。据统计，蒙古每年征购的马、牛、羊等牲畜，有百分之八十三是运往苏联的。1961年—1965年，苏蒙长期贸易协定规定，蒙古平均每年要向苏联供应活牧畜二百五十万头，即蒙古平均每人每年要供应苏联三头牲畜。而实际，蒙古运往苏的活牲畜，每天大约有一万五千头，每年达五百五十万头之多。由于大量牲畜都被运往苏联，蒙古国内肉食供应自然就显得紧张起来。但蒙古政府宁肯让普通百姓吃不上肉，也不敢得罪苏联这位兄长。对苏联的供应，还得保质保量限期完全。否则，苏联冲冠一怒，可不会令蒙古这位小弟即使有肉也会“吃不了兜着走”。除了把大量活牧畜赶往苏联外，蒙古还必须向驻在其领土上的苏联军队、各类专家、顾问和他们的家属提供肉食，其总量等于蒙古国内肉食供应量的四分之一。由于这样的原因，蒙古竟破天荒地在全国增加了蔬菜耕种面积，城市居民索食者也日益增多。照此下去，这个几百年来一直以肉食为主的民族，恐怕会完全改变他们原来吃肉食的习俗。当然，苏联人也并不是全都把蒙古进贡的活牲畜自己消耗掉，他还有更精细的打算。苏联在同蒙古接壤的地区，建立大型肉类联合加工厂，专门加工从蒙古进口的活牲畜。苏联还大搞转口贸易，把从蒙古进口的畜产品经过加工或不经加工就向西方市场高价出售。加苏联从蒙古进口马、羊后，供应法国马肉和供应英国羊毛线，转手之间，就获得了大量利润。据估计，从1959年到1969年的十年中，苏联就从蒙古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榨取了四亿多卢布的巨额利润。蒙古真正地变成了苏联的巨大的天然牧场。成群的牛羊就象蒙古高原上空的白云一样，源源不断地运往苏联，给苏联人民送去了福音，却使蒙古本国的人民处于有苦难言的窘境之中。

除了政治上和经济上进行控制外，苏联还对蒙古进行军事上的占领，文化科技上进行渗透。蒙古虽然不是由苏联控制和操纵的华沙条约组织的缔约国，但苏联通过苏蒙双边军事条约、早已把蒙古变成他的东方军事基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蒙古境内原来就驻有苏联的军队，后来撤离回国，只留下少数通讯兵和空军技术人员。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随着中苏关系的紧张，大量的苏联军队从欧洲调往蒙古。从1962年起，苏联军队重新开入蒙古，首先是增加了苏驻蒙古的通讯部队，接着是工程部队。1963年7月，苏蒙签订了旨在对付中国的“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接着苏军就开始大量进驻蒙古，苏联军队还在蒙古境内各地构筑军事基地，建造军事设施，积极进行战争准备。到1965年底，苏军实际上已形成了对蒙古的军事占领。苏联还在南戈壁等蒙古南部边界省份设置了电台，在南部中部省份设置了雷达站，在乌兰巴托以西省份设置了所谓地震观测站，在蒙古全境修建了能与苏联直接联系的有线电话网等军事设施。一时间，中蒙边界上军队密布，战云骤起，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更有甚者，1966年1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勃列日涅夫访问蒙古，和蒙古签订了为期二十年的《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它实际上是一个军事同盟条约，条约第五条规定：“缔约双方将……在保证对方的防御力量方面互相提供援助，缔约双方……为保证两国的安全、独立和领土完整起见，共同采取包括军事方面的措施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这个双边军事条约，同华沙条约缔约国的双边军事条约一样，都显以“友好合作”为名，来掩盖其实质性的内容的。至此，驻蒙苏军合法化，蒙古也就理所当然、顺理成章地沦为苏联的保护国和军事基地。根据这个条约的规定，又有大批苏联军事人员被派到蒙古部队中任职，蒙古军队的作战部队营以上、边防总队以上都驻有苏联军事顾问坐镇指挥。蒙古军队的指挥官没有自己指挥军队的权利，完全听命于苏联军事顾问的愚弄和摆布。蒙军的装备完全是苏式的，而且从平常的军事训练、条例条令到纪律制度，也完全照搬苏联军队的模式。苏联就这样通过驻蒙古的苏联军事顾问控制了蒙古军队，蒙军的作战指挥，兵力部署、军事演习、人事调动、军事训练等一切权力，均掌握在苏联军事专家、顾问和教官手中。蒙古军队实际上一步步变成了苏联的一支雇佣军。为所谓“保卫苏联”义务服务。

苏军进驻蒙古，开始是秘密的，这也许是它自己觉得心虚的缘故吧，也许它害怕引起世界舆论特别是中国的反对。但是，苏联和蒙古缔结军事条约后，苏联方面就无所顾忌了。苏联军队在蒙古的胆子越来越大。1967年，蒙古庆祝十月革命胜利五十周年，首都乌兰巴托举行了盛大的节日游行，在游行的队伍中出现了身穿苏军制服的苏联士兵，这是驻蒙苏军在公开场合的第一次露面，它给蒙古的游行队伍增添了几许不和谐的音符。1969年，中苏在珍宝岛发生了大规模流血冲突，驻蒙苏军就更肆无忌惮地叫嚣它“将象保卫自己的边界一样”来保卫蒙古的边界。苏联军队的坦克竟耀武扬威地在中蒙边境上行驶、企图挑起争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苏联在中苏边界地区陈兵百万，其在蒙古的驻军，由于苏联的保密，没有确切的数目，有的报道说有两个师，有的报道说苏联驻蒙古的总兵力有8—9个师，其中有七个陆军师，一个空军师（共有一百四十架飞机）和一个中程导弹基地。虽然没有准确的苏联驻蒙古军队的数量，但世人相信，它是够庞大的。然而，苏联还不满足。他还需要更多的军队，于是苏联就不顾蒙古人口少，劳动力缺乏的现实，迫使蒙古扩充军队和加强军事训练。据估计，在六、七十年代，那时的蒙古只有一百多万人。但蒙古人民革命军已拥有陆军二万八千人，空军一千人和公安部队一万八千人。蒙古的青壮年几乎都要接受军事训练和服兵役。

在苏联的军事控制下，蒙古附属国的地位进一步被确立，并且成为苏联威胁中国的前沿阵地。

苏联驻扎在蒙古的军队，给蒙古人民带来很重的负担。蒙古不仅要承担苏联军队的食品供应，还得处处照顾苏军的利益。由于苏联军队在蒙古横行霸道，引起了蒙古人民的强烈不满。1990年，当苏联军队不得不缓慢地从蒙古撤军的时候，一群蒙古中年妇女朝着远去的苏联军车吐了一口痰，然后啐骂了一声“俄国佬”，表达了大多数蒙古人对驻扎在蒙古的估计为十五万苏联士兵和技术人员的蔑视。苏联驻蒙古的军事人数接近蒙古人口的8%。“谢天谢地，他们总算走了！”那位中年妇女接着说。苏联军队在蒙驻扎了近二十年后，终于不得不撤离这个或许令他们十分留恋的草原之国，他们带走的是人们的怨恨，没有人会挽留和怀念他们的，这是大多数蒙古人的想法。他们觉得，正是苏联军队给他们带来了不安定的生活，打破了他们宁静平和的草原生活，他们希望苏联军队撤离后永远不要再返回蒙古。

军事上进行占领外，苏联还在文化、科技领域对蒙古进行渗透，企图改变蒙古的原有习俗，把蒙古“苏联化”，同化蒙古。在文化上，四十年代，蒙古废除蒙古文字，改用俄罗斯字母，这在世界史中，是十分罕见的。苏联首先强迫蒙古人从小学就开始学习俄语，蒙古在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的教育大纲中规定，“从小学四年级起，学生就得上俄语课。学校也必须开设俄语课。”那时，蒙古国立大学的某些课程及其所属的综合技术学院的全部课程，都用俄语进行授课。蒙古高等院校各门课程规定的教材和参考书，大部分是苏联出版的俄文书籍。苏联为了从语言上同化蒙古人民，除了在学校对学生进行俄语培训外，还在蒙古举办每期十个月的俄语进修班。一个民族被其他民族所同化，总是从丧失本民族的语言开始的。苏联正是利用语言来消除蒙古族源地流长的悠久文化传统，竭尽全力用俄语去取代蒙古语和蒙古文字，企图让蒙古人忘掉过去、消除蒙古民族和俄罗斯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隔阂感，瓦解懈怠蒙古民族的反抗意识，使他们屈服于现在，屈服于现实，忘掉蒙古民族在历史上辉煌灿烂的时刻。文化上的侵略，远比军事侵略狠毒和阴险得多，其危害性相对也更加隐蔽和巨大。只是蒙古当局仍执迷不悟，怡然自得，视苏联为最可靠的盟友。蒙古教育局声称：“不论过去和现在，苏联的教学经验都起着决定的作用。”完全照搬苏联模式。苏联除了文化上对蒙古进行极为隐蔽和潜移默化的侵略外，还积极培养所谓的蒙古人才，实际上也就是培养苏联在蒙古的代理人。根据1974年的统计，蒙古现任各省委书记中，有百分之六十六是在苏联共产党中央高级党校“陶冶”过的。蒙古政府每年都要派遣大批留学生到苏联留学，接受苏联的教育和思想。这些留学生回国后，大部分都能担任高级官吏。他们自然是苏联政策的积极拥护者和宣传者，并且在蒙古国内大力推行苏联的一切政策和措施。这些留学生才是真正使蒙古紧随苏联的结存所在。蒙古的文学艺术、科技和医务界的一些主要人员，也大多由苏联训练。在蒙古现有的博士和付博士中，有将近百分之九十四的人是在苏联考取并获得学位的。苏联在文化上和科技界控制蒙古，也有其独特的手段和方法。

苏联通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方面一系列的措施和手段，一步一步地把蒙古这个“独立国家”变成了自己的附属国和殖民地。在政治上，苏联在蒙古扶植泽登巴尔上台，作为它在蒙古的代理人，完全控制了蒙古的政治，通过泽登巴尔推行一整套苏联的路线和政策。经济上，苏联利用“经互会”，在“国际分工”和“经济一体化”的幌子下，不择手段地掠夺蒙古的资源，控制了蒙古的经济命脉，使整个蒙古变成了苏联的“大牧场”。蒙古经济完全没有自主权，沦为苏联的经济

附庸。在军事上，苏联对蒙古实行完全的军事占领，把蒙古变成了苏联的被保护国。苏联还在文化科技等领域进行渗透和侵略。可以这么说，蒙古社会的方方面面，无不打上了苏联的烙印。具有悠久历史的蒙古族人民，或许他们已经忘记了他们的祖先成吉思汗的惊天动地的伟绩。现在的蒙古民族，也许缺乏了他们祖先的强悍的传统，变得安稳和懈怠了，世人见此，有时也不得不为蒙古民族扼腕叹息！

二、沉沦

蒙古虽然几十年来一贯紧随苏联，从来没有落在东欧国家的后面。然而，苏联这位大哥却没有真正帮助这位弱小而可怜的小兄弟一把。蒙古几十年来，社会发展十分缓慢，就象那散布在蒙古高原上缓缓而行的骆驼一样。整个蒙古国家就象一个行动迟缓、反应迟钝的老人一样，看不出它有多大的发展变化。自从蒙古独立后，它的经济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反而陷入了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中。苏联的新的殖民经济在东欧多数国家和蒙古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也严重地阻碍了它们经济的发展，尽管苏联在口头上高唱什么经互会各成员国经济将共同高涨，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将“趋于一致”，要提高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以便“大致同时过渡到共产主义”等高调，但是，事实恰恰和苏联所唱高调相反，苏联的新殖民统治严重摧残了这些国家的经济，使它们的国民经济处于越来越恶化的状态中，在蒙古，原有的经济结构遭到破坏，燃料和工业原料严重依赖苏联进口，国内物价上涨，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苏联控制东欧各国和蒙古等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是在“经互会”的幌子下，在“生产专业化”和“经济一体化”的旗号下实现的。所谓“生产专业化”，其实也就是“生产畸形化”和“生产殖民地化”的代名词而已。在“专业化”的要求下，经互会各成员国都按照实际情况，生产苏联所需要的产品。按照这样的分工，蒙古国家最适合发展畜牧业。所以它也就单纯地发展畜牧业经济，成为苏联的“牧场”。其实，受“专业化”之害的又何止蒙古一国呢，原本工业比较发达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已成了苏联的加工厂或附属车间。保加利亚则成了苏联的果菜园，古巴则成了苏联的甘蔗园。这些国家经济的畸型化和殖民化，危害是非常巨大的，由于只搞单一的畜牧业经济，蒙古所需的各种机械设备，就不得不完全依赖苏联的供给。而苏联通过对经互会各成员国的经济援助，趁机把许多陈旧商品推销出去，以转嫁苏联国内的经济困难。由于苏联推销给蒙古的机械设备质量低劣，又不附带零配件，经常损坏，给生产上带来巨大损失，有时因一个重要机件损坏时，影响整个生产，蒙古就不得不用飞机把机件运往苏联修理。因为蒙古国内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厂家。苏联是蒙古拖拉机的供应者。然而，从苏联运往蒙古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汽车等，每年都有大批报废而不能使用。苏联还把一些旧机器油漆刷新一下就当作新机器卖给蒙古，甚至把旧轮胎修补后，就当作新轮胎卖给蒙古。这就是苏联口口声声宣称他同经互会其他成员国的经济关系是什么“国际主义”的“兄弟般的社会主义合作关系”，是“建立在平等和相互支持的基础上”的实质。苏联对蒙古的贸易，有时甚至达到了毫不讲理的地步。1964年，苏联未经蒙古同意就将一批电冰箱运到蒙古，由于蒙古人民并不需要它，所以冰箱根本卖不出去，而蒙古又不敢把冰箱退还给苏联，它不得不用政府的名义买下全部冰箱，而把它们无限期地库存起来。这使得蒙古的资金大量积压，给蒙古的财政也带来极大困难。这就是苏联对蒙古的“大公无私”的帮助。苏联在对蒙古的贸易中，经常搞

这种欺骗性的商品交易，蒙古明知上当，却也无可奈何，只能忍气吞声，站在苏联的屋檐下，它怎么能不低头呢？

蒙古本来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但是，苏联为了向蒙古倾销它的石油和石油制品，在“国际分工”的幌子下，要求蒙古降低和减少石油的生产。因此，蒙古石油生产的下降幅度极为惊人。从1960年到1970年的十年前，石油生产几乎持续下降，1960年，蒙古石油的产量为二万八千吨，1965年则下降为一万四千吨，只有1960年的一半，到了1969年，石油产量只有四千五百吨，只相当于1960年的15.7%，减少了84.3%，到了1970年，蒙古按照苏联的要求，已完全停止了石油的生产。与此同时，苏联供应蒙古的石油和石油制品却不断增加。如果把1966年苏联供应蒙古的石油数看作100的话，到1969年，则达到了132，1970年以后，由于蒙古已停止生产石油，因此，它所需石油和石油制品也就完全由苏联供应。苏联就是采取这样的手段，让蒙古减少甚至停止生产某些燃料和工业原料，而由它供给。这样就完全控制了蒙古某些部门的生产，并且以此作要挟，使蒙古不得不屈从苏联的压力。你使用了我的石油，就得听我的摆布，这就是那时的苏联希望达到的目的。不仅蒙古深受其害，东欧各国也是这样。匈牙利的汽车工业和造船工业本来都有一定的基础，但根据“生产专业化”的规定，匈牙利被迫停止生产小汽车、普通卡车和一千五百吨以上的船只，连国内对这些产品的需要也只能靠进口来得到满足。匈牙利现在也不再生产拖拉机，而只生产拖拉机的制动件。在“生产专业化”的束缚下，东欧各国和蒙古不能生产一台完整的机器设备，而只能生产某种零部件。这就更加深了对苏联的依附程度。例如，根据苏联同东欧各国签订的合作生产小汽车的规定，捷克斯洛伐克只生产汽化器和汽车零件，保加利亚只生产车身和蓄电池，难怪在保加利亚工人中曾流行过这样的政治笑话：“世界上最长的汽车是哪个国家制造的？”回答是“保加利亚——车身在这里，驾驶盘在莫斯科。”这句话生动地刻画了保加利亚依附于苏联的严重性，同时也隐约可以看出保加利亚工人对苏联的不满情绪。

蒙古的畜牧业自然发达，这也是蒙古唯一能引以骄傲和自豪的。然而，在苏联的掠夺下，蒙古的畜牧业也举步维艰，濒于破产的边缘，在苏联的胁迫和勒索下，蒙古甚至将母畜和幼畜一起赶往苏联，结果。在蒙古的畜牧生产中出现了恶性循环，牲畜头数不断减少，根据蒙古官方公布资料，蒙古牧畜头数历史上最高水平是1940年的二万六千多头、到1959年，牲畜头数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下降到二万四千多头；1966年继续降低到二万二千多头，到1968年6月时，就只剩下一万八千多头了，比1940年减少了百分之六十左右。由于供应苏联大量活牲畜，使得蒙古国内也常感到肉类供应不足，以至于蒙古政府号召人们要多吃野兽肉和蔬菜。

这就是蒙古紧随苏联的严重后果，这使得蒙古国内生活水平下降，生产长期停滞不前，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政治生活也得不到正常健康地发展，而且蒙古国内物价飞涨，人们怨声载道。然而，那时的蒙古领导人却仍然执迷不悟，仍然紧紧围绕着苏联的指挥棒转。蒙古为完成第六个五年计划，加紧推广苏联的“新经济体制”和“先进经验”。它的计划规定，在本五年计划内：“基本完成新的计划体制和新的经济刺激体制”，“蒙古人民共和国最重要的任务是在经济领域，政策、意识形态工作，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同行联更加紧密地接近，这是加速蒙古社会经济进步的重要因素。”泽登巴尔在蒙古人民革命党十七大的报告中说：“以在经济领域中全面接近的主要任务为依据，经常就一系列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同

苏联的计划机构和务部门进行协商。深入协调自己的计划，密切协商一体化和其他共同措施，通过文件途径在计划工作领域中用一切方法加深和扩大同苏联的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蒙古同苏联的附庸关系，由此得到完全的显示。蒙古给自己国家的发展，套上了沉重的枷锁。苏联这位庞大的巨人，一直压迫得蒙古喘不过气来，这和七百年前的情形正好相反。当时的蒙古盛极一时，蒙古铁骑，日行数万里，所向者破，所击者服，俄罗斯俯首称臣，欧罗巴惊慌失措。都已经成为历史。蒙古人现在只有凭记忆来回想当年的荣耀了。而对被自己统治了近三百年的昔日的俄罗斯人，今日却受它奴役和欺骗的苏联人，蒙古民族除了摇头叹息外，还能做些什么呢？他们现在自以为找到了新的靠山。谁知却是与虎为伴，自投罗网，把整个国家送进了灾难的深渊。蒙古酿造的这杯苦酒，的确够蒙古人民喝几代的，直到压在他们头上的那位巨人消失，亦或另一位成吉思汗出现。

第三节 在中苏之间

1.反目的巨人

1917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占世界六分之一的广袤大地上建立起来，它使世界为之一惊。三十二年后，又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巨人在东方站立起来了，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当毛泽东那浓重的湖南口音还在天安门城楼上空回荡时，他却乘上了抵达莫斯科的火车，对苏联老大哥进行了正式访问。斯大林以极其复杂的心情接待了这位他曾打心眼里瞧不起的“土”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两双曾令世界震惊的巨手握到了一起。《中苏友好国际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苏两个社会主义的巨人的关系进入了“蜜月期”，苏联答应在经济上援助中国，政治上支持中国，当时在中国普通老百姓中存在着这样的观念，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苏联是老大哥，中国位居第二，朝鲜居第三，蒙古居末。中苏两国度过了一段兄弟般的美好时光。那时，中苏的友好关系令社会主义阵营欣慰，令资本主义阵营眼热得咬牙切齿。岂料斯大林逝世后，风云突变，中苏在评价这位伟人时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亲如兄弟的两国关系出现了难以痊愈的裂缝。斯大林亲自选定的接班人赫鲁晓夫在195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对斯大林进行了尖锐激烈的批判，说要消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但是，中国共产党并不那样认为，毛泽东大手一挥说：“我看斯大林的功过是非，可以三七开嘛。功劳占七成、错误占三成，功大于过嘛。”对此，苏联新领导集团很为不悦。中国共产党还认为，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报告会造成苏联共产党内思想混乱和国际共运内部的混乱局面，从而使帝国主义有机可乘，破坏了国际共运的团结和打击了共产党的威信，还会引起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矛盾和政治上的不稳定。于是中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及《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文，把中共的观点公布于世。中共还不同意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可以经过武装斗争，就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策略。苏共二十大是中苏分歧的开始，它给中苏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1958年，台湾海峡局势紧张，国民党和蒋介石大有反攻大陆的趋势，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游弋，中国驻福建的边防军则向驻守在金门和马祖岛的国民党军队进行炮击。当时，苏联支持中国，苏联政府一再发表声明：“针对英国侵略性的报复封锁……苏联不会无动于衷，决不会袖手旁观。”赫鲁晓夫在给美国总统艾森豪

威尔的信中声明：“对我国伟大的盟友和邻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犯，也就是对苏联的侵犯。”而美国则支持台湾政权。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在这件事情上（指台湾海峡形势），美国迫不得已时不会回避使用武力。”世界大战大有在台湾海峡暴发之势。赫鲁晓夫对此口头上虽较强硬，但内心实是很惧怕美国的，他把美国的军事力量估计过高，于是就向毛泽东建议苏联和中国共同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成立苏中联合舰队，以对付美国和台湾。但当时，中国大陆的空军力量薄弱，根本没有组成联合舰队的可能，而且还牵涉到中国的主权问题，所以这个建议被毛泽东愤怒地拒绝了。从此，中苏关系逐渐走向恶化。1959年8月，中国和印度之间发生了由印度军队越过麦克马洪线侵犯中国西藏，因而和中国边防军发生冲突的流血事件。9月，苏联塔斯社发表声明，在这次冲突事件中偏袒印度，把中苏分歧公开化。1960年6月，苏共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兄弟党会议上，组织了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布加勒斯特会议，给中苏关系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它给两国关系带来了严重的损害，会议结束后，中共代表发表声明：声明中指责赫鲁晓夫破坏协商一致原则。这是中共首次点名批判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恼羞成怒，背信弃义，于1960年7月决定在上个月内撤走全部在华的一千五百名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撕毁中苏间的有关合同和协议。从此，中苏论战急剧升级。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分歧越来越大。1962—1963年的一年里，苏联报刊发表了一千余篇攻击中共的文章。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委员会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在苏联和国际共运内部掀起了反华浪潮。苏共公开信发表后，立即在全国展开宣传，从小学低年级只认得几个字的小学生，到一切学校，一切机关，工厂矿区，不管人们懂不懂，所有的苏联人，统统都被强制阅读这篇文章。中国共产党对这篇攻击我党的文章自然不能等闲视之，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间，连续发表了九篇评论文章，使中苏论战达到高潮。

1966年3月，苏共召开二十二大，中共拒绝派代表团出席，两党关系由此断绝。此后，两党关系的紧张转为两国关系的紧张，苏联不断向中苏边境增兵。除布下百万大军外，还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部署了针对中国的导弹部队。1969年3月，苏军乘坐装甲车和汽车侵入我国黑龙江省的珍宝岛地区，双方发生了大规模流血冲突。由此，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

中苏分歧是必然的。它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因素。从历史上看，苏联政府虽然在帮助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斗争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那是微不足道的。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和苏共奉行的主张有明显的不同。五十年代初，由于相互的需要，中苏度过了一段蜜月期，但那暗中的分歧却是存在的，只要有了土壤，它就会滋长。从个人角度来看，尼基塔·赫鲁晓夫和毛泽东两人的性格是完全不相容的。他们之间不能进行一般建立正常的政治同盟所要求的协商、妥协和合作。伟人们固有的个人行为也使正常的政治分歧变为相互的敌意。两位共产党巨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框架内，对谁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全世界他共产党和民族解放运动产生更大影响而展开了竞争。毛泽东自然不甘永远受制于人，他要和别的领导人一比高低，于是问题关系由亲密走向对抗，最后竟发展到武装冲突的严重局面。

2. 中蒙关系的“蜜月”

1949年10月6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仅6天，蒙古人民共和国就发表声明，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为10天后，即1949年10月16日，和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中蒙两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和协调并建立了的善邻关系。蒙古方面认为，“从今……在我国两国人民的善邻关系中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的蒙古政府深信，蒙古之间的友好关系将会为我们两国人民这个福，为了以后全世界人民的和平和安全的堡垒——伟大的苏联为首的民主阵营的巩固而发展。”蒙古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是相当融洽的。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对外贸易等方面进行了广泛合作。1952年，中国和蒙古的贸易，与1947年相比，面粉增笔不30%，小米增加了42%、烟草增加了47%。同时，蒙古对中国的当口也有所增加。1955年4月，中蒙签订了《关于派遣中国员工到蒙古帮助建设的协定》。根据该协定，中国派遣了大约六千名援蒙人员帮助蒙古在乌兰巴托市建筑了许多现代化的住宅，修建了宽阔坚固的街通、修筑了长这三百七十米的跨线桥。改变了乌兰巴托市街道狭小、弯曲，交通不便的面貌。对中国援工的辛勤劳动和无私奉献，蒙古政府当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1956年8月，中国政府根据经济技术援助协定。向蒙古提供无偿资助一千七百万美元，帮助蒙古建设十七个项目。1960年5月，中蒙之间又签定了《中蒙友好互助条约》、《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及《中国给予蒙古经济技术援助协定》，又无偿给予蒙古贷款二千二百万美元。如果人们仍然没有忘记当时中国国内自身面临的严重困难的话、就会更加理解毛泽东的“国际主义”精神了。9月，中国又根据协定，向蒙古派遣了第二批援蒙人员。前后两次，中国共向蒙古派出了两万多名专家和工人，他们在蒙古高原上忘我地工作着，帮助蒙古建立了火柴厂、砖厂、水泥厂、木材加工厂、修建了沥青公路、现代化桥梁、运动场、体育馆、三十万平方米的现代化住宅等。这段时间，是中蒙关系史上值得那个时代的人们永远回忆和留恋的美好时光。中国对蒙古的援助，不附加任何条件，而且中方援助蒙古所建设的项目，完全是蒙古发展民族经济的急需的一些生产部门。因此，这才真正体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其实中国共产党援助别国，向来是不需要回报的。我国一向遵循“施恩不图报”的传统美德、无私地帮助朝鲜、越南抗击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入侵。又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又非常无私地援助了坦桑尼亚等非洲国家。而蒙古，只不过是接受中国援助的众多国家中的一员而已。

3. 反华的急先锋

但是、中苏关系紧张后，蒙古政府就忘掉了中国对它的援助，以怨报德，把中蒙之间的友好关系一笔抹杀，对中国援蒙人员的贡献视而不见，竟把他们全部驱赶出境。蒙方领导人纳·沙格达尔甚至还说：“一万八千名中国工人在我国工作的九年期间，对于我国工人建筑技术方面，没有表现出多大的热情。……中国同志在教蒙古工人时表现出的为难态度，认为带徒弟会减少自己的工资收入……。中国干部们对蒙古工人抱着这样冷淡的态度，而他们的上级人员还得意洋洋地说，中国工人在蒙工作期间，是根据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为蒙中团结做出了贡献，这表明中国同志的言行是多么不一致。”这和中苏关系，中蒙关系没有恶化前时对中国工人的评价，简直判如天壤。特别是泽登巴尔上台后，追随苏联，猖狂反华，完全破坏了两党和两国关系。在中苏大论战中，蒙古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进行了大肆攻击，有些言辞的激烈和尖刻程度，甚至超过了中国主要论战对手苏联。

中苏分歧公开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除了阿尔

巴尼亚共产党外，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都支持或倾向于苏联共产党。自从苏联共产党的公开信发表后，夹在中苏两大国之间的蒙古，更是积极依附苏联，在报上发表了数千篇反华文章，配合苏联反华。蒙古《真理报》及其他报刊杂志，在中苏分歧中，公开站在苏联一边，拼命开动全国所有的宣传机器，对中国共产党进行诬蔑和攻击，同时挤命鼓吹苏联的对内对外政策，歌颂蒙苏的“伟大友谊”，允许苏联军队驻扎在蒙古。使中苏关系也象中苏关系一样，达到了非常紧张的地步。

苏共公开信发表后，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有些国家党的领导人屈从苏共领导的指挥棒，奉行苏联的旨意，在本国内掀起了疯狂的反华浪潮，在舆论上进行了猖狂的反华宣传。据不完全统计，到1964年7月，世界上已经有六十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发表了各种各样的反华材料。一时间，中国共产党似乎处于“四面楚歌”之中。前有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后有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围攻和指责。中国当时的处境的确是相当艰难的。特别是蒙古这个曾经和中国一度十分友好的国家，更是紧随苏联。泽登巴尔在1960年布加勒斯特苏联组织的围攻中共代表的会议上，助了苏联一臂之力。此后，随着中苏分歧的尖锐化和论战的升级，泽登巴尔及蒙古的宣传机构的调子也越来越高，反华的口气也越来越猖狂。1963年1月，泽登巴尔在一次讲话中，污蔑中共“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7月，蒙古《真理报》秉承政府旨意，发表了《苏联共产党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致的热情捍卫者》的社论，社论中说：“近来，中共领导人在诸如和平并处、战争与和平、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任务和发展、反对个人迷信的思想和实践的斗争，世界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战略和策略等切身重要原则问题上奉行着同苏联和世界共产主义。工人运动截然相背的危险的错误政策。”社论在指责中共的同时，还对中共进行了攻击，说中共“挑起分歧”，其使用的字句之毒，足令天下文人寒心：“某些愚笨的、只啃书本的教条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共产党、共产党的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正确政策，进行歪曲，颠倒黑白，制造出这些党所没有做过和说过的东西强加给他们，进行直接诬蔑。这些人，恬不知耻对世界共运和工运的先锋队——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共产党、工人党，以共产党人口中不能说出的话进行毫无根据的恶毒的咒骂。”

1963年，苏美在莫斯科签订了一个《禁止在大气层、宇宙空间和水下试验核武器的条约》。众所周知，当时世界上拥有核武器和核试验能力的国家只有美国 and 苏联。中国正在发展自己独立的核工业。很明显，苏美的这个禁止核试验条约，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是美苏为保持自己的核垄断地位，对别国进行核威胁和核讹诈，其主要针对的即是中国。曾经有传言，说苏联准备在中国还没有发展起核工业时就把建立在我国西北戈壁的核基地摧毁掉。基于这样原因，中国政府当然反对这个条约，于是中共又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攻击。蒙古《真理报》发表社论，对该条约的签订，“蒙古人民表示祝贺和赞成”。面对中共，则进行了诬蔑：“中国领导人追随美国和欧州的极端反动分子，借用他们的词藻，全力反对这个条约，粗鲁地诬蔑苏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一切和平力量，进行除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阵营的仇敌以外在其他任何人嘴里也说不出来的虚伪的诬蔑，用伪善的词藻大喊大叫。这是极其可耻的。是反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行为。”同一篇社论中还说：“尽管中共领导人大喊什么我们正要为和平而斗争之类的伪善的话，但是粗鲁地反对采取符合人们的和平利益并得到了他们广泛同情和支持的具体步骤，用最恶劣的词句攻击和诬蔑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其他社会主

义阵营的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是极其卑鄙的丑恶行为，受到蒙古共产党人和全体人民坚决地谴责和驳斥。”还说：“中国领导人反对该条约，这说明了他们在和平共处方面所说的只不过是夸夸其谈、漂亮的词藻而已。”更有甚者，蒙古报纸竟诬蔑中共和西德、法国勾结，同西方帝国主义一唱一和，共同反对该条约。蒙古《真理报》在《这是谁同谁勾结起来了》的文章中说：“中国领导人直接否定莫斯科条约，他们的行动旨在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涣散和平的队伍。正因为如此，使帝国主义者高兴。根据这些事实，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同志的纠缠不休的顽固的教条主义和左倾宗派主义不断滋长，使得他们在国际舞台上同西方反动派的刽子手结合起来，把他们推到了在复杂的问题方面犯严重错误的可耻的道路上。中国同志和西方狂人（指戴高乐）一唱一和、从他们反对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任何措施来看，谁同谁勾结在一起，那不是很明显吗？”

“中国领导人唱的是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唯一战士，而其行动却是支持竭力想取得核武器以及大量生产和试验核武器的波恩和巴黎当局的疯狂政策，明里暗里咬牙切齿地咒骂为禁止核试验而斗争的人们。”在和平外交政策和《禁止核试验条约》这个问题上，蒙古对中国进行了大肆攻击和诬蔑，对我国当时的外交政策大加指责，并且在各种国际会议上，与苏联及所谓社会主义阵营一唱一和，对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大加责难和破坏，处处维护和附和苏联的建议，使中国的外交进入了困难时期。

同时，蒙古政府还极力评蔑中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形象。1963年8月，泽登巴尔为苏联《真理报》撰文，攻击我党是“教条主义者”，诬我对苏联进行“没有根据的恶毒指责。”“中国政府的多次声明和最近所作的宣传活动，都是旨在分裂国际共运的团结，歪曲国际共运的先锋队——苏联共产党及其他兄弟共产党、工人党的正确路线，破坏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现代教条主义者歪曲正在实现苏联建设共产主义的纲领的苏联人民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蒙古政府就是这样、在攻击和诬藏中，总忘不了歌颂和吹捧苏联，处处向苏联表功，显示出一副忠诚模样。

蒙古除了对中共进行空洞的词藻上的咒骂外；还对中共制定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建议、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进行大肆攻击。因为它脱离了苏联的控制，摆脱了苏联模式、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发展经济，于是泽登巴尔又迫不及待地充当了攻击中国总路线的急先锋。1963年9月4日、泽登巴尔在莫斯科对记者谈话，就公开攻击我奉行“同社会主义隔绝的、单靠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同时，蒙古报刊煽风点火，大造声势，批评中共的总路线。《真理报》说：“反对国际主义运动总路线”，就其思想内涵来说，是忽视世界历史发展的新阶段的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中国领导人的思想，政策活动是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所以，在经济上是有害的。政治上是反动的。”“中共的自力更生理论，是同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格格不入的，在理论上是极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危险的，在经济上是极为有害的。”就仅仅因为中共不屈从于苏联的指挥棒、就引来了这么多兄弟国家的围攻，显得是多么可笑。有的人自己甘心作了奴仆还不算，还想把天下没有做奴仆的人都拉来同自己一道。他们最恨天下的自由人了。

1963年2月，蒙古人民革命党举行第十四届五中全会，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共领导人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制造的分歧和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立场》的反华决议，使蒙古的反华言论达到了高潮。这个决议中，蒙党攻击中共妄图在国际共运中“占据领导地位”，“残暴地干涉”兄弟党和别国内政，从而把分歧由党内关系扩大到国家关系上，严重影响了中蒙关系。决议中说：“中共妄图在国际共运中取得统率地位，尽其所能在全体进步人类面前贬低伟大的列宁党的威望，对世界共运一致公认的先锋队——苏共进行了最卑鄙的诬蔑和攻击……。”并且说中共给国际共运造成了危害：“中共领导人通过自己的冒险政策和分裂活动，对加强世界社会主义各国和国际共运队伍的团结一致的事业和社会主义及民族解放革命的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害。”这个反华决议，竟堂而皇之地摆在了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四届五中全会的议程上，不过当时却没有分发表，是秘密通过的。也许是蒙古党和政策的领导人内心也没有底吧。到底是谁破坏了中蒙两国的友好关系，人们一眼就能看出，可世上偏有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指鹿为马的事。蒙古部长会议副主义图·拉格查在庆祝蒙古人民革命四十三周年集会上竟然说：“中国领导人恶化同我国的关系，执行扼杀贸易和经济的政策，给蒙中人民的友谊带来瑕疵。”大约他当时喝多了苏联的伏特加酒，难怪他胡言乱语了。

到了1964年4月到7月，中蒙关系更加恶化。蒙古方面单独撕毁了双方签订的各项合同和协定，将中国的援蒙工人全部赶走，并把大批披着“建筑人员”外衣的苏联军队引进蒙古。中蒙关系几乎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9月，蒙古撤回了驻中国内蒙古呼和浩特的总领事，中国也就随即关闭了领事馆。更为可笑的是，泽登巴尔在1966年6月召开的蒙党十五大的报告中，别有用心地攻击中共奉行“民族主义一大国沙文主义”政策，并颠倒是非，反诬我撤走援蒙员工使蒙古建筑部门“缺乏技术人员”。他说：“中国领导人滚到大国沙文主义，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左倾托洛茨基主义和狭隘的利己主义的泥潭中，在背离马列主义原则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蒙古人民革命党还不顾基本事实，捏造、诬蔑中国对蒙古怀有领土野心，“中国领导人咬牙切齿地憎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和领土的完整，并怀有根本不能实现的逐步加以吞并的野心。只要汉族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得以实现，中国领导人是不惜玩弄别国人民的命运的。这好象是他们的愿望，在大小民族的关系上，中国领导人奉行的原则就是这样的！”当时，蒙古在国内大造中国将要入侵的谣言，在全国制造恐怖气氛和反华浪潮。在蒙古人民心中制造对中国人民的憎恨和恐怖。蒙古政府就是利用这种欺骗宣传的手段，愚弄了蒙古的广大人民，同时合法合理地把苏联军队引进了蒙古，请求苏联保护其家园。更有甚者，蒙古竟把中国比作帝国主义看待，他们的报刊和杂志说：“只能这样理解他们（中共），如果需要的话，不仅他们自己独吞，而且为了讨好法国、西德和日本之类的帝国主义，同它们合作分赃也在所不惜。”并且就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人一事，蒙古通讯社发表声明，诬蔑毛泽东在谈话中对蒙古有领土欲望：“毛泽东在谈话里直接了当地提出了毫无根据地兼并和扩张毗邻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土的欲望。”尽管这些诬蔑和攻击在今天看来是多么软弱和苍白无力，可在当时，它却能起到蛊惑人心，混淆是非的消极作用，从而引发边界的紧张气氛。

此后，泽登巴尔集团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诬蔑和攻击有增无减。1973年4月，蒙古人民革命党召开了第十六届五中全会，泽登巴尔在开幕词中攻击中国，并叫嚷要“不断地揭露X集团对伟大十月革命的祖国——苏联、蒙古和其他社会主义国

家，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破坏活动。1976年6月，蒙古人民革命党召开十七大，泽登巴尔在会上继续猖狂反华，他在报告中攻击中国“敌视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全的力量，竭尽全力来破坏一切革命力量的团结，破坏缓和，散布各国之间的猜忌敌视，挑动世界热核的毁灭。”并且诬我和帝国主义勾结。在十七大的报告中，说中蒙关系时，泽登巴尔说我国“明目张胆地同坚持种族歧视的法西斯集团、顽固的反动势力，以及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公开勾结。”对中国的攻击，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蒙古人民革命党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给中国共产党加了许多封号，诸如“现代民族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国际机会主义者”！“分裂主义者”之类，不一而足。实际上，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空泛的攻击，是蒙古政府为配合苏联而宣扬的俯拾苏联牙慧的陈词滥调，客观上说，蒙古政府只是苏联反华浪潮中的一颗小卒子而已，是苏联政策的附和者和传话筒而已。

蒙古政府除了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进行了毫无根据地攻击和诬蔑外，还极力讨好苏联，处处迎合苏联的意旨，“言必称苏联”，竭尽吹捧苏联之能事，即使蒙古政府在用最恶毒的语言攻击中国的时候，它也没有忘记用最美好的最动听的语言去歌颂苏联。蒙古的报纸、杂志和它的领导人的讲话中，处处把苏联共产党挂在嘴上，时刻念叨，并且还给苏联共产党的头上套上了极其耀眼的光环，使得其神圣化和不可侵犯了。我们仅摘出一小部分蒙古报刊杂志和其领导人对苏联共产党尽力吹捧的言论，就足以见其表里和耐人寻味了。蒙古报刊不止一次地宣称：“苏联共产党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致的热情捍卫者”。竭力吹捧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说：“在社会主义各国的发展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开创新时代的苏共二十大的决议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的决议，特别是苏共纲领，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华，是给苏联人民指出了建设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的杰出文献。”它又吹捧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是维护世界和平和保卫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堡垒：“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究竟依靠什么力量在同资本主义进行和平的经济竞赛而向前发展着呢？帝国主义害怕什么力量而不敢发动战争呢？这应该归功于强大的苏联，”真有点到了恬不知耻的地步。就在蒙古报刊大肆吹嘘苏联为世界和平的可靠堡垒时，却爆发了由苏联引发的“加勒比海危机”，这对蒙古的宣传、无疑是绝大的讽刺。明眼人早就清楚地认识到了到底是谁在世界各地进行扩张和侵略活动。除了象蒙古这样的“吹鼓手”之外，恐怕没有，也不会有别国的报刊和杂志那样卖力地、不合时宜地称苏联是“和平的可靠堡垒”。而且还不止此，蒙古还把苏联共产党抬到了更高和无法相比的地步，称苏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先锋队”，是一面“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胜利的旗帜”。且不以蒙古人民革命党对苏共俯首为巨，心甘情愿奉苏共为其领导，就是它所说的“公认”，怕也是牵强附会，差强人意，也就是它一家“公认”而已，蒙古政府还极力夸大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作用：“苏联共产党在过去和现在一直以它的明智政策和卓越的战斗活动给人类提供了和平自由和发展进步的可靠前景。”“苏共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经验最多和经过锻炼的一支队伍，它过去是，今后也仍然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公共的先锋队。”

蒙古政府还强调蒙苏之间的“友好”关系，并且说它“始终不渝地支持苏联的政策。”就差没有说是苏联的随声附和者了。在蒙古的各种刊物和领导人的谈话中，

多次提到所谓的蒙古友谊：“伟大的苏联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忠实的良友和可靠的支柱。”“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每一个劳动人民都清楚地知道，如果我国人民不把自己的命运同苏联结合在一起的话，也就不可能有独立自主的蒙古国家，也就不能取得象现在这样的成就。”“蒙古人民共和国劳动人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了解到，苏联真正尊重弱小国家人民的独立和平等权利，对他们实行着真正友好的兄弟般的政策，并在其发展进步中给予全面的真诚援助和支持。”也不知蒙古政府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否出于他们的真实想法，但在1976年6月召开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十七大上，泽登巴尔又重新强调了同苏联的关系，他在报告中称：“过去的五年是蒙苏关系大幅度发展的时期，在这段时间内，蒙古同苏联建立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合作，出现了新的形式，产生了新的内容，从而大大地丰富和扩大了这一合作。”泽登巴尔还极力吹捧苏联对蒙古的援助，称蒙苏合办的额尔敦特钢铁矿是“伟大友谊的象征”，说蒙苏协调国民经济计划是“特别重要的收获。”

在中苏关系紧张和中苏论战中，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政府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坚定不移地站在苏联一边，附和苏联反华，不仅在理论上为苏联拾遗补缺、煽风点火，而且在实践上，让苏联军队进驻蒙古，直接制造了中蒙两国边界的紧张气氛。蒙古紧随苏联，大肆攻击和诬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给两党和两国的关系留下了难以弥补的裂缝，使中蒙两国的关系经历了一段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这也是那个时代，在那种特殊环境下的特殊产物。

外蒙古独立内幕（11） 第十章 失落与困窘

第一节 多米诺效应

一、震撼世界的东欧剧变

历史缓慢地但却是顽强地向前发展着，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集团在对抗中互求生存。在军事上，两大集团之间可谓势均力敌，互不相让。你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我就有华沙条约组织与之相抗衡。但在经济上，东欧社会主义集团各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却远远地落后于资本主义各国，且差距越来越大，引起了东欧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对本国政府的不满。在这种情形下，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不得不吹响了改革的号角，力求摆脱经济的困境，寻求新的发展道路，这为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政策”找到了突破口。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世界政治风云变幻，最引人注目的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在瞬间瓦解了。长期困扰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和政治上的改革，使社会主义各国“和平”或“流血”成为资本主义国家。1985年，年轻的苏联新一代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提出了他的改变世界格局的“新思维”。重新制订了苏联的对内对外政策，放松了对东欧各国和蒙古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控制。于是各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仿效苏联，实行改革。自然，只有经济领域里的改革是远远不够的，人们对本国政府又提出了政治上的变革要求，

社会主义各国内部各种势力借机纷纷起动，还出现了反对共产党一党统治的反对派组织，加上西方世界的推波助澜，使社会主义各国的改革更加复杂化和尖锐化。在短短的几年间，东欧各国及苏联的共产党都丧失了执政地位，有的沦为在野党，有的被取缔，有的改名为社会党，各国政局变化之快，变化之大，出乎世人的预料。一时间，东欧各国及苏联上空浓云密布，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几成众矢之的，我们首先来看看东欧及苏联发生的剧变经过：

首先被西方打开突破口的是波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波兰经济陷入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反对共产党执政和团结工会在席卷全国的浪潮中宣告成立。其主要领袖为工人出身的瓦文萨。团结工会成立后，成为波兰共产党几十年未遇的强有力的政治对手。团结工会迅速发展和壮大，引起波兰政府的恐惧和镇压。团结工会十年来的历史，正如它的外文名称中的第一个字母“S”一样，经历了一个兴衰沉浮的曲折过程。它曾经盛极一时，会员遍布全国各地，后又江河日下，被共产党执政的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而被取缔。瓦文萨也尝到了铁窗的滋味。但在风云变幻的1989年，它竟又东山再起，并通过合法的选举，击败了共产党，夺权成功，取代了执政达40年之久的波兰共产党——波兰统一工人党，从而使波兰这个拥有二千八百万人口和三十一万平方公里土地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改变了发展方向，1990年11月，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当选为波兰总统，波兰的社会主义制度消失了。瓦文萨在波兰实行完全的经济改革，并大量向西方外国求援。正当波兰脱出社会主义大家庭时，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教堂里却钟声齐鸣，此时正是1989年6月16日中午12时，匈牙利政府和人民为纳吉举行了“隆重的重新安葬仪式。纳吉是匈牙利的领导人，于1956年被宣布为犯有“组织推翻匈牙利人民民主国家制度罪”和“叛国罪”而处死。现在匈牙利政府却为他彻底平反，称他是“杰出的国家领导人”。并且为他举行隆重的国葬仪式。这是匈牙利政府改变发展方向的信号。此后不久，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就丧失了执政党的地位，沦为在野党。匈牙利也紧步波兰的后尘，驶向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方向。

就在同一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人昂纳克、克伦茨先后被迫辞职，共产党在东德的统治岌岌可危。两德统一，拆除“柏林墙”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势不可挡的洪流面前，1990年10月2日迈向3日的夜晚，对于近八千万东德和西德的人民来说，非同寻常。当时针指向3日零时时，在柏林帝国议会大厦前，伴随着联邦德国的国歌声，特制的旗杆上徐徐升起了黑、红、黄三色的联邦德国国旗，分裂了45年的德国重新统一了。于1949年10月7日成立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从此从世界地图上消失了。前民德共产党领导人昂纳克被迫到苏联避难，后又被遣回到德国，被柏林地方法院审判。民主德国合并于西德，前民主德国的共产党的地位一落千丈，到处受到歧视和排挤。社会主义大家庭又少了一个成员。强大的日耳曼人是否会重温当年日耳曼帝国的美梦，欧洲及其周围国家不禁心惊。

1989年圣诞节的前几天，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首都布加勒斯特突然炮火连天，枪声大作。原来是反政府武装同保卫政府的军队之间由于人们的示威游行而爆发出激烈的战斗。此时，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正在伊朗访问，他急忙飞回国内进行弹压，但形势已无法挽回，情况越来越有利于反对派。就在圣诞节那天，执政近25年之久的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被推翻，他和他的妻子被反对派救国阵线逮捕，几天后被秘密处死。又一个共产党国家从地球上消失了。此外，保加利亚、

南斯拉夫、捷克斯路伐克、阿尔巴尼亚等国的共产党，也都逐渐失去了执政党的地位。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消失了。

面对东欧的剧变，作为其领袖的苏联难道就甘心袖手旁观吗？苏联眼看一个个小兄弟背他而去，岂有不心痛之理？奈何苏联自身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无暇顾及东欧。自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实行激进的改革措施，苏联国内固有的各种矛盾重新暴露并且日益尖锐起来。其中尤其是民族矛盾、改革派和守旧派之间的矛盾特别突出。1991年8月，共产党保守派发动了一场不成功的政变，企图推翻戈尔巴乔夫的统治，但这场政变很快就失败了，政变只维持了两天就失败了。戈尔巴乔夫重新执政，但他的政治地位也不牢固，于91年度被迫辞职，让位于更加激进的改革者叶利钦。1991年，苏联解体了。一个在地球上横跨欧亚大陆、占据10个时区的超级大国的分裂，宣告了从1922年起就在这块国土上飘扬了近70年的镰刀和锤子的苏联红旗的消失。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的这面红旗，于1991年12月25日，在凛冽的西伯利亚寒风中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凄凉地随着雪花降了下来，代之而起的是白、红、蓝三色的俄罗斯旗帜，存在了六十九年的苏联正式解体，一个庞大的、统一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从世界地图上消失了。前苏联就象一只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外强中干，分裂为十几个独立的国家。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有的已发展成武装冲突。苏联的共产党也被宣布为非法。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至此也放弃了当初其缔造者的最初愿望，走向了他们愿望的反面。这样，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如泥沙所筑的大厦，一夜之间，消逝得无影无踪。其变化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尤其是对第三世界来说，更是特别严重和深刻。

二、树倒猢猻散

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各国的剧变，使这些国家陷入更深的危机之中，前东欧各国的经济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恢复，而前南斯拉夫一直战火不断，前苏联各国国内物价飞涨、货币贬值，人民生活困难，经济改革也一时难见成效。前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联邦国内也面临困难，它自身还要靠西方的援助度日，所以没有能力再象以前那样去援助别国了。这对蒙古、越南、古巴以及非洲一些专靠苏联贷款和援助的弱小国家来说，不啻是雪上加霜，屋漏偏逢连阴雨。我们知道，蒙古国家所需的日用消费品中，百分之八十是依靠苏联提供的，现在俄罗斯自身难保，自然无暇顾及他人。前苏联于是就减少甚至停止了向蒙古出口石油等工业产品和日用消费品，这使得蒙古叫苦不迭，却又有苦难言，给蒙古的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影响。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宾巴苏伦由于无法解决经济问题而提出辞职，他在辞职中谈到蒙古的经济危机，达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1991年，工业总产值下降10%以上，贸易总额下降60%，国民收入减少约13%，全年国民总收入只有1.8亿美元。”他把这一切都归因于东欧和苏联的剧变。并且还说：“事实已经证明，政府没有能力充分保护其人民和国家在历史进程中免遭由激进的改革引起的动乱之苦。”的确，经济危机给蒙古国家带来了灾难。一九九一年底到九二年初，蒙古广大地区又遭受了三十年来最严重的暴风雪灾害，更是雪上加霜，使其经济危机加剧。

我们来看看由于苏联的解体而给蒙古人民带来的危害：

我们已经知道，前苏联由于实行所谓的“生产专业化”和“国际分工”政策，

使本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蒙古放弃了石油的开采，所需石油及石油制品全部由苏联供应。苏联解体后，其国内的石油生产锐减，供应本国需要都还不足，哪里还有剩余石油供应蒙古呢？由于前苏联的石油供应锐减，蒙古全国发生了严重的石油短缺，不得不对全国的燃料实行限额配给。蒙古国营石油进口公司官员说，蒙古目前只有不到两星期的天然气和其他燃料储备，如果不从俄罗斯进口石油的话，我们不得不骑马。现在蒙古的公路和空中运输减少，天然气实行定量供应。蒙古人由于缺少石油，不得不以马代车，甚至又回到几百年前的生活状态中去。

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至乔巴山市的公路上，停着一列长长的车队，造成交通中断。后面汽车里的司机不知出了什么交通事故，只得耐心坐在车里等候，虽然牢骚满腹，却也无可奈何。过了许久，他们才明白，原来并非出了什么交通事故，而是前面公路旁有一加油站，大量汽车涌到该站加油，而加油站却无油可加，因而发生了争执，以致造成交通阻塞堵车现象。因为直到现在，半年时间内，前苏联还没有供应一吨石油或天然气给蒙古，蒙古人象疯了似的，四处寻找石油。他们现在才体会到，石油比水珍贵的道理。与此同时，乌兰巴托整齐宽敞的大街上、高头大马牵引的中世纪时的四轮马车重又耀武扬威地夹杂在汽车行列里流动，特别引人注目。在首都乌兰巴托机场，候机的人们正在焦急地翘首盼望，离飞机预定起飞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可那架停在跑道上的飞机丝毫没有要起飞的迹象，它静静地躺在那里，懒懒地看着人们在它身旁踱来踱去。焦躁不安的乘客们不时和机场工作人员发生争执，一位工作人员苦笑地说：“我们也希望飞机升空，要是它不需要燃料的话。”乘客们只好摇头叹息离去，望着蒙古高原深邃的天空出神……。由于燃料供应困难，蒙古国家航空公司无限期地停止了国内航班的运行。由于苏联的解体和供应燃料的减少，不仅使蒙古深受其害，其他原来主要受苏联援助的国家也出现了同蒙古类似的情况。据报道，古巴首都哈瓦那街头最近突然增加了骑中国出产的自行车上班的人流。原因也是苏联对古巴的石油供应锐减，使古巴人只能望着汽车兴叹，不复不恢复传统而古老的交通工具，向中国进口大量的不需要任何燃料的自行车。哈瓦那街头的自行车和乌兰巴托街头的骏马，引起了人们的深深思索。

一天早晨，乌兰巴托市委书记走进他那位于市中心的市府办公大楼内，得意而舒适地往柔软的沙发上靠去，随后习惯性地取去桌上秘书为他准备好的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机关报《真理报》，这是他每天必须完成的例行工作之一。当他拿起报纸，扫了一眼报上的日期后，却发现报纸是过时的，于是他生气地唤来了他的秘书，责问他为什么没有把当天的《真理报》准备好。秘书委屈地说，当天的报纸，邮局没有送来。书记大怒，立即叫秘书打电话到邮局责问，邮局也正在抱怨说，印刷厂没有将报纸送到。于是层层追查，最后竟查到国家新闻工作者联合会头上。原来，当天的报纸根本就没有出版。这在蒙古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原因却非常简单，就是国家的新闻纸已经用完，印刷机不得不停工。蒙古使用的新闻纸几乎全部从苏联购买，苏联解体后，蒙古的印刷工业受到严重影响。由于没有纸张，而蒙古国家自己又造不出质量高的新闻纸来，许多印刷工厂不得不关机停业，工人失业，工厂停工，报刊、杂志停办。蒙古政府宣布，除国家的主要报刊杂志如《真理报》、《党建生活》等外，其他民间刊物，一律禁止出版发行。这并不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是出于纸张短缺的缘故，蒙古政府采取的迫不得已的措施。

蒙古国家的经济由于苏联的解体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中。燃料短缺，食品供应不

足，电力供应中断，物价上涨，生产下降，百姓怨声载道。人民对新政府的改革信心日益不足。从前衣食不愁的蒙古人，现在不得不为一块面包而奔忙。从前擅长豪饮的蒙古牧民，现在不得不为一瓶“伏特加”酒而大打出手。商店里的货架，陈列着数量不多的食品，而却有那么多的人在店门外对它虎视眈眈。身着裘皮服装的牧民们在蒙古一个小镇——哈沙特上唯一的一家百货商店里耐心地排着队，等着购买定量供应的每户一磅的阿富汗葡萄干。这是他们那年冬天所能期望得到的唯一干果了。而同样的景象在首都乌兰巴托也出现了。五十名市民在中央百货商场等着购买牛奶，是否有货，他们也没有把握。蒙古这个人均拥有牛的头数居世界第五位的牛生产大国，竟然没有牛奶喝，确实出人意料。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有些气愤但又无可奈何地说道：“我排了一整天的队，可什么也没有买到。”在蒙古各地，人们到处都能听到同样的议论，等着买东西的队伍越排越长，物价却发疯似地往上涨。而货架却空空如也。人们再也不能悠闲地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策马奔驰，再也无心欣赏那美丽的草原风光了。他们不得不花最大的精力来寻求食物，满足人类最原始的需要。

在蒙古实行市场经济的第二个年头，食品店门前一大早就挤满了等待购买红茶和面包的人们。对他们来说，迟到一步就可能面临无情的饥饿，在这场杂乱无章、争先恐后的“面包之战”中，有人甚至被拥挤不堪的人踹成重伤，送进医院。有的商店的窗户、门锁因而被挤破，被砸烂，到处是因饥饿而发疯的人群……。根据蒙古官方统计，1992年第一季度，蒙古猪肉、鸡蛋的供应量分别只有132.8吨和410万个，比去年同期减少489吨和250万个，乌兰巴托市酸牛奶供应量比去年减少170万升，只有300万升。由于能源供应不足和原材料匮乏，日用品和食品的生产仍在不断下降，食品价格在实行自由价格以后却上涨了百分之八十左右，而且还在持续上涨。但在食品商店里，货架空空，而在一年多以前，货架上还可以看见黄油、果酱和各类罐头等食品。现在，蒙古全国人民只能凭每月发一次的购物卡购买少量食品。1992年5月，每人可购买一等面1.7公斤，大米200克，四人以下的家庭可购买一瓶酒，五人以上的家庭可购买两瓶，每家可购买2包烟和二十盒火柴。而在4月份，每人还可购买一等面2公斤，大米400克，此外还有植物油、奶粉、香皂等。这个一向以肉、奶为主食的民族，如今每月只能限量供应2.7公斤肉。现在人们要用一半以上的工资和更多的精力为填饱肚子而奔波。严重的经济危机使乌兰巴托市46%，即六万四千五百个家庭的生活水平降到每月347图格里克（1美元：40图）的贫困线以下，有1.6万个家庭的人均收入不足200图。由于摄入量的不足，目前蒙古人至少有30%营养不良，目前蒙古人均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日摄入量，比世界平均低75%、96%和78%，蒙古人现在生活在半饥饿状态之中。蒙古现在什么东西都缺，甚至其特产的肉类和乳制品也无处可购。食糖、食油和黄油，以前是定量供应、但是随时能买到，现在只能在黑市上找到它们、其价格之高是大多数人不敢问津的，俄国人已停止供应石油、天然气及使蒙古炼矿保持正常运转所必需的零配件，造成能源短缺。这在冬季气温有时达零下40度的国家里可能威胁到人的生命。住宅区和工厂停电已是常事。人们对此也习以为常了。与此同时，浪费现象却相当严重。政府部门的暖气过热，大多数窗户整个冬天都敞开着。没有一个人想到要关掉那些照亮乌兰巴托夜空，纯属宣传性质的巨型霓虹灯。虽然乌兰巴托市的夜空星光灿烂，可又有多少蒙古包和住宅区被黑暗的阴影包围着呢？相对来说。农村居民的情况比城市居民要好一些。虽然蜡烛、香烟这类生活必需品很难搞到，但奶、肉、柴不缺，他们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汽油。这样，他们就有可能中断同城市的联系。

蒙古民族本是一个豪爽善饮的民族、但由于经济的困难，政府也不得不实行配酒制度。每月每家定量供应两瓶伏特加酒，这虽不能满足蒙古人的需求，却也令他们神魂颠倒。为了得到剩余的伏特加酒，蒙古人聚积在临时销售点周围。那里很快余出现在雪中和碎酒瓶中发生冲突的场面，经过一番艰辛的搏斗，成功地夺得战利品者情不自禁地在一种胜利与失望交织在一起的气氛中，就地对着瓶口喝起了伏特加酒。近年来，为一瓶酒而伤人的事在蒙古已多次发生，甚至有顾酒不顾命的。人们最原始的激情都发泄到了喝酒上。人们的金钱意识强化，亲情友情淡薄。在家庭矛盾和生活压力下，一部分人铤而走险，少数人甚至自寻短见。为了自我生存，大家各自奔波，很难想到别人。

由于经济恶化，生活水平的下降，还带来了失业、犯罪率上升以及家庭关系紧张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据蒙古劳动部门统计，1989年，有失业者2.64万人，而到1992年5月已上升到8万人，年底将达12万人。这对一个只有215万人口的国家来说，不啻是个沉重的负担。自93年以来，盗窃公私财物的案件分别增长了百分二十二和百分之七十二。据估计，在拥有50万人口的首都乌兰巴托市，诸如凶杀、盗窃、强奸之类的暴力事件约上升了50%，蒙古社会也处于动荡之中。

在苏联在减少蒙古石油、原材料、日用消费品供应的同时，还大量撤走在蒙古的专家和技术人员，给蒙古的经济带来更加严重的影响。在1992年4月，约有六千名苏联专家滞留在蒙古，而他们在不久的将来也要离去。而在一年前，前苏联在蒙古的专家却有一万四千多名。他们的撤离，使蒙古的数十项工程，从公共住房到首都重要发电厂的新锅炉，多半被放弃了。有的大型工程刚刚建设到关键时候，苏联专家却两手一拍，双手一挥，“拜拜”。蒙古自己又没有能力接着苏联留下的工程干下去，只好干瞪眼看着那些欲罢不能，弃之可惜，欲干不能的工厂工程出神。这给蒙古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在苏联帮助下建成并在过去由苏联技术人员管理的许多蒙古工厂正在仓促地培训蒙古工人，以便接管工厂。剩下的前苏联专家也正在离去，因为没有人向他们支付工资。他们可不愿意留在蒙古挨饿，于是就不顾蒙古政府的苦苦挽留，还是和这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告别了。他们走了，他们给蒙古留下的，是一座座未建成的厂房，一堆堆苍白的图纸；蒙古人深深地感到，现在一离了苏联专家，蒙古的经济建设就会受到极大的冲击。这也引起了蒙古政府以及其他主要依赖外国援助的国家的深深思考。在80年代中期，苏联的帮助相当于蒙古国民收入的30%，而现在，由于前苏联自身的困难状况，这种援助停止了，蒙古国没有了外来的依靠，对它的经济发展是个沉重的打击。

蒙古几十年来一直是苏联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卫星国，一切东西都依赖苏联的供应，蒙古由于自身历处的地理条件的限制，对外依赖性特别大。但执政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几十年来奉行对外只依靠苏联的政策，使自己失去了走向世界的大好机会。严格说来，蒙古国家几十年来仍处在比较封闭的状态中。与世界各国的联系极少。故而，苏联的解体才会对蒙古造成那样大的危害。蒙古的经济在苏联解体后继续恶化。92年头6个月中。蒙古的工业产值回去年相比，减少了23.7%，物价上涨了122%。经济危机的根源，人们普遍认为在于它同一度是其思师的前苏联的关系已陷于崩溃。不仅如此，据世界银行估计，仅1991年，蒙古的国民生产总值就下降了16%，而目前物价却以每月10%的速度上涨。蒙古总理宾因苏伦承认，在前苏联停止援助

的情况下，导致了蒙古经济的变化。1991年，国民收入只相当于1990年的87.2%，工业产值退到1985年的水平，对外贸易比1990年下降58.6%，通货膨胀率达35%以上，商品奇缺，连向棉面包的供应也十分紧张。92年第一季度，蒙古的生产继续大幅度下降，食品、日用品价格比七年同期上涨了百分之七十以上，据官方报道，蒙古有百分之一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失业率高达8%，犯罪率以12%——14%的年率增长，百姓怨声载道。

三、我怀念过去，那时候有苏联人给东西

由于经济状况恶化，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能源供应短缺，失业率增加，犯罪率上升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人们对蒙古现任政府的改革能否成功的信心有了动摇，有的人甚至怀念起旧时蒙古人民革命党执政的那段时光来。人们对这个1990年执政的多党制政府的信心有了明显的不足，由清一色主张改革的少壮派组成的政府在1990年仿效苏联，结束了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宣布它已步向世界市场经济之路。这个新政府本以为能把这个节奏缓慢的亚洲内陆国推向二十一世纪，用资本主义和外贸来振兴国营经济。然而，情况却走入了他们良好愿望的反面，经济不仅没有振兴，反而更加恶化。于是人们对新政府逐渐产生了不信任感。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宾巴苏伦为平息人们的不满情绪，于1992年1月提出辞职。但这似乎并未减轻普通消费者的不满情绪。一位排了一整天的队最后却一无所获的蒙古老太太说：“我怀念过去，那时候还有苏联给东西。”现在。正在蒙古进行的民主改革充满了苦涩的滋味。这对大多数蒙古人来说是这样的。失业预计数字（14—20%）令全部蒙古人感到不安。他们也许正在担心自己也会成为失业大军中的一员，这种普遍的担忧正在成为对这个国家的民主演变的一个潜在威胁。一个自称不问政治的蒙古人指出：“在共产党经济时期，商店里毕竟还有东西和吃的可买，价格现在疯长、越来越多的人因失去生活手段而偷窃。”表现了对现政府的相当不满。这对新政府的确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失去民心的政府是不会长久的。在普通群众中间，这种不满情绪却有增无减。一位名叫赛伦道尔吉·纳拉图亚的蒙古老人，一辈子都在蒙古的戈壁沙滩上放羊。他同他村落里的许多人一样，宁愿要苏联人给的社会主义，而不要民主。这位头发灰白的七十岁老人抱怨说：“所有这些新的政党统统去他们的吧。谁需要他们？”蒙古在1992年6月又要举行大选了。但是，这个北亚国家广袤的草原和沙滩上，到处都酝酿着不同政见，在实行了两年的多党民主制以后，居住在中国帮助援建的斯巴达式简朴住房里的居民们，深情地谈起从未受到挑战的蒙古人民革命党统治的岁月。这位老人在回顾1990年要求民主的活动分子的抗议活动并最终迫使执政党与他们并同掌权的情景时说：“他们以绝食开始，结果给全国人民带来了饥饿。”新政府面临着夭折的危险，蒙古的民主改革也会半途而废。蒙古政府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普通消费者责备政府，是因为他们受到大米和食品定量配给的影响，并面临着电力和肥皂供应短缺的威胁。蒙古的官方通讯社也曾哀伤地说：“如果不出现转机，追随苏联七十年的蒙古总有一天会断热、断水和断电，经济将会瘫痪。”

苏联和东欧的剧变，对整个世界的格局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对接受苏联援助较多的第三世界国家的，诸如蒙古、古巴等国，其后果更为严重。苏联的崩溃，使蒙古的政治，经济也随之发生改变。政治上，蒙古也不得不随着苏联的后尘，顺应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实行多党制，经济上实行变革，以挽救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企图振兴全国经济。蒙古的改革之路充满了曲折和艰辛，但希望的曙光毕竟出

现了。

第二节 艰难的转轨

一、迈向改革

蒙古自 1924 年宣布“独立”以来，一直只有一个唯一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蒙古人民革命党执掌国家的政权。同其他共产党国家一样，蒙古人民革命党多年实行的也是一党统治，它不允许国内有反对派组织的出现。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几乎是终身制的。自 1925 年党的创始人苏特蒙赫逝世后，乔巴山一直是蒙古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此后，泽登巴尔继承了其权力，长达 30 年之久，一直到八十年代初。一党统治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在它的统治下，并没有真正的选举自由，公民的许多权利得不到保障。在治理蒙古全国的经济以及政治活动中，蒙古人民革命党追随苏联，在政治和经济上都重复了苏联的错误，给蒙古广大人民的生活带来诸多危害。党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信日趋下降，倘若不采取措施，人民革命党有失去执政党地位的危险。

历史发展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民主的春风终于越过了西伯利亚，吹进了这个封闭的广袤的草原之国。随着苏联实施改革，蒙古也仿效苏联，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改革运动。改革首先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蒙古经济由于几十年来一直依赖外援，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立的民族工业，经济呈畸形发展。为探求富国之路，蒙古政府了不得不首先在经济领域实行大的改革，蒙古正式提出改革是在 1987 年 12 月召开的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当时党的总书记巴特蒙赫作了《关于发展畜牧业和改善牧区劳动者文化与生活条件的任务》的报告。这位毕业于苏联共产党中央社会科学院的总书记在报告中首次提到了蒙古正在进行经济管理的改革，这是蒙古通向改革的第一步。虽然蒙古改革的步伐十分缓慢和小心，但毕竟在它几十年严重的僵化统治后，有了一些微小的转机和变化。历史的潮流毕竟是不能阻挡的。巴特蒙赫虽然不是全新的改革者，又在苏联受过“陶冶”，但他的思想还是比较开明和解放的。乌兰巴托上空的乌云开始慢慢地散去了，草原之国的曙光似乎将要降临了。此后，在 1988 年 12 月召开的蒙党第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巴特蒙赫作了《关于改进党的组织与思想工作的新任务》的报告，这位总书记在报告中说，要在蒙古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要实行党政分开，精简机构，改革选举制度，明确各级政权机构的职责，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修改党章、宪法和历史教科书等。全会还点名批评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前领导人乔巴山和泽登巴尔等。这是蒙古人民革命党在政治领域要进行改革的尝试。乔巴山和泽登巴尔，以前在蒙古人民的心目中，就象高悬在蒙古大草原上的太阳，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们是国家的象征，人们把他们当作神一样的崇拜和敬畏。现在，笼罩在他们头上的神秘光环被慢慢揭开了，普通群众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么神圣神秘的党和国家的伟大杰出的领导人竟也犯有不可饶恕的错误。人们开始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既而是愤怒。于是人们对现任政府的改革抱有极大的热情，非常支持蒙古当时进行的各种改革措施，刚开始的蒙古改革呈出一派蓬勃生机的景象。

经济领域的改革还不是最困难的，难的是政治领域的变革。几十年来实行的一党统治，似乎人们已经习惯了，现在要突然进行变革，就象往平静的湖面上投下一

粒石子一样，荡起了无数的水波。蒙古的现任领导人认为，改革政治首先应该从承认党的失误着手，蒙党召开了党中央非常会议和大人民呼拉尔非常会议，会议解除了前领导人，掌握蒙古政权达 30 年之久的泽登巴尔的职务。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在蒙古人民革命党发展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和特殊的意义。泽登巴尔一贯追随苏联的政策，在国内压制、排挤和打击持不同政见者，流放驱逐了一大批党的领导人，并使蒙古的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障碍。在他统治时期，是蒙古人民生活比较困难的时期，它给蒙古人民带来的是饥饿和恐惧。然而，在此之前，蒙古的各级宣传机构却极力吹捧泽氏的功绩，仿佛他是蒙古人民的“救星”似的。这次会议解除了他的职务，是蒙古迈出政治改革的关键而重要的一步。这次大会还有一项成就，那就是选举了有改革思想的 58 岁的巴特蒙赫为新任党中央书记和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他上任后，立即就在经济和政治领域进行了改革。在 1989 年 12 月召开的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九届七中全会上，巴特蒙赫作了《关于加强贯彻党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报告，指出：“改革不是从社会主义作丝毫倒退”，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的发展达到新的质的阶段。”他强调，必须加快党的自身改造工作。

二、执政党：面对绝食

由于蒙古人民革命党在政治上实行改革，放松了全国的言论控制，人们的自由获得了解放，也敢于对政治发表评论了。在这种情况下，在 89 年底和 90 年初，蒙古出现了几个与蒙古人民革命党相对立的反对派组织，其中最主要的有民主党、联合党和民族进步党以及社会党等。这些反对党派多是接受了西方的思想，要求在蒙古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1989 年底，这些反对派结成联盟，在世界局势和东欧剧变的影响下，在蒙古国内刮起了一股以反对社会主义、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浪潮。1990 年初，他们在首都乌兰巴托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和群众集会，发表演讲，要求政府答应他们的条件，最后甚至组织了几百人的绝食队伍。面对这种复杂的局势，蒙古人民革命党于 1990 年 3 月召开了十九届八中全会，讨论当前局势。巴特蒙赫在会上作了《关于当前政局及其结论》的报告，迫于反对派的压力，他建议政治局和书记处集体辞职，并且放弃宪法中关于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作用的条款，实行党政分开。在党纲宣言中规定：蒙党的最高目标是“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巴特蒙赫还分别请求辞去国家元首职务。这是蒙古人民革命党对反对派作出的重大让步，也是执政的共产党同意放弃它对权力垄断的体现。在这次会议上，选出 61 岁的比巴特蒙赫更有改革思想的激进改革派贡奥其尔巴特为党的总书记，并选出了一个由五位年轻得多的成员组成的全新的政治局。党中央委员会经过几天的讨论和辩论，最终满足了近几周刚成立的以民中联盟为主的反对派组织提出的全部要求，并且得到中央政治局的批准。全会还决定撤销蒙党 1984 年关于对前总书记泽登巴尔功绩评价的决议，并将他开除出党，全会还通过了为在 1962——1964 年遭到清洗的所有党的领导人恢复名誉的决定。这次会议，是蒙古共产党向反对派妥协的一次会议。反对派取得了胜利，蒙党的统治地位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然而，反对派组织并不满足、他们在这次会议召开后不久就指责政府在许诺实行民主方面搞欺骗、并组织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还要求政府解散议会，要求国家的领导人不得隶属任何党派，要求实行选举。在这种情况下，1990 年 4 月蒙古人民革命党开始第十九届九中全会，通过了党中央领导机构选举规定，新任党的总书记贡奥

其尔巴特在党的特别代表大会上指出，我党的主要任务在于“向前进，坚决深化改革，革新党”，称党的政策旨在使国家“彻底摆脱危机状态、以人中心，尽力发挥人们的才干”是建立“人道的社会主义”政策的基础。提出要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法制国家”，实行党政分开，精简党的机构，与其他党派在民主的基础上共同参与竞选。并决定在1990年7月举行全国性的大选。于是，在蒙古国内，以民主党等反对派组织的一方，以蒙古人民革命党为一方，在全国采取各种措施，极力拉拢选民。在90年春天，蒙古就已经实行了多党制，但那并没有经过真正的选举。这次，是蒙古历史上真正平等的竞选。蒙古人民革命党为了在选举中获胜，充分利用了自己执政党的有利地位，采取了顺应民心的措施力求以“实绩”在民众中树立起新的形象，以确保在大选中处于有利地位。人民革命党对党的领导班子进行了彻底改组，更新了80%的中央委员，对同前总理和总书记泽登巴尔有牵连的领导人全部进行审查，并且将其中的七人开除出党，对包括前国家元首巴特蒙赫和政府首脑索德诺木在内的人给予留党察看的处分。蒙党还大规模精简机构，党中央撤掉八个部和一个处，国家机关取消十一个部委局，给三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受政治迫害的人平反，提高职工的工资收入，增加退休金，改善日用品的供应等。由于这是蒙古历史上实行的首次大选，所以蒙古人民和蒙古人民革命党以及反对党组织都极为重视。蒙古共产党毕竟在蒙古有着近七十年的执政经历，在群众中也有广泛的基础，加上选举前又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竞选措施以增加民众的拥护，因而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而反对派组织虽然也努力作了宣传，但毕竟它们成立的时间不长，在全国没有基础，也没有执政的经验。因此，在这首次举行的极为关键的大选中，蒙古人民革命党获得了胜利，它取得了大人民呼拉尔85%的席位和国家小呼拉尔62%的席位。蒙古共产党虽然在大选中获胜，但由该党单独执政的局面已成为历史，它不得不和主要的反对党民族复兴进步党一起组成了多党制的联合政府，在全国推行民主化和经济改革。

三、先访中国而不先访俄国的蒙古国新总统

蒙古实行多党制的联合政府后，面临着一系列的政治、经济难题。国外，苏联的援助日益减少甚至停止；国内，实行新的经济改革措施不仅没有收到预期的改革成果，反而造成了全国经济的混乱，人民还不适应这种突然的大规模的改革。改革也部分地损害了群众的利益。特别是消费品供应的短缺，更是引起人们的怨声载道。而反对派组织对政府的改革仍嫌过慢，他们要求实行更激进的改革措施，希望马上在蒙古实现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并且在政治上更向西方靠拢。蒙古的多党联合政府于是就决定实行总统制。在1990年7月蒙古举行首次选举后、蒙古共产党和反对派组织又紧锣密鼓地展开了竞选总统的活动，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角逐，一个默默无闻且毫不引人注目的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彭萨勒玛·奥其尔巴特当选为蒙古历史上第一位总统。这位年轻的总统于1942年生于蒙古扎布汗省图德布泰县的一个牧民家庭，在他23岁时加入了蒙古人民革命党，同蒙古的其他许多高级干部一样、他也在苏联接受教育。1965年，他毕业于苏联矿业学院，并且获得了矿业工程师的称号。1965年——1967年，任工业部专家。从1985年起，他担任经济联络委员会主席，对外经济联络和供应部长。在1990年3月起方被当选为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人们从他的简历里不难发现，他没有多少惊天动地的政绩。仅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他从一个国内外都不大了解，并且被反对派讥为“什么都不懂的放牧人”，成为国家总统，颇为引人注目。

这位当选的总统是学矿出身的，大约他的思想也象蒙古草原一样宽广。虽然他很少为世人所了解，但却是蒙古新一代改革领袖中的佼佼者。他仔细地研究了蒙古人民革命党七十年的发展历程，总结了其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得失，从中得出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他是一位在政治上比较有远见的政治家，他强调：“全面发展与中苏两国的关系，是蒙古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他上任伊始，就发表了如下谈话：“过去我们亲近一个邻国而疏远另一个邻国的做法没有得到什么好处，相反，却失去了很多。”他把外交的重点放在改善和发展与中国的传统关系上。中国改革的成功也强烈地吸引着他。为此，1990年3月，他就任蒙古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后，首先访问了中国，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热情接待。当然，他首先访问中国而没有象传统习俗认为的那样去访问苏联，受到了苏联舆论的责难和蒙古国内的非议。然而，这位矿业专家却毫不含糊地说：“我们没有先去访问苏联的义务。那种认为先访问苏联的想法是旧思维的表现。”这表明了蒙古的对外政策有了很大的改变，想把这个实际上处于半封闭状态的国家重新推到世界民族之林中去。

四、全盘西化：走不通的死胡同

蒙古政治上的改革并没有就此停步。在1991年1月，蒙古人民革命党公布新的党纲草案，总的来说，这个草案仍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党反对社会阶级、集团内的首富悬殊，坚决维护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的利益，在经济管理上主张市场与国家调节相结合，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实行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在谈到对外政策时，党纲草案坚持在对外关系中奉行不结盟政策，首先全面发展与苏中两大邻国的友好关系。它是蒙古人民革命党政策的重大转变。实际上，党纲草案体现了蒙古现任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在91年6月，蒙古政府又起草了一部新宪法，新宪法体现了蒙古政府在政治改革中决定奉行更加激烈的改革措施。它规定：要在蒙古实行美国式的总统选举，允许公民搞私营企业，并且明确了人权范围。同时决定更改国名，把共产主义味道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改为“蒙古”。蒙古全国正在缓慢地放弃实行了近七十年的社会主义，逐渐向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过渡。它也准备紧步东欧和苏联的后尘，转而全盘西化。虽然这种变化很缓慢，

不象东欧和苏联那样剧烈和明显，蒙古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蒙古人民革命党执政，虽然该党已放弃了大部分马列主义理论。表面上，蒙古仍然是共产主义在全世界所剩的最后几个堡垒之一，但实际上，蒙古正在脱离社会主义的大道，一步一步向西方世界靠近。

当然，蒙古的政治改革也并非一帆风顺，有许多改革措施受到了老党员的强烈反对。蒙古现任总理宾巴苏伦虽一再强调：“政治领域的变化是不可逆转的。”在蒙古推行“改革的新路线”，但阻力仍然很大。蒙古的改革举步维艰。有的党的领导人也有保守思想。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总书记布·达希云登就驳斥了民主派要该党解散的言论，他说：“民主派认为我们应该象苏共那样做，但我们是独立国家，不是苏联的共和国。面对如此艰难的内外局势，宾巴苏伦总理于92年1月向蒙古议会大人民呼拉尔提出辞职，虽未获准，却也使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分裂在所难免。该党显然在议会中拥有绝对的多数，然而，自1990年以来，这个前共产党已经分裂出蒙古民族复兴党等几个对立的派别。该党内部对改革也有不同意见。人民革命党的不团

结，很可能给该党造成很大危害，给反对派组织以可乘之机。在这种为难情形下，1992年2月，蒙党在乌兰巴托举行21大，这次会议进一步背离了马列主义。中央委员会书记巴嘎班热说，现任领导人认为，“目前没有必要改变党的名称，……我们党不怕‘革命’这个字眼。”他是针对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主席布·达希云登在一次讲话中说要去掉该党中“革命”二字而说这番话的。他在随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还说，他的党已放弃了大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和国际社会主义等。然而他又称，党将继续坚持把人放在中心地位的思想。

这种矛盾的政策，体现了蒙古政府在新形势面前的动摇不定的心态和对改革的前途没有足够的信心。一方面，形势逼迫他们不得不做出改革的决定。另一方面，许多守旧的思想仍不时在蒙党中体现出来，有时还表现在具体的政策上，改革本身就是一艘摇摆不定的航船，没有现成的航路，只能在探索中小心翼翼地前行。

然而，蒙古人民革命党和反对派组织的竞选活动并没有停止，也许永远不会停止。1992年7月2日是蒙古大选的日子，在两年前不甘心失败的反对派组织希望这次能卷土重来，一雪前耻。为了在这次大选中获胜，蒙古五个主要反对党中的三个——社会民主党、复兴党、联合党于4月结成了大选联盟，其他两个反对党民主党、民族进步党也与之遥相呼应。他们攻击人民革命党是导致蒙古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甚至宣称：“如果蒙古人民革命党获胜，蒙古人民将陷入苦难的深渊，国家将面临灭亡的危险。”除了在国内进行这种耸人听闻的宣传外，这五个反对党的领导人还联名给美国国务卿贝克写信，希望美国派人到蒙古训练政党，以助其在大选中获胜。寻求西方和美国的支持是蒙古反对党的主要手段之一，他们企图借助外国的力量帮助他们在国内“合法”地夺取政权。

面对反对派咄咄逼人的宣传攻势，蒙古人民革命党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多党制政府成立两年来，蒙古经济继续恶化，人民多有怨言。因此，如何解决经济问题，便成为谁能在本次大选中获胜的关键因素。为此，人民革命党在92年4月提出的竞选纲领中提出了一系列阻止生产下降，恢复经济的主要措施。纲领指出，近两年政府为“挽救经济危机”而实行的“休克疗法”式的激进的经济改革“把经济引入了歧途。”强调坚持该党的“循序渐进地转入市场机制”的做法，以在“两年内稳定恢复经济，减少失业，保持人民生活水平不再下降。”由于该党承认了失误，而且其推出的竞选纲领大多和人们的切身利益有关，远比反对派空洞的恫吓宣传更有吸引力，更能得到人们的支持和拥戴。因而在这次大选中，蒙古的反对派组织又一次尝到了失败的滋味，他们失败得比第一次更惨，蒙古人民革命党以绝对优势获胜。虽然在两次大选中，蒙古人民革命党都取得了胜利。但现时的蒙古，经济问题仍然困扰着全国，人们的生活水平继续下降，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正在日益滋长。蒙古的改革进入了艰难的境地，前进不得，后退不能，大有夭折的危险。正在此时，在蒙古的南方，一位巨人向他伸出了强有力的援助之手。

第三节 走向未来的中蒙关系

一、蒙古国的“中国热”

中国和蒙古之间，本来有着传统的深厚友谊，在蒙古没有从中国独立出去以前

还是一家。五十年代初，中蒙关系是非常睦邻友好的，中国曾经给蒙古以巨大的帮助，有几万中国员工在蒙古工作。后随中苏关系的紧张和破裂，中蒙关系也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世界形势的发展，国际格局的变化，蒙古也逐渐调整了对内对外政策，自1985年以来，蒙古领导人多次谈到要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问题，双方的交往也频繁起来，1989年3月，中蒙两国签订1989—1990年度文化交流执行计划，同月，蒙古外长贡布苏伦访问了中国，双方签署了关于成立中蒙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委员会，两国公民相互往来和恢复蒙古驻呼和浩特市总领事馆的协议。7月，中联部长朱良访蒙，实现了中蒙两党关系正常化。中蒙1990年相互供货和支付议定书签字。中蒙同的贸易也有了显著的增长。1986年，中蒙两国政府签订了第一个长期贸易协定，1987年，中蒙贸易额达1700万瑞士法郎。蒙古主要向中国供应白板纸、旧轮胎、机制地毯、工作靴、羚羊角、儿童靴等。中国主要向蒙古提供运动衣、暖水瓶、排球、油刷等。到1988年，中蒙贸易总额就达1358万瑞士法郎，1989年，更增加到3700万。中国和蒙古双方在由专业化公司完成政府规定的贸易总额任务后，还积极开展了协议外的易货贸易，仅1988年，双方这种贸易总额就达到了530万多万瑞士法郎。与此同时，双方边境贸易日趋活跃。实行改革开放的中国和蒙古在经济方面的关系日益密切，长期奉行亲苏政策的蒙古，把对华贸易作为恢复经济的良策之一。中国的内蒙古与蒙古的边界线长达六千多公里，以呼和浩特市为舞台的中蒙贸易日益活跃。

六十年代初受中苏对立影响而关闭的蒙古驻呼和浩特市总领事馆于91年7月正式恢复，它现在成了连接两国关系的重要桥梁。蒙古由于生活品的短缺，故在双方的贸易中，中国向蒙古出口的商品主要是大米、小麦和食糖等食品。91年8月中旬，中国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办那达慕大会，为期十天的“内蒙古经济贸易交易会”也同时举行，蒙古派人参加了这次交易会，并达成了多项协议。中国的商品强烈地吸引蒙古客商，在北京至乌兰巴托的国际列车上，常常可以看到许多蒙古商人带着中国货物的大包小包。一位蒙古商人特地坐了十二个小时的火车，从乌兰巴托市赶到呼和浩特市，他由衷地说：“此行的目的是购买中国的衣料，蒙古自己生产的远不如中国的好。”蒙古和中国都是在近几年开始搞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以前的中蒙边界虽长达六七千公里，但它就象一道戒备森严的鸿沟，把中蒙两国隔成完全不同的世界，双方鸡犬之声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现在，改革的浪潮终于使它们又走到了一起。双方除在经济领域进行广泛合作外，其他领域的交往也日益密切。1988年，中蒙棋手在北京举行了国际象棋友谊赛，它是六十年来第一次，蒙古驻华大使鲁布桑·楚勒特本在希望运动员时说：“这不仅是一场比赛，也是一次友谊活动，不论谁胜谁负，都是友谊的胜利。”1990年，第十届亚运会在北京举行，蒙古不仅派运动员参赛，还派遣了记者组和组成了亚运会啦啦队，使中蒙两国间的体育交流跃上了新台阶。

同时，蒙古为适应扩大了的和中国交往的需要，这个草原之国掀起了中国热。在外语教学方面，以往主要开设俄语的学校开始设立汉语课程了。它反映出蒙古要完全实现对华关系正常化的迹象。这个“草原之国”正在向疏远了六十多年的南方大国递去热情的目光。于此同时，在蒙古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第一个由国家研究机构的中国问题专家、大学的汉语教师和学生组成的民间中国研究团体，——蒙古中国学者联合会。该会的目的是要将因中苏对立等严峻的国际环境而被迫中断了的中国学恢复起来，并在国内广泛宣传有关中国的知识。这对不熟悉中国情况的一般国民

起到了启发作用。

在汉语教学方面，“蒙古俄语师范学院”从 89 年 9 月起改名为“外国语学院”，除俄语外，还开设了汉、日、英等学科。此外，蒙古还制定了新的外语教学方针，打算在今后四年之内将普通中小学的俄语课授课时间缩短一半，以便腾出课时教授汉语和其他外语。据乌兰巴托市报道，市内除大学和普通学校新设了汉语课程外，还出现了许多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汉语的学习班。“汉语热”正在席卷着整个蒙古，这也是中蒙关系日趋密切的象征。蒙古社会之所以对中国社会产生如此大的兴趣，是因为：一是重建陷于不景气状态的经济，有必要向在十年改革和开放中取得了巨大成果的中国学习，二是通晓中国情况和语言的人才严重不足，培养骨干，交流人才，已成为当务之急。90 年 1 月，贡奥其尔巴特以蒙古人民革命党最高领导人的身份访问中国广州时提出：“中国的成果和经验对于目前正在从事改革开放的我国来说，具有积极的意义。”它表明，蒙古领导人已率先做出了学习中国的姿态。

二、杨尚昆的蒙古之行

八月的蒙古，天空湛蓝，像水洗过似的清澈透明；牧草青青，宛如绿绒毛毯铺向绵延起伏的原野。地平线上，白云伴着枣红色的马匹、深褐色的牛群和灰白色的羊群在缓缓地飘动着。牧草茂盛，牛羊肥壮，风光美丽，气候宜人。在这喜庆丰收的美好季节，蒙古人民热烈地欢迎和热情地接待来自南方邻国的国家元首杨尚昆主席；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 30 年来对蒙古的首次访问。对此，蒙古方面极为重视，很早就进行了精心的准备、蒙古准备热情接待杨尚昆主席，恰好一场秋雨，使蒙古的暴热尽消，碧空如洗，凉风习习，乌兰巴托市正以新姿态准备迎接来自中国的国家主席。雨后的乌兰巴托市的街道两旁，青草如茵，五彩续纷的花朵艳丽夺目，阵阵清风吹来，空气里充满了清新而甜醉的芳香。也吹散了蒙中两国关系上空的乌云。为迎接杨主席的到来，首都乌兰巴托各主要街道清扫得干干净净，各主要交通要道增设了疏通车流和维持治安的警察，主要大街两旁的灯柱上飘扬着中蒙两国的国旗，以及各色鲜艳的彩旗，标志着首都西大门的“友谊门”上悬挂着用中蒙两国文字书写的“热烈欢迎中国贵宾”的巨幅标语。在乌兰巴托国际机场的主要建筑物上，中蒙两国文字书写的“热烈欢迎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同志”的巨幅存语在风中摇动，中蒙两国国旗迎风飘扬。蒙古国宾馆的负责人说，在杨主席访问期间，国宾馆将只接待杨主席一行，这次接待规模之大，是近年来所没有的。

1991 年 8 月 26 日，对中蒙两国人民来说，都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当 80 岁高龄的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健步走下飞机时，早已等候多时的蒙古国总统贡奥其尔巴特快步上前去，两双大手有力地握到了一起，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新的时代的重新开始。杨尚昆主席那浓重的四川音在国际机场上空飘扬，由远而近：

“中蒙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长期以来，我们两国人民互相尊重，互相帮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要把中蒙两国长达 4600 多公里的边界线建设成为和平的友谊线，以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杨主席的这次访问，将给蒙古这个北方邻国带去了主要经济援助，人们只要看看跟随杨出访的主要随员就会明白杨此行的目的了。他们是：中国的财政部长王丙乾，对外经济贸易部长李岚清，外交部副部长田曾佩，铁道部副部长孙永福等。在为期四天的访问中，中蒙双方共签署了五个协定：即《关于蒙古通过中国领土出入海洋和边境运输的协定》，《关于中国向蒙古提供贷款的协定》，

《关于相互鼓励和保护投资协定》，《关于避免双重征收所得税和防止偷税漏税的协定》。这些协定，对蒙古这个内陆国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其中的一揽子商业贷款，更如雪中送炭，使蒙古有可能渡过目前严重的经济危机。根据协定，蒙古可以利用中国的天津港作为贸易通道。为了保证交通，1993年1月，中蒙决定修筑一条天津——北京——乌兰巴托的高质量的道路，以利蒙古货物的外运。这对蒙古发展对外贸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访问期间，杨主席说，为了表达中国人民对蒙古人民的一点心意，他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向蒙古赠送大米、食品、药品等一大批物资。

杨尚昆主席访问蒙古，是在蒙古经济遇到空前危机的情形下进行的，它不仅给广大人民带去了中国人民的传统友谊，而且给蒙古经济的恢复带去了新的希望。中国向蒙古提供了一大批经济方面的援助，这对蒙古坚持改革，恢复经济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蒙古这个曾经是中国的兄弟般的国家的经济陷入危机的时候，它的南方邻国并没有袖手旁观，而热情地伸出了援助之手，向蒙古人民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只要有了中国的援助，蒙古的经济改革一定会取得成功。中蒙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一定会得到巩固和加深。杨尚昆主席访问蒙古，是中蒙关系史上的重要里程碑。